

纪实史学丛书

ТРАГЕДИЯ
И
ДОБЛЕСТЬ
АФГАНА

阿富汗战争的
悲剧

〔俄〕A.利亚霍夫斯基 著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水隐醉月

纪实文学丛书

ТРАГЕДИЯ
И
ДОБЛЕСТЬ
АФГАНА

阿富汗战争的 悲剧

〔俄〕A. 利亚霍夫斯基 著
刘宪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 [俄] A. 利亚霍夫斯基著; 刘宪平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
(纪实史学丛书)
ISBN 7-80190-141-X

I. 阿… II. ① A… ② 刘… III. 阿富汗抗苏战争—研究
IV. K37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1767 号

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 纪实史学丛书 ·

著 者 / [俄] A. 利亚霍夫斯基
译 者 / 刘宪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国际文化事业部 (010)65140868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 静 雁 斌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6.75
字 数 / 416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141-X/K · 049
著作权合 / 图字 01-2003-8379 号
同登记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莫斯科1978.12.5 苏联—阿富汗友好条约签署现场



卡尔迈勒拜访苏联驻阿富汗使馆

艾哈迈德·沙赫·马苏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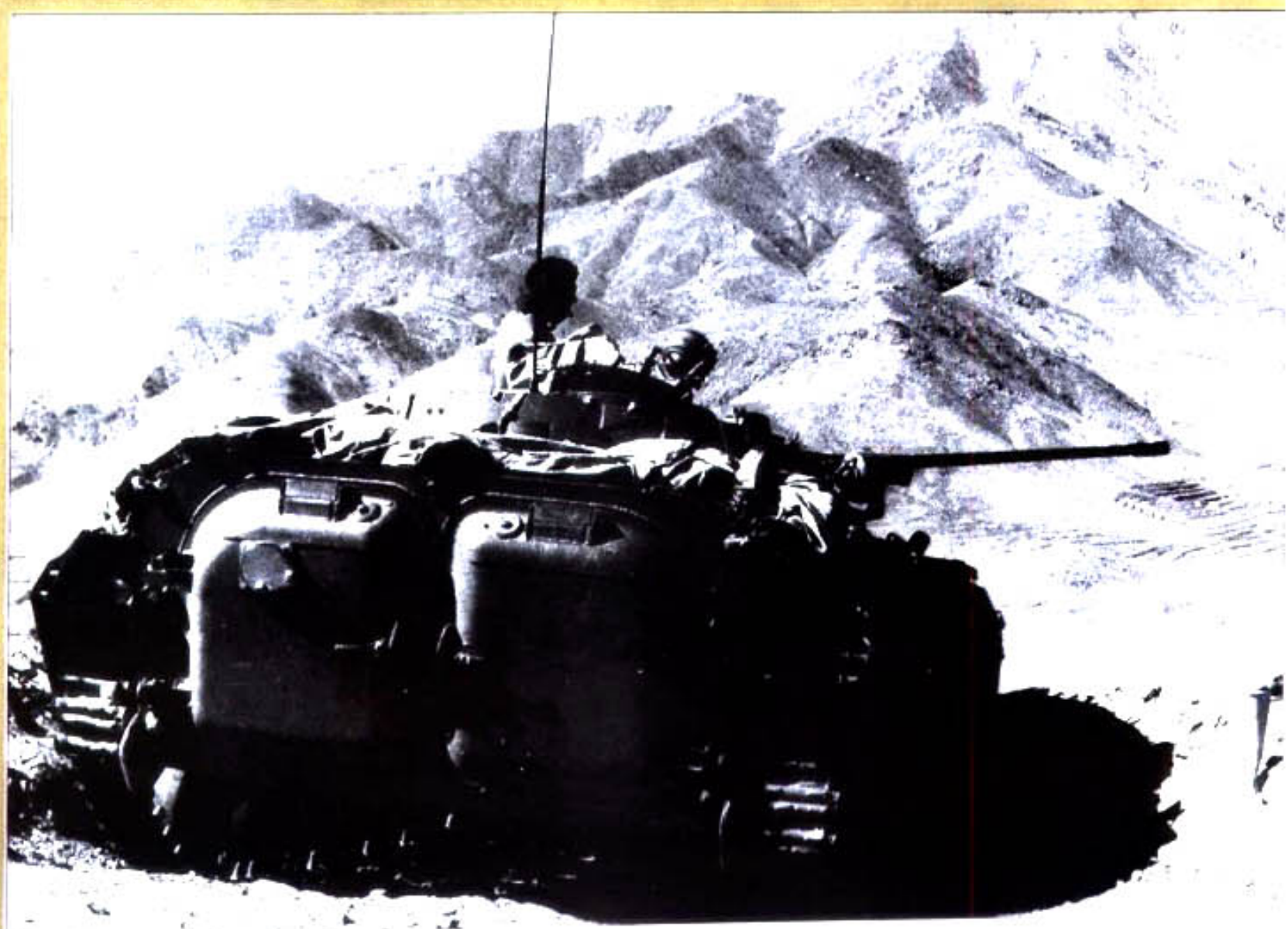


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家作战指挥组

在潘捷舍尔地区的作战行动



步兵作战车在哨所值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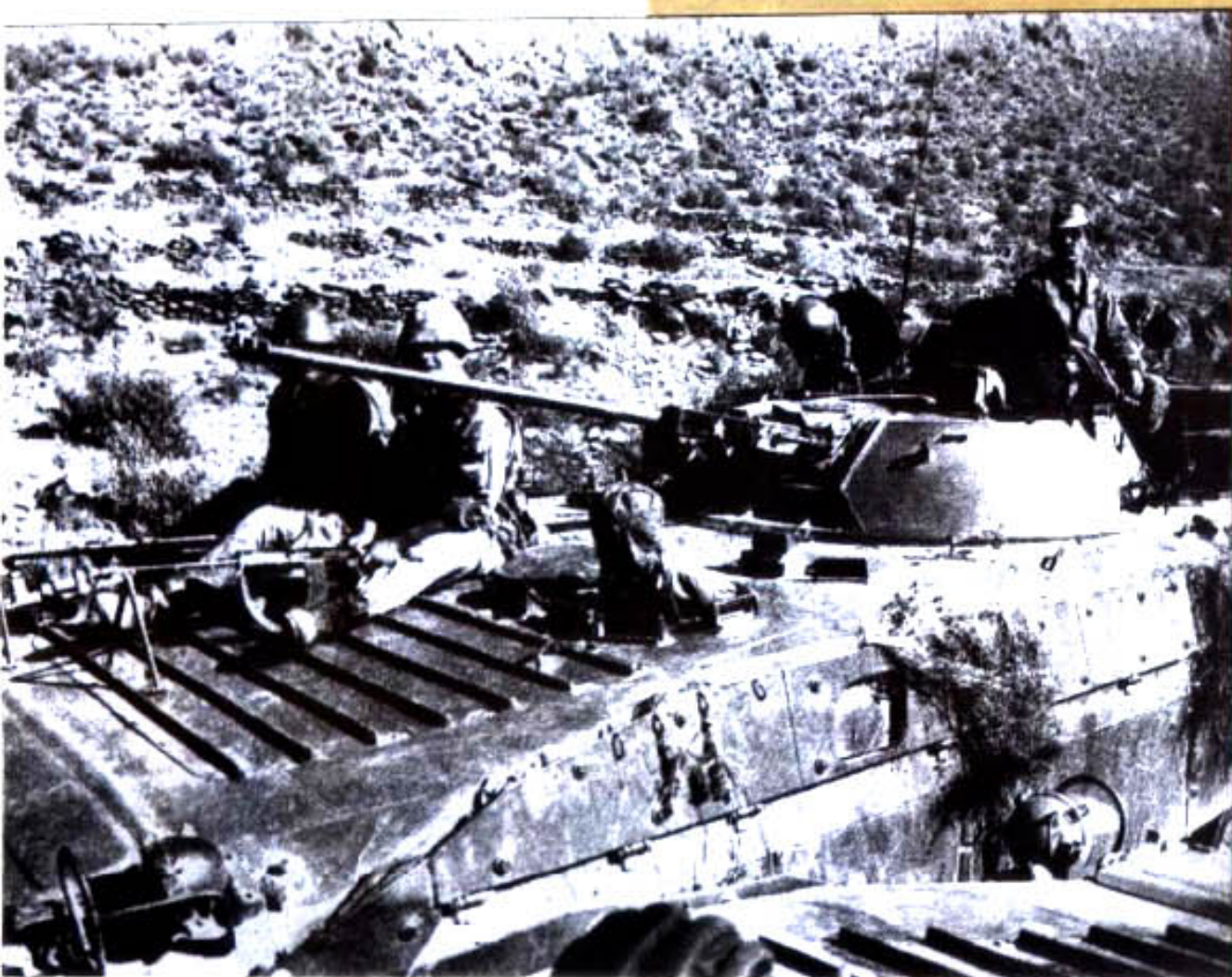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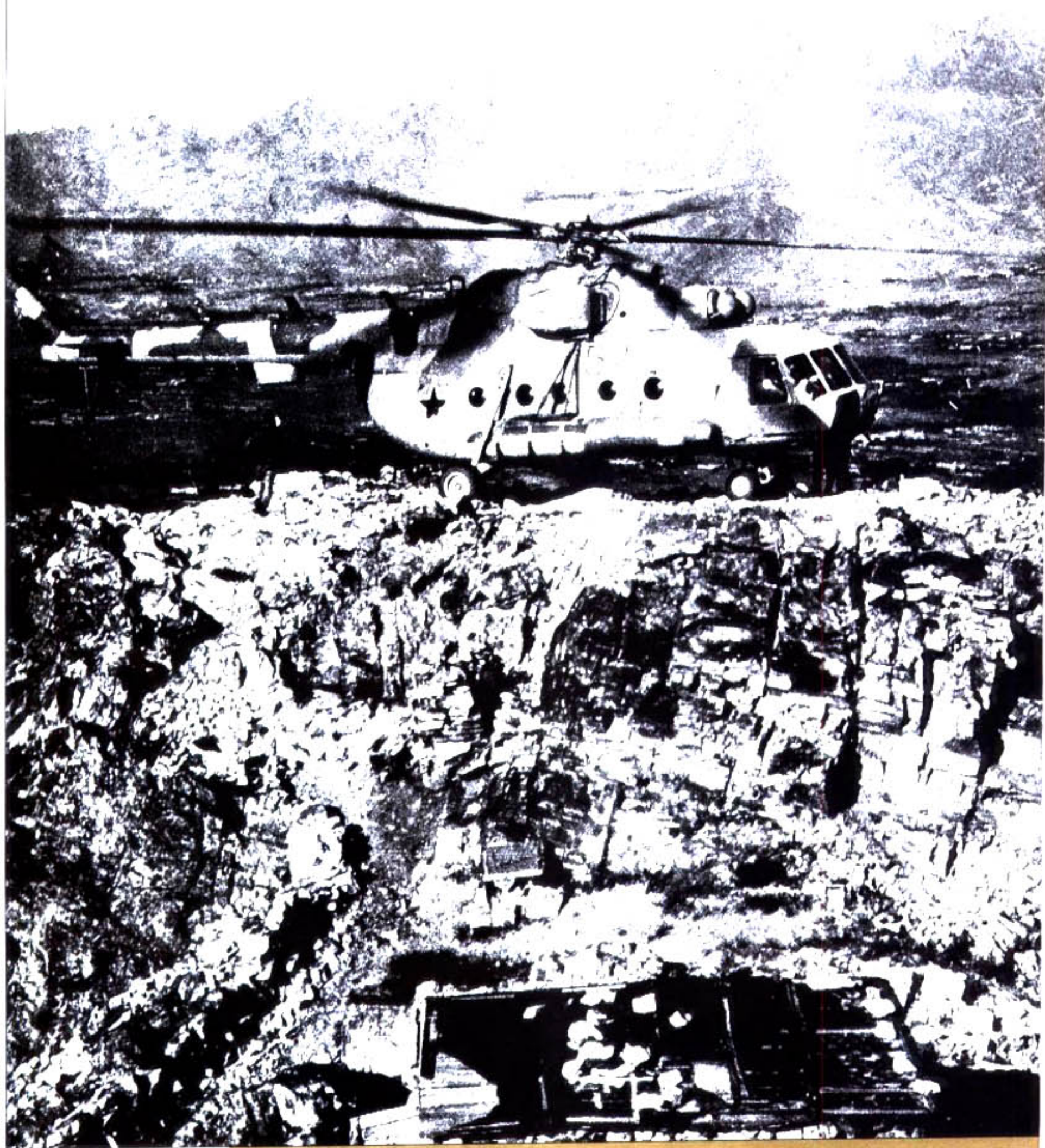


亚利谢尔山区的作战行动

1979.12.27 苏联克格勃“雷”特遣小组人员在攻打
阿富汗总统府塔日-别克宫前夕



米—3直升机在哨所降落



战斗中的2—型步兵作战车

狙击兵在巴达赫山区涉水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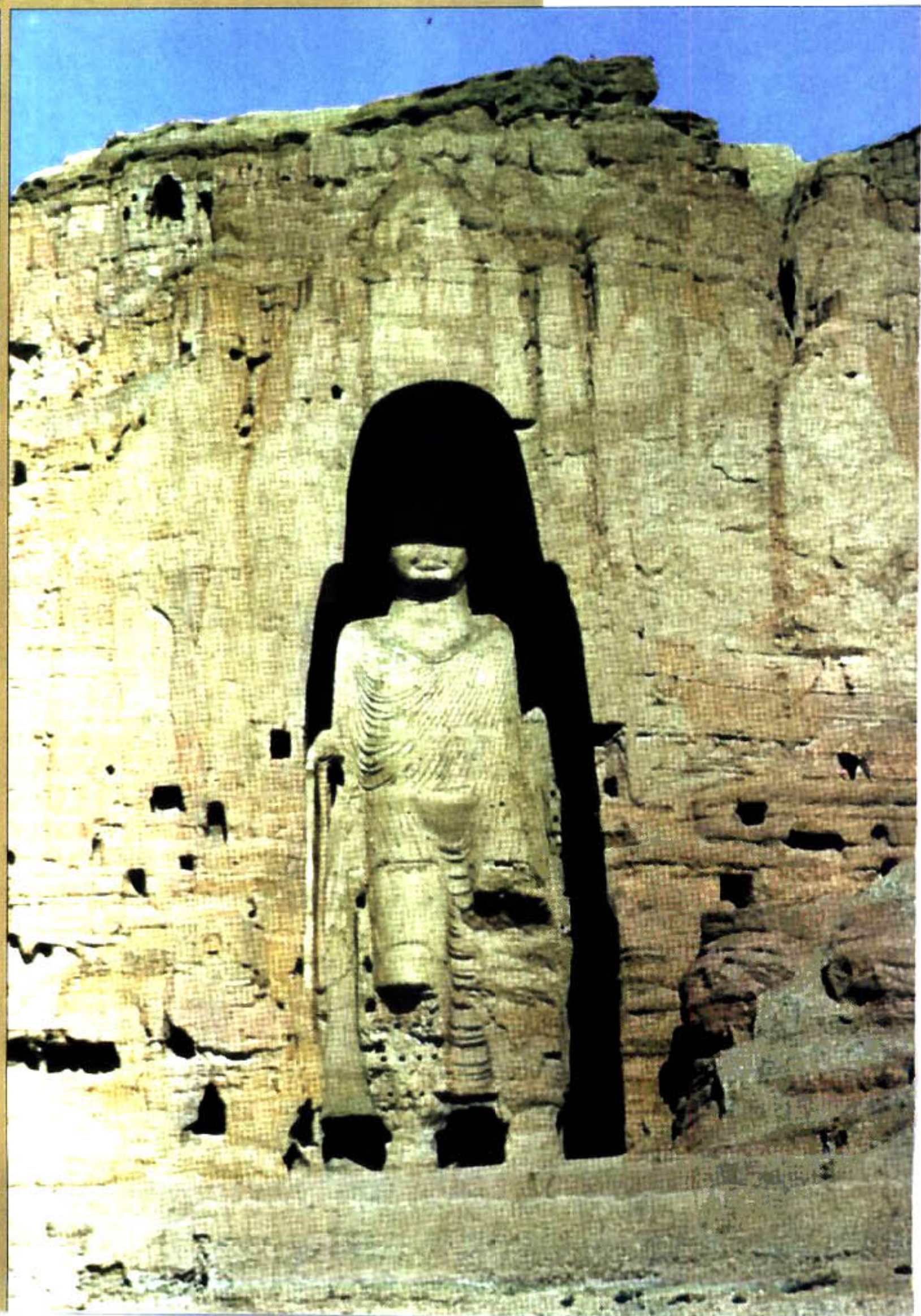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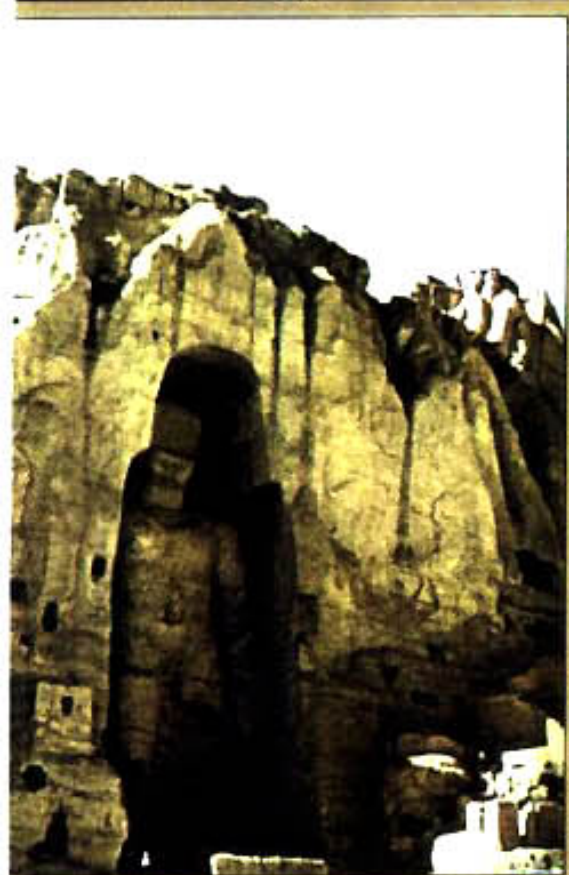
做了简单包扎处理的伤员
在作战现场



一支为圣战者运送武器弹药
的马帮队被击溃

险峻的山间公路

巴米扬石佛



Александр Ляховский

ТРАГЕДИЯ и ДОБЛЕСТЬ АФГАНА

© Ляховский А. А. , 1995

© Оформление ГПИ “Искона”, 1995

本书根据莫斯科“恒古”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出版者的话

读史使人明智。

读解历史，常读常新。

历史没有终点。

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然而史料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历史学家创作史书，读者通过历史学家创作的史书了解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史书，很多确是历史研究成功之作，颇具学术价值，但因其含义深奥，描述刻板和文字拘谨而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历史学家固然应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历史创作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人们了解历史。因此，除了供学者之间交流的研究著作之外，历史学家还应该让史书以一种可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历史研究领域，那种认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就一定只能是“象牙塔”内的陈列品，或通俗的历史著作就一定缺乏深厚的研究功底的想法，未免失之偏颇。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一般读者都是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否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专门为学术交流的作品是需要的（学术论文、专题研究成果大抵就是如此），但为广大读者阅读的作品也是非常需要的（大部分历史书籍理应如此）。而要写出这后一种的作品，作者除应踏实地在研究上下功夫，还要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当然，这种表现形式是基于纪述历史的真实，以使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为目的，而不是“演义”、“戏说”等文学创作，后者的目的是借助历史故事给人以文学的感受或娱乐，人们不会认为那就是真实历史。

“纪实史学丛书”则是要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一番努力：

第一，我们首批选择的大多是苏联历史上引入注意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或者过去的史书中没有说清楚，或者以往的研究带有片面性，或者歪曲了事情的真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它既是专家学者注意研究的课题，又是一般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开这个谜团，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又是广大读者的需求。

第二，毫无疑问，只有掌握了大量史料，历史研究才会有深度。我们丛书的作者具有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又掌握有大量史料，有条件拿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以来发表苏联历史中新史料的俄国杂志多达150余种，各类专题及文集更是层出不穷。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我们确定以纪述史实为主的写作形式，不求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以描述历史过程为主线，把作者的观点、分析、评论融于史实记述之中。显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尽到这一职责，将由读者来判定。

如果我们的作品尚能令读者满意，我们当继续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历史读物奉献给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阿富汗——苏联的南部邻国.....	1
历史点滴.....	1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14
扎希尔·沙赫王朝的终结.....	18
伊斯兰势力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22
1978 年 4 月再次发生政变	24
苏联专家的无能	37
阿富汗式的社会“改造”	39
反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斗争伊始	52
阿富汗与超级大国的关系	55
“人民派”反对“旗帜派”	59
第二章 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夕	64
同志们请求军事援助	64
秘密准备	72

塔拉基遇害	81
勃列日涅夫决定拯救“人民”政权	98
出兵阿富汗在即	124
第三章 苏联军队开赴阿富汗	137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137
代号 333 行动	140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掌权	152
同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160
第 40 集团军被迫参战	193
阿富汗人民不接受人民民主党的独裁	200
苏联出兵是错着吗?	202
第四章 第 40 集团军同“圣战者”作战	210
如何对付游击队	210
作战评述	214
武器和技术装备在山区	223
局部战争是棘手的事	225
第五章 阿富汗的“圣战者”	229
叛乱运动的性质	229
阿富汗反对派在巴基斯坦	235
在伊朗的阿富汗反对派力量	245
阿富汗的反对派武装阵营	251
抵抗力量的基础设施	254

叛匪的武器装备·····	256
圣战的方式和手段·····	258
 第六章 如何摆脱圈套 ·····	267
新政权给予人民什么了? ·····	267
苏联军队是人民民主党统治的保障·····	269
撤军方针·····	274
苏联军队应该离开·····	276
 第七章 如何制止流血? ·····	281
戈尔巴乔夫把赌注押在纳吉布拉身上·····	281
民族和解政策导致党员消沉起来·····	295
创建“新的政党”和“实力阵线” ·····	303
合作是民族和解政策的主要方针·····	306
日内瓦协议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吗? ·····	309
 第八章 别了, 阿富汗! ·····	319
撤军第一阶段·····	319
联合国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	321
反对派的活动频繁起来·····	331
人民民主党危机四伏·····	334
“尽可能多发运武器弹药来!” ·····	338
停止撤军问题·····	345
反对“潘捷舍尔雄狮”的斗争·····	356
“谁也不想再杀人” ·····	388

我们撤离、撤离、撤离·····	390
第九章 苏联撤军以后的阿富汗·····	396
夺权计划受挫·····	396
和棋局面·····	401
寻找出路，摆脱困境·····	406
纳吉布拉政权垮台·····	410
阿富汗新领导人莫贾达吉·····	415
阿富汗战争没有尽头——塔利班的崛起·····	417
阿富汗战争之总结和经验教训·····	429
第十章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阿富汗渗透到 中亚和俄罗斯·····	443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战争”的第一个 牺牲品·····	443
车臣——俄罗斯的阿富汗·····	457
卫国战争后的车臣·····	465
车臣战争（1994～1996年）·····	469
“独立的车臣”·····	485
俄罗斯军队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反恐怖行动·····	490
车臣：初步的教训和结论·····	499
结束语·····	507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510

第一章 阿富汗——苏联的南部邻国



历史点滴

最近 20 年，阿富汗——这个地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它落入标志着两种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冷战”发展到剧烈对抗状态的白热化轨道。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阐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在阿富汗问题上如此针锋相对。

许多世纪以来，在这个“亚洲十字路口”就混居着不同的民族，有的是自古生息于此，有的是为寻找幸福生活而来。按照今天的疆界，阿富汗分布于伊朗高原东部，其领土的五分之四属于兴都库什、科希—巴博、帕罗帕米山脉，它们在阿富汗境内的绝对高度处于海拔 3000~7750 米之间。全国没有铁路，交通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公路和山间小路，以及航空运输。与中亚国家交界的北部地区起伏着群山绵延的兴都库什山脉，与巴基斯坦交界的东部地区矗立着峰峦重叠的苏莱曼山脉。这里大多是干旱多石的高山荒原和高山草原。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之间的是加兹尼—坎大哈高原，它们几乎占去了全部国土的百分之二十。南部基本上是无水无植被的死亡区域，那里是喀什沙漠和被称为“死亡沙漠”的达什吉—玛尔戈沙漠，以及被称为“流沙之国”的雷吉斯坦沙漠。这些沙漠由西向东伸延了 540 公里，从北向南延续了 580 公里。居民们基本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山谷、

峡谷、河谷和沙漠绿洲。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对于阿富汗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风貌的形成抹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特征。

阿富汗历史充满形形色色的事件和神秘的传奇。比如，对于占多数的人种——普什图人（阿富汗人）的起源就众说纷纭。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他们是传说中被波斯皇帝迁移至伊朗东部的那批犹太人后裔。这种假设是以旧约中提到的哈勃尔（好像是今天位于巴阿之间的海别尔通道）——历史上驱赶犹太部落的一个地方——和阿富汗人的相貌（鹰钩鼻子和常见的黑色卷发）为依据的，而且进一步说明他们的称呼来自一个叫做阿富汗的古代祖先，他曾经是索洛蒙的军队统帅。另一种推测则把他们说成是公元前两千年初从西北方向迁徙过来的雅利安部落后裔。

其实，类似的传说在东方不胜枚举。当地人（塔吉克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喜好拉扯与古犹太人相关联的家谱。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断然认为自己属于雅利安人。第三种人则把自己划归为亚历山大马其顿或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这也并非偶然，毕竟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列强和文明社会都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古代巴克特里亚、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贵霜帝国、伽色尼王朝、吉尔王朝、萨曼王朝、成吉思汗后裔和铁木耳后裔、印度大莫卧儿王国、伊朗萨菲王国、纳迪尔—沙赫·阿弗沙尔……。

历史上第一次提到阿富汗人（普什图人）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他在列举分布于伊朗东部的不同部落时，谈到了居住在印度附近的山里人，称其为帕克蒂人。众所周知，阿富汗人自诩为“普什图人”，而印度人称他们为“帕坦人”。公元初的中国编年史在记述突厥部落或突厥汗国（萨基人、匈奴人）征服喀布利斯坦时，提到了居住在苏莱曼南部山区的普都人，他们同犹太部落进行了浴血搏杀。11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布·纳赛尔·穆罕默德也叙述过阿富汗人的故事：“他们居住于群山之巅和悬崖峭壁

之间，在周边地区的峡谷里从事抢劫和掠夺”。阿布·纳赛尔·穆罕默德所言表明，加兹尼地区的山脉就是希腊人和中国人提到的苏莱曼山脉，也就是说，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阿富汗人始终居住在一个地方，而且没有改变在希罗多德时代就形成的野蛮。

总之，苏莱曼山脉就是阿富汗人的发祥地。这片无水无树的贫穷地区给予阿富汗人冷酷严峻的教育和锤炼，使他们具备了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极强的自尊心。由于地处东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欧亚通道，阿富汗屡屡遭受各种征服者的侵袭（亚历山大马其顿、白匈奴游牧部落、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部队）。由于缺乏惹眼的财富，它未引起过强邻的贪心，即使“顺便走走”，逗留的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数百年来，当地人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独立性和自由感。自然资源极端贫乏，哪怕最后一丁点东西也要大家分享。这促使人们团结起来，热情好客成为其性格特点。另一方面，贫穷却驱使人们前往自己生存地之外去寻找生活资料，这就是偷盗、袭击和掠夺别人，这又使阿富汗人养成了诸如贪婪、虚伪、狡诈、背信弃义等特殊的强盗习气和本性。他们身上还显露出苏莱曼山区炎热干燥气候的影响：性格急躁，脾气暴烈，富于报复。

公元7世纪起，阿拉伯哈利发国开始征服中亚细亚。这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建立在伊斯兰教与当地民族传统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新文化的发展。此前，阿富汗领土内的穆斯林宗教已经在排挤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生存。保留至今的一些古代建筑遗迹可以佐证过去。比如，哈德（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佛教建筑群、巴米扬的石窟城、城内有两尊凿刻在峭壁之上的巨型石佛（高度分别为37米和53.5米）等等。

毫无疑问，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中，伊斯兰教对阿富汗人的影响最为深刻。民间传说把阿富汗人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追溯到公元9世纪。然而，也有史料把发生如此重要历史

事件的时间限定在 13 世纪。其实，各个部落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是不尽相同的。

阿富汗人素以尚武好斗著称，历代征战者都试图以剑与火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好在此地集结部队，所以阿富汗人自青少年起就开始从军。比如，马哈茂德—加兹尼斯基（11 世纪）便利用效力的阿富汗青年招募起一支部队击溃了印度人。作为奖励，他把加兹尼、喀布尔和白沙瓦附近的一些地区划拨给阿富汗人居住。这是在伊朗人和印度人占多数的谷地中设立的第一批阿富汗人居民点。后来，随着古代居民在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侵犯下不断消亡，阿富汗人逐渐走下山来，占据平原地带，一部分人保持着游牧生活方式，一部分人则从事耕种。从这时起，阿富汗人以公认的对异族的同化能力迅速扩大自己的移民范围，增加人口数量，并最终得以缓慢而稳步地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和铁木耳后裔）。

从 10 世纪到 12 世纪，阿富汗的领土先后进入伽色尼王朝和吉尔王朝的版图。13 世纪，它遭受了成吉思汗部队的进犯（在很长的年代里，蒙古人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使它变得荒无人烟）。从 14 世纪末起，阿富汗又先后落入铁木耳和他的后裔的统治。阿富汗人服役于东伊朗统治者的军队，为此他们得到了土地，获得了名声。铁木耳后裔沙赫鲁希在赫拉特当政时，赐予他们坎大哈地区用以移民。这段时间内，阿富汗人曾使用武力手段夺取了位于东喀布里斯坦河谷地区的肥沃地段，甚至渗透到印度境内，征服了旁遮普和当时位于恒河上游的一些国家，建立了一个穆斯林政权，不过，其寿命不长。

1525 年，大莫卧儿王国奠基者苏丹巴布尔击溃并征服了阿富汗人，并结束了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尽管苏丹巴布尔在各地遇到绝望的抵抗，但还是占领了喀布尔和加兹尼，甚至攻克了自古以来属于阿富汗人的苏莱曼山区。阿富汗人臣服了，不过这只限于苏丹在世时。巴布尔本人对这个国家很

有好感——遵其遗嘱，他死后被葬在了喀布尔。

苏丹的继承人（16~17世纪）对阿富汗这个山区国家兴趣索然，对其人民也漠不关心。这又纵容了他们恢复袭击和掠夺别人。他们重新移居到坎大哈、加兹尼、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地区。随后，阿富汗人不仅在这些地区扎下根，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居住区域。

在上述地区，阿富汗人已占据多数。由于人口增长和耕地匮乏等其他原因，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普什图人从苏莱曼山区朝东西两个方向迁移，向东已达到印度河。18世纪初，形成了以坎大哈和赫拉特为中心的一批阿富汗公国雏形，后来它们逐渐合并为统一的国家。

居住在南部和东南部山区的阿富汗人（普什图族）为建立独立国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747年，纳吉尔—沙赫在部落大会期间去世后，一个大部落阿布达利族的首领艾哈迈德·萨多扎伊被推选为阿富汗沙赫，他随即把本族易名为“杜伦尼”（意为珍珠），并缔造了一个以坎大哈为首都、使辽阔疆域臣服于己的独立强国——杜伦尼王朝。这个新生国家的版图包括了伊朗东部、土耳其南部和印度半岛西北部。国名阿富汗是在晚些时候出现的。

1773年，艾哈迈德之子杜伦尼—铁木耳—沙赫自坎大哈迁都喀布尔。当时，英国已占据了部分印度领土，并以种种借口插手杜伦尼王朝的内部事务。俄罗斯与法国则试图阻止英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拟定实施一系列干扰措施。1801年1月12日，顿河哥萨克部队首领奥尔洛夫将军收到俄皇保罗一世的亲笔信，命令他开赴奥伦堡，然后经过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进军印度河，同时建议捣毁英国人设在印度的所有海外商站和机构，“获取的土地要保持英国人掌权时的那种从属性，生意都要同我们俄罗斯做”。哥萨克调集了配有24门火炮和22500人的部队，但还未到达奥伦堡，便得到保罗一世辞世的消息和新国君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撤退的诏令。这是很及时的，不难想象那次远征会怎样结束，所以不

能再继续前进了。

英国人的直接干预加剧了王位之争，其结果是王朝的缔造人之孙泽曼—沙赫于1801年被迫害至双目失明。此后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内讧，最终导致王朝于1818年分裂成为若干独立的埃米尔国家。又过去5年之后，喀布尔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重新统一了大部分领土。由于英国人作梗，他转而投向俄罗斯的怀抱。被派往喀布尔的帝俄中尉维特凯维奇在此发挥了特殊作用。

1838年，英国人借口多斯特·穆罕默德与被视为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统治权的伊朗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而对阿富汗宣战。为入侵阿富汗，英国人部署了5万多人的军队。他们的任务旨在协助沙赫—舒泽确立王位。1839年，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先后陷落。多斯特·穆罕默德暂避北部地区。1839年12月，俄罗斯政府派遣彼得军团远征，以解决与希瓦汗国的纠纷。得知这一消息后，阿富汗百姓转向多斯特·穆罕默德一方反抗英国人。多斯特·穆罕默德召集了一定数量的部队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在彼尔瓦达山口重创英军。谁料，当他突入敌方军营后，却被英国人俘获，并被押往印度流放。

这次事件成为1841年起义的导火线，许多英国人在起义战火中丧生。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的战事使英国失去了3万多条人命和5万多头骆驼。他们被迫释放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他在阿富汗执政至1863年。

1843年和1849年，英国人先后占领了信德和旁遮普，这使得居住着阿富汗人的区域也归并于英国人的领地。1873年，俄英双方达成协议确认阿穆河为阿富汗的北方国界。不过，英国不愿承认阿富汗的独立，不愿承当它的保护人，而俄罗斯仅仅对此表示了抗议。

1878年至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期间，游击队运动使英军的交通运输处于瘫痪，英国人曾放弃了征服阿富汗的企图。希拉利汗死后，其子雅库博—汗成为埃米尔，并同英国

人签署了加德满和约，让出了所有连接印度的通道，国家主权受到了限制。人民被和约所激怒，英国总督卡万亚利少校和他的卫队全部毙命于喀布尔。

由罗伯特率领的英军开赴阿富汗，他们击败了阿富汗部队。乞求保护与和平的雅库博被打发到印度，失去了王位。在喀布尔则实施了对阿富汗人的镇压和迫害。不过，英国人很快就不得不躲藏到戒备森严的军营里去避难。

这段时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开始积极活动，把许多新兴的埃米尔国家和城市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这使英国人不安起来，因为他们视俄罗斯的举动为对它的排挤。

1880年初，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孙阿卜杜拉赫曼在巴达赫山宣布自己为汗，当地人也广泛拥戴他为埃米尔。他亦宣告自己为喀布尔埃米尔，并签订了新和约。根据新和约，英国放弃了原先的加德满和约，撤回驻防军，并给予阿富汗财政拨款。

1893年，阿卜杜拉赫曼一汗在与英国海外使团长官蒙蒂梅尔·迪朗特的谈判中由于受到新一轮战争的威胁，被迫放弃了布奈尔、迪尔、斯瓦特、巴爪尔、库拉姆、巴济利斯坦、阿富里基耶人的居住地区，以及有争议的恰曼地区和其他居住着普什图人的领土，并接受了英方提出的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边境地区分界线，政治辞典中称其为“迪朗特”线。这实际上是把普什图人居住地分隔开了。将近半数的阿富汗（普什图）人处于阿富汗疆界外的毗邻土地上，也就是说，一部分阿富汗（普什图）人落入了英属印度（1947年起，这些地区又属于巴基斯坦）。

1905年，实现了阿富汗与伊朗的边界线划分（亦称麦克马洪线）。国际公认的边界线确立，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南方和东南方普什图人的武装部队成为阿富汗统治阶层埃米尔们实施征服政策的冲锋力量。这一征服政策旨在确立国内各民族对于亲普什图的中央政权的臣服。正是南方和东南方的普什图人以火与剑镇压了起义，战

胜了哈扎拉人和卡菲尔人（今努里斯坦人），以及北方独立的乌兹别克汗国、土库曼汗国、瓦汉汗国。

在普什图人征服的比较发达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潜力与掌握在当地武装部落上层社会（其首脑为王族家庭出身）手里的上层政治建筑相结合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独立的阿富汗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决定了普什图人与非普什图人之间劳动分工的特殊形式。在商界和金融界的从业者多来自印度，也有塔吉克人；政府机构中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占据主要位置；军队和司法部门由普什图人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权和行政管理权也掌握在普什图人手中。

本世纪初，发达国家在地球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立了不少联盟（同盟国、协约国等）。俄罗斯加入了英、法协约，对英国人做出了让步。1907年签署的俄英协议中注明阿富汗处于俄罗斯势力范围之外，承认了英国在该地区的优先地位。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表声明，准备派遣全权代表前往喀布尔与阿富汗建立交往关系。亲英的哈比布拉一汗一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另一方面却为白俄匪帮开放了土耳其斯坦至阿富汗的通道。

1919年，阿玛努拉一汗（其父哈比布拉一汗死于贾拉拉巴德城下）执政阿富汗。同年2月28日，他在喀布尔最大的清真寺内宣布阿富汗独立。3月27日，俄罗斯宣布予以承认，成为第一个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国。而英国人不但不予承认，反而在阿富汗边境集结了大量进攻型部队。

1919年5月，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当时的局势对英国人很不利。苏联红军在土耳其斯坦和里海以东地区捷报频传的军事行动、阿富汗人民的坚忍不拔和英雄主义，以及印度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英国人选择了停战。根据1919年8月8日签订的拉瓦尔品第协议，英国暂时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同时废除了哈比布拉一汗在世时给予英国人的特权，并停止经印度运送武器装备和弹药补给，阿富汗则

失去了原先由英国支付的年度拨款。

不过，周旋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的阿富汗政府并非始终如一地奉行同苏维埃俄罗斯友好的方针。1921年2月28日签署了苏阿友好条约。俄联邦政府决定给予阿富汗财政援助，架设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之间的电话线路，派遣其他领域的专家，协助装备阿富汗国民军，移交了12架飞机。同年3月16日阿富汗同土耳其签署了同盟协议书，6月22日同伊朗签订了友好协议。这些行动巩固了阿富汗在该地区的地位。1921年11月21日，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英国人被迫在最终的和平协议书上签了字。

持改革观点的阿玛努拉一汗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当时国内并不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比如，他废除了奴隶制，颁布了禁止早婚、禁止买妻、禁止遗孀必须改嫁给夫兄或夫弟的法令。许多阿富汗年轻人被派往欧洲和土耳其学习，掌握了对于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1923年，阿富汗颁布了第一部宪法。3年之后，苏联和阿富汗签署了相互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

阿玛努拉一汗激进的改革触动了许多社会势力的利益。阿富汗人始终敌视西方文化，视其为异己，而阿玛努拉一汗却对伊斯兰上帝做出不屑之举，因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担心丧失自己传统特权的普什图部落的许多领袖采取了坚决反对“革命埃米尔”的立场。上层政治社会的内部意见分歧导致了以军人部长纳吉尔一汗为首的有权势的叶海亚赫尔部族分离出去。伊斯兰宗教界趁机组织了反政府起义，于1929年推翻了改革者阿玛努拉一汗。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在意大利生活了很长时间，1960年病逝于苏黎士。

有件事情对苏联人来说始终是个谜：1929年春天，斯大林曾经试图公开以武力方式干涉阿富汗事务，以求解救阿玛努拉一汗。肩负这一使命的特遣分队被派出，他们是约1000名乔装成阿富汗军人的红军战士，指挥员是驻阿富汗使馆武官普里玛科夫，他装扮成土耳其军官。他们行进到瓊

拨克时，斯大林得到情报说阿玛努拉一汗已经放弃坎大哈前往印度，于是命令部队迅速撤回。这次远征中，苏军死伤120人，被击毙的阿富汗人约8000。^①

阿玛努拉一汗之后，短暂执政的是以哈比布拉一汗为名自封埃米尔的塔吉克族起义领袖巴恰耶·萨考（意为挑水夫之子）。政府中大部分成员是他家的亲戚，而其中有半数人同初出茅庐的埃米尔一样是文盲。巴恰耶·萨考统治期的特点是，力图建立神权式统治，用中世纪的恐怖手段对付民族爱国力量，激化塔吉克商人与普什图上层社会之间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矛盾，经济一派萧条。属于塔吉克少数民族的巴恰耶·萨考在境外缺乏有实力有影响的靠山，支撑政权的把握不大，1929年10月，在没有英国人参与的情况下，他被纳迪尔一汗推翻，后者自封为阿富汗国王。

纳迪尔一汗奠定了穆罕默德扎耶夫王朝统治，他试图将阿玛努拉一汗的创举化为乌有，但崭新的政治思想已经开拓出道路。政治组织“阿富汗青年”呼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继而要求推翻王权，废除伊斯兰法典。30年代初，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捣毁了这个组织，而其成员则从事起恐怖主义活动。1933年11月，阿卜杜勒·哈列克暗杀了国王纳迪尔一汗。

19岁的扎希尔·沙赫继承了父权。但根据阿富汗传统，这样的年纪还不能执政。所以，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权力实际控制在他的三个叔叔手里。民主运动长期遭受残酷镇压。在这些年代里，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巴斯马赤匪帮在阿富汗境内寻得避难地，经常对苏联中亚国家的城镇乡村进行奔袭。

20年代至40年代，以世袭的普什图贵族和塔吉克族占多数的企业界为主，形成了国家的经济领域上层社会。其中中心人物是来自赫拉特的塔吉克人阿卜杜拉·马吉德·扎布利和

^① 原文如此——译注。

来自克什米尔的阿卜杜拉·哈齐兹·洛多尼，他们以普什图贵族的“阿富汗国民银行”为根基，非普什图的阿富汗北部地区成为他们进行活动的主要区域。

1941年秋天，日本和德国的影响在阿富汗和伊朗日益加强。丘吉尔建议苏联政府派驻部队前往该地区。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前车之鉴，对此予以拒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回答中指出：“1921年的苏联—伊朗协议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派遣苏联军队。当前形势下，反法西斯同盟国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所以必须同时向伊朗派出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1941年8月至9月确实是这样实施的）。关于阿富汗，苏联赞同同盟国一致采取的谨慎战略。苏联以备忘录的形式（1941年10月）要求阿富汗恪守中立立场和执行20~30年代的苏阿条约。备忘录得到伦敦、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支持。

莫洛托夫致信（1941年11月）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说：“……在阿富汗同巴斯马赤匪帮和白匪军作战意味着在中亚挑起战事，这会有利于日本和德国，动摇我们在东方的威信，破坏红军后方的稳定。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国家领导人有理由反对这样的行动。所以，我们在该地区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使阿富汗中立，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进行合作，并加强同也门的关系……。”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智慧才略没有再次出现于7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给予阿富汗技术援助，尔后又对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的一些建设项目提供了财政援助。1948年，美国研究制订了所谓的《兴都库什行动》计划，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针对苏联和它的南部盟国的军事包围圈，并破坏阿富汗国内的稳定局势，如果它试图接近苏联的话。1950年，阿富汗向美国请求购买武器遭到拒绝，后者提出的条件是调整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停止接近苏联。作为回答，阿富汗转而接受了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50年代初，这里实行了出版自由化。许多独立报纸开始出版发行，还出现了一些立场偏激的杂志。一些新党派在

政治舞台露面：“觉醒的青年”（“阿富汗青年”的继承者，塔拉基为其成员）、“瓦坦”、达乌德王子领导的“民族俱乐部”（年轻的卡尔迈勒为其成员）。然而，这些组织都是短命的。1952年，所有反对派的报纸和杂志都被查禁，编辑们被投入监狱，因革命行为被审判的人当中有卡尔迈勒、海拔尔、马哈茂德。

当时，美国处心积虑于稳定伊朗和巴基斯坦国内的亲西方政权。1952年，美国插手推翻了伊朗穆罕默德·莫萨德卡政府，保证了穆罕默德·巴列维王子返回王位。第二年，美国就双边条约一事得到了巴基斯坦认可，该条约正式签署于1955年。美国当局进而试图使阿富汗也加入巴格达公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但国王扎希尔—汗予以拒绝。于是美国就解除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这恰好推动恢复了苏联—阿富汗经济关系。

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喀布尔期间，苏联向自己的南部邻国提供了条件优惠的一亿美元贷款。

这段时期内，两个氏族在执政阶层内进行的长期争斗最终以达乌德胜出国王的叔叔沙赫·瓦利而结束。1953年，随着首相沙赫·马哈茂德辞职，达乌德掌握了政权。

在实施阿富汗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达乌德对国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大大巩固了国家政权，特别是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阿苏、阿美关系也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发展。达乌德执政期间，在苏联、美国 and 联邦德国的帮助下，建成了许多工矿企业，展开了水电站、水利灌溉工程、飞机场和公路建设。他本人多次访问苏联，根据他提议，苏联武器和军事技术开始装备阿富汗军队。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人所施加的压力。

阿富汗似乎逐渐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按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在这段时期内，“阿富汗具有很小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不过，

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喀布尔站长与沙赫·瓦利氏族建立接触之后，便着手研究旨在破坏达乌德政权稳定的计划。

60年代，苏联继续向这个邻国提供经济援助，培训它的军事人员，并逐渐成为阿富汗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最大提供者。苏阿关系在这段时间内是友好的。196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阿富汗期间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接待。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该地区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利益范围，这便加剧了苏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竞争。

这时，阿富汗国内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生活复苏起来。新兴成立的政治社团为各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63年，出现了一个以建党为目的的政治中心小组，其成员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扎赫玛、多斯特、鲁希、巴赫塔里、马哈茂吉、法尔汗戈、海巴尔、巴达赫什。该政党本应取名“阿富汗民族统一阵线”，其纲领性方针具有民主特点。中产阶级代表企图组建一个“中间派政党”。激进的知识分子左翼组建政党的准备工作即将就绪。国王对此心中有数。

1964年9月，一批军官成立了旨在推翻君主制国家、建立民主制国家的非法组织“军人革命组织”。最初的参与者有60名军官，其中的缔造者有阿戈扎尔、马克苏吉、卡德尔、瓦谢、希萨穆金、法鲁克、雅古博……。

同一年颁布的新宪法为那些与王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在法律上提供了参政机会。放宽了公民的社会民主权和自由权，其中包括允许成立政党，允许私人办报，选举议员时采取无记名投票等等。宪法同时注明：“对于关系到国家制度方面的所有事务，国王仍然享有‘否决权’，任何法律不得反对伊斯兰教。”不过，处于沙赫·瓦利氏族压力下的国王还是阻止了议会通过建党法案，虽然宪法已有规定。尽管如此，民主进程已经积蓄了力量。这些政党的领导者是谁？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是谁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些问题

尚未研究成熟，但不回答这些问题，便无法客观地分析研究清楚阿富汗所遭受的悲剧根源。那些支持者的作用还不十分清楚，比如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布利、哈桑·沙尔卡、穆罕默德·汗·贾拉拉拉等人。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在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1965年1月1日，在作家塔拉基家中秘密召开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大会。会上确定了党的目标、任务和机构，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有全体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会选举塔拉基为党的总书记，卡尔迈勒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入选中央委员会的有7人：塔拉基、卡尔迈勒、凯世特曼德、泽莱、潘吉舍里、巴达赫希、沙赫帕尔；还有4名候补成员：沙利、米萨克、扎希尔和萨费。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1917年出生于加兹尼省一个牧人家庭，属普什图人的吉尔扎伊氏族、塔拉克部落、布拉纳旁系。青年时代他就对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和革命斗争产生了兴趣，从1953年到1965年，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撰写了一批政论和文学作品（《班加的漂泊》、《白色》、《孤独》），参与创建政治团体“觉醒的青年”，拥护社会生活民主化，是个自负的理想主义者。

根据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当年《人民报》的前两期发表了党的纲领。它规定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进步力量，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实行旨在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保障国家进步发展的社会改革”。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同年，许多政党从地下走向公开：极左的“永恒火焰”、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阿富汗民族”，以及“平等”、“民

族”、“民族联盟”、“民族阵线”等。至7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20多个激进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党派。同时，开始出现了伊斯兰组织。

1967年春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秘密出版了党章。党章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活动原则，以及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该党宣布自己为“工人阶级先锋队 and 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

莫斯科密切关注着阿富汗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对人民民主党建党过程缓慢而复杂表示了担忧。该党领导人缺乏组织经验和党员理论水平低下成为对此的解释。那时，政府的阻挠，以及左翼的和激进的政治派别（如“穆斯林兄弟会”）的妨碍也对人民民主党的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就该党内部而言，“人民派”趋向于左倾激进主义。苏联的政治领导人劝告该党领袖们不要盲目冒进，不要急于打出共产主义旗号，要突出强调党的社会民主性。然而，这并没有得到塔拉基本人或其战友们的应有理解。1965年底，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塔拉基非正式地访问了莫斯科。他会见了苏共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乌里扬诺夫斯基和西蒙年科。他们建议塔拉基不要把推翻政府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因为该党党员数量少，再说也没有做好准备。塔拉基保证再重新商议此事，保证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据他后来讲，他回国后，国王曾建议他与政府进行合作，但被塔拉基拒绝了。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以后不久，在塔拉基和卡尔迈勒两个人个人矛盾的基础上，党内发生了为争夺领袖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已经被选举为议会代表的卡尔迈勒敏感地认为自己在党内只是二号人物，将要被撤职。另外，在一些策略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比如，采取温和立场的卡尔迈勒及其拥护者主张加强斗争形式的合法化；还有思想启蒙活动的忠实捍卫者，他们极力想通过介绍文化的和全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来提高福利改善百姓生活；也有人反对散发革命内容的传单和书籍，认为更有效的斗争方式是领袖人物在集会和游

行中发表演讲。

塔拉基依据人民革命理论，提出在“封建”的阿富汗社会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依据，他倾向于党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相信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反对派组织领导人公开发表演讲会迅速导致被捕入狱。卡尔迈勒建议吸收新党员时只注意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和为党工作的愿望，不要计较阶级成分。这个观点恰好说明卡尔迈勒本人同贵族阶层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包括了部分王室成员：他自己就是以达乌德王子为首的组织“普什图联盟”的积极追随者，他还介绍首相办公厅主任穆罕默德·多斯特和其他政府高官加入人民民主党。塔拉基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接纳王室成员和有产阶级代表入党，违背了吸收党员的阶级原则，它必然会导致党在人民中间丧失威信。

还存在着其他矛盾。我不去评判哪家的立场观点更正确。党的领导层很快便发生了分裂。塔拉基甚至以卡尔迈勒与国王的女婿、大官员阿卜杜勒·瓦利（沙赫·瓦利之子）有交情为由，建议开除他党籍。作为对此的回应，1966年秋天，卡尔迈勒与自己的支持者们退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成立了新的派别，叫做“旗帜”，其正式名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全体劳动人民先锋队”。同时退出的还有3位中央委员和5位候补中央委员。塔拉基和追随者们则把自己改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阿富汗社会，他们仍以“人民派”著称。

乍一看，这次分道扬镳的原因乃出于理论方面的分歧。“旗帜派”奉行了“共同阵线”的路线，即不排除在夺取政权之前采取妥协或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的策略。它努力向人民灌输真理，以便使社会为改革而成熟起来。而“人民派”则放弃这样的合作，致力于所谓毫不留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纯净的乌托邦。“人民派”利用最穷苦的那部分人不满足于赤贫和无权、憎恨富人、向往幸福生活，利用普什图人热爱自由和好战的性格，提出武装起义形式的人民革命

才是达到彻底解放的迅捷而有效之途径。

分析表明，这次冲突的根源实际上超出了党内矛盾范围。不应在理论范畴内，而应在传统的“文化根源”内寻找原因：这是人种的、社会的、阶级的和民族的差异，是喀布尔人同外省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蔑视，是对个别领袖人物个人的过分拥戴和信赖（这是阿富汗人最典型的特征），是领袖人物之间对权力之争所致。阿富汗人一生趋向极端个人主义，喜好独立，忠实于家族。他们崇尚平等，不盲从，特别是当领导人没有获得他们的尊重，或者不具备他们珍视的品格。

虽然双方在口头上都承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党的纲领、目标、任务和党章，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拥有独立领导机构、机关刊物和成员的两支不同党派。“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代表了思想理论内容迥然相悖的两支民主派别，他们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也分别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属性、人种—民族属性，以及各自的目的和策略。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组织分裂状况延续了十多年，它严重损害了阿富汗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两个派别各行其是地在老百姓中间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工作。“人民派”追求群众性，试图吸引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流氓无产者；“旗帜派”则着眼于知识分子中民主化的那部分人和爱国主义军官。双方都力图使大学生、新闻工作者、公务员和军官加入自己的行列，并且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旗帜派”的海巴尔具体操作领导了在军队的工作。

“人民派”意识到军队在政局动荡时的作用，便加大在军官和士兵中间的工作力度，教权法规组织、极左派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也去这么做了。

70年代初，苏联出版了塔拉基的书《新生活》，并运发至阿富汗国内。国王扎希尔—沙赫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了惊讶。

1968年，塔拉基和卡尔迈勒通过与之有秘密接触的、

阿富汗的民主革命

当时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克格勃驻喀布尔站长向苏共中央表示，希望给予帮助以克服人民民主党的分裂状态。得到的回答是：愿双方摒弃非原则性分歧，致力于为劳动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然而，为和解采取的措施再次付之东流，双方依然像两个政党那样我行我素。



扎希尔·沙赫王朝的终结

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政府内阁一个接一个地替换，局势没有好转。阿富汗经历着经济滑坡。生产建设规模萎缩，外债增加，偿还外债的支付增加等等。这一时期，阿富汗同伊朗王国的关系明显活跃起来，出现了扩大阿富汗—巴基斯坦双边关系的趋势，对生活在“迪朗特线”另一侧的那些普什图人进行的传统的精神道德声援有所削弱。1971至1972年罕见的干旱引发大批牲口倒毙和大规模饥荒，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援助物资被执政的上层人物和政府机构的大小官吏窃为己有，贪污腐化和利用食品进行投机倒把已成为公开的社会现象。在私人新闻媒介、议会、集市和清真寺，人们议论纷纷。

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骚动不安起来，人民民主党的各派，以及毛泽东主义的、伊斯兰教的和民族主义的社团都积极行动起来。军队中也出现了不满情绪。教会对君主立宪制和国王本人的抨击频繁起来，称他为“东西方的两主之仆”，并对其反道德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谴责。所有反对政府的集会者、演讲者、公开表态者均遭到了严厉镇压，组织者被逮捕、被监禁。然而，惩罚手段并未带来积极效果。统治王朝内部也产生了矛盾，特别是达乌德和瓦利两个氏族之间。

1970年5月，由于驱散伊斯兰传教士的游行，国王受到公开诅咒。支持达乌德氏族的、有影响力的教会代表开始形成一种意见：国王不能成为阿富汗正统信徒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家园的捍卫者。私人出版物中越来越经常地刊登材料介

绍达乌德 50 年代的突出政绩和他的“英雄主义”业绩。

达乌德在军内的支持者也积极活动起来。在军队和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他的威望很高。不过，他有把握在军队中寻觅到足够的支持力量以治服国王和瓦利的追随者吗？这促使他在部队中重新寻找同盟者。

那段时间，国王已不再主事，继承人艾哈茂德·沙赫王子立场温和中庸。1972 年 12 月，随着与商贸和工业精英们关系密切的穆斯林界代表人物沙菲克被任命为政府首相，瓦利领导的这一伙人仿佛占据了上风。他在将军群中和部队中级指挥人员中拥有强硬地位，与不少王室家族成员、教权主义活动家和“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追随者交往甚笃，这就造成了右翼势力发动国家政变的潜在危险。这一时期，政府的工作方针是亲近美国、联邦德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限制民主势力的活动。

1973 年 7 月 17 日，穆罕默德·达乌德王子依靠包括人民民主党成员在内的军官团，实现了不流血的政变，仅仅对付了一下瓦利及其追随者的微弱抵抗。对政变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来自王宫卫队、巴拉—希萨尔步兵“突击队”、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里什霍尔坦克部队的 65 名军官和 240 名士兵。对于正在欧洲访问的国王扎希尔·沙赫来说，除了放弃王位，别无选择。达乌德废除了君主制，宣布自己为共和国总统，下令对侨居在意大利的前国王每月发放一万美元抚恤金，并着手进行改革。

供参考的资料汇编^①

穆罕默德·达乌德 1909 年生于喀布尔，是国王扎希尔·沙赫的表弟，在法国接受中等教育后服役于阿富汗部队，1932 年任师长，1938 年任喀布尔军区司令员，中将军衔。

^① 摘自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达乌德卷宗。

1946年，作为国防部长进入沙赫·马哈茂德政府。1948年，经奏请国王钦准，被沙赫·马哈茂德免职（他是首相一职的有力竞争者），后赴巴黎任大使。

1950年卸任回国后积极展开了旨在迫使沙赫·马哈茂德下台的活动。1953年，沙赫·马哈茂德宣布辞职。达乌德接任首相后执政了9年半。这一期间，他在内外政策的制定方面享有对国王的决定性影响。

达乌德奉行了发展国家经济的政策。他执政期间，在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援助下，建成了许多工矿企业，展开了水电站、水力灌溉工程、飞机场和公路道路建设。根据他的建议，苏联武器和军事技术开始装备阿富汗军队，苏联还协助进行武装力量的培训。

达乌德受到来自包括国王在内的各方面压力。1963年3月，他被迫辞职，与国王的關系也日趋恶化。达乌德与瓦利氏族间的斗争最终导致国王扎希尔·沙赫放弃权力。

政变第二天，人民民主党党内的两个派别分别发表声明支持推翻君主制，号召党员支持共和国体制。党内一批积极参与了政变的人士说，他们试图比推翻君主制走得更远，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制止他们这样做。

新制度的政治机构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它由包括达乌德在内的11人组成，其中9人为军官出身。另外，这11人当中有4人（“旗帜派”3人，“人民派”1人）为人民民主党成员。他们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谨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出面活动。

大多数阿富汗人把这次政变看做是王室内讧，毕竟为首者是王室的“合法”成员，其名字在百姓心目中与政权上层联系在一起。尽管被逮捕的有王室成员、瓦利氏族全部成员、前部长大臣们、一批政府高官，以及一部分军官团成员，但社会上未出现反对新政府的任何实质性言论。随后在

军队的指挥人员中对国王和瓦利的追随者进行了清洗。

就任总统后，达乌德通过沙尔克向卡尔迈勒建议进行合作，同时向人民民主党领袖许诺新政府将实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纲领，同苏联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旗帜派”领导抓住这个机会，把不少自己的党羽和追随者安插进政府机构。

达乌德对“人民派”的态度，首先是对其党魁的态度是不友善的，甚至是恶意的。政府的这种偏爱态度更加剧了人民民主党内两派间的敌对情绪。

就个人品质而言，达乌德是个有国家意识的人，意志坚强，行为果敢，好用权势。对于“旗帜派”的观点和他们提出的在阿富汗实行全面社会改革的方案，达乌德不以为然。他知道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做事总是以符合本民族利益为原则，并试图摆脱另样的“同路人”。他巧妙地把昔日人民民主党的同盟者调至徒有虚名的政治岗位上。

1974年2月至3月，达乌德针对进步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挤压措施。空军司令员和参谋长，以及邮电部长和边境事务部长都先后离职。过去，人民民主党的两派正是依靠他们在军队和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到了1976年，达乌德已经把心腹人员中间他所知道的党员全部清洗干净，并对右派献媚：释放了瓦利氏族成员和一部分“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支持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达乌德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矛盾中“捞分”。比如，表示支持苏联的集体安全计划，同时又动手减少传统的阿苏交往，增加同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接触；削减苏联军事顾问人员的数量，同时又把大批军官派往印度和埃及学习。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雇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才能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项目（铁路建设、铀矿储藏的勘探等等），而这正是阿富汗所缺乏的。

达乌德得到了许诺……不过，用什么交换呢？这就是消灭左派势力。在沙特阿拉伯，达乌德受到豪华奢侈的接待，瞻仰了穆斯林世界的所有圣物。他回国后便开始实行镇压左派势力的政策。一些出版社被查封，党的重要活动家被跟踪监视，奸细在人民民主党内挑拨离间。苏联外交部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向达乌德发出书面呼吁，警告他不得对共和国制度可信赖、可依靠的左派力量进行镇压。通过克格勃渠道达乌德还得到这样的信息：镇压左派力量就是削弱国家政权，增强那些希望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对手的实力。

苏共中央国际部呼吁人民民主党两派领袖调动一切力量维护共和国体制，要表现克制，不要做出可能引起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的举动。

苏共中央致电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通报了阿富汗民主运动面临的危机，以期防止发生有损于共同利益的行为。

已经脱离政府的“旗帜派”于1975年8月采取重大措施与“人民派”联合。两派领导声明同意停止公开的敌对行为，为合作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但实际情况没有超越声明，实质性的联合并没有成功。双方继续视对方为敌人，领导人再次强调，只有自己领导的一方才是“其活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共产党”。



伊斯兰势力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一种普遍的简单化论点认为，阿富汗的骚乱是在1978年4月达乌德被推翻之后发生的。实际上，早在50年代中期，大约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的时候（据拉巴尼说，骚乱团伙在1954年就已形成），骚乱活动就作为左翼民主运动的对立面出现了。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创建了自己的团体与组织。他们呼吁恢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则，清除外来文化的沉积和影响，在国内建立阿拔斯哈里发国式或伊斯兰共和国式的神权政治制度。

60年代中期，喀布尔大学神学系成为伊斯兰政治运动最重要的秘密活动中心之一。在系主任格·尼亚齐教授庇护下成立了非法活动小组，成员有阿·尼亚齐、拉巴尼、拉赫曼、戈尔·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姆、塔瓦纳、奥马尔。这一期间，该大学工学系也成立了类似组织。校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为古利别克·赫克玛吉亚尔、谢福金·纳斯拉加尔和哈比卜·拉赫曼。经他们倡议，校内若干伊斯兰小组联合为统一的组织。

1969年，哈兹拉特家族代表莫扎达吉从美国返回后，伊斯兰教徒开始建立政治组织。在“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之一、神学系教授布尔哈努吉·拉巴尼住宅内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产生了第一个伊斯兰逊尼派教徒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青年”。

其领导机构为最高委员会，首领们都是组织的缔造人：格·尼亚齐、拉巴尼、阿·尼亚齐、赫克玛吉亚尔、塔瓦纳、赛亚福。领导军事组工作的是赫克玛吉亚尔和纳斯拉加尔。在军队里直接从事工作的是哈比卜·拉赫曼和工程师穆罕默德·伊曼。这里提到的所有人，包括其他成员奥马尔、玛赫鲁夫、瓦尔达克、帕萨希、法兹里和阿西兹，后来均被称为该运动创始人。除去拉巴尼、赫克玛吉亚尔和赛亚福，其余人都已死去，并被宣布为“殉教者”。

“穆斯林青年”承袭了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极端主义组织。其成员在民主人士中间制造矛盾和不和，妄图分化瓦解他们。“穆斯林青年”与仿佛是放任共产主义影响渗透进来的统治制度做斗争。他们杀害具有进步信念的大学生，他们揭去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脸上的恰德拉（披纱），泼洒硫酸。他们组织示威游行，他们寻衅与民主派组织成员在街头斗殴。

1972年夏天，大学生中的“穆斯林青年”成员与“长明火”组织又一次发生冲突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包括赫克玛吉亚尔、纳斯特拉加尔和奥马尔，遭逮捕并被判处一年

半徒刑。穆罕默德·达乌德（当时被称为“红色王子”）执政后，“穆斯林青年”内部在斗争方式和斗争方向问题上意见相左。有人提出迅速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达乌德，惩罚左翼民主派，建立神权制度国家。

1975年7月，在巴基斯坦领袖祖里希卡尔·阿里汗·布托的支持下，赫克玛吉亚尔的追随者们在潘捷舍尔和许多省城展开了起义行动。这次起义始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唆使，原指望会得到农民的支持。阿富汗政府轻易地粉碎了反对派的举动，原教旨主义派对农民的希望也落空。“穆斯林青年”组织也随之瓦解，其成员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逃入巴基斯坦境内。

在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分子得到相对的自由，并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进行合作，后者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需要同达乌德政权斗争。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下，布托政府为阿富汗反对派建立了训练中心和基地网。在这些秘密训练营地，巴基斯坦悄悄地对那些原教旨主义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训练营地中最重要的一处叫奥托卡，是1973年达乌德进行推翻君主制的政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修建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就这样成为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枪炮。

为展开反政府活动，穆斯林宗教亲君主制派的领袖们——莫扎达吉、哈列斯、穆罕默迪赫拉尼——开始在毗邻边境的普什图人居住区建立基地。作为骨干力量，他们利用了自己的学生和“穆里德”派信徒。

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组织，其领袖为伊斯梅尔·巴尔希和绍阿，他们得到伊朗的声援和资助。



1978年4月再次发生政变

随着伊斯兰组织异常活跃起来，民族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对达乌德政权的敌视态度愈加肆无忌惮。1975年5月，“民族压迫”、“长明火”和站在卡拉卡尼政治土匪主义

立场上的极端主义分子团伙在萨兰戈山口地区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萨兰戈宣言把达乌德政权称为“法西斯独裁统治”，指出同他做斗争的基本方式是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创建革命国家，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要以少数民族稠密地区为基础的原则之上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军事行动。

巴艾斯的武装人员袭击了驻防军和警察哨所，破坏了居民区的平静生活。巴达赫山、塔哈尔、潘捷舍尔等省被宣布为“红色区域”，巴艾斯本人得到了“红色教士”的绰号。卡拉卡尼和赫克玛吉亚尔匪徒也在上述地区猖狂活动。

这些年，美国、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情报部门明显加强了对阿富汗右翼势力的支持。特别是阿富汗—伊朗关系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渐成为达乌德“等距”东西方对外政策观念的中心点。

1976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喀布尔，表示坚决支持达乌德的首创精神。伊朗国王向阿富汗提供了为期10年的20亿美元优惠贷款，并立刻支付了其中的4亿。尽管达乌德这样追求西方，苏联仍继续向其提供援助。两国间的贸易额大约增长了3倍，并且确定了更优惠的贸易政策，又续签了10年期限的苏阿互不侵犯和相互中立条约。

当然，达乌德接近西方与穆斯林国家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焦虑，他们通过印度共产党和巴基斯坦民族党重新致力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派别的和解与统一。尤其是1976年5月，“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要求苏联共产党承认他们是阿富汗共产党的领导者，并请求促进两派联合。

苏共中央的答复通过克格勃驻喀布尔站长转交给了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参加。这是1969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确定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队伍内部的分裂状态，以统一的力量达到巩固共和国体制、实行社会经济改革、加快民族发展和国家的社会

进步。只有联合起来，阿富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

1977年4月，达乌德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为期12年的发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协议书。根据阿富汗外交部门的消息来源，达乌德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见时发生了不愉快事件：他拒绝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面。对于勃列日涅夫“驱除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国主义专家”的呼吁，达乌德的回答是，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他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可是回国之后，达乌德便开始寻找途径减少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的依赖，更紧密地建立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开始迫害人民民主党。

同年6月，“人民派”和“旗帜派”在与政府的斗争中召开了联合大会，之后签署了关于统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声明，两派中央委员会很快又召开了联合会议。至此，两派恢复了形式上的统一。塔拉基重新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在联合大会上选举了30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两派各占半数的10人政治局。围绕着两派中大部分人都信任不过的阿明，发生过激烈辩论。一部分“人民派”党员和“旗帜派”的全体党员坚决反对阿明进入政治局。会议进行期间，有人指责阿明和哈舍米在美国期间与中央情报局有过联系和接触，并宣读了他们从该机构领取资金的文件。不过，阿明得以狡猾地摆脱：他声称这只是和中央情报局做游戏，因为他必须在美国完成学业，而当时已经没有了生活费（会议速记保存在苏共中央乌里扬诺夫斯基的保险柜中）。

随后的事件表明，党的统一是不彻底的。双方的军事委员会不相往来，大部分工作内容也彼此保密。为了不泄密，一种特殊的方法在起着作用：党员们只通过“三人小组”或“五人小组”知道己方战友。1978年夏天，在重建统一的党组织过程中，许多军官才知道他们自己属于同一个党。

人民民主党的统一和左派力量的日益增强使阿富汗统治阶层深感不安。1973年7月政变以后，达乌德在8月至10

月间识破并镇压了三次反政府阴谋。人民民主党都未参与其中。被新生的阿富汗政府镇压的对象基本是国王的追随者：前首相、情报局长、三位将军和一批议会代表和军官。原教旨主义势力于1975年和1976年企图掀起暴乱的举动，包括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在潘捷舍尔省的行动，均被政府力量成功平息。

政府和军队中的右派对达乌德施加压力，要求惩罚左派，首先是人民民主党。他们还希望淡化阿苏关系。在此应当指出，1978年在阿富汗国内共有2000多名苏联经济技术专家，苏联对阿富汗贷款总额达到了12.65亿美元；美国的贷款和无偿贷款数额为4.7亿美元。

达乌德奉行着随机应变的灵活政策。他优先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又不中断与苏联的双边关系。1977年10月1日，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见阿富汗外交部长时转达卡特邀请达乌德来年中期正式访美。那时的阿美关系可以引用美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分析（1978年1月30日第0820号文）来作评价：在1977这一年中，美阿关系非常之好。阿富汗政府履行了对美国许下的诺言，成立了监控毒品生产和运输的联合委员会。达乌德接受了1978年夏季正式访美的邀请。用于培训阿富汗军官的美国教学大纲经费增加了一倍，以部分抵消苏联在援助阿富汗武装力量方面的优势。对其来说更为重要的、与北方邻国的双边关系继续保持可观和有利可图的水平。达乌德访问莫斯科期间签署了为期20年的、阿苏两国经济贸易新一轮协议。

美国一方面支持达乌德为尽量减少依赖苏联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参与阿富汗国内事务，以自己的出现表示友好的关注。应允达乌德正式访问美国是1978年阿美两国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不过，阿富汗总统最终未能如愿。

达乌德在1978年4月的军事政变中身亡……人民民主党的一些成员证实，政变本该发生在8月，但“人民派”利用4月17日“旗帜派”主要思想家海拔尔被暗杀后喀布尔

形成的有利局势，提前动了手。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海拔尔是警察学院院长。他是国王在位时经卡尔迈勒介绍入党的，当时曾惹恼过“人民派”。普遍认为，是内务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努里斯坦尼下令枪杀海拔尔的。成千上万人的送葬演变成反政府示威，最后被法律部门以武力驱散。

根据另外一种说法，是塔伦和阿列姆雅尔兄弟按照阿明的安排除掉了海拔尔。因为人民民主党在军队工作的领导系统线索全部掌握在海拔尔（“旗帜派”）手中，而“人民派”的阿明在这项工作中仅仅是海拔尔的副手。为了篡夺领导权，阿明不择手段消灭竞争对手。后来，阿列姆雅尔兄弟中有一人（阿列弗）遭惩处，另一人却担任了阿明政府的计划部长。如果这条线索属实，那就是阿明为推翻达乌德创造了条件。而如果阿明真的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按其旨意行事，那谁是这次军事政变的组织者不就水落石出了吗？或许，后来也是他采取战略行动，引诱苏联卷入中东的地区性冲突。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线索，没有文件能够证明它。

四月政变的参与者们对事件过程的叙述不尽相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列举出于己方有利的行为。综合众人所述，可以给政变过程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

海拔尔的葬礼结束后，政府开始镇压民主势力。苏联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4月24日，达乌德在驻喀布尔中央军司令部（确切地说是内部餐厅）会见了美国大使埃利奥特，似乎是后者说服达乌德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于是下达命令逮捕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阿明、潘吉舍里和萨菲在内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罪名是违反宪法。26日深夜实施了逮捕。

由于至今也未查明的原因，阿明起初免遭逮捕，虽然警察于25日深夜到他家进行了搜查，对他实行了软禁，对住宅进行监控。为了掌握情况，“被捕者”打发自己的儿子去找塔拉基，而后者在那时已经被逮捕。这给了阿明一个信号，他决定下达武装进攻的命令。通过喀布尔市政府职员法

基尔和空军部队下级军官古里雅博佐伊，阿明对军内战友（“人民派”）转达了行动计划。只是在26日傍晚，阿明才被转押至监狱。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具有改变命运意义的偶然事件……。

那天，军队在驻地庆贺粉碎共产党人的反政府行动。国防部长拉苏利中将下令安排丰盛晚餐和娱乐活动犒劳军人。军中的“人民派”抓住这一机会为行动做好准备。“旗帜派”军官得知消息晚于“人民派”军官，所以他们加入反对达乌德政权的军事行动也要迟一些。除此以外，未授予“旗帜派”军事小组领导人努尔明确权力。

4月27日清晨，武装政变领导层的协调小组在动物园附近的某个地方举行了会晤，参加者有古里雅博佐伊（空军和防空火炮部队）、帕雅姆（第四坦克旅）、帕玛安（防空导弹旅）、杜斯特（“突击队”第32团）。相约早晨8点之前全体人员必须在军营做好战斗准备；并商定好如何协调空军和防空部队的行动；识别密语：口令“赛义德·穆罕默德”，回令“米格—21”。

许多人民民主党成员在第四坦克旅服役。其中拉菲是旅部参谋长，瓦坦扎尔和玛兹杜里雅尔是营长。早晨7点钟，他们发出命令：坦克做好战斗准备后迅速开往喀布尔方向。拉菲留在旅部，以便在采取必要措施时，控制那些可能会加以干扰的军人。

坦克旅的军官们实现了拟定的行动计划。他们首先骗得旅长下令发放坦克弹药，然后行驶至总统府附近。为了给自己的坦克营配足弹药，瓦坦扎尔少校表现得非常机智灵活。早上9点钟时，他找到旅长，使其相信，他是达乌德的忠实追随者。由于首都局势不稳定，所以请求将军同意给他营队的10辆坦克每辆再补充6发炮弹，并说，需要时他的营队随时可以前往救援。当收到炮弹准发证以后，他在领取单上加了个“0”，于是在弹药库就领到了600发炮弹，后来全部用来炮轰总统府了。

接近 11 点钟的时候，其余坦克从普里—恰尔希朝喀布尔推进。坦克手的任务是：法杰赫占据普什图尼斯坦广场，从一个方向炮击达乌德的卫队，从另一个方向监控银行和邮局；瓦坦扎尔应该推进到国防部大厦前的广场；玛兹杜里雅尔负责监控达乌德和其弟纳伊姆的住宅，以及法国和土耳其大使馆。

临近中午，第四坦克旅的第一梯队在少校连长乌玛尔率领下驶达总统府大门。这时，达乌德正在里面主持内阁部长会议。手下人迅速通报了出现坦克的消息，达乌德命令国防部长拉苏利和总统卫队长齐亚少校去查明事因。齐亚责问为什么把坦克开来，乌玛尔说是奉旅长之命前来加强总统府防御。齐亚命令其返回坦克旅驻地，乌玛尔带领梯队驶离总统府正门，拐入毗邻的另一侧街道待命。很快，第四坦克旅其他分队陆续赶到，完成了对总统府的包围。坦克旅中“人民派”军官指挥了所有行动。

正午时分，瓦塔扎尔下令对总统府进行第一次炮击。达乌德中断内阁部长会议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离开这里，自己决定。”

对射一开始，国防部长拉苏利和内务部长努力斯塔尼就从后门溜回部里组织力量，企图负隅顽抗。其他部长则躲进位于总统府内的沙赫清真寺。应当指出，达乌德的总统府就是过去扎希尔—沙赫国王的王宫，它建造得犹如堡垒，拥有新式的反坦克装备，并有 2000 士兵守卫，还配备了 T—54 坦克。于是，发生了坦克对攻。

坦克手进攻总统府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派”的追随者们开始抢夺军械，占领管理机构。当天傍晚，第四坦克旅与“突击队”分队会师。受国防部长拉苏利指挥的步兵第 7 和第 8 师部分所属，以及第 88 炮兵旅的行动已瘫痪。

激烈的战斗在市内不同区域和郊外展开。空军司令部所在的哈扎—拉瓦什路局势一度严峻，坦克兵增援后迅速掌握了主动权。卡德尔少校指挥的空军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忠

于党的飞行员协助完成了攻占巴格拉姆机场的行动。此后，战斗机得以升空。

17点30分，穆斯塔法上尉解救出所有被关押在市府大楼内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广播电台播发了民族曲《拉加·玛尔哈尔》——通常在政权更迭时播发的乐曲——之后，宣布革命取得了胜利。接着，阿富汗空军对达乌德及其亲属和忠实于他的卫队仍在那里顽抗的总统府进行了轰炸。进攻方多次建议停火和投降，但始终得不到回答，对射继续着。

傍晚，“突击队”冲入达乌德官邸，要求其缴械。总统问道：“是谁发动的革命？”“人民民主党”。达乌德听后首先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激烈对射中，达乌德和他全家成员被击毙。事后，参加突袭的人员说，是阿明下令不能让阿富汗总统活着留下。

28日晨，坦克手、飞行员和“突击队”携手肃清了总统卫队的最后抵抗。政权转移到人民民主党手中。牺牲者共计43人。

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历为1357年4月7日）发生的事件被称为四月革命。

事情竟是这样，发动政变的人就是曾经把达乌德推上政坛的人。卡德尔用达里语、瓦坦扎尔用普什图语在广播电台宣读关于四月革命在阿富汗取得胜利的告人民书，其中有“……清除了暴政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最后残余……”。

各省城的老百姓非常平静地接受了人民民主党掌握政权，但这种反映与其说是支持人民民主党，不如说因为清除了达乌德。毕竟不论个人，还是民族，特别是苦难的民族，大家总是寄希望于未来。人民民主党曾保证建设一个公平和自由的民主社会。其成员也曾向贫民保证在不远的将来过上天堂般的生活，所以人民起初拥护了他们。然而，口号依旧是口号，声明依旧是声明，改革者后来的命运竟也是悲剧式的。人民民主党的书记们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除了卡尔迈勒一人死于疾病，其余人都是被杀害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他们奉行的政策没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之上，他们谋私，他们生搬硬套地推行与阿富汗传统和生活方式相去甚远的改革。

对于驻喀布尔的苏联代表来说，1978年4月27日发生的军事政变犹如“晴天霹雳”，他们只是“睡过”了它。人民民主党的领袖对我们隐瞒了推翻达乌德政权的计划，因为他们深信莫斯科对此会持否定态度。政变完成之后，他们便开始冒进的革命改革……苏联的分析专家把这次政变评价为：得到军队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上层军事政变”，但这并未影响苏联领导人以毫不掩饰的愉快来对待人民民主党执政的消息。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的分析专家认定清除达乌德是苏联情报部门所为，但任何证据也没有。

经常有人引用卡尔迈勒同印度记者的一段谈话：“俄罗斯希望这里发生革命。”的确，人民民主党一执政，苏联就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尽管政变以后的事实表明，在阿富汗开始出现人民民主党的独裁，确切地说是该党领袖个人独裁的路线。

为了做出准确判断，美国对政变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利奥特就继续经济援助一事呈报国务卿时说，使馆目前无法做出判断，是否可以把阿富汗新政府确定为“共产主义”政府。塔拉基政府已多次否定了这个标签。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公开的场合还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一词。当然，新政府领导成员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共产主义”历史（虽然任何一个左派也未使用过“共产党人”一词）。新政府直率地宣称，它愿意接受包括美国在内的来自任何渠道的援助，并将根据准备提供援助的情况来评定外国的“友好感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大使馆没有发现蔑视或者拒绝他们能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相反，态度暧昧有可能促使阿富汗新制度变得像古巴那样完全依赖莫斯科。所以过久的观望会产生一种危险，就是给予塔拉基政府以理由做出

结论：在经济方面，除了完全依靠苏联，它已失去了选择。

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美国国务卿助理加洛尔特·桑德斯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新政府中的混合，并要尽力避免把这个政府推入苏联所期望的与它更紧密的怀抱。另一方面，阿富汗国内现政权的反对派将敏感地注视我们是否默认和接受共产主义政权……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我们在该地区的其他盟友是否把当地局势看做是苏联政变……”。^① 国务卿万斯对这份报告很满意，但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次政变把阿富汗引入了苏联轨道，他认为，其最终目的是波斯湾地区产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从属。

塔拉基被选为首相，卡尔迈勒成为他在党内和政府内的第二把手，已是外交部长的阿明和已是内务部长的瓦坦扎尔也成为副首相。

军事革命委员会以新政权第一道命令的形式把自己的全权移交给革命委员会——它宣布自己是国家政权的最高机构。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府和国家的首脑。阿富汗宣布为民主共和国，组成法律机构，任命了各军团和各师团司令员。与苏联国旗相差无几的红色国旗替代了原来的三色国旗，国徽也进行了更改。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由 21 人组成，其中 20 人为人民民主党成员，12 人属于“人民派”，8 人属于“旗帜派”，卡德尔一个人可以有条件地认为是“独立的”人民民主党成员。政府中有 14 个普什图人、3 个塔吉克人、2 个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和查莱曼人各 1 名。政府组成多次经历了调换和清洗，这反映了党内斗争，以及急于篡夺政权的阿明的个人自负与傲慢。后来的事件表明，革命委员会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政策都是在党的领

^① 摘自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78 年 4 月 30 日。

导层的小圈子里决定，革命委员会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塔拉基个人的智慧和办事能力都使得他无法完成民族赋予他的领袖使命。突然加冕的权力桂冠把塔拉基搞得飘飘然，他沉醉于此，深信自己无人可替代。作为经验欠缺的政治家，他又被身边人的阿谀奉承和虚伪的恭维搞得昏昏然。塔拉基实际上只扮演了代表人物的角色，掌握实权的是他身后的另外一些人。

建立新型的国家机关是人民民主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政变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政权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被清除出岗位，替代者或由人民民主党任命，或由新政权支持者们自荐。被枪毙的部长超过了40人，幸存者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软禁。吸收新人参加工作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几十年形成的机制。在行政管理和国务活动方面，现有党员中几乎没有合适人选。而对于老专家们，其中不乏爱国人士，采取的措施又太严厉，许多人不得不移民国外，或者归附反对派。

看来，夺权来得比掌权容易。人民民主党党员面对倒塌在他们身上的政权茫然不知所措。批评统治制度、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同实行社会改革、使国家在经济上发达富强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开始盲目照搬苏联经验，苏联专家们也起了鼓动作用。然而，每个民族都有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夺得政权的党魁们的外行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都给后来发生的事情深深埋下了祸根。

在清洗过程中屡次对各部委领导干部层动手术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机关本来就很低下的工作效率。在官吏和党魁中间出现了一批由盗窃国家和私人财产而致富的暴发户。比如，阿明及其亲信将相当一部分国有资金和罚没的私人资金窃为己有，存入当地或国外银行。阿明被推翻后查清：他在阿富汗国家银行个人账户上有1.14亿阿富汗尼和200万美元。

阿富汗各地驻军对4月27日的武装政变基本上持积极态度。分布于省城驻军中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军事组

织成功地孤立围困了追随达乌德的那些高级军官，阻止了向首都调集忠实于达乌德的部队。各地驻军还多次举行声援革命的游行。军人还参加了诸如对国家机关中原政权追随者进行的清洗，参加特别行动组去监察市场物价等活动。部分军官被任命为省长和县长。政变后立即对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人员进行了清洗，枪毙了包括原国防部长拉苏利和原总参谋长阿齐姆在内的25名高级军官。

5月8日公布了人民民主党纲领——《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它规定要进行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消除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前的各种社会关系；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使社会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行妇女平等；巩固国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文盲；控制物价；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对外政策方面一奉行积极的中立和爱好和平的不结盟方针；为全面裁军而奋斗；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巩固同所有邻国的友谊与合作；优先发展同伟大的北方邻国——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

推翻达乌德政权的那种轻易性滋生出一种历尽千辛的快感与自信。表面成绩竟使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头脑发昏，出现了近乎于崇高和伟大的自我感觉膨胀。即使在接待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时，他们也表现出那种特有的傲慢：其他的事情苏共代表有什么好说的！在与伟大的十月革命进行对比时，他们总是过多地谈论自己的四月革命。他们完全忽视了阿富汗的国情、传统、宗教习俗、国内政治力量，以及周边的国际环境因素。塔拉基和他的继承人阿明对待吉尔扎部落的态度，以及当时仍由杜伦尼人操纵国事这一事实，都是他们的软肋。依然推出民粹派式的口号，传播媒介继续着毫无实用价值的左派闲聊和乌托邦式的宣传——它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完成过。公开宣称，5年以后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阿富汗国内没有无产阶级）……这些没有

给人民带来好处，因为人民民主党试图嫁接给阿富汗的价值观，在人民眼里不是那么回事。对于阿富汗人来说，祖先留下的传统、习俗和所有生活方式才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想脱离它们、抛弃它们，那样做就是对始祖的背叛。虽然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遵循的似乎是“善良”的意图，希望民族繁荣昌盛，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句话并非枉言：地狱之路正是善良的意图所铺就。

如何处理同教会和反对派部落领袖——这两支有影响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未去利用大部落的部落长和支配着实际力量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家们这些人的威望。在宗教界，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被看做是枉自高大的偷机钻营者，没有人认真听他们的话。由于缺乏信心把宣传公布的事情做到底，塔拉基和他的战友们把赌注押在了苏联身上，并且最终达到了目的。

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各项援助的确像潮水一样（仅仅是苏联国防部渠道的援助在阿富汗内战的耗费便超过了120亿卢布，而无偿援助超过了80亿外汇卢布。这样的数字在当时非同一般）。仰仗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人民民主党领导推行一套以压制和恐怖手段为基础的独裁统治路线，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这不能不引起人民的绝望反抗。实际上，该党奉行的政策既没有人民性，也没有民主性。

还必须指出的是，军人和党的骨干分子中间，不乏一批真诚的革命志士，他们诚心诚意地相信党宣扬的理想，为了民族利益和人民幸福他们甘愿赴汤蹈火。为建设一个繁荣平等的社会，给人民以安康和幸福，他们准备为国捐躯，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经常迫不得已地与自己的父亲、兄弟和亲人们进行斗争。他们天真地相信了党的领袖，其中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方面，历史不止一次这样走过，革命开始吞噬那些无论如何也分享不到权力的革命的创造者，

它悲剧性地影响了那些被革命漩涡裹挟的普通人的命运。然而，宣布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一次，人们在追求理想中被欺骗。但革命不是行骗的，为人民利益的革命更不会这样。



苏联专家的无能

很遗憾，以外交官和经济专家、军事顾问和苏共顾问为代表的苏联方面在这一阶段对阿富汗局势的分析、判断、评估，以及援助事务方面都出现严重失误。应阿富汗领导人要求，苏联在“四月革命”胜利后就紧急派出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将以顾问的身份在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政府部委和机构中工作。例如，5月17日，以苏共中央国际部希蒙年科局长为首的专家代表团抵达喀布尔，随行的有甘科夫斯基和斯米尔诺夫；6月27日，另一组被委派去阿富汗政府部门工作的48位专家如期抵达；8月3日，由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长克留契科夫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

目的只有一个——在新制度的成长、研究制定党和国家纲领性规划、共和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拟议，以及农业改革的实施和国家强力部门的建设方面给予全面援助。至于苏联阿富汗军事合作，它始于1956年。在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同时，还进行着对阿富汗军事干部的培训。其实从1972年起，就对阿富汗军队派遣军事教导员和专家（100人）。1978年5月，就军事顾问事宜签署了政府间协议：改变被派人员的地位（教导员改为顾问）、任务和数量（400人），实际增加了3倍。

鉴于顾问团组成仓促，许多人从来没接触过阿富汗事务，对伊斯兰教的概念更是完全模糊，对阿富汗的社会状况只有最笼统概括的了解。他们是本国体制的孩子，面对陌生的习俗，面对另一种社会体系和社会基础，以及迥异的传统和思维方式，他们经常面对最简单的情况而不知所措，造成

过失。苏共顾问试图走自己熟悉的老路，建议阿富汗人去做那些在苏联就早已使自己威信扫地的事情，竭力促使阿富汗人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然而，不了解这个民族，便会一事无成。苏联专家们就这样没有研究了解清楚阿富汗人的心理和志向，仿佛很少有谁去操心这个问题。东方学学者们在自己的圈子内研究讨论过阿富汗问题。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几乎没有传达到实践者的耳朵里，充其量不过是理论思维的书面形式。苏共顾问试图运用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不止一次地做出荒诞事：组织社会主义竞赛，集体阅读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渺小的大地》和《复兴》等。军事顾问亦有自己的问题：建设阿富汗武装力量，同反对派武装力量斗争。

苏共顾问参与起草准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章要求其成员“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在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政府仅仅定位于关心农村人口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不过，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顾问未必就合理。他们是在苏共正式方针政策的轨道内活动的，这些方针政策以当时苏共中央对阿富汗事件的观点和有关指示为依据。那些指示经常是荒谬的，甚至是矛盾的。苏共领导遵循了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方针，企图变“阿富汗为第二个蒙古”。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是个外行，所以苏联顾问们不可能做出什么其他举动，他们也没有权力提出什么建议。

在许多党的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具有“停滞时期”特色的蒙骗行为，就是报喜不报忧。当然，对阿富汗事件也有过客观的、讲原则的评价，但那仅仅是少数例外。

我们的顾问在工作中经常越俎代庖，这助长了阿富汗人的依赖心理，导致他们自我回避现实问题，把精力用于党内斗争。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苏联顾问方面的初级过错已不常见。但是，随着新一拨人员到来，一切又都重新开始重复。要知道，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培养过顾问。在顾问工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看做是可靠的方法论原则和万能手段，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经过全面深思熟虑的、分阶段的战略路线，而这正是我们缺乏的。宣传的只是最终目标。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有苏联顾问工作的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尼加拉瓜、越南、老挝、莫桑比克等。由此可做出结论：顾问必须提前培养。作为顾问，应当派遣那些接受了目的明确的培训的专家，除了擅长自己的业务外，他们还应该了解派往国家的传统和习俗，以及当地政治局势和各派力量的分布，否则只能是弊大于利。



阿富汗式的社会“改造”

土地改革

农民阶层如何对待人民民主党，成为新制度存亡的关键问题。得到它的支持，新政权就会支撑下去；反之，新政权必遭灭亡。因为农业是阿富汗的经济命脉，是土地制度的基础，是基础的核心。

人民民主党制定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中，农业改革占据特别位置。这不仅仅因为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22750 个村落中居住了全国人口的 87%），还因为必须建立一种以无地和缺地的农民为代表的、对新制度的广泛社会支持。

1978 年 11 月 30 日，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有关的“土地令”。它规定了水利—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以国家利益无偿没收多余土地，无偿分配给没有土地和缺少土地的农民，以及游牧民。土地改革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展开，当时通过了在第一批 10 个省进行土地改革的特别命令。

“四月革命”之前，阿富汗 76% 的农业人口丧失了土地。大地主以苛刻的条件出租土地（收获 6 麻包小麦，农民

只能得到1包)；他们收取租金后，或放高利贷，或经商，而且都住在首都或者省会。相对富有的农民—马利克(汗、部落长)在乡下享有较高的威信，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有权收取税金、分配土地、挑选适龄青年入伍等等。乡下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拉，其影响和威望倚仗宗教，他有权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伊斯兰法典有关条款，监督履行伊斯兰宗教礼仪，教孩子识字。条条山梁、难以通过的山口和没有公路，这就十分严实地把一个村庄隔绝于其他村庄，隔绝于大城市。这又强化了牢固的血源纽带和村民们的团结。那里对外界怀有根深蒂固的猜疑和不信任。

马利克的经济权力和毛拉的宗教威信结合在一起……普什图人约定俗成的传统又加深了地域造成的隔绝。阿富汗的农村是社会封闭的一点，那里不能出现外来人，不能出现新的思想。农民没有把地主和马利克看做是敌人。

任何涉及乡村的举动都需要小心谨慎和仔细斟酌。然而，阿富汗领导未经准备(显然，并非没有我们的影响)就匆忙着手旨在短时间内摧毁由来已久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体系的改革。公布了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关于彻底改革的法令：7月的6号法令——削减无土地和缺少土地的农民的债务；11月的8号法令——捣毁大地主拥有土地权的基础。

土地改革过程中，国家从3.5万个地主手中无偿没收了74万公顷土地，其中66.5万公顷无偿分配给了29.6万户无土地的农民，4万公顷划拨给国营农场，3.35万公顷为各城市市政用地。但不是全部有权拥有者都得到了土地：大约还有11.6万无土地和70万缺少土地的农民，以及15.4万游牧民家庭没有得到土地。

土地充公损害了前拥有者的利益，根据法令受到制裁的不乏享有官职的地主、军官、国家部门的官吏和穆斯林神学家。这也决定了这些人对待新体制的态度。

无论怎样说明理由或提出论证，都不可能消除反对侵犯私人财产的偏见——这是阿富汗农民的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个

最重要成分。孰不知，统治他们的是捍卫长老和封建主利益的古老的部落和氏族传统。另外，个人命运和宗法的关系乃至亲属纽带，常把农民和地主联结在一起，而不触动他人财产是以伊斯兰教为依据的。他们认为，真主早已将土地分配完毕，任何人也无权重新分配。

同时，还缺乏现实可能性利用地主们拥有的全部土地资源来保证实现人民民主党要使所有需求者都能得到土地的初衷：农民得到的土地份额常常只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还未建立保障实现改革的机制。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禁止出卖、出租、抵押，或作为遗产分割。这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法典的有关条款和古老传统。还禁止雇工劳动。这些限制再加上对个人高利贷的禁止和没有渠道向国家贷款，最终导致农民赤贫化。

农民无偿得到了土地，但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没有劳动工具，没有粮种，没有资金。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家庭无力耕种分得的土地。许多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丧失了在地主家做雇工的机会，处于饥饿边缘。

改革非但没有带来好处，还引起了经济衰退和生活贫困，伴随改革的只有恐吓和镇压。比如，在赫拉特省的许多地区，当地政府公开把拒绝接收份额地的农民称为革命的敌人。当官的经常滥用职权：把各种好处留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享用；普什图人最先得到土地；贪污受贿成风。人们甚至产生疑虑，这样轻易得到的土地，明天会不会也这样轻易地被剥夺。

被革命惊吓的农民试图寻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对发生的一切加以说明。他们顺理成章地找到毛拉和马利克，要求讲明事理。毛拉和马利克已经感觉到新政权在威胁着他们的地位，便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国家政权被那些卖身投靠俄罗斯的反宗教混蛋们篡夺，必须和他们做斗争。

农业生产方面，土地改革没有带来预期成果，相反，它破坏了现有的农业经营体系，恶化了食品供应，滋生了不平

等，这是引发动乱局面的诸多因素之一。改革使传统的经济关系同农业产品的产销之间发生断裂。国家的中央区域对此感受特别深刻——原来的体系是畜牧业产品再加工保证大城市的供应，哈扎拉人和游牧民族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农田灌溉、获取新技术、粮种和肥料的私人投资减少。在没收土地的过程中，地主们杀死了牲口，销毁或盗窃了拖拉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这些做法降低了农业生产力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其结果是人们从开始的消极抵触发展到后来的公开反抗。

土地改革使国内的发展前景更加复杂，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心也转移到了农村地区。1978年6月，在农村第一次爆发了反对中央政府有关措施的武装事件。起初在巴达赫山、巴米杨、库纳尔、帕克吉亚、南加尔汗尔省，后来蔓延成武装起义，波及到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

结论是，人民民主党政权的衰落从多方面讲都是因为他们为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他们推行的改革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

如何处理民族问题

对于人民民主党来说，这是事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它有属于3个人种系的20个民族：普什图系（阿富汗）、伊朗系和突厥系。当然，还有其他人种系，但那是少数，不会对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阿富汗各民族总是以数量多寡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历史性作用来相互区别。就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而言，几百年来普什图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1979年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它曾被用于反对人民民主党的宣传：统计青年人的数字，以便今后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去），国家的人口情况为：常住人口1300万，游牧人口100万~250万，总计1400万~1550万（1996年的统计为1260万）。

居民的人种构成大致是：普什图人 6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43%；塔吉克人 400 万，约占 29%；哈扎拉人 110 万，约占 8%；乌兹别克人 130 万，约占 9%；土库曼人 50 万，约占 3.5%；查莱曼人 50 万，约占 3.5%；其他民族（贝卢吉、努里斯坦、波斯、克孜尔巴什、姆里坦、帕沙伊、哈萨克、吉尔吉斯、阿拉伯、帕米尔、印度、库尔德）为 60 万，约占 4%。

普什图（阿富汗）占压倒多数。约有 300 万普什图人密集地分布于东南地区阿巴边界线一带的“部落区”，另一部分安居在广阔的南部地区，第三部分人分布在像飞地一样散落于北方和赫拉特省的绿洲。许多普什图人在大城市生活。

延伸于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部落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片 600×120 公里的辽阔区域内密集地居住着相当比例的普什图人。在阿富汗这一侧，这个部落区占据了整个南加尔哈尔省、帕克吉亚省、帕克捷卡省，以及扎博尔、加兹尼、拉戈曼三省的南部区域和坎大哈省南部。这些地区的县镇行政划分常常同一些大部落氏族的居住区域相吻合。

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区”享有特别行政地位，并且保留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那种间接管理体系。

“部落区”的重要性还在于军事战略方面。因为它不仅是两个国家的连接点，还是中东和南亚之间的走廊。对于没有海上门户的阿富汗来说，这个区域就是连接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间的市场之窗，是接受大量经济援助和进口商品的渠道，也是本国游牧民前往巴基斯坦的通道，同时它也是与“历史衔接的人种之桥”。它把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同自己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历史摇篮相连接。

前面已提到过，1893 年的“迪朗德线”把普什图人分割为两部分（1850 万人中的 900 万在阿富汗一侧，其余的在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对“迪朗德线”从未承认和服从过，普什图封建贵族和部落领袖中间有一种建立独立普什图国的

强烈愿望。这是阿巴边界线上的一个敏感点，双方对它总是避而不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什图人企图实现独立的举动屡遭挫折。比如，1949年创立了普什图斯坦民族会议，它又建立了部落大委员会。大委员会视恢复被巴基斯坦“占领”的普什图斯坦的独立为神圣任务。1959年，普什图部落同巴基斯坦军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阿富汗政府支持的普什图部落一方被镇压，由此导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阿富汗政府从未承认过“迪朗德线”是合法边界线，历来认为居住着普什图部落的区域是阿富汗不可分割的领土。

巴基斯坦领导人虽没有对邻国提出领土要求，但坚持要官方承认“迪朗德线”为两国边界线。但绝大多数普什图人认为承认便是对民族利益的出卖。对于普什图人来说，民族性莫过于第二宗教（也许是第一宗教）。了解自己的种族、它的代表和历史，为它骄傲，颂扬同胞的事业——这是每一个阿富汗人的职责，不仅心甘情愿，而且狂热地去履行的职责。我认为，普什图人和阿富汗其他民族对自己传统的忠诚和对长老的尊重等品质具有其深刻含义：这就是与时间的连接，与自己的人民、祖先乃至祖国的完整统一。

根据人种特征，普什图部落可划分为4个族系：凯尔拉尔尼、古尔戈什、萨尔巴尼（杜伦尼）和吉尔扎伊。一批研究专家认为，其中最古老的（始祖的）是生命力最强的凯尔拉尔尼。它鲜明地反映了阿富汗族的特点，它居住于“本民族最原始的巢穴（苏莱曼山）”。人种学专家认为，其余三支族系是从离乡的凯尔拉尔尼中派生出来的。阿富汗人的“扩散”和立足不是“跳跃式”的，而是渐变的，它成功地利用了历史发展中的许多契机，接受了其他民族的人种成分，并落户于陌生的地方：古尔戈什同别鲁吉，吉尔扎伊同突厥系的哈拉吉……。

阿富汗领土上总计有90个部落，每个部落的人数从3万到15万不等。部落间有条件地以阿巴边界线划分，相互

保持着紧密的亲属关系和经贸等其他关系。每支部落都有自己专用的区别特征：服饰、象征物。每支部落代表之间总能相互区别辨认。普什图人有自己景仰的荣誉规范——“普什图瓦利”——非书写的法典、部落权利、地方习俗和穆斯林教规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荣誉、诚实、不计后果地忠实于真理、勇敢无畏、不惜流血复仇、绝对服从族长、好客……。

在不违背民族传统和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普什图人形成了帮助自己生存下来的一套独特的自我管理体系。阿富汗至今还保持着牢固的部落氏族结构，它包括划分为部落的部族，部落又划分为氏族和家庭。每一部落仿佛都是“国中之国”。部落由家庭首领会议来管理；关系到所有部落的问题则召开大委员会来决定。

历代阿富汗政权都打算取消“部落区”的半自治地位，以确保国家体制下的完整一体化，并终止大部落的半独立状况，置其于喀布尔控制之下。作为成员数量众多的群体，普什图人从来都享有不同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特权。国家机构和军官团常常是由普什图人（部分塔吉克人）组成，他们免服兵役，不缴纳所得税和海关税，不参加体力劳动，还保留了司法审判和自我管理的传统原则。他们被允许携带武器，划拨得到肥沃土地，包括在其他民族人口占优的地区。政权有意识地培育推广“普什图精神”，用于抗衡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部落区”重要的特殊性还在于每个部落自古便拥有用于捍卫居住领土和本部落利益的军事力量。游牧部落中的军事力量达到居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部落人拥有马匹，都是优秀的骑手。他们的军事素质丝毫不亚于常规部队。各部落都掌握支配相当数量的射击武器，武装人员接受过很好的山地作战训练，设有传递情报的侦察系统。还具有做事干练，训练有素，高度军事纪律性，由祭祀树立的对指挥员的绝对服从等特点。童年时就开始培养男孩子的战斗意志。热爱自由、崇尚武义、坚忍不拔、无所畏惧、协作精神是他们的心

理性格特征。还有急躁、不为意见左右、对现实评价的实用主义等。

普什图人为自己的民族属性感到非常骄傲，他们格外珍惜自由。俄罗斯杰出的军事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斯涅萨列夫在《阿富汗》一书中引用阿富汗人回答英国人指责他们内讧和分争不安时说的话：“尽管我们贫穷，我们在淌血……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我们阿富汗人从来都是最自由的”。^①在一则谚语里也折射出对祖国的热爱：“故土珍贵于全世界”。把它视为“弃绝旧世界”的号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弃绝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传统和祖先的信仰，那也就失去了未来。它或慢慢死亡，或被其他民族同化。不少民族、不少文化和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留下夺目的痕迹后便销声匿迹。昔日的文明伟业留下诸多的纪念物（埃及金字塔、卡纳克神庙群、卢克索城、东南亚的古刹、阿西德克人和玛雅人的城市）、书籍、神话和传说。而有一些民族留下的仅仅是称谓。自由，这个理想的、诱人的、甜蜜的和令人内心不安的词被阿富汗人扬举为独特的顶礼膜拜，他们对其忘我而自豪的崇拜已延续了若干世纪，在战争中流淌的鲜血被看做是自由的露珠。为此，他们甘愿赴汤蹈火。在鲜血中丧生的常常是试图陶醉于自由的那些人。自由从不轻易地落于谁人手中，它像海市蜃楼般地消失，地平线般地离去。当仿佛已经获取自由，可以呼吸它那令人心醉的气息时，才会明白，它依然若原先那样遥远而不可及。自由，这是人类美好的、不可企及的古老理想和愿望。显然，它因此而备受追求和挚爱。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每当人们面临死亡时都会呼出这个极具魅力的词——“自由”？人们犹如扑向灯光的蝼蛄，乐于忘我地为自由而死，但从来是在渴望中落入欺骗。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抛向自由的祭坛。然而，地球上有没有哪个民族能够骄傲又自信地说：“我是自由的！”？

^① 斯涅萨列夫著：《阿富汗》，第99页，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0。

在普什图人眼中，其他民族是陌生的、敌意的，甚至是劣等的，尽管他们总是极其重视和尊敬客人。不论他们如何欢迎外国人，不论他们公开地对其表示多么的尊敬，埋藏在心底的必定是鄙视和极度不信任，甚至是不可遏制的憎恨。这种感觉可以暂时“清除”，但无人能够将其从阿富汗人的意识中彻底清除掉。

自古以来，阿富汗人为了自由，手持武器在部落之间或其他的战事中同外国人进行战斗。根据规模和目的，战事分为不同类型：“淌血的复仇”、部落间战争、同中央政府的战争，还有穆斯林为伊斯兰教和法典进行的圣战。

对于每个阿富汗人来说，首要的职责是保障“纳姆斯”——家庭、氏族和部落女人的荣誉。有格言为证：“为挽救头颅，牺牲你的财产吧。为捍卫‘纳姆斯’，贡献你的头颅吧！”与家庭和家庭利益相关的任何恶行必须遭受报应（常常采取暴力）。根据“普什图瓦利”法典，无法复仇就是丧失荣誉，因为“荣誉”在每个普什图人的意识根基里就是“我”。

有一句普什图谚语如此描绘部落之间和部落内部的战争状态：“部落进行战斗之时，就是和平降临之日。”还规定，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必须停止家族和部落内部的敌对行动。

以“淌血的复仇”为目的的战争规模不大，允许采用任何手段，惯用的是埋伏，杀死对峙家庭里那些应该抵命的人。双方恢复平等后，战争就结束了。这种战争的结果向来都是平手，这是被山里人广为接受的传统。它与伊斯兰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违背它什么。

部落间的战争和与政府之间的战争一般尽量避免流血。这类冲突大都因为分割牧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在内部的、无休止的谈判和协商中进行：胜方仅仅是获取，而非消灭对手的生命。放弃军事行动，代之以缴纳事前约定的款额。传统上部落间的战争规模不大，只在

特定的地方进行，并受时空限制：搏斗在村外进行，只许男子参加，并要避开收获季节。

这类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争夺与经济利益（土地、猎物、赎金）有关的领先地位。另一则谚语说这是为土地、黄金和女人的战争，其实也是为威信和荣誉而战。

中央政府利用当地部落长老、宗教领袖、军队代表和国家首脑（国王、达乌德）的斡旋达到了部落间的和解，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才动用常规部队对付敌对双方。

圣战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由有影响的宗教活动家发起号召，旨在反对外国异教徒。通过号召与异教徒——为伊斯兰教和法典——进行战斗而发起的圣战已经超脱了部落的价值观念和法规。圣战中沒有毙命者，只有殉教者；没有军人和普什图人之区别，有的只是同异教徒及其追随者搏杀的圣战者。

在处理同普什图部落的关系中，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不善于避免导致严重破坏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人种关系，乃至刺激外省反对派力量增长的一系列行为（强制性服兵役、对居民区的轰炸、对部落个别长老和领袖人物的镇压）。

一方面强化传统的分裂主义情绪和对中央政权领导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利用恫吓和收买，政府的反对者以此把相当一部分普什图部落头领和阿富汗其他少数民族领袖拉拢到自己一边。于是，昔日与喀布尔政府合作保卫疆界的部落准军事力量倒戈到反对派武装阵营。

1978年四月革命之前，非普什图人遭受着双重压迫：封建主的压迫和亲普什图的中央政权的压迫。少数民族一贯是歧视政策的对象。在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管理机构，普什图人被委以优越的高官显位。比如，所有的省长和多数大封建主都是普什图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推行强制性的普什图化政策，这种做法灌输助长了普什图沙文主义。尽管大多数居民讲达里（法尔西）语，1964年的宪法还是规定了普什图语的优先位置。新政府宣布各民族平

等，而普什图人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也不例外。

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后，并未制订计划解决民族问题，它的纲领仅仅宣传了这种必要性。公开宣扬的民族平等最终没有得到落实。

这里有阿明招致的一个巨大损失。这个狂热的普什图民族沙文主义者采取了更深化的强制性手段推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什图化方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因为具备斗士的品格，所以普什图人才有能力把四月革命进行到底，并在阿富汗建立社会主义。一些少数民族代表的政治活动家被扣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有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利用尖锐的民族矛盾挑拨普什图人去反对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阿富汗领导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层安插普什图人的做法和岗位更替时鼓励氏族联袂令人难以接受。比如，省长、市长和县长职位上任命了64名来自阿明故乡帕戈玛的人……。

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极为消极地影响了民族局势。从土地匮乏省份往其他地区迁移农民时，没有考虑民族构成问题，在拔尔赫省，部分普什图家庭落入塔吉克人稠密区，这进一步激化了两族间的矛盾。

80年代初，北部省份巴戈兰、塔哈尔、巴达赫山和昆杜兹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中少数民族已超过80%，而赫拉特、巴特基兹和古尔三省的圣战者队伍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分别为：塔吉克族52%，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恰莱玛基人22%，普什图人只占26%。

宗教是为人民的，还是反人民的？

阿富汗是个穆斯林国家，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民间传统。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法规，有自己对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态度。

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约为 30 万人（人口的 2%），开放的清真寺和供祈祷的地方超过了 4 万处。数以万计的陵墓和圣徒墓地，及其他类型的圣地，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前往瞻仰凭吊。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没有最高的宗教领袖，每一位毛拉都按照自己的意图活动，不从属于任何人。神学界高层给予的规劝仅仅是不具实际约束力的可兰经概论。每 10 个阿富汗人中有一人曾前往麦加、麦迪纳或纳扎弗朝圣。2 万名阿富汗人常年在宗教学府里学习。喀布尔大学神学系为逊尼派教培养神学干部。学习伊斯兰教是全国学校的必修课。每天的生活均以祈祷开始和结束。

国内占主导的伊斯兰逊尼派教是国教，受大多数居民信奉。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大多数人也是逊尼派教徒，官吏阶层和军官阶层亦如此。通常，这些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普什图人，特别是来自“部落区”的普什图人都不是那种狂热的宗教分子。宗教领袖在“部落区”的影响一般是次要的，部落长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才是第一位的。

什叶派教在伊斯兰教中处于次要位置，几乎算作是邪教流派。传播布道什叶派教的有哈扎拉人、塔吉克山民和部分普什图部落。什叶派教徒受到歧视，他们被迫唯心地说话，这也引起邻国伊朗什叶派领导人对阿富汗政权的敌视态度。

什叶派的旁系派别伊玛玛特派、阿赫默底亚派、阿赫列哈科派和伊斯玛仪派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伊斯玛仪派，它在阿富汗的信徒已接近 100 万，而且全部居住在非普什图省份巴米扬、巴戈兰、萨曼甘、昆杜兹、塔哈尔和巴达赫山。人民民主党特别残酷地迫害了什叶派分子。伊斯玛仪派领袖塞义德·曼苏尔·纳吉尔一家的命运最具代表性，他的三个兄弟都被阿明授意杀害。

众所周知，宗教情感是精神生活最微妙最细致的部分。介入其中时，切记守规矩，千万不得乱来。“如果自己不懂，就去询问行家吧！”可兰经这样告诫。然而，掌权的“革命者们”却违背了这一训诫。虽然新政权在 1978 年 4 月《告

人民书》中宣告革命是为了“捍卫伊斯兰原则和民主”，并且得到宗教界的响应与合作，但人民民主党仍然采取措施加强对宗教界活动和布道内容的监控。

政府缺乏对信徒宗教情感的敬意被看做是玷污圣地，因而引发了教会的批评。对此，人民民主党不做应有的解释工作，就宣布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为头号敌人，也没有揭露个别毛拉的反政府行为就采取镇压手段，当众枪杀了许多神职人员。

他们就这样进入了暴君行列，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国家政权的形象，使相当一部分百姓放弃参与改革，政府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反对派把伊斯兰教作为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加以利用，同人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应该知道，伊斯兰教是阿富汗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在他们心目中，神职人员就是真主在地球上的仆人。同伊斯兰对抗，并同它进行斗争，这意味着同自己的人民作对，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果真如此。为谋私利同伊斯兰耍手腕，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978年10月7日，政府以特别命令的形式确定了法学和神学高层委员会的新规章。这个机构隶属于司法部，但它无法发挥积极灵活的作用和对宗教界的活动施加影响，以及吸引其代表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政府拟召开法学和神学高层会议以期得到宗教界支持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并使塔拉基和阿明的统治也具有伊斯兰权威的努力最终劳而无获。那些与政府进行了合作，并认为接纳人民民主党领袖也不违背教规的人在信徒面前威信扫地，因为时隔不久，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便被指控犯有杀戮罪孽，成为人民的敌人。

1978年10月，政府的第7号特别法令给予妇女以男女平等权利。规定取消婚金和彩礼，禁止早婚（也称婚姻改革）。在消除文盲的斗争中，强迫妇女识字（宗教界宣扬女人有文化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创办了混合学习班（老人、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以欧洲文明观点来看，这是进步措

施，但对于缺乏文化、宗教成风的阿富汗人来讲，特别是乡村地区，这种做法就是干涉私人生活，就是对传统根基的践踏。尽管如此，宣布男女平等还是产生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大城市），数以万计的妇女支持了政府，加入到捍卫革命的行列以及警察部门。

不过，先前对宗教界上层采取的镇压措施还是使毛拉们同人民民主党积极对抗起来。他们巧妙地把伊斯兰价值观念当作夺取政权的武器来运用。所以，人民民主党做出的许多尊敬伊斯兰的姿态（拨款维修兴建清真寺，优惠赴麦加朝圣的费用，提高毛拉薪金）都未收到预期效果。

◆ 反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斗争伊始

1978年6月，反对中央政府“民主和反封建措施”的武装行动首先在巴达赫山、巴米扬、库纳尔、帕克吉亚和南加尔哈尔等省展开。领头的是封建地主阶层和卖办资产阶级，以及与之合作的伊斯兰宗教界上层人物。他们善于利用居民的高度文盲、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部落矛盾，以及狂热的宗教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这样的变化并未引起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给军队下达有关命令，以为只要动用武力就可以遏制住反对派力量的策源地。

正规军对付反对派的农民武装，动用炮兵和空军给平民带来伤亡，毁坏乡村、灌溉系统和田间收成，这导致暴乱活动逐渐蔓延。在毛拉和土地所有者挑动下，农民的自发起义开始具有了组织性和伊斯兰教色彩。然而，政府依旧寄希望于动用武力，不断增调部队加入行动。

针对国内反对派和老百姓的讨伐行动引发了背井离乡的难民潮。为了拯救孩子，人们整家整家地，有时是整村整村地逃离家园。这一现象很快便失去控制。如果在1973年有数百人逃至巴基斯坦，1978年则达到11万人，而仅仅在1979年9~12月间难民数字更是突破了75万人。再往后，

就以百万来计算了。

以巴基斯坦为主要基地的国外反对派也积极开展活动。1975年的起义失败之后，与国际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伊斯兰社团同解散后幸免于难的“穆斯林青年”组织成员在邻国联合成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党”。参与其中的还有宗教界上层代表和毛拉，比如，布尔哈努迪·拉巴尼、穆罕默德·尤努斯（哈列斯）、纳斯鲁拉、曼苏尔、杰拉鲁丁·哈卡尼……。

当代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们都受到了强烈的政治影响冲击，他们当中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协会”和“伊斯兰运动”奠基人和领导人塞义德·毛杜迪、马夫洛诺·穆夫迪亚·马哈茂德、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的奠基人塞义德·库塔博和哈桑·乌里·班，以及伊朗人、伊斯兰运动思想家阿里·沙里阿季。这些人以伊斯兰的极右立场从事反对人民民主党的斗争。但一个山头容不下两只老虎，每个重要人物都在竭力创造自己的政党。拉巴尼走在了前头，他首先成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协会”。“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进去，包括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这两个政党都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立场。

这样，至1978年4月份，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就活动着两支主要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派组织：由赫克玛吉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和以拉巴尼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协会”。随着暴乱活动升级，人们发现，参与其中的阿富汗农民基本是在当地毛拉领导下作战，毛拉都是墨守陈规的传统观念维护者，他们反对伊斯兰之间的新一轮冲突，认为那是错误和邪恶的。另一个政党“可兰经之仆”应运而生。虽然反对派各政党领袖们公开是同盟者，但他们之间逐渐出现不和，继而转变为相互敌视，情况一年比一年恶化。

不久，反对派政党便采取措施进行联合，领导它的本应是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但这种做法与建立在个人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阿富汗传统的社会体系相

抵触，所以联合是短命的。

1979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在巴基斯坦成立的反对派政党、中心和组织：由于赫克玛吉亚尔和哈列斯两人之间发生矛盾而从“阿富汗伊斯兰党”中分离出来一个“哈列斯伊斯兰党”；由拥护复辟君主立宪制的“卡吉利亚·苏菲”派首脑、著名宗教活动家吉拉尼创建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由纳比领导的、在保守的宗教界政党“可兰经之仆”基础上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所有这些组织都态度坚决地准备同人民民主党政权展开武装斗争。他们着手组建武装队伍，训练战斗人员，为其配备现代化武器。

反对派力量的所有努力都着眼于部落和难民，以吸收每个部落过去就拥有的自卫力量中的现成战斗人员。开始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人种群体；努力使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的宗教色彩同传统和居民心理相吻合。

反对派组织在紧靠阿富汗边境居民点的巴基斯坦一侧领土上建立了许多训练中心、军事营地、武器库和作战人员转运站，并有计划地修建了一批准备在阿富汗全面展开军事行动的基地和据点。同时，反对派领袖们还在宗教界上层人物和大家公认的、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部落长和部落长老们中间进行宣传工作。他们的密使遍布阿富汗全国，并且没有遇到任何一级地方政府的干预。

对于反对派各政党来说，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出现的阿富汗难民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此前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牢固的基地”。在巴基斯坦军人协助下，他们开始在农村青年中招募和训练战斗人员；后者已在难民营中被金钱收买，有时亦被威胁生命或惩罚亲人的恫吓所胁迫。简而言之，这些青年人将扮演“炮灰”的角色。1978年底，开始向阿富汗大批派遣接受过训练的武装分队和破坏小组。从这时起，反对塔拉基政权的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反对派中间人数不多的什叶派分子得以在伊朗立足。不过，伊朗有自己的伊斯兰革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

事情，无暇旁骛。

正是在那个时期，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喀布尔一直鞭长莫及的哈扎拉扎特省全面展开反对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努里斯坦的居民也公开反对政府；从巴基斯坦赶赴当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密使为反对派招募战斗人员；反政府宣传也更加肆无忌惮，特别是针对军人、旨在瓦解军队的蛊惑宣传；建立了由逃兵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分队；在许多省份反对派团伙进行了诸如切断交通、毁坏输电线路和通信线路的破坏活动；针对奉公守法公民的恐怖活动增加。反对派就是如此破坏稳定局势，动摇阿富汗现政权的。

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临时代办弗雷兹指出（1979年7月10日，5244号文函）：“……暴动者正在竭力‘弄伤人民派政权的鼻子’，以使人民派领袖经常宣扬的‘我们得到百分之九十八居民热情支持’的话成为乌有。起义者的行动使许多外国经济发展项目被停止和冻结，人民派失去了来自国外的资金投入，而这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人民派是否能支撑得住，或是被迫求救于俄国人？7月初，困境中的人民派看上去还可以在苏联继续慷慨的物质施舍和顾问援助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支撑下去。毫无疑问，人民派懂得，邀请外国军队的做法会在大多数阿富汗人（包括那些愿意给他们机会使国家摆脱古老的封建泥潭和实现现代化的人）心目中彻底毁掉自己的形象。所以，人民派把这步棋当作最后一着，但这一刻还没有来临。”

阿富汗领导人对暴乱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并请求苏联扩大军事援助。起初，我们的领导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待这些请求，但是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阿富汗与超级大国的关系

多数西方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盟国从一开始就对阿富汗国内发生的事情采取消极乃至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该地区

的力量关系对比如果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美国对待阿富汗乃至对待中东的外交路线只是其总体方针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总体方针在 70 年代中期已经具备了清晰的轮廓。美国认为当地形成的局势是不稳定的，所以在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和伊朗君主制垮台之前就开始强化自己的军事准备，计划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其中，根据卡特关于准备进行局部战争的指示，在 1978 年初就为在该地区的行动划拨了三个步兵师和若干空军联队。

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对那里的局势没有形成一致态度。以万斯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克制。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的强硬派提醒卡特总统说，在这个国家退让，特别是面对伊朗上层社会的不稳定，就等于给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一个信号：该地区已被“注销”，因为就美国利益而言，它并不重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协助阿富汗反对派在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和训练营地网，为此，他还会见了巴基斯坦领导人……。

布热津斯基说服美国政府相信，苏联在阿富汗加强影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但局势又为美国人在政治上提供了良机。诚如美国国务院后来形成的一份报告^①所言：“……推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将向落后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表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是不可靠的”。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出这个论点时还不可能做出预言，13 年后放弃这条道路的不仅有阿富汗，还有苏联自己，以及“第二次大战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美国一面指责苏联输出革命，一面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放弃支持阿富汗，并且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1978 年 3 月在北约例会上白宫审视了军事政变后阿富汗的局势，并同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进行了磋商，继而在夏季采取

^① 美国国务院电码 06251，1979 年 8 月。

了一系列旨在破坏阿富汗稳定的做法。

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代表会见阿富汗政府官员时公开警告说：“阿富汗侧重于苏联的方针政策将迫使美国为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做出一切努力，这包括支持自己的同盟国和协助中央条约（原为巴格达条约，1959年改用此名）成员国的活动。”7月，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印度首相杰塞在会谈中强调：“西方应该寻找能发挥作用的措施，使阿富汗局势朝着应有的方向发展。”英国人建议更广泛地利用经济杠杆对阿富汗施加压力。

他们重审了该地区的政策优先地位以及落实方法，采取扩大同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进行合作的方针，加大力度迫使阿拉伯国家淡化处理包括同以色列关系在内的地方性问题。1979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布劳恩便以此为目的前往中东地区。2月，美国总统宣布，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美国人不惜在中东和其他地区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手段。

巴基斯坦的军人政权和伊朗的沙赫政体对人民民主党组成的阿富汗政府采取了公开的敌视态度。来自德黑兰的消息说，伊朗领导人认为，积极利用喀布尔新领导层中间缺乏统一认识，并且在宗教界和部落中间给反对派情绪火上浇油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沙赫力图获得美国允诺的支持，但美国人显得很谨慎。国家安全委员会雇员西克说：“阿富汗当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我们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沙赫感兴趣的是在阿富汗应该做些什么，而我们或置之不理，或闪烁其词。”

1978年5月，齐亚·哈克总统的对外问题顾问阿迦·沙希访问伊朗时确认：“4月27日政变之后，阿富汗不再是一个缓冲国。苏联朝着印度洋出海口又迈进了一步，它可以随意钳制德黑兰和伊斯兰堡。”另外，塔拉基关于“阿富汗将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明亦被当地极其警觉地加以评述和理解。伊朗国王表示必须同“重新肢解巴基斯坦的威

胁”进行对抗……。

巴基斯坦政府为推动西方给予经济援助，假惺惺表示愿意同阿富汗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它起初担心苏联方面针锋相对的措施，故一直遮掩着自己从外部支持阿富汗叛乱分子的行径。后来，伊斯兰堡军方研究了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还研究制订了在4个月时间内推翻阿富汗现政权的计划。在该计划的拟议实行中建议动用常规部队占领坎大哈省，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则由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执行。

巴基斯坦领导首先在“统一战线”框架下联合团结阿富汗各派反政府力量。阿富汗难民营被反对派积极用作所有敌视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武装人员的训练和供给基地。而这一时期，正值巴基斯坦政府公开表示要与阿富汗发展友好关系。

美国情报机关也加强了同阿富汗反政府组织的联系。1978年9月2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外财政援助法草案”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向尼加拉瓜和阿富汗提供财政援助。当年年底，布热津斯基说服卡特赋予他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协调委员会以独立于中央情报局的司法管理权，这使他得以采取许多秘密步骤在阿富汗同苏联相对抗。

1995年9月，在奥斯陆召开的某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尔纳在谈到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时说：“1975年和1976年，类似的秘密行动在美国并不十分普遍。中央情报局的权威也没有这么高。197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我们进行类似的秘密行动时必须得到总统批准。1979年，我们从总统那里获准在阿富汗进行秘密行动。显然，这里指的是宣传和给予起义者援助。军事援助没有列入我们的计划。”援助反对派的实际范围和程度，以及落实的途径都精心掩盖起来了。议员约翰·里奇在给参议院的报告中如此写道：“援助渠道和武器数量的真实情况，甚至连熟悉情况的情报部门都不知道。”

美国人认为存在一种建立务实和建设性的美阿关系的可

能性。他们关注着阿富汗是变为苏联阵营中顺从的成员，还是在体制方面发生彻底变化；但保留了阿富汗特点和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最糟糕的莫过于苏联出兵，那将严重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人民派”反对“旗帜派”

四月革命以后，人民民主党领导层内部重新出现了不和谐。除去个人自尊作祟外，引起这次不和的是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评价有分歧，对如何使用权力和确定今后的发展策略存在不同意见。塔拉基和阿明口称不允许分裂，实际上却在极力维护本方的威信，5月24日他们得以使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该决议禁止进行任何方式的派别活动，任何意见和主张都被看做是派别活动。这实际上被利用于维护“人民派”的利益。

从1978年中期开始，根据阿明的建议，掀起对塔拉基的个人崇拜运动，造成一种全社会崇拜“阿富汗人民之父”的气氛。所有做法都过分到足以损坏塔拉基个人威信的程度：竟然使他在所有新闻照片中高于站在身边的人，在所有的会议上都至少悬挂他的5幅肖像，在他住宅内开辟了博物馆。不幸的是，塔拉基以为自己真的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所以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创造“个人威信”了。

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阿明手中。他积极去创造一个对他惟命是从，对别人专横跋扈，并且善于进行全面压制的党的领导机构。国内展开了针对“旗帜派”分子的大规模清洗镇压，后者伺机投靠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遭到灭顶之灾的还有左派民主团体和自由主义组织的成员、知识分子代表、工商界资产阶级代表和宗教界代表。革命给人民带来了痛苦、折磨、暴力和死亡。阿明正是要在人民中间播种恐怖，因为在恐怖和暴力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便于统治。

对于一种制度来说，党和国家领导层出现不和睦是最危

险的，因为这首先关系到军队建设。

对组建军队持有不同意见的派别团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阿明和塔拉基帮、国防部长卡德尔帮、卡尔迈勒帮。对此我不做深入分析，只想说：阿明酝酿了凶险的计划，编织了庞大的阴谋网，收拾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军队、内务部和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安插了自己的大批亲信。为了渗透进军队，阿明广泛利用了政治机构的一些机制，得以实施一条抬举吹捧他的路线（他被称为四月革命的统帅）。那些对“旗帜派”和塔拉基有好感的军官都暴露出来，并被解职。

塔拉基的坚定追随者当中有瓦坦扎尔、古里亚佐、萨尔瓦里和玛兹杜里雅尔（他们也被叫做四人帮）。卡德尔上校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对阿明的行为公开表示不满，认为那是企图想要军队服从他的个人影响。他觉察到“人民派”与“旗帜派”之间的敌视状态一触即发。作为职业军人，他亦深知党内矛盾转移到军内后将带来灾难。

清洗过程中，不少校官和将军被解职，少数人被镇压。获得自由的“旗帜派”分子得到命令转入地下，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阿明采取清洗措施的理由是四月革命以后，身为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卡尔迈勒于6月份在巴戈曼省召开“旗帜派”代表大会，通过了夺取政权的纲领。这当然被阿明得知，于是采取了相应措施。

最终是在6月18日，当着苏联驻喀布尔大使普扎诺夫和党务工作顾问组长哈扎洛夫的面，卡尔迈勒对塔拉基宣称，由于中央政治局在前一天任命一批同志为驻外使节，因此他和努尔同志认为以大使身份或者治疗的理由出国是适宜的，这样做就不会给人口实来挑拨离间那些光明磊落的好同志。

卡尔迈勒同意出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临行前还信誓旦旦地对战友们说，重归故里时他依然会手持红旗。此后7到10天的时间内，“旗帜派”的其他党魁们相继离开自己在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分别被任命为驻外使节：努尔—华盛

顿，瓦基里—伦敦，亚纳希塔·罗杰普扎—贝尔格莱德，巴尔雅拉—巴基斯坦，纳吉普—德黑兰。

在军队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安插的都是普什图人。居住在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代表被排挤到了次要位置。我认为，苏联领导人当时对这一情况也是估计不足，因为人民民主党后几届总书记的任命都未离开过我们的推荐。

苏共中央政治局一直为阿富汗事件感到不安。莫斯科呼吁阿富汗领导在党和政府中实行团结统一和委员会式的集体领导。不止一次地在最高级别的接触中转达了建议和劝告，希望他们注意自己的过失和冒进行为。然而，缺乏经验、缺乏足够政治灵活性的阿富汗领导人不能时时考虑，或不能全面考虑这些建议和劝告。

苏共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前往喀布尔。1978年9月底，苏共中央书记波诺玛廖夫前往访问，他此行目的就是要阻止大规模的清洗，包括对“旗帜派”采取的行动，指出苏联的做法是出于对阿富汗革命前途的关心，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注意到清洗行动已具有了大规模的性质，而且没有依法行事。这种做法尽管打击了新生革命政权的阶级敌人，但也殃及了许多本来革命可以利用的群众。这将损害革命领导层的威信。

1978年12月，塔拉基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苏共中央再次以友好的方式向他强调了巩固和团结党的队伍的重要性，建议要与国内所有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重申不能在国内和军内使用迫害手段时强调指出：“如果经常调换军队指挥员，而且还伴随逮捕，那就不能对军队抱过大希望，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很多指挥官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并消失，就会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确有反对革命政权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能采用镇压措施。但要切记，武器是个极端的東西，使用它必须慎之又慎。”

塔拉基对此予以回答说：“镇压措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

反动派走狗、针对部分宗教界代表和公开反对新生人民政权的那些人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没有一个人在受到侦讯时其罪行还未在法律程序内得到确认……除此之外，这些措施只触及为数极少的疯狂的反人民分子和新政权的敌人。”

柯西金在同塔拉基谈话时也涉及了这些问题，他提请塔拉基对待干部要爱护关心，因为干部政策方面的错误会付出巨大代价。柯西金说：“斯大林时期，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当时我们的许多军官都在监狱里。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不得不把他们派往前线作战。这些人的表现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军事家。”

1979年7月，波诺马廖夫访问喀布尔时清洗和镇压的问题再次被提及。当时，向塔拉基和阿明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明确意见——不允许缩小和削弱革命的社会基础。只有扩大革命政权的支持面才能为政治解决阿富汗所面临的问题创造条件。一部分地方行政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并未看到这个任务，不善于处理同居民的相互关系，甚至表现出对地方风俗习惯和传统的不敬，玷污了宗教信仰者的感情，毫无必要地公开自己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批评态度，而后者的数量在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

另外，包括省长在内的某些政府官员越权越职、营私舞弊、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许多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继续凭借自己的“革命觉悟”行事……。

大规模清洗和粗暴践踏公认的刑事诉讼准则的事实，对国家和人民政权来说都是道德、政治和威信的巨大损失。

由阿明暗中操作的清洗运动愈演愈烈。幼稚的塔拉基无法认清自己亲密战友的本性，尽管在1978年他已及时地得到了提醒。塔拉基把阿明看做自己“忠诚的、杰出的学生和接班人”，为此他后来付出了生命代价。众所周知，自古以来统治者身边总会围绕着不少垂涎其位的人。阿明耐心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并终于等到了。像塔拉基这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长期掌权的，他们给国家和事业带来的损失是

不可挽回的。

1978年12月5日，塔拉基第一次正式访问莫斯科期间，根据阿富汗方面建议，签署了苏联—阿富汗友好合作条约。后来，阿富汗政府请求苏联出兵时，便引用了该条约的第四章。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向国际友好政党通报阿富汗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结果之际，乐观而满意地阐述了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

然而，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却与苏联的看法完全相反，“革命”最终以人民的悲剧告终。

第二章 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夕



同志们请求军事援助

阿富汗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阿富汗领导人很快便请求苏联出兵援助。这种请求不止一次地向苏联驻喀布尔的普扎诺夫大使、克格勃代表伊万诺夫中将与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中将表示，而且不断地重申给访问阿富汗的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苏军总政治部和海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和陆军总司令帕甫洛夫斯基大将。另外，阿富汗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阿富汗领导人也把这些请求当面转达给勃列日涅夫、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阿富汗人妄图以此使苏联直接卷入其内部事务的处理，并且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1979年2、3月间，发生了对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要事件。2月5日，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其结果是霍梅尼走上政坛。他采取了反美和反帝的立场。美国不甘心失去以巴列维为首的忠实同盟者，紧急研究制定了对伊朗和该地区的新政策。

2月14日，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阿道夫·达布斯被劫持。作为人质，他被恐怖分子扣押在首都的一家饭店里。劫持者是“民族压迫”组织的白斯派成员，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在押的白斯和另外两个同伙来交换美国大使，但条件没有被接受

(有情报说当时白斯已被处决)。阿明不顾美国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要求暂缓进攻性行动的呼吁，下令安全部队占领这家饭店。在双方的对射中，大使遭受致命重伤。美国以此为理由，彻底改变了对塔拉基政府的态度和方针。

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突然停止，所有的专家被召回。这也使得布热津斯基得以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协调委员会强行通过一个措辞含糊的决议：“需要同情那些坚决捍卫国家独立自主的阿富汗人”。这一决定使美国加强了对暴乱分子的政治和物质援助。

3月15日，赫拉特省发生了约有两万居民参加的反政府暴乱。在指挥员带领下，驻守当地的步兵师下属的炮兵团和高射炮营的军人们也卷入其中。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卡拉伊—诺、戈尔玛奇和库什吉—科赫纳，反政府武装也展开行动。包括我们的两名顾问在内，近千人丧生。这使阿富汗人深感不安，他们请求我们直接出兵予以支援。

局势尚不明朗。根据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的命令，在边境地区开始了旨在提高部队备战程度的各项措施。乌斯基诺夫命令总参谋部调动一个空降师用于可能的空降行动，三个空军团转移基地。同时命令土库曼斯坦军区的机械化炮兵团和坦克团在常驻地做好战斗准备；从中亚军区调集一个步兵师前往捷尔梅兹地区。

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建议，3月17日~3月19日的3天时间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赫拉特地区暴乱引起的阿富汗局势恶化以及阿方要求苏联出兵的问题。在3月1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人建议乌斯基诺夫组建一支军事分队，详细制订它的条例和规定，以便根据特殊命令派出。对此，苏联国防部长说：“有关军事行动问题，我们已制定好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我们用一昼夜的时间向阿富汗派出第105航空师，把一个机械化团调往喀布尔，第68摩托化师集结于边境，第5机械化步兵师部署于边界线。这样，三昼夜时间我们可以做好出兵准备。不过，我们将要做出的是

正在讨论的政治决议……我们有第二方案，也是经过斟酌的，那是向阿富汗派出两个师……。”^①

柯西金被指定落实呈报文件的细节，并列人：供应面包10万吨，天然气价格从15卢布提高到25卢布，免除利息和硬通货。还要与塔拉基通电话，弄清他对国内情况的看法。批准国防部沿苏阿边境线部署两个师的兵力，指定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综合各方意见起草政治文件。决定国防部和克格勃两个渠道同时向阿富汗派遣优秀军事专家，以便详细调查清楚阿富汗局势。

3月18日，柯西金与塔拉基通了电话。柯西金解释了苏联的立场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要求我们派遣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即使他们开着坦克过来也无妨，因为这些民族阿富汗都有。塔拉基还说，只要他们穿阿富汗军服，戴阿军领章帽徽，就没有人能认出。塔拉基还要求苏联派兵帮助恢复赫拉特省的秩序，柯西金对此予以断然拒绝，并建议他组建新的部队，因为仅仅指望外来人的力量是不明智的。

柯西金举伊朗为例，伊朗人民不就抛弃了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伊朗保护者的美国嘛。谈话录音当天便传达给每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然后再次讨论了稳定赫拉特省局势的可行步骤。安德罗波夫表示不宜出兵阿富汗：“同志们，我认真思考了所有问题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出兵阿富汗？我们完全清楚，阿富汗现在还不具备条件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解决所有问题。那里有巨大的宗教霸权势力，农村人口几乎是百分之百文盲，经济落后……我们知道列宁关于革命局势的学说，而阿富汗能谈得上什么局势吗？那里什么局势也没有。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暂缓革命……只依靠我们自己的部队，这是完全不

^①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允许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①

在3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人基里连科说：“昨天阿富汗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们都倾向于是否可以派出一定数量的部队。今天的情况变了，我们的谈话也合乎情理地变化一下，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认定，出兵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契尔年科说：“如果我们出兵，并且攻击了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指责侵略。那可罪责难逃。”^②

同一天，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下令增加部署土库曼斯坦的两个师（为期一个月）。其时，已经认为出兵阿富汗是不必要的了。根据总参谋长的命令，各部队于4月里返回常驻地，恢复了日常的生活作息。在教学中，各部队重新研究讨论了有关做好战斗准备、完成行军、突破边境防御和转入阵地防御等问题。

同时还做出决定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在内的专用器材，并且举行了一些政治性质和筹备性质的活动。采取认真措施加强土库曼斯坦军区各部队的战斗组建，利用更新现代化军事装备来提高战斗力。

阅读分析3月17日至3月1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对于出兵阿富汗，苏联领导人一致持否定态度。葛罗米柯援引的论证一目了然地表达了政治局的立场：“彻底放弃出兵阿富汗这个手段。军队在那里是没有希望的……一旦进入阿富汗，我们的军队就是侵略者。它将为反对谁而作战？反对阿富汗人，首先要向阿富汗人开枪。安德罗波夫说得对，就革命而言，阿富汗的局势还未成熟。如果出兵，这些年我们克服困难进行的诸如裁军等许多事情就会半途而废。所有不结盟国家将反对我们……应该自问，我们会赢得什么？阿富汗和它的现政权，还有落后的经

①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②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济和国际事务中微不足道的分量。另一方面，应当看到，法律上我们不能解释出兵的理由。根据联合国章程，一个国家可以呼吁救援，我们可以派出军队，如果它遭受了外部侵略。阿富汗没有遭受任何侵略。一切都是它的内部事务，是革命队伍之间的内讧，是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的战事。还需要指出，阿富汗人并未正式要求我们出兵。一句话，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由于严重失误而得不到人民应有的支持，处于瘫痪状态。”

“……比如说，我们走了出兵这冒险的一步，那肯定是弊大于利。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阿富汗军方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的做法，并保持中立的话，我们就是武装占领阿富汗。那么，在对外政治方面，我们就会把自己置于极端严重的境地……。”

“所以，尽管阿富汗的形势比较严峻，我们也不能采取出兵的行动。”^①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喀布尔传来密电。由于情况恶化，大使和克格勃代表请求采取措施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建议以技术专家的名义向巴格拉姆和喀布尔机场派出军事分队。

3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了对阿富汗局势的讨论。他说：“我认为政治局委员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陷入这场战争……他们的军队分崩离析，而我们却去为他们而战”。^②

安德罗波夫说：“我想，我们不会就出兵做出决议。出兵意味着反对人民，向人民开火。我们就会被看做是侵略者。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③ 这次会议决定邀请塔拉基来莫斯科磋商。其实，被赫拉特事件吓得惊慌失措的人民民主党总书记本人已经在要求迅速同苏联领导人会晤了，并叮

①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②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③ 见机密文件保存中心，馆藏89，编目25，卷宗1，第12~25页。

嘱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莫斯科之行。3月20日，他紧急飞抵莫斯科，同柯西金、葛罗米柯、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再次就出兵阿富汗问题对他阐明了我方立场。告诉他，那样做不仅会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还会同自己的人民发生冲突。共同的敌人在等待着苏联军队出现在阿富汗的那一刻，这将给他们口实把仇视阿富汗的武装力量派进你们的领土，人民对此是不会饶恕的。从支持的成效性这一点出发，最好的方式是苏联对其他邻国施加政治影响，并进一步对阿富汗提供多方面援助，这样做会比出兵产生更大效果。

同一天，塔拉基拜会了勃列日涅夫，在座的有柯西金、葛罗米柯、乌斯基诺夫、波诺玛廖夫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萨莫杰金。塔拉基再次请求苏联出兵阿富汗。苏联共产党领袖对此回答说：“关于您在与葛罗米柯同志通电话时提出过的、现在在莫斯科再次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苏联向阿富汗派出军事部队的可能性，我坦率地告诉您，这是不该做的。那种做法只能有益于敌人，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敌人。”

“……针对你们的请求，通过军事渠道和其他渠道，我们已经向阿富汗派遣了数量不少的专家和顾问。在你们那里工作的苏联将军和军官已超过了500人。我得到的报告说，苏联专家和顾问的工作得到了您的肯定，这是令人愉快的。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派遣一些党的工作者，以及150到200名军官……。”^①

即使在高级别上，同阿富汗人的对话也是件麻烦事。他们已不是在请求，而是在纠缠苏联领导人满足他们的愿望。至于苏联驻喀布尔的代表们，他们简直是每时每刻处于巨大精神压力之下。

3月20日，根据安德罗波夫的个人指示，伊万诺夫中

^① 摘自1979年3月2日谈话记录，第486号卷宗。

将率领克格勃军官小组飞抵喀布尔，随后还将继续派遣这个机构的其他高级别人员。

3月2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了与塔拉基的会见，确定了不向阿富汗派遣军事部队的立场，并拟定了改善对阿富汗无线电广播的措施。

在没有苏联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忠实政府的力量平息了赫拉特省的叛乱，但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难以预料。巴戈兰、乌鲁兹甘、法拉赫、巴德基兹等地相继发生武装暴乱。

阿富汗军队内部的清洗继续扩大。3月21日，贾拉拉巴德省驻防军“揭露一起阴谋”，逮捕了大约230名参与者。许多军官眼看自己的同事被逮捕，不免产生一种危机感。应当指出，阿富汗军队内部的许多制度、传统和相互关系还保持着国王时期的做法。不少军官只是口头拥护新制度，暗地里仍然是革命的敌人。这些人是暴乱的积极策动者和参与者。苏联军事顾问成为最初的牺牲者，他们或被殴打，或被虏为人质。

3月27日，根据革命委员会决定召开了由塔拉基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军队、边防部队和警察队伍，利用新技术和新武器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创建新型的作战部队，加强军中指挥员的一长制；提高军人的道德觉悟和政治水准。会议期间，瓦坦扎尔和古里亚博佐伊指责阿明在与军队关系中有过失行为，认为他在同党内对立派的斗争中利用了军队，还使用军队镇压平民百姓。会议决定解除他在国防部的领导职位，把他的活动限定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范围内。

任命瓦坦扎尔接任国防部长，姆兹杜里亚尔为内务部长。不过，党内的权力之争并未至此结束。阿明在国防部领导层的亲信们百般阻挠瓦坦扎尔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些高级军官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仍然请示阿明，而非瓦坦扎尔。

赫拉特事件和其他消极现象引起苏联有关部门的关注。4月1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对于阿富汗局势恶

化原因所做的分析结果，指出：赫拉特事件的紧急关头暴露了阿富汗领导人还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尚不理解如果满足其要求，伴随出兵阿富汗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考虑到反政府行动的性质只是阿富汗内政，出兵参与平息只能损害苏联的国际形象，使裁军的努力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塔拉基政府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政府凭借自己的力量平息了赫拉特叛乱，这一事实展示了新生制度的牢固性，必定会对反革命产生遏制作用。会议确认，没有满足阿富汗政府请求向赫拉特派遭苏联军队的要求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一方针没有能够坚持到底。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出兵阿富汗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基本观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个谜。我认为，这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本人改变了态度。在领导人专横跋扈、老百姓盲目服从的国家里，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站在首位的那个人。其他人或为生存，或为保全自己的位子，不得不默默地跟随其后。当人们质问“您为什么没有反对出兵？”时，其实是在作假，或者没有理解极权国家的本质。

4月6日，为搞到当地局势的第一手资料，并阐明苏共领导人的立场，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海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抵达阿富汗（原计划派遣乌斯基诺夫，但他说：“我觉得，未必就该让我去阿富汗。也许，政府中的其他什么人去是否更合适？”）。

代表团团长会见了塔拉基、阿明和其他军政领导人。阿富汗人再次提出派遣军队方式的军事援助。代表团对他们重申：苏联不能这样做。但阿富汗人就是固执己见。阿明表现得格外积极，他不仅同叶皮谢夫会见时如此，就是在喀布尔同巴甫洛夫斯基大将会见时，当着戈列洛夫将军的面，也直言不讳地说，阿富汗领导人迫切要求苏联政府积极对待他们关于迅速派遣一个师到阿富汗的请求，同时许诺说，这支部队不会参加战事，仅仅作为坚强的盾牌来保护阿富汗政府的

安全和工作稳定。他们再次被告知，出兵阿富汗是不适宜的。

一个星期过后，4月14日这天，阿明受塔拉基委托约见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中将，要求给喀布尔调遣15到20架配备了弹药和机组人员的武装直升机。为什么？为的是紧急情况下在边境和中央地区使用它们对付来自巴基斯坦的暴乱分子和恐怖分子。4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要求，决定暂缓派遣武装直升机。

5月初，我们驻喀布尔的代表建议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类似在古巴有过的那种训练中心。而知情人披露，那里将部署机械化炮兵旅。

美国人也在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发展，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他们在5月初发现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的摩擦，并做出假设说，“人民派”政权越是无法保障国内安全，它的领导人就越会担心“国际主义朋友”可能要开始琢磨应该支持左翼领导中的哪一方。

苏联驻喀布尔代表受到的指责已司空见惯：仿佛是他们的情況通报促使勃列日涅夫几乎做出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的确，是他们建议扩大与阿富汗的军事合作，但归罪于这是他们禀报阿富汗领导人的要求所致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而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之际，就这些要求做出了哪些分析和结论，则是另外一回事。毫无疑问，这些建议充满了矛盾，不乏片面性和短见。



秘密准备

1979年5月……决定组建一个特遣营，其人员全部是土生土长的中亚人。后来，正是这支部队同克格勃的一支特别分队一起在废黜阿明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局长伊瓦舒金大将召见本局科列斯尼克上校（曾在土库曼斯坦军区任旅长），责成他去执行这个特遣营的筹建工作。第二天，科列斯尼克与两名军官启程飞往塔

什干。

这支特遣营平日里被戏称为“穆斯林营”，它的人员基本上是从中亚军区和土库曼斯坦军区的侦察兵、摩托化步兵和坦克兵部队中间精心挑选出来的。基本要求是，掌握东方语言，身体条件优越。只有23—4—型自行高射炮乘员组由斯拉夫人组成。

特遣营配备了新式武器和装备。它的编制是5个连和两个别动小组，人员稍稍超过500人。根据科列斯尼克的建议，任命哈尔巴耶夫少校为特遣营营长（提前晋升，军区召见时，他还在索尔涅契诺戈尔斯克城高级军官进修班学习呢）。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紧张，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5月底，“穆斯林营”的组建工作宣告完成。

营地位于距奇尔奇克市不远的一座军人城内。整个夏天，特遣营接受了特殊纪律、战术和武器运用（所有类型的武器射击、徒手搏斗、越野跑、布雷排雷）及体能方面的强化训练。在9月底进行的综合性教学演练中，特遣营表现不俗。同时进行备战的还有克格勃特别分队。其中一些人被先期派往喀布尔。不过，大规模扩充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分队的行动当时还没有展开。

这一点，美国人也发现了。驻阿富汗临时代办阿姆斯通向国务卿汇报阿富汗局势时（1979年5月9日，第3626/1和2）强调说：“虽然最近几个星期苏联在阿富汗的参与明显加强了，但还未达到新闻界夸大的那个程度。尽管阿富汗全国形势仍在恶化，可最近几个月苏联参与的规模并未增加，军事顾问的数量保持着原来的水准，1000人多一点，另外约有2500名非军事顾问。”

“虽然种种现象表明，苏联不愿卷入越南式的别国内战泥潭，但不能排除苏联军队介入阿富汗冲突的可能性”。阿姆斯通继续说，“同时也不能排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重演的可能性。苏联可能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因为‘阿富汗革命处于危急之中’。它也许最终下决心干涉，因为阿富汗

与苏联接壤，不同于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也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毗邻苏联中亚地区的几个敏感国家”。

夏季来临时，反对派武装已经部分或全部控制了百分之五十的领土。帕克捷卡、加兹尼、帕克吉亚、坎大哈、库纳尔、巴尔希、喀布尔、古尔和洛加爾都先后爆发了反政府武装暴乱。必须采取紧急手段加以平息，但做到这一点却一天比一天难。人民民主党在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阿富汗再次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1979年5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予以研究。回函中说：为稳定阿富汗局势，苏联政府愿意一如既往地提供国际主义援助，决定从1979至1981年无偿提供价值5300万卢布的特殊物资，其中有火炮、地雷、装甲运输车、射击武器、迫击炮、药品和医疗设备……作为优先援助提供了100个密封油料罐和160个一次性炸弹箱。最终决定不提供非毒性气体的瓦斯弹。至于要求派遣配备有机组人员的直升机和运输机，以及空降兵，这些行动将会产生许多复杂情况，不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方面，那样做会被敌对势力利用。首先会危害阿富汗利益，危害你们对巩固革命成果所做的努力。

美国人认为苏联不会出兵进行直接干涉。分析局势以后，他们做出结论说：战略方面，阿富汗同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本质区别，出兵阿富汗会消极影响苏联的全球战略利益。他们认为，经过对比，“否定”的论证一定会胜过干涉带来的利益。但是，如果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领导人会重新研究以保护在阿富汗投资为目的的局部或直接的干涉，

众所周知，当时苏联并没有派遣作战部队的计划，做出那个决定是在晚些时候，尽管阿明不间断地提出要求。阿富汗领导人开始对自身安全表示担忧。6月14日，阿明在会见苏联驻喀布尔总军事顾问时强调说：“敌人正在竭力收买人民宫的保安部队，他们妄图消灭国家领导人。我们已完全不相信人民宫的保卫人员。我想请您把我们要求援助的愿望

转告给自己的领导人：派遣配备苏联乘员组的坦克和步兵战车来担任人民宫和巴格拉姆机场、申丹特机场的警戒工作。”

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它于每天早晨8点之前准备好一份阿富汗形势和最新动态图表，它还要就军事方面的相应措施为领导部门起草建议书，而有关那些需要做出决定的重要问题，则以简报形式呈递苏共中央政治局。6月里，这种局势分析和稳定局势的建设的呈报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中有意见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难于立足具有许多客观因素，这就是经济落后，工人阶级数量少，人民民主党软弱无能。局势严重也由于主观原因所致：党内和国家机构内均没有委员会式的集体领导，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塔拉基和阿明两个人手中。他们经常犯违法错误。

政府仍然依靠正规军对付反革命势力，尽管积极参与其中的已有安全部门、边防军和新组建的自卫队，但没有广泛吸收社会各界参加打击反动派的斗争，因而稳定社会秩序的各项措施也是收效甚微。

1979年6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卷宗号No II 156/XI），派遣由经验丰富的将军率领的军官小组前往喀布尔援助总军事顾问，在阿富汗部队（师、团一级）直接开展工作；以航空技术人员名义派出伞兵空降营保卫巴格拉姆机场的苏联航空队，责成克格勃特种分队（125~150人，扮装成服务人员）保卫苏联使馆；8月初，准备工作结束后，又计划在局势突变的情况下对巴格拉姆机场派遣情报总局的特别分队。

根据这一决定，7月7日，3架伊尔—76运输机把第105空降师第111伞兵空降团第1伞兵空降营的368人运送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指挥员是洛玛金中校。后来，这个营编入第345独立伞兵空降团。该营人员身着地勤助理机械师制服，军官们一律扮作军士，指挥员佩戴准尉肩章。10月里，特别行动处特派员切布尔诺伊大尉自杀后，任命普斯朵维特为营长。正是这个营后来担负了我们往巴格拉姆调集

部队时的地面保障工作。

决定派遣以陆军总司令帕甫洛夫斯基大将为首的工作小组前往协助总军事顾问。

驻扎在捷尔梅兹的第108机械化步兵师第180机械化步兵团重新装备了步兵作战车辆，并把人员编制补充到作战满员状态。

7月9日，塔拉基同苏联大使普扎诺夫谈话时“对苏军特别分队抵达巴格拉姆表示满意，并且希望同苏联同志商谈一下加强边境保卫措施的事”。是时，“穆斯林营”正在奇尔奇卡着手筹备喀布尔行动。局势的发展仍不明朗……。

6、7月间，巴达赫山、拉戈曼、帕尔万、瓦尔达克和法里雅博相继出现反政府活动。塔拉基和阿明继续要求苏联出兵。7月11日，塔拉基在同克格勃代表谈话时希望苏联能在喀布尔秘密部署几支特别分队，要求每支分队人数达到营的编制，以应付局势的突然恶化。

第二天，苏联大使、克格勃代表和总军事顾问汇报说：阿富汗政府在认真准备同反政府武装进行新一轮冲突；他们的计划是指望苏联直接开展武装援助；重新要求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建议向阿富汗派遣独立的军事部队和由苏联人员操作的军事技术装备。

7月18、19日，塔拉基和阿明在同访问喀布尔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玛廖夫谈话时，不断重复要求苏联派遣两个师的兵力。他们试图说服波诺玛廖夫同意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给予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苏联不会这样做。

7月20日，在帕克吉亚省展开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叛乱分子企图夺取省城加尔捷兹，两位苏联军事顾问牺牲。

7月21日，阿明约见苏联大使，说塔拉基委托他向苏联方面请求作为紧急情况向阿富汗空军提供8至10架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直升机，并由他们执行飞行任务。对此，苏联大使回答阿明说，苏联领导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联

方面不能参与军事行动。

局势继续朝着不利于人民民主党统治的方向发展。1979年中期，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局势也明显紧张起来。战火的蔓延使得难民数量增加，其中一部分被阿富汗伊斯兰党和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的代表，以及其他伊斯兰组织利用来补充自己的兵源，组建新的部队。反政府的宣传也在推波助澜，它把游牧部落吸引到自己一边，怂恿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进行偷袭。

1978年6月—1979年11月，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的叛乱分子达到数千人。这一时期阿富汗同西方的经贸关系受到消极影响。1979年3月到9月，与美国的贸易额减少了13%，从日本的进口额减少了33%，英国停止购买阿富汗棉花，联邦德国停止供应白糖……。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谋士们对阿富汗局势定期交换意见，制定口径一致的建议。他们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政治解决是最佳方案，建立基础更广泛的政体，但仍然是“革命”的和忠实于苏联的。不过，他们强调说，问题在于难以判断政府今后是否是共产主义的，是否是亲苏联的，是否是反伊斯兰的，除此之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苏联领导人也采取过政治调解阿富汗内部矛盾的措施，但遇到了塔拉基和阿明的反对。他们明白自己势单力薄，经受不了长期消耗，于是又不厌其烦地要求出兵，认为苏联领导人最终会对他们让步的。

7月24日，阿明在同克格勃代表谈话时，再次要求在喀布尔部署三支苏联部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他们的秘密驻地可以设在军人俱乐部、苏联大使馆，或者年底政府首脑将迁往的官邸塔日—别克宫，那里有现成的军营。后来，西方记者杜撰出一个线索，说阿明把总统府迁往塔日—别克宫完全是苏联的建议，以便易于对“第二号人物”下手。其实，从交谈记录中可以发现，阿富汗人早就做出了这个计划。当然，改建装修官邸的经费是苏联提供的，但主意毕竟是阿明

自己提出来的。

苏联在喀布尔的代表得不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莫斯科的战略方针已被搅乱了——便逐渐开始倾向于支持扩大军事介入的要求。8月1日，普扎诺夫大使、克格勃代表伊万诺夫和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共同做出建议：考虑到8、9月间叛乱武装会加强活动的可能性，应该积极看待阿明提出的向喀布尔派遣特别分队的要求。

事实上，对阿富汗领导人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反对派，而是隐藏于党和政府领导层内的无形斗争。阿明不满意许多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被免职、被清洗，被迫逃离祖国。尽管阿明表面上崇拜塔拉基，当众亲吻其双手，但是他废黜“自己老师”的阴谋已接近完成。在东方，伪善和口是心非的手腕已达到完美。阿明急欲篡夺权力，实现个人独裁。他不再想扮演塔拉基“忠实学生”的角色，而想坐上头一把交椅。他善于利用形势，已经开始积极活动。

7月27日，阿明为最后篡位赢得了关键一步。革命委员会一纸命令使塔拉基从形式上掌管与国防和军队指挥相关联的事情。但是命令又说：“……在肃清外国侵略者之前，我授权自己亲爱的和杰出的学生阿明……根据我的直接指示履行国防部长的职责”。对军队的控制再次落入阿明之手，他成为实际上的国防部长。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过的瓦坦扎尔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玛兹杜里雅尔改任边界事务部部长。

8月5日，在喀布尔的第26伞兵空降团和“突击队”营驻地区域发生暴乱，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后暴乱被平息。8月11日，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会见了阿明，谈话焦点依旧是苏联出兵问题。阿明请求转告苏联领导人必须迅速派遣苏联部队赶赴喀布尔。是时，部分作战部队和克格勃特别分队已经启程开赴阿富汗，这一信息迅速被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截获。

我认为，当时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原因。

诚如斯蒂文·加尔斯梯尔所言：“或许，通过中央情报

局，华盛顿在1979年8月份就已经给予抵抗派财政支持。”。当时，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有这样的结论：“塔拉基—阿明政权的垮台符合美国的广泛利益，尽管这对阿富汗今后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会产生一些消极后果。”^①

为了证实加尔斯梯尔所言，我想引用美国驻喀布尔使馆临时代办阿穆斯通兹的一段话：“由苏联支持的左派体制的彻底垮台可能在‘第三世界’对美国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这可以证明我们对手的所谓在某些方面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论据并非一成不变。虽然专门渠道的信息不够充分，但我们仍然认为反对派所倡导的体制更具可塑性，更易于美国返回阿富汗参与经济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体制恐怕不会优先考虑社会 and 经济发展，因为阿富汗伊斯兰党《宣言》号召妇女遁世和恢复佩戴面纱，而不可避免要对‘人民派’实行大规模屠杀会导致侵犯人权，尽管‘人民派’的几位头目对此罪有应得。”

“无论如何，鉴于阿富汗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反复斟酌‘是’与‘否’，就不难看出，另一种体制会比塔拉基—阿明体制更适合我们的最高利益……。”（No6251号文，1979.8.16）

当时，喀布尔广泛流传着一封“密信”，它号召罢免阿明的职务，创建“忠诚革命者”的联合阵线。四处流传阿明是中央情报局间谍的传闻，说他的任务就是消除阿富汗对苏联的信任。这个说法后来具体为：他奉中央情报局之命，玩弄狡猾的政治游戏，以便把苏联拖进中东地区的局部冲突，所以在要求苏联出兵阿富汗的问题上才这样死缠蛮缠。

8月10日和11日，阿明在同苏联代表谈话时指出，只要苏联领导对阿富汗政府的要求做出肯定答复，使用驻扎在

^① 见斯·加尔斯梯尔著《竞争与调解在阿富汗：和解的前景如何？》，《第三世界季刊》，1988年10月，第1505～1541页。

喀布尔的苏联部队对付反政府武装就会成为可能。这里是指在阿富汗首都部署三支苏军特种部队。

8月12日，阿明对苏联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宣称：“苏联部队将不会卷入军事行动，只是在最紧急关头才需要他们的援助，另外，他们只需驻扎到春天。”与此同时，安全部门领导人萨尔瓦利受阿明委托要求我们迅速落实阿方的要求，派遣特种营和配备苏联机组人员的直升运输机。

为避免调集苏军常规部队，苏联代表建议向喀布尔派出一支别动营和若干配备苏联机组人员的运输直升机。除此之外，阿方要求再考虑派遣两支别动营的问题，一支用于加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警戒，另一支部署在喀布尔郊区的巴拉—希萨尔要塞。他们认为这几支部队可以平息反对派的武装进攻，保护在阿苏联公民的人身安全。

8月份，以巴甫洛夫斯基大将为为首的18人军事代表团抵达喀布尔，以便实地考察评估局势和执政方的“生存能力”。晚些时候，巴甫洛夫斯基大将回忆说：“我记得动身前，从莫斯科给正在索契休假的乌斯基诺夫打电话，我是他的副手和陆军总司令。对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提出的许多问题有这么一个：‘是否有出兵阿富汗的计划？’部长答道：‘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此，我抵达喀布尔之后便通报给普扎诺夫大使，然后会见了塔拉基和阿明。前者性情温厚，喜好脱离现实的哲学推理。阿明看上去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坚毅、锐意进取的人，而且对军事问题钻研得很好。他请我转达给乌斯基诺夫个人的请求：派遣一支伞兵空降旅。我用密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并认为必须说出自己的意见：‘出兵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告诉乌斯基诺夫，我去了塔拉基和阿明那里。根据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反应我明白了，莫斯科并不信任阿明……。”

8月20日，阿明在同巴甫洛夫斯基谈话时请求调拨1500人到2000人的苏联伞兵大队前往喀布尔，替换那里的阿富汗政府军。此外，还要求苏联专家接管保护首都的以连

为单位的高炮部队，阿明认为自己人已不可靠，并且再次提出新的借口，要求苏联出兵。

阿明没有得到对这一要求的肯定回答后，非但不放弃这个念头，而且在下一次见面时继续坚持着，理由是在喀布尔派驻苏联部队，可以使阿富汗政府军腾出力量去对付叛乱分子。8月22日，阿明同巴甫洛夫斯基谈话时再次要求派遣苏联部队进驻喀布尔……他非常希望掌握一支苏联部队来保障其政体的稳定，为达此目标，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固执和富于想像力。显然，他在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力。



塔拉基遇害

9月初，阿明坚持让塔拉基出席哈瓦那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企图利用塔拉基赴会期间完成夺权的最后准备。苏联领导试图说服塔拉基放弃此行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仍然盲目相信阿明。

从古巴归国途中路经莫斯科逗留时，塔拉基再次得知了阿明的失体行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转达的消息迫使他陷入沉思：他在国外期间，一些最受他信赖的、忠诚可靠的同志被阿明解除了职务……。

起初，苏联领导曾想派出“穆斯林营”保护人民民主党总书记。9月10日，命令哈尔巴耶夫少校把队伍带至塔什干机场，然后换上阿军服装，飞往喀布尔。营队抵达机场时，下达了另一道命令：原地待命！有消息说，当时安德罗波夫说服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相信已无需“穆斯林营”参与了，阿明将被“架空”。然而，罢免“二号人物”的行动落空了。他从另外一条道路前往机场迎接自己的“老师”，得以逃脱了埋伏。

巴甫洛夫斯基也在欢迎塔拉基的人群中。他回忆说：“本该阿明前往哈瓦那，但他明白出行就是冒险，未必还能回得来……于是说服塔拉基代替他出访——毕竟他是党的总

书记和国家元首嘛。我们得知后，建议塔拉基经土耳其赴哈瓦那，返程时经停莫斯科。塔拉基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葛罗米柯。他们使塔拉基相信，当他返回喀布尔时，阿明已不在了。然而，阿明没有打盹，他拥有组织完善的侦察和反侦察网，他命令自己在空军的亲信击落塔拉基的座机。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

“塔拉基走出飞机时一眼看到了阿明，不禁踉跄了一下。他们相互拥吻后，乘车前往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我们4个人（普扎诺夫、巴甫洛夫斯基、伊万诺夫和戈列洛夫）也去了塔拉基那里。交谈时一切都正常。喝了白兰地和茶水，并且交换了意见，一切如初。原来是什么样，还将是什么样。塔拉基仍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阿明仍是总理和国防部长。”

“然后我们回到使馆，通过政府专线与莫斯科通话，把刚才的谈话结果汇报给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和波诺玛廖夫。当然，每个人首先汇报给自己的上司，然后再回答其他政治局成员提出的问题。”

没用多少时间，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就确信党内发生了彻底的分裂。他的亲密战友瓦坦扎尔、萨尔瓦利、玛兹杜里雅尔和古里亚博佐伊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他解除阿明的一切职务。塔拉基许诺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和平的方式把事情摆平。阿明已落实了篡权的先期措施，做好了最后夺权的准备。他甚至要求塔拉基解除“四人帮”的关键职务，这自然遭到了拒绝。阿明立刻组织散布谣言，说塔拉基现在更相信“四人帮”，而非他，并在准备暗杀他。阿明打电话告诉巴甫洛夫斯基，塔拉基不同意罢免“四人帮”的职务，这说明他们又吵翻了。这迫使塔拉基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认真讨论一下。此后，事态的发展是始料不及的……。

流传的说法不一。官方的解释是，妄图独揽大权的阿明得知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已向塔拉基挑明了他的有关阴谋。最可能的情况是（今天已无法验证），塔拉基的贴身保卫兼副

官塔伦中校向阿明透露了有关消息。看来，由于不够谨慎，从苏联飞回阿富汗途中塔拉基对塔伦中校吐露了自己的不安。塔拉基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贴身保卫竟然早就为阿明“工作”了，而且还是最积极的通风报信者和共谋者之一。也可能，阿明从总参谋长雅古博那里得到了详尽的情报……。

9月13日，苏联大使普扎诺夫设法调解他们的矛盾。他宣读了勃列日涅夫给他们的来函。来函说，苏联领导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本人希望阿富汗领导人能够在革命大局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度责任感。为挽救革命，必须团结和一致行动。对于革命和阿富汗人民来讲，领导内部的分裂是毁灭性的，这会被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和外部敌人迅速加以利用。

人民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听罢，请求转告苏联领导人，这里的一切都会正常。阿明走后，塔拉基继续同苏联代表交谈，他不止一次地把话题转向“二号人物”。显然，他已深感不安。比如，他表示明白了阿明欲把阿富汗驻苏联大使帕克金调回喀布尔的意图，因为帕克金是阿明的同路人，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为阿明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塔拉基决定把帕克金留在莫斯科。

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坦率地承认自己缺乏主理国事的经验。他试图找到忠实于人民政权的、可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他曾想逐渐把原首相艾杰玛吉和原贸易部长贾拉拉拉吸引到政府中来工作。

涉及对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旗帜派”的清洗问题，塔拉基把责任推到阿明身上。他承认自己对待卡尔迈勒的错误态度，说原来只想摆脱卡尔迈勒和他身边的亲信，并没有想到会波及那么大的范围；他希望“旗帜派”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议，但愿苏联同志能够帮助他们来参与党政机构的工作。塔拉基还希望苏联驻喀布尔代表能毫无保留地向他通报各种信息，甚至是消极的。他再次以缺乏经验为理由，请求予以援助：“有时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依靠谁”。

塔拉基的计划注定无法实现：9月14日早晨官方宣布，安全部门负责人萨尔瓦利、内务部长瓦坦扎尔、边境事务部长玛兹杜里雅尔和邮电部长古里亚博佐伊全部被解除职务。同时根据阿明的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入战斗状态。苏联代表（普扎诺夫、巴甫洛夫斯基、伊万诺夫和戈列洛夫）拜会了塔拉基，并表示了他们对阿富汗国内局势变化的不安。塔拉基当面拨通阿明的电话，请他过来，还说这是苏联同志的建议。

帕甫洛夫斯基对我叙述说：“我们让塔拉基打电话给阿明请他过来。阿明开始执拗着不想来，说一过来就会被干掉。我们说服了他。阿明到来时，塔拉基的副官塔伦走出去迎接。他把客人让进门，自己走在前面，迈上楼梯阶，刚刚从拐角走出来，枪声就迎面扑来。塔伦中了6枪，阿明只伤了手。这是塔拉基命令副官们干掉阿明。”

“阿明跑回小轿车，司机也受伤了。阿明不得不自己驾车返回总统府。塔拉基的妻子跑进我们待着的房子，用普什图语喊道，塔伦被打死，阿明跑了。”

“阿明跑回总统府后给我们打了电话：‘你们瞧，我说过的，他想打死我！’”

此后，塔拉基迅速乘车来到阿富汗部长会议大厦，腾出一间办公室，安排了警卫。他妻子也被送到了那里。

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继而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塔拉基的一切职务，任命阿明为党的总书记。

是的，9月14日下午3点整，阿明来到“老师”的官邸，在迎接他的塔伦中校陪同下，沿着后面那条通往塔拉基住宅区的楼梯向上走来。这时，骤然响起自动枪射击的声音。一片惊慌失措和混乱。阿明搀扶着受伤的副官齐拉克，跑到小轿车跟前，然后逃脱掉了。塔伦被子弹洞穿，阿齐姆医生肩部受伤，他前去送茶水，不巧落入火网。有一个事实或许能间接证实这其中的勾结：阿明指示给予死去的塔伦以极高的荣誉。除此之外，决定贾拉拉巴德市易名为塔伦一沙

赫。不过，这些是现在无法查清楚的。对射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第二天便被逮捕，并消失得无影无踪。

16点20分，总参谋长雅库博一声令下，喀布尔卫戍部队进入内防区域，封锁包围了塔拉基的官邸，切断一切通讯联络。17点50分，喀布尔电台宣布阿富汗政府发生更迭。与此同时，驻防军部队内解除了第8步兵师师长及其下属的炮兵团团长和独立坦克营营长，以及第4和第15坦克旅参谋长的职务。喀布尔市内保持了相对平静，所有大型建筑得到保护，街道派出巡逻队。

事件发生后，苏联代表返回大使馆，使用专线电话与莫斯科取得联系，汇报说：“有人朝阿明开枪，塔拉基被捕。”安德罗波夫问：“有没有人能够执掌政权”，回答是：“除了阿明，喀布尔没有这样的人”。

9月15日，就阿富汗局势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苏共中央工作简报摘录^①（绝密）^②

……塔拉基从哈瓦那返回后，即遇到阿明断然要求罢免和惩处……他的亲密人士——内务部长瓦坦扎尔、邮电部长古里亚博佐伊、边境事务部长玛兹杜里雅尔和安全部门负责人萨尔瓦利。理由是……这些人参与了反对阿明的“帝国主义者阴谋”。

说服阿明放弃自己的要求和使领导层状况正常化的努力都没有收到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掌握的情报得出结论，阿明利用塔拉基外出的机会完成了为独揽大权进行的准备，其中包括军权和安全部门的权力。

显然，塔拉基为防止情况发生逆转，已准备罢免阿明的领导职务，但表现得优柔寡断，也许是并不握有走

①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82，卷宗173，第72~75页。

② 此处以及后面的绝密字样只表示当年情况，现在均已解密。

这一着棋的必要实力。

这种情况下，塔拉基完全被阿明孤立隔绝，无法动用任何力量。苏联代表也无法接近他了。

在塔拉基官邸发生的枪击事件中有两人丧生，其中包括塔拉基的保镖。阿明利用这一事件直截了当地要求塔拉基从一切职位上隐退。

根据我们的代表同阿明的最近一次谈话中得来的情报，9月16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召开中央全会，会上将建议塔拉基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由主动辞去所有职务，即使他不同意这样做，那也无妨做出这样的决议。

我们的同志态度明确地忠告阿明，这样做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后果，但阿明置若罔闻。

在这一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现阶段我方遵循如下方针是适当的：

第一，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阿明和以他为首的政府打交道，并利用可能的机会努力阻止他对塔拉基的追随者进行清洗，阻止对那些与他不投缘、但并非革命之敌的人进行镇压。同时应利用同阿明的接触彻底了解他的政治态度和意图。

第二，仍在阿富汗部队中的我方军事顾问，以及内务部门和安全部门系统的顾问应留在原地，完成对叛乱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武装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如果他们所在部队参与对反阿明人士的清洗活动，我方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第三，苏联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速度应该放缓，仅限提供用于对叛乱分子实施打击所必需的弹药和现有武器装备。

第四，要对阿明阐明我们的意见，塔拉基下台后，不应对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进行什么审判。

第五，关于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适宜的做法是：只做一些态度平

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核。

No 793 1979年9月15日 葛罗米柯（外交部）、
乌斯基诺夫（国防部）、茨维贡（克格勃）”

对驻喀布尔的苏联代表们也下达了涉及他们行动的相关指示。

然而，9月15日夜间，阿明召开了人民民主党政治局会议，并在16日清晨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外交部长沙赫·瓦利主持。会议一致同意解除塔拉基和他同伙的职务，并把他们开除出党。“选举”阿明为党的总书记。全会在“捷尔库沙”大厅进行，会场被政府卫队和安全部门便衣警察封锁。随后，革命委员会任命阿明为主席。

供参考的情况汇编

哈菲祖拉·阿明——出身于普什图一个不大的部落哈拉塔耶夫，1927年生于喀布尔附近一个叫做巴戈曼的小地方，职员家庭。早年丧父，由哥哥抚养。

阿明先后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喀布尔大学科学系，历任喀布尔贵族学校讲师、副校长和校长。1957年前往美国进行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

1962年，为准备和答辩论文，阿明再赴美国。这段时间是他积极的政治生涯的开始。1963年当选为留学美国的阿富汗学生会主席。由于表现积极，在完成论文工作前不久，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在参与人民民主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期间同塔拉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人民民主党分裂期间，他坚决支持塔拉基，赢得了他的好感，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

1967年，经塔拉基介绍，阿明进入人民民主党“人民派”中央委员会。然而，同巴达赫什发生冲突后，1968年1月，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又把他从正式党员转为候补党员：他放弃了国际主义原则。全会决议中记载着：“作为个人，他以往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西斯分子特点，以及同那一类高级官吏间的私人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1969年，阿明当选为议会下院议员。他利用议会讲台对国王统治进行了激烈批评。从达乌德执政起到1978年四月革命前的这段时间内，阿明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他完全致力于党的组织工作，这有助于他提高了自己在“人民派”内部的影响和威望。

1977年夏天当选为人民民主党联合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人民民主党“人民派”军中组织的负责人（两派联合后，其军中组织的活动仍是分开的）。1978年4月，在人民民主党大部分领导人被捕后，直接在军队中主持了反对达乌德统治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

人民民主党执政后，革命委员会任命阿明为副首相和外交部长，他还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卡德尔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后，阿明“全权协助塔拉基履行国防部长的职责”，这几乎等于统管了军权。

阿明逐渐独揽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国家建设工作方面的权力，完全控制了安全部门的活动。塔拉基无节制的信任也是阿明个人威信提高的一个因素。阿明具有很大的能量、很强的进取心、研究问题实质的愿望，观点果断，行为刚强，善于吸引群众，置他们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谈话时叙述明确简练，记忆好，很能引起对话者的好感。

阿明利用自己的影响，把亲属和忠实于他的人安插在党内和政府部门内。他是个鲜明的普什图民族主义分子。熟练掌握英语，不吸烟，不酗酒。

已婚，有7个孩子。（摘自阿明卷宗）

苏军驻扎在巴格拉姆的那个营待命飞赴喀布尔解救阿富汗领袖。机舱内，军人们已各就各位，但最终没能起飞。阿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对保卫机场的防空部队下达命令——击落所有飞机，不论起飞还是降落。当天傍晚电台宣布，塔拉基已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同时还宣布，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萨尔瓦利、瓦坦扎尔、玛兹杜里雅尔和古里亚博佐伊，以及塔拉基在军内高级将领中的亲信都被解除了职务。

镇压“不满者”的行动由阿富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雅古博指挥。阿明宣称，前总书记企图诱骗他中计，尔后杀害之。阿富汗国内、军队内和党内的局势变化已不利于塔拉基。

美国人也在关心着阿富汗时局，认为正在发生政治危机，除了支持阿明，苏联别无选择……。

9月中旬，克格勃特遣分队的第一个小组抵达喀布尔，他们奉命在国界线以外进行作战准备。这个小组是由谢苗诺夫少校率领的18名军官。他们驻扎在阿富汗首都苏联大使馆内的一幢别墅里。此前，他们主要在国内协助顾问们进行反恐斗争，但供职于不同部门，各有各的具体任务。

普扎诺夫、帕甫洛夫斯基、伊万诺夫和戈列洛夫多次通过“直线”汇报情况。勃列日涅夫同意了阿明作为阿富汗领导人留下来，几位苏联领导人联名发出贺电，同时从莫斯科给阿明发出另一份电报要求他保全塔拉基的性命。

9月底，苏联驻喀布尔的代表们被召回莫斯科，他们就扩大对阿富汗军援和出兵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大将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一段时间过后，所有对出兵阿富汗表示反对的军事顾问都被陆续召回国内……阿富汗外交部长沙赫·瓦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国记者们说，苏联同志可能参与了9月14日发生在塔拉基官邸中的事件。普扎诺夫大使被“建议离开阿富汗”。根据葛罗米柯的指示，“考虑到其多次请求”，普扎诺夫被召回了莫斯科。

时隔不久，阿明公开表示：“苏联大使支持了反对派，危害了我”。11月8日，鞑靼州委第一书记塔别耶夫被任命为新大使，他于11月26日抵达喀布尔。而外交部领导人中竟然没有人约见返回莫斯科的普扎诺夫，没有向这个毕竟在阿富汗工作了7年多的人征询意见。据说，“上面的人自有头脑”，他们认定大使的经历是失败的。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好问的了。

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中将也有同样遭遇。由于达乌德时代他就在阿富汗了，所以得不到新政权的信任。于是，乌斯基诺夫把他召回国内。9月中旬，穆罕默多夫中将成为苏联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就这样，出兵阿富汗前夕的关键时刻，一些“偶然”的人来到阿富汗。也许，这是“灵活”的一着。

苏联领导人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迅速改变对阿富汗的态度？不承认阿明政府？或者做出姿态，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然，对于阿明的所作所为，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持批评态度；特别是他的贪权和随意猜疑。不过，对待阿明，我们领导人的立场可以称为是妥协主义的。鉴于他掌权后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其中包括继续奉行开展革命和巩固阿苏合作关系（他圈子里有不少真诚的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的人）的方针，所以我们通过决议，一如既往地对待阿富汗政府在同反革命势力斗争时提出的具体援助要求。

指示驻阿富汗的代表们对阿明施加影响，避免其在塔拉基问题上采取清洗政策，防止发生各种过激行为；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然后再调整我们的行动。

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长沙赫·瓦利在会见社会主义国家使节时，对苏联参与9月14日暗杀阿明的事情公开表示不满。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萨弗龙丘克当即对外长表示：“您是否明白，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会给苏阿关系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问题没有得到答复……。

几乎同时，10月10日，安德罗波夫被授权把卡尔迈勒从捷克斯洛伐克接回莫斯科……。

美国人在评价局势及其发展前景时（1979年9月17日，№6936文）指出：“阿富汗政权的更迭并未使苏联领导人高兴。不过，他们或许意识到，除了支持自高自大、性格残暴的阿明外，眼下还没有其他出路。更适当的时机出现之前，阿明只是可以借用来捍卫‘兄弟党’和保护‘进步革命’的惟一武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苏联默认了阿富汗发生的变化。”

一句话，尽管发生了新的军事政变，我们的领导人依然奉行了既定的方针政策，正式表示了对独裁者的支持。对于一个社会，一切从外部看上去都应该是圆满的。10月10日正式宣布了塔拉基的死亡消息：久治不愈的重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事后才明朗，在宣布死亡两天前，总统卫队的军官们根据阿明的命令使用枕头将塔拉基扼死。直接的执行者是阿布杜勒·哈杜德大尉（安全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艾克拜尔大尉（守卫阿明官邸的分队长官），以及鲁齐上尉（总统卫队政治部副队长），行动总指挥为总统卫队长贾纳德少校。根据总参谋长雅库博的命令，人民民主党奠基人塔拉基在死去的当天就被埋葬在科拉斯—阿卜契坎（受难者之丘）公墓，而其家属被关押进布利—恰尔希监狱。

阿明玩弄社会主义口号，用蛊惑人心的宣传掩饰自己，展开与人民民主党宣布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大规模清洗和惩罚运动，一步步恢复独裁统治。他推行的方针是把党变为自己独裁的附庸。

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致函国会（驻喀布尔使馆致国务卿，1979年9月18日，№6976文）：“18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自我毁灭……实例之一：1978年四月革命确认的部长名单至今已经更改了25次。而副部长名单则更改了34次。清洗一次接着一次，以致令人难以想象政权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对揭露出来的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死亡的政治犯已达

6000人，在押的政治犯和曾被羁押的政治犯数字恐怕是这个数字的4倍……我不知未来会怎样。令人吃惊的是，阿明居然活下来了，尽管针对他的阴谋不断。当然，法规的概率最终会惩罚到他。我个人认为，他在本年度内执政到底的可能性只有50%。我还认为，他活到老年，死在病榻上的概率是零……那个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掌权的可能性还很大……。”

这段时间，阿富汗80%的领土已被反政府武装控制，人口接近1000万。而中央政府只支撑着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约250万人。所有农村地区和主要的交通运输网及公路干线均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由于政府在改革中忽视了“部落区”的特殊性和它的半自治地位；许多地区的普什图部落也举行了起义。穆罕默德扎伊人、巴拉克扎伊人、阿尔克扎伊人和始终敌视中央政权的贾德兰人部落对人民民主党的体制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部落中一些非虔诚信徒的实力派人物发现削弱中央政权可以巩固自己在同乡中的地位，与其他部落清算旧账，以及靠提供武器、商品和毒品大发不义之财。

对此，阿明提醒各部落头面人物对自己所为是要负责任的，宣布了对抗中央政府会遭受从罚款至死刑的严厉惩罚措施。他下令动用常规部队进攻叛乱部落，并对他们实施空中打击。这迫使一部分部落迁移到巴基斯坦领土，并导致难民问题加剧。苏联顾问对此提出了批评：怎么能够轰炸和消灭整个部落呢？阿明平静地回答：“你们不了解我们阿富汗人！如果哪个部落拿起了武器，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惟一办法就是从老到小一个不留地斩尽杀绝！这是我们的传统。”

斯大林是阿明崇拜的偶像，他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阿明喜好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

把塔拉基赶下台以后，新的总书记也开始为自身安全操

心。10月2日，通过克格勃代表，阿明转达了派遣一个营苏军到喀布尔的要求，以保卫他拟于10月15日后乔迁过去的新总统府。他的要求这次得到了满足，12月派出了“穆斯林营”。后来，这支队伍很好地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塔拉基被杀害几天后，帕甫洛夫斯基大将打电话向乌斯基诺夫汇报说，他领导的小组已经完成了任务，请求允许返回莫斯科。国防部长沉思许久后说：“11月3日回来吧！”

11月3日，苏联大使普扎诺夫通知阿明，我们的领导人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他，并对“阿富汗政府在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回国前夕，普扎诺夫拜会了阿明，再次对阿富汗奉行的政策表示满意。

帕甫洛夫斯基回忆说：“11月3日回到莫斯科后，我即打电话给国防部长报告自己的抵达，并请求会见。他说他自己会约见我。可是，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他始终未约见我，甚至11月7日在红场阅兵式上，他也只看了我一眼，伸过手来，什么话也没说。后来，他约见了。在我汇报了在阿富汗完成的工作后，乌斯基诺夫说：‘你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去找阿明？应该去找卡尔迈勒谈。’我告诉他卡尔迈勒当时不在国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乌斯基诺夫什么也没说，但从此不再约我，不再打电话给我。我明白自己失宠了，就试图通过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把情况解释清楚，但他对我说，部长没有同他商量过，只同阿赫罗梅耶夫谈过。”

文 件^① (绝密)

苏共中央特别卷宗

导致塔拉基下台并最终被杀害的9月13日至16日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82，卷宗173，第118～127页。

事件过后，阿富汗局势变得极为复杂。

为巩固自己的权力，阿明做出一些姿态，诸如开始制定宪法草案和释放部分在押人员，但实际上却在党政军和社会团体内扩大清洗范围。他明目张胆地把那些党和国家的著名人士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因为他视这些人为自己的现实对手和潜在对手。

根据掌握的情报，阿明正在准备迫害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中的一个派别（吉莱、米萨克和潘捷舍里），给他们捏造的罪名是“反党和反革命行径”。不久前召开的该党中央全会上，阿明把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许多亲信拉进党的领导机构。

阿明的这些做法势必引起人民民主党内部进一步分裂，消灭党的健康中坚，削弱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还会使领导人在建设新社会和反对国内反革命派的斗争中偏离解决那些迫切问题的轨道。同时，尽管最近以来阿富汗的军事形势趋于稳定，但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反对派已放弃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阿明的做法已引起进步势力的普遍不满。如果过去反对他的只有“旗帜派”的成员们，那现在加入其中的已有“人民派”的追随者，以及政府机构、军队、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这也引起了阿明对别人的不信任，他正在依靠强化清洗手段来寻找出路，而这更削弱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新领导和他推行的做法采取了谨慎的观望立场。军人的心态亦如此。

值得警惕的是刚刚出现的苗头：阿明有意调整同穆斯林反对派代表和反政府部落首领之间的关系，阿明准备以“妥协的条件”就他们停止反政府武装行为的问题进行谈判，这种“妥协条件”的实质就是牺牲国家的进步发展。

最近以来出现一个明显的征兆，就是阿富汗新政府在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力图奉行更加“平衡的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人通过与阿富汗人的接触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可以把阿富汗的政策朝着有利于华盛顿的方向扭转。

在同苏联的关系中，阿明的行为越来越暴露出虚伪和两面性。阿明和他的心腹们口口声声说要在各个领域同苏联发展合作关系，实际上他们却在怂恿有悖于这种合作的行为。阿明表面上同意苏联代表提出的、包括维护党和国家领导层统一等问题在内的若干建议，声称准备巩固同苏联的友谊，背地里不仅不采取措施制止反苏情绪蔓延，反而鼓励和助长这种情绪。比如，经他授意传播的谣言说苏联代表参与了9月13日至16日事件期间针对他的“谋杀”，面对苏联代表参与了阿富汗发生的清洗行动的诽谤，阿明及其亲信们始终也不加以制止和澄清。

这样，我们不得不同阿明这些贪权的家伙们打交道。他们以背信弃义和手段残酷著称。鉴于人民民主党党组织涣散，其成员思想幼稚，不能排除为了维护个人权力阿明走出改变政治定向这一步。

不过，阿明深知，阿富汗革命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困难、地理因素，以及国民经济和满足军队日常供给的依赖性，都决定了阿富汗领导人对于维护和发展阿苏间的多方面关系还存在客观兴趣。阿明懂得一个事实，就是现阶段撇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行不通的。这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对他施以明确的扼制性影响。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军队内部存在着健康势力，他们对国内局势深感忧虑，因为目前的局势可能会葬送四月革命的成果。然而，这些人是各自为政的，并且处于非法地位。

综上所述，为防止反革命势力在阿富汗获胜，防止阿明在政治上转向西方，我们必须尽己所能而为，遵循以下适宜的方针路线：

1. 继续同阿明乃至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现领导人积极协作，不给阿明以借口认为我们不再信任他，不愿再与他共事。利用同阿明的接触，对他施以相应的影响，同时亦是为进一步探明他的真实意图……。

2. 不断提醒阿明注意必须坚持集体领导，遵守法规和党内生活准则，不得再对党政军干部实行毫无根据的清洗。

3. 通过我驻阿富汗的所有机构加强局势的研究分析工作，包括党和政府机构，以及军界指挥层和安全部门的情况。在与友好人士和为四月革命成果担心的那些人士接触时，不要使他们认为我们赞同阿富汗目前发生的一切，不要疏远这些人。同时注意不要公开批评阿富汗现领导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不给阿明及其同伙以口实指责我们干涉其内政。

4. 目前应控制对阿富汗军事援助的规模。考虑到使其国内局势正常化和进一步进行针对反政府武装军事行动的需要，继续提供射击武器、备件、最低数量限度的弹药和辅助军需品。积极对待阿富汗政府要求为其人民警察提供轻型射击武器的事情。暂缓进一步提供重型武器和军事装备，因为没有现实必要性。在阿富汗不宜造成这类武器和弹药的过量囤积。

5. 驻阿富汗的苏联军队（通讯枢纽、伞兵空降营、航空运输队的飞机和直升机），以及负责保卫苏联机构的军事分队应继续完成既定任务。根据阿明要求用于个人安全保卫的军事分队派遣任务暂缓执行……。

6. 由国防部、克格勃和苏联其他部门派往阿富汗的我方顾问应留在原处，完成先前下达给他们的任务。但考虑到阿明反复强调苏联代表与阿富汗公职人员在相关部门的工作中“责任平等”，我方代表和顾问必须避免参加阿方组织的有可能给苏联造成恶劣影响的各类活动。对于阿富汗方面提出的补充派遣不同专业的苏联专

家和顾问的要求，必须谨慎斟酌，只有在符合我方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满足他们。

7. 为阐明我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弄清楚阿富汗方面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意图，应该继续同阿明和其他代表就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如有必要，应以相应的方式向阿明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其在与西方关系中玩弄手腕的。同时，通过外交和其他特殊渠道采取措施，防止邻国和其他国家干涉阿富汗内政……。

8. 苏联驻阿富汗使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国防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要研究阿明及其同伙如何对待阿富汗的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留学过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研究反动的穆斯林宗教界和部落领袖，以及阿富汗同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

如果发现能证实阿明有反苏倾向苗头的事实，则需要提出我方的补充性建议措施。

决议草案附后。

请示

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
波诺玛廖夫 1979年11月29日

签署这份文件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波诺玛廖夫。这一组合绝非偶然。实际上，在70年代，苏联的国家政权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所有对外政治方面的问题在高层都是由这几位来定夺。他们草拟建议，并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此外，上述几个人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成员。

工作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通常先分别由上述4个部门的代表起草文件，为自己的部长们上交提案做准备。非重要问

题从不开会商讨。否则，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便聚集到一起，还要请来那些准备材料的人，然后拟定共同方针。当需要解决特别重要的问题时，按照惯例，参与的还会有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外交部长的有关助手（比如科尔尼延科），或者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他们将汇报自己的提案。

然后，领导们之间交换意见，并下达指示：哪些更改必须体现在修改的文件里。接着，根据问题的实质性和其重要程度，按顺序签阅后，以苏共中央工作报告的形式发往中央书记处……提案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审理，并做出最后决定。决定出兵阿富汗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体系仿佛最大限度地听取了各方意见，而实际上，有关部门提出的分析性质的推理和结论常常是徒劳的。因为领导们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能事先得知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并附合于他，这样就忽视了分析家和专家的建议。

这一期间，阿明要求苏联出兵的信息不断从喀布尔传递过来。不同机构汇报的情况有时大相径庭，提出的建议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类似的报告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认为，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勃列日涅夫决定拯救“人民”政权

透过援引的文件不难看出，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不是匆忙做出的，而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和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走出的一步。如前所述，从阿明执政到他杀害塔拉基，苏联领导人已经面临必须解决阿富汗出现的危机。1979年10月到11月间，通过克格勃渠道汇集来的情报开始表明，阿明正在考虑某种改变对美政策的可能性，这使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深感不安。9月27日，阿明热情接待了阿姆斯特兹，并呼吁改善两国关系；同一天，阿富汗外长沙赫·瓦利在纽约对美国副国务卿大卫·纽森和国务卿助理盖洛特·桑德斯表达

了同样的意思。10月1日，阿姆斯特通兹临时代办在给国会的报告（№7258号）中说：“最近7天以来，使馆得到明确的信号，阿富汗正在寻求同美国改善关系……。”

对美关系方面，阿富汗领导在两个层面上推行自己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向美国人透露，他们希望拥有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他们认为目前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例如达布斯大使被害现场调查、和平使团和美国国际发展署使命，以及美国通讯社有关计划的执行，美国人总是遇到许多障碍。除此之外，阿富汗政府在两个月时间内还削减了美国使馆的人员编制。

部分美国官员力图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在阿富汗的影响，认为苏联领导人不会为人民民主党政权拿自己对外政策中其他重要目的去冒险，不会直接干涉阿富汗事务，会出现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局面。

阿明的双重政策和暴露出来的亲美倾向使苏联领导人无法听之任之。从长远看，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宣扬社会主义口号的执政者去接受美国人的控制。这是荒谬的，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玷污。

同时，包括“旗帜派”和“人民派”在内的阿明的对手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苏联领导人表达对于“人民民主政权”命运的担心，警告阿富汗国内存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危险，指出人民民主党总书记毫无顾忌的行为可能导致“民族爱国和进步势力”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这些人善于利用美苏之间当时存在的矛盾，他们说：“这不仅是革命事业的存亡问题，还关系到维护阿富汗独立，保护一个主权国家，一个与苏联友好的不结盟国家的问题（要知道，政权有可能转移到与美国和巴基斯坦以及正统的穆斯林国家关系密切的保守势力手中）。”事实上，正是“旗帜派”自己极欲篡夺政权，他们指望依靠苏联来达到目的，所以他们毛遂自荐为推翻阿明政权效力。

根据流亡在外的人民民主党两个派别的活动分子（卡尔

迈勒和萨尔瓦利)的声明,他们已建立了非法的组织机构,其干部已开始悄悄返回国内,并采取果断行动反对阿明派。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谈论武装起义的事,阿明对此已有所耳闻,这些“侨民”也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军援。不过,没有谁相信这支力量能够独立地揭竿而起,并顶住军队的阻挠。

于是,在苏联国防部内,出兵阿富汗问题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进行审查和研究。尽管这时并不存在赫拉特三月事件那样的催化因素。

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事后回忆说:“我们3个人前去部长那里:奥加尔科夫、我和瓦连尼科夫,后者当时是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部总指挥。我们告诉部长,这样的部署(4个师7.5万人、一个航空大队,以及部分补给部队——译者注)在阿富汗只会一事无成,而其他部队我们又没有。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可以稳定秩序吗?’部长问道。我们回答说,如果出兵,把他们部署在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是可以做到稳定秩序的……。”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反对出兵阿富汗的意见是非常婉转地、语意双关地表达给国防部长的。这些军事指挥官知道部长的立场,异议在当时会受到严厉处罚。

我要指出,70年代末,这个地区的战略走势已经不利于苏联。以色列与埃及间的和约、英迪拉·甘地在总理竞选中落败、伊拉克的军事政变、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土耳其艾吉维特左中派政府的下台……这一切都极大削弱了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如果再丧失“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阿富汗,那将是极端痛苦的事。

根据苏联专家的研究分析,阿富汗事件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建议苏联领导人不要容忍反革命输出,要给予阿富汗健康力量支持,以捍卫革命成果。这一观点恰好与苏联领导人的心态相吻合。在南疆拥有一个意识形态和利益都与苏联一致的可靠盟国太具诱惑力啦!

阿明是靠不住的,他随时都有可能倒向西方。这是最令

人担心的——埃及、智利、索马里……等国家易帜反苏，至今还记忆犹新。另外，克格勃内部仿佛还有情报说他与中央情报局有瓜葛。也就是说，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

1995年9月，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召开的研讨会上，对于我直率的问题“阿明究竟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特尔纳回答说：“我已久闻阿明与美国和中情局有关系。必须指出，给我们登录在案的事情多得根本无法做完。阿富汗并非我们的首要问题，其他的问题太多了。即使在今天，我们对阿富汗的兴趣也是有限的。”而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马歇尔·舒尔曼补充道：“阿明是不是中情局间谍，问题并不在这。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阿明很会耍手腕，他极力想建立更加独立自主的地位。莫斯科对此的反应是错误的。”我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讲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11月4日，伊朗大学生进行了策划已久的行动，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把使馆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这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它拼命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制定了解救本国公民的多种方案——与苏联领导人的区别在于，美国人总是把同胞的人身安全摆在首位。

显然，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人更会去操心解决在伊朗出现的问题，不会阻挠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于是决定充分利用有利局势。有人建议创造条件迫使阿明下台，用一个比较忠诚可靠的正常人代替他。“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当时正好滞留在莫斯科。分析专家认为，他在阿富汗百姓和党员中间享有一定的支持率（事后证明，实际支持率很低或没有支持率），于是建议他来领导推翻阿明的斗争。卡尔迈勒表示同意后，立刻受到克格勃保护。他许诺完全的忠诚和服从……。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这样走出了艰难的一步，尽管大家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准备捍卫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当年的形势，可以这样做结论：有能力保持国内稳定、不至于把事情搞到发生国内战争地步的、客观上对

我们比较合适的人选可以是前国王扎希尔—沙赫，或者是另一个与人民民主党没有牵连的、在阿富汗有影响的人士。但是在当时，这种想法是不能说出来的，那会被看做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

大批在喀布尔工作的克格勃高级代表陷入困境。他们在分析局势的基础上认定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把阿明赶下台，并把这一结论汇报给莫斯科。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12月初安德罗波夫致信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将阿富汗局势说成是危机的，并建议采取措施捍卫我们的利益。显然，这封信再次推动了对出兵阿富汗必要性的研究。

12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鉴于阿富汗局势和阿明的请求，决定派遣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一支分队，人数约500，全部着便服，隐瞒真实身份。12月上旬军用运输机将把他们运送到目的地。

同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双方讨论了批准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认为，条约会在1980年3月获得批准。同时讨论的还有美俄的合作领域：第三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80年7月勃列日涅夫访美、削减中程导弹……只字未提阿富汗。12月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协调英美在12月份的北约例会上的立场赴华盛顿访问。那次会议将讨论以苏联为目标的美中程导弹在欧洲的部署问题。

……“穆斯林营”准备就绪后，科列斯尼克被召回莫斯科，他着手准备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人员和武器装备于12月9、10日这两天空运到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全体人员均着阿富汗军服，从外表上看同当地军人没有差别。服装是根据军事侦察人员转送过来的样衣制作的。

塔别耶夫大使向阿明透露说，派遣两个营的兵力来加强总统府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保卫工作的要求已经落实。同时告诉他，苏联领导人准备在莫斯科接受他的正式访问……。

莫斯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见解：若要创造迫使阿明下

台的条件，没有苏联军队的参与是复杂的，即使有可能，那仅仅依靠国内反对派是冒险的。谁能保证阿富汗军队认可和支持卡尔迈勒？

即使卡尔迈勒夺取了政权，他有能力击退反对派的武装进攻吗？反对派的对抗行为始终在增长。根据那个时期苏联使馆提供的情报：“阿富汗反对派广泛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加强了作战部队的实力，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建立了营地。由于反革命势力对远离首都的驻防部队中军人的影响，时有反政府行为发生。发生叛乱的地方有第30山地步兵团（阿斯玛尔）、第36步兵团（纳莱）、第18步兵团（赫斯特）等地方驻军，这些部队长期与自己的上级部门隔绝，得不到任何方式的支持……在庫纳尔、南加尔哈尔、拉格曼、帕克吉亚、卡比萨、加兹尼、扎博尔、坎大哈、古尔、巴德吉斯、巴米扬、赫拉特等省，阿富汗伊斯兰协会和阿富汗伊斯兰党新编部队的出现引人注目。反对派控制（或政府失控）地区已占全国领土的70%，人口超过1000万，相当于全部农村地区……。”

12月到来时，局势更加不利于政府。共和国领导层在如何对待军队的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导致阿富汗武装力量组织涣散、军纪松弛。对领导干部接二连三的清洗、镇压、撤换，以及强制性征兵都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按照阿明的说法，阿富汗军队已经不堪一击，无力独自保护统治政体和捍卫国家主权。

实际上，我们的部分军事顾问是拥护阿明的，他们持有另外一种观点，也作了相应汇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主要传递那些能迎合掌权人胃口的信息，使领导人只能“推测”到既符合他们观念又证实他们有洞察力的那些重要情报。应该说，当时在阿富汗工作的苏联行家并非是最优秀的。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对付西方了。

12月8日，在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又称核桃木厅）召开了一个“小范围”会议，与会者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

柯、苏斯洛夫和乌斯基诺夫。他们长时间讨论了局势，斟酌了所有反对出兵和赞同出兵的理由。认为必须这样做的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基诺夫一方的理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卡拉站长为波尔·亨斯）在建立包括苏联南部加盟共和国在内的“新奥斯曼大帝国”方面又加大了力度；如果我们失去南部地区的可靠防空体系，一旦美国在阿富汗部署导弹（别尔申克型），受到威胁的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目标，比如拜克努尔宇航发射站；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可能会利用阿富汗的铀矿来生产核武器；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建立反对派政权，并使该地区与巴基斯坦连接……。

结果是决定制定两套方案：利用克格勃的能力废黜阿明，把权力移交给卡尔迈勒；如果不成功，则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前往阿富汗完成这一任务。

1979年12月10日，乌斯基诺夫召见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通知他说：政治局已做出向阿富汗临时派兵的初步性决定，下达给他的任务是调集大约7.5万人到8万人的部队。奥加尔科夫非常吃惊地表示，这样的数量无济于事，他反对这样做，这是草率行为。部长严厉地制止住他：“怎么搞的，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必须执行命令……。”

同一天，奥加尔科夫被紧急召进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小政治局”已经聚集在那里。瓦连尼科夫大将对我这样叙述说，动身去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他们两个人就奥加尔科夫在出兵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立场商量了半天，并且谈妥了奥加尔科夫要坚持到底，不放弃出兵不合时宜的意见。决定在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情况下建议派出小部队前往阿富汗保卫个别目标。奥加尔科夫就是这样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总参谋长再次试图使在座者相信，问题应当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不要寄希望于武力手段。他举例说明了阿富汗人的传统，就是对于自己领土上的外来人从来不予容忍，提醒大家我们的部队可能陷入军事行动而无法自拔，但他的良言都是徒劳的。“我们将引起所有东方穆斯林的反对”，奥加尔科夫说，“政

治上，我们也会在全世界一败涂地”。安德罗波夫不讲情面地打断他的话。“您去做那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吧！政治方面的事情有我们、党、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尊称——译注）来做！”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试图反驳他：“我是总参谋长”。安德罗波夫再次制止住他：“仅此而已！”赞成克格勃主席的有契尔年科、苏斯洛夫、乌斯基诺夫、基里连科。然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应当支持尤里·符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尊称——译注）。”

这次谈话最后确认——关于紧急军援，暂时不做决定。为预防万一，可以进行部署军队的准备工作。

当天傍晚，乌斯基诺夫召集国防部的同事们宣布：看来，最近的时间内将会做出决定，要在阿富汗动用苏联军队，应该准备好相应的部署。向部队下达了 №312/12/00133/号指示。从12月10日起，乌斯基诺夫开始对总参谋长口授命令在土库曼斯坦军区组建一支新的混成部队：准备进行空投的一个空降兵师，准备一个独立伞兵空降团，5个航空兵运输师；加强土库曼斯坦军区两个师的作战准备；把基辅舟桥团补充到满员状态，并调集到捷尔梅兹地区……一切均在暗中进行，似乎蒙上了传奇色彩。

12月10日，驻捷尔梅兹第108机械化步兵师师长库兹明少将在前往“克里米亚”疗养院休假途中，从捷尔梅兹飞抵塔什干后下榻一所宾馆，打算第二天再飞往辛菲罗波尔。他意外地收到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玛克辛莫夫打来的电话，命令他迅速返回师部。

克格勃方面从喀布尔发回对阿富汗局势的分析并且断然预测说，凭借自己的力量他们不能把阿明赶下台，没有部队的支持，他们无法保证政变成功；如果失败，我们将永远失去阿富汗，而苏联大使馆则会被毁掉。得到这些信息后，最终做出了动用军队的决定。基尔彼契科证实这份电报是集体创作的成果。12月12日早晨，当国防部长准备前去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这份情报已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对

此，在阿富汗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身边做顾问的扎普拉金少将可以作证，他在头一天晚上从喀布尔被召回，他非常熟悉阿富汗军队中的情况，而新任总军事顾问穆罕默托夫还没有充分了解阿富汗局势。

将军表示不同意情报部门对阿富汗军队内部情况的分析，认为他们过分渲染了局势的紧张程度。乌斯基诺夫对他晃着由克格勃主席签署的那份密电说：“你们在那边不能商量好，可我们在这边却得拿出主意。”

尽管这些情报相互矛盾，但政治家们有责任预见战略事态的发展趋势和决定出兵后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但他们无法这样做。他们墨守陈规，不顾当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不利于我们的变化。

自尊与傲慢依然如故。认为我们同美国人对话只能在平等前提下进行，涉及对我们生命攸关般重要的地区时，客气不得。所以，对于我们出兵后美国人的反应的预测是表层和肤浅的。即使考虑到了美国人的立场，也疏忽了我们走出这一步后卡特将面临的局面，因而也就忽略了美国人会对我们出兵做出强烈反应。事情发生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在选民眼中，卡特不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我们无从感受竞选活动中那种斗争气氛，我们这里的选举从来都是按照一个版本进行的。今天，这其中的事理已经明了了许多。

以阿富汗政府请求出兵为借口只是一种宣传伎俩。所有通过苏联代表转达过来的这类请求大约有20起，其中7起是阿明罢免塔拉基以后亲自表达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在同苏联领导的高层会晤或电话交谈中表达的愿望。倘若过去阿富汗问题国际专家对这类请求表示怀疑，并指责苏联军队背信弃义地闯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那么后来，他们都承认：这些请求是存在的，不过它们没有法律效力，以它们做托辞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俄罗斯人罢免和杀害了那个邀请他们的人”。这里有合理的看法和自己的逻辑。

12月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外长和国防部长会

议上通过了在西欧部署“别尔申克”和“科鲁茨”美国新式中程导弹的计划，西欧一旦配备了这种武器，就可以随时打击苏联领土，这一决定成为在天平上为出兵阿富汗进行辩解的最后一粒砝码。就在这一信息到达的当天，政治局，确切地说是那几位精英，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葛罗米柯一致做出出兵阿富汗的最后决议。他们确信，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以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顾及的了……。

那次会议的记录保存在苏共中央的特别卷宗里。具有寓意的是，记录出自契尔年科之手。文件中的字母“A”表示阿富汗，而“措施”一词则表示苏联出兵阿富汗。这份记录长期以来都是绝密的，始终保存在特制的保险柜里。能够阅读到它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中的个别几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谁是这些“措施”的始作俑者和执行者。

文 件^① (绝密)

特别卷宗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到会者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基里连科、佩尔谢、
乌斯基诺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
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波诺玛廖夫。

苏共中央决议 №176/125 号 12/X1 系列

适用于《A》章

1. 赞同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同志阐述的意见和措施。允许他们在落实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做出非原则性更改。需要中央委员会决定的问题应及时呈报政治局。委托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葛罗米柯同志落实这些措施的执行。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 3，编目 82，卷宗 173，第 128～129 页。

2. 责成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成员通报既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 №997 (1 页)

参加那次会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一例外地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没有人说“不”，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持异议者和与总书记意见相悖者，意味着自动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斯大林时代的综合病症尚未痊愈，仍然是连保制原则。

俄罗斯从来是一个人统治，这不同于美国，美国是由一个系统来统治。持否定观点的柯西金未参与此事。这样，那些关于由谁来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便不攻自破。诚然，文件没有说明出兵目的和行动方式，尽管有消息说政治局根本没有召开这次会议；决定是在小范围做出的，然后“请”其余的人签名；没有人拒绝签名；每个人都害怕。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说法。

然而，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有苏共中央书记扎米亚京的叙述：“只召集了4个人，勃列日涅夫、乌斯基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契尔年科书记也在场。在那里决定出兵阿富汗。使用的是尤里·符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提供的资料。讨论是如何进行的？我无法说。”除了那份由契尔年科书写的记录，什么也没有……在政治局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决议用笔写就，而非打字机。

问题的名称用加上引号的字母“A”来表示，共包括了4点，出兵问题是其中之一。当然，作为公式化的行文，那里注明是国际主义援助，规定了对人员数量的限制等等。还有乌斯基诺夫的保证，说出兵是临时性的，最多3~4个月，然后就撤回……。

……安德罗波夫有一份非常详细的笔记，这得益于他的特别顾问和助理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率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阿富汗。应该说，伊万诺夫的电

报较早暗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需要其他方式。安德罗波夫的笔记中毕竟有这样的话：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使用武力来支持塔拉基，那我们就会失去阿富汗。也就是说，布热津斯基“在苏联中亚国家身下制造一个‘绿色’下腹”的论调将成为现实。

稍后一些时候从喀布尔发回的密电似乎证明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据克格勃代表通报，12月12日和12月17日，阿明在同他会晤时说：阿富汗领导人欢迎苏联武装力量进驻北部省份的战略目标。军事援助的形式和方法应该由苏联方面确定，苏联可以在愿意的那些地方拥有驻防部队。比如，保护所有阿苏合作项目，保卫阿富汗的公路交通线。

对于出兵问题，没有形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或者其他类似文件，所有指示均以口头形式传达，以确保机密性和迷惑阿明。因为有这种采取重大政治决定的成熟实践经验，所以实现有关步骤便成为可能：事实上，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执政党的最高机构）确认后，这些决定只是走一下“同意”的过场，然后向人民宣布。这是“统一思维”的时代。发生作用的是党所钦定的那些人建立起来的精确的从属系统，它不允许你背离一步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方针路线。在国家占据关键岗位的人们都处于这一系统的全面监控下。

苏共领导人不认为把这个问题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必要的，仅宣布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就一了了之了。那些耍滑头的人（包括在高层）为了替自己辩解，矢口否认自己知道关于出兵阿富汗的事情，表白自己什么也没有参与。但当他们得知了以后，是予以反对，还是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不，都赞同了。他们害怕丢掉官位。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摘录完全能够证实这一点。

1980年6月23日一致通过的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

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决议说：“中央全会完全赞同采取措施对阿富汗反击外部干涉和武装进犯的事业给予全面援助。外部干涉和武装进犯的目的是在于扼杀阿富汗革命，并在苏联南部边疆建立亲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战略据点。阿富汗奉行不结盟政策，全会支持政治调解阿富汗问题。为此，正如阿富汗政府所声明，要求彻底消除针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拥有反对外来颠覆活动的可靠保障……。”

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报告，以及中央全会其余与会者的发言，凡涉及出兵阿富汗，都表示赞成苏联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在全会主席台上的发言：“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和苏联领导人从不食言，不会任凭命运去宰割自己的朋友。”

“目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伟人行径，拜读他的宏伟巨著和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会由衷地感到兴奋和自豪，因为你意识到，领导党和国家的是集知识渊博、列宁主义原则性、无产阶级坚定性、革命勇气、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和罕见的外交灵活性于一身的那个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后来，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表达了截然相反的立场观点。不过，说出来的话是撤不回去的。应该指出，不论在代表大会还是全会上，谢瓦尔德纳泽都以滥用美誉之辞著称，他犹如高加索夜莺那样富于热情，话说得娓娓动听，吹捧党的领袖英明卓见到了有失体面的地步。显然，他就是这样在格鲁吉亚维护了自己的权力。“改革时期”，谢瓦尔德纳泽把自己吹捧赞美之能事转换了方向，让自己以往的观点遭受“批判性的反思”。

第4医疗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长期负责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他撰写的《健康与政权》一书以事实来说明，在生命的最后7年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发生了障碍，使他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院士的回忆能够把很多情况解释清楚：“现在响起许多声音，其中包括前领导人，

说什么勃列日涅夫的真实健康状况没有通报给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甚至已不是耍手腕、使诡计，这是‘求生的谎言’。因为那些知道缘由并且顺从的人，现在必须对自己的沉默和无动于衷有个什么辩解。说实话，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那时，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勃列日涅夫帮’手里。而对于领导层中没有进入这一帮派的那些人来说，当时的形势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正是那种形势维持了这些人的位置，成全了他们在虚弱的勃列日涅夫执政下的未来……这涉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重要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阿富汗战争的发起问题。”

“我不了解我们军队入侵阿富汗的操作和准备阶段的详细情况。如果相信一些新闻媒介，那准备和实施这次入侵的只有4个人：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吉洪诺夫。中央委员会和领导层中间，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这样的行动。不过……国家领导和中央委员会成员还是不间断地得到有关阿富汗局势的消息通报。包括军事侦察、克格勃人员和党的工作者在内的数以千计的我方代表搜集了广泛的资料提供给莫斯科。”

“对我而言，阿富汗事件的发生要早于苏联出兵。那是阿明弟弟阿卜杜拉（阿富汗安全部门首脑）奉兄长之命，亲自或者借自己人之手‘废黜’了人民民主党和国家领导人塔拉基……。”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危象知觉能力已经降低，但是他依然对事件表现得非常难过。令他愤懑的是这样的事实：事件发生不久前的9月10日，他还会见了塔拉基，并许诺了支持和援助……‘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啊！用枕头闷死了和自己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是谁领导了阿富汗革命？（见面时他这样说）别的国家会怎么说呢？难道还能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话吗，如果他许诺的支持和保护只停留在口头上？’据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当着他与乌斯基诺夫的面，勃列日涅夫大概就是在这种情绪中说出这番话的。莫非是勃列日涅夫的

这些意见在入侵阿富汗问题上起了催化剂作用，不过……这些事情发生后，便开始了入侵准备……。”

“那段时间，我经常遇到安德罗波夫。在我们相识的17年时间里，我从没见过他那么紧张。我感觉，就在出兵阿富汗前夕，他在精神上出现了动摇甚至迷惘的周期。这是区别于乌斯基诺夫的。但是，安德罗波夫非常相信自己的情报来源……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与情报背道而驰：出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回想苏军出兵阿富汗前的那个阶段，许多事情急转直下，我相信，开始，对阿富汗派兵的决定是许多人的共同作为，而只有领导层少数几个人对此知道的论点才是瞎说……。”

依我看，院士在回忆录中叙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塔拉基被杀害以后说出的那番话是个关键：“难道还能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话吗，如果他许诺的支持和保护只停留在口头上？”葛罗米柯认为，塔拉基的被害加剧了局势的恶化。要求苏联援助正是始于塔拉基政府。这一流血事件震惊了苏联领导人，塔拉基之死又使勃列日涅夫感到格外沉痛。

官方宣布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的目的是维护和平，表述的方式是单一的：在稳定局势和反击可能的外部入侵方面给予援助。苏联部队本应成为驻防军，不去卷入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作战行动。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在食品、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分配，以及防止土匪袭击方面要时时处处给予当地居民帮助。我们还认为，苏联军队介入的本身就是强大的稳定因素，会有效地巩固人民民主党政体，给予反对派运动以威慑性影响……今天看来很明白，那样的方针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而在当时却是可以接受的。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真实目的何在呢，对此只有猜测了。我认为，就是强迫阿明下台，并铲除他。

读者自己明白，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么困难。并非像一些新闻记者试图想象的那样，决定是在内部原因作用下

非常仓促做出的。它是在大量相互矛盾、转瞬即逝、极其偏激，但又直接触及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因素作用背景下产生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后来的事件表明，不做相应的预测，并且没有对涉及出兵后果影响阿富汗局势发展的各种因素做综合分析就采取行动，不仅给阿富汗人民，也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其中有奥加尔科夫、瓦连尼科夫，以及陆军总司令帕甫洛夫斯基大将，在最后决定做出之前，一直在反对出兵阿富汗。他们劝告政治领导人不要被投入军队同阿富汗反对派武装作战所诱惑。这些军队领导人认为，我们军队的介入会激化作战行动，使之扩散，使叛乱活动进一步升级。而缺乏对当地传统和风俗的了解，特别是对伊斯兰教以及民族和种族之间相互关系的无知，将置我们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后来，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发生的。但在当时，军人们的论证却被忽视了。对时局清醒的分析被苏联领导人看做是没有理解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阿富汗事件的政治重要性。这几位后来都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发生了龃龉，被后者排斥在“阿富汗事情”之外。帕甫洛夫斯基还被安排退役，奥加尔科夫则被降职调任西方面军司令员……阿赫罗梅耶夫则成为国防部长比较信任的人物。

12月初，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联元帅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索科洛夫前去休假，因人民代表的事情去了卡列里亚一个星期，然后计划去皮亚吉戈尔斯克军人疗养院休息，但被意外地召回莫斯科。他没有任何疑虑地让家人继续准备出行。然而第二天，他没能前往皮亚吉戈尔斯克，却来到了苏阿边境的捷尔梅兹市。正式受命直接指挥出兵阿富汗准备工作的索科洛夫元帅在与妻子告别时说：“一个月后就回来，到那时我们再去疗养院。”谁料，这趟公差几乎长达一年。

如果说到我们国内对于出兵阿富汗的反应，应当指出：公开谴责这次行动的为数不多，恐怕只有一个萨哈罗夫，以

及非法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小组成员。不过，他们的声明大多发表在西方的新闻媒介，而那时对于苏联大众来讲这是很难得到的消息，所以这些声音实际并未引起什么注意。他们对制止和减少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点影响。我认为，今天也不值得对此进行重新评价。

后来还出现了大批形形色色的活动家，他们不仅在“心里”，而且始终在“公开”反对出兵。莫名其妙的是，他们的声音的确谁也没有听到。当然，在那个时代公开表态是不可能的，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他们毕竟也没有对事情的发展过程产生过任何影响。如出一辙的是，1994年12月做出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来恢复车臣共和国的宪法秩序时，反对的声音也没有发生作用。公开表示反对的有许多社会活动家和军界要人（格罗莫夫、沃洛比约夫、康德拉基耶夫等），其中不乏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可不要健忘，1979年苏联的新闻媒介处于国家的全面监控之下，相比而言，今日俄罗斯的新闻媒介已经宽松得多了。

有关出兵的缘由和目的存在着许多种意见。它们是五花八门的，有时甚至针锋相对。有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我只相信事实和文件。时值“冷战”年代，发生着两个超级大国、两种体制和两个军事阵营之间的军事战略对抗。伊朗的反沙赫革命和伊斯兰政体的确立迫使美国人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寻找新的地域。因此，在直接与我们边境的交界地区频繁援助阿富汗叛乱分子和加强美国势力一边的武装人员的实力，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

70年代末，苏美两国间的裁军步伐已停顿下来。卡特政府单方面决定无限期中止对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在苏联看来，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政治总方针的急剧改变。北约组织审核了成员国至20世纪末每年增加军费预算的问题。美国人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

世界各地的局势都是紧张而富于爆炸性的，特别是在中近东地区。在它西南部界线外的伊朗发生了另一场革命。有

两个原因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了不安。首先，伊斯兰在伊朗的复兴可能会减弱苏联在那里的影响，并在阿富汗乃至在苏联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中间散布“不服从”；其次，沙赫的垮台会促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寻找新的立足点建立军事基地。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不给自己的对手机会来利用可能在阿富汗出现的类似局面。伊朗亲美国的沙赫体制被推翻，引起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一阵畅快的幻觉，那就是对中东施加影响的可能——迅速、果断、不付出额外气力地巩固自己的地盘。

当时业已存在的对世界和地区性局势，以及同美国进行竞争的前途进行分析的结果使苏联领导人中占上风的意见为——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使得我们至乌拉尔的目标都可以轻易遭受打击，而此次行动可以缓解这一紧张状况，可以使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在波斯湾和迪耶果—加尔希亚岛加强舰载机群力量，如同对西伯利亚主要工业目标和采油、采煤、采气中心的防空保护那样困难……部分专家担心美国介入阿富汗事件会威胁到苏联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美国人会遇到同样于我们的命运。

另外，个人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这就是个别苏联政治家的妄自尊大（不能原谅阿明不顾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个人”保全塔拉基性命的呼吁）。正是总书记本人的妄自尊大给予苏联领导人决定性影响。妄自尊大使他失去治国的英明，改变不宜出兵阿富汗介入其国内冲突的信念。我们的领导人急于防止阿明的恐怖主义政权生成，使阿富汗人民遭受种族灭绝之灾，以及阻止反对派掌权，在“意识形态”上维护一个盟友，鲁莽行为产生了负面效果。

再有，领导人那时的工作作风中大国主义思维占据上风。出现过对待阿富汗人的轻视，比如，乌斯基诺夫认为，只要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出现，一部分叛乱分子立刻会自动缴械投降，而另一部分只会四散逃命了。显然，正是以这种

心态组编部队。实战中，轻视对手也给我们带来惨痛损失。1994年，在车臣共和国的情况亦如此。

1989年底，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大将在谈到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出兵阿富汗的原因时指出：“局势的特征是极端的紧张。那是放弃裁军的年代，是世界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年代，是西方针对苏联及其盟国频繁展开颠覆活动的年代。当然，我们并没有掉以轻心。”

“美国领导人面临国内严重的信任危机，于是通过巩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主地位来寻找出路。在美国的庇护下，在对抗‘苏联威胁’的口号下，三支已经形成的力量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连接到了一起。它们对苏联实行禁售现代化技术，广泛采取各种类型的制裁。研制飞弹、高精度核弹头、B1型战略轰炸机和MX新式战略导弹的工作活跃起来。美国军人反对批准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提议被审核。总之，华盛顿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显得不可告人，而且具有了危险的性质。”

“引起美国不安的还有70年代下半期北约组织越来越强烈的离心倾向。今天，你们知道，对于这种复杂的、涉及广泛的现象的态度已经改变了，而当时在华盛顿的压力下西欧国家开始实施补充装备和更新装备的长期规划。循序渐进的是伴随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军费预算每年递增百分之三的核潜力集团的增强。不能断言我方没有提出理由要求西欧证实这样的军事规划对于他们有无必要。在平等的程度内可以认为我们的理由是公平的，因为这涉及西方试图破坏战略均衡……。”

“这种相互对峙的观点普遍适用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及其盟国之间关系的所有领域。世界上一批地区被美国列入西方‘切身利益’的范围。不能例外的自然有苏联丝毫也没有参与的1978年阿富汗发生的革命，那时，苏美矛盾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待伊朗事件的态度上。美国为了弥补自己在中

东地区的势力被削弱，将海军力量开进了波斯湾，制订了入侵伊朗的计划。美国人及其盟友，都不能不给自己提出问题：阿富汗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到底能走多远。”

“他们曾经采取更替喀布尔政体的方针，还提出如亲西方势力掌权就在阿富汗安装针对苏联的美国电子侦察设备，可能的话，还有若干型号的导弹。我们甚至了解到美国 and 巴基斯坦的特工机构制订了利用毗邻国家领土在苏联中亚共和国进行煽动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情绪的计划。可以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况，苏联领导人更可能做出以下推论：如果在经过革命的阿富汗局势发生重要的变化，那美国及其盟国在该国的地位就会增强。这势必会发生苏联不愿意看到的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在苏联南部边境线一带的力量对比的整体变化。不容置疑，西方企图通过阿富汗来扼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

“苏联领导人不能置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发展于不顾。左倾冒进和完全依靠军事手段和镇压来解决内部问题非常迅速地导致了政体丧失人民的支持。大批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和伊朗。阿富汗的反革命势力善于利用人们对政权的不满。1979年秋季时，在巴基斯坦领土上成立的各种伊斯兰政党已经把自己武装人员的数量增加到4万人之多，并且把反对政府军的武装行动扩散到全国27个省份中的12个。被清洗搞得疲惫不堪的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制服反政府活动。军队内部的哗变频繁发生，各地驻军中携枪开小差的现象司空见惯……。”

“政体进步的前景也引起不小的惊慌。哈菲祖拉·阿明在党内和国内都在确立个人权威。他在1979年秋季策划暗杀了国家元首和党的总书记塔拉基。人民民主党内的健康力量代表经常提醒苏联方面注意，阿明集团的狂妄行为必将使国家的民族爱国力量和进步力量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受迫害最深重的是少数民族代表——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土库曼和其他与苏联、中亚国家居民有着血缘亲属关系的北方民

阿富汗的悲剧

族。通过阿富汗朋友的深切焦虑我们得知，阿明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自己的政权，准备同伊斯兰反对派进行秘密谈判，并对西方及其盟友做出重大让步。”

“1979 年年终，形势已经非常明朗，阿富汗濒临全民族危机边缘，国家走进死路……。”

这份对阿富汗局势和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分析，是作为苏联领导的辩护词事隔 10 年后出笼的。但它实际地反映了 70 年代末占上风的观点和看法，使我们从中了解到苏联领导人在决定出兵阿富汗之际的思路。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称，他们掌权后将把伊斯兰口号下的斗争输出到苏联中亚国家领土。苏联对时局分析之后，对此做出了不安的反应。伊朗的政治家是如此分析局势的：“克里姆林宫已深陷支持喀布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至于无法放弃对庇护对象的直接军事援助……除此之外，使莫斯科担惊受怕的还有新伊朗的影响前景，这种影响不仅仅在阿富汗，还会波及阿塞拜疆和中亚。因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莫斯科庇护的喀布尔是反对全球穆斯林统一思想的前哨”。^①

显然，在今天，许多人认为这些情形是无关紧要的，担心也是过分的。转移什么斗争呢？谈何容易！苏联是个大国，伊斯兰分子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尽管不能不考虑阿富汗及其周边的局势是爆炸性的，但实际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他们认为决定出兵便可以挽救已注定要垮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体制。他们陷入不能支持“兄弟党”的境地，这是许多我们的盟国和友好的共产党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缺乏驾驭国事的才略（或者说是在坚持不宜出兵的观点上缺乏精神勇气和坚定性），他们也没有找到其他出路，而他们以为选择的这一步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他们却没有掂量，破坏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经过几百年时间形成的力量

平衡有多么危险，不论这一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来，人的命运和性命是从来没有被考虑过的。需要和不需要时，他们都是“为国捐躯了”。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亦如此。人被看做是人的因素，遇到极端情况时（战争、切尔诺贝利事件）加以使用，然后便被随意忘却。现在应适时地指出，往阿富汗调兵遣将的那些人的子孙们在部队中是找不到的，那些人更愿意让别人家的孩子去死。

长期以来，苏联的对外安全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础上。正是以它们作为当年分析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它们是从属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主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公理。主要精力分散给了支持意识形态的同盟者了，只要回忆一下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事件就足够了。

应当指出，苏联领导人毕竟从阿富汗经验中汲取了一些什么。80年代初，波兰政局发生恶化时，有人建议过派遣华沙条约国部队去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最终没有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身陷阿富汗。或许，这反倒阻止了发生更大规模的牺牲。正所谓因祸得福。

不能苟同那些研究专家的意见，他们把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仿佛苏联入侵后便可以立竿见影。不妨回忆一下斯涅萨列夫的进言：“阿富汗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它是个山国，没有公路，缺乏技术上的便利，居民涣散如沙，不可信赖，但却极其热爱自由，珍惜独立自主，富于自尊心。近来的情况表明，即使能够占领这个国家，也很难支撑下去。用于社会秩序和管理机构运转正常化的投入是巨大的，是这个国家永远也偿还不起的：它无所偿还。所以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在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相互争斗的数百年历史中，阿富汗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它的价值从来都是间接的和有条件的。如果认真思考其政治价值的实质，充其量也就是它连接着通往印度的军事通道。历史上有过非常鲜明的例子：四千年时间

里，共有 20 起针对印度的大规模进犯。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的统治者都怀着发财的目的对印度趋之若鹜……阿富汗是必经之路，舍此别无选择。这一情况……使得阿富汗具有了政治价值，增添了一定的分量……。”

我认为，美国人的计划范围要大得多。苏联长期陷入地区性冲突，对谁有利？显而易见，有利可图的是那些援助反对派势力和极力想拖住苏联军队的人。其目的在于迫使苏联进行力不从心的沉重的持久战，从而在经济和道义两方面把它拖垮。

1979 年至 1980 年，连西方新闻记者都注意到：当苏联军队已经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动时，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却令人生疑地保持着沉默。他们具有现代化的侦察手段，不可能没有发现苏联军队准备出兵阿富汗……虽然他们对我们提出了一些询问，但苏联领导人并未放在心上：对这样的行动美国人会过分敏感吗？阿富汗纯粹是苏联的世袭领地。它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同美国的关系，犹如越南战争期间，我们继续同美国人合作。

12 月 17 日，特别协调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特尔纳谈及阿富汗局势时说：“从 7 月份至不久前，苏联军队始终滞留在原地。不过，现在已有情报表明他们在调动。阿富汗北部边境新近设立了两处指挥点，还观察到空军力量有所加强，以及结集了近两个师的兵力。在阿富汗目前有 5300 名苏联军事人员和近 2000 名非军事专家，以及部分家属。中央情报局视情况为……有步骤、有相互关系地增调军队，显然，起因是苏联看到局势在恶化……。”

“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落入叛乱分子手中，如果军队中不发生大规模的逃兵现象，就不能指望大城市的陷落。我们认为，苏联会做出政治选择来维持现政权……如果必需，就动用……军事手段。比起顺利完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们更看重此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事件与限制战略武器谈

判毫无关系。他们……打算抛弃阿明，但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①

虽然距我们出兵阿富汗仅剩下一周时间，但在这份报告里看不出美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由谁来代替阿明，因为当时卡尔迈勒已经在巴格拉姆了。讨论研究阿富汗和围绕它所形成的局势后，特别协调委员会建议遵循以下战略方针：“第一，继续保持我们同苏联的秘密外交接触。现阶段……如果公开事情，我们不会得到什么；第二，与巴基斯坦和英国一道利用可能的机会来改善叛乱分子的经济状况、武器装备和通讯设备，以使苏联的努力付出更多代价；第三，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苏联的宣传压力……建议我们欧洲盟国的新闻媒介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强化自己的努力，使苏联以伊斯兰宗教和穆斯林国家敌人的面目出现。”

美国国务院官员麦克·加里森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回答我提问时说：“当谈及办事不得要领时，我一贯觉得那是不会有作为的。我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国内，可12月13日却收到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函，里面谈的是柬埔寨边界问题。我们继续以阿富汗目前已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为由提醒国内注意。当时我真不明白华盛顿的狗为什么总也没叫起来，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马·舒尔曼说：“那段时间在阿富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并且在蔓延。11月底，我3次得到情报部门的消息：有部队在调集，有飞机部件从集装箱卸载，招募预备役人员……我得到情报后急躁起来，谁料……没人对此感兴趣。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试着考虑不同的方案……往莫斯科发急电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美国方面要做出相应反应。不过我觉得，苏联对这种反应是不

^①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格尔曼·利勃列里，2130 X 大街，国家情报局，701，华盛顿，卷宗 K20037。

会在意的。”

根据全面分析当时美国人使用假情报战来对付苏联领导人时采取的综合手段，我斗胆推测，我们的政治家和情报部门“落入了圈套”，在进行具有战略规模的大型战役过程中，他们被有意地引入了迷阵。也许，我夸大了中央情报局当时那帮人的能耐。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在为出兵阿富汗进行部队组编时，我们错误地认为做到了出人意料和神不知鬼不觉，并以此来安慰自己。或许，掩盖的仅仅是一些细节，但这还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落入了后来付出巨大代价才勉强得以摆脱的陷阱。苏联领导人没有识破对手的假情报战，超乎一切界线地大肆搞起军备竞赛，不仅破坏了经济，还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贫穷。

阿富汗战争是“冷战”的一个环节。美国的战略家们力图在这场战争中采取另外的方式——没有战斗和流血的胜利——来达到政治目的，而非直接使用武力。他们最终得逞了。“苏联帝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是美国的胜利，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历史中并不多见”，美国遗产基金会在《美国的安全世界》备忘录中对“冷战”做总结时这样描述。^①

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反对这种说法：美国大选前夕，卡特不会有意把苏联拖进这个圈套。难道他愿意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个当美国人质还滞留在伊朗时又允许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总统吗？这对他无利可言。不过，在美国难道一切都必须服从大选吗？还存在其他势力。有目共睹，在那些势力的作用下，美国人在悄悄等待着，指望苏联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苏联政治家认为，果断地走出第一步是重要的，今后让历史去证明你吧。但果断和果断也是有区别的，有时消极便在其后。研究人员至今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绝不是偶然的：苏联为什么在阿富汗行动消极？为什么没有适时增加自己的

^① 《为美国创造全球安全》，华盛顿，1992，第4页。

兵力，给了叛乱分子苟延残喘的机会？战争如此“阴燃”着对谁有利呢？

美国人早就对越战失利做出过明确结论。他们现在说：发动一场战争时，你必须投入拥有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否则就不要去打这场战争。比如，1991年他们同伊拉克作战时便果断地投入全部实力。其实，我们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勃列日涅夫希望把兵力限制在5个师以内，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坚持动用25个师。试想，如果在阿富汗我们也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好说事情会发生怎样的逆转了。可惜我们当时的国防部长是乌斯基诺夫，军事方面他是外行，或者说略知门径，而其他军队领导人则被迫缄口不语，只去执行政治家的意志。然而，唐·吉珂德式的政治家向来会使人民付出惨痛代价。

政治家的英明才略在于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防止战争的发生，并寻觅到解决冲突的和平途径。要寻找任何方式的妥协，最大限度地做出可以接受的让步，以维护和平。但是，如果已经做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那就别幻想能以不大的牺牲应付过去，并以此自慰。历史已多次证实：战争是不可以玩弄的，应该认真地去进行战争。而我们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始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恰恰落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方针轨道，即所谓的低度紧张性冲突。而这不仅在经济上消耗我们，还在精神上搞得我们疲惫至极。

发动这场战争的那些政治家的牢骚和怨言听起来，如果不像褻渎，那才奇怪呢。他们说一些无辜的老少妇孺的死伤……不是他们的初衷，军人们无法精确履行只准消灭武装分子的职责。这个事只能在办公室里探讨，战场上是做不到的。现代战争的野蛮性恰恰在于所使用武器给平民带来的伤亡要大大超过军人。近来，这似乎已成为常规。比如，1945年~1997年在全球局部冲突中丧生的人数为4000多万，其中和平居民为3500万。阿富汗战争丧生者中间85%为和平居民。



出兵阿富汗在即

我当时供职的总参谋部作战总部里有一个由武装力量各军兵种的将军和校官们组成的特别小组，它对派遣第40集团军进驻阿富汗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工作。正是这个小组为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拟定了调动部队进驻阿富汗的指示方案及保障措施，并且计划和实施了部队、技术设备、武器和物资向阿富汗边境的运送和运输，落实一些组织性质的工作，以及不间断地监视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形势，做出分析判断……。

12月12日，第108机械化步兵师开始战斗动员，下属的第180机械化步兵团隐蔽地开赴边界线一带。拟定在常驻地进行战斗动员和做好作战准备，但没有如愿，动员工作是在教学中心进行的。

12月13日，组建成立了以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大将为首的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其成员有总参谋部的将官和校官，以及苏联武装力量各军兵种和国防部总局和中央局的代表。

12月14日22点，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抵达位于苏阿边境地区的捷尔梅兹市，随即在土库曼斯坦军区展开工作。过了一段时间，苏联元帅索科洛夫被任命来领导这个作战指挥组。正是在他的统一领导下，实施了苏联出兵阿富汗。

资 料

苏联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

……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期间，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作战指挥组轮流交替地开赴前线。以空降兵副司令员古斯科夫中将为第一个作战指挥组于1979年12月初抵达巴格拉姆，并于12月23日转移到喀布尔。12月25日至27日，正是

这个组指挥了向巴格拉姆和喀布尔调遣空降兵部队，部署他们安营扎寨，以及推翻阿明一伙的军事行动。

1980年1月3日，以苏联元帅索科洛夫为首（阿赫罗梅耶夫充当副手）的国防部作战指挥组从捷尔梅兹飞抵阿富汗，指挥组在当地工作到当年11月。此后，作战指挥组经常飞赴阿富汗协调规模较大的苏阿两军的作战行动（比如潘捷舍尔战役），最长时要在阿富汗停留半年。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阿富汗的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由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的瓦连尼科夫大将来领导。起初，他只是定期飞往阿富汗，不过从1987年1月2日到苏联完成撤军为止的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阿富汗。作战指挥组的将官和校官在第40集团军的师、团一级进行了系统工作。在作战行动的筹备和实施，依据经验进行备战，以及协调同阿富汗军队的作战行动等方面，他们给予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许多实际的帮助。在制订作战计划，提高阿军作战能力，以及解决军事行动中的各种问题等方面，他们也发挥了作用。除此之外，作战指挥组还完成了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各种复杂任务。

鉴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只是为了领导较大规模战役而不定期地在阿富汗停留，1985年3月向喀布尔派出了总参谋部五人代表小组，为首者是被苏军总参谋长特别授权阿富汗事务处理权的格罗莫夫少将（1985年3月~1986年4月）。后来相继出任作战指挥组领导的有：雅雷金少将（1986年4月~1987年5月）、库特莱少将（1987年5月~1989年1月）。作战指挥组还被派往土库曼斯坦军区所属部队进行工作。

从1988年苏联撤军开始，总参谋部的一个特别作战指挥组在阿富汗投入工作，其领导人为加波年科中将。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为关键地区（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加尔吉兹等省）的阿军部队和边防哨所调集3个月储存量的紧急备用品。

“阿富汗战争”的最初阶段，总参谋部作战指挥组完成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它领导部队的重编、动员和开赴阿富汗领土，它还实施了罢免阿明和扶持卡尔迈勒的行动。在随后的几年里，它领导进行了规模较大的作战行动，并且解决了许多军事政治性质的复杂问题。

12月16日，下达了第40集团军战地指挥管理动员令。土库曼斯坦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图哈里诺夫中将被任命为第40集团军司令员。

总参谋部并没有提前制订好出兵阿富汗的计划，所以也没有下达动员部队和指挥机构的统一指示。各部队都是在传达了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的有关口头命令后进入战备状态的。

大约从12月中旬开始快节奏地组建远征阿富汗的军队。土库曼斯坦军区指挥人员配备齐全的满员师和团成为骨干力量。他们依靠当地的资源和预备役人员进行了补充。中亚地区的军人都根据当地惯例在工程兵或机械化步兵部队服过役，但军事素质并不是很高。所以部队根据总参谋部的单独指示或命令重新进行战备训练，在3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类型的指示和命令下达了30多次。^①这说明，即使到了12月中旬，苏联国防部也没有做出任何出兵阿富汗的具体计划。只是政治领导人决定“援助南部邻国”之后，才在土库曼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开始实施有关“措施”。

被扩编扩充的部队和机构将近100个，其中包括第40集团军指挥部、联合航空大队、4个机械化步兵师（土库曼斯坦军区3个，中亚军区1个）、若干炮兵、防空导弹、伞兵突击旅、独立步兵团、火箭炮团、通讯部队、侦察部队、后勤部队、工程维修部队、伞兵空降师、独立伞兵空降团，

^①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历史档案中心，类别48，编目3570，案卷3。

以及航空技术援助和机场保障部队都补充到满员状态。

从预备役人员中补充给部队的校官、尉官和士兵的数量超过了5万。从国民经济部门调拨给部队的机动车辆将近8000辆……在土库曼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这种规模的动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此，当地政府机构、企业和经济部门、军事部门和当地驻军都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例如，进行征召动员的最初阶段，忽视了补充给部队的那些专业人员的素质。大家认为这只是例行考察，一旦把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打上去，一切都会结束。然而，当指挥官和军事部门得知行动有可能要延续下去时，只得对那些已经应征入伍和已经被派遣到连队里去的现役军人进行紧急调换，开始感到极度缺乏热门的专业人员（坦克和步兵作战车驾驶员和机械师、反坦克导弹和雷达站操作手、火炮瞄准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亚共和国的代表们都是短期服役于工程部队和机械化步兵部队的，由于俄语掌握得不熟练，无法得到应有的专业技术训练。

由于军事部门登记工作缺乏条理、户口登记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街道名称的混乱等等原因，相当数量的义务兵最终没有找到。也有为数不少的义务兵以种种借口回避收取通知书，或在住地躲藏起来，或出示伪造的医疗证明。还有不少预备役军官根本就没服过役，不具备基本的实用军事专业技能：他们是在高等院校的军事教研室接受的培训。总而言之，部队进驻阿富汗的最初几个月里，遇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战时状态下，这已经预示了无法预言的后果。

尽管困难重重，12月24日深夜，第40集团军的主要部队仍然或好或差地做好了出兵阿富汗的准备。作为后续部队的团和师相继进行组编工作。比如，驻扎在杜尚别的第201师（师长斯捷潘诺夫上校）在12月24日傍晚才开始动员。该师利用三昼夜的时间进行了动员征召，然后经过急行军于12月28日午夜到达捷尔梅兹地区集结，随后决定使用驻德、驻捷苏军指挥人员对该师进行增补。1月里，对在编

人员进行了调换。月底，第 201 机械化步兵师进驻阿富汗北部地区。

12 月初，克格勃“顶点”别动队附属的两个小组（每组 30 人）抵达巴格拉姆，12 月 23 日又派出了“雷”（格罗姆）别动小组。这是他们在阿富汗的约定称号，在总部则是另一种叫法。比如，“雷”别动小组是“A”分队，也就是后来知名度甚广的“阿尔法”分队。举世无双的“A”分队是 1974 年根据安德罗波夫个人指示组建的，初衷是用于实施反恐怖行动。而“顶点”（泽尼特）分队的前身是创建于 1966 年的巴拉什辛军官技能高级培训班，培养目标是必要时在苏联境内外展开军事作战行动的指挥人员。后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信号旗”分队。12 月初，在阿富汗的“顶点”分队成员超过了 100 人。对他们进行统一指挥的是波里亚科夫。

同时向阿富汗紧急调遣其他的军事作战分队。为已经驻扎在巴格拉姆的第 345 团的那个营补充了由谢尔久科夫中校率领的若干作战分队。在此期间，卡尔迈勒乘坐安德罗波夫的专机秘密抵达阿富汗，他混在驻巴格拉姆的苏联伞兵中间，并且受到以舍尔金为首的克格勃人员保护。聚集在这里的还有塔拉基的同党瓦坦扎尔、古里亚博佐伊和萨尔瓦利。很快，他们便被运往喀布尔。事情在于，12 月中旬将实施废黜阿明的军事行动，阿富汗新一届领导人也将公布于世。

12 月 11 日，谢苗诺夫少校率领的“顶点”分队的战士们被召至巴格拉姆。空降兵副司令员古斯科夫中将给他们布置了夺取“橡树目标”的任务。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穆斯林营”的一个连。后来才知道，“橡树目标”就是阿明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总统府。手头既没有楼宇平面图，也没有保安系统图。清楚的只有一点：守卫总统府的是近 2000 名近卫军。这对 22 名“顶点”分队成员和“穆斯林营”的一个连来说实在是寡不敌众。

战斗准备的组织性措施实施了两个昼夜：获取情报，绘

制目标平面图和警卫系统图，确认协同作战问题……攻占总统府的计划制订完毕。12月13日15点30分下达了发起进攻的命令，部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离开巴格拉姆前往喀布尔武力占领阿明的总统府。真不知道这一冒险行动会怎样结束。我想，一定是彻底的失败，白白让人去送死。谢天谢地，16点钟下达了“解除战斗警报”的命令。12月13日至17日，对进攻喀布尔市中心总统府的准备工作继续深入研究（实地勘察选点，斟酌进攻的每个环节，重新配备武器……说得上是面面俱到）。

“顶点”分队成员茨维特科夫和叶洛赫夫两人在巴格拉姆调试好了射程为450米的狙击步枪，他们将在这个距离瞄准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明射击。他们在喀布尔阿明日常外出时经常行走的路线上选择了一个点，设置了观察哨。但每次阿明通过之前公路沿线就会加强警戒，所以“顶点”分队成员们无法完成任务。

12月16日对阿明进行的暗杀也没有成功。他仅仅受了轻伤，而其外甥、安全部门的头子阿萨杜尔·阿明却受了重伤。让苏联外科大夫阿列克谢耶夫做完手术以后，就用飞机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了……从弗尔干纳飞来一架安-12型飞机，它把仍然滞留在巴格拉姆的、以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未来政府成员重新送回了苏联。

12月17日入夜前，对“顶点”分队和“穆斯林营”下达命令开赴坐落在阿富汗首脑新官邸的达尔—乌尔—阿曼区，并决定在阿明返回塔日—别克宫后采取行动。“顶点”分队潜入阿富汗首都，暂住苏联使馆内的3幢别墅。12月18日早晨，“穆斯林营”开始朝喀布尔市内运动，并于入夜前到达指定区域集结。在翻越一个山口时，“穆斯林营”遗弃了两辆装甲运兵车，车上运载的士兵是苏联出兵前夕刚刚去营里报到的（特别行动处的代表在最后一天还在对全体人员进行从里至外的检查）。恰巧有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路经此地，他立刻汇报给莫斯科说，这个营准备得太差，应

该迅速撤换指挥员。

同日傍晚，科列斯尼克上校在莫斯科收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的指示，命令他着便装飞往阿富汗，执行政府的特殊任务。同行的还有一位军官，是什维兹中校。迅速办理了这种紧急情况必需的证件（出国护照直接送到了飞机上）。12月19日6点30分，他们从契可洛夫机场起飞，经过巴库和捷尔梅兹前往巴格拉姆。

到达捷尔梅兹之前，同行的有一位押运军事贸易货物的护送员。到达目的地之前，还有两位同路人，后来了解到他们是克格勃人员德罗兹朵夫少将和科兹洛夫海军中校。飞机在捷尔梅兹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寻找另一架。多亏土库曼斯坦军区的同行前来接应，他们安排了午饭，并且协助调换了飞机。

到达巴格拉姆时已经很晚了。两位同路人被使馆的安全军官接上，直接去了喀布尔，而科列斯尼克和什维兹就在遇到的第一个飞机掩体内过的夜。12月20日清晨，他们也出发前往喀布尔，在那里遇见了驻阿总军事顾问穆罕默托夫上将、驻阿武官巴拉纳耶夫上校……很了解哈尔巴耶夫的科列斯尼克说这样的营长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危难时刻他不会坑害你。克格勃主席驻阿富汗的特别代表伊万诺夫中将一见面便向德罗兹朵夫和科兹洛夫发问：“你们为什么也来了？”回答说，这需要看看克留契科夫的密电。随后他建议大家熟悉一下环境，看看“顶点”分队成员们的住所。

阿明是前一天乔迁进来的，做梦也想不到已落入“穆斯林营”的“羽翼”之下。

府内的警卫系统是经过精心研究后设计的。在内区服务的是由亲戚和特别信任的人员组成的私人警卫。他们的服装是特制的，完全与众不同：制服帽子上帽圈、皮带、手枪套和袖口一律为白色。他们住的泥草搭建的小屋紧挨着宫邸，旁边有一小房子是卫队指挥部。第二道防卫线有7个岗哨，每处有4个哨兵。他们配备有机枪、掷弹筒和冲锋枪。每

两小时换一次岗。

附近3个摩托化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营的驻扎地形成外环警卫线。它们在不远的距离上分布于塔日—别克宫四周。在一处制高点上固定了两辆T—54坦克，它们可以直接瞄准总统府毗邻地区，并用火炮和机关枪射击。警卫队共有2500人。此外附近还驻扎着一个团，装备有12门100毫米高射炮、16门高射机关炮。另有一个1000人的工程兵团也配备了射击武器。驻扎在喀布尔的还有其他部队：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

12月21日，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召见科列斯尼克上校和哈尔巴耶夫少校，命令他们使用“穆斯林营”的兵力加强塔日—别克宫的警戒，吩咐他们在警卫队哨位和阿富汗各营队分布线之间的结合部进行防御。苏军开始迅速执行任务。

很快便同警卫队长占达德少校（阿明亲信）取得了联系，协商了苏军营队防御工事的位置及所有涉及协同行动的问题。占达德给苏联军人提供了一架日本微型无线电台以便联络。由于在苏联学习过，警卫队长的俄语讲得还可以（他自己隐瞒了这一点）。据说，科列斯尼克上校装扮成“科列索夫少校”——负责作战训练的副营长；什维兹中校装扮成“什维佐夫少校”——特别行动处军官。他们旅行中的同路人之一德罗兹朵夫成了“列别杰夫大尉”——哈尔巴耶夫负责技术问题的助手。对此，阿富汗人表示了惊讶：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才是大尉？

对所有问题进行了协商之后，双方进入实际操作。拟定了警戒计划，并把任务下达到连队。勘察了各部队出行路线和阵地位置……其中，在一条路线上出现了自然障碍物——灌溉沟渠。苏军和阿方警卫队的士兵们携手架设了一座小桥——敷设水泥桁架，再铺上石板。这个工作进行了两昼夜。12月22日晚，苏军邀请阿方警卫队指挥官前来共进晚餐。

12月22日和23日，塔别耶夫大使通报阿明，莫斯科已完全满足了他关于派遣苏联军队的请求，准备从12月25

日开始实施。阿明对苏联领导人表示了感谢，并下达命令给阿富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对苏联出兵予以协助和配合。

据穆罕默托夫介绍，当他通过专线与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谈话时，后者问道：“废黜阿明的计划实施得怎么样啦？”穆罕默托夫完全不知他说的是什么计划。于是，乌斯基诺夫让他找伊万诺夫中将搞清楚所有细节。然而，当总军事顾问就计划攻占塔日—别克宫一事咨询克格勃主席时，后者竟回答说一点也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穆罕默托夫说明事情原委，说必须得联合行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基诺夫在电话里谈过此事……一段时间过后，伊万诺夫，显然是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请来穆罕默托夫，给他看了克格勃人员研究制订的行动计划。总军事顾问感到很愤懑，然后说，这不是什么计划，这简直是文字不通的一沓废纸。

同一时间在莫斯科，乌斯基诺夫正在主持一个有国防部领导成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他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的事情进行解释。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的副部长们、各军兵种和空降兵的司令员、中央局和总局的部分领导人。苏联国防部长对空降兵的空降师和独立伞兵空降团、土库曼斯坦军区机械化步兵师、中亚军区的独立机械化步兵团下达开赴阿富汗的命令，同时下令陆军有关师和团也进入战斗准备。做好战斗准备的还有与阿富汗交界地域军分区的联合航空大队，他们面临往阿富汗空运增援部队的任务。这次会议的发言提纲保存在总参谋部档案室内，其中一页上有乌斯基诺夫用红铅笔特别注明的“特别重要和机密”字样。

亚佐夫的意见是：“阿富汗战争是他的惟一失误，而我觉得，他最终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是个蹩脚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像一个衰老的斯大林‘近卫军’代表，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强力手段解决。如果我看到安德罗波夫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被阿富汗战争困扰得团团转，那乌斯基诺夫始终泰然自若，显然是相信自己的正确性。”瓦连尼科夫大将也认为，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策上，国防部长起

了第一把小提琴手的作用。另外，在军队内部，乌斯基诺夫作为国防部长，大家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在国防工业的组织 and 领导方面他的功劳被高度评价，但作为军事首脑，大家持怀疑的目光。或许，国防部长想通过这次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果敢？

1979年12月24日，乌斯基诺夫和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签署的第312/12/001号指令传达到部队，它确定了出兵时的具体任务和在阿富汗领土的部署。其中，对采取的这一步骤作了这样的解释：“鉴于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阿富汗政府最近一次的呼吁被予以了积极的审理。做出决定，派遣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苏联部队进驻阿富汗，给予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国际主义援助，并创造一种有利条件来防止可能来自外部的反阿富汗行动……。”

指令接下去给部队下达了进军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部署任务。没有提及参与作战行动，只是在晚些时候，12月27日国防部长签署的第312/12/002号指令，才给各部队镇压叛乱分子的抵抗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

苏联元帅索科洛夫在阅读指令时对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布鲁金中将说：“写得很高明，没的可说，什么都明白了，但就是没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武器。”

就落实与出兵阿富汗相关联的所有事情而言，所剩时间已非常短暂——不足24小时。这样的匆忙仓促，不可能不在日后产生消极影响。许多方面都没有考虑完善，准备妥当，这也在日后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通过政府电话召见了穆罕默托夫和科列斯尼克。然后，他们来到布置在距美国大使馆不远的“阿斯卡利俱乐部”运动场内的战地电话站。这是12月24日傍晚。他们进入政府线路电话间，开始给远在捷尔梅兹的阿赫罗梅耶夫大将拨电话，当时他随具体落实出兵工作的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在那里逗留。接线生好长时间不愿给科列斯尼克接通，借口在一份特殊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后来，显然是征求了阿赫罗梅耶夫的意见，才给接通了。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吩咐科列斯尼克汇报决定。阿赫罗梅耶夫大将听毕，就该决定的依据和用意提出了一些疑问。他对许多细节很感兴趣，交谈中不时提出意见，做出指示。然后，穆罕默托夫同阿赫罗梅耶夫通了话。后者给他下达了任务：12月25日早晨，使用密码把决定发过去，并且要有两人的签名，他自己的和科列斯尼克的。从电话间往外走的时候，穆罕默托夫对科列斯尼克说：“上校，你现在可以选择，或者赴汤蹈火，或者临阵逃脱……。”

他们就在电话站写就了一份报告，并在夜间两点钟用密码发出，然后乘车来到大使馆。科列斯尼克急着赶回营队：部队要做好战斗准备……科列斯尼克被国防部任命为代号“进攻—333”的战役指挥。

责成秘密侦察局局长德罗兹朵夫将军指挥克格勃别动队的行动。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契科夫通过政府电话线路指示他要考虑到一些必要的细节，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战役参加者的人身安全。安德罗波夫问：“或者，再把谁派过去？”尤里·伊万诺维奇回答：“我们自己应付得了。”不过，在场的伊万诺夫中将请求把博亚里诺夫上校派过来，以加强指挥和协调别动队的行动。后来也确实这样了。

尽管阿明在9月里欺骗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他许诺保障塔拉基的人身安全，后者当时已经死于被窒息），但是他依然相信苏联领导人。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排除他与中央情报局有瓜葛的说法，那一定就是他收到了相关的指令。或者，他认为胜利者是不会被审判的，同他们……要友好。再有，他不怀疑，“俄罗斯人也只承认实力”。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不仅使苏联军事专家“围拢在自己身边”，同苏联国防部和克格勃的高级代表交换过意见，而且只完全……信任苏联大夫。最后，他也始终寄希望于我们出兵。他不相信“旗帜派”，预料他们会发动进攻，预料圣战者会发动进攻。然而，他最终成为来自另一方向的政治阴谋

的牺牲品。

……从大使馆回到营队驻地时，大约是12月25日凌晨3点。科列斯尼克上校立刻着手武力占领塔日一别克宫的准备。什维兹中校予以积极的协助。作战计划规定在预定时间（战斗起初计划在12月25日，后来进攻推迟到12月27日）里以3个连的兵力控制塔日一别克宫的防御地段，阻止阿富汗军队出动（3个机械化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营）。以别动队组成的连或空降兵组成的连来对付上述4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坦克营同一个步兵营驻扎在一起）。增援的伞兵连连长是沃斯特洛金大尉……。

德罗兹朵夫目睹了伞兵们出众的军容军纪。我要特别提一提沃斯特洛金。“阿富汗战争”期间，我们中间涌现了许多传奇式的指挥员、军士和列兵，他们是勇敢、高尚和战友协作的光辉榜样。瓦连金·沃斯特洛金是最优秀者之一，他先后3次赴阿富汗参战，开始是连长，1980年7月身负重伤。当营长后再次负伤。“阿富汗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已是伞兵空降团团长。由于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他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派遣“巴松管”反坦克导弹排去对付阿军的坦克营。还有一个连奉命参加对塔日一别克宫的直接进攻，同这个连队一起行动的还有克格勃特遣小组（罗曼诺夫、谢苗诺夫和戈卢别夫）。部分人员奉命占领高炮团和工程兵团驻地并解除其武装。还布置安排了如何解决警卫部队和增援部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拿下控制着所有接近塔日一别克宫路径的那两辆固定在制高点上的坦克。

挑选出包括坦克专家在内的15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领头的是副营长萨塔罗夫大尉，还有克格勃的4位狙击手。整个战役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小组的行动结果，由他们开始动手。营队指挥官懂得，只有凭借出其不意和高超的作战技巧才能完成此项任务。否则，是不可能活着回来的。

12月24日，全体顾问的领导召开会议。在下达指示过程中，全体顾问都得到命令：不允许阿富汗军队在喀布尔有针对苏军的出动。为了防止调集伞兵时阿富汗军人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在阿富汗防空部队工作的全体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都对高炮设备和弹药储藏地实施了监控，甚至临时拆卸了相关部件（瞄准器和炮栓）。这样，就保证了运载空降兵的飞机得以安全着陆。

总参谋部制订的计划规定两个机械化步兵师从两个方向进驻：第5师从库什卡、赫拉特、申丹德方向；第108师从捷尔梅兹、普利—胡姆利、昆杜兹方向。同时实施第103空降师登陆，第345团留守喀布尔机场和巴格拉姆机场。

12月24日夜，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玛克辛莫夫上将是电话报告苏联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部队作战准备已经完毕，然后又以密电形式做了重复报告。

第三章 苏联军队开赴阿富汗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1979年12月25日7时整，两个舟桥团在捷尔梅兹地区开始架设浮桥。部队和装备将从桥上通过……为了确认有关双方协作和部队驻扎区域的问题，第40集团军司令员图哈里诺夫中将在昆杜兹会晤了阿富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巴巴占将军和阿明的弟弟阿卜杜勒……。

12时……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签署的命令下达到部队：第40集团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时间为1979年12月25日15时（莫斯科时间）。

苏联出兵行动分秒不差地在预定时间开始。部队即将出发之际，苏联元帅索科洛夫和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玛克辛莫夫上将赶到指挥部。率先渡过浮桥的是侦察分队和哈巴洛夫少校带领的空降突击营，他们的任务是抢占萨兰戈山口。紧随其后的是库兹明少将率领的第108机械化步兵师各部。

与此同时，军用运输机开始从空中运送官兵，第103空降师和第345独立伞兵空降团余部相继在喀布尔和巴格拉姆机场着陆。

为了运送人员和装备，实现了343架次飞行，空降部队的着陆用去了47小时（第一架飞机的着陆时间为12月25日16时15分，最后一架为12月27日14时30分）。遗憾

的是，没有能够做到万无一失：12月25日19时33分，一架伊尔—62型飞机（机长为果洛夫琴大尉）在喀布尔降落时触到山峰发生爆炸，机上37名空降兵和7位机组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在总参谋部，一个军官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它密切监视着局势，落实苏联出兵的所有措施，并不断为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大将起草报告和提出建议，而后者则适时汇报给苏共中央和国防部领导人。

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非常关心任务的执行情况。他召见了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布鲁金将军，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研究了局势，并不断提出具体的问题：“部队在浮桥上行进速度为何这么缓慢？汇报给我时可是说要快得多……如果忠实于阿明的部队发起反攻，我们的空降兵在喀布尔能坚持多久？”

野战部队行军途中（他们在居民点停留时），出现过临时组织的群众欢迎集会。阿军士兵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对我军格外友好。

12月26日，在普利—胡姆利举行了军人友好集会，与会的有苏军官兵和阿富汗陆军第20师第10团的官兵。阿富汗军人在发言中感谢我们给予的国际主义援助，并表示愿意合作。他们响亮地呼出了阿苏两国军事友好的口号。

但并非处处如此。部分阿富汗人很警觉地对待苏联军队的出现，避免和我们打交道。也出现过敌对现象，部分反政府武装甚至向苏军开火，而国防部的指令中没有明确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回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

12月26日，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召开了一次有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参加的会议，他们讨论了苏共中央12月12日P176/125号文件的执行情况。由契尔年科执笔这次会议记录。

文 件^① (绝密)

1979 12 12 编目 No П176/125 文附件

……乌斯基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汇报了苏共中央 1979 年 12 月 12 日 No П176/125 文件的执行情况。

勃列日涅夫同志表达了一系列愿望，同时肯定了同志们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

大家周密考虑了行动的每一步骤，确认阿富汗问题委员会以这样的组成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行动计划是适当的。建议将及时呈报中央委员会。

契尔年科 (签字) 编目 No 13 (1 页)

1979 年 12 月 27 日

当时，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在执行什么计划。如果其目的仅仅是把阿明赶下台，那派出的部队是足够的。而如果依照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反击外部入侵，那么部队数量就明显地少了。

12 月 27 日，空降兵部队和第 103 师各部，以及增援他们的克格勃部队出现在阿富汗首都的一些重要行政管理机构和关键设施（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邮电部、广播电视中心、电话局、普利—恰尔希政治犯监狱），“加强”了对这些目标的保护，实际就是设置了对它们的控制。

第 108 机械化步兵师本应在多什、普利—胡姆利、昆杜兹和塔鲁干地区占据临时驻扎地，但是，任务在行军途中被更改，全师转而朝喀布尔东北地区行进，并于 12 月 28 日早晨在目的地集结。就在这时传来通知，苏联国防部部长任命库兹明少将为第 38 军主管备战的副军长。苏联元帅索科洛

^①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 3，编目 82，卷宗 174，第 138～139 页。

夫来到第108师设在普利—胡姆利的指挥部，向大家介绍了新任师长米洛诺夫上校。不过，在前往伊万诺—法兰科夫斯克之前，库兹明在米洛诺夫身边做了将近一个月的顾问。



代号333行动

我们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之初，苏联克格勃别动队和陆军特遣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12月27日进行的第一次作战行动是攻占阿富汗首脑官邸所在地——塔日—别克宫，废黜阿明。

在同一时间，还需占领国防部大厦、内务部大厦、空军司令部、监狱、电报电信局……。

当时在喀布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公众来说，这始终是个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逻辑推理和最不可思议的传闻。苏联领导人断然否认自己参与了此事，说那是人民民主党内健康势力所为。我有幸接触过许多当事人，甚至在今天，他们对事情的了解和认识都不尽相同。

他们的叙述都是主观的，有时不免自相矛盾。有些东西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了，许多东西没有说透，或者完全疏漏了。当事人的回忆当中有个人对事件的理解，有对战斗过程的目睹。我综合起所有不同的线索和叙述，力争把接近事实的那一天还原。但这也仅是一种近似，只能局部地反映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首都的作战情景。

11月25日晚，在“穆斯林营”驻地招待阿富汗警卫部队指挥官们吃饭，准备了羊肉抓饭。本来搞酒是困难的，但克格勃们还是想出了办法。他们弄来一箱“大使牌”伏特加，还有白兰地和美味食品（鱼和鱼子酱）。餐桌摆设得可丰富了。

以警卫队长和副政委为首，阿富汗方面来了15位指挥官。席间，苏方想方设法地使阿富汗人多说话。为苏阿友谊、为军事合作不断举杯……充当服务员的苏联士兵有时把

水倒给自己的军官们。警卫队副政委的话特别多，在最坦诚的时刻他告诉“列别捷夫大尉”，是阿明下令窒息死塔拉基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占达特迅速吩咐手下人把副政委弄走了……其余人分手时，即使不是朋友，也是熟人了。

当晚，德罗兹朵夫将军根据对目标的侦察结果召集克格勃侦察破坏小组指挥员开会，确定了各自在攻占塔日一别克宫时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只缺少目标的平面图。

第二天，为阿明的贴身保安做顾问的克格勃第9局人员把侦察破坏小组人员带进了塔日一别克宫，他们什么都看了。德罗兹朵夫绘制了每一层楼的平面图。“格罗姆”和“泽尼特”小组的军官们罗曼诺夫、谢苗诺夫、费多谢耶夫和玛扎耶夫勘测了一些位置，并对附近的一些火力点做了侦察。离官邸不远的一处高地上是一个食堂，平时是阿军高级军官聚会的地方。特别行动分队人员借口要为自己的军官找地方搞迎新年活动，特地到那里走了一趟——塔日一别克宫尽收眼底，所有要冲一览无遗。

入夜前，科列斯尼克、德罗兹朵夫、科兹洛夫和什维兹再次讨论了进攻行动的所有细节，特别注意了指挥和协调问题，对目标从里到外都安排了不间断的侦察和观测。

“进攻333”战役开始前，克格勃特别行动分队人员详细认识了解了攻占目标：最便捷的路径、哨兵换岗时间表、警卫部队和阿明贴身保安的总人数、机关枪火力点、装甲车和坦克的分布、官邸内迷宫似的通道和室内布局、无线电联络设备的位置……。

克格勃特别分队必须在发起进攻前炸毁“井”——与重要的军事和民用设施进行秘密联络的枢纽。攀登用长梯、专用工具设备、武器弹药都已准备妥当。重要的是，保密和不走漏风声。

塔日一别克宫坐落在灌木丛生、绿阴遍布的陡峭山坡上。所有能接近它的周边地带都是雷区，惟一一条通道昼夜有人把守。官邸本身便是一幢难于接近的建筑。它厚厚的院

墙足以抵挡炮火的轰击，再加上周边都处于大口径重机关枪射程内，任务的艰巨程度显而易见。

12月27日早晨，德罗兹朵夫和科列斯尼克按照俄罗斯古老习俗，在战前洗了俄式桑拿浴，换上了干净的内衣，分别再次向上司报告战斗准备已经完毕。伊万诺夫同中央取得联系，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把无线电话筒递给德罗兹朵夫。安德罗波夫说：“你自己明白吗？不可能没有风险。多保重吧，要爱护大家。”对科列斯尼克也讲了同样的话……。

中午，科列斯尼克上校、德罗兹朵夫将军和营长再次视察了阵地，并对军官们通报了作战计划中与他们每个人相关的环节，然后宣布了行动程序。科列斯尼克吩咐在黄昏把一挺重机枪架设到阵地上更方便的地方去，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火力压制。

在进行观测时，他们从望远镜里看见了占达特和一群军官在研究“穆斯林营”的防御工事。什维兹中校驱车赶过去邀请他们共进午餐，说正好有一位军官过生日。警卫队长说，他们正在进行教学，晚上再过来。于是，什维兹请他允许苏联军事顾问们离队，并把他们带了回来，此举实际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攻占塔日一别克宫以后，占达特说，他们已得知苏军的意图，但没有相信。不过，还是下去进行了侦察，以防万一……显然，中央得知了阿富汗方面的动向，于是下令进攻时间改为下午3时。

得到这个通知以后，全体连长，以及突击小组和火力支持分队的指挥员被召集到了兵营的二层楼上。德罗兹朵夫将军对局势做了政治性分析，把共同的任务交了底，并对塔日一别克宫的警卫手段和兵力情况作了分析。科列斯尼克上校给各部下达了战斗任务，并为它们当中的每一支布置了具体的任务，同时说明了口令暗号、识别敌我和协调行动的方式方法。“穆斯林营”营长哈尔巴耶夫少校、特别行动队指挥员罗曼诺夫和谢苗诺夫给各部下达了战斗任务，并做好夺取塔日一别克宫的进攻准备。

这时的阿明仍然得意忘形于达到了使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目的，丝毫没有觉察到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12月27日白天，他在自己豪华的官邸里举办盛大午宴来招待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部部长及家眷。正式理由是想给自己的战友们看看新落成的总统府，再有就是为刚刚从莫斯科返回的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潘吉什利洗尘。他确认苏联领导人相信了对塔拉基之死的解释，并认可了阿富汗国家领导层的更换。访问巩固了阿苏双边关系，莫斯科多次表示将会在军事领域给予广泛援助。

阿明对在座的嘉宾庄严宣布：“苏联军队已经踏上路途，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不断同葛罗米柯同志进行电话联系，共同商讨一个最佳口径方案，向世界宣布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

白天，大家期待着阿明在阿富汗电视台发表讲话。大批军政界要人被邀请到总统官邸电视直播现场，这无形中影响了克格勃方面策划的行动。

席间，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和其他许多客人突感身体不适，一部分人甚至丧失了知觉，阿明也不得不彻底离开。他妻子迅速唤来总统卫队的占达特少校，后者开始给中央军人医院和苏联使馆医务室打电话，请求援助。餐桌上的食品和石榴汁迅即被送去化验，受到怀疑的厨师被拘留，加强了保安警戒。然而，事情的主要操作者还是隐藏起来了。

下午3点钟，苏联使馆转告德罗兹朵夫，进攻时间定为晚上22点钟，随后又提前到21点。后来，这一时间几经更改，最终定格在19时30分。

在阿军总政治部主任艾克拜尔·瓦吉尔请求下，以及驻阿苏军军事卫生总部政治处杜杜什金少将的一再坚持下，在喀布尔的苏联军医和阿军中央医院院长维洛雅特·哈比中校和外科主任阿卜杜勒·卡尤姆一同来到塔日一别克宫。

当外科大夫维克多·库兹涅契科夫上校和野战医院外科加强组组长安纳托里·阿列克谢耶夫上校，以及其他苏军医

务人员到达外围警戒哨，同往常一样交出武器后，他们还受到了搜身检查。这在以往是不曾有过的，而且哨兵的样子格外严厉。进入宫殿时异乎寻常地核查了证件，并再次进行了搜身。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大家看到更衣处、房间里和楼梯上横七竖八坐卧的人们时，心里才明白过来。那些恢复知觉的人在疼痛中抽搐着。大夫们迅速做出诊断：集体食物中毒。正准备为患者实施治疗之际，阿方军医维洛雅特中校跑过来，把众人带到阿明身旁，中校说国家元首情况危急。阿明躺在房间里，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裤衩，颌部耷拉着，眼睛翻白。他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死了吗？号号脉：非常微弱。

库兹涅契科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中校两人根本就不会想到现场情况正妨碍着什么人的计划，便抢救起“苏联友好国家”的首脑，先把颌骨复了位，再使他恢复了呼吸，然后抬到浴室擦净身子，接着进行洗胃和强行排尿。做完这一切后，又把他抬回卧室，重新注射，打吊瓶，两手的静脉都有针头注入……这些事情一直做到了晚上6点钟。

他们挽救了阿明的性命。不过，阿列克谢耶夫预感到有什么会使人慌乱的事件正在迫近，于是以需要去化验室做化验为由打发妇女们离开了宫殿……。

事情使负责保卫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安全工作的军官们极度不安，他们抽调阿富汗军人加强了内外保安，并往坦克旅打了电话，要求做好应急准备。其实，他们已经无处求救，因为我军空降部队已完全切断了驻扎在喀布尔的阿军出路。

当时在现场的萨尔金是这样叙述的：“大约在晚上6点半钟，旅长艾哈迈德·贾恩大尉接到命令派遣一个营进城。这段时间，我和顾问皮亚谢茨基中校一直没有离开过旅长。他命令第一坦克营做好战斗准备，出发命令在晚些时候下达。坦克发动机在顷刻间咆哮起来。第一营作战准备完毕。皮亚谢茨基不时地看看手表，等待着下一道命令。7点钟

时，他亲自要求艾哈迈德·贾恩大尉同自己的指挥员联系……然而，由于联络信号中断，后者无法接通电话。”

“皮亚谢茨基建议检查驻地附近的电话线路。迅速派出了一个通讯兵排，战士们进行了仔细认真的检查。时间过去了30分钟。”

“……突然间，4辆陆战队作战车在全速行驶中冲撞开驻地大门，围住旅指挥部。从第一辆车上跳下一位苏联大尉。他进屋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皮亚谢茨基叫到一边，交谈了几句，取出酒壶，提议喝点儿。大尉对旅长诉说城里不太安定，部队出动恐怕不合时宜。旅长同大家商量了一番后，对一营下达解除战斗准备的命令……。”

阿明的眼皮跳动起来以后过了很长时间，人才恢复知觉。他醒来后惊奇地问道：“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家里？是谁干的？是偶然，还是蓄意？”

接近晚上6点钟时，穆罕默托夫联络上科列斯尼克说，进攻发起时间又更改了，必须尽快动手。15到20分钟过后，萨塔洛夫大尉率领突击队朝着固定有两辆坦克的制高点出发了。突击队中包括了来自“格罗姆”和“泽尼特”小组的各两名成员。坦克由哨兵守卫，操作人员位于200米外的军营里。“泽尼特”小组的兹维特科夫和“格罗姆”小组的沃尔科夫负责击毙哨兵，“穆斯林营”的一个连埋伏在指定区域，准备火力支持萨塔洛夫突击队。

作为“泽尼特”成员参加行动的博亚里诺夫上校在指挥点显得焦急不安。他是前一天晚上才到达喀布尔的，还没来得及适应过来。或许，他预感自己会遭遇不幸。看在眼里的科兹洛夫忙说，他会陪着一起参加行动，虽然他并没有被列入突击队名单。斯捷契金检查自己的手枪后，发现谁也没穿防弹衣，便快步走向“格罗姆”小组成员已经各就各位的步兵作战车，科列斯尼克递上了自己的钢盔。这时，不论科兹洛夫，还是博亚里诺夫都没有想到，突击行动之后，他们两人将成为苏联英雄，更不会料到，后者命中注定不能生还。

萨塔洛夫突击队乘坐的车辆驶近第三营驻地时，那里突然枪声大作。科列斯尼克上校毫不迟疑地对“穆斯林营”官兵和参加行动的克格勃特遣队下达命令：“开火！”“前进！”

首先对塔日一别克宫开火的是平射的23.4毫米自动高射机枪，子弹像海浪一样倾泻过去。17型自动榴弹炮则对坦克营驻地进行射击，使乘员组无法接近坦克。“穆斯林营”各部开始向指定区域运动。冲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沙里波夫上尉率领的连队，他的10辆步兵作战车运载着以巴拉绍夫、耶梅舍夫、戈洛夫和卡尔布辛为首的“格罗姆”特遣队所属的一些空降兵小组，他们受罗曼诺夫少校统一指挥。

由谢苗诺夫少校率领的“泽尼特”小组乘坐4辆装甲运兵车沿宫殿的木板路前进，然后迅速攀登通往塔日一别克宫上方的阶梯。这两支突击队应当在宫殿正面会合，然后一起行动。

可是，计划在最后一刻改变了。首先朝宫殿推进的是“泽尼特”的附属小组，他们分乘3辆装甲车，小组长分别是卡列林、苏沃罗夫和法捷耶夫，统一指挥员是谢苗诺夫。“泽尼特”的第4附属小组被安排在了“格罗姆”的队伍里。战斗车辆击溃了外部警卫线后，疾驶在仅有的一条道路上，这条路像彩条一样爬上山坡，然后朝下驶进宫殿前的广场。道路的保卫已被加强，而其他途径都已布雷。第一辆车刚刚驶过大门，楼内的重机关枪就开火了。行进中的第一辆车的轮胎被击中……苏沃罗夫的车也被击毁，燃烧起来。指挥员不幸牺牲，乘员们都受了伤。大家急忙跳下车，隐蔽起来，朝着宫殿的窗户开火，借助冲锋梯向上面攀登。

晚上7时15分，喀布尔市内响起阵阵强烈的爆炸。这是克格勃“泽尼特”附属小组（组长普列什库诺夫）炸毁了叫做“井”的通讯枢纽，切断了阿富汗首都与外界的联系。原定爆炸声为发起进攻的信号，但克格勃特遣队动手的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

“格罗姆”附属小组也遇到了重机关枪强劲火力的阻挡。

突击在飓风般的狂射下进行。卡尔布辛附属小组最先突破到宫殿下。特遣人员迅速跳下战车，占据宫殿前的平台。“格罗姆”附属小组指挥员巴拉绍夫的防弹衣被弹片击穿，情绪激昂的他并未感觉疼痛，和大家一起冲向宫殿，只是在晚些时候才被送到营卫生所。科兹洛夫坐在装甲车里，脚刚刚伸出车外，就被子弹射穿……。

战斗的最初一刻异常激烈。进攻塔日一别克宫的是克格勃特遣队人员，沙里波夫连的主要力量用于掩护，而“穆斯林营”其余各部负责外围掩护。高射机枪平射塔日一别克宫殿，23.4毫米子弹打在墙壁上像胶皮子弹那样弹回。宫殿窗口里的机枪继续朝外猛烈扫射着，压制住了地面的特遣队人员，只是在高射机枪击中宫殿的一个窗口以后，他们才得以抬起头。这种激烈场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5分钟。战士们却感觉是漫长的。谢苗诺夫带领自己的人员冲进宫殿，在门口遇到了罗曼诺夫小组……。

什么都搅和在了一起，发生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进攻刚开始祖金就牺牲了，受伤的有库维林、巴耶夫、什瓦契科。战斗的最初阶段，罗曼诺夫少校手下有13人受伤，他本人则被严重震伤。“泽尼特”小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梁赞诺夫大腿被击穿，他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坚持战斗。最先冲到宫殿跟前的人有雅库舍夫和叶莫舍夫。阿富汗人从二楼往下投掷手榴弹。雅库舍夫刚刚爬上楼梯就被爆炸的手榴弹弹片击倒，而跑上去救助的叶莫舍夫则伤了手臂，后来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

大楼内的战斗一下子就达到了白热化。由科兹洛夫、罗曼诺夫、戈洛夫、索博列夫、卡尔布辛、普留斯宁、戈里申、弗里莫诺夫，以及谢苗诺夫组成的突击队同“泽尼特”的梁赞诺夫、贝科夫斯基和波杜布内是从右侧临院的窗户闯进去的。卡列林、希戈列夫和库尔巴诺夫率队从正面进攻。博亚里诺夫和库维林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切断了总统府同外界联系的通讯枢纽。

特遣队人员的行动英勇果敢、无所畏惧。如果没有人举着手从屋里出来，那就会踹开门，继续往里扔手榴弹。戈洛夫嘍嘍实实让弹片给“鞭打了”一通：事后找出了9块弹片。别尔列夫的冲锋枪弹匣被流弹击毁，走运的是身边的库维林立刻帮助他换上了自己的。如果他们稍微迟疑一下，跳到走廊里的阿富汗近卫军便会首先开火，而实际上阿富汗人落后一步。

塔别耶夫大使并不知道此次行动的意图，所以当枪声响起后不断有伤员被抬进使馆时，他给克格勃主席打电话要求解释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无可奉告，详细情况天亮再解释。

……高射机枪开始平射其他目标。步兵作战车辆驶离宫殿前的广场，封锁了惟一的一条通道。另外一个连和两个自动榴弹炮排始终在用炮火轰击阿军坦克营，使坦克兵们无法接近自己的战车，然后迫使他们缴械投降。“穆斯林营”特别行动队先抢占了阿军高炮团的装备，然后俘虏了全体官兵。这一部分军事行动是由什维兹中校指挥实施的：“占领工兵团和高炮团驻地之后，我报告科列斯尼克说，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后顾之忧了。”

宫殿内，阿明的私人保安部队官兵和贴身保镖（约100到150人）拒不投降，他们进行了垂死抵抗。高射机枪不得不把枪口调转过来，射击塔日一别克宫和前面的广场。这时，二层起火了，这严重干扰了楼内的守卫者。特遣队人员越是接近二层，射击和爆炸声越是激烈。阿明的保安部队起初把进攻者当成了本国叛乱部队，只是当听到俄语交谈和骂娘声，才开始陆续投降……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梁赞的空降兵学校学习过，并且永远记住了俄罗斯脏话。

谢苗诺夫、科兹洛夫、阿尼西莫夫、戈洛夫、卡尔布辛和普留斯宁向二楼发起进攻。罗曼诺夫由于受了较重的震伤，只能留在一层。特遣队员异常暴怒地冲击着，他们端着自动枪不停地扫射，把手榴弹扔进每一个房间。

宫内的苏联医生都各顾个地藏了起来。起初，他们以为是“圣战者”打来了，后来，又认为是塔拉基的追随着们，只是后来听到了俄语的叫骂声，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人。本来应该照顾阿明女儿（他有个吃奶的婴儿）的阿列克谢耶夫和库兹涅契科夫，在进攻一开始就藏到了酒吧台下面。他们看见阿明在走廊里徘徊，他浑身都被火光照亮，只穿着裤衩和背心，缠绕着导管的手臂高高伸起，像举手榴弹那样举着生理输液吊瓶。可以想象出这要付出多大气力，而静脉里的注射针头也会叫人疼痛的。

阿列克谢耶夫从隐蔽处跑上前去，拨出针头，再按住针口处，以免流出血来，然后把他搀扶到酒吧。阿明刚刚靠到墙上，就传来了小孩子的哭泣声——只见5五岁的儿子不知从哪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边哭边用小手擦着眼泪，看见父亲后，立刻飞跑过来，一下子抱住爸爸的双腿，阿明把儿子的头拢到身边，父子两人一起倚墙坐下。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当时觉着不能在酒吧待下去了，得赶快离开；大家在走廊里走着走着，突然发生了爆炸。冲击波把他们抛到了会议室门前，于是，大家索性躲了进去；里面黑糊糊、空荡荡的，不时有枪声从破碎的窗口传进来。库兹涅契科夫靠着窗户左面的墙壁站起来，阿列克谢耶夫从右面，命运就这样把他们分离开了：有一名战士从门前跳过，以防万一地朝黑暗中扫了点射，库兹涅契科夫不幸被一发子弹击中。他只惊叫了一声，便倒下死了。

根据阿方副官的回忆了解到，阿明命令他通知我们的军事顾问有人对总统官邸发动进攻，并说：“苏联人会帮助我们的”。副官报告说：“进攻的是苏联人”，这番话使总书记失去了自我控制，他抓起烟灰缸朝副官扔过去，并喊道：“你扯谎，这不可能！”然后试图亲自给总参谋长挂电话……通讯已经中断了。阿明自言自语道：“这是我曾经猜疑过的，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也许，这暗示了阿明不是中央情报局

的人？如果是，那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暴露自己。

……突击部队冲进塔日一别克宫以后，“穆斯林营”的战士们在宫殿周围组成了毫不留情的火力网，消灭一切予以反抗的目标。冲上二层的特遣队人员听见女人的哭喊：“阿明，阿明！……”，这好像是阿明的妻子。“泽尼特”小组中惟一懂阿富汗语的库尔巴诺夫为谢苗诺夫翻译起来……。

由科兹洛夫、谢苗诺夫、卡尔布辛、戈洛夫、普留斯宁、德洛兹朵夫和库尔巴诺夫等人组成的特遣小组在手榴弹和自动枪掩护下冲上二楼以后，看见了身着阿迪达斯短裤和背心的阿明躺在酒吧台旁，已经死去了……线索就是这样。我不清楚究竟谁杀了他。

整个战斗持续了43分钟。“枪声突然间停下来，”谢苗诺夫少校回忆道，“我通过移动电台报告首长，总统府已被拿下，伤亡者很多，他们的头已死了”。萨尔瓦利和古里亚博佐伊来到现场确认阿明死后，阿富汗政府和人民民主党领袖的尸体就被毯子裹了起来……

……萨塔洛夫太尉一队人乘坐从阿富汗人手里缴获来的两辆坦克驶到总统府前。他向科列斯尼克汇报战斗任务的完成情况：当他们经过警卫部队第3营时，发现那里已经下达了作战警报，阿富汗军人正在领取弹药，而营长和另外两个军官就站在特遣队经过的路边。我们迅速做出决定，跳下车来抓住那个营长和两个军官，把他们塞进车里，继续赶路。已经得到弹药的一部分阿富汗人开始朝我们射击，而其他人员则陆续加入追赶的行列——营救自己的指挥员。

于是，特遣队开始用机关枪射击奔跑的步兵们，为萨塔洛夫小组提供火力支持的步兵连战士也加入了射击行列，把对手“放倒了”250多人，其余人见状四散逃离。这时，兹维特科夫使用带消音器的自动步枪“解决了”把守坦克的哨兵，于是坦克就被我们缴获。后来，阿富汗人也开火了。萨塔洛夫小组不得不隐蔽下来。对射中，“格罗姆”小组的沃尔科夫不幸牺牲，兹维特科夫头部中弹。

连长沙里波夫上尉也汇报了任务的完成情况。科列斯尼克下达了停火命令，并把自己的指挥所迁进总统府大院。他们和德罗兹朵夫登上塔日一别克宫以后，在宫殿前和里面，突击队负责人陆续走到跟前汇报战斗情况。卡尔布辛拿出自己的钢盔，只见一颗子弹嵌在盔壳里，他说：“瞧，我真走运”。突击队员和特遣队员在大院巡逻，搜查残余的“阿明分子”。

战斗全部结束后进行了清点。克格勃别动队在进攻中一共牺牲了5个人，包括博亚里诺夫上校。几乎所有人都挂彩了，但能拿得起武器的都没有下火线。“穆斯林营”有5人牺牲，35人受伤，但其中23名伤员没有下火线。比如，腿部负伤的沙里波夫上尉继续指挥了自己的连队。受伤严重者由军医易卜拉欣莫夫大尉用装甲车运往营卫生所或者喀布尔医院。

我不知道直接负责阿明安全的苏联克格勃第9局人员的命运，根据一些渠道的消息，他们都提前转移了。

整整一夜，特遣队人员警惕地守卫着总统府，因为担心驻扎在喀布尔的阿富汗师团和坦克旅会前来反攻。不过，这并未发生。在阿富汗各级部队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和被调遣到首都去的苏联空降部队没有给予阿富汗人这种机会。况且，特遣队人员及时地使阿富汗军队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显然，在一些同胞身上发生了误伤：黑暗中，“穆斯林营”和克格勃别动队人员是以白色袖标、口令“米沙—雅沙”和骂娘话来相互识别的。然而，所有人都身着阿富汗军服，射击和投掷手榴弹都在一定的距离上进行的。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怎么能绝对做到不发生误伤呢！？

喀布尔夜间发生的枪战没有惊醒任何人，首都居民和外交官们睡得都很平静。而当第二天早晨大家醒来时，阿富汗政权已经发生了更迭。

阿富汗战争的回溯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掌权

喀布尔广播电台在总统府被攻占后宣布，根据革命法庭决定，叛徒哈菲祖拉·阿明被处以死刑，并已执行，然后又录放了卡尔迈勒宣读的告阿富汗人民书。其中有些话的公正性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也不容置疑：“今天，阿明及其走狗们的拷打逼供机器被摧毁了。这是些篡权者和野蛮的屠夫、刽子手，他们杀害了我们数以万计的同胞——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女子孙……。”

12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审核了苏军进驻阿富汗的宣传保障措施和向卡尔迈勒移交政权的工作，并确认了就阿富汗局势发展情况对苏联驻阿大使和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下达指示的方案；以及塔斯社的报道方案、致卡尔迈勒的贺电……。

当天傍晚，安德罗波夫会见了卡尔迈勒，后者当时受克格勃人员保护于部署在巴格拉姆机场的第345独立空降兵团驻地。安德罗波夫以个人名义和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就第二阶段革命胜利和他被任命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向卡尔迈勒表示祝贺。

供参考的情况汇编^①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附近一个叫做加玛里的地方，普什图族，军人家庭。父亲穆罕默德·侯赛因，莫拉希尔部落普什图人，中将，国王统治时期出任过帕克吉亚军团司令和该省省长，并且主管过国防部财政司的工作。1973年发生武装政变之前退役，达乌德执政期间重新任职，是第17步兵师师长和赫拉特省省长。1976年最终离开了军队。卡尔迈勒的母亲

^① 引自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卡尔迈勒档案。

是塔吉克族人。

卡尔迈勒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缔造人之一，1967年该党分裂后，他担任“旗帜派”领导人。1977年，人民民主党重新联合后，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副总书记。1978年4月（军事政变之后）成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政府总理。1978年5月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任大使，同年8月，在阿明的压力下，卡尔迈勒被解除了所有职务。由于担心回国后会遭受迫害，他最后定居于捷克斯洛伐克。

出色的讲演家，情绪易激动，偏激于不利具体分析
的抽象思维。对经济问题知之不多，只有泛泛的兴趣。

懂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常用达里语。能熟练运用英文，略知德文。

已婚，有4个孩子。小叔是马哈茂德·巴里亚莱。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迅速吩咐把自己送到首都去。开始想乘坐直升机，后考虑到安全因素，决定改用地面交通工具：由3辆坦克车做前导，掩护军车组成的车队从巴格拉姆朝喀布尔行进，其中一辆车上坐着阿富汗新一届国家元首，由舍尔金指挥的11名苏联克格勃第9局人员同车负责其安全保卫。12月28日拂晓，车队行至总军事顾问官邸（巴格拉姆和喀布尔之间的距离约60公里），12月28日召开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选举卡尔迈勒为党的总书记。他一开始居住在萨兰多大厦，但不久便搬到一处阿富汗军队驻地，一昼夜后又搬至喀布尔郊区的一处别墅，最终于一周后落脚在了阿尔卡宫。

这段时间里，他的安全保卫一直由克格勃人员负责。1月1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卡尔迈勒“当选”阿富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分别致电祝贺。我要补充说，此举赋予卡尔迈勒一种从属作用，不能不招致阿富汗人民的反感和不信任。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无论人口多寡，都不会容忍别

的国家来安插傀儡。自古以来，阿富汗人就没有支持过任何傀儡政府，他们从来都是依靠由部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享有威望的统治者。因此，要卡尔迈勒奉行一种符合我们利益的政策，困难是很大的。

12月28日夜间，又有一支机械化步兵师进入阿富汗，它先前驻扎于库什卡（指挥员是沙塔林将军）。该部开赴赫拉特和申丹特，留下一个团布防坎大哈机场，该团后来改编为第70旅。

“12月28日早晨”，“穆斯林营”的一位军官事后回忆说，“消灭阿明政权的战役响过了最后一排枪声。整个过程中，第一次出现在阿富汗的特遣队员们发挥了自己有分量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全营上下谁也没料到，在夜间就停息下来的这场战斗仅仅是我们的处女之作，我们今后面临的是数以千计的流血更多的战斗，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特遣队员竟会在1989年的2月份。”

实际上，那天夜间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通常的政变，政权从“人民派”手里转移到苏联支持的“旗帜派”手里，那天夜里的事情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埋下了伏笔，并且分别在阿富汗历史和苏联历史中揭开了悲剧性的一页。

参与12月事件的官兵们深信自己的使命是正义的，相信自己是在帮助阿富汗人民摆脱阿明的暴政，并且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后会即刻返回祖国。他们不是那些应当在对事件做出评价的基础上再对发展前景作预言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学者或者社会学家，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祖国命令的普通军人。

也就是在12月28日早晨，新闻媒介公布了阿富汗政府声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注意到来自外部敌人的持续蔓延的干涉和诽谤，为了捍卫四月革命、领土完整、民族独立……我们强烈请求苏联政府迅速给予政治的、道义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苏联政府满足了阿富汗方面的请求。”

王宫保安部队残余在清晨就被我们的特遣部队缴了械，有1700多阿富汗人做了俘虏。我们在此也没有做到万无一失。比如，当保安部队指挥部里伸出白旗时，“穆斯林营”的一辆装甲车开了过去，尽管有命令规定不得离开战车，但连副指导员和两名战士仍然跳下了战车。这时，隐藏在附近一幢水泥建筑物房顶上的阿明贴身保镖用机枪打了个点射，3个人就这样牺牲了。

12月28日早晨，第350团团长什帕克中校（1995年4月，已经晋升为将军的他在车臣战场失去了儿子）带着9连来到总统府，对其实施保护。那里仍弥漫着火药气息，刚刚结束的战斗在各处都下了痕迹，而突击行动的参与者大都坐在地上庆贺胜利。来自空降兵指挥部的团长和少校也被大家斟上白酒来纪念阵亡的特遣部队战友。然后，他们俩在塔日一别克宫里走了一圈。在二层，被子弹击穿的玻璃镜上浸着一大块血迹。

包括阿明两个小儿子在内的阿富汗阵亡者统统被掩埋在了毗邻的兄弟公墓里（1980年7月起，第40集团军指挥部就在那里安营扎寨）。还是在半夜里，阿明的尸体就被裹上毯子，在营副政委萨哈托夫大尉指挥下埋在了同一地方，不过与其他人隔开了距离，没有留下任何碑文。

阿明家族中的生存者被关进了布利—恰尔希监狱，他们在那里替代了塔拉基的亲属。阿明女儿在战火中失去了双腿，仍被关进了冰凉的水泥地牢房。仁慈和怜悯对于那些其亲属在阿明旨意下备受折磨的人来说是陌生的，现在他们只渴望复仇。

12月28日中午，“穆斯林营”全体指挥员来到了苏联大使馆。首先向穆罕默德中将和巴拉纳耶夫武官汇报了任务的完成情况。然后，科列斯尼克上校在大使办公室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向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舒京大将汇报了战斗结果。大将建议把“穆斯林营”从阿富汗调回土库曼斯坦的奇尔奇克，同时吩咐与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

员协商解决此事。

德罗兹朵夫将军也向苏联克格勃机构驻喀布尔代表伊万诺夫汇报了任务的完成情况，然后根据在其他目标执行任务的部队指挥员的报告编写了详细的密电，发给在莫斯科的安德罗波夫，其中提到了表现出色的克格勃“格罗姆”和“泽尼特”特遣队员以及10名“穆斯林营”战士的名字。作为礼物，安德罗波夫在晚些时候还收到了一份战利品：阿明的一支配有瞄准器的狙击枪。

当天晚上发生的一个意外，险些导致直接参与“进攻—333”行动的指挥员们全都丧命。当他们按照事前与古西科夫中将的约定乘坐政府的“梅塞德斯”轿车返回“穆斯林营”驻地途中路经阿富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附近时，遭到了己方空降部队袭击。时隔数年后，科列斯尼克少将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响起自动枪点射，轿车戛然而停，马达也熄了火。我们开始喊叫是自己人。经过交换暗号，射击才停止……。”

他们走下车，打开机罩，看见了5个弹孔。“再高一点，我们全完了……”，德罗兹朵夫说道（他是经历了卫国战争的前线军官，战后曾经担任过驻美国和中国的情报站站长）。

德罗兹朵夫、科列斯尼克和什维兹改乘哈尔巴耶夫的装甲车，再拖上“梅塞德斯”（科兹洛夫和谢苗诺夫仍然坐在里面），然后又上路了。

到达“穆斯林营”驻地后，大家决定为顺利完成战斗任务庆贺一下。“我们5个人喝了6瓶伏特加”，科列斯尼克对我说，“可觉着一点儿也没喝。精神过度紧张，虽然差不多两昼夜没合眼，可谁也睡不着。有些评论家把特遣队的行动说成是背信弃义。在那样的情况下，又能怎么办呢？问题很简单：有他无我，有我无他。”（1995年1月，科列斯尼克将军的儿子在车臣阵亡）

物换星移，岁月流逝，特遣队员终生不忘进攻阿明总统府的战斗。那是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们问心无愧地

执行了祖国下达的命令。

指挥员们当时都认为，出兵阿富汗是短期行为，一旦任务完成，我们会离开。比如，1980年1月1日，空降兵司令员苏赫鲁科夫通过飞机把几株圣诞树送给了自己的士兵们。古西科夫将军在视察军营，向大家致以新年问候时还说，一两周后就可以回家了。然而，到了2月初，他不得不时常单独飞行，因为“行动”要延续漫长的9年。

资 料

至1945年，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活跃于敌后，然后又同形形色色的土匪战斗过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第4局所属特别行动部队全部解散完毕。

阿富汗战争前夕，苏联没有可以用于执行特殊作战任务的部队。“格罗姆”小组（“阿尔法”分队）和“泽尼特”小组（巴拉什辛军官进修班）都是仓促组建的。

1979年12月31日，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C”局局长德罗兹朵夫少将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攻占塔日一别克宫的战斗情况时表示，在日常备战中必须拥有一支可以执行特殊任务的骨干部队。1980年，安德罗波夫同意建立一支数量为两千人的类似作战部队。两支编制外的作战分队“急流”和“欧米加”迅即组建完毕，并在阿富汗屡建战功。

1981年8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在克格勃内建立一支旨在“非常时期”于苏联境外执行特殊作战任务的秘密特遣部队。其第一任指挥员是苏联英雄科兹洛夫海军上校，这支部队的代号为“信号旗”（正式名称为“苏联克格勃独立教学训练中心”）。为它配备的都是军官、准尉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而且不局限于克格勃机构内，包括空降兵、飞行员、坦克兵、边防军……对体格、心理素质和外语知识的要求极其严格。“信号旗”分队的大部分人员都掌握外语，并且接受过两到3种专业的高等教育。根据专业 and 任务性质，全体人员都经历了可以在世界

任何地区、任何气候条件下执行任务的强化训练。他们参战的足迹不仅仅在阿富汗，还遍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老挝……只有克格勃主席有权下达作战命令，而且必须是书面形式。

在自己生存的年代里，“信号旗”成为世界上同类部队中规模最大的。1993年10月，在对莫斯科“白宫”进行突击中它拒绝合作，实际上，“信号旗”从那时起已不复存在。1993年12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命令解散国家安全部，“信号旗”被移交内务部管理。于是，军官们纷纷递交了辞职报告，一支从来不说“不可能”的特殊部队就这样消失了。

1994年12月成立了特遣部队和情报部队“信号旗—联盟”老战士协会，领导人就是苏联英雄科兹洛夫。

“阿尔法”分队的许多军官和将军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应运而生的还有“阿尔法”反恐怖分队老战士协会，其会员中有许多人参加了对塔日—别克宫的进攻。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冈察洛夫。

夺取塔日—别克宫的经验证明，只有高素质的职业军人才能在类似的战斗中顺利完成任务。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行动起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队被解散和职业军人离开国家公职以后，却派遣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孩子们去攻打格罗兹尼。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内部命令，一大批克格勃人员（约400人）受到了奖章或勋章的奖励。博亚里诺夫上校在对兄弟的阿富汗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援助中表现出极大的英雄主义气概，被迫授苏联英雄称号；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还有科列斯尼克、科兹洛夫和卡尔布辛。德罗兹朵夫少将荣获十月革命勋章；“格罗姆”小组指挥员罗曼诺夫少校荣获列宁勋章；什维兹中校和谢苗诺夫少校荣获红旗战斗勋章；将近300名军官和“穆斯林营”的战士荣获政府奖章，其中

7人荣获列宁勋章（包括哈尔巴耶夫、萨塔洛夫和沙里波夫），约30人荣获红旗战斗勋章（包括沃斯特罗金）。

“追授国际主义军人库兹涅契科上校红旗战斗勋章，以表彰他在进攻塔日一别克宫时的英雄主义表现”。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在进攻总统府的战斗即将打响前，这些人和阿列克谢耶夫上校一起履行白衣天使的职责，“救活过”哈菲祖尔·阿明。阿列克谢耶夫离开喀布尔返回祖国之际得到了一份荣誉证书。所有参加进攻总统府的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执行命令的（他们中间有人受伤，有人阵亡），可他们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该由他们提出，而是由其他什么人来提。战争从来都不是士兵发起的，但付出生命代价的总是他们。

12月29日，空降兵和第40集团军某部从特遣部队手中接过了总统府的保卫工作。

苏联克格勃驻喀布尔机构的领导和在进攻塔日一别克宫中表现出色的军官受到了卡尔迈勒的接见，他在致感谢辞时说，没有苏联的支持，“旗帜派”人士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

苏联克格勃主席调用自己的专机把“格罗姆”和“泽尼特”两个特遣小组人员从喀布尔运送回了莫斯科，还亲自前往迎接，以示尊重，但当场提醒大家必须忘掉这次行动。回家以后，基尔皮契科和德罗兹朵夫将军在12月31日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接见，他们做了汇报。安德罗波夫说，原来只是想迅速了结这件棘手的事，谁知搞成这个样子……。

早些时候，伊万诺夫中将也从喀布尔返回了。接替克格勃驻阿富汗代表处领导职位的相继是勃格丹诺夫、斯波尔尼科夫、卡利亚金、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扎伊采夫和列文。

1月9日，“穆斯林营”全体人员飞离阿富汗回国，军事技术装备留交给了第40集团军。临行前，全体军官和士兵都受到了检查，没收了数量不多的匕首、两把手枪、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录音机，并如数上缴给了特别行动处。然而，事后却有传闻说，特遣队员从总统府中带出了贵重物品……。

坦率地说，“穆斯林营”的战士们在空中都觉得很不自在，有的人心有余悸，甚至担心会被自己人击落，以“不留痕迹”。还好，什么也没发生。一昼夜后，营队回到奇尔奇克的常驻地。1981年，两支野战特遣营被派到阿富汗去保卫普利—胡姆利的管道和什巴尔甘的石油业，而晚些时候又派出两支加强的特遣旅去打击为圣战者提供武器弹药的马帮队。

1月12日上午，科列斯尼克上校被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元帅召见。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上校向元帅汇报了夺取塔日—别克宫的详细过程。此刻，乌斯基诺夫才突然发现，不论苏联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还是克格勃驻阿代表，均没有在作战计划上签批。科列斯尼克当时翻过文件，指明了记录：“他们确认计划，但拒绝签名”。最后，部长对上校的果断表示感谢，吩咐派遣他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

同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及在随后的战事中站在喀布尔政权一边，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应，特别是美国、北约、伊斯兰国家……它们认为，这是莫斯科为谋求私利和打破已有战略力量平衡（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而做出的直接尝试。1979年12月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苏联出兵阿富汗一事致卡特总统备忘录，布热津斯基敏锐地觉察到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使美国有利可图，决定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加强针对苏联的破坏行动。

文 件^①

华盛顿 白宫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致总统备忘录

主题：苏联入侵阿富汗

我向您补报定于周五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程，议题是阿富汗和伊朗。此前，您已经收到了这两个国家局势问题专门协调委员会今天的会议记录。本文目的在于协助您尽可能周详地评价业已形成的局势。

正如大约一周前我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是地区性危机。阿富汗和伊朗都处于混乱状态，而巴基斯坦局势的特点是内政不稳定，对外政策方面变化无常，令人捉摸不透。如果苏联在阿富汗得手……（此处在解密时被删除），那苏联的夙愿就会梦想成真——获得印度洋的直接出海口。

历史上，英国人在这一通途上设置障碍，阿富汗始终是这样一个缓冲国。我们在1945年便支持阿富汗发挥这种作用了。然而，伊朗危机导致了西南亚力量对比失衡，使得苏联有可能直达阿拉伯海和阿曼海湾。

因此，于我们而言，不论从对内对外角度，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一个极具威胁的挑战。如果阿富汗可以成为下一个“苏联的越南”，那么，由于下列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原因，苏联入侵的最初所获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最消极的后果。

对内性质方面的原因：

1. 苏联的干涉可能成为呼吁美国在伊朗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的借口。与苏联的“强硬”相比，我们的忍耐立场将越来越表现为英明，但过分“羞涩”。

2. 同时，该地区的不稳定会妨碍伊朗问题的解决，并使我们与苏联发生直接碰撞。

3. 显然，面对苏联赤裸裸的军事侵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使不被断送，也将受到威胁。

4. 如果话题再广泛一些，那么，我们如何解决与苏联入侵的相关问题就会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并且还会受到来自左右两派的非难和抨击。

国际性质方面的原因：

1. 如果在该地区我们无法创立一个稳定和相互信任的局面，那么，巴基斯坦……（此处在解密时被删除）。

2. 与伊朗的持续不稳定并存的是东南亚地区不具有阻止苏联突破至印度洋的牢固障碍。

3. 自然而然，中国会注意到，苏联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进攻并没有遇到美国的有效对抗。

补偿要素：

1. 苏联入侵将激怒国际社会，穆斯林国家无疑会对此格外关注，这是我们可加以利用的。

2. 巴基斯坦境内已有 30 万阿富汗难民，我们可以斥责苏联给人民大众带去了灾难。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苏联在柬埔寨怂恿的行为已经受到了谴责。

3. 我们的盟国中间，增强防御能力的意识将会提高。

苏联的越南？

现在，我们还不足以希望阿富汗事件会像越南事件那样发展下去而聊以自慰：

1. 起义者在组织和管理方面都非常差。

2. 他们没有固定的基地，缺乏纪律严明的部队和统一的指挥中心，而这是北越人所拥有的。

3. 他们得到的境外援助是有限的，相反，苏联和中国提供给北越人的军援是巨大的。

4. 苏联的果断行为仿佛是目的明确的，而美国在越南推行的政策是迫使对手明白，他们消灭南越社会制度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结论：苏联也许能卓有成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没有什么比实际结果更富有成效的了，这是不取决于道德观念的。

应该做些什么呢？

下面是一些值得全面考虑的初步设想：

1. 阿富汗的对抗继续下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这意味着要提供给起义者更多的武器，会有更多的销售，进而可以对他们提供必要的顾问援助。

2. 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当向巴基斯坦提供保障，并使其相信援助起义者是必要的。这要求修改我们的对巴关系政策，重新考虑提供武器和保障……（此处解密时被删除）。

3. 我们甚至可以促使中国对起义者提供军援。

4. 就宣传措施和秘密军事行动领域如何援助起义者，我们需要同伊斯兰国家达成协议。

5. 我们必须传达给苏联这样一个信号，他们的行为可能威胁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而且会完全改变布劳恩中国之行的性质和目的，因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比任何人更关心苏联对其邻国侵犯的后果。我担心，如果我们不直率而明确地对苏联表示双边关系正在受到损害，那么苏联就不会认真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不安”。那么，苏联人自己未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他们的地区性冒险会不会严重影响美苏关系的长远任务。

6. 最后，我们要把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径当作威胁世界和平的问题提交联合国。

……12月28日，卡特班子在白宫召开会议，研究苏联入侵阿富汗背景下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决定就在阿富汗事件上同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扩大合作的问题派出沃伦·克里斯托弗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进行磋商。在同西方国家首脑磋商以后，卡特致函勃列日涅夫，强烈否定了苏联的行为，警告苏联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任何外部势力夺取波斯湾控制权的企图都被看做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侵害，必将遭到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任何方式的反击。卡特声明：

“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对和平明目张胆的威胁，它可能标志着我们双边关系中根本和长期的变更”。他坚持要求苏联迅速撤军，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

……1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赞同了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总统卡特来函的回复。在此，我全文援引勃列日涅夫的回复，因为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特点和冲突水平。或许，没有这场战争，两国关系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文 件^① (绝密)

尊敬的总统先生！

作为对您12月29日来函的回复，我认为必须奉告如下：对于您就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论断，我未敢苟同。我们以信任的方式通过您在莫斯科的使节向美国方面和您本人转交了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对那里真实情况的说明，并解释了促使我们积极响应阿富汗政府要求派出数量有限的内陆部队的原因。您的来函试图怀疑阿富汗政府请求我们出兵这一事实，这是奇怪的。不得不指出，事实真相绝不是由谁认可谁不认可，谁赞同谁不赞同而确定的。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在几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阿富汗政府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请求。顺便提及，类似的请求有一次就是在今年的12月26日发给我们的。我们苏联掌握这些情况，发出请求的阿富汗方面也掌握这些情况。

我再次强调，向阿富汗派出数量有限的苏联内陆部队只有一个目的，即在反对外来侵略方面给予协助与支持，这种协助与支持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现在则更加广泛了。

您的来函中确信苏联做了什么手脚来推翻阿富汗政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还要

明确强调，阿富汗领导层的变化是阿富汗人自己搞的，只有他们自己。对此，您完全可以去询问阿富汗政府。

您的来函中还提及阿富汗领导人的家庭命运，这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我们所拥有的资料否定了你们的情报。

其次，我还要明确地对您表示，苏联内陆部队没有采取任何针对阿富汗方面的军事行动，自然，我们也不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

您在来函中指责我们在派遣自己的内陆部队进入阿富汗之前没有同美国政府就阿富汗事务进行磋商。允许我问一问您，美国在与伊朗接壤的水域和波斯湾地区，以及其他许多事件中大规模集结舰队和军事力量之前，有没有同我们协商一下呢，至少，您总该让我们知道吧？

鉴于您来函的内容与精神，我认为有必要再解释一遍，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和苏联政府对这一请求的满足，完全是苏联和阿富汗两国间的事情，它们根据自己的协商来调节自己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容忍对于这种相互关系的外来干涉。它们和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一样，不仅拥有独立防御权，同样拥有集体防御权，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也是苏联和美国共同起草的，并且得到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赞同。

显然，您关于我们在阿富汗的行为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论点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综上所述，您来函中一些表达方式和语气是非常不妥帖的，这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以和平的最高利益，而且不必置我们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于不顾地冷静评价一下时局不会更妥吗？

对于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反馈过意见，在此我要重申，一旦促使阿富汗向苏联发出请求的因素不复存在，我们立即就会从其领土上全部撤出自己的数量有限

的内陆部队。

我们给您的建议是：在消除外来武装对阿富汗领土的入侵方面，美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不认为建立苏美间更加稳固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努力最终会徒劳，当然，如果美国方面不想这样，我们当然也不愿这样。我觉得，这样对美利坚合众国自己也无益可言。我们确信，苏美关系成为何种状况是双方共同的事情。我们认为，这种关系不应该在附加因素或者非重要事件作用下发生波动振荡。

尽管在欧洲政策和世界政治等一系列问题方面存在着分歧，对此我们始终做着清晰的解释，但苏联仍然赞同按照我们双方为了平等合作、国际安全 and 世界和平利益而接受的那些有关文件与条约的精神行事。

勃列日涅夫 1979年12月29日

信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关于我们没有参与推翻阿明的官方态度，否定我们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很难说清楚他们指望什么，寄希望于军事行动的所有细节不泄露？其实，所有机密最终都会浮出水面，历来如此。

美国总统把苏联的回答看做是“不真诚”和带有侮辱性的。卡特发表电视讲话说：“比之在我任期内苏联曾经做过的什么，他们这次的行径更意义深远地改变了我对苏联的目的性的看法”。

12月29日，美国大使与西方国家驻莫斯科代表就美国 and 西方对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内政的反应交换了意见。美国大使向自己的同行们通报说，美国的正式抗议照会没有委托给他，估计是白宫通过“热线”直接转达了。交谈中指出，如果注意到苏联是多么热衷于保障自己的区域性安全，那么，他们的迅速撤兵就是不可相信的。美国大使说：“显然，我们无法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兵，我们甚至怀疑是否能利用安理会来谴责苏联，最起码这可能会受到不予理睬，但

我们要力图迫使苏联为侵占邻国而付出沉重代价。”

对于大多数常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外国新闻记者来说，阿富汗事件的披露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在莫斯科的美国使馆人员在记者的追问下也没有掩饰：这个国家的变化令他们措手不及。

西方记者非常积极地搜集事件的有关信息和苏联人民对此的反应。美国《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英国路透社给自己的记者下达任务，要求他们迅速搜集有关阿富汗局势、苏联对事件的反应和赴阿苏军数量和部署等资料信息。

美国总统收到了一份备忘录，安全事务助理提醒他1968年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美国当局采取了哪些措施……。

文 件^① (绝密)

白宫 华盛顿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致总统备忘录

题目：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

我们同苏联相互关系中最基本任务之一从来都是保持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多次对苏联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反对（在远离国界的古巴的行动，以及在越南的军事基地）。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以实际行动来巩固这些口头抗议，苏联人不再认真对待了。

周一，沃伦·克里斯托弗将在伦敦与我们主要的盟友们会见。他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领头人，给他们出主意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阻止苏联毫发无损地侵占阿富汗。考虑到这些情况，您或许可以指示克里斯托弗向这些国家通报我们在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中已经采取的，以及直率地谴责他们行径的那些实际步骤。

^① 机密文件保存中心，编目14。

鉴于您在昨天与欧洲首脑会见时把 1979 年入侵阿富汗同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了对比，那了解 1968 年 8 月 20 日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略后约翰逊和拉斯克采取了哪些措施无疑是有益的（您尽管相信，俄国人也牢记着这件事，他们将考虑到自己所处的那个国际环境而做出部分撤军）。他们也会以同样的目光看待今天国际社会对他们所为的反应，特别是阿富汗的周边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入侵后的三天时间内：

1. 总统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声明。
2. 国务卿发表公开声明。
3. 我们倡议安理会召开会议。
4. 我们推迟与俄罗斯进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双边谈判。
5. 驻莫斯科使馆接到指示大幅度减少官方人员交往。
6. 同样的指示发往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
7. 8 月 23 日，拉斯克告诉多勃雷宁，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没有明朗之前，美俄关系中任何问题都不会有什么进展。
8. 国会极力建议中断同苏联的事务性交往。
9. 对苏联的出口许可证采取推迟、停止或作废的方法。
10. 我们取消参加莫斯科商品交易会。
11. 我们取消了原先已经商妥的文化交流。

诚如您所了解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取消了原来计划好的华盛顿—莫斯科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虽然我反对冻结为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做的努力，但我认为，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如果仅限于口头将是错误的。因此，我将国家安全机构布伦门特的备忘录附在后面，他列举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用来对莫斯科的行

径表示愤慨的手段和措施。如果能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会不胜感激。我坚信，对苏关系的具体变化是莫斯科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的必然后果，克里斯托弗在下周一应该向盟友们通报我们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我认为，不论就对内还是对外而言，这种果断态度只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西方国家中对阿富汗事件强烈否定的是美国。显然，美国当局对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做出果断抨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该地区局势分析和长时间讨论的结果。美国如此迅速和果断地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说明我们没有理解美国人的立场，它把我们的这一举措看做是苏联为保障自己的“暖海出口”走出的第一步，而这威胁到波斯湾的产油国地区，一句话，触动了美国的利益，尽管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目的。

美国当局不安于日趋恶化的美伊关系，以及中近东产油国家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进步，于是得出结论，阿富汗事件会进一步破坏其利益已经处于危机中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认识到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军事介入来支持阿富汗反对派，美国便寄望于利用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以及北约盟国。

美国政府做出决定，迅速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美国同巴基斯坦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磋商，还在北约框架内进行了讨论，分清了美国 and 英国支付一部分费用，其余成员国支付另一部分。其中联邦德国和法国没有接受对苏联采取联合制裁行动的建议，不过，它们赞同美国抗议性地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并表示可以参与针对阿富汗的政治和经济联合制裁。

就这样，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强硬派占据了上风。为了加强区域性安全需要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并加强对盟国的军援，特别是巴基斯坦，另外，还要建立快速反应部队。阿富汗战争之前已经面临政治和经济破产的巴基斯坦变成了“前

线国家”，开始得到来自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

美国在进行这一援助时，避开了本国法律关于禁止向核武器研制国家提供援助的条款。齐亚·哈克政权还得以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加强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作用。

为了使苏联对自己出兵阿富汗付出更大代价，卡特总统在达到了让盟友们——穆斯林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对苏联进行广泛抨击的目的的同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强大压力，决定对苏联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的不同部门开出了制裁苏联的详细清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朵姆将军这样回忆道：“他们对我说，把您在上一轮制裁中的所为忘掉，在新一轮制裁中继续干吧。我召集了商业代表们，建议他们以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禁运条款为原则，严格执行。苏联出兵一个半月以后发现，那些被接收的条款基本上是以我提供的清单为基础的。我有资料说明，对俄国人实行粮食禁运是非常艰难地被接受的。我个人被指责说，难道是我们的疏忽导致了入侵……。”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尔纳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有个人性格方面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会有数量那么庞大的苏联军队要跨过边界线。”驻莫斯科使馆加里松说：“驻莫斯科使馆表现得绝对平静。我们把制裁清单发往华盛顿，后来得知，基本上与中央研究制定的相吻合，例外的只有驻基辅领事馆……。”

1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针对苏联的一整套制裁措施。

文 件^①

摘自致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长的备忘录。

题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80 年 1 月 2 日会议结果。
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

1. 关于审核“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事情只保留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里，必须避免对它进行讨论和表决。凡涉及此事，均保持官方立场：强调此条约的重要性不依赖于美苏双边关系的好坏，但现阶段对其进行表决是不适宜的。

2. 认为就其他双边武器控制条约谈判发表声明是适宜的。如有必要，就公布它们的继续情况。有关印度洋的谈判仍奉行既定精神……推迟原拟下周召开的常规武器谈判代表团首脑会议。

3. 今天公布召回沃森大使。

4. 由国务院出面提议把苏联驻美外交人员数量削减至美国驻苏外交人员的水平，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编制例外。建议还应包括限制苏联官方人员赴美的措施，其程度应相当于美官方人员赴苏的水平。

5. 推迟在基辅和纽约互设总领事馆的筹备工作。

6. 根据国务院 12 月 31 日简报中的建议，“自由电台”、“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要增加播放量，将为此提供必需的资金……要广泛采取外交行动，加强宣传力度谴责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

7. 同阿富汗政府的关系，我们的立场是：现时情况下不保持任何关系。驻阿富汗使馆人员编制缩减至 10 人。暂时不考虑承认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权。

8. 不恢复目前停顿下来的领事谈判。

9. 对于申请入境的苏联官方人员，国务院遵循区别对待原则予以拒签或缓签。

10. 把苏联新闻机构驻美人员削减至美国相应机构驻苏人员的同等水平。

11. 无限期推迟美国货运机向苏联运送磁流体动力机。

12. 不予恢复同苏联就交流的总体协议问题进行的谈判。

13. 取消：原定1月份召开的农业双边委员会会议；原定2月份在莫斯科召开的卫生双边委员会会议；原定1月11日至18日进行的以众议院议员格林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访苏团之行。

14. 必须在极其必要的情况才能进行任何副部长或以上级别的正式会见，而且要严格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

15. 西方盟国关心我们是否参加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的正式立场是：这个问题处于研究阶段，它的解决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立场。

16. 对苏联官方人员在美国境内旅行的限制要严格控制在我方人员在苏期间旅行时所享受的范围。

17. 必须推迟下列会晤：拟于4月份在华盛顿进行的双边贸易委员会晤；拟于1月9日在莫斯科进行的鼓励双边商业行为的谈判；拟于2月13日开始的民用航空谈判；除此之外，苏联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无论如何也不得超过当前协议规定的每周两班。

18. 必须加强对苏联的出口监控。今后的出口供应要严格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我们美国甚至要准备比盟国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地限制出口许可证，前提是类似的行动不会使我们在业务利益方面比自己的盟国更吃亏。

19. 应当就苏联对美国商业的扩张行为进行调查，这里指的是对其进行限制。国务院会在一周内就此提出建议。

20. 根据捕鱼协定向苏联提供的设备和资料应该予以限制。

21. 美国必须，而且在今后仍要促使盟国确信扩大对穆斯林国家和苏联及中亚国家的电视广播量以报道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和盟国一道定期

在联合国出版和散发宣传册，介绍苏联入侵后阿富汗局势的现状和变化。

22. 美国赞同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必须迅速讨论阿富汗问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克·戈列格里已接到指令，如果不违背联合国宪章，他将呼吁其他国家驻联合国代表支持美国关于在本届联大会议上讨论阿富汗问题的提案。

23. (本条解密时被删除)。

24. 将努力说服其他国家今后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25. 同盟国一起努力说服那些有援阿计划的国家取消这些援助计划。

26. 我们将采取措施修改援外法有关条款，使巴基斯坦被排除在禁止核扩散修正案适用国家范围之外，也就是使我们可以向巴基斯坦核电站提供裂变原料。

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雇员西克所言，当得知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后，华盛顿便惊慌失措。我问他：“难道你们就没有立刻反应过来，苏联的行动拱手让给你们多大好处，在解决美国的区域性问题苏联领导人打出了什么将牌吗？对于你们，毕竟有许多事情在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后变得轻松起来了……”。他回答说，他们不知所措正是因为大家立刻就明白了美国可能从中捞得的便宜，并且评论起可能面临的更大的事情。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根据苏联分析专家的看法，1980年1月，美国人念念不忘的是以下几个基本目的：

1. 向阿拉伯国家首脑和人民展示，苏联才是“伊斯兰的死敌”，而非美国；并以此来破坏苏联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阿拉伯地区的阵地。同时，美国将积极煽动怂恿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针对苏联在这

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和他们的合作者的敌对行为。

2. 向北约盟友和日本施加压力，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局面，谴责苏联在阿富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当局认为，这种谴责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为此设想了一些实际措施，直至经济制裁，削减驻莫斯科和喀布尔西方外交人员的数量，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3. 创造条件和环境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阿富汗问题”一案。该提案旨在调查苏联在阿富汗事件中的作用，谴责苏联入侵“一个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保障国际社会对苏联实施孤立。

因此，巴基斯坦会发挥特别作用，它应根据美国的构想，向联合国正式“上诉苏联的侵略行径”。

美国当局的反苏立场得到了参议院中保守派代表的支持。比如，参议员哈雅卡瓦要求卡特总统延缓进一步审核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重新从全局考虑美苏关系，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支持他的参议员沃奈专门致信卡特，呼吁总统把审核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推迟到1981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多尔和得克萨斯州前州长孔奈里均支持参议院对审核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意见，以示抗议苏联在阿富汗事件中的行为。

正当美国当局的众多高级官员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表示失望时，布热津斯基却在着手制订一项旨在利用时局优势改善美国全球地位的规划。

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讨论和与盟国的协商，美国当局采纳的针对苏联的措施集中为下列诸点：

1. 向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谴责苏联无端公开侵略一个独立国家。

2. 在这一侵略行径结束之前，拒绝在国会讨论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3. 暂时冻结所有的双边谈判、高级别人员往来、转售先进技术，给予可能的粮食禁售。

4. 限制美国和欧洲盟国给予苏联的贷款。

5. 美国拒绝在外交上承认阿富汗新政权，北约国家继而支持这一决定。

6. 给予巴基斯坦紧急援助以加强其防御力量。

7. 同索马里和埃及政府就一旦波斯湾和中东地区受到军事威胁时，美国使用设在这两个国家的空军基地的适宜性签署协议。

8. 采取秘密计划，向阿富汗穆斯林起义者提供苏制反坦克和地对空导弹，有可能通过埃及。

9. 鼓励中国向起义者援助机关枪、迫击炮、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

苏联出兵阿富汗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一项叫做“分析”的密令，以使美国的秘密行动合法化，它规定向起义者秘密提供轻型武器。这项计划的关键在于：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向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并对援助情况进行全面监督；由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与起义者建立直接联系。

沙特阿拉伯同意仿效美国提供资金援助，并且也是转交给了联合情报局；政府间级别和私商水平上军火交易在埃及和華沙进行。如此这般，中央情报局在表面上仿佛与其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特尔奈的见证词：“起先，我们过高估计了苏军实力，我想过是否值得支持起义者，因为斗争过于力量悬殊。后来，经过我独自思考并咨询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握有足够的胜率。我们策划了通过巴基斯坦出售武器的秘密行动，而且得到国会的赞同。作为军人，我试图来证明，我们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一定会富有成效。”

“然而，总统本人和当局的上层人物消极地对待这次秘密行动。第一批武器1月10日才运抵巴基斯坦，而我希望在5天之内，我不断对执行任务的那些军官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干得更有效率……。”

关于苏联领导人对美国人采取的措施做出的反应，我以

为，斯梯文·迦尔斯特在《竞争与调解在阿富汗：和解的前景如何？》一文中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苏联的立场：“……对于卡特的做法，苏联的反应是防御性的，而且很‘惊讶’。出兵后不久，苏联代表便对卡特的做法表示了莫斯科的态度：‘如果我们也像美国对待苏联那样，赋予自己权力在美国周围建立和维持链条一般的军事基地，美国会做何反应呢？……’。”

“这一类比道出了苏联出兵的真实原因。他们入侵并非为了那个阿明，苏联谎称是这个阿明请求他们解救阿富汗政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之手。苏联士兵进入喀布尔后枪杀了阿明，组织了比较‘友好’温和、比较好商量的政权。尽管苏联官方活动家担心在反共势力面前丧失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但使他们更为处心积虑的是，事情本身意味着本民族的安危。也许他们认为，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护苏联在阿富汗开始消失的影响，美国人会理解的，因为美国人在事情涉及自身势力范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是这么做的……。”^①

……伊朗宗教政治领导人就阿富汗事件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语调相对温和，这表明了美伊关系的紧张程度和霍梅尼不希望激化对苏关系，以及伊朗感兴趣于安理会讨论对它实行制裁时苏联的“否决权”。

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事件的反应极其强烈，它认为不久以后苏联军队就会越过巴基斯坦边界。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对事件的反应比较激烈。谴责苏联行为的还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苏丹、突尼斯、阿联酋……阿拉伯世界的左翼势力满意地看待苏联的行为。

我们的政府试图列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采取这一步骤的正确性。新闻领域展开宣传运动，支持党和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展示了社会各阶层代表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出兵后的最初一些日子里，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呈

^① 见斯·加尔斯梯尔著《竞争与调解在阿富汗：和解的前景如何？》，《第三世界季刊》，1988年10月，第1505～1541页。

报的一份文件中，对事件做了初步结论，对阿富汗国内局势和前景做了乐观分析和预测。

文 件^① (绝密/特别卷宗)

致苏共中央

关于1979年12月27日至28日的阿富汗事件

由阿明一手策划操纵的政变和枪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的事件发生后，阿富汗局势急剧恶化，开始具有危险性质。

阿明在国内实行了个人独裁体制，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贬低到名存实亡的境地。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属或投身卖靠者。阿富汗政府、革命委员会和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或被排挤出党的组织，或被捕入狱。遭受人身迫害和消灭的基本上是四月革命的参与者，以及那些没有掩饰对苏联怀有好感和在党内生活中维护列宁主义原则的人士。阿明谎称苏联赞同把塔拉基清除出党和政府，从而欺骗了党和人民。

根据阿明的授意，阿富汗国内散布起一股无中生有的谣言，它污蔑苏联，中伤苏联在阿人员，并且设立了种种限制来约束他们同阿方代表的接触。

与此同时，存在着经过阿明圈定的“更平衡的对外方针”框架内的同美国人建立联系的尝试，阿明同美国驻喀布尔临时代办保持着秘密接触。阿富汗政府开始为美国文化中心的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阿富汗的情报机构也遵照阿明的指示，停止了针对美国大使馆的工作。

阿明妄图通过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头目的妥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还通过亲信同右翼的穆斯林反对派头目

^①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120，卷宗44，第22～26页。

接触。

政治迫害的规模越来越大。仅仅在9月事件过后的这段时间里，在阿富汗未经侦询和审判就被枪杀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和其他被怀疑反阿明的人士已经达到600多人。这实质是在毁灭一个政党。

所有这一切与阿富汗特色的条件和客观困难综合在一起，使革命进程的发展处于极端沉重的状况，导致了反革命势力猖獗。他们实际上已控制了国内的许多省份，并利用阿明在位时规模发展越来越大的国外支持，根本改变了国内军事政治形势，极大程度地毁灭了革命成果。

统治的专制手段、迫害、大规模枪杀和无视法规引起了国内的广泛不满。首都开始出现大量传单，抨击现政权反人民，号召统一起来反对“阿明集团”。不满情绪也在军队蔓延，相当一部分军官对外行的阿明走卒们的强权势力表示愤慨。实际上，国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反阿明阵线。

侨居国外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阿萨杜拉·萨尔瓦里表现出对国家独立和革命前途的担忧，他们敏锐地感觉到阿富汗国内反阿明情绪的增长，于是确立起为挽救祖国与革命，团结一切国内外反阿明组织的方针，同时注意到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原“旗帜派”人士在秘密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为团结包括原“人民派”塔拉基追随者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而建立的大量业绩。

原先存在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派别分裂都被消除了。以萨尔瓦里为首的“人民派”和以巴布拉克为首的“旗帜派”宣布党实现了最终的统一。巴布拉克被选举为新的党中央领导人，萨尔瓦里成为他的副手。

当时的情况是，四月革命成果和我们民族自身安危利益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向阿富

汗继续提供军事援助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前阿富汗政府也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根据1978年苏阿条约的相关条款，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必要的和数量有限的苏军部队。

在苏联严格按照1978年苏阿条约有关条款派出自己的军队后，广大阿富汗居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反阿明派于12月27日夜至12月28日晨组织了武装进攻，推翻了阿明政权。这次行动得到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军官和国家机构的广泛支持，他们一致同意建立党和国家的新领导机构。

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原“人民派”和“旗帜派”两派代表、军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新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宣布，要为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帝、反封建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在对外关系方面宣布了全力巩固同苏联友谊与合作的方针。考虑到原政权的过失，新政权在自己的实践中有意认真关注社会生活的更广泛的民主化，保障法律，拓宽社会服务，巩固地方政权，对宗教、部落和少数民族奉行灵活的政策。

吸引阿富汗社会注意力的最初的做法之一就是释放一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其中包括阿富汗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卡德尔、克史特曼、拉菲等）满怀热情地积极参与了新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活动。

广大人民群众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地对待阿明政权垮台，并表示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公布的纲领。阿富汗军队的主要军兵种指挥官均宣布支持新的政党。对待苏联军人和专家的态度依然是友善的，国内局势开始实现正常化。

喀布尔的政界认为，巴布拉克政府面临着解决许多前政权遗留下来的极其困难的内政和经济范畴的问题，同时相信，在苏联的援助下，人民民主党会完成这些任务。在能够冷静客观评价局势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中间，巴布拉克是理论造诣较深的一位，他始终真诚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在国家和广大党员中间享有崇高威望。有鉴于此，我们相信阿富汗新政权能够为国内局势的完全稳定寻找到有效途径。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基诺夫、
波诺玛廖夫 2519-A 1979年12月31日

文件中引证的实例归结为一点，就是阿明乃阿富汗局势恶化的根源。但这种看法仅仅是表面的，因为根源不仅仅在阿明身上，尽管他的行为招致了极大损失。谁也说不清，如果阿明继续留位政府首脑，阿富汗的局势会如何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能否强大，特别是极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的个性。当个性强而有力时，国家就会蒸蒸日上；反之，国家就会衰败，甚至彻底崩溃。综合所有分析，阿明是个性很强的人，他未必就会脱离苏联。然而，情报部门关于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瓜葛的资料对苏联领导人做出判断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难道可以允许采取社会主义方针的我们的友好邻国之首脑是个同美国有联系的人吗？虽然出兵以需要援助阿富汗反击外来侵略为理由，但透过间接的迹象可以肯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是迫使阿明离开政权，进而推举卡尔迈勒执政。

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苏联出兵和迫使阿明下台立刻被看做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人在采取经济和政治制裁措施的同时，还做到了在联合国谴责我们。苏联领导人曾试图缓解高涨起来的抗议声浪。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雅诺夫斯基接到指示：“如遇图谋把我们在阿富汗行动的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的行为，坚

决予以制止，阻止其被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并且强调，这个问题是苏联与阿富汗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他们自己会加以调解……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款，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反击外部侵略方面拥有国际公认的权利请求苏联援助和支持，而苏联拥有权利予以这样的援助和支持……”。

不过，安理会还是就阿富汗问题召开了会议。在飞往纽约之前，阿富汗外长沙赫·穆罕默德·朵斯特于 1980 年 1 月 4 日顺访了莫斯科，同葛罗米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葛罗米柯就阿富汗外长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的性质阐述了苏联的建议。根据有关方面的愿望，萨夫龙丘克也飞往纽约，以便给予朵斯特咨询协助。

1980 年 1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与会国家谴责了苏联的行为，要求我们撤出军队（投票表决时 104 票赞成，反对和弃权的共 48 票）。此后，阿富汗问题被经常提到联合国进行讨论，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留驻数量有限的军队的票数虽然有所变动，但从来没有低于过 100 票。

1980 年 1 月 1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们出兵阿富汗做出了初步总结。

文 件^①（绝密）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80 年 1 月 17 日

No P179（独份）

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

与会的有安德罗波夫、戈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佩尔谢、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基诺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杰米契夫、库兹涅佐夫、波诺玛廖夫、索洛缅采夫、卡皮托诺夫和多尔吉赫同志。

……

①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藏 3，编目 120，卷宗 44，第 42～44 页。

8. 阿富汗局势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你们知道嘛，几个月以前，由于阿富汗事件，我们责成由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向政治局通报有关情况，如有必要，就准备相关文件提交政治局。

我要说，这个委员会工作得不错。最近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落实了相关措施。

我觉得，阿富汗的局势还远没有达到放弃经常不断的监督和相应作战手段的程度。所以，我认为，不必再组建其他什么委员会，只需要责成现在的这个委员会保持原有的那种工作精神继续干下去就是了。

对此建议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

那么，从现在起，政治局的这个委员会仍按照原来的人员组成从事工作。

葛罗米柯：阿富汗领导层正在联合各派力量，他们经常找我们征求建议，我们就告诉他们。他们发言都是有稿子的。战事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也没有恶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军队支持阿富汗现领导人。

围绕阿富汗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美国的喧嚣有所减弱，北约没有就对苏联采取措施达成一致。起码，西方国家没有都跟着美国人走，其中有联邦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它们没有采取美国人在制裁方面的一些做法。

联合国大会已经结束。3天内发言的代表很多，不过应当指出，赞成决议案的104个代表团中，有不少并非心甘情愿，而反对和弃权的国家有48个。这实际已是三分之一了。也就是说，美国仅仅纠集了一帮反动势力，指使它们对决议案投了赞同票。

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中存在着某种消极因素。不过在这同时，还有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国

家，仍向苏联出售粮食，没有附和美国人的做法，加拿大也如此。

勃列日涅夫：万斯提出反对美国参加夏季奥运会。

葛罗米柯：是的，万斯是非正式地谈出这个想法的。不过，对于各种各样的活动，英国人的可塑性很强，他们容易受影响。德斯坦发来信函，内容不错。伊斯兰堡要召开伊斯兰会议，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建议他不要离境出国。

安德罗波夫：最近10天，阿富汗建立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任命了总检察长……工作中存在着特别大的困难，因为这里有不同的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的分歧仍然很明显。当然，要密切注视党内动态，使之达到符合我们所建议的精神的统一。苏共中央的信函他们在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起草了有关建立基层组织的相关指示。

部落在那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说服他们站到国家领导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有3支非常有代表性的部落声明支持巴布拉克政权。为巩固统一，巴布拉克在进行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在同宗教活动家建立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进展。

乌斯基诺夫详细汇报了阿富汗领土内各地军事态势；说军事态势从全局来看，基本是令人满意的，叛乱分子方面用以抵抗的基地现在是大幅度减少了。

波诺玛廖夫介绍了建党和巩固团结统一方面所采取的有关措施，汇报说昨天向阿富汗派出了以戈列科夫为首的16人专家小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方同志的建议。党的领导层内已经拥有骨干力量。

勃列日涅夫：建议把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同志就这个问题汇报的情况备案。

责成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和波诺玛廖夫同志就审查准备与阿富汗局势有关的资料继续工

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应提交政治局。

大家都表示同意。

苏联官方没有重视国际社会对我们出兵阿富汗的批评，反而立刻致力于消除由阿明招致的损失。主要的努力旨在扩大卡尔迈勒政权的影响范围和社会基础，这集中在表现3个方面：采取更适度的改革步骤；限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反对派力量的援助；阻止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基地的伊斯兰反对派武装人员对阿富汗的渗透。

对于我们出兵阿富汗，美国当局的观点在1980年1月初的一份情报报告中有所反应：“……促使苏联走出这一步的关键的和具有催化作用的原因是，使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更接近于成功。操纵阿富汗想必是朝统治亚洲次大陆和获取印度洋陆路通道迈出的重大步骤。”显然，美国人真的相信苏联军队会进入巴基斯坦和伊朗。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证实说，出兵以后，美国国务卿万斯曾经问道：“你们想进入巴基斯坦和伊朗，这是真的吗？”对此，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我来讲，完全可以让你们相信：这样的目标在当时是我们完全力所不能及的。我供职于总参谋部，从来就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计划。

毋庸置疑，苏联科学院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的东方国家研究专家之一格奥尔基·米尔斯基教授描绘了一幅很现实的画面：“可以说，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来管理国内事务，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在国际事务领域的表现亦如此。没有任何科学的、客观的、与国际局势相关联的思辨，就做出重大决定。”

“其实，在各个层次上都缺乏这样的分析。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均认为，圣战者是抵抗不了苏军的，他们或许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被歼灭。尽管由于邀请外国军队来挽救自己，喀布尔政权会部分地丧失自己的威信，但能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一切都会被淡

忘，阿富汗便会按照‘四月革命’确立的道路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历史会证明我们无罪’。虽然我和我的同行们在国际方面没有找到什么充分的理由来为出兵辩解，但我们仍然认为，事件的进程将会改变当时的情况。而这恰恰证明我们错误地分析了局势：我们出兵后，阿富汗国内的抵抗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增强。”

“我以为，如果党内斗争的获胜者是塔拉基，他也会寻求苏联出兵援助。对于拿枪的、反对喀布尔政府的那些人来说，塔拉基和阿明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区别：这是一个相悖于他们想象中的喀布尔政府的体制。倘若塔拉基执政时我们出兵，就可能不会引发1979年12月里仿佛一颗炸弹轰然爆炸于全世界那样的戏剧性效应。西方的第一个反应是：进入阿富汗以后，俄国人朝印度洋、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跳跃出了第一步。我还记得，在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自己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劝说他们放弃这样的观点……。”

如果我们的分析专家和东方学专家都不称职的话，那对于做出出兵决定的苏联领导人就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他们视自尊与意识形态定理最重要，他们指望按原则行事就能在冲突中获胜，以为历史不会审判胜利者。而那些为了自尊而令人民去赴汤蹈火的政治家，向来或迟或早地被人民所唾弃。

政治家们没有十分重视分析专家、军界人士和东方学专家做出的结论和预测。对此，可以依据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分析笔记《70年代对外政策总结的若干思考（提纲）》摘录进行评判。这份资料由博戈莫洛夫院士签批，于1980年1月20日递交苏共中央和苏联克格勃：“苏联出兵并没有使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减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明显加强了在居民中间的宣传工作，并且利用起反抗外国军队斗争的新口号。图谋把一切伊斯兰战斗队联合成为反政府和反苏的统一阵线的举动活跃起来。”

“苏联出兵以后，美国及其盟国、一部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以及中国都公开声明支持和援助反对派。这种援助过

去就存在，现在则极大地增长了。阿富汗在国际社会处于被孤立境地，它只能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的支持。”

“在阿富汗动用军队，使我们的政策……超越了‘第三世界’发生冲突时认可的界线。较之我们利益所受到的损失，这次行动带来的好处是得不偿失的：

1. 两条战线对抗——在欧洲对抗北约，在亚洲东部对抗中国——这等于在苏联南面出现了第三个军事政治紧张的策源地，而且是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不利的情况……。

2. 从西方到东方，环绕苏联的反苏国家阵线实现了可观的壮大和意义深远的合作。

3. 苏联对不结盟运动，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影响大大降低。

4. 裁军受挫，限制军备竞赛的政治前提消失。

5. 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压力急剧增长。

6. 以破坏苏联在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舆论中威望为目的的西方和中国的宣传机构获得了有力的王牌。

7. 阿富汗事件将长久地消除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前提。

8. 这一事件成为美伊关系缓和，以及克服双边紧张关系的催化剂。

9. 加深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对苏联的不信任，以及它们对苏联的疏远。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出版物中，对于苏联在阿富汗采取行动一事，也第一次出现了保持沉默的迹象。从中不难发现上述国家领导人对参与苏联的大规模行动的担心和社会心态的反应，而参与这种大规模行动，我们的伙伴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10. 西方列强的区别对待政策进一步深化，而且转变为积极介入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领域的策略，并在它们之间的利益不相一致或发生矛盾时进行公开的赌博。

11. 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成为苏联的沉重负担……。”

笔者认为，这些论证都是明确而清晰的。重要的是，这一分析的完成和向苏联领导人的递交也十分及时——立刻住手、迅速撤军都还为时不晚。顺便要说的是，美国人很善于在这方面做文章，并取得成功，甚至仅仅在分析的基础上，就能洞察到出兵阿富汗把苏联拖入的那个无底洞到底有多深。毕竟还有其他途径的论证和事实。

由阿尔巴托夫院士领导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然而，他们的论证统统被推翻。党务官员、思想理论家和所谓的阿富汗问题专家们援引的、有利于军事介入的论据在政治家眼里却是极有分量的。此外，文中所提到的那份分析笔记惹恼了苏联的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其作者们从此长期受到当局的冷落。

不言而喻，被迫去作战的不是那些决定出兵的政治家们，而是那些士兵、士官、尉官、校官，以及预言了这一步是没有前途的那些将军们。向来如此，军人们总是别人失误下的人质。那些“谋士”和政治家中间有谁受到损失了吗？或者承担起出兵阿富汗的责任？

恰恰相反，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后来竟作为“原告人”出面控诉，推出一个论点——把错误全部归罪于那些在战场上以自己的“无能”行为断送了崇高理想的人。“车臣战争”中的某些情况与此如出一辙。

文 件^① (绝密/特别卷宗)

№181 记录第 34 条款附件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阿富汗事件中进一步采取措施

保障苏联国家利益

包括军援在内的苏联给予阿富汗的及时帮助和巴布

^① 秘密文件保存中心，类别 89，编目 34，卷宗 3，第 8 页。

拉克·卡尔迈勒政府执政创造的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必要条件，最终排除了中东局势发展的若干危险因素。

事件的进展同时表明，美国及其盟国把最大限度利用阿富汗事件制造反苏气氛和为使力量均衡朝着有利于自己转变的、敌视苏联的长期对外政治方针进行辩解当作自己的目的。西方向阿富汗反动势力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保障，指望能扩大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冲突。他们认为，这样便可以使苏联陷入这个国家，从而消极地作用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

保障苏联利益和广泛的对外政治利益是非常必要的，它要求我们今后在履行与阿富汗事件有关的事务时保持进取精神。在研究分析和落实中，以遵循下列原则为宜：

——在对美关系以及国际事务中，要以不偏不倚的坚定路线来对抗卡特当局的挑拨性行为。虽然华盛顿今后仍然是反苏活动的牵头者，并将努力使盟国的行动具备协调性，但我们会根据适当结构的苏美关系之复杂化特点来实施自己的反措施。

——加强对北约个别美国盟国的影响，首先是法国和联邦德国，它们与美国在选择如何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做出回应措施的立场上出现分歧，我们要以我为主地充分利用这一点。

——注意到美国和中国把苏联出兵阿富汗作为两国在反苏基础上进行接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必须制定长久的措施来使北京和华盛顿的相互关系复杂化，具体的就是阻挠所谓的美中日三国联盟框架内的关系发展……。

——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敌对攻势的重要精力应该集中在中东和中近东的伊斯兰国家，首先是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印度那一类在亚洲有影响的国家。要积极阻挠美国实施结成欧洲与部分伊斯兰国家的统一战线，使

伊斯兰狂热分子转变方向进入反苏轨道的方针。

考虑到美国和中国试图积极利用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叛匪武装的重要基地都位于这个国家领土内等因素，所以要不断对齐亚·哈克政权施加压力，包括使用特别渠道，迫使他采取措施限制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叛匪活动……。

鉴于阿富汗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于阿明一伙人的犯罪行为在一部分阿富汗人心中造成的反苏情绪，显然，在阿富汗国内实现局势稳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未来几年内，巩固人民政权和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保障党内的真正统一，能不能在统一战线框架内实现所有进步力量和民族爱国力量的联合。

因此，为实现四月革命的目标，为落实我们就发展经济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对阿方提出的建议，要给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基本原则如下：

——始终不渝地在党的生活和党的建设中落实苏共中央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公开信中就党的统一问题给予阿富汗同志建议的方针和路线。在中央和地方揭露和孤立那些可能抵制既定方针路线的人，消除他们在党内的分化瓦解影响。

——在解决建立以人民民主党为核心，真正广泛代表左派和民主组织的联合阵线这个问题上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加强党对阿富汗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影响，建立一整套文化体育和其他组织来协助青年团的工作。

——致力于发展和巩固阿富汗进步的社会政治基础，加快起草和通过新宪法，为部落和少数民族代表能够享有充分权利地参加地方委员会和社团工作创造条件。

——与阿富汗比较有实力的尚武部落首领和长老建立联系并进行谈判，寻找途径迅速就他们停止反政府斗争的条件达成妥协。对反动部落阵营采取分阶段的攻势，对社会有产阶层和不同的部落要采取区别对待政策。

——制订一个对穆斯林宗教界进行长期工作的计划，以吸引温和派的穆斯林知名人士与政府进行合作；孤立宗教界的反动势力代表；与穆斯林什叶派建立联系，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经济）歧视他们。

——采取调整措施，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正常化，首先要改善农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国有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的平衡与互利的合作。要在维持国家监控的前提下，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乃至生产领域内为中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要全面做到：

——在实现对外政策纲领和为巩固阿富汗对外政治地位而制订的未来计划方面，要协助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人。

——在军事建设领域要给予全方位的实际帮助，这里指的是尽快建立起具有战斗力的、组织良好、装备精良的人民军队。促进人民民主党巩固自己在军事指挥部门中的地位，加强在军队中进行忠实于阿富汗人民政权的思想教育。

——鉴于许多复杂的任务必须由阿富汗的情报部门来解决，所以，通过所有渠道对阿富汗地方和中央的民警、内务和安全部门给予必要协助的工作计划要尽快落实。

——考虑到1980年春季阿富汗各地的起义活动可能进一步活跃起来，以及阿富汗人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性，需要同阿富汗政府和国防部进行磋商，并签订一个相关的协议书，以确定苏军在阿富汗逗留的法律依据和

法律地位。

请审理。

葛罗米柯（外交部）、安德罗波夫（克格勃）、
乌斯基诺夫（国防部）、波诺玛廖夫（苏共中央）

№210-A 1980年1月27日

1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审理了上述提议，并建议在研究处理阿富汗事务时遵循其精神。

实际上，阿富汗的局势比莫斯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同时，并非所有方面在确定采取“行动”时都得到了应有的注意和考虑。认可行动计划的人当中，不是所有人都对阿富汗的历史发展、各党派与宗教界之间相互关系这些问题具有清楚的了解；况且没有去注意阿富汗人的一些品质特点，比如极端个人主义；一个人信赖和忠实于另外一个人（家庭成员或是部落酋长和首领）；对别人不信任；除了宗教，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思想；宗教狂热主义等等。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确破坏了这里业已存在的军事战略平衡。在大规模对抗的条件下，这不可能不留下痕迹。西方以大规模向阿富汗反对派和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装备和加强对该地区战略要地的军事介入迅速填补了这一力量失衡。

事件的发展进一步表明，美国及其盟国对阿富汗问题感兴趣的程度，恰恰同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它们加强与苏联对抗的方针相一致。美国人一面施加各种压力，一面力图把这一局面作为自己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加以利用，展开广泛活动，欲使苏联威信扫地。为此，他们不懈努力吸引大型国际组织加入其中，这包括了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

作为归纳，我要补充说，做出对阿富汗动用军队的政治决议机制受到新闻媒介的全面抨击。但这个教训并没有使我们引以为戒。1994年年底，俄罗斯政府为恢复车臣共和国境内的宪法秩序，做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时，差不多也是

这种情况：没有对局势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局势发展做出预测，造成同样的社会政治和战略目的的不明确性；在对冲突的根源、性质、规模和解决方式的分析评价方面，有关部门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作战行动的计划 and 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宣传信息保障混乱一团等等。这种状况是如何造成的？谁都知道。

1980年1月里，由图哈林诺夫中将指挥的苏联部队占领了阿富汗的重要地区，并和阿富汗政府军一道捍卫着行政中心、至关重要的建筑物、飞机场和重要交通干线：海拉通—喀布尔、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贾拉拉巴德、普利—胡姆利—昆杜兹—法扎巴特。苏阿合作项目也得到了可靠保护，那里居住和工作着苏联民用项目的顾问和专家（贾尔库都克和什巴尔加的天然气工程；苏鲁比、纳戈卢、普利—胡姆利和喀布尔的发电站，以及玛扎里—沙里夫的工厂，萨兰戈的隧道）。我们的部队一共保卫着21个省和许多乡镇中心的安全，还有11个飞机场（喀布尔、巴格拉姆、申丹特、坎大哈、昆杜兹、贾拉拉巴德、加尔吉兹、赫拉特、法扎巴特等）。

补充重要的一点：出兵是在冬季，即最艰难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教训也没有被汲取，从阿富汗撤军的完成阶段也是在冬季）。作为进入阿富汗的首批部队战士们，忍受了全部艰难困苦和战争带来的物资短缺匮乏。军医们不得不经常冒着刺骨严寒或者顶着40度的酷暑在帐篷里长时间地做手术，他们经常在手术台前晕倒。战士们经常在光秃秃的石头或雪地中搭建帐篷，安排自己的生栖之地，设置哨所，站岗放哨；在向南方推进过程中，在戈壁荒滩、绿洲河谷兼作驻防军；自己携带食物、汽油、弹药和淡水。

出兵的准备仓促至极，大家非但没有进行作战训练，甚至对阿富汗的严冬都毫无防备。对部队的安置也达不到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再加上军事政治、地理和流行病的复杂条件，就会明白官兵们落入了怎样一种困境。



第40集团军被迫参战

1980年1月初，驻扎在北部居民区纳赫林的阿富汗武装力量第4炮兵团起义倒戈。有情报说，在该部服务的苏联军事顾问被扣押，或许也有伤亡。应阿富汗政府请求，并且为了营救仍活着的苏联顾问，驻阿苏军进行了第一次军事行动，对叛乱团实施围困缴械。参加行动的有第2机械化步兵营、加强坦克连、第1机械化步兵营第2连等部队……。

第一次战斗暴露了我们的指挥员、参谋人员和战士们在军事素养和战术训练方面的消极环节和许多不足。尽管如此，在这次战斗中他们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勇敢果断和高超的射击技能。立功的有坦克排排长希科夫上尉，他第一次开火就击毁了敌方的两门火炮；由伊万尼科夫上尉率领的掷弹筒排，击毙了20个叛乱分子……第186机械化步兵团第2连最先进入居民区，封锁了叛乱炮兵团所在的军事城堡。

苏军指挥部门原来以为自己的介入会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迅速地稳定政权，部队可以用作卫戍，但这个打算没有灵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于我们的介入只做了消极抵抗，而阿富汗人却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阿富汗政府希望合情合理地使苏联的有限部队卷入其内战，这又恰恰催化了阿富汗人的军事行动。莫斯科不断收到喀布尔的电报，要求协助镇压叛乱分子的进攻，苏联领导人又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尽管心里指望着苏军的逗留是暂时的。

多勃雷宁证实说，1月底他离开莫斯科返回华盛顿之前曾经拜访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总书记说两个月以后苏联就会从阿富汗撤军。我认为，事情如果真的有这个转折，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这并没有发生。苏军开始参与阿富汗政府一面的军事行动，并且一下子延续了许多年。

1月31日至2月1日，安德罗波夫化名访问了喀布尔。

在当地研究局势过程中，他会见了卡尔迈勒、萨尔瓦里、古里亚博佐伊、瓦坦扎尔、努尔、泽拉伊、卡德尔等，同他们交换了意见。2月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理了安德罗波夫此行的总结报告。根据他的分析，阿富汗国内形势依然是复杂的，新政府为稳定局势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向政治局成员汇报了与阿富汗领导人的会见和交谈，以及同他们探讨巩固党的地位，迅速纠正以往过失、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等情况……当涉及撤军问题时，许多苏联领导人表达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文 件^① (绝密/独份工作纪录)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80年2月7日

由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

与会的有安德罗波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基诺夫、戈尔巴乔夫、杰米契夫、库兹涅佐夫、波诺玛廖夫、贾皮托诺夫、朵尔基赫、泽米亚宁和鲁萨科夫同志。

……乌斯基诺夫：尤里·符拉基米罗维奇阿富汗之行的通报非常详细。但是我想说，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谈论有关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我觉得，需要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阿富汗的局势才能稳定下来。在这之前，我们根本就不能考虑撤军，否则会惹出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我们甚至应该稍微增加一点驻阿部队的数量。

葛罗米柯：依我看，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毫无疑问，一段时间过后，会从阿富汗撤军的，毕竟现在出兵也是应阿富汗政府要求、依照协议进行的。假使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120，卷宗44，第77~80页。

中国、巴基斯坦等国停止了敌对宣传，我们就可以有所变通地实现全部撤军。我觉得，在允许撤军的情况出现后，我们应该考虑确定一些双边条约性的义务。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就是再也不会有敌对势力侵犯阿富汗。所以，我们要保障阿富汗的彻底安全……。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弄不清楚自己的处境，更不知道这样下去会给苏联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以为，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具有说服力的是决心和最后结果，其他都是暂时的。而他们需要的结果恰恰没有，也不会出现……当他们明白时，为时已晚。

2月底再次讨论了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据说是勃列日涅夫提议），认为推翻阿明，巩固阿富汗的卡尔迈勒新政权，这些基本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但由于种种客观情况，没有着手撤军。反对撤军的有乌斯基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可能是弃权）。根据总参谋部的有关档案（由于未解密，所以无法公布），他们认为，当时撤军就是表明对美国侵略政策的退让；会使在苏美关系和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中强硬路线的拥护者加强自己的立场；会丧失苏联的威信，丧失苏联真心签署的那些条约的威信；引起阿富汗局势的进一步混乱；进而可能最终失去阿富汗；使穆斯林极端分子在苏联边境地区迅速发展。所以，建议要根据阿富汗党政军的巩固情况、国内政局的稳定情况，在晚些时候再讨论撤军问题。

1980年3月起，部分苏联驻阿部队开始加入库纳尔省的军事行动，从此卷入了阿富汗内战。尽管他们卓有成效地扼制住了反政府武装的猛烈攻势，但就整体而言，在阿参与军事行动的程度从此再也无法控制。叛乱活动一年比一年扩大，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明年将是我们反对叛匪斗争出现转折的关键一年……。”

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

同时，阿富汗政权的敌人也展开了对苏联军队和其使命的造谣中伤，号召人民起来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根据阿富汗局势的变化，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就苏联今后的方针政策拟定了自己的建议，并在4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通过（№191记录，第4条）。

文 件^①（绝密）

致苏共中央

就阿富汗局势及其围绕它的有关情况

汇报一下我们对今后的一些设想

1. 1979年12月向阿富汗派出数量有限的军队以后，这个国家事态的发展证实我们的行动是及时和正确的。它挫败了推翻阿富汗革命政权的阴谋，防止了在苏联南疆出现一个新的军事威胁策源地；结束了阿明奉行的旨在诋毁四月革命目的和任务，放弃同苏联的合作，并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冒险路线，拯救了人民民主党、军队和政府部门一批忠于革命的干部的生命。并逐渐创造出条件，使原来“人民派”和“旗帜派”的成员以及民族民主力量和爱国势力代表积极投入革命改革。

在苏联的全面援助下，以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新领导人在巩固国内局势，反对内外反革命武装进攻，铲除阿明统治遗留的恶果，赢得部落和其他阶层居民信任等方面基本上正确地制定了任务，并且进入落实这些任务的实质性阶段。

2. 但是，阿富汗的局势依然紧张而复杂。在人民民主党缺乏真正的团结统一、党和政府部门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软弱无力（特别是在地方，根本不存在政权的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82，卷宗176，第9~17页。

下级机构)的情况下,在经济困难日益增长、阿富汗人民警察和武装力量仍不具备足够战斗力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表现特点是得到外部怂恿和积极支持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但仍有不少诸如同穆斯林宗教界、部落领袖和中小资产阶级改善关系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地改革尚未结束,特别是在国家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3. 在控制国家局势方面,驻阿苏军发挥着决定性的协助作用。他们在许多省份同阿富汗武装力量一起有效地开展消灭武装叛乱组织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重创了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减轻了新政权受到的军事威胁。

可以预见,在业已拟定的军事行动计划之后,将会出现一个即使有外来援助反对派武装力量也未必有能力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相当长的阶段。对此可以表明的是,反革命势力现在已经被迫改变策略,在军事行动和恐怖活动中仅使用小股人员,同时把赌注投在对交通、食品供应和经济活动的暗中破坏,煽动宗教和民族主义,以及反苏情绪、仇视政府、不信任政府作为等方面。然而,还不能排除反革命势力企图在个别省份开展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

4. 在当前这种条件下,目标坚定、始终不渝地落实旨在使人民民主党队伍实现真正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统一团结,加强其在国内影响力,联合民族爱国势力,建立有效率的地方政权,提高人民警察、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战斗力,解决首要的经济任务,改善与部落首领的工作措施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这些任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就无法切实地巩固革命成果。

5. 同时,驻阿苏军应该继续履行以下任务:保卫阿富汗的革命制度,使其免受外来威胁,与阿富汗军队

共同封锁边界，保卫主要交通要道和城市中心的安全以及阿富汗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和提高战斗力的工作。只有随着阿富汗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周边地区形势的缓和，以及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才能考虑我军从阿富汗逐渐撤出的问题……。

葛罗米柯 安德罗波夫 乌斯基诺夫

扎格拉金 1980年4月7日 №0304/rc

一场战争就是一场悲剧，而内战则是双重悲剧。通常，一个国家如果参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战，那它将对所有的损失和失败负起责任。我们且不去谈论圣战者，就连那些长期依靠苏联军队支持的人后来都力图把阿富汗的一切毁灭和牺牲归罪于苏联。

1980年2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152-45号命令，它确定了经费问题，并规定给部队的人员编制给予优待。这样，苏军长期驻扎阿富汗的问题便明朗化了。抽调军官干部和现役军人替换义务兵和预备役军人的工作迅速展开了。干部人员编制整体轮换工作的完成情况是：校官在1980年11月前，士官和战士在3月前。一共调换了33500人，其中校官2200人，士官和战士31300人。对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的所有车辆和技术装备都进行军事化改装。

进驻阿富汗的师级部队的编制都是满员的，其中包括了坦克部队、导弹部队、高炮部队……这是不是总参谋部的失算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因为解释出兵动机的理由之一是，反击外国对阿富汗的侵略。“曾经提出过”可能要同阿富汗邻国的常规部队作战。

当清楚了谁也不准备公开进犯阿富汗、对手只是没有装备飞机的叛乱游击部队、重型武器在山区作战发挥不出威力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达命令调回了大部分坦克、导弹和高炮部队。

文 件^① (绝密)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记录摘要 №200/VI

1980 年 6 月 19 日

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处理方案

(解密时第一条被删除)

2. 确认撤出部分作战部队是适宜的, 因为目前情况下它们留驻阿富汗已无必要。有关这些部队从阿富汗撤出的编制、期限和程序方面的问题, 责成国防部落实解决。责成安德罗波夫同志同卡尔迈勒协商从阿富汗撤出部分苏联军队的问题。

3. 以从阿富汗部分撤军为契机, 要求巴基斯坦和伊朗停止针对阿富汗的敌对行动, 停止源自他们领土的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

中央委员会书记 勃列日涅夫

为了削弱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 揭露美国在阿富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并使它信誉扫地, 苏联酝酿着采取一些官方性的宣传措施。

其中, 下达给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和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 抓捕在阿富汗境内反对派武装队伍里活动的美国人, 在叛乱分子俘虏中查清那些在巴基斯坦受训期间与美国情报人员有接触的人。然后在喀布尔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揭露美国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的真相……。

1980 年秋季, 叛乱分子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山区构筑武器弹药库、食品物资储藏库, 为在洞穴里过冬做准备。随着寒冷的来临, 相当一部分叛乱分子扮装成当地人潜入居民区, 对党务工作者和新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 制造障碍

① 《俄罗斯总统档案》, 馆藏 3, 编目 82, 卷宗 176, 第 101~102 页。

阻挠新政权向自己控制的地区运送粮食。他们还在当地居民中间积极展开反政府宣传，破坏青年人应征入伍，以杀死应征者家人、毁掉其房屋来恫吓威胁，有时还强迫青年人参加反政府武装。



阿富汗人民不接受人民民主党的独裁

1980年4月，四月革命后由“人民派”更改的国旗颜色又恢复成原来的三色，国徽亦如此，以表示忠实于国家的传统颜色。

表面上看，卡尔迈勒是积极的，他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会见社会各阶层代表，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然而，他没有去过任何一个省，没有下过任何一支参战部队。这样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给政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积极变化。

尽管国内政局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积极的，但改革步伐过于缓慢，遇到了大部分居民的抵触：仍然是没有考虑到农民利益。反对派开始更加强烈地反对那些支持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人士。第40集团军侦察队队长的报告说：“针对党政部门和安全、警察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支持卡尔迈勒政权人士的恐怖活动的规模已相当广泛。今年4月，全国发生38起这样的暗杀事件，63人死亡。而在5月，这一数字增加到112起，死201人。”

“侦察员在塔鲁坎地区截获了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指示，它要求叛乱者继续避免同正规部队接触，要巧妙地伪装成普通百姓。”

“叛乱分子伪装成阿富汗政府军和民警进行活动的事件频繁起来……。”^①

卡尔迈勒的政策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人民民主党继续通过使用强制手段推行自己统治国家的方针，同时极力使苏联军队去履行围剿讨伐职能，这样就激化了叛乱地区百姓对苏联的仇恨情绪。

老百姓并不接受人民民主党的改革，因为各地的“人民政权”都是通过强迫手段确立的，生硬地推广一种陌生的政权体系来替代传统的政权体系。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带着一帮人来到某个省会或者县城，这些人就是所谓新政府的“奥尔加德罗”（意为人民民主党书记、省长、警察局长、安全局长等），于是，先前在地方政府拥有职权的那些名流就被武断地排斥了。新政权的那些“奥尔加德罗”基本上是被人民大众唾弃的，所以也就成为非稳定因素。在那些无军队驻扎的地方，类似的政权几乎在转眼间就会被“消灭”：山民自古以来就奉守这样的信条，只有驻扎着军队时外来人才能在当地掌权，军队的撤离是外来人执政终结的标志。所以，在那些没有驻军的地方，有的是喀布尔派来的“奥尔加德罗”自行撤离，有的则被反对派消灭。对此，阿富汗政府一定要回敬，它必定会强制性地恢复丧失的“奥尔加德罗”，再次将军队派回。这样的过程能循环反复多次。对这一情况，可以根据苏联驻阿富汗民族与部落事务部顾问普罗什列佐夫致苏共中央乌里扬诺夫的信函做判断：

“尊敬的罗斯基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将阿富汗民族与部落事务部的若干文件和信息资料呈报给您。

诚如您所了解的，在5、6月间开始好转的普什图部落的局势再度恶化起来。使反对派感到不安的是部落地区出现的对他们的抵触和部分部落及其部族开始倾向政府，所以他们极力破坏和分化瓦解同阿富汗政府合作的基础。

在部工作总结中，指出了努力方向和存在的一些困难。我们将完善工作作风，制定前景规划和部落各有关部门的综

合工作计划。

但这都是不够的。如果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善国内军事政治局势这方面的问题不予以真正的重视，不花大气力，不集中足够力量和资金，那不论什么新的委员会也好，什么新的会议也好，最终都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必须落实下拨给部落区开展工作的经费。巴基斯坦给阿富汗的权势者付费，这是起作用的。在那些长老中间有人民政权的拥护者（也有中立者和敌人，甚至还有想两边挣钱的）。我们给予拥护者的帮助太少了。

苏联无偿援助的资金——说服部落的有效杠杆——很少能下拨到部落区，所以部落同巴基斯坦之间经贸联系的因素很可能会长期发生作用。”

◆ 苏联出兵是错着吗？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明显加强了对苏联施加的压力（针对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最主要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大范围加强了在阿富汗的秘密活动。斯蒂文·加尔斯梯尔是这样评价的：“……为了抵消他所理解的苏联在阿富汗的收获，里根赞成给予这个国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统治的反对派力量以援助。所以，在阿富汗，所谓的‘里根主义’比‘卡特主义’又朝前走了，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

“……里根当局使圣战者的活动成为他东南亚政策的关键和全球‘进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另一位分析专家、《华盛顿邮报》记者史梯夫·科尔在题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秘密角色”一文（1992年7月19日至7月20日）中说：“……不同来源的消息表明，

^① 斯·加尔斯梯尔：《竞争与调解在阿富汗：和解的前景如何？》《第三世界季刊》，1988年10月，第1505～1541页。

1985年3月，里根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No166文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林则签发了内容扩展的附件，它补充了卡特总统先前主要关注的‘令人不安’的反入侵部队活动的侦察情报分析。里根的详细文件虽然也包括了外交的和人道主义目的，但是语气强硬，而且允许对圣战者的秘密军援，阐明了阿富汗秘密战争的新目标：借秘密行动击败苏联人并使苏联离开阿富汗。”

上述知名记者的论述可以部分地解释出为什么包括安德罗波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尽早从阿富汗撤军的意图没能实现。

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拟定了对外政策方面的措施，创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苏联领导人应有意利用古巴——卡斯特罗是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他致函勃列日涅夫，建议充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平谈判的中间人。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审查认可了这一建议，并草拟了政治调解的总体方案。

它规定，这应该是某种阿富汗与其邻国，首先是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协议产物，而且要具备苏联、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相应的保障体系，当然，其中的每个国家都要得到对立国双方的认可。着手讨论阿富汗与邻国关系正常化应该是首要的任务。在确认相互尊重主权和在友好相处、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基础上的共同原则前提下，要求承诺停止军事行动或者承担从本国领土从事任何形式的敌对活动的责任；调解阿富汗难民问题，停止收买和利用难民从事针对阿富汗的破坏活动。

苏联试图组织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之间、阿富汗同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希望巩固阿富汗政府的地位，避免政治调解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化”。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必须体现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保障。

为了实现调解阿富汗问题的这一方针，拟定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

文 件^① (绝密)

№191 记录第 4 条附件

就阿富汗局势和有关问题向苏共中央汇报

我们对今后步骤的一些想法

围绕阿富汗的局势和由此引发的任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阿富汗局势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敌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势力出现了某些分化和瓦解。

1. 美国和中国继续奉行旨在改变阿富汗政治制度和苏联迅速撤军的强硬路线。其他一些国家则明显地表示愿意寻找政治调解局势的折中方法，尽管这些方法是不能接受的。

不同于美国的是，大部分西欧国家不再把苏联撤军作为政治调解的先决条件，而把它看做是这个调解过程的一部分。逐渐地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解，即不承认阿富汗是苏联的直接邻国，否认该地区涉及苏联的特别利益这样一个事实，就无从解决阿富汗问题。西欧国家立场上的这一进步是由于我们明确反对英国人提出的毫无前途的旨在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罢免现任领导人的阿富汗“中立化”方案。

2. 不结盟运动出现了一个倾向：部分国家改变以往激烈抨击苏联的立场，开始寻求以保留阿富汗不结盟国家地位为基本条件的调解。奉行这种路线的有印度，它担心美国和中国帮助巴基斯坦更新武器装备，以及美国军事力量增加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介入。

最近一段时间，巴基斯坦政府方面也流露出一些迹象：不愿意再追随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一意孤行的路线。这一点的表现是：它准备在伊斯兰堡把古巴外长作

为现时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国外长来接待。尽管古巴人主动斡旋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双边谈判以使其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目前尚无成效，但类似的步骤是适当的，古巴人今后的意图是利用这一机会接触更多的不结盟国家。

3. 同时，我们也同那些对政治调解阿富汗局势表现出兴趣的国家保持了适当的接触。在这些接触过程中继续推行这样一种思想，就是政治调解的基础应该是保证全面停止针对阿富汗的侵略行为和其他形式的颠覆活动，以及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

同时，在与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接触中，要一如既往地明确指出，有关阿富汗政治体制和政府组成等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谈判内容。同样，大家应当清楚，讨论或解决涉及阿富汗的任何问题，避开阿富汗政府，排斥阿富汗现领导人参加，都是行不通的。

4. 至于讨论调解阿富汗问题时可能会涉及的层面，必须同美国人想就事论事的企图针锋相对，除了切实保证不得恢复武装干涉和其他形式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的问题外，我们一定要提出削减美国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军事介入，建立印度洋和平区，消除那里的外国军事基地等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会给美国人施加压力，并对谈判过程产生有利于实现我们意图的作用。另外，这样还可以扩大在阿富汗问题上善意对待我们立场的那些国家，或者起码理解我们的那些国家的圈子。

5. 研究如何吸引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政治经济和道义领域援助阿富汗的问题看来是适当的。对此，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6. 因此，在调解阿富汗问题方面，我们对外政策活动的方向应该是，首先，要发挥作用缓解西方利用苏联出兵阿富汗制造的紧张局势；其次，为在阿富汗形成团结局面进行工作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并且要使那

里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具备不可逆转的性质；第三，一旦阿富汗国内和该地区整体的政治军事形势成熟，我们保证苏联军队实现有条件、有步骤地分阶段撤军。

7. 为了在未来显示我们保卫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免遭各种形式的外来侵略的果断决心和光明磊落，在适当时候可以重新签署一份苏联—阿富汗双边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今后，可以根据局势情况来详细审理这个问题，当然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鼓吹侵略阿富汗的人将不会具备任何理由反对这样一个就其任务来说是防御性的条约，那种防御条约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多得不可枚举。

签署这样的条约并不表明阿富汗要失去不结盟国家地位。只要想一想不久前巴基斯坦也被吸收进不结盟运动就够了：1959年签署的美国—巴基斯坦条约依然有效，根据该条约，美国视“捍卫巴基斯坦独立和完整如同自身目标和普遍和平那样生命攸关的重要”，并且有义务在巴基斯坦遭到外来侵略时根据其政府请求“采取应有措施，包括动用武力……”。

葛罗米柯 安德罗波夫 乌斯基诺夫

扎戈拉金 1980年4月7日 №0304/гс

然而，苏联未能利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斡旋。在联合国秘书长和部分国家（印度）的努力下，经过外交渠道的长期工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意进行间接谈判。尽管苏联认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直接对话是解决争议迅捷和有效的方法，但还是积极肯定了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同时声明，在政治调解的具体情况下，可以考虑撤出临时驻扎在阿富汗的数量有限的苏联军队。

1981年3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有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苏联元帅索科洛夫、阿赫罗梅耶夫大将、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玛克西莫夫上将、驻阿富汗总军

事顾问马约罗夫大将、驻阿富汗大使塔巴耶夫和克格勃驻阿富汗代表斯波尔尼科夫少将参加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约罗夫大将的倡议，在一大堆问题中（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形势、人民民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经济形势和军队状况等）讨论审理了从阿富汗撤军和替换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卡尔迈勒的问题。当时，这引起了乌斯基诺夫和安德罗波夫一派的强烈反对，因为卡尔迈勒是克格勃所庇护的人。马约罗夫大将很快就被从阿富汗调回。

1982年7月13日，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巴耶夫致电莫斯科，请求迅速增派7到8个营的苏联内务部队，计划把他们用于保护苏联—阿富汗经济合作项目和苏联公民居住区域。这样可以使第40集团军的作战部队从保安任务当中解脱出来。然而，这几个营并未按照这个初衷去行事，他们仅仅以特种警察部队的梯队身份对保安工作给予过援助。

1982年初，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科尔多维斯为自己的副手，后者于4月先后访问了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为当年7月在日内瓦展开的12轮谈判中的第一轮谈判奠定基础。

然而，除去苏联撤军、国际保证和难民返回等问题，巴基斯坦额外提出要求阿富汗承认“迪朗特线”为两国边界线。

为了消除外部武装干涉，阿富汗政府准备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但同时担心会刺激国内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阿富汗政府承认过“迪朗特线”是国界线。这个问题最终成为谈判的障碍，大家无功而返。

此后，科尔多维斯为筹划调解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展开了紧张工作。从1982年起，他主持了41次研讨活动，进行了大量会见和座谈，但有关情况却没有通报给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官，甚至联合国代表也不知道。

在7月份第一轮谈判结果的基础上，科尔多维斯拟就了协议草案：苏联根据谈判确定的日期从阿富汗撤军。安德罗波夫掌权后莫斯科迅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勃列日涅夫的

葬礼上，苏联新领导人同巴基斯坦首脑齐亚·哈克有过私下交谈，安德罗波夫向他转达了“苏联的灵活政策和对必须迅速解决危机的理解”，只对巴基斯坦提出了一个要求：停止援助叛乱分子。

是的，尤里·符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先于其他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参与阿富汗战争毫无前途。他痛苦地寻找着体面的撤军退路，可惜他最终没能如愿。

诚如1983年3月3日《泰晤士报》所述，安德罗波夫务实地筹划着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步骤方面的可能途径，他首次公开承认了在过去只是窃窃私语的事情：“在阿富汗，我们的战士死在起义者的枪弹下……在山区的军事行动中，抵抗力量如此强大而富有经验，足以有效对付苏联步兵和坦克……。”

美国记者哈里逊在“阿富汗和谈内幕”一文中指出：“在伊斯兰堡，科尔多维斯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盟友——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斯佩尔斯，他相信苏联正在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方法。”

1983年4月一轮谈判前夕，德奎利亚尔和科尔多维斯会见了安德罗波夫。后者使他们相信，他已准备采取“某些措施”，只是怀疑巴基斯坦和美国是否会支持联合国建议。在强调协议中有关不干涉的第二部分的重要性时，安德罗波夫告诉德奎利亚尔，他要感谢科尔多维斯先生，因为“他理解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的所有重要性”。3月28日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内容全部涉及阿富汗问题，科尔多维斯后来说：“他讲完话，伸出手来，弯曲手指悉数促使苏联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原因。冲突不仅恶化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消极影响了同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他最后指出，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内生活，影响到了政治和经济。”^①

^① 塞·哈里逊：“阿富汗和谈内幕”，《外交政策》，1988年，第72卷。

1983年5月19日，苏联驻巴基斯坦大使斯米尔诺夫公开证实苏联和阿富汗正在努力“确定撤出苏联有限部队的期限”。然而，1983年7月17日至7月24日第三轮谈判期间，巴基斯坦和美国阻挠了建设性决议的通过。依照美国人的意见，当时并不存在通过谈判停止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机会，科尔多维斯的使命也不会带来什么结果。当时美苏关系也恶化了：当年9月，我们的导弹击落了韩国客机，冲突加剧了。美国有了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的机会。自然，他们百分之百地利用了这些机会。显然，当时他们还没有实力允许自己做出那些诸如使用北约空军轰炸南斯拉夫领土和伊拉克的事情来，但美国得到的利益显然是增加了。

1983年9月13日安德罗波夫因病住院，不久便溘然去世。随后，苏联外交家对于支持联合国建议表现出的兴趣越来越小。科尔多维斯把自己的草案分别交给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但是没有得到回音。美国国务院对外仅仅提到了“在联合国的对话”。

也许，只能表示遗憾：美国领导人不愿意相信安德罗波夫留在身后的8个月撤军方案是诚心诚意的。看来，这在当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必要的条件尚未成熟。

契尔年科执政以后，尽管军界不断提出撤军问题，但阿富汗问题的和谈进程仿佛被冻结了。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谈判才得以恢复。

第四章 第40集团军同“圣战者”作战

◆ 如何对付游击队

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执行下列军事任务：

- 同反对派力量中比较危险的队伍作战；
- 摧毁或者占领他们的基地区域，销毁那里的武器储备，以及物资和装备。
- 扼守主要的战略交通线，保障中央与地方在行政管理 and 经济事务方面的稳定联系；
- 护送苏联驻军和阿富汗政府的物资供应运输队；
- 协助阿富汗军队封锁阿巴边界和阿伊边界，阻止武器运输和反对派兵源进入阿富汗；
- 协助阿富汗部队同反对派武装队伍作战。

对阿富汗的战况分析表明，苏联军队主要完成的是局部作战任务，投入的完全是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整个战争期间，第40集团军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动用全部力量在各地主动进攻叛乱分子。事情在于，驻阿富汗苏军凭借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不可能以应有的效力百分之百地完成综合性的作战任务和确立对阿富汗领土的可靠控制。

苏联政治家们在决议出兵阿富汗时，曾经指望以为数不多的部队来解决战略问题，但他们失算了。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没有承认这个错误，也没有续派增援部队。苏军部署在各省城和人口稠密地区，还要保护主要的交通干线和重

要目标。依照政治家们的策划，只要苏联军队一介入，就可以保证阿富汗的局势稳定。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以反对人民民主党统治和苏联武装介入为目的的起义运动在阿富汗全国蔓延开来。所以，苏军不得不经常同阿富汗政府军一道为稳定局势在这个省或那个省作战。不过，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有节制的。

在阿富汗，面对高原、高温、低温、“绿区”和荒漠，以及复杂的流行病……苏军遭遇了严峻的困难和作战行动的极端特殊性。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以及叛乱分子采取的游击战术……官兵们都缺乏精神准备和应有的训练。此地发生的一切既不同于教科书中关于战术的叙述，也区别于军事条例的训导。况且，我军已经长期脱离作战实践。部队中有作战经验的将官和校官所剩无几。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充满“意外”的战争，原因也就在于此。只好重新学习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没有训练场地，没有教官和特殊环境作战教科书……虽然军官们的军事理论素养比较高，但这种理论是对传统（正规）形式的作战而言，对地域性特点和游击战方式缺乏考虑，对其注意和研究也是不够的。理论毕竟是理论，缺乏实战经验束缚了苏军官兵发挥自己拥有的作战潜力。

实践表明，应召的预备役官兵接受的训练毫无用处，也暴露了我们后备役训练系统的弊端。下级军官（士官）有时看上去简直是束手无策。有一些军人则表现出缺乏在山区使用武器装备的技能，特别是在夜间。简而言之，常规作战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和某些职业军人没有完全适应反对派武装的小股部队的灵活作战方式。

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反游击战经验。过去在反对土匪武装和巴斯马赤匪帮斗争中积累的作战经验已荡然无存，我们以为在苏联领土上消灭了这些家伙，就可以一劳永逸，所以部队的重点训练是抵御外来武装侵略的常规作战。

苏联领导人在出兵阿富汗时想象的“闲逛一趟”没有实

现，而且很快就搞清楚了：过去始终笃信的原则——如果部队已做好大规模综合性战争的准备，那小型战争就不在话下了——是靠不住的。苏军统帅部被迫承认它的错误性，这一点在车臣战争中再次得到印证。

我们还明白了，军队没有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不得不根据当地条件酌情对部队进行改建：为提高作战能力和积极性，对师旅团营连排的组织编制体系予以改变；重新培训各级军官和士兵；改良武器和技术装备；重新研究反游击战和反恐怖斗争的方法和手段。

起初（至80年代中期），苏军以传统方式作战，主要在公路附近和沿山谷地带那些可以使用军事装备的区域进行袭击，但效果甚微。同时，指定师和团负责的区域比较大：师是200平方公里，团是70~100平方公里；他们无法牢靠地控制如此辽阔的领域，特别是在山区；缺乏自己的侦察体系，阿富汗人提供的侦察情报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

只好求助于早年积累的作战经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司令员加米涅夫在1923年以土库曼斯坦军区部队作战经验为基础撰写的《与巴斯马赤土匪做斗争的系统方法》一书已经指出了反起义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战术方法：包围、封锁作战地区、搜查和追捕。

我们没有根据阿富汗的条件研究寻求相应的作战形式、方法和手段，有时甚至违背了军事条例。因此，在第40集团军研究和引用作战经验，宣传普及典型战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作战经验的积累，不断对战术加以修正，使之更适合于当地条件。作战的主要原则是：提前包围封锁反对派武装盘踞的地区；在他们可能撤离的地段设伏和阻截；包围被发现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并予以彻底歼灭。

与土匪队伍的战斗并非总能得手。应当承认，许多问题最终也没能解决得了。从全局讲，并非所有的战役都十分有效。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战果和部分战役的失利：部队

的作战准备比较差；忽视军机保密，战斗中疏忽大意；不合乎要求的侦察和战斗中的观察；在追歼残余土匪时缺乏昂扬的斗志；不善于组织联手行动、包围和包抄退路。在不少战役中，对军事冲突地区实施包围时，外行地布置火力，而且错估了武器在山区的战斗性能，出现了部分地段的射击死角，导致土匪逃之夭夭。

还有一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反对派武装作战的难度：阿富汗政府军低下的作战能力；高原和荒漠；叛乱活动的基础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大多数居民被土匪的恐怖活动恫吓住，他们拒绝求助于政府军，而协助土匪藏匿。在阿富汗战争的年代里，最终也没能消灭掉反对派武装队伍，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当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在阿富汗作战的我军官兵始终处于日益增长的紧张状态。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成功、都达到了目的吗？远不是这样。战斗的结束经常是以击溃对手为标志。我们会汲取教训，积累经验，圣战者们也会吃一堑长一智……假使苏联军人在阿富汗服役两年后返回祖国，那圣战者们从来也不离开自己的故土，他们继续战斗，在外国教官指导下不断完善作战技能。被派去接替归国“老战士”的是初出茅庐的军官和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年轻兵源——士兵和士官。个人军事素养方面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众所周知，战场上执行任务的是士兵、士官和下级军官。不过，即使存在这些因素，在公开的战斗中，圣战者仍然不是我们正规军的对手。在这里发生作用的是我军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良好的装备，特别是重型武器。吃败仗的往往是叛乱分子。但是，他们失败的代价却小于我军取胜的代价。一条老规矩在这里应验了：动用大批正规部队对付非正规部队会事倍功半。局部战争的经验表明：参战者必须是经过良好训练，并且具有反游击战实战经验的职业军队。

苏军和阿军的作战决策系统是与众不同的，是根据阿富汗

汗的当地条件形成的，它建立在每个月制订一次的作战计划的基础之上。作战计划由第 40 集团军参谋部、土库曼斯坦军区参谋部和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机构共同实施；总领导是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每一项计划的制订都要依据对全国战况的整体分析和该地区战况的局部分析，同时考虑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军指挥部和苏联克格勃、内务部驻喀布尔代表处领导的意见。计划还要呈送莫斯科，经总参谋部研究审查后提交苏联国防部长确认。

根据阿富汗全国和个别省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趋势，这些计划规定在不同省份进行协同的和单独的（仅指阿军）战役或作战行动。不过经常会有一些计划外的、被时局所迫的作战行动。

在军、师、旅、团，每个月都会制订附带简要说明的作战计划；侦察任务的布置和实施计划；作战行动保障计划；协助地方管理机构巩固国家政权、稳定辖区局势的有关措施计划，然后下达作战命令。布置战斗任务以后，各营还要绘制有图例的作战行动计划实施平面图。在计划中还注明了行动意图，部队本月的基本任务，作战行动的地区、目的和期限，以及上级领导、动用的人力和物力、每个区域内叛乱队伍的构成。除此之外，还为值勤部队标明了各省和部落区，也计划设伏行动。

在旅和团，每个月都要制订详细的设伏计划表格，并注明参与部队、增援力量的手段、筹备时间和完成期限。一个营每个月一般要设伏两到三次，时间为 4 至 5 昼夜。

◆ 作战评述

第 40 集团军在阿富汗进行的作战行动可以有条件地划分为：每个月在莫斯科由苏联国防部长确认的计划内的和由于局势恶化或者应阿富汗领导人要求进行的计划外的。此外，当迫在眉睫地要求应付突发情况时，习惯于使用加强营

来采取突袭作战行动；还有值勤部队在辖区内的作战行动；同运输武器弹药的马帮队的战斗；对暴露出来的敌方目标和武装战斗人员群实施空中轰炸和俯冲扫射打击，以及导弹、火箭弹和火炮打击；通常，作战行动同阿富汗武装力量联手进行。阿军很少单独承担作战任务，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有，而且具有局部性质。

同反对派队伍作战的最主要内容是计划内的大规模战役和局部性战役。在这些战役过程中运用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包围和搜查面积不大的地区和村庄、“绿区”和人口稠密居住点；对分布着叛乱分子的所有纵深地带同时或者连续发动进攻；在作战行动进行的总体区域内发动个别方向上的进攻；偷袭；设伏。

在山区、居民点和“绿区”作战是非常复杂的。这类战役的特殊性在于：水渠、坎儿井、住宅建筑物、窑洞分布广阔，形成网络，而这些物体往往成为叛乱分子的抵抗工事，大大延缓了作战推进速度，有时一个小时只能前进150到200米；茂密的植物妨碍了测定地形和行动配合——以烟雾来判断自己的方位经常是无效的；我军与叛匪之间的战斗接触常常只有50到100米，这就排除了使用炮兵和空军来直接支持己方部队的可能；炮兵的有限作用迫使步兵连乃至步兵排都配备了80毫米迫击炮和两到三个编组的反步兵自动掷弹筒，每个士兵都携带了超量的备用手榴弹；有些地区装甲车辆确实无法通过，所以它们就不在部队的作战队列，而用于实施包围；即使在被封锁地区，叛匪也能在我们的眼皮下悄悄逃脱，他们迂回运动，突然从后面或者侧翼袭击我们，这又迫使我们不得不配备侧翼保护和后方保护；每个连队都要求配备航空瞄准手和炮兵校对手，而每个班都要求配备电台作为信号转发器，牺牲的概率明显增加了。

大部分战役是在海拔3千米或者更高的山区进行，部队不得不在缺氧、没有道路和温差极大（夜间是严寒，白天是

灼人的酷暑)的条件下行动。技术装备在山区一般派不上用场,它们都躺在山脚下——我们的官兵在岩石上爬行。在这里,我们的军人同叛匪是平等的,因为使用的武器一样。实际上,叛匪反倒占有优势,因为他们在熟悉的地方作战,又有老百姓的支持,况且自我装备和对当地条件的适应都比我们好。

山地战要求特殊的战术,而且还有自己的规律(必须占领制高点,防御结构要有层次,几个人一小组等等)。需要负重30到40公斤,有时一背就是几昼夜。官兵们都没有专门接受过山地战的训练……士兵的许多个人装备品都显得毫无用处,特别是侦察兵。而需要的用具起初他们都没有,没有睡袋,没有山地战必需品,没有合脚适用的鞋……无休止地翻越一道道山梁去搜寻敌人,极大消耗了我军官兵的体力,他们已不堪重负。战士们经常把沉重的装备(防弹背心和钢盔)留在宿营地,把82毫米迫击炮扔进深渊。一句话,只携带那些缺了就无法作战的东西(羽绒睡袋、弹药、饮用水、干粮)。

在山里作战一周,体重要下降7到10公斤,而两到三个星期过后,很多人需要医疗恢复。在解决后勤补给和转运伤员问题上遇到了棘手的困难。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直升机真是帮了大忙。不过在山区,直升机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式有:

大规模作战行动主要在某些地形条件使对手难于实施战术迂回,无法从进攻中脱逃的地区进行。在被封锁的山谷盆地和高山地区进行这样的战役效果特别好。而在高原地区进行此类战役,叛匪依然能有人得以脱逃,战果的分量要差一些。

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年代里,一共进行过400次大规模战役。我向你们介绍其中的几次。

1981年12月上旬,发动战役摧毁大规模的叛匪基地达

尔扎博，这是圣战者在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囊括的省份有法里亚普、扎乌占、巴尔赫、撒曼甘。这里驻扎着几支反对派骨干的伊斯兰委员会和属于他们的武器弹药库。从建筑工程角度看，据点构筑得非常好。在炮兵和空军支援下，苏军和阿军各投入4个营进山剿匪，指挥员是我军司令部的捷尔·格里戈良茨少将。

达尔扎博据点位于同外部隔绝的山区，只有两条通道。决定空投4个营包围封锁它，其余力量则乘坐装甲车推进，对据点予以摧毁。这个计划实现了。尽管云层低至30到50米，直升机还是成功地空投了伞兵，伞兵占据了制高点，使反对派武装无法从达尔扎博外逃。在伞兵部队和特遣营的共同努力下，敌人被歼灭，据点被彻底摧毁。

战斗中，我方有7人阵亡，14人受伤，3架直升机受损。摧毁“不可逾越的达尔扎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阿富汗北部地区局势的稳定，打击了反对派的气焰。从此，叛匪再没有试图恢复这个据点。

1982年1月至2月，发动战役歼灭“绿区”内查里卡尔、贾巴尔-乌萨拉吉和玛赫姆德拉基等地的叛匪武装。他们约有4500人，这些家伙专门袭击我空军基地所在的巴格拉姆机场，盗抢汽车运输队，袭击苏军哨卡和岗哨。

调集了苏军12个营和阿军8个营来参与这次战役。第40集团军副司令员维诺库罗夫少将被任命为战役指挥员。战役计划拟出其不意地包围“绿区”内的查里卡尔、贾巴尔-乌萨拉吉和玛赫姆德拉基，切断叛匪退路（封锁面积约400平方公里），然后在10天时间内收缩包围圈。使用阿富汗军队步步为营地搜查居民区，在阿富汗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专门建立的审查点对所有男性公民进行过滤式检查。

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被识别和扣留的叛匪达到1.6万人。该地区局势得到空前稳定。这次战役的特点在于，装甲编队不仅以火力支持自己的分队，而且在包围圈的个别区域进行了单独作战。战役中的创新是，为识别隐藏在平民中的

叛匪，建立了过滤式检查站。苏军方面阵亡 25 人，伤 76 人。

1982 年 4 月，一举捣毁了拉巴梯 - 贾里的国际毒品销售据点。笔者认为，那次战役是值得借鉴的。该地区位于阿富汗西南部的荒漠地区，毗邻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反对派战斗队在此以鸦片换取武器，并接受作战训练。

决定由苏军单独执行捣毁贩毒据点的任务。维诺库罗夫少将奉命担任战役指挥员。动用的力量有第 103 伞兵空降师的一个营、第 70 独立机械化旅的两个伞兵突击连和一个机械化步兵连、特遣队的一个独立侦察连、39 架攻击机、70 架直升机……。

预定首先对据点实施突击轰炸，然后空投伞兵抢占制高点，包围封锁据点，歼灭叛匪武装，捣毁所有的仓库和建筑物，销毁毒品。整个过程需要 6 个小时。

战役在 4 月 5 日清晨打响。空军的突击轰炸之后，据点上方“悬挂”起航空照明弹。空中指挥点没有给直升机群引导好规定的平飞区，接近空投区域时，长机飞行员萨夫契科中校参照航空照明弹判定方位，而风把它们刮得飘离了目标上空。构思缜密的作战计划险些毁于一旦：伞兵被空投到了伊朗领土上，直升机空投之后就“走了”，这几乎要酿成国际事件。幸亏空降兵各分队队长及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阿富汗……立即采取措施返回阿富汗领土。3 小时之后他们才得以穿越边界，又耗费了两个小时，他们才重新集结于出发点。

在进行了二次空中打击后，空降兵迅即攻占了据点，炸毁了所有的建筑物，销毁了 1500 公斤鸦片半成品。当然，苏联政府不得不在事后向伊朗方面正式表示道歉。

进行大规模战役时，根据当地条件、地形和圣战者的战术策略，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比较有效的战术手段包括：袭击行动；不同方向战术空投配合下的分队作战行动；夜间包围并歼灭小股匪徒的作战行动；值勤分队实施侦

察任务和对精确侦察出方位的敌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各级部队在边境地带辖区内实施埋伏和侦察搜寻行动；使用战术空降兵消灭小股叛匪；以歼灭为目的围困叛匪部队；对分布于作战地区不同纵深地带的不同叛匪群实施同时的或连续的进攻；包围封锁作战地区、“绿区”和居民区；追击溃退的叛匪；利用搜查消灭武装叛匪……。

战役中的大部分情况下，作战区域被团和营划分，它们在战役主导思想框架内依照各自指挥员的决定独立行动于自己的区域。部队迂回是被广泛采用的，经验表明，即使人力物力都占优，正面进攻的成功率也不高。所以，包抄、偷袭、设伏都被普遍运用；对叛匪可能接近或退离时可能经过的地段实施航空布雷和机动布雷；对武器装备难以接近的山区实施炮击和空中打击，以击溃靠近那里或者撤离那里的叛匪群；撤退迂回，朝新的方向进发——进攻同一个目标；抢占垂悬于峡谷之上的制高点；在左右两翼制高点上战斗组同步推进的掩护下，部队于谷底和山口进行作战行动；在装甲编队、炮兵、武装直升机火力掩护，以及对溃退叛匪群的同步空中打击下，营队沿毗邻方向——沿制高点山脊和山坡（通常，公路被叛匪多层次火力所覆盖）——徒步进行纵深迂回；对战役纵深地带集中使用战术空降兵，以协助迂回的步兵和装甲编队；在空军以及我们的装甲编队和炮兵火力掩护下，由苏军封锁包围居民区，由阿军进行搜查；利用当地居民、向导和俘虏的指认，以及侦察跟踪进行侦察搜寻行动，以发现和捣毁敌人的仓库；事先占据制高点，从不同方向对峡谷和盆地进行密集搜索，以消灭敌人。

后来，在许多战役中都对这些战术加以选用，并且不断创造出新的、不为对手所知的其他战术手段，使敌人陷于迷惑，从而保障了我们的胜利。

经验还表明，战斗中采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或者使用对手原先不知道的武器和技术装备，能达到更大效果。虽然圣战者武装分子生性野蛮残酷、好自我吹嘘，但面对陌生的战

术手段，也表现出犹豫和胆怯。这种类型的作战行动常常把对手引入死路，使他们威风扫地，迫使一些人放弃抵抗，甚至在己方有利的情况下也愿意妥协。

然而，常规部队的局部胜利并没有导致彻底粉碎反对派武装队伍。另外，苏联的有限部队各部在军事行动的许多方面作用还不是很大，比如在侦察行动中，作为迂回部队和战术空投部队执行任务时，穿越障碍防线时……在进军途中克服雷区，或对路段进行排雷时，暴露出许多缺陷。

采用游击战术、良好的单兵作战训练、坚韧耐劳、生活简朴、善于适应当地条件和高昂的战斗士气这些因素，使得圣战者们在武器装备比自己现代化得多的对手面前没有被消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熟知地形，且有当地百姓的支持，所以经常得以在我军打击下保存住自己的实力。他们在自己家里。他们的胜利甚至常常得益于我方不同级别上的泄漏消息，这是因为，作战行动是与阿富汗政府军携手进行的，作战计划要传达给阿富汗人，于是反对派也就得知了。后来，苏军指挥部不得不制订两套作战计划，严格控制真实计划的通知对象，而伪计划则交给阿方，到了最后时刻才在作战现场明确具体的战斗任务。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作战意图不泄漏。尽管如此，仍然发生过那样的事情：战地指挥员已经掌握了战役准备情况的全部资料，可是在主动进攻开始之前，他们又把自己的队伍带离了作战地区。

计划外作战行动（局部战役）适用于局势急剧恶化的地区，以及获得关于圣战者武装队伍或武器运输队将出现的准确情报时。计划外作战行动在动用兵力和耗费时间上是有限的，但战果较大，因为利用的是第一手侦察情报，做到了出其不意。这类战役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就运用的战术手段而言，与计划内的大规模战役没有太大的区别。苏军有限部队驻阿期间，一共进行了220多次局部战役。

这类战役是根据军部或者师、旅、团等部队指挥员的决定进行的。作战行动一般在得到侦探或军事侦察情报一到三

天后展开。允许军、师、旅、团指挥员在计划外战役中动用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当作战地区距部队驻地 10 到 15 公里，而且是夜间出动时，战役产生的效果就特别显著。

计划外战役的主要内容是：我军封锁包围指定的区域、居民区和目标，阿军进行搜查，如遇敌人撤离，就要穷追不舍。在战线没有连接起来的条件下，这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它被指挥员普遍接受采纳。

包围封锁指定的区域和居民区是为了彻底孤立叛匪盘踞地，以便对其发动攻击。事前提醒被包围封锁区域内的居民对协助藏匿圣战者和收藏枪支是要追究责任的，同时建议居民交出枪支和指明圣战者隐藏地和他们的仓库或者基地。居民不得收留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禁止夜间外出活动。

搜查的目的在于，消除指定区域内暗藏的圣战者，找出并销毁武器弹药库和食品军需库，找出并扣留叛匪人员。

战役的重要准则是及时封锁叛匪盘踞地区，组织策应，在叛匪可能撤离的路段设伏，尽量包围被发现的叛匪群，并彻底歼灭之。

1985 年 9 月的法拉赫战役可以作为一个战例。当时第 40 集团军指挥部得到情报说，伊朗境内训练装备了一个哈扎拉人营，计划派遣它到古尔省，并依靠这个营在阿富汗内地建立一个哈扎拉自治共和国。

其辖区包括伊朗方向的我军第 5 机械化步兵师师长卡斯佩罗维奇少将接受了任务：阻止哈扎拉营的渗透……任务是艰巨的，边界线漫长，而兵力很少。于是决定设立关卡，派遣巡逻队，布置包括空中侦察在内的日常侦察。时间一天天流逝，这个营始终没露面。警惕性松懈下来，已经觉得是让他们溜过去了，可偶然一个机会帮了忙：两位强击机飞行员在坎大哈省执行了轰炸攻击任务之后返回申丹特机场途中，在法拉赫东南方向峡谷里无意间发现了一支载货车队，迅速通过作战指挥中心报告了师长。师长下令在峡谷上空巡逻飞行，确定当时推测是马帮队的位置。

师长同时让两对值班的强击机飞行员升空，下令撤回其余几处的侦察队，并向峡谷地区派出装甲车编队。在发现那支马帮队以后5到6小时后，峡谷被封锁包围，空军和炮兵予以了火力攻击。机械化步兵和侦察兵最终摧毁了这支马帮队。

对手遭到重创。被击毙的就达到了125人，3人被俘。开始误以为他们是中国人，后来才搞清楚：正是哈扎拉营……35辆汽车中烧毁了15辆，其余的都各顾各地跑回申丹特了。战利品有：迫击炮16门、杰格佳廖夫-什帕金纳大口径重机枪25挺、埃及造机关枪16挺、300多支冲锋枪和300多套制服，以及几吨食品……。

这次战役彻底挫败了建立哈扎拉自治共和国的政治阴谋。

不料，师长汇报了战果之后，竟然引起当时身在阿富汗的扎伊采夫大将的怀疑和不满。是时，扎伊采夫大将正指挥部队在潘捷舍尔峡谷同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匪徒激战，于我军不利的战况使扎伊采夫很恼火。显然，他在迁怒于走运的师长，想好好地“斥责”别人一番，批评其“草率下结论”，说什么战果还需要验证，并没有全部消灭哈扎拉人，让他们突围出去了。大将命令核查战果，组织人力搜查哈扎拉营残部。这简直太荒谬了，在大面积的山区搜查隐藏的武装分子？命令就是命令，除了执行，卡斯佩罗维奇没有其他办法。不言而喻，师长组织的搜寻无功而返。

为了尽快结束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师长被迫讲假话。他把战利品按天数分摊，然后每天汇报“击毙敌军多少多少人和缴获武器多少多少”，并尽量把数字控制在“需要”的程度内。由于每天都要向莫斯科汇报当日击毙的敌人数量，所以，这样做就多少掩盖了潘捷舍尔战役失利的不光彩，挽回了指战员的一些面子。看来，没有为法拉赫战役参加者颁发勋章并非偶然，尽管它战果显赫。

在出兵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经常使用的手段还有加强营

的突袭作战行动、执勤部队在辖区的作战行动、消灭马帮队的作战行动、设伏、保安行动……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武器和技术装备在山区

苏联生产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在这里显示了很高的作战性能，特别是射击武器、2型步兵作战车、80型装甲运兵车、“飓风”和“冰雹”火箭发射装置、火焰喷射器、武装直升机和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部分现代化重型武器在山地战中暴露出严重缺陷。在当地条件下，火炮炮身的仰角和倾角不够，最主要的弱点是离不开公路。坦克和1型步兵作战车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战空间，无法对山顶射击，“陷入”绿沼，作战中时常处于无用状态。苏联制造的某些型号的地雷和探雷器也显得效力不够和作用不大。

所以，不得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增强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部队武器的火力，为他们装备17型反步兵自动掷弹筒、“丸花蜂”火焰喷射器、可装卸15型反步兵掷弹筒和6型手提反坦克掷弹筒的74型新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并且在战斗中广泛使用“飓风”和“冰雹”火箭炮。

还发现了装甲车和汽车机械动力传送和行驶系统一些部件的安全可靠性不高，动力装置的防尘性不够，在高温条件下反坦克武器装置填料箱密封性能失灵，炮兵侦察的无线电定位手段和红外线测距仪的可靠性不够。1型步兵作战车和1型空降兵作战车如遇反坦克地雷，通常是车毁人亡。60型和70型装甲运兵车的低功率发动机无法保障它们在山区正常运行。

我们不得不在战争中去改善或弥补兵器的许多缺陷。先是对高射炮进行改装，使其能对山顶射击，在步兵作战车上安装17型反步兵自动掷弹筒以代替反坦克导弹，在自动步枪上安装光学瞄准器，这样可以消灭裸眼视力外的敌人。

1980年5月，一批主任设计师来到喀布尔，听取了对武器改进的全部要求，其中涉及直升机发动机功率不够，探雷器失灵……这种做法确实起了作用。后来，他们经常飞到喀布尔，对改进件进行检验，并试验新武器。

军人们自己也不断地寻找途经更有效地使用技术装备和武器。1981年7月，第40集团军司令员特卡契中将在一次发言中有这样的分析：“……在山区作战时，某些类型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暴露出许多缺陷。例如，安装在步兵作战车和空降兵作战车上的Д44型88毫米炮和‘雷’型火炮因仰角不够而无法使用；120毫米迫击炮由于难于在山区安装而极大程度降低了其威力；Д30型号122毫米榴弹炮也难以使用，因为它需要面积较大的发射阵地；17型反步兵自动掷弹筒的制动锄装置不能保证在硬质土上牢靠固定。在冬季开始装备部队的2型步兵作战车和82毫米‘托盘’迫击炮……性能良好。”^①

还有一些型号的飞机和直升机在山区显得灵活性和装载力不够，瞄准系统性能不高。现代化高速战斗机的使用在山区受到限制，后来改用苏—25强击机，许多人亲切地称其为“白嘴鸦”。

在对付反对派武装力量的战斗中，武装直升机越来越具有威胁作用。起初，它们独霸天空，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米—8直升机驾驶舱必须安装装甲层来抵御炮火袭击。随着叛乱武装力量装备了“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系统，米—8直升机的损失不断增大。这迫使我们寻求新的方法来使用武装直升机，要求建立新的系统来防反“毒刺”对空导弹……直升机开始只运用于超低空和夜间作战，这样虽然降低了它的效力，但同时延长了其寿命。1989年4月，笔者同西利格·哈里松有过一次交谈，我不能苟同于他的观点。他说，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从阿富汗撤军的主要原

因是空中武器装备的大量损失，特别是在圣战者拥有了美式“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以后。这个论调不完全正确，因为这需要对整个战争期间空中武器装备的损失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



局部战争是棘手的事

可以毫不犹豫地讲，我们没有从卫国战争，没有在中亚、波罗的海、西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消灭巴斯马赤匪徒和土匪武装的斗争中，以及50年代到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汲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个严重过失，因为我们本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和牺牲，比如，我们在中亚和北高加索的作战行动，以及美国人在越南的经历，都对反游击战策略有过足够充分的研究。然而，这些经验没有被加以利用。为什么？在苏联军队里，同非正规武装力量的斗争被赋予次要意义，军队主要是在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认为同土匪武装的斗争是内务部队和警察部门的事情。美国人在越南的行为未免太残酷了，更何况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我们不能接受美国人的经验。我们应当奉行自己的人道主义方针，特别是在对待平民百姓的关系上。其实，这恰恰是错误的，因为在国内战争中这是行不通的，叛乱分子与和平百姓之间不可能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线。白天他们也是平民百姓，可到了夜里就是圣战者了。所以政治家们在决议动用军队时要时刻切记：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平民百姓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利用军官集训、作战研讨会来交流讨论作战经验，并加以概括总结，在阿苏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战行动体系。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传达到部队的每一级编制——印发了各式各样的手册、条例和教科书……创建了一整套备战体系，使战士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培养他们的勇气、体力上的耐力和作战积极性，以及在荒原和山地的作战能力，从而避免重复错误，做到减少牺牲。

最初，被派往阿富汗的列兵和士官都要在苏联境内的培训中心再接受一段训练，因为必须使这些来自各军区的已经“接受过训练的”人重新适应阿富汗的条件。总参谋部 №314/3/00655 指令规定组建一批山地作战营。1980 年拟定了山地作战营人员培训大纲、教学分队学员培训大纲，以及机械化步兵教学法参考资料和行动指南——山地作战和行军途中遭袭时的对策。

后来，在土库曼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范围内的捷尔梅兹、奥塔尔、库什卡建立了专门的教导团，在阿什哈巴德、约洛塔尼、捷尔梅兹、阿拉木图和库什克等地区建立了培训中心。士官和专业人员要进行半年、士兵要接受 2 个月的培训；指导培训的校官和士官都具有在阿作战经验。新兵在阿富汗抵达自己的部队驻地后还要接受 10 到 12 天的实地训练。

1983 年 6 月 2 日，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宣布的“关于提高第 40 集团军军官轮换人员素质的措施”的 №15/085 指令规定了这一工作的连续性和综合性题目。制订了培训军官的专门纲要，首先在军校进行，然后在距塔什干不远的奇尔奇克预备军官团中进行。

抵达阿富汗后，要在顶头上司的领导下接受 4 天的（每天 10 到 12 小时）集训。这时特别要注意计划组织作战行动的实践课，以及在各种条件下的相互协作和保障的特殊性。为了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使增补人员能迅速胜任职责，1983 年 6 月 12 日，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颁布了 №15/091 指令，要求根据专业派遣人员；不允许使用同年入伍和同一民族人员配备班排和乘务组；作战部队人员首先要配备齐全。坚决禁止在第一阶段培训结束前中断受训人员的学习，而把他们投入到执行作战任务、围剿任务和其他内务部队的行动中去。

确立了授课程序，实行了根据该军人执行的作战任务或者该部队所处地域条件来区别对待的教学方法。特别提醒注

意的是使用武器，乘坐军车和装甲车的行动，排除地雷等爆炸物……。

这样的学习也贯穿于战斗始终，是鲜血换取的。叛匪一方生存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的装备同我们几乎一样，而且他们善于随机应变，有时集中力量于这一点，有时那一点，出其不意地造成人员和武器的力量对比悬殊，从而进行恐怖活动和掠夺性袭击。与其斗争是特别不易的事。

实践表明，“其他措施”巩固不了作战行动中取得的成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部队撤离“被清剿”地区，叛匪们返回后又恢复了自己的政权，这使得军人和平民的牺牲付之东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可谁也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遗憾的是，国际社会至今也没能拟定出在类似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准确建议。“阿富汗战争”和其他战争的经验虽然也总结过，但很少运用。一如既往，在不同的局部冲突中，军事实力仍然是最基本的道理。

现代作战行动要求对全部力量和手段进行精密的组织和详尽的协作配合，因为它们机动性非常高、所需时间非常短促，而在行动中共同协作的是不同军兵种。时间和位置的丝毫偏差和不符合都会增加你的牺牲，不是炮兵或航空兵攻击了自己的部队，就是部队踏入己方布下的雷区……是的，我们在作战行动和偷袭行动中出现过纰漏，经历过令人懊丧的荒唐事和失算，许多人死于非命。比如，在赫拉特省的一次协同作战行动中，我军第5机械化步兵师炮兵营和火箭炮连给予阿富汗17步兵师火力支援。尽管事先对细节作了规定，核对了时间，并且指挥员都在作战图上签了字，可阿富汗人还是莫名其妙地在规定时间之前出现于作战区域，结果遭受我炮兵攻击，3人阵亡，受伤的10人中有该师师长。

尽管战争在阿富汗继续着，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但苏联政治领导人却视而不见，认为此事不宜声张。确切地说，就是隐瞒于全社会，不让人民知道这场战争。

文 件^① (绝密)

特别卷宗 (工作记录)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1 年 7 月 30 日会议

.....

苏斯洛夫：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吉洪诺夫同志就永久纪念阿富汗阵亡军人的问题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报告，建议给每个死难者家属拨款 1000 卢布用于建立墓碑。问题并不在钱上，而在于，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永久性地纪念阵亡者，把有关内容书写在墓碑上，他们的坟墓安置在若干公墓内，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不妥的。

安德罗波夫：当然，应该敬重地安葬阵亡者，但永久性纪念的事为时尚早。

基里连科：设置墓碑现在不适宜。

吉洪诺夫：总之是要安葬的，至于要不要树碑立传，那是另一个问题。

苏斯洛夫：如何回答那些有孩子死在阿富汗的家长，这个问题也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言简意赅，更具标准……。

由于遵循了某种远离生活实际的“政治观点”，没有给予牺牲在阿富汗战场的战士们以人生的最后礼仪。这样的情况在卫国战争期间对待阵亡战士时也出现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也未能得到安葬……他们的尸骨至今仍遗留于沙场和战壕。热心的搜寻者们何时才能找到并安葬为祖国捐躯却被祖国遗忘的最后一位战士啊？如此对待阵亡将士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东正教为牺牲在阿富汗的苏联军人进行了安灵祷告，生存下来的“阿富汗军人”也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战友们树立了纪念碑。

第五章 阿富汗的“圣战者”



叛乱运动的性质

从事反对喀布尔政府活动的反对党派组织和团体达到了70多个，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推翻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在社会发展的远景方面，它们之间没有达成统一认识：一部分人赞成宣布成立巴基斯坦或伊朗式的（但有所区别）“伊斯兰共和国”；另一部分人拥护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包括君主立宪制；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分歧（民族主义的、部落的、宗教的、党派的）。实际上，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体制的反对派只是些彼此间少有联系的、散乱的乌合之众。

所以，对叛乱分子运用“反对派”这一界定完全是笼统的和有条件的。他们的首领追求的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他们之间经常是互不承认，甚至会发生火拼。总之，开战以来，他们始终没有推举出一个有能力统一领导整个叛乱活动的领导人。其根源深植于民族文化，由3部分组成：作为信奉那种不可或缺的、区别于他人的自尊和荣辱观所必需的鲜明的个人价值观念；希望别人也能按照本地五花八门的传统和习俗来生活的愿望；信奉伊斯兰教。

阿富汗反对派的活动得到外部世界的积极支持。抵抗力量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阿富汗和苏联的对手从外部进行干涉，首先是美国和巴基斯坦。为了同苏联在这一区域的意图相对抗，美国在若干方面建立了相应体系。在物资供应

上，阿富汗反对派完全依赖于北约国家和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同美国一道比较积极地给予阿富汗反政府力量多种支持的国家有巴基斯坦、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西欧国家等。

反对派接受的主要援助有：资金、武器弹药、军事装备，有外国教官和顾问参与叛乱分子的军事训练，以此创造条件迫使苏联撤军。

例如，1981年9月，军事侦察代表的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西欧国家、埃及和巴基斯坦一起，明显加强了对阿富汗反革命势力的援助。为了协调这方面的行动，在伊斯兰堡成立了一个包括美国、英国和埃及驻巴使馆代表，以及巴基斯坦军事侦察机构和总参谋部人员在内的特别工作组，在其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进行颠覆活动的具体行动方案，并涉及个别国家参与叛乱分子在阿富汗境内的组织工作。其中，破坏和恐怖活动训练在联邦德国进行，从1980年年底起，那里就运作起几个对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军人进行游击战训练的中心，接受培训的时间是一个半月。今年9月上旬，又一支破坏分子小组已经飞往联邦德国。”

“埃及增加了对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的现代化武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地对空导弹、便携式对空射击武器、爆炸装置、定时炸弹等）。运送武器的C-130运输机总是在夜间降落于白沙瓦，它还会定期带来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教官，他们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训练阿富汗叛乱分子。”

“最近，英国也积极参与针对阿富汗政府的破坏行动。今年9月上旬，由10位英国专家组成的游击战小组飞抵巴基斯坦，目前他们滞留在巴阿边界地区，其任务包括实地研究‘内战’现状……起草包含对英国直接参与援助的形式做出具体建议的报告”。^①

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反对派组织积极从事反对阿

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和苏联军事介入的斗争。他们拥有现成的机构，这包括了领导机关、武装战斗队、军事训练中心系统，物资供应基地、宣传手段和机构（电台和出版物），而在叛乱分子控制地区则是伊斯兰委员会。另外，在美国、西欧和部分穆斯林国家，反对派还拥有自己的基金会、团体、代办处等许多分支机构，通过它们实现对各党派团体的财政拨款和物资提供。

圣战者们虽然立足于阿富汗国内，但他们活动起来我行我素各自为政。通常，他们不在“别人”的省份或者地盘内同政府军发生接触，千方百计地抵制联合统一和加强军纪的措施，反对任何人去研究制定统一的战略方针，只承认本党的领袖和战地指挥官。这种涣散性、党派间的相互敌视、地方主义、宗教的和民族的不和，妨碍了事业走向成功。各派首领在白沙瓦的争斗甚至制约了阿富汗本土上的军事行动。

在如何分配境外援助和势力范围划分等问题上，反对派内部存在着深刻矛盾。因此，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武装战斗队之间多次发生军事冲突……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圣战者就葬身于这样的火拼中。

支持反对派的国家始终在致力于使圣战者的统一，但圣战者们遇到的困难与人民民主党遇到的一样：一盘散沙，相互猜疑，各不买账。这是阿富汗社会的基本特性。

其实在1979年底苏联出兵前，反对派就采取过措施试图进行统一。当时建立起来的“同盟”——“伊斯兰革命运动”和后来又建立的“伊斯兰统一联盟”，都在组建立后不久就分崩离析了。此后，试图团结起圣战者的行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美国和伊斯兰国家对滞留在巴基斯坦的反对派首领施加压力，力图促使其团结起来。最终，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外长特别会议召开前夕（1980年1月），反对派宣布成立了有6个党派参加的“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3月10日，当时还不拥有自己组织的塞亚弗被联盟的最高委员会选

举为主席。

1980年4月27日，6个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在伊斯兰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新联盟的目标：把阿富汗从无神论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根据可兰经和预言家穆罕默德的学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六党派”的首领许诺同愿意恢复伊斯兰统治的组织合作，呼吁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首脑给予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和资金与武器援助。这个联盟生存到1980年12月也解体了。

不过在外部势力的压力以及穆斯林和阿富汗神学者的要求下，很快又开始了恢复联盟的谈判，并于1981年6月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联盟”。6月25日，这些组织的首脑在白沙瓦的麦哈巴特清真寺对可兰经和圣书《大布哈拉》宣誓忠于新联盟，并通过了手抄本的联盟章程。反对派首领们共同签署的文件得到阿富汗神学者米亚戈尔·萨西卜-扎杰的认可。

根据章程，原来的6个反对派组织应该自动解散，并且把自己的物质财产、收入来源、不动产和武器全部上缴新联盟，然后完全终止原先的独立活动。不过，那次会议是新联盟缔造者们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面。同年8月召开的联盟成员会议只有“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的吉拉尼出席；尔后，“阿富汗民主伊斯兰革命”的纳比一去不归；“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的莫扎达吉退出联盟。随后，联盟的组成和名称又发生了若干次变更：“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同盟-7”和“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同盟-3”。只是到了1985年5月，在巴基斯坦的所有反对派组织才重新团结在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同盟-7”的旗帜下。尽管先前已有各组织自行解散的决议，但各派都保留了自己的机构。武装战斗队伍继续从命于在巴基斯坦的本党派首领和中心，而不是“同盟-7”。

不同派别的武装战斗队伍的活动区域经常成为他们的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军事冲突舞台，他们为控制地盘、争夺兵源

和物资食品而公开斗争。圣战者的头头们虽然在嘴上对此予以谴责，并赞同制止这样的冲突，但暗中却千方百计地鼓励和纵容那些得以把“对手”的人马消灭或者清除出自己控制区域的人。

比如，“阿富汗伊斯兰党”军事委员会在1981年的一条命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党的圣战者弟兄们应该努力去寻找其他党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装备仓库，在有利情况下夺取它们，并用于穆斯林圣战。除了仓库，还可以沿公路进行夺取武器和食品的作战行动。”“阿富汗伊斯兰同盟”成员职责也明确规定：“如果同其他派别组织成员的联系不能为本党带来好处，那就不能保持这样的联系。”

在后来的年代里，反对派又多次试图联合起来，但这仅仅是为了在外国贷款者面前展示一下反对派领导阶层的团结统一。1986年8月，设在巴基斯坦的5党总部（“阿富汗伊斯兰同盟”、“哈列斯伊斯兰党”、“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阿富汗民族救亡阵线”）再次试图对不同党派的武装战斗队伍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制订了反对人民政权的共同斗争计划；组建了流亡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阿富汗伊斯兰同盟”首领布尔哈努丁·拉巴尼被选为新的“同盟-5”主席，并被责成组建政府内阁。

出于对整个反对派运动领导地位的垂涎，“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首领古尔别丁·赫克玛吉亚尔没有进入新同盟，而他麾下的叛乱分子队伍是规模最庞大的（1193支队伍共40570人，几乎是阿富汗叛乱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拒绝合作的是“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的首领阿卜杜尔·拉苏尔·塞亚弗，他拥有125支队伍，4300人，占叛乱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

从今往后所有联合统一的企图都徒劳无功，即使在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以后，这仍然是反对派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圣战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土匪。这样一来，就团结统一而言，民族基础就比意识形态因素和宗教因素变得更具

分量了。难怪苏联撤军以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策动下，1994年发起了亲普什图的政治宗教运动——塔利班伊斯兰运动，其武装战斗队从事针对原圣战者的作战行动。

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反对派组织总部指挥阿富汗本土上的叛乱活动。总部一般下设军事委员会、侦察和反间谍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医疗委员会等。为了灵活而有效的指挥边境地区的叛乱活动，大多数反对派都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克维塔、帕拉契纳尔、杰里－芒加尔、米拉姆沙赫）和伊朗的一些城市（麦什希德、扎勃尔）设有自己的代表处，也就是本党的分部。

总部和这些代表处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有：控制阿富汗境内反对派武装力量的行动和辖区内的局势；计划并实施作战行动；筹备并派遣运送武器弹药和技术物资保障设备的马帮队前往阿富汗；为武装战斗队提供资金；建立基地，构筑工事和不同用途的仓库；协调不同派别的武装战斗队之间的行动。

各反对党派的组织机构基本相同，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党的领袖和第二把手、执委会领导人和有威望的神学家。党的日常工作机构是执委会，它由若干职能部门组成：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医疗委员会、计划委员会、预算委员会……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委员会也受执委会领导，执委会还要负责控制武装战斗队和辖区内的局势，拟定作战行动计划，筹备调遣运送武器弹药和技术装备的马帮队，向武装队伍提供资金；保障基地的建设、构筑工事和各类仓库，以及受训人员安全穿越边界；此外，还必须负责协调不同派别作战人员之间的行动……。

反对派武装力量在阿富汗本土的活动接受设在叛乱分子控制地区省、县、乡、镇、区的伊斯兰委员会直接领导，同

时也接受联合了若干武装战斗队并号称“方面军”的较大规模的战斗组织指挥部的领导。

伊斯兰委员会的组成通常是主席一人，副主席一至二人，以及法官、毛拉、征税人、居民点的马利克和叛匪队伍头目等，总人数根据他们的活动规模而定，5到30人不等。若干村委员会或乡委员会隶属于县中央委员会。若干规模较大的此类中央委员会联合为同盟，其活动范围分布于相对广泛的区域。



阿富汗反对派在巴基斯坦

如上所述，反革命的联合组织“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同盟-7”和“同盟-7”都是于1985年5月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直接压力下纠集“七同盟”（“阿富汗伊斯兰党”、“阿富汗伊斯兰联盟”、“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哈列斯伊斯兰党”和从“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及“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分裂出来的3个团体）和“三同盟”（“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和“拯救阿富汗民族阵线”）残余拼凑起来的，它还包括伊斯兰逊尼派反对党中的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势力。

应当指出，这一同盟完全是为了招摇的，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其中4个党属于原教旨主义，3个属于保守主义。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一个区别性特点在于从根本上缺乏统一的政治思想体系，尽管它们都善于伊斯兰的诡辩术，也反对“无神论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阿富汗抵抗运动没有统一的领袖，每一党派的首脑都觊觎这个位置，这也是他们之间始终解决不了的矛盾。

“同盟-7”领导层内分歧的症结在于各党派各团体对叛乱运动领导权的竞争，对可以把自己推向国际舞台的这种权力的竞争。党派间的分歧向来都存在，扎希尔-沙赫国王时期，就是这样的分歧使得加入“过渡政府”的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这也是因为“阿富汗伊斯兰党”和“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各自在人数和军事力量上有优势而要求单独领导叛乱运动所造成的。

各反对派党魁无法解决“同盟-7”框架内的组织问题，反对派队伍中间也就没有了名符其实的统一。其中有些组织常年无所事事，对叛乱活动不发挥任何作用。联盟高层每个月召开两次例会的决议也没有实际效力。每一反对派都保留了独立做主的权利，各派设在边境地区的本党总部实施作战计划，而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巴阿边界对叛乱分子来说始终是自由开放的。

供参考的资料汇编

“阿富汗伊斯兰党”首领古尔别金·赫克玛吉亚尔 1944年出生于库杜兹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普什图族。在喀布尔大学工程系学习期间成为极端的“穆斯林青年会”组织的缔造者之一。1972年因抨击王室和皇族，以及参与同“常明火”组织的冲突而被捕入狱，1973年阿富汗君主制被推翻后获释。

他曾经主张建立进步的阿富汗。1973年至1975年，达乌德下令镇压宗教界人士期间，他被推举到反对派的伊斯兰运动领导行列，1974年流亡到巴基斯坦，纠集“穆斯林青年会”余部成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党”。该党得到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资助。在建党的当年夏天他们就企图在潘捷舍尔、拉戈曼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被政府军镇压，逃生者返回巴基斯坦后获得了政治避难资格。

赫克玛吉亚尔密切注视伊朗伊斯兰革命进程，试图从中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方针。1979年访问伊朗期间，受到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接见。

他几乎同所有反对派领袖之间都有尖锐分歧，并且随时随地受到巴基斯坦政权的压力和监视。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

西方援助，他被迫冒着得罪美国的危险投机地把自己的总部从巴基斯坦迁往伊朗，这样也便于同穆斯林国家，首先是同伊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他还拥有宝石加工厂、毒品加工厂、玻璃制品厂和水泵厂，并从为阿富汗难民提供医药、食品和服装的基金会里捞取钱财，购买商业和工业股票，把数以万计的美元存入国外银行的个人账户，1987年3月，他在瑞士巴塞尔一家“美国便捷银行”的个人户头上一次就入账24.5万美元。

他不择手段地敛财。通过冒名顶替的分支机构和小商贩，以批发和零售方式出售本该提供给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的服装、食品和药品，甚至不惜倒卖旧服装。他的原则：钱是不会发霉的。

赫克玛吉亚尔和亲信们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建立了毒品生产网，把鸦片罂粟加工成海洛因，通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贩运到欧洲和美洲（包括美国）。他们批发销售毒品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利润。在毒品生意的支持下“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战斗队伍才显得那么嚣张，他们企图独霸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和霍斯特两省，正是在这些与巴基斯坦的接壤地区，包括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份，隐藏着他们的大片鸦片罂粟种植园。

赫克玛吉亚尔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透露，“国际朋友”提供了化学武器，同时指示派遣人员到美国教官那里学习使用技术。

另一个反革命政党“阿富汗伊斯兰同盟”的头领布尔哈努金·拉巴尼，1940年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塔吉克族，所以特别受到非普什图族人的欢迎。

1963年毕业于喀布尔大学神学与法学系，留校任教期间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头脑人物，并且奉命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学生组织“穆斯林青年会”。1965年赴埃及“阿里-阿兹哈尔”大学求学，3年后获伊斯兰哲学硕士学位回国，继续任教于喀布尔大学。作为神学教授，他有不少

文字作品，而且在国际穆斯林神学界很有名气，同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活动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他熟练掌握波斯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英语和土耳其语。

1973年，拉巴尼被选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并掌权至1976年。达乌德执政后，他受到政府通缉，为逃避追捕不得不躲避到仍然反对政府的部落地区，后来在移居巴基斯坦期间，利用“穆斯林青年会”成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阿富汗伊斯兰同盟”。

1978年4月之前，拉巴尼是个地毯出口商，除了地毯厂，他在巴基斯坦还拥有家禽厂和纺织厂，年利润为2000万卢比；另一个收入来源是通过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下级部队头目进行的走私交易和毒品交易。目前，他已经是穆斯林国家鸦片和海洛因来源的最大供应者之一，他还参与走私贩运巴达赫山省的青金石和潘捷舍尔省的绿宝石。

拉巴尼不知羞耻地动用国际社会提供给阿富汗难民的援助资金，以维持地下辛迪加的正常运转。仅1988年年底至1989年初的6个月时间，他在美国和欧洲一些银行里化名“塔菲尔·穆罕默德”的账户上增加的存款就相当于6亿巴基斯坦卢比。在巴基斯坦的恰拉特和达拉-阿达姆-谢尔两地都有受他控制的地下鸦片加工厂，还建立了代表机构网络，负责毒品的非法输出，克维塔和卡拉奇两地是主要的转运站。

拉巴尼派往阿富汗的人员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瘾君子，半数人偶然吸食。他们在毒品的陶醉下常常透露说自己经常执行责任重大的袭击任务：烧毁医院、水井投毒、杀戮妇幼、沿途抢劫、盗窃百姓。不义之财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拉巴尼的腰包。他把这些资金投入改善毒品生产环节和运输，并设法使自己这种所谓的“捍卫伊斯兰”的丑恶行径避开国际刑警组织的视线。

他主张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绝对奉行伊斯兰法典的伊斯兰共和国。他立足于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同时在与赫克玛吉亚尔进行“同盟-7”领袖地位的竞争中力争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

拉巴尼在阿富汗中部和北部地区享有较大影响力。

“拯救阿富汗民族阵线”领袖谢卜哈杜拉·莫贾达吉1925年出生于喀布尔一个在阿富汗历来有影响的氏族家庭——哈兹拉特世族（预言家的后代）。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从印度迁居阿富汗的阿拉伯世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莫贾达吉在埃及著名的“阿里-阿兹哈尔”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缔造者阿尔·拔纳。后来曾先后在几所寄宿学校任教，是喀布尔大学伊斯兰法学教授，1960年由于反政府宣传和企图谋害当时在喀布尔逗留的苏联代表团而被判处4年监禁，但几个月后获得监外执行。随后移居国外，落脚哥本哈根，领导起当地的伊斯兰中心，在穆斯林侨民中间进行宣传工作。

后来他在阿富汗以神学家和雄辩的演说家著称，在集会和自己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必须“恢复伊斯兰的真实面目，必须使其具有进取性质”。他还反对国王的改革，并积极参与了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组建。塞亚弗证实，当莫贾达吉要求加入“穆斯林青年会”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其领导人担心随着莫贾达吉的到来，他们可能会受到排挤。

1976至1977年在巴基斯坦期间利用“穆斯林兄弟会”中间的温和派成员成立了“穆斯林神学会”，1977年至1979年初在荷兰生活期间做清真寺主持。

1979年3月12日，莫贾达吉向全体阿富汗穆斯林发出呼吁，决定开展“圣战”反对人民民主党统治……他被看做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西方方案拥护者。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在伊斯兰学说和私有制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教权

主义国家。莫贾达吉掌握 5 种外国语言。

四月革命之后，莫贾达吉一派的成员有 75 人之多遭受镇压。在亲友的帮助下，他与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伊斯兰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沙特阿拉伯住着他的表哥和嫁给执政王朝家族中一位王子的表姐。

莫贾达吉同梅尔赫纳戈尔（民族和部落事务部长苏莱曼·拉耶克之姐）育有 4 子，其中一子阿兹祖拉死于“阿富汗伊斯兰党”恐怖分子之手，这也是莫贾达吉同该党领袖赫克玛吉亚尔结下私仇的原因之一。

印度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表明，莫贾达吉家族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

莫贾达吉早就是个只看重钱财的人，阿富汗同胞在异国他乡遭受苦难的命运丝毫不能打动他，有事实为证：当亚拉瓦里和亚利扎两处难民营里的居民在疾病和饥饿折磨下被迫发出痛苦的反抗声时，莫贾达吉残忍地命令武装人员予以镇压，不满者被指责为叛变，就地枪决。

依靠本派的政治、经济、财政关系和宗教影响，莫贾达吉成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东部和东南部普什图部落居住区，他享有特别的影响力。他不接受阿富汗政府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主张把国家领导权托付给扎希尔－沙赫一个人。

“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首领塞义德·艾哈迈德·吉拉尼自诩为阿富汗民族精神的感召者和思想导师，他 1931 年出生于祖籍伊拉克的一个阿拉伯后裔首领家庭，父亲谢义德·纳吉卜·萨义普·巴戈达吉是宗教界名人，同扎希尔－沙赫国王的父亲纳吉尔－汗一家关系密切，在英国人帮助下当选为逊尼派社团“卡吉利亚”的最高主席，吉拉尼继承了父亲的这一职位。大部分阿富汗人、特别是普什图人都属于这一社团，它还拥有大量穆里德派信徒。吉拉尼的母亲玛尔塔·里希特是德国警界一位高级要员的女儿。

吉拉尼在西方接受上层社会教育，在伊朗接受宗教教

育，去过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掌握5种外语。他的家庭在喀布尔是富有的，而且很具影响力，君主制被推翻之前，同国王很亲近（吉拉尼曾经是扎希尔·沙赫的私人顾问），并且同政府要员和高级军官过从甚密，这些人在1978年以后陆续加入了“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

他在许多大城市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房地产，在喀布尔拥有汽车寄卖店，1978年四月革命前评估的个人资产为700万美元。逃亡巴基斯坦以后，利用搜刮的民财在拉瓦尔品第和伊斯兰堡购置了两处别墅，以及几辆豪华轿车、汽车修理厂和商店。吉拉尼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常去美国旅行，贪色好酒，喜欢奢侈，挥霍难民资金，为此招来阿富汗反对党原教旨主义派首领的批评。

仰仗同国王家族和普什图部落宗教界的广泛联系，以及个人财产，吉拉尼在普什图人居住省份拥有影响力。他是个态度温和的政治宗教领袖，主张建立新型的“穆斯林民主”，拥护建立以扎希尔·沙赫，或者他的亲信为首的政府和共和国，趋向同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保持多方面的事务交往和私人关系，他妻子是前国王扎希尔·沙赫之孙女。

“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领袖穆罕默德·纳比1920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神职人员家庭，普什图族。接受过高等神学教育，是一个观点保守的穆斯林、出色的演讲家，在宗教界享有威望。1973年之前在洛加尔省的伊斯兰学校教书，是议会代表。利用职权在吉尔福德省非法侵占土地100公顷。反对西方文化对阿富汗的渗透。

鲜明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共分子，创建了宗教活动家小组，拥护伊斯兰生活方式，抨击共产主义和进步思想。

1973年达乌德掌权后，纳比不满扎希尔·沙赫的垮台和自己失去议会中的位置，从而反对改革和达乌德政权。由于撰写和传播反政府诗歌而被警察局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来跑到南方继续从事类似宣传。1975年被警察当局收买，进入从事针对爱国主义者进行侦查的侦探组织机构。1978年逃

亡巴基斯坦，在“可兰经”组织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其领导层大多是来自阿富汗西南地区著名的宗教和神学界人士，是极端的伊斯兰反动组织。由于拥有大批来自基层的不怕死的毛拉，所以该组织具有狂热的宗教主义性质。纳比主张以武装斗争反对阿富汗政府，但是不赞同赫克玛吉亚尔的激进主义，支持扎希尔·沙赫参与调解阿富汗问题。

从本组织的财务账中侵吞了 30 万巴基斯坦卢比，为自己的新娘订制了金质桂冠。

“哈列斯伊斯兰党”首领穆罕默德·犹奴斯（哈列斯）1919 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宗教人士兼地主之家，普什图族。没有接受过高等神学教育，只是跟随父亲学习过宗教知识，但自诩神学者。在喀布尔清真寺做过毛拉，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情报机构雇员，有犯罪记录。1963 年至 1973 年在首都组织领导一个由毛拉组成的原教旨主义者小组，主要在清真寺从事宣传。发表过一些政治和宗教题材的专著，同前国王扎希尔·沙赫一家有联系。1976 年，哈列斯同自己的小组一道加入“阿富汗伊斯兰党”，达乌德执政时期他在几个省做过神职人员。

1979 年底，因与赫克玛吉亚尔失和而退出“阿富汗伊斯兰党”，组织了自己的同名党。

他把原配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到了沙特阿拉伯，并不顾周围人的反对，于 1982 年 5 月娶了坎大哈省一个富有宗教名流家庭 18 岁的女儿为妻，指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实力。

哈列斯是阿富汗反对派领导人当中惟一常年居住在国内的人。狂热的宗教主义情绪决定了他推崇恐怖和暗杀方针，他反对人民政府的手段也是最卑鄙的。

阿卜杜尔·拉博·拉苏尔·塞亚弗是“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的首领，1944 年出生于喀布尔，是个阴险凶残的人。1964 年加入非法的原教旨主义者小组，1967 年喀布尔大学神学系毕业后服兵役一年，两年后加入“穆斯林青年会”。

1970年，利用教会得到的一个名额，塞亚弗（根据传说，他出身的塞亚弗家族是预言家的后裔）被派往埃及的“阿里-阿兹哈尔”大学接受神学高等教育，并且与沙特国王法赫德同班学习。1973年依靠国家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伊斯兰法，回国后被控残酷迫害百姓和企图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捕入狱6年。

1980年初刑满获释后，塞亚弗即前往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成员。1982年3月在联合所有反对党派的尝试失败后，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善于搞阴谋，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有走私和贩卖毒品的记录，在反对派头目中间威望很低。^①

独立的西方记者在描绘“同盟-7”的头头们时，实际已经证实了苏联和阿富汗侦察机构和情报部门得到的这些人的资料。一位美国的官方代表认为“赫克玛吉亚尔是最狡猾无耻的人”。在“美国应该加强监视对阿富汗叛匪的援助”一文中，著名记者戴维·克莱因这样写到：“在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潘捷舍尔雄狮）和伊斯玛伊尔·沙赫那样真正的战地指挥员由于弹药不足而苦苦挣扎于战场的那几年里，待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的各党派官僚和公职人员却随时准备不劳而获地得到中央情报局每年拨出的600万美元中的自己那一份。在战场上你很难见到自称为‘白沙瓦男人’的那些家伙们，但你可以看到他们乘坐豪华吉普车在街头狂奔，在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各种宣传，或者设下诡计来反对比自己更富有和更知名的对手。在其中一些人的办公地附近，你还可以看到有美国装备和粮食出售。”

“……两个月以前，阿富汗独立通讯中心受人尊敬、知名度高的纳希姆·马日鲁赫先生在白沙瓦自己的办公室门前被枪杀。他曾经是喀布尔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正准备公布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揭发了以古尔别金·赫克玛吉亚尔为首的

^① 引自“同盟-7首领档案”。

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反政府的极端行为。在白沙瓦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凶杀案是‘阿富汗伊斯兰党’所为。”

“最近一段时间，不同派别叛匪针对西方记者和技术人员的野蛮袭击有所增加。每一次事件都发生在对他们的宣传报道有所减少，或者他们感到在援助的分配中自己的优势受到了威胁时。去年9月，‘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武装人员扣押了执行援助任务的法国医务人员，当时他们正前往另一派武装控制地区。7名法国医生和3名技术人员被圣战者扣押了10天。他们的个人财物和价值7万美元的药品被掠夺一空。10月和11月，叛匪又对另外两支法国医疗队设了陷阱。”

“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阿富汗伊斯兰党’成员杀害了英国电视摄影师恩吉·史普科维卡。他是在作战现场做报道的最有经验最勇敢的摄影师之一。目击者证实，史普科维卡落入4个‘阿富汗伊斯兰党’成员的埋伏，他们后来被逮捕仅仅是因为企图把英国人的摄像机带入巴基斯坦……。”

“据认为，他们还参与杀害了两位独立的美国摄影师：来自纽约的李·沙贝罗和来自洛杉矶的詹姆斯·林捷洛弗。他们的向导是‘阿富汗伊斯兰党’的人，说他们死于苏联武装直升机的进攻。虽然大多数观察家倾向于这一线索，但也有人认为他们两人死于‘阿富汗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同对手之间的火拼中。”^①

斯蒂文·加尔斯梯尔说：“……直接指挥反政府战斗的战地指挥官们并不喜欢盘踞在白沙瓦的反对派头子们，因为他们都是被收买的机会主义分子，连一场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就可以享受战争带来的政治利益。”^②

① “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8年5月24日。

② 《阿富汗战争与调解：和解的前景如何？》，《第三世界期刊》，1988年10月，第1505～1541页。

阿富汗反对派的理论家们发表的文章佐证了“同盟-7”领导人的不光彩行径。比如，法吉里写到：“在移居国外和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移民，以及建立起政治、军事、经济管理机构以后，反对派运动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利用权力杠杆把援助物资作为战乱年代的酬劳来获取。这种趋势演变为对权力、职位、财富、特权的追求……最痛苦的现实是我们面对着歪曲了我们自己方针路线的实例，也就是在为了暴富和生活舒适而不惜非法占用资金的那些人与丧失了最低生存手段而只求一口面包的那些人之间产生了分歧……。”^①

▼ 在伊朗的阿富汗反对派力量

这里也存在伊斯兰反对派组织，而且全属什叶派，它们是1979年4月开始在伊朗境内形成的。那些在居住于伊朗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权以后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人中间比较有威信的人被挑选做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成员，武装战斗队的普通成员也挑选了以前就在伊朗工作生活的阿富汗人（1978年4月以前，有60万阿富汗人为了挣钱常住在伊朗）。1980年1月起，反对派开始把难民作为战斗人员的补充来源。始于当年9月的、蓄意挑拨的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转变为双方的武装冲突，并且一下子延续了8年。这限制了伊朗的能量，牵制了伊朗的部分军力，有利于巴基斯坦在该地区加强自己的地位，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伊朗境内迅速成立了许多阿富汗反对党派。由于在获取更多财政援助和人员武器，以及为这位或者那位什叶派人物寻求庇护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

伊朗的什叶派领导人向来把阿富汗的反对派组织看做是政治军事力量，借助其可以稳定阿富汗局势，削弱民主制

^① 《齐亚·哈克》杂志，1982年，第1~6期。

度，还可以促使民主制度的垮台；从长远看，建立一个在伊玛目（首领）霍梅尼或者其继承人保护下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然而，扎根在伊朗的反对党派并不具备“联盟-7”中那些亲巴基斯坦党派所享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为他们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主要来自伊朗，而伊朗的主要资源都被牵制在了伊朗—伊拉克边界，所以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是有限的。

由于战事在东部和西部边界同时展开，伊朗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苏联领导人当时能够给巴基斯坦制造类似局面……比如，诱使它同印度发生冲突，那么我们在阿富汗就会主动得多。

1985年，由执政宗教界直接参与，在伊朗的阿富汗反对党派组织合并成为“联盟-8”。这个联合组织重新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联合委员会”。其成员有：

“胜利党”是亲伊朗的什叶派组织，成立于1980年。其头目阿卜杜勒·阿里·玛扎里和沙法克都生活在伊朗，并且仰仗宗教领袖二号人物蒙塔泽里的支持。战斗人员将近4000人，其特点是武器装备好，弹药补给充足，作战训练素质高；军事总指挥官是穆罕默德·侯塞因·萨德基，主要活动区域是阿富汗中部，但总是经常不断地同竞争对手，特别是同亲巴基斯坦的队伍发生冲突。伊朗和美国对其予以军事和财政援助。总部设在伊朗的库姆。

“真主党”是1980年由伊朗领导撮合成立的，目的是团结起所有反革命叛匪力量，实现对阿富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头目是什叶派毛拉、自诩为“阿富汗什叶派精神领袖”的卡利·艾哈迈德·亚克达斯杰（独臂卡利）。该党成员必须信奉伊斯兰什叶派。大约有4000武装人员，他们特别凶残地对待拥护执政者的人。活动区域主要在阿富汗西部和南部省份。总部设在麦什特，在伊朗其他城市有分部。

“阿富汗伊斯兰圣战军团”成立于1983年，是伊朗“伊斯兰圣战军团”控制下的亲伊朗组织。作战人员有1500人，

经常同“胜利党”联手行动。总部设在库姆，头目是艾克巴利。

“伊斯兰革命联合阵线”成立于1983年，主张承认霍梅尼为世界伊斯兰运动领袖和建立伊朗式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部设在库姆，有作战人员2500人。

“阿富汗伊斯兰运动”是反革命势力中比较强大的一支，成立于1979年。密切配合加兹尼、坎大哈、赫拉特、喀布尔等地山区哈扎拉人的地下活动，有同亲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和“阿富汗伊斯兰同盟”合作的经历。头目为穆罕，穆罕默德·阿谢夫·莫克谢尼（坎大加里）。总部设在麦什特，代办处设在很多城市。作战人员有3000多人。1981年由于头领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两个组织：“坎大加里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和睦委员会”。

“伊斯兰和睦委员会”哈扎拉人的什叶派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领袖阿里·别谢什吉，军事指挥官塞义德·贾格兰。由于贾格兰保持着同伊朗宗教界的联系，所以伊朗政府对该组织的信任是有限制的。他们的政治纲领包括要求苏联撤军和给予哈扎拉自治。作战人员有6000人，主力分布于加兹尼省和巴米扬省。避免同政府军作战，主张同政府进行谈判。

“伊斯兰革命运动”是从亲阿富汗的“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头目是纳斯鲁拉·曼苏尔。他们受到伊朗领导人的信任，并被利用来在立足于巴基斯坦的反对党派中间扩大伊朗的影响。作战人员约800人。纳斯鲁拉总是把自己的行动同赫拉特省的“阿富汗伊斯兰同盟”首领图兰·伊斯玛伊尔协调起来。

“阿富汗捍卫伊斯兰战士组织”是哈扎拉人的什叶派反革命组织，头目是莫斯巴赫-扎杰。领导层同“胜利党”关系密切。

建立这一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联合起伊朗领导下的阿富汗什叶派反对党派，以扩大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规模；阻

止亲巴基斯坦的“同盟-7”对阿富汗局势发展以及其他有关情况方面垄断性影响的扩展。“联盟-8”政治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把阿富汗共和国演变成为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其领导人物以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中心（库姆、麦什特、吉尔贝拉、纳加）为靠山。

什叶派反对派阵营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采用了伊朗伊玛目（首领）霍梅尼强加给他们“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方针政策。在“联盟-8”的纲领中，霍梅尼被宣布为阿富汗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领袖。声明同美国和其盟国，以及否定伊朗宗教界在伊斯兰世界统帅地位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彻底决裂，并把伊朗看做是阿富汗什叶派捍卫切身利益的惟一保障。拒绝了阿富汗政府就包括组成联合政府和实现民族和解政策提出的建议，同时宣布在日内瓦举行的巴阿和谈是非法的，为什叶派所不能接受的。

比较坚定地拥护输出伊朗革命这一思想的党派和组织是“真主党”、“胜利党”和“阿富汗伊斯兰圣战军团”。

依靠伊朗支持的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对伊朗而言，其领土上的阿富汗人是补充人力的资源。伊朗就是需要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人，利用他们的痛苦和悲剧来实现霍梅尼对别国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计划。

除了反对党派控制下的武装战斗队伍之外，在伊朗还活跃着封建土匪武装和毒品生意武装，这是在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强盗行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得到解决。毒品商贩在阿富汗农民手中购得鸦片半成品，运往巴基斯坦和伊朗。

反对派战地指挥官

叛乱运动的特殊性造就了特殊类型的军事领导人——武装土匪性质的战地指挥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富汗伊斯兰同盟”武装匪徒的头目阿卜杜勒·巴希尔、亚利恩普尔、

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土兰·伊斯玛依尔；“哈列斯伊斯兰党”武装匪徒的头目捷拉鲁金·哈卡尼、马哈茂德、西罗德曼、伊斯玛依尔“博士”、苏菲·帕亚达、扎比布拉、法捷赫；“阿富汗伊斯兰党”武装匪徒的头目塞义德·曼苏尔、穆罕默德·巴希尔、法利德；“伊斯兰和睦委员会”武装匪徒的头目塞义德·阿里·别赫什吉、塞义德·穆罕默德·哈桑、穆罕默德·亚谢夫·莫克谢尼—坎达加里；“哈列斯伊斯兰党”武装匪徒的头目马哈茂德；“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武装匪徒的头目尼克玛玛达、阿卜杜拉赫曼、姆拉·纳西姆、姆拉·玛兰戈、加法尔；“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武装匪徒的头目乌拉玛玛德等。

这些人直接领导反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武装斗争，不但在叛匪中间，而且在百姓中间都享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知名度常常高于栖身国外的反对派领导和阿富汗侨民的头面人物。

在国外的其他阿富汗反对派组织

除了立足于阿富汗国内以及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反对党派以外，还有一些反对人民民主党的组织落脚于其他国家。

国际组织着手使反对派阵营的穆斯林党派和组织合法化，这样便可以在纯粹的阿富汗基础上“以支援难民的名义”全面扩大援助叛匪的规模。出现了大量改头换面的“关心阿富汗人民处境”的社会团体、同盟会、委员会，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年代。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正加强反苏宣传。

反对派阵营拥有设在美国、西欧和其他国家的各派组织的广泛网络。

在美国有若干正式注册的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团体：“援助阿富汗难民协会”、“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在美阿富汗解放组织合作委员会”、“统一委员会”、“加利福尼亚阿富汗人联合会”、“美援阿协会”、“阿富汗人救国委员会”、“在美阿富汗人协会”、“对阿富汗负责的知识分子委员

会”……。

在法国活动的组织有：“声援阿富汗人民反抗运动”、“巴黎人权委员会”、“阿巴友谊协会”、“医生无国界”、“袭击”，他们全都是通过在法国的一些团伙，比如“进步大学生小组”、“坦达尔小组”、“扎克里亚兄弟小组”和“沙赫·阿谢弗小组”与叛匪保持着联系。

在联邦德国与联邦军进行合作的有阿富汗反对派的合法代表机构：“普什图人委员会”、“法兰克福阿富汗首领协会”、“阿富汗人民合作委员会”、“阿富汗文化中心”、“境外阿富汗学生联合会”、“援助阿富汗难民基金会”等。除了宣传任务，这些机构还扮演武器销售中间人的角色。

在意大利的罗马，代表阿富汗侨民说话的是一个“亲君主制团体”，它试图联合和指挥反对派力量来对抗现政府，并且还网罗国王当政时期的政府要人和政界、军界人士，其中有原阿富汗军人阿卜杜勒·瓦利上校。另外还存在着“国际援助委员会”和“阿富汗圣战者团结委员会”两个组织，它们的目的是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叛匪。

在英国活动的反对派组织有“阿富汗团结、和解与对抗运动”和“声援阿富汗委员会”，1985年还设立了“同盟-7”驻欧洲代表处。

在埃及成立了组织落实对阿富汗叛匪进行资金和军事等援助的“团结阿富汗人民委员会”。

在土耳其大约有2万阿富汗难民，他们集中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东部某些城郊的难民营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捐款以“救济阿富汗难民基金会”的名义汇往位于巴基斯坦的反对派组织。

在科威特的一万阿富汗难民受控于“玛赫布博·沙里弗”组织。

在印度的3万难民中有4000人是“阿富汗社会民主党”、“穆斯林兄弟会”国际分支机构和“扑不灭的火焰”等组织的成员。

在其他国家活动的反对派组织还有“战斗的阿富汗人民”等。它们拥有可观的资金，一般都立足于所在国家的首都，其活动重点就是给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



阿富汗的反对派武装阵营

如上所述，反对派的初衷是推翻人民民主党政权，建立神权制国家。

反对派领导人最初确定的任务包括：积极从事武装斗争；号召百姓不要服从各级人民政权机构；在人民中间进行反政府宣传；策划和实施针对人民民主党、国家机构、军事部门、苏联军队和法制部门代表性人物的暗杀行动；破坏政府的征兵工作；破坏交通干线，袭击哨卡、哨所、驻防军和公路运输。武装斗争一直受到优先重视。

始终处于紧张、恐怖和不安状态的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不可能生活得自由。

圣战者的行动具有下列特点：政治局势直接影响战术策略；不对手发生经常性的作战接触；避免公开的军事冲突；力争在不与政府军和苏军发生战斗的前提下消灭他们的人员，销毁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尽量在苏军抵抗能力最小的时刻发动袭击；为执行作战任务进行的力量集结迅速而隐秘；速战速决，遭到对手袭击时能有组织地撤离；尽量在远离己方基地的区域进行作战行动；在转移和作战时广泛利用地形地物、黄昏、气候恶劣、能见度差等自然条件；不断扩大控制地区，吸引当地百姓参加反对苏军的斗争；在选择行动方式和执行时间上具有高度主动性和自主权；在给对手实施疲劳战和破坏行动方面运用新式武器。

叛乱运动的主要活动方式有：武装斗争、暗杀破坏行动、怠工罢工、各种意识形态性质的行动。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包括利用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国际性组织的讲坛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圣战者武装斗争的基本做法是，在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驻地消灭我方人员；对公路、机场和其他重要目标进行破坏；对党和政府机构代表进行恐吓和暗杀。总体上讲，阿富汗的起义运动可以概括为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只不过他们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地运用了恐怖主义的战术和手段。

由于叛匪一方缺乏足够的、同政府军特别是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作战的组织有序、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作战队伍，所以必须采取游击战术。因而叛匪一方总是在政府调集足够数量的部队对他们实施沉重打击之前尽量控制更多的区域，但从不对自己的控制区域进行防御，因为防御战会使他们遭受重大伤亡，所以他们很少固守阵地。遍布阿富汗全国的叛匪武装活动迫使苏联军队在各地设立许多驻防军，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而这有助于叛匪监控自己的领土。

反对派武装队伍的活动都是区域性的——局限于自己的监控地区。同时，不同反对党派的武装队伍之间为扩大自己监控区域而进行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阿富汗圣战者颇具个性的行动特点可以归纳为：良好的组织性；偷袭的出其不意和速战速决；当地居民加入武装队伍的普遍性；作战中的绝对残酷性。圣战者们被忠告在每一次作战行动中都要给予对手突然性打击，最大限度地重创对手后迅速撤离。

后来，圣战者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和方式，为避免苏军和政府军的炮兵轰击和空中打击，他们就不再集结部队；在中部、北部和西部地区，圣战者化整为零，以10~15人的小组为单位；必要时便隐藏在百姓中间或者技术装备难于使用的高山地区。不过，确实有大股叛匪武装（艾哈迈德·沙赫、图兰·伊斯玛依尔、捷拉鲁金、塞义德·贾戈兰等）在若干年里一直活跃在阿富汗的东北部、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叛匪很好地安插了间谍侦察网，每时每刻都在密切监视我军的行动路线，以及驻防军和警戒哨的动向，通过声响信

号和光线信号（手电、篝火、镜子）来传递情报信息。为此，他们动用大量当地居民——牧民，甚至儿童。这使得叛匪在我军包围其据点或者屯兵地区时，得以及时撤离主力，留下小股人员设伏，或沿退路布雷和就地布雷。叛匪使用马匹、骆驼和其他驮畜向山里转移或者运送物资，所以在许多场合下比我军灵活得多。

如果在政府军行动前圣战者未来得及撤离主力和储备物资，他们会在1000米距离上使用远程炮和重机枪火力，或者在200到300米距离上突然开火，以图重创我军进攻部队，特别当我军失去了装甲车、炮兵和空军的火力支持时。然后叛匪就会撤离，撤退时叛匪一般会化整为零，每组10到15人，而且方向不一，借助事先布好的雷区保护，以及狙击手和重机枪火力掩护（也利用坎儿井、灌溉沟渠、羊肠小道和山缝）。他们逃跑时得手最多的情况是在夜间通过苏军和阿军布兵的缝隙和接合部。

叛匪惯于创造局部优势，在短时间里出其不意地用小股人员进行破坏行动；在保卫基地区域、大规模的转运站和其他重要目标时常会进行顽强抵抗。与我军意外遭遇时，叛匪总是尽快脱离接触，如果做不到，就予以坚决抵抗，而且会坚持到天黑，然后利用夜色撤退。只有在地形熟悉和人力物力占优的情况下他们才敢于同我们公开接火。他们了解地形，掌握山区的通道和秘密小路，所以被包围时从不抵抗，而是迅速撤离人员，转移物资，仅仅遇到退路被切断和需要保卫据点的情况下才进行抵抗，伤员和阵亡者尽量不留下。圣战者不止一次地在接到我军或者阿富汗政府军接近的消息后设置观察哨，安排两三人作为伍的小组掩护大队人马撤退进深山，藏匿武器，“消失”在平民百姓当中。

游击战的特点是行动果断、方式多样。在天黑以后（18点至24点）和无法动用空军的情况下，叛匪的行动特别积极，而且总是在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进行侦察以后，还善于利用我军指挥员的细微失误和呆板的指挥观念。



抵抗力量的基础设施

为了发展叛乱活动并发挥其作用，反对派阵营领导人特别注意基地、基地区域、大规模转运站和据点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基地区域位于远离苏军和阿军驻地、交通不便的山区峡谷地带，面积一般很大，主要构成有参谋部（伊斯兰委员会）、训练中心、各类仓库、修理车间、医院、居住房屋、掩蔽所和防空洞，还驻扎着后勤、警卫和防御部队。从建筑学角度讲，基地区域装备得很好，拥有发达的防御设施体系和障碍区，还有防空火力网的保护。

二、基地是属于某一个党派的、占地面积不大的建筑物，用来驻扎武装人员和存放枪支和物资，大约有几十处。

三、转运站和据点是反对派物资供应的中转地，位于同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地区的公路线附近，从邻国偷运来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正是在这里被活跃在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运输队接手转运。如有必要，武器弹药可以在此长期存放。

有趣的是，部分基地的建设过程十分漫长，早在人民民主党执政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用途是为了同达乌德政权做斗争。这是些地面和地下建筑（隧道式的、距地面 15 至 20 米）相结合的综合性设施。这里具备日常生活和作战需要的基本条件：拥有联络枢纽的指挥部、宣传和训练中心、若干军营、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仓库、汽车修理厂、武器修造厂、子弹装配厂、医院和监狱，还有行政管理楼以及供要人及外国代表住宿的公寓房。基地拥有独立的水电供应系统。

通往基地的要冲都处于在制高点装备了掩体火力点的三道防御线控制之下。整个区域拥有强大的对空防御系统：大批“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装置、重机枪和高射炮。

大部分基地都出现在 1983 年或者之后。为什么呢？那

一年的春、夏、秋 3 个季节，反对派武装一直在积极地作战。随着寒冷的冬季降临，他们本该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进行休整和人员、武器弹药的补充，同时在外国教官带领下进行作战训练，天气转暖以后，再返回巴基斯坦。但 1983 年的冬天，叛匪队伍第一次被禁止像前几年那样出去休整，开始在阿富汗境内直接建造基地和基地区域（比如，1984 年至 1985 年在赫拉特省根据联邦德国和伊朗军事工程师制订的计划营造了基地）。

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当局的协助下，阿富汗反对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训练中心以及阿富汗境内的基地区域建立并运作起军事训练的完整系统。这样便可以使用接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来补充死亡减员，使积极作战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的人员始终维持在 6 万人以上的水平。

专门从事这种军事训练的中心和据点总共有 212 处（178 处在巴基斯坦境内，34 处在伊朗境内），同时接受训练的人数可达 7.5 万人以上。

大部分训练中心都开设公共军事教学课，这包括射击武器的机械原理、射击实践操作、掌握作战的战术原理、判断地形技能的演练、简单的医疗救护。教学大纲规定了对阿富汗人的宗教政治说服工作和反政府反苏联宣传课程。在伊朗的库姆神学中心专门设立了宣传系对受训者进行思想工作，反对派武装领导人员的培训和暗杀破坏活动的训练受到特别的注意。

在部分培训中心，有人专门学习布雷和安放爆炸装置，使用重机枪等对空射击武器，还有的中心专门分班教授步兵对空导弹系统的战地实用技能，以及火箭弹发射装置的使用。教官有阿富汗原政府军军官，以及来自巴基斯坦、伊朗、美国、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人。

为了对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训练工作进行监督，专门组成了若干协调小组，它们不仅要监督培训工作，还必须总结在阿富汗境内作战行动和特殊行动的经验，研究起草建议书，

编纂教学大纲，并负责给中心配备教员和教官。

受训时间从两到三周至半年不等。大部分培训中心都是铁丝网围起来的帐篷城。规模大一些的还设有管理机构，并建造了营房。中心实行严格的出入通行证制度和统一的作息時間，并配备了组织良好的警卫。

在叛匪的军事培训系统中，附属于大的作战队伍的教学点和小组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里不仅能学会使用武器，还可以研究火箭弹发射装置的使用方法和运用技巧，以及布雷排雷方法。培训结束以后，叛匪即被派往阿富汗境内的武装队伍。

◆ 叛匪的武器装备

叛匪武装队伍的装备有射击武器和可以拆卸成部件后用牲口运载的重型武器。价格相对便宜的小体积的杀伤武器使得叛匪可以保持一个拥有的必要数量，而它们便于携带和便于运输，更促进了使用时的机动灵活。叛匪所用武器中大部分是苏式的，基本类型是中国和埃及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也有通过第三国得到或者在战斗中缴获的苏联制造的，或者美国制造的 M16A1 型步枪，联邦德国、以色列、英国和瑞典制造的冲锋枪。

使用比较普遍的武器有中国制造的 12.7 毫米重机枪；苏联、瑞士、联邦德国、以色列、美国和法国制造的便携式反坦克掷弹筒；美国和巴基斯坦制造的 75 毫米和 82 毫米无后坐力炮。大量使用的武器还有 60 毫米和 82 毫米迫击炮，它配备到叛匪的每一小组。1984 年年初，叛匪装备了大批中国制造的火箭弹发射起动装置，它们用于轰击苏军哨所和驻防部队，以及政府控制下的行政管理中心。

作为防空武器，叛匪使用了重机枪、山地高射炮和小口径高射炮，自 1981 年起又装备了苏联、埃及、英国和美国制造的各种型号的便携式对空导弹系统。

叛匪队伍还装备了各式各样的地雷、反坦克地雷、反步兵地雷，以及应用雷。在交通线附近活动的队伍最喜好使用美、英、意、瑞制造的各种型号的地雷，还有塑壳地雷，这东西很容易躲过探雷器，轻压就能引爆，以及定时雷、无线遥控雷。使用自制爆炸物（钢笔炸弹、收音机炸弹等）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叛匪各级队伍的指挥调动是通过日本、联邦德国、中国和苏联制造的短波、超短波设备实现的。

美国的分析评论家斯蒂文·科洛认为提供给不同派别的武器是不均衡的：“不论是巴基斯坦，还是西方的消息来源都一致认为阿富汗反对派中原教旨主义势力分得了武器援助中的最大份额。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对原教旨主义头目赫克玛吉亚尔得到武器和资金的50%的说法提出异议。尤萨弗说，当他在1987年离任时，赫克玛吉亚尔得到的份额是年援助总量中的18%到20%，而4支原教旨主义党派得到的援助加在一起为75%。其余3个比较温和一点的党派得到的援助就相对少了……美国和欧洲的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一数字的准确性，尽管他们认为，较之自己的竞争对手，赫克玛吉亚尔得到的武器在质量上好得多，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手下人表明他们能更好地使用中央情报局从1985年开始大批提供的武器和通信联络设备。”

还在阿富汗战争之初，美国就建立了一种采购体系，就是利用沙特阿拉伯的资金，通过埃及和以色列购买苏联制造的武器，然后发往巴基斯坦。最终目的地为阿富汗的武器和弹药从那里用机动车运往边境地区的转运站和基地区域，再利用马帮队分批运送到不同地点。在苏军和阿政府军活动比较积极的地区，马帮队就在阿富汗边界的另一侧组建。

对叛匪来说，把武器和弹药运送到阿富汗境内是一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所以报酬很高。

马帮队的规模有大有小。运送大批武器前往转运站和仓库的一般拥有25到100头驮载牲畜，或数量大致相同的汽

车，其武装护送人员可达 80 人。运送的武器数量少，马帮队的规模也就小，视货物的重要性还会增加护送人员。还有一种类型的马帮队是与在训练中心接受完培训的叛匪同行，其规模一般要小一些。

通常，在马帮队出发前几天，叛匪扮装成难民和小商贩考察一下线路，确认一下河流、峡谷和个别地段的可通行性，通过当地居民了解沿途的雷区、设伏情况和空中侦察频率。参与线路侦察的有走私货车司机、牧人，以及配备了摩托车的侦察人员，为了发现雷区和试探设伏情况，叛匪经常在事先驱赶牲口走在前面……。

只有在夜间，规模大的马帮队才运动于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控制的区域，白天，他们在加强了警戒的居民点或者转运基地休息。一旦到达专门构筑的基地以后，马帮队队长就会把武器和弹药转交给当地伊斯兰委员会的代表。

叛匪出没的路线将近 100 条，分布于不同方向：巴达赫山、库纳尔—南加尔哈尔、加兹尼—加尔吉兹、坎大哈、吉尔伯特、法拉赫、捷拉兹……这些运输线路的存在成为圣战者得以坚持武装斗争的关键条件。不切断这些运输线路，阿富汗政府就无法使国内生活正常化：得到境外多方面援助的反对派武装可以长期从事反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破坏活动。遗憾的是，尽管竭尽全力，控制马帮队运输线路的任务最终也没有实现。

◆ 圣战的方式和手段

阿富汗圣战者作战行动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有：利用重型武器（包括火箭炮）炮轰我方部队和居民区，袭击政府军哨所和力量薄弱的驻防部队，设伏，布雷，破坏国民经济设施，暗杀党政机构代表人物和军人……我在此仅分析其中几项：

1. 炮轰驻防部队和哨所哨卡是惯用手段，目的在于始

终让不同地区保持紧张气氛，最大限度地给对手制造精神和物质损失。

遭受炮袭的有居民区、部队驻地、警卫岗哨、工业设施和其他目标。马帮队沿途地区的边防哨所、驻防部队和警察分队也定期受到炮击，目的在于封锁他们，给他们施加精神压力，消磨他们的斗志。

对居民区和驻防部队炮袭时，叛匪特别注意集中不同类型火炮以达到密集火力的作用，他们总是使用不同型号的火炮从不同方向同时开火。

炮击公路交通线上的值勤岗哨是破坏行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岗哨是固定目标，叛匪熟知它，并且一直是他们的观察对象。作为吸引战术，有时射击一开始来自非主要方向，然后重型炮火才从主要方向射来。也有时，一阵扫射以后就停息了，仿佛局势平静下来了，而就在哨所上的警惕性有所放松时，密集射击从天而降，接着是攻占哨所和消灭我方人员。

进行炮袭时，叛匪们惯用安装在机动车上的火炮，这样可以不断变换射击阵地，并且在射击后迅速逃离。圣战者使用的武器有火箭炮、无后坐力炮、野战炮、迫击炮、山地高射炮、重机枪、手提反坦克掷弹筒等。炮袭总是在夜间发动，因为夜间测定发射位置难度大，空军协助也复杂化。

随着圣战者拥有了火箭弹远程发射装置，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炮袭。他们通常乘坐机动车辆来到安装了发射装置的地方，完成发射后（只用很短时间），在我军回击之前乘车从容地离开该地区；叛匪有时在夜间把弹药装填上配有定时器的发射装置后离去，炮袭会在预定的时间内发生，这样，政府军对发射地区的火力回击便会徒劳无益。

2. 炮袭总是伴随着偷袭，目的在于夺取武器弹药和食品，销毁军事装备和其他技术设施。

居民区、警卫岗哨、势单力薄的阿富汗驻防部队、各类仓库基地和政府机关都是偷袭目标。

执行此类任务时根据目标的情况来确定派遣人员的组成。例如，抢占阿军哨卡只需要 20 人到 30 人，袭击县、乡政府时就需要几百人。偷袭队伍都配备了附属的火力压制小组、工兵小组、火力掩护小组等。

3. 设伏是叛匪惯用的作战手段之一，目的在于截击公路上的军车和运输中的技术装备，也是为抢夺俘虏、武器装备和物资。公路设伏的主要目的在于爆炸军用和民用物资运输车队，以此来引起居民的不满情绪，迫使我们调遣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来加强公路运输安全保卫。“公路战”的战术取决于地形条件、目标性质和拥有的力量。其过程是炮轰公路交通警卫岗哨，在相应地段布雷设障。参加行动的有 10 人到 15 人的小组，或 100 人到 150 人的大队。执行设伏任务的队伍都配备了附属的小组：先头小组、观察小组、火力小组、后援小组。

在山区设伏通常选择地势陡峭地段或者谷地出口附近的山梁，也可以是谷地、狭窄地段入口和几条道路的交汇点。叛匪们经常在车队行进路线上设置一连串的埋伏点。设伏的匪徒的阵地利用地形地物掩蔽得很好，而且还有秘密通道可以撤退，所以对破坏车队是有把握的。设伏匪徒队伍包括先头小组、指挥小组、观察小组、火力小组、攻占小组、掩护小组、战术小组和诱敌小组。

叛匪的设伏队伍一般沿公路展开 150~300 米的长度，3 人~4 人为一小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5 米，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距离 25~40 米。两侧布置有反坦克掷弹筒、机关枪和狙击手，制高点处安置重机枪。车队驶近埋伏点时，警卫先头车和大部分运送装备的车辆一般会先被放过，然后诱敌小组会对车队中的警卫队伍开火，并竭力牵制住他们。同时，被放行的车队已经失去了警卫，他们在前面遇到设伏叛匪主力的攻击，遭受重创。打响第一枪的通常是狙击兵神枪手，运输弹药和汽油的车辆最受叛匪注意。他们利用遥控爆炸物使领头车辆停顿下来，如果车队中有装甲车辆，就使用

重机枪和反坦克掷弹筒。

设伏总是在下午或夜间，这样叛匪可以在进攻得手后于黑暗下撤离，此时是无法动用空军的。

在苏军和阿富汗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后的归途中，人员疲劳，警惕性降低，叛匪在这种情况下设伏最易得手。第40集团军司令员在一份报告中列举的一个例子曾经引起过强烈反响：“1984年4月30日，在潘捷舍尔峡谷战役进行中，由于第108机械化步兵师682团团长苏曼中校对待军人职责犯罪程度的冷漠态度，导致该团1营落入埋伏，并付出惨痛代价：53人阵亡，其中军官12人，58人负伤。当时位于机械化步兵1营后方的阿富汗部队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阿富汗指挥员的消极行为助长了敌人对1营的进攻……。”

4. 布雷一般在公路的“狭窄地带”，即桥梁、隧道、拐弯处、迂回弯道、上坡下坡，在那些视线受阻、行动受限的绕行地段。地雷通常布置在道路两侧，阻止车队遭受埋伏时人员向四下撤散。

布雷手段和技术不尽相同。在路面硬实的公路，地雷通常埋在下坡处和道边，在沥青和水泥下面：从两侧挖地道过来；也埋在被破坏的路基处。为加强爆炸物的威力，使用了应用雷，它们是用一些下脚料制作的（未爆炸的航空炸弹和炮弹）。

布雷时使用意大利和英国制造的地雷，也使用自制爆炸物，以及杀伤人员和毁坏车辆的定向爆炸应用雷。此外还使用填满汽油、煤油或柴油的应用雷，为提高威力还使用了硝酸钾。爆炸目标设施则使用伪装成被运输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的爆炸装置（筒和箱子）。塑胶雷也不鲜见，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巴基斯坦教官辅导阿富汗人如何制造和掩藏缓爆塑胶炸弹。为此，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化学和电子定时器。

5. 破坏性的恐怖活动是阿富汗反对派的惯用手段，被圣战者视为削弱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圣战者把恐怖活动当作达到目的的一个基本途径。伊斯兰运动思想家之一阿

卜·塔洛克·穆萨弗尔所著《游击战术详解》一书中指出：“恐怖活动是斗争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破坏行动小组在喀布尔、坎大哈、贾拉拉巴德、赫拉特、玛扎里—沙里夫等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中包括了针对苏联机构和苏联公民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喀布尔郊区叛匪控制地区驻扎着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恐怖活动小组，他们不仅在喀布尔市内，还在周边地区从事破坏性的恐怖活动。

叛匪的恐怖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対国家安全机构和警察机构的领导人、武装力量的指挥人员，以及党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人身消灭。执行这些任务的是那些在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欧洲国家和近东国家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小组。

恐怖主义活动的做法有：杀害负责官员或者把他们拘为人质；放火和盗窃；在公共汽车上安放磁性炸弹；使用装满爆炸物的机动车辆；利用未成年人在负责官员的轿车内安放炸弹；爆炸输电线塔；利用家畜把爆炸物送达集市贸易区；在市场和其他喧闹地区利用伪装的爆炸物（儿童玩具、钢笔、打火机等）。

培训恐怖分子和提供小体积武器为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美国在此是首当其冲的。1987年夏季有报道说，伊朗截获了一批中央情报局发运给阿富汗游击队的“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系统。伊朗人试图利用它们来对付波斯湾中受美国海军保护的那些船只。美国官方人士证实，这些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对空导弹系统在无辜的阿富汗圣战者手中“失窃”。而事实正如伦敦记者塞尔·沙赫所做的调查，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官方代表把它们转交给了原教旨主义人士中的一位领导人，而后者为了双倍的暴利，已经提前把它们倒卖了。

圣战者掌权以后，美国人开始关注伊斯兰宗教分子的动向，对买断或者销毁这批“失窃”武器的可能性表示出兴

趣。1993年1月，美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一等秘书罗伯特·巴耶尔会见俄军第201机械化步兵师代表契尔诺梅尔金上校时请求透露当年在塔吉克斯坦交易这批武器的地点。

评价阿富汗战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能不指出，这个国家的领土逐渐变成了射击训练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在此接受军事训练。在叛匪武装队伍里，首先在“阿富汗伊斯兰党”、“阿富汗伊斯兰协会”和“哈列斯伊斯兰党”的所属队伍里，参战人员大都是来自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印度尼西亚、乍得、孟加拉国、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者，其中还有来自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教徒，以及美国本土的“黑色穆斯林”教徒和苏联境内的穆斯林武装人员。

根据西方专家的估计，除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顾问以外，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数量大约为2500人。他们到阿富汗是为了挣钱，战争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尽管伊斯兰教善于雄辩，但这些人就是雇佣军。后来，不论是圣战者，还是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他们都没有放弃恐怖主义的做法，并且试图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把自己的思想推广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恐怖主义真正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祸害。以往的任何一個世纪也没有像20世纪这样“赠予”人类如此之多数量的恐怖主义牺牲品。现在，所有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这一恶魔，绝不允许阿富汗成为来自近东国家的那些国际冒险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无赖骗子们的栖身之地和避难所，因为这些人存心要把阿富汗领土当作向自己国家扩散“圣战”的基地。这会导致诸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这类国家的局势不稳定，而作为对轰炸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报复，甚至会波及美国 and 英国。藏身于塔利班控制领土上的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分子乌斯曼·本·拉登不止一次

地公开对美英发出过威胁。美国人当初帮助人家在巴基斯坦推广军事训练营地，提供资金培训圣战者武装和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对此，华盛顿今天不可能不感到懊悔。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为那些打着伊斯兰旗帜在许多国家制造灾难的恐怖主义者开辟了一条通道。

6. 反对派武装同苏联驻阿部队空军和阿富汗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且倾注了特别的精力。当直升机和战斗机为攻击地面目标而把高度降低至300米至500米时，反对派武装会使用所有类型的射击武器进行射击，以期击落；直升机和作战飞机在飞行中也会遭到射击，而且叛匪还会利用特遣小分队在机场附近设伏，在近距离对飞机射击；他们还装扮成当地居民混入特别行政管理区，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进行射击；可以说明问题的是，损失掉的飞机中有一半是在机场警戒地区被击中的。卡拉什尼科夫重机枪、掷弹筒，以及“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系统都是叛匪经常用来攻击飞行器的武器。毋庸置疑，普通的射击武器不会对飞机构成重大威胁，叛匪防空武器的不足在于缺乏摧毁高空和中空飞行目标的手段。为了提高对空作战能力，美国人向叛匪提供了现代化的“毒刺”式对空导弹系统。1986年1月，奥林·海特议员陪同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巴基斯坦就向圣战者提供“毒刺”导弹一事达成一致，半年后开始落实这项供应现代化对空武器的计划，总计有250套发射装置和近1000枚导弹。根据西方专家评价，“毒刺”式导弹的杀伤率为30%至75%，但是它们似乎迫使苏联军队“放弃了原来那套保证在战争中获胜的军事理论”。我以为，“毒刺”式导弹是影响战况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尽管随着“毒刺”式导弹的出现我们不得不改变空军的作战策略，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它导致了战局的实质性转变。

7. 叛匪武装从不主动进行防御战和进攻战，并且回避同苏联军队正面接触，因为这样的接触向来是以他们的失败和重大损失告终。在他们的策略中，防御战是被迫的，只有

在遭到突然袭击，所有退路被切断，已经无法躲避正面接触时，或者在保卫大规模的基地区域时才采用这个战术。

对于基地区域和拥有大量军火和物资仓库的基地（比如贾瓦拉、伊斯卡博尔、梅莱瓦、玛鲁尔加特、土拉—布拉、什帕尔凯等）以及生命攸关的地段（比如潘捷舍尔和安达拉普峡谷、贾拉拉巴德的黑山等），叛匪们常依托构筑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他们修筑堑壕、地下通道、战术掩体、高空索道、迂回通道，也利用洞穴和悬崖峭壁上的藏身地。所有能接近防御区的地段都被布了雷，而且叛匪会竭尽全力地抵抗到武器弹药和物资全部转移到另一基地区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拼死抵抗到自己的主力队伍从作战区域安全撤离。

对于山地高地的防御战，叛匪会从垂直和水平角度出发安排布置多层次战术火力和力量。在低层次上布置无后坐力炮和掷弹筒；重机枪、加农炮和迫击炮布置在所有层次上，山地高炮和重机枪布置在制高点上，而在居民点和“绿区”实行连环防御。

如遇进攻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叛匪，并且利用直升机空降兵对其据点实施封锁包围，叛匪则会沿事先拟定的路线前往另一集合地，或者推进至防御线。在预先指定的火器掩护和伏兵、地雷、爆炸装置障碍的掩护下进行撤退，这时也会充分利用空中索道。

如果据点始终被围困，圣战者会在夜间“渗透”过我军作战队形接合部，天亮时已占据另一处阵地。叛匪经常在夜间使用小股人员袭击“楔入”对方区域的我军先头部队，然后迅速逃脱。叛匪并不力争坚守据点，而是争取时间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程度的损失。

8. 阿富汗反对派从事的颠覆性宣传鼓动工作旨在制造国内政局不稳定，破坏政府举办的各项活动，分化瓦解党政机构和阿富汗军队各级部队，拉拢部落领袖和长老站到反对派一边，引诱百姓加入叛匪行列。建立在虚假情报、造谣中

伤和歪曲阿富汗改革以及苏联驻军作用基础上的宣传鼓动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反对派还善于利用政府的过失和冒进行为。

伊斯兰委员会特设的思想工作小组极力在农民群众面前混淆视听，散布对民主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他们还花费相当精力来丑化苏联军队：伪装成苏联军队的叛匪抢夺民财，乱杀无辜。在作案现场故意留下苏联军装、苏联报纸、俄文字条和苏制子弹壳。

圣战者利用宗教和民族感情、使用恐怖和恫吓手段极大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各阶层阿富汗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和方法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花样：无线电广播宣传、散发印刷品、散发传单以及录有伊斯兰宗教和反政府内容的录音带……。

总而言之，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社会，小体积武器已经具备强大的威力，再加之发达国家的全面援助，这样的斗争策略往往会达到宏大的政治目的，最终要导致统治阶层垮台。

伊斯兰党在阿富汗掌权以后，其领导人已经毫无顾忌地表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的行为也证明自己同原来的人民民主党官僚们没有多少区别，不论同伊斯兰，还是同圣战者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还称自己为伊斯兰，仿佛还恪守伊斯兰价值观念。一个政党的圣战者开始扼杀另一个政党的圣战者。大家都明白起来：伊斯兰仅仅是用以达到夺取政权这个目的的杠杆。这些人利用伊斯兰来牟取私利，他们背叛伊斯兰的真谛——宽容大度、妥协折中、不涂炭生灵、崇拜知识、求公平、讲实话——使自己的心灵负债累累。

第六章 如何摆脱圈套



新政权给予人民什么了？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特别是它的省、县级机构，长期以来没有从事研究巩固中央政权和其他对于国家存亡攸关的问题：没有努力扩大社会基础，没有把农民大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没有发展经济，没有建立具备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相反，人民民主党却一直在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为自己、自己的亲属、自己这一派、小团体和同乡在党内和国家获取特权地位。这导致了贪污受贿盛行，在崇高理想的遮掩下，执政党人利用战争和苏联的无偿经济援助大发横财。

在绝大部分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控制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没有建立“人民政权”的那些地区。有时还会出现这种离奇事情：农民不是从政府手中，而是从反对派控制地区得到了生活必需品。过去不曾是这样……现状自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对民主制度越来越失望，并逐渐站到了反对派一边。

党内的涣散和其领导人那种帮派式的自傲所招致的严重后果远比想象的要大。党在“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所消耗的精力也超过了同反对派斗争的付出。不过，对于那些党的官僚们来说，这些作为就是他们的主要作

为，因为它给了这些人“阳光下一席之地”——特权和发财的机会。

党内和政府内都缺乏统一领导的现象给军队建设带来了极大损失，使国家孤立于世界，军事力量落后于他人。这也是人民民主党无法团结那些潜在的同盟者并动员起他们同反对派做斗争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并没有利用苏联出兵以后形成的大好局面。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在苏共顾问的监管下，人民民主党继续在“温室”条件下发展。这助长了党的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消极成分，改变了党的干部。他们好像是主动放弃了对重要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依赖和观望的立场。

有一个事实逐渐明晰起来，就是卡尔迈勒缺乏在地方组建政权和控制政权的能力，选择他做全党和全民族的领袖是不成功的。他在国内并不具备那种足以团结起全社会的威望。“人民派”并不拥护他，宗教界人士对他也是不信任的。普什图人不认为他是“纯粹”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不认为他是“纯粹”的塔吉克人，而其他民族的代表也没有视他为“自己人”。

反对派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民环境里，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不能说党政机构人员不懂得这一点，但在农村开展工作需要勇气和巨大付出。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认为，没有这项工作他们也能把握住政权，只要苏联驻军不放弃作战行动。

反对派利用批评政府的无能团结和巩固了自己，赢得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这时，阿富汗政府军和苏联驻军针对叛匪武装的作战行动已经开始给阿富汗人民制造了不小的痛苦，因为叛匪活动已经在生活着和平百姓的地区发展起来了。如果再考虑到抢劫、偷盗、预防性空中打击和炮兵袭击这些因素，就会明白为什么老百姓同人民民主党的关系日益恶化，而百姓对待苏联军人的态度与我们出兵初期相比较，也没有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



苏联军队是人民民主党统治的保障

卡尔迈勒视苏联军队的参与为自己可以借之无忧无虑生活、从事帮派活动和占用国家财富的一种力量和手段。他的如意算盘是，苏联军队将无限期地长期驻扎在阿富汗，履行保卫他统治的职能。然而，政府武装力量不情愿针对圣战者作战（真不知道往后的情况会怎样），于是，视军事手段为最重要的卡尔迈勒经常向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要求苏军直接参加作战行动。留给他去做的还能有些什么呢？要知道，是人民否定了他的改革……。

我们的部队变成了保卫“共和国政权”生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成了一支由本国政府供给、在别人国家作战的特殊“雇佣军”。这是“阿富汗战争”的又一滑稽之处。

以消灭重要地区叛匪武装为目的的计划内的大规模战役和局部战役仍然是同反对派武装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部队作战行动的主要方式是大量使用战术空降兵对叛匪基地和基地区域实施封锁包围，紧随其后的是空军和炮兵不断支持下的阿富汗政府军的搜查清剿。叛匪一般在我们的作战行动从一个地区转到另外一个地区后会返回原地，所以也使用过短暂间隔的二次封锁包围手段，对搜查过的地区再次搜查。

1984年6月，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索科洛夫元帅向国防部长汇报分析了一些战役情况：

在针对反革命力量开展了一系列作战行动以后，军事局势已经明显好转。

5个月当中共进行了85次作战，其中第40集团军同阿富汗政府军协同作战51次，阿富汗政府军独立作战34次。潘捷舍尔战役和在赫拉特省的军事行动对整个战局的好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潘捷舍尔峡谷和阿达拉卜峡谷以及以北地区，我们给予对手重创，摧毁

了他们的主要基地……。

我军于1984年5月18日在潘捷舍尔缴获的机密文件帮助揭露和捣毁了阿富汗伊斯兰协会在喀布尔和其他地区活动的庞大地下间谍网。特务安插在包括国家安全部、警察局和国防部在内的党政部门……。

5月份特别是进入6月以来，准备停止武装斗争，承认人民民主党政权而主动上门谈判的叛匪队伍的数量增加了，整队叛匪投降的事例也多起来（在潘捷舍尔和阿达拉卜，不算匪首朱玛汗率领的700人，投降的8支叛匪队伍人数已达600人）。

第40集团军依然是稳定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它承受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主要重负……他们极具战斗力，潘捷舍尔和安达拉卜峡谷战役证明了我军步兵和空军在海拔4000~5000米高度的山区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参战人员表现出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大多数飞机都是在低空执行作战任务，苏—25强击机显示出良好的作战性能……^①

1984年至1985年这个冬季，第40军集团军进行了10次计划中战役、3次计划外战役和19次局部战役；出动侦察部队120次，设伏1460次。尽管第40集团军与阿政府军的共同行动给叛匪武装造成了相当损失，但是，他们的活跃程度、战斗人员数量，以及在大部分省份的影响力却没有减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有我军作战效果降低、部分指挥员的宽容，对情况估计不足和现场指挥的严重失误。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在对这一阶段作战行动进行总结时指出，由于草率、敷衍和低质量执行任务，还导致了人员的无辜伤亡。比如，1985年12月18~26日，济年维奇中校在帕尔万省指

挥一次作战行动时，由于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混乱，部队护送阿政府军去彼什戈尔以后，自己却陷入叛匪的埋伏，致使5人阵亡，33人负伤。

1984年12月5~14日，在第682机械化步兵兵团团长指挥的一次作战行动中，我军牺牲7人，受伤29人，一架苏-25被击落。在4昼夜时间里，这支部队竟然无法从叛匪火力下突围，而师部和军部也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援助。这种粗枝大叶、敷衍了事和组织混乱的例子还很多。

1985年4月21日，在庫納爾省的瑪拉瓦爾峽谷，賈拉拉巴德旅的一支特遣隊不幸落入叛匪埋伏，几乎是全部阵亡，死34人，只有个别人生还。

遭受重创（仅1985年被歼叛匪就达1.7万人）并未使反革命势力善罢甘休。在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积极、全面和巨大的援助下，叛匪始终在扩大自己的军力。1981年，叛匪作战队伍拥有3万人，1983年差不多达到了4万，1985年已经超过了5万（1985年克格勃机构提供的积极参与叛匪活动的人数要远远高于这些数字）……。

今年5~6月，仅在庫納爾和吉爾緬特兩省被击毙的叛匪就达4900人（其中庫納爾为4200人）。除此之外，还缴获或者捣毁了100门火炮和迫击炮、200架卡拉什尼科夫重机枪和高射炮、160处不同类型的仓库、250万（发或颗）子弹和炮弹，以及一个培训中心。耐人寻味的是，对于阿富汗叛匪的这些重大损失，巴基斯坦媒体没有做过任何报道……。

同时，在第40集团军和阿政府军在庫納爾和吉爾緬特兩省取得大捷的背景下，人民民主党和阿政府机构在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上表现得非常疲软。比如在吉爾緬特省，尽管我方一再表示自己的愿望，但阿方什么也没有采纳。在庫納爾省，经过我军多次和坚决的要

求，阿方才在战役进行中在驻扎了阿政府部队的那些村落地区采取有限措施扩大势力范围，而在解放区始终就没有委派新的“观察员”。通过政府渠道提供给库纳尔省的无偿经济援助，根本就没有到位。

所以说，通过作战行动结果来稳定国内形势只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匪有能力在这些地区恢复自己失去的地盘……^①

80年代中期，阿富汗政府军已经强大了一些，但没有苏军的支持，他们依然不能进行大规模战役，其实他们也不乐于这么去做。我们在军事上的参与、武器、技术装备和其他专门物资的提供，仍然是人民民主党得以维持政权的保障。显然，这样的状态正合其领导人之意。

被击溃的叛匪队伍也在得到补充。然而，接替者中大多数已经不是土匪，而是习惯于自己独特法规和习俗的当地百姓。自由和放纵精神熏陶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承认独裁，不承认中央政权，更不屑说外国人的专断了。正是他们手持武器奋起反抗对氏族部落和宗教基础的毁灭，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拒绝接受人民民主党官僚强加的发展道路。

从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人民作战的那一刻起，沉重的精神负担就压在了苏联军人的心头。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领导人瓦连尼科夫大将在给苏联国防部长的报告中就说过，仅仅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四月革命遗留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局势要求重新评价各派实力和各种可能性，重新确定党和政府今后进行改革的道路。有这样一种建议：代表委员会应该审视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围绕这一局势的有关情况，从而根据阿富汗现体制的实际能力，研究制定出可以改变局势发展的建议……。

美国人在那个阶段曾指出：来自苏联国防部高层人物的

消息表明，苏军指挥部研究制定了旨在保证两年内取胜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他们是根据1984年以来我们使用武装直升机和特遣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做出这个结论的。但这只是战术，而非战略。阿富汗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根基而接受我们的操纵，只要能得到外部援助，他们可以永远战斗下去。

也是在那一时期，里根当局通过了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纲领升级的决定，允许向圣战者提供高技术武器。从1985年起，中央情报局对他们提供通过间谍卫星KH-11拍摄的有关苏军设施和战地目标的情报和资料；美国对这颗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还专门进行了修正；圣战者还得到了从被截获的苏联特工人员无线电联络中筛选出的有关我军作战计划的详细情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特地把电子监听装置转移到了更接近苏联边境的地方。

美国的侦察网络高度密集，以至于只有极少数苏军军事行动能逃避他们的视线。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雇员分析卫星照片，并把苏军指挥人员的肖像图片和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及作战行动的分析结果转交给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延缓爆炸装置，用于破坏和恐怖活动的数以吨计算的塑胶爆炸物“C-4”，用于远距离射击的狙击步枪，终端与美国海军侦察卫星相链接的迫击炮瞄准装置、遥控反坦克雷和其他装备。

根据西方的情报来源，1985年巴基斯坦人求助于中央情报局伊斯兰堡站站长，要求提供远射程的狙击步枪和复杂的光学瞄准仪器并在日后转交给阿富汗叛乱分子。这里说的是他们要针对在喀布尔的苏军高级将领采取暗杀行动，美国间谍机构负责跟踪监视这些将军们的日常活动。

中央情报局局长凯希认为，只要苏联高层人物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就会把战争继续下去。所以，针对苏军高级将领和外交官的暗杀行动是军事行动升级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党政高级干部的子弟（美国人在此搞错了，驻阿苏军中没有

高干子弟——作者注)和军官被装进锌制棺材运回家,局势就可能发生变化。不过,当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法律专家担心,暗杀苏军高级将领会被看做是违背1977年总统关于禁止中央情报局参与谋杀行动的指示。

因此,最终决定只提供狙击枪,不提供夜视装置和可以保障暗杀成功率的侦察情报资料。1983至1987年负责秘密战争的巴基斯坦军官尤素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狙击枪大约得到了30至100支。美国人毕竟是坚决谴责恐怖主义的,对恐怖分子和奉行恐怖主义政策的国家采取严厉的措施。然而,凯希却怂恿圣战者去那么做。



撤军方针

在苏联,许多领导人已经开始醒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不仅对军人,而且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阿富汗的内部问题,动武只能把我们引进死胡同。虽然不是立刻,但还是逐渐形成了一种见解:需要新的立场观点,以及研究制定有助于扑灭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火焰的补救措施。

80年代中期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当时苏联国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采取了社会民主化和同美国及其西欧国家建立新型关系的方针。

由于派遣军队参与阿富汗内部冲突,苏联的国际威信开始下降,即使在自己的盟国中间也不例外。我国领导人为解释军事干涉阿富汗的理由而推出的论据也没有得到印证。苏联在各种类型的国际圆桌会议上遭到谴责,其中也包括联合国旗帜下的会议,而且谴责我们的始终是多数国家。苏联国内已经开始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小伙子躺在了异国他乡,这不仅引起死者家属的愤怒,也激起了所有诚实善良的人们的不平。

针政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尽快解决撤军问题，并确保阿富汗的友好政权能稳定存在。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和政治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于是，10月份在莫斯科举行双边谈判时，我们直接对阿方代表指出了人民民主党在实践方面的严重冒进与过失，阐明了新的原则性建议，并告诉他们，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会带来更积极性的效果；同时，阿富汗领导人得知苏联将要撤军的果断意向，苏联也再次确认了继续向阿富汗武装力量提供装备的义务。

当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以后，阿富汗方面持否定态度。卡尔迈勒说了声：“如果你们现在就走，那下一次你们就得被迫派遣上百万士兵”，他本来就没有光彩的面色更加暗淡下来。不过，这次还是说服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来调解阿富汗内部矛盾；他们表示理解出现的情况，将在最短时间内采取措施来落实苏方表达的意思。卡尔迈勒对苏方建议表示热情感谢，但行动上依然固执己见，还是言行不一。为了不失去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总得有点什么可以标榜为“落实苏联的建议”。1985年11月20日召开的人民民主党中央第16次全会决定，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具有领导作用的人民民主党应该与那些也愿意加入其中的其他政党共同行使国家权力。但这仅仅是粉饰和渲染，是口头承诺，人民民主党不愿同任何人分享权力，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巩固政府军方面的工作也作为甚少。企图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苏联头上的卡尔迈勒总是反复不断地对我们说：“去调动我们的军队吧，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军队指挥吧！”而另有一些居心叵测的阿政府军将领则想利用这一点来回避同反对派武装发生直接冲突，盘算着万一圣战者掌权还可以证明自己同苏联军队只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关系。因此，苏军继续承受着沉重的作战任务……。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百分之百地依靠苏联生存，我们要把武装斗争的重负移交给政府军的打算落得个毫无结果。卡

尔迈勒不愿意同本国人作战，他私下里对亲信说，战争是苏联人发动的，让他们自己去打吧。苏联领导人是从在他身边工作的谍报人员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于是便产生了使用另外一个更能让我们接受的人物来取代他的想法。作为应付意外，克格勃在喀布尔驻有一支属于“奥米加”的特遣小组，它在紧急情况下完全可以保障罢免卡尔迈勒，或者将其消灭。

在1985年，苏军和阿政府军针对叛匪武装成功地进行了80次作战行动，使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减少军事行动，在许多场合，他们完全丧失了士气。叛匪丢弃了许多大型军火库、食品储藏库和药品储藏库……。

反对马帮队斗争战果的提高和有效切断其交通线路使得叛匪受到了弹药和物资供应不足的困扰，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和中央区，这影响到了他们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积极性。

叛匪不顾损失惨重，执意扩大反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斗争规模。他们增加了恐怖暗杀行动，宣传工作也活跃起来，还试图把各党派的作战队伍联合起来，按照常规军的编制进行改建（方面军、师、团），重建被我们摧毁的基地区 and 供应点，重点选择了阿富汗境内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采取持久战方针；改进马帮队的护送战术，为比较活跃的圣战者作战队伍配备了重型武器来加强火力，其中有反坦克导弹和“毒刺”便携式对空导弹系统。比如，1985年叛匪实施了141次对空导弹发射，而1984年仅有62次。此后这一数字逐年增加，圣战者得到了越来越先进的对空射击武器，使我军飞行器的损失呈上升趋势，我们不得不修改空军的作战战术。



苏联军队应该离开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面对与会代表宣布，阿富汗方面已经制定了苏联撤军的分阶

段方案，一旦达到政治调停，这一计划将立即付诸实施。

下达给苏军指挥部的命令是：不得再参与作战行动，注重完成掩护任务，保卫公路交通和防御重要的战略目标，并采取补充措施协助阿富汗政府军的巩固工作。

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会同驻阿总军事顾问机构和第40集团军指挥部采取措施，依靠阿政府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参加作战行动以减少苏军的主动参战行动。

驻阿部队指挥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以后，竭力设法使人民民主党党魁改变自己的“信念”，并采取措施让阿富汗武装力量自己去同叛匪作战。比如，1986年年初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赫斯特地区捣毁叛匪在“贾瓦拉”（狼穴）的大型转运基地的战役。这个基地被认为是难以攻克的。根据作战计划，阿富汗政府军54个营的兵力，以及炮兵和空军参加战斗。第3兵团司令员穆罕默德·阿谢夫·杰拉瓦尔少将指挥了这次战役。

第40集团军某部奉命负责阿军的侧翼和后方掩护，但不得直接参与正面作战。这显然不符合阿富汗人的愿望：他们自己不想打仗，却极力促使我军去正面作战。

2月28日，阿政府军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从加尔捷兹出发前往作战区域。配合他们行动的有苏军的两个营，他们负责占据哈兹仑至玛特瓦尔赫沿途的制高点，保证行军路线畅通。然而，阿政府军某部到达玛特瓦尔赫区以后，停止了向前推进……他们在原地驻扎了将近一个月。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前往贾瓦拉。叛匪发现这一情况后，就对这支部队进行火力袭击。而他们宁可接受伤亡，也不愿前进一步。战役受到失败的威胁。在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的强烈要求下，苏军指挥部被迫把一部分力量投入作战区域。

指挥苏军参战部队的是第40集团军参谋长戈列科夫少将，阿富汗军队的指挥员是国防部长穆罕默德·纳比·阿基米中将。同时对战役计划作了实质性的修改。

4月5~9日，在赫斯特机场空投了4个营的苏军增援

阿富汗人，向塔尼地区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但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阿富汗人没能立刻拿下贾瓦拉。他们居然不能去扩大看得见的战果，连第一道防御线都拿不下来，并且在第4天后撤了5~7公里，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深谙阿富汗问题，他始终关注赫斯特战役的进程，把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摆在首位。驻阿苏军总军事顾问和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驻阿领导人都接到了相关的指示和命令。

文 件^① (机密)

致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瓦连尼科夫大将同志
和驻阿总军事顾问沃斯特罗夫上将同志

驻阿总军事顾问和他的一班人错估了对手以及他们在帕克吉亚省的能力。在战役准备阶段疏忽了进入1985年以来匪徒在更新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而对手却汲取了在这个地区的失败教训。错误还在于战役时间的选择，在最初的战斗打响以后，不论是新任命的总军事顾问沃斯特罗夫上将，还是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都没有及时采取应有的措施来纠正失误……。

我现在要求：

1. 全面评价赫斯特地区形成的实力对比，加强对敌人的侦察。空中打击要针对有侦察结果的目标，而不要大面积地轰炸。

2. 要组织好对部队的指挥。从中部地区调集到这里参战的部队要服从有关师的指挥员。

3. 如有必要，部队的进攻行动可以推迟几天。检查一下阿富汗政府军各级部队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补足弹药和物资，明确作战任务。协调好与空军的战术配合。

4. 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需要在4月17日加以确认。

索科洛夫 312/1/07/ 参谋部 1986年4月

根据这些指示，驻阿富汗苏军指挥部和阿富汗政府军指挥部共同努力下重振旗鼓，于最短时间内落实了各项备战措施。明确规定了以压缩战斗队形、对局部地段实施打击为目的的作战队伍的整编。要迷惑对手，转移敌人对主攻方向的注意。每一支队伍的动手时间都是不同的。

4月17日早晨，空军对分布在控制着贾瓦拉地区的制高点上的叛匪火力点进行了轰炸攻击，并予以了清除。苏军部队随后抢占了制高点，以火力掩护来保障阿富汗政府军部队向前推进，阿军积极进攻基地区，消灭了大量叛匪，于4月19日占领了贾瓦拉。在炸毁了基地设施和苏军工兵进行了特殊布雷以后，阿富汗政府军于4月22日傍晚撤离作战地区，前往赫斯特地区集结。这是阿政府军第一次攻占贾瓦拉，此前，他们在贾瓦拉屡战屡败，所以它才被认为是攻不破的。

由于圣战者打算在我军作战后的归途中进行袭击，瓦连尼科夫大将命令使用苏联空军和阿富汗空军运输机实施部队转移。

在参战的阿空军基地所在驻防军营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在喀布尔更是举行了“胜利者”阅兵式。

尽管存在不足，但攻占贾瓦拉的战役毕竟表明了：只要进行相应的组织并具有适当的愿望，阿富汗政府军是可以成功执行作战任务的。这次战役甚至对从整体上提高阿军士气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可以画个句号，但必须补充说，半年过后，叛匪又修复了贾瓦拉，把它改建为一个转运基地。很遗憾，许多战役的最终结局都是如此。人们表现出勇敢和无畏，经受了艰难与牺牲，可最终一切付出都变得毫无意义。

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联手对叛匪制造紧张局势的策

源地进行围剿和摧毁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反对派的计划。可以列举 1986 年进行的各种战役来评价当年作战行动的强度和频率：2 月在巴达赫山对匪徒巴希尔作战，在南加尔哈尔摧毁玛鲁尔加特转运基地；3 月，在帕克吉亚的舍库尔地区摧毁转运基地，在南加尔哈尔歼灭返回玛鲁尔加特转运基地的叛匪，在巴达赫山对巴杜达匪徒作战，在扎勃尔地区对匪徒作战；4 月，在南加尔哈尔歼灭齐亚拉特古里亚匪徒，在巴达赫山的巴尔杜日谷地对纳日姆吉纳叛匪作战，在巴戈兰的瓦里亚谷地对曼苏尔匪徒作战；5 月，在帕克吉亚的达吉县对阿富汗伊斯兰党武装作战；6 月，在帕尔万的潘捷舍尔峡谷对玛苏德匪徒作战，在坎大哈的斯宾布尔达克县摧毁什纳拉伊转运基地，在捷拉特歼灭位于市内绿区的叛匪，在拉戈曼歼灭转运基地的叛匪……。

在攻占贾瓦拉和同期展开的其他战役中，苏军的作战技能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必须抽调相当数量的部队去保护军事和经济目标，保卫政府区域和交通线，这使得我们无法从事更大规模的战役去对付反对派。

资 料

驻阿苏军的 133 个营队，有 82 个营（占 61.7%）承担保安职责：23 个营守护公路，14 个营保卫机场，23 个营守卫军事和经济目标，22 个营保护地方政府。可以用来作战的部队只有 51 个营……。（资料来源：第 40 集团军参谋部 1986 年 7 月 1 日）

第七章 如何制止流血？

◆ 戈尔巴乔夫把赌注押在纳吉布拉身上

人民民主党向人民许诺的社会生活的好转并没有发生，而经济危机在加剧，国内政治局势在恶化，卡尔迈勒本人无进取心的家长式作风——这一切都使许多党员丧失了对这位总书记的信任（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越来越清楚的是，他在人民民主党内已经丧失掉威信，而且也缺乏使国家摆脱困境的能力。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卡尔迈勒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是毫无前途的，采取了替换他的相关措施。

这时，苏联军队已经在阿富汗参战6年了。阿富汗人没有独立执行过一次任务，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定，战果没有转变为政治性成果，我们为阿富汗人民进行的斗争失败了。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这个国家今后向何处发展，谁来接替卡尔迈勒？有过几个方案。我在这里援引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

供参考的资料汇编^①

围绕人民民主党高层领导更迭的谣言

卡尔迈勒滞留莫斯科引起了阿富汗党政军干部的种

^① 资料来源：苏联国防部总参谋部作战指挥组，1986年4月。

种猜疑，认为他可能不会复返和即将下台。事情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征兆之一是，人民民主党十七届中央全会召开期间，以及当年3月30日到4月1日召开的领导层会议上，都没有提及卡尔迈勒的名字。在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纳吉布一派（包括了克什特曼、奴尔和泽莱）甚至公开批评了卡尔迈勒。

总之，意见归结为一点，卡尔迈勒缺乏领导者的素质，应该下台，他的下台会导致本国和苏联以及其他友好邻邦所期待的新的方针政策的出现。

卡尔迈勒的接班候选人有纳吉布同志和萨尔瓦利同志。可能性大一些的是前者，因为人民民主党十六届中央全会后，他成了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针对纳吉布担任党的总书记的看法是复杂和矛盾的，大多数人持否定态度。不过，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中间既有“旗帜派”，也有“人民派”。他被称为“铁腕”，人们惧怕他，不相信他。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经历也经常被人们否定地议论。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建立了国中之国，建立了为个人利益服务的机构。关于国家安全部门在他授意下滥用职权的传说很多，其中包括指责他至今还错误地把5000多无辜的“人民派”党员关押在普利-胡姆利监狱。他不相信“人民派”，永远会敌视他们。

正是在纳吉布怂恿下，党政干部中间盗窃和贪污成风，其程度完全超过了国王执政时期。据说，他不仅自己收受贿赂，也允许别人这么做。

大家都认为纳吉布具有强烈的普什图民族意识。所以说，首先是北方，也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部分塔吉克人不会追随他，而这会削弱军队的力量，因为军队的战斗核心是这些人组成的。还有一种担心，认为就其性格而言，他未必能同部落搞好关系。仿佛是巴基斯坦部落鼓动阿富汗部落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人民已经厌倦了，所以不支

持纳吉布沽名钓誉的企图，反对他利用部落问题达到个人目的。

另外还怀疑他对苏联的友好感情是否真诚。举例说，他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期间曾经解雇过那些亲近苏联顾问的“亲苏分子”。有人认为，任命被大家称为“反苏分子”的纳吉布将军为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并非偶然。最后可以确定的是，纳吉布出身贵族家庭，妻子是国王阿卜杜拉赫曼的孙女，他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他本人没有在苏联学习过，也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这对于一个内战不断的国家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他不具备能力团结政党、军队和人民来达到和平目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同志对萨尔瓦利的个人品格有相当高的评价（他是上校，塔拉基执政时领导国家安全部门，后来同卡尔迈勒等人一起离开祖国，是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年出任阿富汗驻蒙古大使）。

由于他一贯反对宗派主义，在普什图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中口碑很好，在军界也有威信，据认为，他有能力使党实现统一。萨尔瓦利办事果断强硬，被称为是同时具备了政治家和军人素质的一个人，他善于明察秋毫地领导同反革命的斗争，有能力实现国内局势稳定。至于他的缺点，那就是他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时，被捕者所遭受的刑讯拷打是人们至今还没有忘记的。

看来，围绕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层可能发生变动而出现的种种传说，反映了在我们宣布将减少参与作战行动和分阶段撤军以后加剧起来的慌乱情绪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也证实了人们不满现实和渴望好转的情绪在增长。

纳吉布担任国家安全机构领导职务时，得到过苏联克格

勃的支持，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领导人便忽视了反面评价他的信息资料。我们没有充分研究包括同反对派进行改良主义妥协的非此即彼的方案，而是坚持要走现成的路。我要说句公平话，这是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况且当时并非所有事情都取决于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决定。

纳吉布在北方没有影响。作为普什图部落代表，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迪朗特线”是阿巴之间的合法边界线。而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并使其停止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

总之，在苏联克格勃建议和苏共中央的协助下，1986年5月，人民民主党第十八届全会选举穆罕默德·纳吉布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化名纳吉布拉。纳吉布拉迅速就调解国内冲突提出了范围广泛的建议：吸引农民支持政府；制定具有建设性内容的妥协方案，与伊斯兰党、与国内或国外的组织进行谈判；吸收前国王扎希尔-沙赫参与调解过程。

供参考的情况汇编^①

1947年，纳吉布拉出生于喀布尔的一个富有家庭，普什图族，穆斯林逊尼派信徒。其父艾赫塔尔·穆罕默德曾是部落首领，与前总统达乌德有来往。纳吉布拉的根基在帕克吉亚省。

1964年寄宿学校毕业后，纳吉布拉进入喀布尔大学医学系学习。1965年加入人民民主党，属于“旗帜派”。由于多次参加反政府活动，1966年曾两度被捕。1967年党分裂以后追随卡尔迈勒，两年后再次因为政治活动被捕入狱。1970年1月，因为在美国副总统访问阿富汗之际参与反美游行再次被捕，同年被选举为秘密的“旗帜派”喀布尔市委员会书记。

1975年大学毕业，成为妇科大夫，在若干省行医数年。1977年进入人民民主党联合中央委员会，1978年政变后成为阿富汗革命委员会成员和人民民主党喀布尔市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塔拉基和阿明执政时）被任命为驻伊朗大使。

1978年10月，由于倾吞使馆的10万美元公款，纳吉布拉被罢免大使职位，并移居南斯拉夫。苏联出兵后，他返回祖国，1980年重新当选革命委员会成员，成为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1981年进入政治局，1985年起成为分管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中央书记。

聪明、狡猾、无情的政治家。虚荣，好权势。

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是阿富汗社会“普什图化”政策的鼓吹者之一。在亲信中间只讲普什图语。任人唯亲，受重用者大都是亲戚和同乡。

已婚，有三个女儿，妻子是富家之女。

苏联领导人希望随着新领导人的上任能够展开阿富汗局势正常化的具体工作。然而，停止战争要难于发动战争，这一点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具有更大意义——遗憾的是，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停战方面的若干经验和教训可以从这一阶段在阿富汗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尝试中汲取。

这一政策的构想是在莫斯科研究出来的，而纳吉布拉同意执行一条旨在结束国内冲突的方针路线。我们同时提醒阿富汗领导人，他们必须目的明确地做好准备，独立地同反对派武装进行斗争，而苏联着手准备从阿富汗撤出自己的军队。

1986年5月22日，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宣布了国防委员会的名单，以及作战指挥组和工作组的组成。纳吉布拉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凯什特曼、奴尔、纳扎尔·穆罕默德。国防委员会成员有泽拉伊、瓦塔扎

尔、拉菲、拉耶克、卡尔瓦尔、雅库比、古里亚博佐伊、奥留米、塔奈。组成了作战指挥组来负责日常工作：塔奈、罗德瓦尔、法兹尔哈克、萨拉夫扎沃里、博卡尔·法林、瓦吉里。

苏联领导人着手落实被接受的撤军构想。当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基沃斯托克发表演讲时声明：“到1986年年底，将有一个坦克团、两个机械化步兵团和3个防空兵团，共6个团的兵力及其装备从阿富汗撤回。这些部队将驻扎在苏联境内自己的常驻地，所有对此感兴趣的方面都可以确信这一点。”正如许诺的那样，这些部队于当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撤出了阿富汗（从申丹特——坦克团、机械化步兵团、高炮团各一支，从昆杜兹——机械化步兵团和高炮团各一支，从喀布尔——一个高炮团）。

1986年11月13日，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应当确定一个战略目标。在不很遥远的过去我们还谈论过要封锁阿巴边界和阿伊边界。经验表明，由于当地地形地势的复杂和山区数以百计的通道，使我们无法完全这样做到。今天要明确指出，这个战略任务就是要把战争结束。”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赞同后说：“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有两个问题要确定下来。第一，在两年时间内全部完成我们从阿富汗的撤军。1987年要撤出50%，下一年再撤出50%；第二，应当从政治力量的现实分布情况出发，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由于保留了卡尔迈勒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纳吉布拉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另外，相当一部分阿富汗领导人对新政策并不欢迎。这个问题上，政治局委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他们认为，民族和解政策只会导致政权垮台。

纳吉布拉不得不求助于苏联领导人：寻找一种可能性把阿富汗的权力完全交给他。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们做出了相应的建议。

苏共中央工作简报摘录^① (机密/特别卷宗)

致苏共中央

纳吉布拉当选为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后，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领导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积极的进步仍然在继续着。党政机构更加积极地工作起来，宣传的方式方法有所改变，更加努力地寻找能够对广大百姓产生作用的其他方法。阿富汗武装力量的状态和作战能力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不过，还没有达到国内政治军事局势的明显好转。纳吉布拉同志也能客观地评价局势，深知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

纳吉布拉同志指出过，阿富汗全国 3.1~3.5 万个村庄中，政府实际控制的只有 8000 个。完成了地方政权选举工作的村落就更少了，大约 2700 个，还是城市附近的……。

纳吉布拉同志认为，反革命的武装活动仍然很猖狂。他说，今天在阿富汗领土上活动的叛匪队伍有 5016 支，人数共 18.3 万人，其中 8 万人是反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反革命力量的战术策略在改变和完善。有一些向叛匪武装提供弹药补给的马帮队通道无论如何也封锁不住。这需要今后进一步加强封锁边境的措施。

纳吉布拉同志强调说，如果以军事手段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那么按照目前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速度来看，还需要 20~30 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局势的完全正常化。因此他认为一个不可推卸的任务就是为在国内达到民族和解而积极努力。

纳吉布拉同志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应当同那些国内外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进行谈判，这包括那些准备走折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卷宗 3，目录 120。

衷道路，并且对流血冲突不负有很大责任的有关组织，甚至可以同那些拥护君主制的人士对话。纳吉布拉同志认为，永远不能同贵族势力、封建势力、大地主阶层和反革命的毛拉—原教旨主义妥协。不过，不能排除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物进行接触……。

纳吉布拉同志正在考虑就民族和解政策公开发表声明和同反革命停火6个月的建议同时并举的可能。纳吉布拉同志认为政治调解和苏联撤军的问题同民族和解是相辅相成的……。

纳吉布拉同志知道，到今天为止，有利于民族和解的事情做得很少。看来，他准备采取更实际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而在这方面他需要我们的支持……。

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

索科洛夫、多勃雷宁 1986年11月13日

纳吉布拉同时还建议与卡尔迈勒以及他的亲信们携起手来共同解决问题。其中包括，由纳扎尔·穆罕默德接替拉菲任国防部长，由朵斯特接替瓦基尔任外交部长。因此，当时在喀布尔的克留契科夫还奉命会见了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向他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在干部问题上，只要他能找到合适的，就可以用。

1986年11月，人民民主党中央二十届全会满足了卡尔迈勒提出的免除他所担任的党和政府职务的“请求”，向他颁发了“四月革命勋章”，并发放了养老金。国家安全部长雅库博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古里亚博佐伊和玛兹达克。

不久，卡尔迈勒前往莫斯科“休养和治疗”，并且留居在那里。后来，他多次提出返回阿富汗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待苏联完全撤军之后。

1986年12月，人民民主党中央特别全会正式宣布了新的原则性方针：民族和解，停止自相残杀。全会还宣布，解

决阿富汗问题将主要依靠政治手段。因此，民族和解被看做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和政治妥协的一个特征，其过程为一系列不可分割的任务的组合：停止战争、建立民主体制，在多党制和联合管理条件下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允许经济生活中的多种成分，保持阿富汗不结盟的中立国地位。同时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战争和武力从来没有给任何民族带去过幸福。

人民民主党人推出这样的构想，希望以政治手段战胜反对派，达到和平。但是，圣战者有自己的计划。众所周知，国内战争是不会有胜者的，只有平分秋色。战争会一直延续到力量恢复均衡为止。在理想中，战争应该以全社会的和睦而告终。

苏联政府把和平的希望和创造撤军条件同民族和解政策联系在一起，1987年1月2日，向喀布尔派出了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瓦连尼科夫大将为首的国防部作战指挥组，以处理日常工作。

作战指挥组被安置在距离第40集团军参谋部和阿富汗国防部不远的达尔-乌尔-安曼宫。革命前，这里曾经是喀布尔军团司令的官邸。瓦连尼科夫大将占用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和卧室，其余人为3~7人一个房间。办公室和食堂都安排在这幢房子里。

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发挥着一个协调中心的作用，它没有常驻编制，将军和军官都是作为出差人员被派遣来，定期轮换。这里聚集了所有军种的军事专家、分析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比如作战准备、征兵动员）。作战指挥组的主要职能是：领导苏联军队；协助阿富汗武装力量进行建设；组织苏军与阿军之间的协作行动；给予阿富汗武装力量、包括最高统帅多方面协助；参与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组织和实施重要战役以歼灭拒绝和解的反对派武装；协助共和国领导人同反对派的战地指挥官建立接触……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还执行了其他的一些任务，比如，协助建立阿富汗最高统帅

部大本营。

作战指挥组不干涉第40集团军参谋部和司令员以及部队各级指挥员的行动，不限制他们在作战行动过程中独立做决定。通过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司令员和军参谋部能够同苏联国防部指挥中心取得联系，这样便可以灵活机动地解决作战实践和部队全方位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

校官们和将官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层部队和省里度过的，有些人则长期在“热点”地区，如坎大哈、赫拉特等地。作战指挥组领导人瓦连尼科夫大将实际承担了所有在阿苏联军事机构的指挥领导工作。他从不待在喀布尔，阿富汗中部的所有省份和许多县，以及有军事行动发生的大部分地区和局势紧张的地方，他都去过。他还多次身处紧急情况，但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同阿富汗各阶层代表、同以著名的战地指挥官为首的反对派代表，以及“同盟-7”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着接触，他熟知阿富汗局势，深谙第40集团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状况，经常乘车乘机深入到内地会见省长、宗教界代表、阿军官兵、圣战者的战地指挥员和普通作战人员，以及当地居民。

瓦连尼科夫大将具有站在国家高度进行分析的头脑，具有外交家、政治家和活动家的品质，他不仅在军界，而且在政界均享有崇高威信，实际扮演了阿富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军事顾问的角色。他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为胜利由衷高兴，为失利深感痛苦。他为恢复阿富汗人民的和平生活做了许多事情：修复公路、灌溉系统、输电线路、住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谁具备他这样敏锐的使命感和对肩负职责的负责态度。他虽然年长于我们许多，但每当我们束手无策，或者疲惫不堪时（在阿富汗边远地区昼夜连续工作后，在作战过程中，或者经过长途跋涉和长途飞行以后……），他却能思路清晰地准确判断局势和下达命令。无形中产生一个印象，仿佛他不需要休息，因为你随时可以在工作地点见到他。他经常抱病工作，而且能设法不让上级和下级知道。

此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充分表明，向喀布尔派遣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对于制定总体方针路线和计划，协调苏军和阿军的作战行动，在落实民族和解政策过程中帮助阿富汗领导人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和解

1987年1月中旬开始实施民族和解政策。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纳吉布拉发表讲话解释这一新政策的基本原则。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阿富汗民族和解”的声明是一份最重要的文件，它规定了执行新政策的细则。其中阐述道：“1987年1月15日，国家有关权威部门下达命令：实行全面停火；部队撤回常驻地，转入非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没有对平民构成威胁，就不对他们进行炮兵和空军的打击；武装力量的任务限于守卫国境线、军事目标和政府目标，护卫车队，以及其他重要的防御任务和经济任务。”

“作为对此和平措施的回答，政府期待停止针对城市乡村、部队驻地、航空交通的射击，停止运输和在阿富汗领土储藏武器弹药，停止在公路布雷，停止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

在新形势下，建立在村、乡、县、省一级和国家各级部门的民族和解特别委员会成为落实和解的重要机构。它们的目的是在相应级别上达到和平与和睦。落实和解的最高机构是阿富汗民族和解特别委员会。政府赋予这个委员会所有必要的权力。

同时还宣布成立国民和平议会，它们也获得了特殊的权限：可以应它们的要求对地方派遣医疗队，发放药品，派遣农田专家和灌溉专家，提供肥料和种子帮助农民，免费提供包括苏联无偿援助物品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它们还有权解决土地所有问题，有权在本地区组织农田水利改革；它们还可以建议赦免在押犯人——如果后者保证不再进行反人民活动。

和平议会还有权任命人民法庭，派遣志愿者代替义务兵

去服兵役——后者被征入伍是去守卫同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的边境——在边境地区的 52 个县和乡服兵役两年，有相应的货币军饷，然后转为预备役；停止征收土地税，废除罚款制度；并且在 1987 年年底前取消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罚金制度；解决百姓之间的债务纠纷，调解部落间冲突、本地矛盾和派别冲突；要求政府机构给予协助。

在社团的请求和奔走下，国家承担起毛拉和地主的生活费；通过权威部门，和平议会还对国家公务员违反有关协议的行为进行上诉，促使对违法者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

村乡县或省如果达成民族和解，并宣布为“和平区”的话，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会给予当地百姓实际的优惠政策：有权以民主方式组建当地政权和管理机构，这些机构有权根据民意任命乡长和县长；宣布特别开放日，允许百姓参观访问革命政权管辖下的城乡；邀请叛匪武装头目进行谈判，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安全返回；同愿意和解的叛匪武装头目签署有关协议书，给他们保留一定的领土和具体的设施；给予接受和解的叛匪武装以物资援助；给予这一类武装的头目和当地权威人物在政府控制区之外的地区获取运输和销售生活必需品的优先权力；那些停止反人民政权的县、乡、村的百姓可以不受限制地在阿富汗全国活动，探亲访友，参加宗教仪式或者了解四月革命的真实任务和目的。人民可以上访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部长会议，以及党政和社会机构。

百姓在各处都保证会受到热情接待，达到兵役年龄的青年人可以随意参观访问国家的管理中心，不必担心在这样的日子里会被征入伍；在所有省会都为上访者公开设立了生活必需品发放站、医疗站和健康咨询站。

为了表示对全民族和解和睦的诚心诚意，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在 1987 年发布特别命令，宣布释放那些保证今后不再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在押犯人。人民民主党革命委员会重申：全体阿富汗公民，不论是命运使其成为我们的

敌人，还是在迫害和欺骗下客走他乡，只要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放下武器，那就会得到祖国和人民的宽恕。

疲惫于连年战火的人民大众起初热情饱满地接受了民族和解政策。反政府势力的部分领导人动摇起来，对继续进行敌对军事活动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国外反对派头目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竞争激烈起来，不同党派武装力量的战地指挥官之间，以及同国外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这再次证实了反对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意见纷纭。民族和解政策中的若干思想被侨居西欧的部分阿富汗移民所接受，其中包括前国王扎希尔·沙赫。

国内反对派武装的许多战地指挥官同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他们被编人民兵部队和部落部队。其中有赫拉特省的阿米尔·塞义德·艾哈迈德和法兹尔·艾哈迈德，安达拉普省的朱玛-汗、斯皮巴尔达克省的伊斯玛土拉·姆斯里姆，后者甚至还荣获了将军官衔。虽然这种合作是不牢靠、不稳定的，但毕竟在某些地区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不过，由于缺乏吸引大多数战地指挥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解过程始终没有普及开来。人民大众逐渐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丧失了信心，加上党不思进取、反对派的抵制和见不到积极的效果，主动权便从纳吉布拉手中滑落了。

政府军停火和宣布民族和解政策都没有带来政府期待的局势缓和。究其原因，是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一政策的机制，也没有采取实际步骤支持民族和解政策的方针路线。对和平与和睦的招摇式祈祷更像蛊惑人心的口号，凭借口号怎么能求得和平呢？导致战争的原因没有铲除，也没有创造条件来恢复被破坏的实力对比均衡。

人民小心翼翼地观察多年来始终鼓吹强力手段的政府吐出的和平之言。没有什么东西能迫使反对派停止敌对行为：它还控制着大部分领土，它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分支机构网，获得的武器弹药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最新式的。况且，新政策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它勾画出来的依然是一

党专制的蓝图，尽管已经作了明显的权力分配。总之，新政策没有带来预期结果。

阿富汗政府不顾反对派的嚣张气焰，继续兜售自己的民族和解政策，尽管其初步成效无法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当局在集中了主要人口的乡村地区没有什么地位；对待那些与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反对派武装头目的态度没有什么连续性。加上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急于求成，在力保自己的统治地位时没有做出什么原则性让步。而他们指望反对派自己拱手称臣的局面，命中注定是不会出现的。

在推行新政策的头6个月里，苏联军事专家对阿富汗国内局势做了这样的分析：民族和解政策还没有创造出预期效果。阿富汗政府宣布这一新政策以及单方面宣布（1987年1月15日）停火以后，反革命破坏活动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减少。叛匪继续炮击行政管理机构、苏军和阿军哨所、驻防军，继续破坏公路，继续袭击暗杀党政人员，继续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转运武器弹药、后备人员和各种物资。

自政府宣布民族和解政策之日起，有100支队伍（总数为3785支队伍）6370人（占叛匪总人数的4.7%）投诚。这一时期，同政府进行谈判商讨投诚可能性的有代表1.3万人的326支叛匪队伍的头目。必须指出，他们当中多数在与政府进行停火谈判和签署和平协议时都暗藏着诡计：避免自己的队伍遭受空军和炮兵的打击，保存实力，从政府手里获取帮助，等待时机，根据今后局势发展来最终决定自己的立场。

扎根于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反对派力量也蠢蠢欲动，破坏民族和解政策。他们在继续为颠覆活动训练和派遣武装人员、补充武器弹药的同时，不断在阿富汗难民中间加强宣传鼓动工作，阻止难民返回家园。巴基斯坦和伊朗政府则助纣为虐。

尽管如此，在落实民族和解政策期间，还是有6200个难民家庭大约3.6万人返回了故乡。当然，这一数字确实太少

了：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为 300 万，在伊朗为 150 万。

回到国内的难民却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究和迫害，直至枪杀。他们担心叛匪的报复，就千方百计地躲避同地方政府接触，迁居进乡村，藏身于亲朋好友中间，拒绝政府提供的救济，或者暗地接受叛匪给予的救济。因此，包括苏联提供的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物资，常常到不了难民手中，而是囤积在地方领导人和他们亲戚的手里，甚至会落入叛匪手中。例如，当时在土鲁坎省会向当地居民发放苏联的无偿援助中的生活必需品时遇到了叛匪的极力阻挠。5 月 15 日，在向波里科克村的百姓发放了救济物资以后，匪首佐比带着 40 多人包围了村子，强迫每一个接受了救济的村民缴纳罚金 1.5 万阿富汗尼。反对派就是如此来破坏我们的计划，打击百姓的情绪。

由于“不妥协者”拒绝合作建议，以及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强硬意向，苏联军队落入一个极端复杂的境地：停火使他们成为活靶子，在叛匪的枪击下遭受无端牺牲，伤亡数量在一天天增加。把现实当作愿望的企图再次暴露了政权的无能。

在阿富汗领导人的请求下，第 40 集团军部分部队重新卷入阿政府军在“紧张”地区（坎大哈、赫拉特、加兹尼、昆杜兹、帕克吉亚、赫斯特和喀布尔周边地区）的战事。以及阻击从巴基斯坦和伊朗给叛匪补给武器弹药、输送战斗人员的马帮队。统计表明，在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半年时间里，阿富汗国内的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规模都没有实质性的缓和与降低。民族和解政策被反对派所利用，部分党政要人认为这一政策其实在背叛革命。然而，不论是苏联政治家，还是纳吉布拉本人，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



民族和解政策导致党员消沉起来

在推行民族和解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某些抹煞了目的性和内容，使其成为“空谈”的消极环节。甚至包括许多人民

民主党成员都在抵制民族和解政策。他们视它为退让和软弱的表现，是威胁自身利益和导致现政权垮台的开始，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观点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从1987年开始，政府的某些机构、政府军和安全部队的某些队伍（特别是在地方）同反对派武装进行斗争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在许多场合采取观望态度，重新把作战行动的沉重负担推到苏联军队身上。党政机构代表经常寻求途径与圣战者接触，为可能倒戈过去创造条件（取决于苏联撤军后的局势）。这些人以抨击苏联军队来表示对叛匪的忠诚，企图以此在反对派中间获得声誉。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或伪造事实，或公开攻击苏联顾问，或消极怠工，或散布各种谣言……。

地方领导人亲自协助叛匪迷惑政府军的事情时有发生。省或县领导人还时常心怀鬼胎地递送假情报，为的是同某些武装匪首算账，或者迫使某些村庄的农民弃家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

1987年4月，根据地方当局提供的情报，反对派战地指挥官将在卡比萨省某村庄召开会议，于是对这个村庄进行了空中打击。事后查明，会议其实在给我们指明的村庄东北12公里处召开的，而空袭给村民造成了4死9伤的损失。这个村庄的百姓从此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该地区百姓对政府的态度也愈加恶劣起来。其他地区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政府军放弃同拒绝妥协的反对派武装作战使民族和解政策产生了负面效应。政府军在作战中总是把第40集团军推到前头，极力回避同叛匪武装接触。阿富汗武装力量整支部队的背叛行为和倒戈事件频繁起来。

情况越来越清楚，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主张的、推行民族和解政策所需要的那种客观条件并不具备，而反对派却利用这一政策来破坏人民民主党的统治。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从阿富汗撤军，以此消除影响苏联改革的消极因素。民族和解政策对于阿富汗领导人来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1987年7月，格罗莫夫将军接任第40集团军司令员。此前，他曾两度赴阿作战。1980年1月，他曾任第108机械化步兵师参谋长，后来当过第5师师长。他在阿富汗东部省份成功地指挥过一些战役，其中包括在鲁尔科赫山区摧毁叛匪基地的战役。1982年8月，他被派遣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以总参谋长特派将军身份返回阿富汗。丰富的作战经验使得新任指挥员不辱使命地担当起责任重大的任务：以最小代价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1987年10月18日至20日，人民民主党召开了民族和解大会，颁布了修订的《行动纲领》，这成为全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个纲领通过棘手的实际任务，尖锐地指出了人民民主党党员队伍的团结问题：如果不能牢固团结起自己的队伍，人民民主党将抵挡不住反对派武装的压力。

从公布民族和解政策时起，特别是在全党大会召开前夕，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团结上——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机构，提高总书记的威信和作用，落实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员对本职工作的个人负责原则。

在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它完全适合于阿富汗社会的历史特点，并且成功地使一些宗教界要人以及原反对派头目同普通百姓进行接触交往。对群众施加影响的手段除了电视、广播和出版外，还利用党的领导人公开演讲、宣传队、传单、议会讲坛等形式，以及传统的散发信息的地点——清真寺和集贸市场。

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会后，加强了反对贪污腐化、氏族家族帮派、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官僚主义、任人唯亲和破坏主义的斗争。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的领导干部要遵守党员道德准则，处分一批滥用职权谋私利的干部，领导干部子女要服兵役的决议。不过，这项工作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触动党的高层领导人。

在民族和解政策基础上，1987年11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选举纳吉布拉为共和国总统，任期7年。更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去掉了“民主”一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民主发展的道路。

大国民议会还确定了新宪法，一共有149项条款。它取代了1980年4月公布的临时宪法——“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基本原则”。

大国民议会召开期间，喀布尔展开了代号为“干线”的联合战役，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中将负责指挥。战役自1987年11月持续到1988年1月，可以说战果辉煌。特地为战役下达了经济目标：解除敌人对加尔捷兹—赫斯特公路线的封锁，把载有食品、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车队护送到省会。当然，实际目的是政治性的——显示政府军有能力和实力对反对派作战。

以戈拉乔夫为首的空降兵部队攻克了被西方媒体称为“俄国人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萨图坎达夫山口，对战役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应该说空降兵的进攻方向是最危险，责任最重大的第103伞兵空降师突击组副组长希什科夫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11月28日，毫无结果的谈判过后，我军部分部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共同打响了战斗。为了使叛匪的火力点，特别是对空火力暴露出来，军长下令向山口投放20个假伞兵。炮兵侦察组和火力校对组的指挥官利用这个机会确定了敌人火力位置。然后陆军航空兵和强击机，以及炮兵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阵地持续进行了4小时的火力打击。”

“11月29日，短暂的炮击之后，机械化步兵团开始朝山前地带推进，准备徒步抢占山梁上的制高点，建立巩固的值勤哨卡，阻止叛匪通过帕拉契纳山嘴朝萨图

坎达夫山口这边增援。”

“叛匪的火力异常猛烈。在团长的犹豫不决和保险主义思想作用下，刚开始的行动被迫停顿下来。30日夜间，叛匪利用地形熟和我方指挥员的大意，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使我军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格罗莫夫将军动用了空降兵分队来攻占制高点，主攻方向上有第一伞兵空降营和阿军的‘突击队’营。行使指挥权的营长彼德洛夫少校迅速组织好联手行动，部队开始朝制高点推进。空降兵占领目标以后，用火力的掩护其他分队向山梁进发。叛匪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进行顽强抵抗，延缓苏军和阿军向山口的推进。这时，炮兵营根据彼德洛夫少校的请求，对已经暴露出来的敌军阵地上的火力点予以猛烈轰击，压制住了它们，使空降兵部队迅速占领了主要山梁。这完全出乎叛匪的预料，他们在慌乱中溃退……彼德洛夫少校趁机使用迂回战术，从两侧和背后攻击敌人。”

“叛匪不知有多少苏军和阿军从背后和两侧追击他们，匆匆忙忙撤离山口，在阵地上遗弃了许多重型武器。我军轻易夺取了山口，并加固了工事。萨图坎达夫山口，这个防御重点——打开整个敌军防守系统之门，就这样被攻克了……。”

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领导人在1987年作战经验总结报告中指出：“……进行了18次联合战役（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战役有‘雪崩’、‘毅力’和‘公路’）、25次局部作战行动和610次落实侦察情报的战斗行动。破获或歼灭近1000支马帮队，作战设伏7000多次，24次出动师旅团一级的部队支援阿政府军的独立作战行动……。”阿富汗战争就这样持续着，叛乱分子没有俯首就范接受和平，武装冲突的紧张程度丝毫没有降低，战争的绞肉机依然在杀戮无辜百姓。

根据苏联代表的建议，阿富汗领导人在这一阶段致力于巩固国家体制：总统——省长——县长——乡长——村长；在省级领导机构组建联合班子（特别注意人民民主党省委书记、省长、部队高级将领、警察局长和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的人选）；在那些不受人民欢迎的乡和县撤销“派驻”机构，把政权移交当地权威人物，也就是地方自治；创建进步党派联盟，为人民民主党的统一奋斗；总书记在党内坚持不懈地做那些主要人物的工作，以建立可靠的领导圈子……。

还特别注意了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从非主要方向调集部队和物资来确立对重要区域和交通干线的守卫和保护；保持同内外反对派力量的接触，不放弃他们的妥协。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定期会见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强力部门的负责人，向他们阐述我方立场，并提出相应建议。

文 件^①（机密）

致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同志

我向您汇报：

……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刚刚结束，纳吉布拉就约见拉耶克同志谈话。应该指出，纳吉布拉同拉耶克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经常单独商议各种问题，然后才提交政治局或者国防委员会讨论。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纳吉布拉曾多次派遣拉耶克前来与我会晤，不言而喻，谈话内容都是纳吉布拉授意的。

今年1月10日就有过这样一次会见。他表面上是来讨论加尔捷兹—赫斯特地区局势，但实际上是想了解苏联代表对于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喀布尔的评价。

开始，我就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对阿党政机构产生的影响阐述了我们的看法。拉耶克听后强调了这样一个

结论，就是阿富汗领导人已经彻底明白，苏联军队很快就要撤离阿富汗，所以，必须为加强人民民主党的统治地位和进一步稳定国内局势采取果断措施。

我接着向他提出了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他同意这些问题都是极其迫切的：

1. 加快地方政权选举的进程。人民应该自己决定选举谁。要勇敢地迈出吸收当地土匪头目加入地方政权这一步……。

2. 巩固国家政权的地位。省长理应成为省里的首要人物。重新审查省一级领导机构，罢免那些在百姓中间丧失威信的人……。

3. 加强党的建设。在即将召开的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上要确定人民民主党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的行动策略和发展前景……。

4. 促进左派力量联盟的壮大，使其加入到国家的政治进程中……。

5. 集中精力在八九个关键省份（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帕克吉亚、赫斯特、南加尔哈尔、巴尔赫、昆杜兹）加强工作，牢牢把握住阿富汗西部、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

6. 趁苏联军队还没有撤走，现在就着手建立联合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寻找非寻常途径，同诸如艾哈迈德·沙赫、杰拉鲁金这样的匪首进行接触，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工作。

在巩固党的团结这个问题上，拉耶克保证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制止高层的宗派主义，一切都会正常起来。按照他的话，在党组织的中层和基层环节，意见分歧并不十分明显，很容易清除。必须开除政治局委员中3到4位积极从事宗派主义活动的人，以达到中央政治局的团结一致。但是，拉耶克没有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

……他还说，民族和解政策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在落实过程中，阿富汗领导不会去吓唬反对派，“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我告诉拉耶克，反对派自己是不会走进这扇谈判大门的。你必须态度坚定地邀请他，并且要进行平等对话，要使反对派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所指望。长期以来，对立的匪首之间处理相互关系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动武。现在又该重新看待那些有影响的匪首了，而且要采取有区别的对策。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同我们接触，同我们谈判，并且加入联合政府的有关机构，还要给他们在省里或者中央提供优越的职位，同时还要通过以策反小股部队倒戈的手段来解决减少大匪首影响的问题。

阿富汗领导人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理解这个问题。阿富汗特别革命法庭在1987年缺席判处包括玛苏德和杰拉鲁金在内的7个著名匪首死刑的决定至今也没有撤销。阿富汗电台仍在播放对这些人进行恐吓的节目。显然，这只能妨碍同他们建立接触。

拉耶克表示同意这些论据。不过，玛苏德及其他那一类人是否能坐下来谈判（尽管阿政府还没有提出过这一建议），他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指望人民民主党内部的不和会导致党的自身灭亡，这样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政权……。

瓦连尼科夫 1988年1月

根据上述建议精神，在许多省份任命了无党派人士、其他党派人士甚至反对派人士担任省长；为建立联合管理机构也采取了一些表面性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了部分“热点”地区（赫拉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乌鲁兹甘、吉尔缅甸特）的紧张局势；为那些饱受战争创伤、始终颠沛流离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创造返回家园

的必要条件。不过，反对派领导人却针对难民问题制订了另外一套计划：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难民返回阿富汗，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民族和解政策的提出以另一种方式把人民民主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摆在了面前。建议别人做出让步妥协，它自己就应该放弃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垄断，与其他民主力量共同分享权力。但是，执政党官员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与众不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放弃官位：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关键岗位仍保留在人民民主党手中，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仅仅作为民主和民族和解的象征存在。喀布尔政权指望与政治无能者建立联盟，所以仍旧没有对“同盟-7”和“联盟-8”的首脑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步骤。为此，在人民民主党领导下开始组建各党派的左翼联盟。不过，正如预料的那样，这个左翼联盟是无能为力的，对局势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 创建“新的政党”和“实力阵线”

1987年7月2日，阿富汗革命委员会批准通过了“政党法”。它阐明，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超过了500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党；同时确定了政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自章程登记注册之日起，该党便有权与民族阵线联合，有权推荐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机构选举，有权同其他政党结盟——临时性的或者永久性的，有权依据法律就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公开自由地提出意见，有权创建自己的出版物或者根据法律使用国家的出版物，有权根据本党章程或者任务、目的和共和国有关法规履行其他职能。

政府控制地区合法或半合法活动着许多政党和左翼组织的这一实际情况客观地促进了左派力量阵线的形成，但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对立于人民民主党的完整统一的政党，而只是

一种运作于执政党框架内的力量，或者试图升格为政党的独立组织之间的相互关联的体系。其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人民民主党的，不少人拥有双重党籍。当然，很难指望他们来稳定局面，这种做法是为了撑起联合的门面，希望能吸引反对派代表加入其中。

人民民主党为吸收左派政党和组织加入联盟而展开的努力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党的十八中全会之前的1980年至1986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卡尔迈勒宣布要扩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的方针，但没有做任何实事。对立双方不愿妥协，不愿为停止互相残杀和稳定局势寻求共同点。卡尔迈勒及其追随者不愿同任何人合作，惟恐权力被分享。他们劝说党员相信，同左派民主力量在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同语言。

左派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团体要求在国家管理机构实行合作的呼吁书被否决的原因就是人民民主党独揽大权，并且不打算分权。这是个“坐失良机”的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1987年。随着民族和解政策的宣布，对待左派民主力量和其他爱好和平的政治组织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只邀请它们加入联盟，不强求它们加入人民民主党，显示出一种多党合作局面，而实际上是企图实现对这些组织的控制。

1987年11月，“阿富汗劳动人民革命组织”、“阿富汗劳动者组织”、“阿富汗伊斯兰人民党”、“阿富汗农民平等党”等组织先后获得合法身份，继而经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批准正式登记注册为政党。

如果排除了强制性色彩，人民民主党在吸引左派组织和政党组建联合政府方面采取的步骤都是名符其实的。对联合方面的所有问题都由苏共党代表提出建议，可是这些人并非行家，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党本身就是极权国家的提倡者。它历来不崇尚民主，所以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从某种角度讲，阿富汗成了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实验场。

在建议给阿富汗人的民族和解政策中，戈尔巴乔夫式的、无原则的“民主化”概念和立场观念初露端倪。它在苏联的实验对于国家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民民主党执政的整个年代，从1978年11月至1988年10月，有一支庞大的苏共顾问团常驻在阿富汗，他们负责落实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参与工作的党的顾问人员达到了316人，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顾问教员，以及共青团顾问和译员也有45人之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忘我的工作。

这个顾问机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边区抽调了党委会工作干部组建的，其中莫斯科42人、列宁格勒4人、俄罗斯联邦144人、乌克兰39人、哈萨克斯坦27人、白俄罗斯12人、乌兹别克斯坦10人，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各5人，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各4人，立陶宛、拉托维亚、格鲁吉亚各3人；土库曼斯坦和爱沙尼亚各2人。一共有16个民族的代表。

经常更换领导人妨碍了党的顾问团的工作效率。10年时间里先后担任顾问团领导的有维谢洛夫、戈列科夫、科兹洛夫、罗曼采夫、罗蒙诺索夫、克尼亚耶夫、莫扎耶夫、叶果雷契夫（后两位在任时兼任驻阿大使）。

除去党的顾问人员之外，卡尔迈勒和纳吉布拉身边还配备了政治顾问，他们为人民民主党研究制定战略方针，为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起草各类会议发言。不过，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局势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经常成为一些人达到私人目的或者部落目的的掩饰。因此，建立“各政党阵线”的举措并没有在稳定局势方面带来纳吉布拉追随者所期望的实质性效果。不过，是人民民主党首先进行了在民主和国家中立的共同立场上联合其他政党和社会力量的尝试。至于提出来的纲领过于“模糊”，而其保障实力又过于虚弱，则是另一个问题。另外，这个纲领没有考虑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



合作是民族和解政策的主要方针

阿富汗领导人宣布民族和解政策时确定了一个目标：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扑灭自相残杀战火的联合政府，表示了要与包括国内外反对派和侨民界（扎希尔·沙赫）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合作的决心。

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声明，准备在停火的前提下，与昨天的敌人携手执政。提供给反对派的位置有首相、最高法院院长、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半的部长位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和一批省长的位置。但暗地里的打算是尽快推翻这些建议，掌握全部权力。

遵循大国民议会的决议精神，以停火为目的扩大对话，纳吉布拉于1月27日发布命令，豁免了一大批被判处死刑的战地指挥官，其中有著名的玛苏德和捷拉鲁金。阿富汗领导人口头上承认联合的不可避免性，行动上却不情愿、不敢于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总以为应该是对手主动前来称臣。

这里有一个严重疏忽。国内反对派拥有自己的实力，他们干扰和阻挠人民民主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另外，国外反对派和支持他们的国际势力都极力反对民族和解政策的落实。指望“同盟—7”的某个领导人能加入联合政府是不切实际的，起码是天真的。

使百姓对民族和解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还保留着苏联驻军。而苏联撤军以后维持不了几天政权的阿富汗领导人开始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只能依赖于妥协和对反对派采取新措施。但是谈何容易，根本就不现实。

人民民主党已经陷于无法克服的深刻危机之中。持续不断的、日趋激烈的战火更是使得这样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实际上，人民民主党已经丧失了控制局面的机会。社会上的恶意煽动、执政党的言行不一、党政机构领导人的贪污腐化

都使老百姓离心离德、人人心思变。

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创造条件去解决战略性任务：克服深刻的社会危机，实现苏联撤军，保证国家今后正常的社会发展，而不是十万火急般地去拯救人民民主党自身。

来自喀布尔的情报^①（机密）

……最近同纳吉布拉以及其他阿富汗同志多次进行了认真的交谈，加上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的分析，可以对当前阿富汗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特点做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随着戈尔巴乔夫和纳吉布拉的声明公布于众，民族和解政策的一个重要阶段就要圆满结束。当地舆论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为恢复阿富汗和平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过去年代里所为的总和。同时，局势正在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时期，而且它所包含的方方面面现在尚无法一一列举。但重要的已经明朗：阿富汗人应该自己去弄清楚并且亲自利用符合历史传统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那些问题的时刻正在来临。理顺相互关系的形式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要诉诸武力，有的地方则需要谈判，而且必须做出重大让步，首先是要求政府方面，而这正是阿富汗问题由阿富汗人来解决。

大家都明白，苏联撤军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将是最为关键的，据估计，反对派武装会对政府军施加强大压力。诚如纳吉布拉同志指出的，重要的是在头两三个月里顶住，此后反对派便会变成强弩之末，还会出现各种复杂局势使反对派的实力进一步削弱。另外，政府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段，按照总参谋长塔奈的意见，在那些政府军明显处于劣势的地区，应该提前撤出，这样做也

^① 摘自瓦连尼科夫大将档案。

可以避免日后反对派把自己的每一次局部得手都吹嘘为重大的军事胜利。

……随着苏军的撤离，反苏主义这个促使反对派联手作战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活动于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武装战地指挥官同本党派境外上司之间的矛盾将会具备更加激烈的对抗性质……。

纳吉布拉同志认为，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沉重的、同反革命武装的大规模作战；第二种情况应当说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不依靠作战手段来解决问题，而利用各种智谋和妥协手段，以及利用部落、民族、同乡的关系进行谈判。

纳吉布拉同志本人倾向于认为，局势不会朝着不好的方向转变。他多次谈到过这层意思，每一次都表示出乐观态度。

……阿富汗当前的局势表明，纳吉布拉当选总统带来的积极影响已经可以感觉得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相当一部分国内反对派的知名首领在努力同纳吉布拉建立接触。根据这些人的言谈，他们看中的恰恰是打交道的对象不是党的领袖，而是国家总统这一点。同样情况也存在于各省，规模较大的武装队伍的指挥官很情愿同省长打交道。

现在还无法预测局势的转折和曲折。重要的是阿富汗人能够彻底摆脱依赖心理，自己解决问题，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失误是难免的，但只要不酿成重大政治错误就行。

实践表明，戈尔巴乔夫和纳吉布拉会见时确定、谢瓦尔德纳泽今年1月访问喀布尔时具体化了的今后的工作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莫扎耶夫（外交部）、瓦连尼科夫（国防部）、
扎伊采夫（克格勃）、叶戈罗夫（内务部）

1988年2月

阿富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促成局势的政治化调解。1988年4月进行了议会选举，其宗旨在于为民族和解政策注入新动力。党外人士穆罕默德·哈桑·沙尔克当选为政府首相，议会中的62个席位留给了反对党，计划在苏联开始撤军之际成立以沙尔克为首的联合政府，组建有当选的国内反对派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从边境地区撤回政府军，为难民返回创造有利条件。

不过，1988年上半年阿富汗的局势依然复杂和紧张。缺乏民众足够支持的纳吉布拉不得不依靠党的机构。这就把他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虽然加强了领袖在全国的地位，却从整体上削弱了总统制政权的社会基础。

阿富汗社会的深刻政治危机已经无法避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已经形成了不利于人民民主党的局面。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重大改观，纳吉布拉凭自身力量是无法同反对派的全面推进抗衡的。显而易见，民族和解政策不会带来期望的结果。没有以党和政府的积极实践活动为内容的民族和解最终造成了广大群众、大多数党员和军官的政治冷漠和事不关己，反对派却大肆利用民族和解政策的条件在百姓中间开展反政府和反苏的宣传工作。

反对派了解撤军是苏联政府的战略方针，寄希望失去了苏联军队直接援助的纳吉布拉政权坚持不了多久，所以继续使用武力手段，妄图消灭它。还有一点其实也很清楚，就是如果反对派认定自己明天能夺取全部政权，那么，它今天怎么会同意接受政府中的几个位置呢？



日内瓦协议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吗？

日内瓦协议签署前夕，苏军指挥部为巩固阿富汗武装力量，给政府创造一个撤军后的良好环境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曾预料，不论日内瓦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随着苏联撤军，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局势必定会复杂起来，并将反映

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中。

为此，我们督促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政府领导人要理解在首都和地方落实巩固政权的措施同等重要，必须着手在地方开展工作，比如加强国家政权的工作，包括突出省长的作用，强调省长工作的主要意义。全面树立“省五人组”的威信（省长、省委会第一书记、驻军指挥长、国家安全厅厅长、警察局长）。在县和乡进行了政权选举，候选人都是当地知名人士（过去是上面委派）。但这个过程仅仅是在积蓄力量。尽管国内已经宣布实行多党制、总统一省长一县长这条线路已成为国家管理的基本体系，但人民民主党过分突出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得到纠正。在人民民主党对政权持续垄断的条件下，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还不具备足够的权力，充当着次要角色。

民族和解政策以最消极的方式影响到阿富汗军人的心理状态。即使排除这一因素，阿富汗政府军官兵的精神状态也始终是萎靡不振和士气低落。逃兵现象激增，部队对战胜反对派的信心也丧失殆尽。显然，在思想斗争的较量中反对派已把握了主动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当局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哪怕是国土的一部分也好。

纳吉布拉执政以后，党内斗争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日趋激烈。人民民主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与“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的竞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去传统的派别和部落团伙外，在所有政治局委员身边都形成了新的帮派，每一派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民族成分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不仅仅是在党内。党已经松懈涣散。在党组织内部，在省委会和区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机构里，人们对纳吉布拉的所作所为公开表示不满，指责他“不能清楚地构思”党的当前斗争战略和策略方针，含糊不清地下达任务，不吐露时局的真实情况，正在把党引向政治垮台。

这些力量当中最为显眼的是卡尔迈勒的追随者，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阿明分子”，他们围绕在中央委员会书记、政

治局委员泽莱身边。此人于1988年5月致信苏共中央求助，岂料信从莫斯科转到了纳吉布拉手中，这对泽莱产生了严重后果。

这时，人民民主党党内早已是一盘散沙，而美国借机加强了对反对党派的援助和支持。

美国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势力的证据^①

美国当局不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可能在日内瓦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直接达成协议，继续对阿富汗的反革命势力提供广泛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援助。

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的策略和行为的意图都在于迫使苏联在最短时间内撤军，破坏民族和解政策的实施，使反革命势力的军事潜力保持在新条件下（只要日内瓦谈判成功，就会出现这样的新条件）足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水平上。在国会极端主义势力的压力下，美国当局的部分代表试图把停止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势力同苏联撤军的进程联系在一起。提出的要求是，不是在日内瓦签署了相关文件以后立即停止全部援助，而是把这一援助保持在与苏联撤军速度相一致的水平上。美国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亲西方的、主要是倾向华盛顿的反动政权。

其时，在制订反阿富汗行动计划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有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主管部门。到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援助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1988年的计划援助额超过了7亿美元。最近以来，美国人立足于向叛匪提供现代化的对空作战武器。1987年，叛匪得到了600套“毒刺”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系统，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美军基地和训练中心接受

^① 资料来源：苏联克格勃、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1988年3月。

培训的叛匪人员达到了100人，作为指导如何使用这种武器的教官，他们接受了内容广泛的训练。美国人的军事援助是通过反革命党派的总部实现的。提供给叛匪的军火首先运抵卡拉奇，接下去的步骤是：卸货入库，转运巴阿边境地区，移交给叛匪。通常，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军队要参与这一过程。

从1988年起，频繁的军火供应从美国运往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的港口和空军基地。这些武器弹药囤积在当地仓库，着眼于未来的需求。

美国人还参与实施把土匪队伍整编为正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1988年3月，在巴基斯坦整编成立了22个团，在阿富汗成立43个团。不断建立新的反革命据点，完善指挥联络系统。

在阿富汗境内从事作战辅助工作、工程工作和在巴基斯坦军事培训中心训练叛匪的美国顾问人数达到了250人。分布于巴基斯坦的巴尔萨克、科哈特、帕拉奇纳尔、科维塔、白沙瓦、扎姆鲁特、萨达等地区的专业化中心机构也都发现有美国顾问的介入。1987年12月，“同盟—7”代表哈列斯在白沙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提到过一名美国顾问死亡的事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确实有美国军事顾问在叛匪队伍中间活动。

在积极开展反对阿富汗共和国的行动中，华盛顿组织了规模广泛的心理战攻势，目的在于破坏喀布尔政权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阻挠联合政府的组建。50多家受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领导或控制的无线电台使用阿富汗各民族语言进行煽动性广播。1988年中央情报局拨款100万美元在叛匪中间培养宣传干部。

援助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当时美国国会赞同扩大援助，里根当局便开始提供现代化武器。其中应国会要求，经白宫批准，中央情报局向圣战者运送了瑞士生产的“厄立

康”对空导弹。同年，华盛顿又向叛匪提供了英国生产的“吹管式”地空导弹系统，1986年3月，最终决定提供美国生产的“毒刺”便携式地空导弹系统。

1985年11月，一架运载军商人员的苏式安—12飞机被击落，机组人员和妇女占多数的28名乘客无一生还。军部副参谋长西蒙诺夫上校率员搜寻遇难者尸体和飞机残骸时，在坠落地区发现了对空武器射击阵地和一些遗落的、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使用过的对空射击系统部件。

大约就在这段期间，我们从叛匪手中查抄了6套外国制造的便携式地空导弹系统。起初，我们以为是“轻标枪”式对空导弹，经过第40集团军的武器专家卡夫里加中校和菲朵托夫少校研究，确认是“吹管”式对空导弹，于是迅速研究对策。军部的度量衡学工作室在阿列克辛中校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拆卸下来的导弹的关键部位随时可能爆炸），由当地高手制造出了干扰发生器，这个发明后来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直升机驾驶员中间。

1987年1月5日，由谢尔盖耶夫少校率领的第7特遣营值勤小组在沙赫涿西南首次截获了一批“毒刺”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系统，共3套。当时，米—8武装直升机对被发现的马帮队进行攻击，米—8直升机空投了作战人员……战士们开火击毙了16名叛匪，缴获了全套的“毒刺”导弹系统、两部装有发射器的起动装置，一名活下来的叛匪做了俘虏。

实际上，敌人还是发射了两枚，显然是为了炸毁“毒刺”式地空导弹系统。因为一旦被我们缴获，责任者将会被处以死刑。还有一次发射没有来得及完成。“毒刺”导弹和起动装置被运往喀布尔第40集团军参谋部，研究了随机文件后得知，这批武器是在白沙瓦得到的，由17名叛匪护送，用5辆摩托车运往阿富汗内地。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国防部长曾经许诺授予第一个搞到“毒刺”式导弹的人“苏联英雄称号”。然而，当起草给谢尔盖耶夫授奖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障碍”：他在

“饮用酒精饮料方面并非无劣迹，而且对上级的态度十分生硬”。总之，只授予他“红旗战斗勋章”。谢巴尔申中将证明，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人员还从圣战者手中购得了几套“毒刺”导弹。

调解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前，不论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都在提高自己作战潜力上加速了投入。

尽管如此，在阿富汗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和美苏关系中的积极变化仍然给予缓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双边关系的谈判以新的强大动力。

经常有人问：既然早在1982年苏联领导人就明白了必须从阿富汗撤军，那为什么撤军过程拖延了这么长久？这是因为阻挠撤军的势力是极具权威的，况且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利于撤军计划的落实。另外，必要的条件尚未成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美苏间旷日持久的竞争没有消除，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还没有建立。毕竟，两个大国间的全面对抗已经成为阿富汗国内冲突持续不断的原因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客观地说，出于战略意图，美国当局始终在破坏联合国倡导下的谈判。1982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正式会谈结束以后，里根总统决定扩大对叛匪秘密援助的规模。1982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齐亚·哈克会见时告诉后者：“如果巴基斯坦停止对抵抗者的支持，苏联将‘迅速’离开阿富汗。”怎么样呢？里根在此后下达命令给中央情报局：向圣战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武器。1983年5月，当捷戈·科尔多维斯宣布“面面俱到的决议文本已经完成了95%”时，美国当局却公布了另一条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分摊了用于向叛匪提供军火援助的费用，一家5000万美元。”这样，谈判立刻复杂起来了。

1986年3月，科尔多维斯宣布：“他现在拥有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万无一失的决议的所有细节”，而美国政府却指示向阿富汗叛匪提供“毒刺”导弹……事情就是这样。日内瓦

文件签署前夕，美国当局又提出了许多自己的建议，其实质可以归纳为：我们的阿富汗政策之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苏联军队在最短期内永不返回地彻底离开这个国家，给予阿富汗人民独立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如果协议规定苏联开始撤军时美国就要停止对反政府力量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国将不予签署；白宫应该坚持分阶段终止援助，就是削减援助反对派的比例要同撤军进程的比例保持一致；美国应当预先制定一个苏联撤军以后继续对圣战者提供援助的方案，以防苏联继续供养一个“亲苏和亲共产主义”的派别；美国要同巴基斯坦联手长期维持可以给叛匪提供援助的机制，并且随时准备利用这一机制，以对付苏联撕毁协议派军重返阿富汗；美国要根据有关协议的程序要求苏联给予阿富汗赔偿，以弥补战争给阿富汗造成的损失。赔偿数额由国际上的专业委员会确定。

1988年4月14日，经联合国斡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旨在停止阿富汗流血的一揽子协议。美国 and 苏联充当了执行协议的保证国。我们认为，这些文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在原则方面为解决阿富汗局势中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终止对阿富汗事务的武装干涉和其他方式的外部干涉。

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双边协议规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均负有责任不使本国领土以任何方式被利用于干涉对方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民族统一，以及破坏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双方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协助、怂恿和支持旨在破坏对方统一、颠覆对方政治制度的叛乱和分裂活动；也不得在本国领土内招募、培训、装备、资助旨在对方境内从事敌对行为的雇佣军，同时要拒绝给予对这类雇佣军的培训、装备和运送提供资金的协助；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利用或纵容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团伙；禁止为从事破坏活动、颠覆活动、扰乱治安、贩运军火等行为的人员提供资助，进行装备和培训，禁止这样的组织或个人存在于本国领土内或

者藏匿于难民营。

关于难民自愿返回的双边协议责成阿巴两国要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必要措施。

根据这些谈判结果，苏联负有在9个月时间内（自1988年5月15日开始）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责任。实际上，在头3个月里，苏联驻军就已经撤出了50%。

巴基斯坦和美国理应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阿富汗的内部事务。

为了监督各方履行职责，成立了联合国保护下的观察机制。

但是，西方记者奥利维尔·罗伊说：“1988年4月14日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的文件并非和平协议，它仅仅调解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这个实质性问题。”

“……协议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第一章从理论上限定巴基斯坦不得通过本国领土为抵抗派提供或者运送武器。然而，华盛顿的代表就在协议签署的那一刻对外声明，如果莫斯科继续援助喀布尔政权的话，美国将在今后保证提供抵抗者所必需的一切。”

“……可以不要求苏联签署对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来说等于是死刑判决书的协议。重要的是他们离开那里，并且维护自己的威信……。”^①

没有受邀前往日内瓦的圣战者首脑发表声明说，在那里签署的协议同他们毫不相关。赫克玛吉亚尔宣称：“无论什么方式，这个协议都是与我们不搭边的，也不可能赋予我们任何职责。纵然苏联开始撤军，我们该发动进攻时还得发动进攻。”

应当指出，依我之见，苏联领导人拒绝美国人提出的同

^① 奥列维尔·罗伊：“正在扩大的阿富汗冲突”，《欧洲文献》，1988年第9期。

时停止对纳吉布拉政权和圣战者军援的建议，其实是个重要失误，尽管这样做也许会加快政权的垮台。那时，我们的领导人认为，把反对派同人民民主党相提并论缺乏法律依据。他们不顾分析专家预测亲苏的政党没有前途，仍然抱有什么希望。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对阿富汗国内政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民族和解政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加快了对一些尖锐的地区性问题的政治解决。

这是阿富汗政府果断的一步棋，它提高了不仅关心实现和平，而且为之做出具体努力的国家政权的威信。不过，阿富汗政府要员在私下同苏联代表谈话时流露出一种担心，就是苏联军队一旦撤出，局面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混乱，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严重动摇政府地位的党内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这更加重了他们的担忧。

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苏联驻阿富汗代表立即执行，首先是组织撤军的一系列措施。

5月10日，也就是开始撤军的前夕，传达了苏共中央致全体党员的内部信件。信中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件和我们在那里的作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阐述了苏联共产党对阿富汗和围绕阿富汗问题的一贯政策。苏共中央通过这封内部信向党员同志们打招呼，希望消除由于“改革”而在党内和人民中间引起的紧张气氛和情绪。

如何看待这封信呢？不言而喻，以今天的观点来评价，信中充满了对阿富汗事件的固执态度，对纳吉布拉的分析也流露出一种懊悔。还有许多虚无缥缈的宣传鼓动，信中提出的任务也是无法完成的，而对时局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后来的情况证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以为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能解决好阿富汗问题，但我们错了。

发生的一切都在使我们国家的利益遭受损失。当时，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在号召尊重和报答那些执行祖国命令，

履行军人誓言，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去阿富汗冒险的第40集团军将士的同时，在全苏联掀起了不知廉耻的反军运动。“自由”的新闻媒介我行我素地利用一切手段了解事情真相。戈尔巴乔夫的“成就”——公开性被用来进行反对自己政权、反对国家关键机构和强力部门以及搞垮军队的信息战。

浴血战斗的军队被指责为残酷无情的军队、滥杀无辜的军队。对此，政府竟然置若罔闻。参战官兵听到人们如此评价他们在阿富汗的行为，既奇怪又痛苦。不过，当时他们都还相信宣布的“改革”，寄希望于真理最终会占得上风。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

第八章 别了，阿富汗！



撤军第一阶段

1988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同纳吉布拉在塔什干会见以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日内瓦协议一旦签署，将根据拟订的计划从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实施撤军……。”

命令附有由总参谋部、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土库曼斯坦军区参谋部和第40集团军共同执行的撤军进度表。它经过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的审理，同时还研究制定了撤军的综合方案，明确了在阿富汗领土和苏联领土上将要采取的措施。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便开始实施这些措施。

尚在准备阶段（4月到5月的上半个月）时，第40集团军司令员就下令把我们的营连级部队从个别规模不大的驻防军中及时撤回到主要的团级部队驻防基地。

日内瓦协议签署之际，驻阿苏军人数为10.03万人。撤军的第一阶段（5月15日至8月15日），苏联部队应当撤出贾拉拉巴德、加尔捷兹、加兹尼、坎大哈、拉什卡尔加赫、赫拉特、法伊扎巴特、申丹特等地的驻地，部分后勤保障部队撤出喀布尔。苏军的撤离路线有两条，通过库什卡和捷尔梅兹，并遵循分阶段和连续性。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撤军表的次序更改了多次。

5月15日，贾拉拉巴德驻军首先开始撤离。在贾拉拉巴德、喀布尔、海拉屯等沿途城市，阿富汗方面组织了群众集会。在贾拉拉巴德有1.2万人参与送行，在喀布尔上街送行和参加集会的人达到了10万人。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以纳吉布拉总统为首的阿富汗政府官员出席了首都的欢送活动。

报道苏联撤军的记者有212人，其中22人来自10个西方国家（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瑞典、芬兰、联邦德国、日本），15人来自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新闻社、塔斯社）。他们随着部队一直抵达喀布尔，再往前走，部队乘军车近抵苏联边界，其余人乘飞机前往捷尔梅兹和海拉屯。新闻记者的活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为了这一重大事件能够得到全面真实报道，为记者提供了一切方便。

为确保安全撤军，预先做出了有关规定：利用其他部队和空降兵加强公路沿线的保卫；炮兵和空军对部署了叛匪火力点的地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空军对毗邻地区实施夜间不间断照明，防止圣战者暗中靠近部队。一句话，我们保证了部队的行军不受丝毫损伤地完成。当然，大多数叛匪没有给撤军制造麻烦。

向阿富汗部队移交武器装备和军营，以及建立必要的储备（包括弹药和燃料），都是按照苏联国防部长的命令和确认的计划进行的。所有的营房、公共设施、装备和住宅房都实现了移交。

第一阶段，苏军撤离了12个省。如日内瓦协议规定，从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加尔捷兹、法伊扎巴德、昆杜兹、拉什卡尔加和坎大哈撤出的苏军人数为5.02万人，正好50%。

纳吉布拉要求我们从昆杜兹撤军，而不是申丹特和赫拉特，总统还坚持在坎大哈留下一部分部队。为此，我们被迫削减留守喀布尔人员的数量，这样会使留守坎大哈的部队处

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那里仍然是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瓦连尼科夫大将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为了说明自己的理由，瓦连尼科夫大将于7月底带领一批军官飞抵坎大哈，说服省长奥柳米将军相信在第一阶段就必须从坎大哈撤军是必要的。他仅仅要求多留一些军火储备，并得到了许诺。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最终达到了苏联部队按撤军进度表离开坎大哈的目的。

撤军一开始，反对派武装力量便对纳吉布拉政权施加压力，作战行动频繁起来，对人民民主党、国家机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士气和分化瓦解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果，其中包括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在库纳尔、南加尔哈尔、帕克吉亚、帕克捷卡、洛加尔、瓦尔达克和坎大哈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随后，反对派又把力量转移到其他省份，而且不断改变策略。

8月15日以后，只有6个省还驻有苏联部队（喀布尔、赫拉特、帕尔万、萨曼甘、巴尔赫、巴戈兰），有5.01万人，第40集团军的空军力量保留了55%，其中20%为作战飞机，35%为陆军航空兵。他们的主要力量都用于协助阿军保卫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航空基地和公路交通；在不同地区支援阿军同强硬的反对派武装进行战斗。

后来的事态表明，以我军基地区域为支撑点进行撤军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它防止了留守地区的政治变态，而阿富汗人则取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在第40集团军空军支持下）。看来，这个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联合国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

苏联和阿富汗全面准确地履行了在日内瓦承担的义务。联合国监督机构的代表在现场目睹了一切，而美国和巴基斯坦却以自己的见解来对待谈判结果。联合国建立的监督机制缺乏效力。其代表竟然没有被允许进入分布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反对派训练营和基地，而联合国安理会却未采取什么制裁

措施。

我们极其严格地努力履行苏联的义务和职责，并给予联合国代表多方面协助。笔者就有幸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同赫尔米年、谢万、皮尔奈斯的会见与交谈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不过，当时就已经觉察到，联合国的和平使命收效甚微，这后来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证实。

为了推动日内瓦协议朝前发展，苏联和阿富汗表现出了新的积极性。其中，我们在联合国框架内又提供6亿美元的无偿援助用于恢复阿富汗经济建设和资助难民。阿富汗领导人多次向“同盟—7”和在西方的侨民代表发出呼吁，建议就采取停火措施和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直接谈判。

这些措施本来是可以促进阿富汗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但它们的特点毕竟是模棱两可和动摇不定，更何况敌对方面（美国和巴基斯坦）在明目张胆地干扰和破坏日内瓦协议，而反对派武装则利用他们的支持使国内局势紧张起来。苏联军队减少和阿富汗军队从一些边境地区撤回以后，反对派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阿富汗外交部递交给联合国驻喀布尔和平使团的照会具体叙述了巴基斯坦方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违反日内瓦协议的事实。其主要行径是帮助阿富汗反对派在训练营地和培训中心训练作战人员，组织并装备这些人，有时，巴基斯坦军人还直接参与向阿富汗境内转运武器和弹药。

苏联撤军的第一阶段结束后，运送军火的马帮队明显增加了数量。仅仅在1988年的9月和10月里，就有172批大规模的马帮队进入阿富汗领土，它们运输的军火是反对派用来进攻政府的。马帮队和作战人员的派遣和调拨都是经过巴基斯坦政府批准的；他们还发放特别公路通行证，确定作战组的人员组成。为了补充射击兵器 and 弹药，反对派武装把从阿军手中缴获的重型武器运到巴基斯坦境内，作为交换或者出售给巴基斯坦当局。

我们的情报部门不止一次发现巴基斯坦武装力量的军用

车辆把叛匪人员和军火运送到阿富汗边境。9月底，他们把4000枚火箭弹从白沙瓦运至帕拉契纳尔地区，后来这些弹药被转运到了喀布尔、洛加爾、帕克吉亞等省。

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反对派领导人仍然在伊斯兰堡当局的支持下千方百计阻挠难民返回家园，不惜动用边防军、警察部队和叛匪人员。在边境线一带的兰吉—克塔尔、捷里—曼加尔和恰曼等地区经常发生阻挠难民返回的强迫性行动。另外，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在伊斯兰堡的默认和参与下，展开过清除回归情绪的宣传运动，包括恐吓，直至当众迫害。

这就是尽管阿富汗政府加大了接受难民的工作力度（扩大帐篷营地，筹建旅馆，组织医疗服务和提供饮食，以及利用苏联的无偿援助提供大笔财政拨款），从巴基斯坦返回家园的人数仍没有增加的原因。返回的难民中有80%是绕过边防站才得以脱身的。

巴基斯坦在多国外长会议期间为反对派主要领导人提供发言机会，直接践踏了日内瓦协议。在白沙瓦、伊斯兰堡和魁塔，多次举办有圣战者和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和集会。叛匪总部内的出版机构继续运营着，印刷出版宣传书籍，然后运送到阿富汗境内。

外国顾问和专家继续被派遣到阿富汗领土上协助叛匪作战。比如，活跃在巴米扬、巴尔达克、乌鲁兹甘和加兹尼等省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顾问；活跃在庫納爾、南加爾哈爾、帕克吉亞和帕克捷卡等省的則是巴基斯坦軍事顧問。這段時間里，為巴基斯坦境內叛匪提供大量物資、財政和顧問援助的是沙特阿拉伯和美國。

接受美國提供的物資和財政援助的不僅有赫克瑪吉亞爾的伊斯蘭黨，還有“同盟—7”的其他成員。有事實為證：1988年11月6日至10日，以拉巴尼為首的反对派代表团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对他们承诺，“同盟—7”对美国新政府的指望可以超过里根政府。

设在巴基斯坦的美国情报机构也转而从事起直接组织和领导反对派武装活动，为此特地在白沙瓦设立了以驻伊斯兰堡大使助理玛克－威廉斯（原驻喀布尔使馆一等秘书）为首的代表处，以便同“阿富汗抵抗运动”保持联系。据我方军事侦察报告，9、10月间，在巴达赫山、帕尔万、贾皮萨、塔哈尔、坎大哈、吉尔缅甸特等省都出现过由这一机构派出的秘使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

而巴基斯坦却在同一时期里毫无根据地指责苏联扩充在阿部队，调集作战飞机，部署导弹，仿佛准备打击巴基斯坦领土。这显然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捏造。尽管阿富汗人一直在促使苏联空军去轰炸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反对派目标，但整个战争期间，苏军指挥部始终留意避免这样做。巴基斯坦的这种无中生有完全是为了掩盖齐亚·哈克政府自己对日内瓦协议的违背。

可以确认，由于双方对协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产生了许多困难和误解。作为执行协议的保证方之一的美国，对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做法给予了直接的影响。齐亚·哈克政权和阿富汗反对派首领仰仗美国人的支持，开始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苏联和阿富汗，甚至联合国。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痛苦的，但我们毕竟处于软弱的一方，被迫严格履行达成的协议，尽管美国和巴基斯坦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同一协议。看来，如此的命运向来都在恭候冲突中渴望得到和平解决，但又缺乏足够实力来保障的那一方。

在此，亚洲问题专家哈里特·杜朗的文章“苏联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日渐扩大”很具有说服力。他认为，违背协议是由于在日内瓦签署的文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可以做出双重解释。他说：“……9月份，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逗留华盛顿期间，坚持要求日内瓦协议签约各方会见，以讨论美国和巴基斯坦的违约行为。然而，白宫却没有看到类似会见的任何理由。美国政府坚持认为，问题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莫斯科过多地向喀布尔提供军事援助，使得华盛顿不得

不给予圣战者支持。这样，力量对比就发生了不利于喀布尔的变化。”

不过在1988年10月初，美国政府仍然在呼吁圣战者要克制。

……由3个现存伙伴（苏联、美国和巴基斯坦）共同拟就的日内瓦协议过于模糊。首先，各方都有自己的理解；其次，大家都有意识地阐述自己的解释。从华盛顿和伊斯兰堡的观点看，莫斯科是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喀布尔的投降。而苏联的观点则认为，“这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没有确定过的”。^①

日内瓦协议刚刚签署，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就表示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的，“协议中对美国继续向抵抗运动提供军事援助没做任何限制”，美国将这样做下去，并断言：“我们准备以克制对待克制”。被舒尔茨的这番话所怂恿的巴基斯坦外长也坚持认为，协议没有对巴基斯坦向圣战者提供援助立下任何限制。而协议的第11章第3~12款明确规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双方必须放弃干涉对方内部事务，无论公开还是秘密。

西方记者戴维·姆拉尔卡悲观地看待已经形成的局势：“……在莫斯科的高层会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戈尔巴乔夫就违反日内瓦协议一事提出了严正警告。他宣称：‘协议毕竟是协议。我们看到了巴基斯坦的所作所为，苏联外交部对此也做出过声明。在此毋庸赘述。我仅仅要强调，破坏协议的企图会招致极端严重的消极后果。这一观点已经毫无保留地向总统先生和美国代表团阐述过。’”

“从那以后，苏联的愤怒不断加强。连西方记者都经常报道阿巴边界两侧的叛匪武装急剧增长。美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他们并没有违背协

^① 哈·杜朗：“苏联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日渐扩大”，《里塞纳环视》，1988年11月，第401~406页。

议的字面意义，因为它允许双方在提供武器方面保持旗鼓相当。从这方面讲，莫斯科成了仓促签署协议的牺牲品。这个协议包含了对于令人怀疑的利益的慌乱让步，而协议却要接受现实检验。”

“不论莫斯科多么恼火，甚至愤怒，苏联所握有的变着并不多。它可以令人忧郁地暗示自己的政策将针锋相对，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它能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军事介入。而且，不论类似的军事行动是如何被挑动起来的，都势必会严重损害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戈尔巴乔夫心甘情愿地在阿富汗问题上表现自己的灵活性，这已经成为他巩固自己国际威望的重要因素。”

“……前景是这样的，莫斯科一如既往地反对美国和巴基斯坦的行为，同时继续自己的撤军……。”^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协议没有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那它就会被强大的一方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以解释和执行。

的确，根据对1988年阿富汗局势以及围绕着这一局势的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可以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确信苏联不会中止从阿富汗撤军。苏联的利益在于按照既定期限撤出军队。如此地蔑视苏联，这在西方完全是第一次。显然，当年苏联领导人那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和多次在地缘政治较量中使自己蒙受损失的经常性单方面让步的做法正中美国人下怀。

采取投降主义路线的戈尔巴乔夫寄希望于西方伙伴的绅士风度，希望他们会协助恢复阿富汗的体制，但是，真正的政治家从来都是依本国利益行事，不顾及软弱者，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需要强劲的对手，并且千方百计地回避，他们支持在苏联发生的、把国家引向崩溃的“改革”。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东西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分崩离

^① 德·穆拉尔克：“莫斯科不抱希望”，纽约《中东国际》，1988年7月，第11～12页。

析，但西方分析家已经发出预言：“俄罗斯人试图提前界定出未来的阿富汗，也就是以政治途径达到军事手段达不到的目的。莫斯科在极力掩盖自己在阿富汗的‘软弱’。很多苏联领导人担心，这些‘软弱’可能会鼓舞苏联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或者促使东欧国家奉行独立于莫斯科的路线……。”

在同苏联关系方面，美国最终得以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事情在于，美国当局在40年代已经意识到利用通常的战争手段是不可能消灭苏联的，并且估价了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于是研究制订了旨在消灭苏联的惟一手段的全面反苏的心理战和宣传战计划。在确定这场战争的性质时，北约的一份军事理论刊物《大国军力评论》指出：“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惟一手段是：借助分裂和颠覆的方法从内部搞垮苏联。战争的主要方式：使其他国家敌对于俄罗斯，使世界上其他民族敌对于俄罗斯民族；在其国内则要使一个民众群体敌对于另一个民众群体。”

为了达到拟定目标，前人不仅完整和妥当地利用了时代最新科技成果，还有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民族的经验，以及古代的经验。远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在自己的著作《孙子兵法》中奠定了一个国家以“和平手段”征服敌手的基本理论：“败坏敌对国的所有长处。引诱其代表性人物犯罪。诋毁他们的威信，必要时将其丑恶公布于众。不惜与那些卑鄙齷齪的小人合作。在敌对国百姓中间制造内讧、挑拨冲突。唆使青年人反对老一辈人。不择手段地干扰敌对国政府的行为……不惜使用财物和资金用于搜集情报和收买同路人。总之，在钱财和承诺上不要吝啬，它们终究会带来巨大利益。”^①

美国人不仅出色掌握了古代中国军事家的训诫，而且忠实继承其同胞、中央情报局创始人和首位领导人阿连·达列

^① 《孙子兵法》，康拉特译，第12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

斯的衣钵，他在40年代末就公开宣称，希望看到在苏联“结束战争，方方面面勉勉强强安顿好。而我们投入一切拥有，所有黄金、物资援助，采取全部措施来蒙蔽和愚化百姓。人的大脑和意识是善于思变的。我们在苏联制造混乱，我们暗中调换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迫使他们信奉被偷梁换柱的价值观念。怎么样了呢？我们定能在俄罗斯寻觅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同盟者和协助者。地球上最倔强的民族的大规模灭亡悲剧将一幕接一幕地发生，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将不可逆转地彻底熄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我们将逐渐消除他们的社会本质，让艺术家缴械投降，剥夺他们描写和研究人民大众心灵经历的愿望。文学、戏剧和电影将描写和宣扬人类最低级的情感。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扶持那些在人们意识里强行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虐待崇拜和背叛崇拜的所谓艺术家，一句话，支持任何形式的道德沦丧。在国家管理领域制造混乱……。”

“我们还将悄悄地积极怂恿官吏和索贿者胡作非为，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将上升为美德……良心和遵纪守法将遭受嘲笑，再也无人需要，成为历史渣滓。厚颜无耻、谎言和欺骗，酗酒、吸毒、动物般相互惧怕和恬不知耻，背叛、民族主义和各民族相互仇视，首先是对俄罗斯的敌视和仇恨，我们将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灵活地培育和推行这一切，它们必将盛行一时……我们会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动摇他们……我们将从人的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做起，把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腐化瓦解他们，使他们堕落，把他们造就为间谍和世界主义者。我们将会这样去做。”“冷战”正是遵循达列斯的方针展开的，其目的就是要借助非军事的，以经济、宣传和业务性质为主的颠覆行为来摧毁苏联。为了落实这一方针，美国人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和人力物力。

他们完成了计划中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从内部颠覆苏联的人。在此，美国人在“不可接触的部落里”（个别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为自己寻觅到了同伙，得以打

击我们整个体系的心脏和最脆弱的部分，并且依靠他们的帮助解决了“冷战”的全部任务。

苏共中央总书记郑重宣扬自己的民主的和民粹党式的口号，极力要给社会发展注入新气象，而实际上却把国家引向崩溃。苏联人民在改革之初接受它时的那股热情迅速被深深的失望所代替。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以合乎情理的动机粉饰其志向的丑陋，继续说服大家相信他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操劳、尽其所能地加强安全使苏联稳定……一切都事与愿违。许多条约和协议的签署都是以牺牲苏联利益为前提的（关于削减中短程导弹条约，关于苏联驻军从东欧，特别是从德国撤出的协议等等），中央政权继续在被削弱，社会生活中的消极趋势日益增强。党魁们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依然固执地追随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强加于人的方针路线。在习惯和传统的作用下，苏联人仍信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普通党员仍本分地期待着谁的命令。他们终于盼来了……。

那时，苏联国内的分裂主义势力已经逐渐积蓄起力量，而政府方面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卡拉巴赫事件就是一次投石问路，当时决定改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自治地位。其实应该运用符合法律的紧急手段，而戈尔巴乔夫只有关于公开性和改革的冗长论断和推理，连篇累牍的空话和虚无的号召。在实际事务中缺乏积极性，却要在嘴上叙述描绘积极性。这样，又衍生出另外一些刺激分裂主义情绪膨胀、挑拨民族冲突和动摇国家体制的步骤。历史早已表明，一个国家在极端危机时刻如果不动用专制手段或者求助于另一类似的政权，那就注定要灭亡。然而，我们的“领袖们”既没有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也不去借鉴古代事件留下来的宝贵教训。这些人本不是什么领袖，而是靠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爬上领导层的一群庸人，他们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拥有如此领袖的国家和人民是不幸的，苏联没能逃避这一命运。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大家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苏联撤军之后，阿富汗的局势会怎样？

美国和巴基斯坦在扩大援助叛匪的同时，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要求其严格执行撤军计划表。虽然苏联领导就日内瓦协议被破坏一事提出过抗议，也对阿富汗人提出过警告，但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已被放肆地愚弄欺骗，履行日内瓦协议也变成了苏联和阿富汗政府的单方面行为。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庸人外交”给苏联和阿富汗带来了严重后果，从长远看，其负面影响更为广泛。由于缺乏可靠情报，我无法断定，他们的行为是否具有被收买或者被国外控制的性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他们的政策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他们犯下了反对祖国的滔天大罪，他们的行径极大地使社会主义制度威信扫地。

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位“领袖”和他“杰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英雄壮举”给原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俄罗斯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大损失：放弃了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总结和雅尔塔—波斯坦宣言体系；破坏了战略实力平衡，使其有利于西方；瓦解了华沙条约和几十年欧洲安全体系下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使前苏联加入了由美国发号施令的针对一些友好国家采取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国际体制；苏联军队实际上从德国的溃退最终为苏联解体创造条件……这份清单距离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以“优秀德国人”面目建造纪念碑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使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差得远哩。这一切给予了世界什么呢？看看巴尔干、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还有中亚和其他地区吧。许许多多的苏联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祖国，祖辈们在几百年时间里以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那个强国沦为了二流国家，再无人把它的话当回事儿。

也许，他们是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不善于管理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对于这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戈尔巴乔夫在位时喜好引用其言论的列宁曾经说过：“从个人意义上讲，因软弱产生的叛徒与有预谋和利益作用下产生的叛徒之间的

区别非常巨大；而从政治方面讲，这样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因为政治实质就是无数人的命运，而命运不会因为以软弱的叛徒还是贪财的叛徒来区别工人和贫农是否忠诚而发生变化。”^①

是的，这些人今天的处境也不错，寄生在民众的贫苦之上，像阔佬一样生活，说话的腔调变了，宣传的思想变了，犹如一群行尸走肉在辱骂自己的祖国，靠“讲座”和“书籍”收取别人恩赐的铜钱……。

现在只有指望他们最终会因为自己的“善行”而得到报应。变节常常会受到很好的犒劳，不过，报应亦会更加沉重。倘若人间的法庭无能为力，还有苍天的法庭，上帝知道他们的名字。仿佛，它已经开始清账了……毫无疑问，铁面无私的历史迟早会澄清一切，让所有人都还原到自己的位置上。历史从来也没有饶恕过那些哪怕是忘记了祖国一天、背叛了民族利益一天的人。这些人的名字将永远被人民所咒骂和唾弃。

我不是曾经统治过苏联的那个制度的辩护者，它应该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和否定。但是，苏联的解体，请把它看做是俄罗斯国吧，对于我来说是个悲剧。



反对派的活动频繁起来

第一阶段撤军结束以后，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形势开始全面恶化，特别是在中央地区、北部省份、喀布尔、卡比萨、巴达赫山，以及喀布尔—海拉屯交通沿线……个别省份的政权名存实亡，贪污受贿成风，甚至发生过人民民主党省级领导人以及当地驻军指挥部门的直接倒戈事件。人民民主党和国家机构已经无力获得可靠稳定的地位和保卫政权的新生力量。在“俄罗斯人撤退”完成之前就不遗余力地去抢夺战略

^① “政论家笔记”，《列宁全集》，第40卷，第131～132页。

要地的那些不愿妥协的反对派力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

部分战地指挥官则放弃作战行动，采取观望政策。11月份，这样的队伍达到了300支，共1.2万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去比较活跃的叛匪作战队伍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到十七。苏军指挥部和阿政府机构同比较有影响的反对派领袖进行的谈判对于稳定局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政府进行接触的叛匪情况是：站到政府一方的叛匪队伍有175支，共一万人；签署了停火议定书的有206支队伍，8840人；正在谈判中的有549支队伍，共17240人。不过，这一进程后来严重迟缓下来。

政府军尽量避免同反对派武装发生直接冲突，只有在县府、乡府或者个别部队驻地受围困时才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要拥有充足的食物和弹药供应）。开小差的现象在各级部队增加了。这主要是由于大家萎靡不振，不喜欢政治部门和指挥部门在国防部、国家全部和内务部所属部队中间进行的提高士气的工作。斗争前景的不明朗和叛匪极有可能掌权的情况迫使许多原来支持政府的人去和反对派勾结妥协，以保证自己和家人能够生存下去。

反对派在国家北部地区采取的行动（也许是为了引诱苏军返回）是阿富汗政府始料未及的，他们攻占了昆杜兹（时间不长）、哈纳巴德、塔鲁甘和巴米扬等地。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政府最大的失败原因在于部队的不稳定性和变节行为，个别队伍放弃同叛匪作战，甚至集体倒戈，不战自弃警卫哨所。虽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在有关地区建立了联合指挥部，火速增派了部队，人民民主党向昆杜兹派出了负责干部），以及动用了苏联地面部队和空军以后，昆杜兹的局面得以恢复，但是其他几处仍处于反对派控制之下。另外，叛匪还非法控制了其他许多地区。

叛匪继续寻找着苏联军队撤退背景下同政府斗争的新方法、新形式。步步为营地从内部分化瓦解党政机构和不择手

段把它们拉拢到自己一边的策略，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和国家总统不能不予以重视的。形象地说，在改变斗争形式和做百姓工作的方式方法上，纳吉布拉的追随者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反对派。其实，喀布尔政府不止一次地去尝试过更有成效地影响老百姓，但纳吉布拉最终也未能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积极变化，尽管在苏联边防军的努力下，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完全的缓和。

反对派比较现实地评估了时局的发展前景，没有急于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讲，为在苏联完成撤军以后采取行动做好准备才是头等重要的。下达给战地指挥官的命令是：不得阻挠第40集团军返回苏联；储备武器弹药和食品；对相互间的冲突要克制；必须有取胜的把握，才可以携手对政府军作战。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同反对派的接触频繁起来。总统的行为表明了同反对派的显要头目拉巴尼和吉拉尼的关系有改善的前景，与赫克玛吉亚尔的秘密联系也深入了一步；同阿富汗前国王扎希尔·沙赫的对话也取得了进展。最终，苏联官方人物也参与其中，会晤了“同盟—7”的代表（12月份在沙特阿拉伯的艾特—塔伊法）。遗憾的是，为什么以前不去这么做？条件早就具备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于1986年就在瑞士同反对派当中伊斯兰党的一个重要头目建立了正式接触。

总之，阿富汗国内同数以百计的伊斯兰各派武装力量头目进行着秘密谈判。这些人管辖的武装人员约7万人，占叛匪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些谈判者都是看风使舵的家伙。

尽管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同塞义德·艾哈迈德（捷拉特）、塞义德·凯扬（巴戈兰）等战地指挥官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没有最终使这批战地指挥官麾下部队的活动地区的局势真正正常化。激进分子武装进攻塔哈尔省会塔鲁甘时，萨玛德的

部队并没有对政府军给予支持。

尽管官方的正式声明中对民族和解政策非常重视，但由于下述原因，它的方针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贯彻：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同阿富汗政府之间在行动中缺乏一致，特别是在如何理解与反对派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上，因为许多负责干部不愿意妥协，不赞成分权，总统为此受到压力；阿富汗军队士气低落，使反对派相信苏军撤离以后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反对派拒绝在管理国家的联合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同人民民主党合作，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它自高自大，要求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享有领导地位）；民族关系继续紧张，这一消极因素直接制约了政府同反对派的接触。

国内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日益高涨没有被阿富汗领导人（大多为普什图人）予以应有重视，这反映在与非普什图（比如同哈扎拉人）武装组织的进一步接触方面有意识地举步不前。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情报机构的反行动，对阻止反政府武装同政府接触起到了实质性的影响。为此，他们软硬兼施，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压力，使用极端手段对付与政府有联系的叛匪队伍（主要是阿富汗伊斯兰党），以及对个别战地指挥官采取人身消灭的方式。

各反对党派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愈演愈烈。两个最庞大的反对党武装力量之间（阿富汗伊斯兰协会和阿富汗伊斯兰党）的矛盾已经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人民民主党危机四伏

在心理上制造压力，组织破坏活动，消极怠工，使公共交通瘫痪，袭击部队，以“盲目”炮击城镇来加剧恐惧感——这是反对派的主要手段，这导致了政治军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的外交人员撤离驻喀布尔的使馆。老百姓在谴责反对派炮击城镇和破坏的同时，表达了对当局的不

满：即使在自己控制的行政管理中心地区，也不能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

包括军队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党政机构领导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得消极悲观。其中不乏有人无视各项命令、指令，甚至法令（特别是在征兵方面）。各省国防委员会的多数领导人以民族和解政策的口号为掩护，长期不执行征兵计划，致使军队人员锐减，战斗力降低。尽管苏联顾问们一再发出建议，但对那些人却没有采取过任何制裁措施。

各级政府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和宽容一切的态度滋生出更大的冷漠无情，而这又助长了一种抵触情绪，就是不愿意为巩固政权去做工作。涣散和沮丧笼罩着中央委员会的多数领导成员，工作人员只关心个人命运，而非人民民主党的命运。许多人虽然保留了人民民主党党籍，但已经沦落为其他党派活动的积极分子。中央同地方党组织间的联系越来越脆弱，失败观念和投降主义情绪迅速增长。

随着苏联军队撤离，所有上层机构的派别斗争都异常活跃起来。大批部落的加入，则使对抗愈加复杂化。这不仅对于人民民主党，而且对于对立双方来讲，都是破坏稳定、加剧涣散的催化剂。无论党内还是社会，都越来越尖锐地感到潜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其根源仍然是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以及蔓延全党的普什图霸权主义。

倘若塔拉基当政时，特别是在阿明时代，奉行普什图主义方针的只有“人民派”，那么，随着纳吉布拉走上政坛，“旗帜派”也被这种狂热所吞噬。比如，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的多数领导人、大部分高级军官已经全部是普什图人了，这也引起了构成武装力量中低层骨干力量的少数民族军人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各部落派别之间为争夺统帅地位进行的斗争也同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派别斗争搅和在一起。有资料表明，纳吉布拉、凯什特曼、努拉、拉菲、瓦吉尔、泽莱、拉伊克、古里亚博佐伊、塔奈、卡夫亚尼、奥留米、萨尔瓦利等人均拥有帮派

团伙，他们依靠包括反对派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一句话，斗争正在导致武装力量和党组织自身迅速毁灭。

在这样一种党内斗争的背景下，早已存在于安全部门和武装力量各自所属部队之间的互不买账和相互敌视便彻底公开了。总统给予国家全部所属特殊任务近卫军的优待自然引起了军队和警察系统指挥层中“人民派”的不满。纳吉布拉缺乏对军队和警察部门的信任，而主要依靠安全部门的支持，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于是乎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军队力量的增强反而使总统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深知失去军队就解决不了政治问题。

组建三支力量均衡的军事队伍（国防部、国家全部、内务部）并没有达到巩固和加强国家政权的目的，仅仅成为了纳吉布拉在危机时刻给自己提供安全的一种保障。他非常敏感地对待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利用野战部队和内务部队加强喀布尔防御，以及任命内务部长、“人民派”的古里亚博佐伊担任首都卫戍司令的建议。他采取紧急措施组建了特殊任务近卫军，并使其隶属于他个人和国家安全部长的指挥。

在部分党政机构涣散与不稳定的状态下，纳吉布拉表现出坚定和富有灵活性。他善于在需要的时刻巧施谋略（任命塔奈为国防部长，授予部分“人民派”成员将军官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稳定了党和政府机构内的局面。不过，这毕竟是个人的手腕，解决不了党内和军内的派别问题。

1988年10月召开的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进行了党政机构干部调整，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危机，以及缓和局势的措施。泽莱和拉茨姆焦被中央政治局除名，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晚些时候，阿富汗部分高层领导人在同苏联代表的交谈中流露出对人民民主党二十六中全会的不满，他们在评价那次会议总结报告时持一种谨慎态度。

全会之后大家表现出一种担心：尽管1988年10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许多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央委员会

成员仍然支持了总统，但强力部门领导人塔奈、古里亚博佐伊、奥留米（第二军团司令员）、卡德尔（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员）等，以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萨尔瓦利在组织工作方面（关于解除泽莱和拉茨姆焦职务一事）都成为了总统的反对派。

这一阶段，亲近纳吉布拉的党员们开始怀疑政治局里存在总统的反对派。他们知道萨尔瓦利、塔奈和古里亚博佐伊之间来往密切，所以，为苏联撤军后的国家命运担忧。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撤换国防部和内务部的领导人。

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闭幕以后，立刻采取措施加强纳吉布拉的地位。在关键岗位上启用了总统的追随者，其中也包括忠实于他的“人民派”人士。内务部长古里亚博佐伊被派往苏联出任大使，接替他位置的是瓦坦扎尔。特殊任务近卫军以最快的速度组建完毕。苏联专家按照紧急情况下的处理方式在总统府内为总统和他的家属建立了特制的安全保护仓，以及首都遭遇炮击或者进攻时可以保护人身安全的设施。

……作为对传闻总统将引退并迁居国外的回答，纳吉布拉公开发表声明说：“在祖国命运攸关的时刻，我将坚守自己的岗位，竭尽所能地制止发生流血。”然而，他显然是不愿意重蹈阿明的覆辙，调换了贴身警卫队（苏联克格勃第9局人员），任命以弟弟艾哈迈占为首的一批最忠诚可靠的人来担当这一任务。

总统的家眷也都留在了阿富汗。“苏联撤军前夕，”纳吉布拉在一年后回忆道，“谢瓦尔德纳泽和克留契科夫到过我家。对我妻子法塔娜和3个孩子来说，这次会晤是多么温暖和必要。交谈中他们非常委婉地建议我妻子带上孩子趁着战火尚未停止前往苏联，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法塔娜断然婉拒道：‘离开家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只待在一起。’”可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修建的掩蔽部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纳吉布拉及其亲人的性命。



“尽可能多发运武器弹药来！”

我们的部队必须在几个月之后撤出阿富汗，苏军指挥部紧张地工作着。为了撤军的这一阶段能够像第一阶段那样顺利完成，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而且确有成效，阿富汗领导人也在适应政治军事局势的改变，但很独特。比如，阿富汗武装力量已经足够程度地配备了所有必要的武器装备。但是，领导人不去采取措施提高作战人员的道德素质和战斗士气，以及加强反侦察工作，而是着手装备方面的更新，他们极力想从苏联手里最大限度地获取高质量的新式武器样品，有意扩大武装力量各个兵种的人员编制（常规军、安全部队、内务部队），并且不断提出申请，要求补充提供武器和装备，理由是部队基本武器的装备程度太低（就扩充后的人员编制而言）。

这样，在阿富汗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局面：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越来越多，可是阿富汗常规部队、安全部队和内务部队的装备程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低。比如，这一年的9月，阿富汗武装力量的3个部长（塔奈、古里亚博佐伊、亚库比）一起来到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竟然要求提供价值12亿卢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阿富汗人的所有要求都被认真审理、全部接受并付诸实施。

尽管阿富汗武装力量拥有的相当数量的装备和武器由于“缺乏初级操作专家”无法使用而被堆放在仓库或者闲置于露天，可他们的索要是没有止境的。在那样一个敏感时刻，显然，苏联领导人不能不给予他们所求。就这样，苏联在实现撤军计划的同时还要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

对于阿富汗人的其他要求和申请，我们也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比如，加速实施培养国民经济专家，以及内务部门和法制机构的专家，并且要为关键区域和哨卡哨所储备3个月的物资。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加波年科中将为首的苏联武

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指挥组进行指导（实施3个月储备任务的省份有贾拉拉巴德、加尔捷兹、坎大哈、昆杜兹、申丹特、赫拉特、喀布尔、贾巴尔—乌萨拉吉、巴戈兰、普利—胡姆利、马扎里—沙里夫）。各种物资和弹药储存量达到8.5万吨。

当苏军和阿军部队在反击叛匪进攻时需要空中支援，而位于阿富汗境内的苏联空军基地由于气候条件被迫关闭时，便会利用苏联境内空军基地的作战飞机，或者P—300火箭炮予以支持。这样的空中打击对于省会的防守具有决定性意义。

毋庸置疑，令人沮丧的事件是不能绝对避免的。我还记得，1988年年底，将军官衔的奥留米省长飞到喀布尔，抱怨苏联飞行员说，他们在坎大哈投下两颗两吨重的炸弹。一颗在阿军指挥部附近爆炸，另一颗落进了居民区，百姓中出现了伤亡。于是专门组成了混合委员会进行调查，负责人是阿富汗空军的卡德尔将军和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的阿法纳西耶夫将军。他们飞往出事地点，以及轰炸坎大哈郊区的那些轰炸机停靠的玛雷机场，但是没能做出明确的结论。

阿富汗领导人在每一次对苏联援助表示感谢时都会提出新的要求，不是新一轮的武器弹药提供，就是希望扩大第40集团军的参战范围。一批要求被接受，另一批就接踵而至，真是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著名童话《渔夫和金鱼》。阿富汗人把经济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我军减少参战行动，他们便大为不满。阿富汗政府的公职人员越来越频繁地对苏军官兵提出各种各样的过分要求，甚至公开对苏联军事顾问表示怀疑。

来自喀布尔的情报^①（机密）

致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同志
向您汇报。

……最近以来，尤其是今年8月份，阿富汗领导

^① 摘自瓦连尼科夫大将档案。

人，特别是纳吉布拉本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意图，就是尽可能地使苏联获得更多的物资和设备，甚至迫使苏联军人最大限度地使用第40集团军的兵力和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其要求的决定并没有换来阿富汗朋友的感激之情，相反，招致了他们变本加厉的要求，许多是不切实际和过分的……。

除此以外，倘若阿富汗常规部队或者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中出现了不稳定现象，纳吉布拉就会直接地说——过去是间接地——这是由于第40集团军方面的支持不够，同时还百般淡化阿富汗军队方面的消极表现。

仅举以下几个例子为证。

1. 经常毫无根据地要求对阿军提供额外的武器和军械。客观地讲，目前确实需要增加武装运输直升机的提供。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相关措施，阿军在直升机的作战应用方面依然组织得很差，导致了没有道理的的巨大损失（仅仅在本月阿军就损失了4架作战飞机、8架直升机）。涉及其他类型的武器，本不该成为问题。事实竟然相反，纳吉布拉不止一次得到报告说，现有的装备和集团武器根本无法使用，因为配备的专业操作人员太少了（20%~40%的坦克、步兵作战车辆、装甲车、火炮和迫击炮没有编组和操作小组，许多机动车辆甚至没有驾驶员）。

已经连续3年以各种方式，我们提出来改善征兵工作的迫切愿望了……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富汗军队和武装力量其他兵种才可能利用现有装备来充分支配自己的潜在战斗力……。

内务部和安全部长都在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部队的实际状况，甚至机构的编制都保密。不过，我们还是了解到，隶属于他们的部队在技术装备方面是完全正常的（对执行正常任务而言），有些型号的武器还

有储备，比如，仅国防部军械库存放的82毫米迫击炮就达425门。

至于弹药，纳吉布拉奉行的是一条根本不讲消耗程序和定额的路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敌人对着我们倾泻炮弹，我们还有什么定额要遵循？”这一错误见解导致了阿军在执行作战任务时的不负责任，射击时就是盲目地开枪开炮，不做任何瞄准。

这种现象最终会导致的结果是，一旦第40集团军撤出，哪怕最低限度地为部队运送军火和燃料，他们也将无力保驾（第40集团军现在的运输业务完全是为阿军保留的）。在纳吉布拉同意的情况下，阿方3支部队在驻防转移或战斗进行中还毫无顾忌地就地销毁大批存放在原驻防地的武器、弹药、装备、燃料和其他物资。

举例为证：第2步兵师从潘捷舍尔撤退时，其第64团遗弃的武器有76毫米野战炮4门、82毫米迫击炮9门、高射机枪2挺、重机枪1挺、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180支；在昆杜兹省，内务部和安全部军人也遗弃了大批储备物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阿富汗领导人始终在不断地要求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而在使用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爱惜和节约。他们可能不知道，苏联方面会满足他们任何要求的……。

2. 掩饰部队现状的企图是改变不了实际情况的。8月7日至8月8日，阿军放弃了昆杜兹、哈纳巴特和塔鲁甘。

哈纳巴特驻防部队由两个营的内务部队和一个营的安全部队组成，而在昆杜兹有3个营的安全部队和两个营的内务部队，这个数字要比对手多出3~4倍。然而，敌人竟然不经过战斗就占领了上述两地。当时，部分驻防部队竟然倒戈到了叛匪一边，其余人或缴械，或溃

逃到昆杜兹机场地区。

起初，这一事件使阿富汗领导人感到震惊，说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后来，开始搜集事发原因的证据，但最终竟转变成列举那些临阵逃脱者的英勇事迹。

今年8月18日，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会议上，纳吉布拉强调说，参加哈纳巴特和昆杜兹战斗的大部分阿军部队还是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精神。我被迫发问，并指出总统是被人蒙蔽了。8月12日我亲自前往哈纳巴特和昆杜兹阿军曾弃阵逃脱的现场，搞清楚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自己就已经被吓得胆战心惊的原驻防部队代表和上述两省国防委员会领导人在参加会议期间，受到上级指挥官阿察克中将和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萨尔瓦利的尖锐批评。部分驻防军不放一枪、不抵抗就弃城而退，别说阵亡，就连伤员都没有一个。我指出，如果这些部队继续留在驻防军编制内，那么，已经发生过的丢人事情还会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对昆杜兹的驻防军做出调整，补充了部分常规部队……。

3. 有人企图把一切失败的责任转嫁给苏联军队。沙卡尔达拉县位于喀布尔北方，这里驻扎着一个高炮营。周围的情况变得对它越来越不利，因此，今年7月曾经建议把它转移到喀布尔郊区，这样也可以避免在当地居民中间造成冲突局面，因为那里的人完全处于叛匪的影响下。

然而，建议没有被采纳。8月初，高炮营被敌人包围了。于是，被迫集中炮兵和空军力量（主要是苏军）对高炮营附近地区进行打击。苏军的这次作战行动完全是计划外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正根据撤军进程表对第40集团军返回苏联境内提供保障，而喀布尔卫戍区阿军的部分人马也在协同第40集团军的另外一部分部队转战于瓦尔达克省和洛加尔省。

坚持了4天以后，高炮营的军人们扔下武器和装备，四下逃散了。敌人在向白沙瓦的指挥部报告时，对战果作了极大夸张。阿军无线电侦察兵截获了这一信息，并汇报给了纳吉布拉。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会议上，纳吉布拉措辞激烈地声称：“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第40集团军没有使用能有效歼灭敌人的弹药。所以，我被迫再次向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下令使用那样的弹药。我还对他们说过，要让这里（沙卡尔达拉）所有的东西都从地面上消失。”

我对纳吉布拉解释说，苏联炮兵已经对这个地区发射了9000多发炮弹和迫击炮弹，出动了169架次的攻击机；有了这样的空中支持，任何一支驻防部队都可以信心十足地坚守上几个月。高炮团是在叛匪们强大宣传攻势下溃败的……。

在分析上述情况和纳吉布拉的行为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富汗越来越紧张的局势正在动摇他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时刻还固执地追求以军事手段解决所有问题，只能导致重复以往的错误。他的做法不能缩短对立双方的距离，只能激化矛盾。纳吉布拉指望用军事力量控制各地，而不愿与反对派妥协，这样做不会在阿富汗整体局势上取得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局势紧张的省份，比如昆杜兹、塔哈尔、巴米扬……。

瓦连尼科夫 1988年8月

……对于这一类情况汇报，莫斯科的反应耐人寻味：它增加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军火供应，并于10月份派出一个导弹营。该营被部署在喀布尔郊区第40集团军指挥部附近，并开始对阿巴边境一带的叛匪基地和聚集地实施导弹袭击。起初，袭击目标由总统自己提出，而我则要拿着标有这些目标的地图先去找总统，然后再去找阿军总参谋长核实坐标，

并在汇报给苏联国防部驻阿作战指挥组之后，再下达给导弹营的指挥员科玛洛夫中校。

于是，首都的天空经常被导弹的光点所点缀，它们划出弧线，慢慢熄灭着飞向远方，以满足一些官员继续执政的愿望，而把死亡和毁灭带给另外一些人。开始，阿富汗人把这当作某种形式的娱乐演出，他们像孩子那样兴奋地观望导弹在喀布尔天空闪烁的弹道。最初的快乐过后，他们清醒过来：导弹最终拯救不了他们。

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能拥有这批导弹系统，并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军队撤出以后把这批导弹系统留给阿富汗军队，并且根据纳吉布拉的指示迅速选拔了数十名优秀人员——比较有文化的党员骨干分子，派往捷尔梅兹的第720培训中心接受导弹系统操作训练。

为了表示苏联政府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加之当时所有问题都可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意见灵活解决，1988年11月中旬，以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为首的政府委员会代表团在喀布尔逗留了两天，随行的是庞大的专家组：别洛乌索夫部长和宋佐夫部长、苏共中央国防局局长别里亚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玛察克、对外经济联络部工程总局局长格里申海军上将、陆军总参谋长格林凯维奇上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布卢金中将，以及其他军火和装备制造供应部门的领导人。他们全面审查研究了阿富汗武装力量在各个领域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苏联撤军最后阶段必须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专家组工作期间，阿富汗方面再次要求我们补充提供总计为21亿卢布的武器弹药和其他专用物资。如此庞大数量的军火，阿富汗即使用尽吃奶力气也是用不完的，他们只是想尽办法在储备，同时也是指望无偿得到更多的武器和装备。阿富汗人的要求再次被接受了。

专家组飞离喀布尔时，事前得到情报的圣战者对喀布尔机场进行了火箭弹袭击，图—154伴随着爆炸声在跑道上滑

行。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它起飞，忘记了自己也处于射击范围内，直到它脱离地面开始爬高，大家才舒了一口气。专家组安然无恙地离去，但有一颗炮弹落入我军航空团的生活区，造成了我方军人的伤亡。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主动向美国和巴基斯坦方面做出姿态，建议签署协议，于1989年1月1日实现敌对双方的全面停火，同时停止向反对派和政府军提供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然而，盘踞白沙瓦的“同盟—7”头脑们拒绝在纳吉布拉下台之前同喀布尔举行谈判，他们打算在苏联军队撤出以后迅速建立自己的政权。

大多数西方专家和记者也是这么考虑的。部分阿富汗领导人甚至“预言”了反对派即将取胜。苏军指挥部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认为当局尚有机会维持政权，倘若他们果断行事，不放弃主动权，不拱手相让的话。最大的危险在于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己方人员的大规模倒戈。

1989年1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喀布尔期间，纳吉布拉向他递交了阿富汗政府要求援助的例行清单。阿富汗方面请求废除或者延期支付主要债务：贷款偿还和利息支付；重新考虑阿富汗出口商品的价格；提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调拨外汇或者提供阿富汗不得不用外汇购买的商品；增加提供列入生活必需品清单的货物；重新拟定和改善苏联与阿富汗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工作。



停止撤军问题

苏联撤军的最后阶段，（为保存实力）阿富汗政府不再想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付那些拒绝妥协的反对派武装。事实和资料证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试图把第40集团军裹挟进去，使其参与大规模的、持久的作战行动（主要用于对付玛苏德武装），把苏军拖在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多次呼吁苏联政府：

“由于巴基斯坦和美国没有履行日内瓦协议，请务必停止撤军。”

当纳吉布拉萌生愿望，欲呼吁苏联政府在日内瓦协议确认的撤军最后期限后在阿富汗保留部分苏军部队时，驻阿苏军指挥部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特别坚持苏联军队应该严格遵守撤军时间表的有瓦连尼科夫大将和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中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份报告可以成为证明。

喀布尔情报^①（机密）

致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同志：

……应阿富汗总统的一再要求，9月4日我在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指挥部会见了。纳吉布拉在谈话中说：“……敌人散布谣言说，总统并不珍惜第40集团军给予的援助，声称苏军在回避参加作战，也没有给予阿富汗武装力量有效支援。而实际情况是，面对美国和巴基斯坦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径，阿富汗领导人正在致力于苏联停止撤军，并以此来创造条件避免丧失四月革命成果……。”

我们认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第40集团军也不会留在阿富汗，留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国内和国际舞台，苏联将会遭受无法预言的损失……。

瓦连尼科夫 1988年9月

……纳吉布拉在这次会见时提到的停止撤军的问题只是试探性的一步。此后，阿富汗领导人三番五次地提出类似要求，而且不分场合，无论是高层，还是与驻阿苏联代表的私人谈话。自然，在阿富汗逗留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也是他们纠缠的目标。

9月25日，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调

拨增援力量加强坎大哈卫戍部队的防御力量（在阿富汗武装力量内部进行了3个小时的寻找，为的是能够使用和调集1000名常规部队人员和内务部及安全部的150人）等有关问题，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顺便涉及的问题还有对坎大哈军方追加物资和技术补给（特邀坎大哈省长奥留米中将与会）。

会议同时注意到，苏联撤军的第一阶段实践揭示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真实目的，它们根本没有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愿望。“只有苏联和阿富汗在单方面忠实准确地履行有关协议中自己承担的义务。这种状况会削弱一方势力，增加另一方势力”，纳吉布拉说，“第40集团军全部撤出以后，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完全丧失阿富汗的事实，这就促使我们要认真地重新考虑今后的所有行动步骤”。

阿富汗领导人的代表多次劝说我们相信，没有了第40集团军，政权是难于维持下去的。他们流露出要求苏联停止撤军的意图。为此，瓦连尼科夫将军再次向苏联国防部长发出密电，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即使我们把撤军时间延迟一年，对阿富汗局势的好转也无济于事，而苏联却要为此蒙受巨大损失……。”

第40集团军指挥部也持有同样意见，它建立在对局势的分析基础之上，赞同驻阿苏军全部撤出，他们提醒苏联领导人：

1. 一旦公布的撤军期限过后苏联军队仍滞留在阿富汗领土，反对派头目就会积极展开针对苏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不能排除他们携手进行大规模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另外，阿富汗伊斯兰党已经在帕尔万省散发传单，号召人民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对付苏联军队，如果冬季末苏联人仍在拖延撤军的话。

2. 更改撤军时间必然要导致恢复针对反对派武装的作战行动。对叛匪驻地进行空中打击和远程炮火打

击，这势必又要造成平民伤亡，也会促使叛匪加强在苏阿边境线地区的破坏活动，恢复在喀布尔—海拉屯交通沿线的作战行动。

3. 推迟撤军还会激化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巴基斯坦和伊朗当局就会拥有充分理由关闭边界，阻止难民返回家园。那时，不论是在境外还是境内的阿富汗人眼中，日内瓦协议对苏联撤军和难民返回家园就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

4. 阿富汗各阶层人民都把苏联撤军同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生活联系在一起。毕竟拖延撤军是违背日内瓦协议，会进一步损坏国家威望和形象（驻阿富汗苏军官兵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①

越是接近苏联撤军第二阶段的开始日期，阿富汗领导人就越发显得焦躁不安，为了拖住苏联军队，他们策划着非同寻常的步骤。1988年12月15日，阿富汗国防部长塔奈上将会见了苏联驻阿军事顾问指挥部领导人列夫琴科中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不错。塔奈通报说：“我军总政治部主任齐亚尔玛里中将态度坚决地告诉我，他希望军界提出尽快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问题，要求国防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军界领导人发言，由他们提议国民代表大会呼吁苏联把自己的军队在阿富汗留驻更长时间。”

“齐亚尔玛里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保卫他们的那些部队最好尽可能多地留在阿富汗。这些建议应当事先同苏联人协商讨论。”

齐亚尔玛里的举动绝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阿富汗领导层许多人的观点和利益。瓦连尼科夫将军采取的一些措施防止了这样一类动议的实现。

……在惊慌情绪和令人不安的预测的作用下，焦急的电

报接二连三地发往莫斯科，其共同内容都是要求苏联留驻一部分军队，如果不同意，那就晚一些时候再撤离。这样的立场居然得到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理解，其中有谢瓦尔德纳泽。这引起了驻阿苏军将官和校官的惊讶，他们始终以为苏联外交部长是日内瓦协议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根据这个协议，我们的一部分军队已经撤出了阿富汗。留驻已经被“分割”的部队，意味着把它当成了人质。显然，他这样做是出于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才趋于明朗。

苏联撤军的第二阶段应该在11月开始。不过，根据纳吉布拉的要求，撤军进度表作了一些修改：根据苏联国防部长的指示，辅助部队和机关组成的纵队开始撤离喀布尔的时间为1989年1月2日，其余作战部队为1月15日，这意味着苏联撤军的最后阶段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短的时间长度迫使我军呈密集队形沿喀布尔—捷尔梅兹和申丹特—库什卡两条线路朝国境线行进。即使西线一切正常，那么在东线，穿越萨兰戈山的部队也得受限于隧道管理制度，只能隔天行军，因为每隔一天都有来自苏联境内的为喀布尔运送食品、燃料和生活必需品的车队通过隧道。所以，苏联撤军进度表已经是超饱和状态。另外，还要考虑到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因素。

1989年1月，谢瓦尔德纳泽和克留契科夫在喀布尔逗留期间会晤了纳吉布拉总统、总理沙尔克、国防部长塔奈、安全部长雅库博、内务部长瓦坦扎尔、外交部长瓦吉尔、赫拉特省长哈列克雅尔、坎大哈省长奥留米将军……此后，局势再度紧张起来。阿富汗领导人更加固执地强求留下部分苏军，即使部队中的志愿者也好，并且找到了借口，就是为了保证喀布尔国际机场和喀布尔—海拉屯战略交通线的安全（大约需要1.2万人）。这是遏制住反对派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毕竟他们曾经扬言要切断交通线，让首都在饥饿中窒息。下面引用一些当年的谈话片段。

纳吉布拉：“900 人的阿富汗旅和一个团的安全部队未必能在玛苏德的势力范围内以应有的方式抵御住反对派武装。所以，我请求苏联领导人在临时性这一前提下考虑在萨兰戈地区部署苏军部队的问题，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保卫公路。”

“政权的存亡将取决于喀布尔—海拉屯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否得到保障。反对派不足以使用军事手段夺取喀布尔，但是，他们打算以经济封锁来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唆使他们起来反对政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喀布尔储备足够的食品、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过，今后一段时间内，只有依靠苏联方面的直接协助，才能保证组织好地面运输和空中运输。”

“……我想就建立喀布尔和苏联领土之间的‘空中桥梁’一事再次向你们发出呼吁。”

“在距离阿富汗边境最近的苏联机场保持一支数量适当的常备飞行队伍，以便在局势发生危机时能够灵活机动地打击叛匪，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到目前为止，坎大哈必备物资的储备问题仍没有解决。目前局势下，仿佛可以尝试向那个城市派遣物资运输队。为此，阿富汗方面能调集第 4 和第 2 步兵军的部分队伍，总共 2000 人。不过，没有苏联军队的参与，就不可能护送运输车队……。”^①

谢瓦尔德纳泽：“非常清楚，为了护送运输车队，需要抽调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这就避免不了同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的危险；而在现阶段我们不愿付出多余的牺牲。”

“预定的方案认为，建立连接喀布尔的‘空中桥梁’的想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从苏联领土实施空中打击的问题具有极其微妙的性质。我们明白，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你们会很困难。但是，苏军驻阿期间的空中支持同苏军撤离以后的空中支持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这样做，必然会招致美国 and 巴基斯坦采取反措施，也会在国际上引起消极反应。”

“我们还认为，必须立刻着手研究喀布尔—海拉屯交通干线的安全保障问题。因为不能利用这条公路也就意味着无法解决首都的供应问题……。”^①

有鉴于此，如果实施纳吉布拉提出的建议，在撤军完成以后使用苏联境内的空军力量对圣战者目标进行空中打击，那么，美国可能会做出的反应和它打算采取的措施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直至1989年1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讨论研究留驻部分驻阿苏军的问题。

文 件^② (绝密/特别卷宗)

№ П 146/VI

戈尔巴乔夫同志、雷日科夫同志、斯柳尼科夫同志、切布里科夫同志、谢瓦尔德纳泽同志、雅科夫列夫同志、玛斯柳科夫同志、亚佐夫同志、姆拉霍夫斯基同志、克留契科夫同志、博尔金同志、法林同志呈送全文。戈斯捷夫同志——第2部分，沃尔科夫同志——第5部分，卡图舍夫同志——第6部分。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9 年 1 月 24 日会议记录
(№146) 摘编。

① 摘自博洛维金档案。

② 摘自《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28。

关于目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有关措施。

1. 同意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切布里科夫同志、雅科夫列夫同志、亚佐夫同志、姆拉霍夫斯基同志和克留契科夫同志在1989年1月23日书面报告中阐述的意见。

2. 鉴于要保障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的正常运转和必须由阿富汗人自己部署力量保卫这条公路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仍由我们向阿富汗人提供补给，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要协同国家计委和国家财政部在1989年2月前提出相关建议。

3. 责成亚佐夫同志前往喀布尔，以便进一步评估目前的军事局势，并且在解决防御问题方面给予阿富汗方面实际援助，包括与保卫喀布尔—海拉屯战略交通线有关的问题。

4. 苏联国防部要协助阿富汗总统制定国家宣布战争状态时的各类指挥系统。

5. 苏联国防部和民用航空部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能在志愿基础上和有关物质奖励的前提下在阿富汗运输机上，或者在阿富汗方面租赁的苏联运输机上使用苏联飞行员。

6. 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要在1989年2月份之前制定好对阿富汗追加进行经济援助的程序。

与此相关，将派遣玛斯柳科夫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卡图舍夫同志前往喀布尔。

7. 做记录。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会同中央社会部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一份以阿富汗事件发展全过程（从决定出兵开始）的确凿实例为基础的书面材料，还要针对今后阿富汗时局可能的发展情况，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后果提出自己的见解。

苏共中央总书记 米·戈尔巴乔夫

文 件^① (绝密/特别卷宗)

对No146 记录第Ⅵ项

致苏共中央

与当前从阿富汗撤军相关联的措施。

……纳吉布拉表示，如果到5月前能够保障公路的正常运行，那么现政权就能够生存下来。显然，没有我们的帮助，阿富汗朋友是无法保证这条公路正常运行的……。

从原则上讲，我们拥有以下几种方案。

第一，以苏联国民所处的困难状况为理由，只留驻一个师的兵力，大约需要在海拉屯—喀布尔交通沿线部署1.2万人。不过，本方案未必适当，因为它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被提交给联合国，说我们没有完全撤出自己的军队。尽管巴基斯坦没有履行日内瓦协议，但仍然可以预料到，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不会支持我们，因为撤军问题是全部问题的核心。

第二，以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受到饥荒威胁为理由，呼吁联合国迅速为向这些地区运送食品和燃料提供保障，并派遣部队维护公路的正常运行。联合国部队到达之前，在这些地段留驻我们的部分力量执行特别人道主义的任务——保障居民的食品和燃料。同时可以宣布，苏联撤军已经实现，一旦联合国部队抵达，我们的剩余部队将立刻返回苏联。

然而，这个方案恐怕无法实现，因为联合国部队的派出需要安理会做出决议，而这是不能指望的。

第三，按计划于2月15日之前撤出军队，并以苏联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的声明在世界范围予以确认。然后，根据阿富汗政府的要求，阿富汗政府也以此要求向

^① 摘自《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3，编目28。

各国发出呼吁，开始派遣民用物资运输车队，同时配备苏联军队做护送保卫。这项工作可以在苏联撤军两周后展开。此前要创造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反对派妄图以饥饿置各大城市百姓于死地。在社会舆论谴责的背景下，有我们参与的物资运输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人道主义行为。落实这一方案时，许多路段都不得不通过战斗夺取。

第四，2月15日之前撤出绝大部分部队。在有关声明中正式确认苏联完成撤军。不过，以海拉屯—喀布尔公路线若干地段的哨所要移交给阿富汗军队为由，在一些重要地段，包括萨兰戈山口留驻我军部队。根据我们的要求，对这一做法不予以渲染，仅仅指出，这只是些为数不多的苏联军人，而且是由于阿富汗方面尚未接管上述哨所。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如同第3方案中指出的，开始往喀布尔派遣由我军部队护送的物资运输车队。

所有这些方案应该遵守的原则是，参加行动的将是常规部队，但其组成应该是自愿的，其成员必须是正在阿富汗的现役军人，或者是服役期满后已在苏联的。这种情况下，普通士兵的军饷将确定为每月800~1000卢布，其中部分支付阿富汗尼，军官的月饷将大幅度提高（同他们在战斗中承受的危險相比较，第40集团军官兵的薪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例如，苏联驻阿富汗使馆门卫和打字员的劳动报酬要高于第40集团军指挥员的收入，更不要说其他级别的官兵了）。

上述4个方案里，都规定1989年2月15日以后在阿富汗保留数量不多的苏联部队。

或许，还研究过第5方案：2月15日之前，苏联军队全部撤出。但我们要给予阿富汗方面补充性援助，包括财政援助，以及协助阿富汗人部署自己的部队来保卫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这些部队还会在相当一段时

期内依靠我们的供给。毫无疑问，这当中也会出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可靠地保证物资的运输方面……。

阿富汗领导人再次提出撤军以后继续使用以本土为基地的我军轰炸机对反对派武装进行空袭的问题。为此，从各方面对阿方解释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建议他们认真考虑如何在新形势下充分利用自己的空军力量。总之，我们的解释还是得到了理解，不过，他们强调说，遇到危机情况，依靠苏联空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看来，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其他综合性因素……。

谢瓦尔德纳泽、切布里科夫、雅可夫列夫、
亚佐夫、姆拉霍夫斯基、克留契科夫

1989年1月23日 №65/OC

1989年1月，短暂的间歇持续了十几天（直至1月27日）。这段时间内，苏军指挥部没有按计划有步骤地撤军，而是根据新近接到的莫斯科的指令，开始通过运输航空兵铺设的“空中桥梁”往喀布尔运送3000吨面粉（平均每天飞抵15架尔伊尔—76运输机，每机运载25吨），往坎大哈运输2500吨军火和20套军事装备（安—12运输机在坎大哈机场冒着叛匪炮击进行夜间着陆，出现过飞机被击伤的情况）。

同时还奉命进行名为“在南萨兰戈派出政府军前哨”的战役准备，也就是策动针对玛苏德匪徒的军事行动，这种做法纳吉布拉过去曾经得手过。尽管苏军指挥部这次始终持反对态度，但战役仍然在这一地区展开了。

在此，有必要指出，苏军在阿富汗驻扎期间，同玛苏德部队之间的战斗自始至终没有间断过，他是反对派武装力量战地指挥员当中最强悍的一个。西方新闻媒介称他为“不屈的焦”、传奇的“潘捷舍尔雄狮”。围绕玛苏德流传过许多神话，塑造出一个为人民和信仰而战的伊斯兰斗士的浪漫主义

形象。在撤军的最后阶段，苏军指挥部进行了大量工作，试图说服玛苏德与政府合作。然而，他不愿接受现存制度，最终没有走上妥协道路，这导致他日后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这是一个单独的话题。

苏军指挥部的行动并不是自主的，只有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指示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效力。所以，我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文件和事例，目的是就要杜绝各种方式的歪曲和投机行为，尽管我对这些文件的感觉是复杂的。总之，还是由读者自己评判吧……。

◆ 反对“潘捷舍尔雄狮”的斗争

1980年4月，第一次对盘踞在捷尔梅兹—喀布尔交通沿线的玛苏德队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时他还毫无名气。他的人马差不多每天都要在辛扎—贾巴尔—乌萨拉吉地段袭击我军或阿富汗政府军的车队，直接影响了军需品和民用品的运输供给，遭受袭击的还有苏军哨所。为了稳定交通沿线的局势，苏军决定同阿军联合作战，歼灭这股叛匪队伍。

根据侦察情报，以潘捷舍尔峡谷（喀布尔以北80公里）为基地的玛苏德匪帮大约有1000多人，均为当地居民。当时，圣战者尚没有建立先进的防御体系，仅有的一条通道上，也只是个别地段设置了雷区，或者障碍物。

调集参加潘捷舍尔战役的有苏军的3个营（机械化步兵营、伞兵空降营和空降突击营）和阿富汗政府军，以及部分安全部队和党员骨干分子。他们被分为两部分，从峡谷的东西两个方向对叛匪发起攻击，最后会师。一部分从帕希—沙希—玛尔丹动手，另一部分从亚纳瓦。部队步步为营地包围封锁村庄，阿富汗政府力量（军队、安全部队和党员骨干分子）进村逐户清查。

行动非常紧凑，一共持续了4天。叛匪遭受重大损失。当然，我方也有伤亡。参加这次战役的第56独立旅第4空

降突击营营长哈巴洛夫大尉从整体上肯定了作战结果，他说，通过直升机的联络间接指挥战役的佩切沃伊将军（他本人位于作战地区5公里外的地段）的指挥艺术还可以再提高一步。营队刚刚接近巴扎拉克村，便从四面遭到叛匪的火力袭击。在把他们歼灭以后，沿峡谷的继续推进就没有再发生伤亡。可是，临近傍晚时，侦察员们却陷入了埋伏。

勇敢果断的营长亲自率领一个小组前往解救，途中不幸被爆炸子弹重伤前臂……。

玛苏德同苏军指挥部签署了秘密协议，他保证不对苏军和阿政府军采取敌对行动。作为交换，我方保证停止对潘捷舍尔的空中打击，对他的马帮队出入峡谷予以放行，并且在他的队伍同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队伍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给予空军和炮兵的支援。

至1982年5月协议期满，双方基本上履行了各自承担的义务。玛苏德停止了对交通线的破坏行动，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构筑潘捷舍尔的防御工程，以及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队伍。他逐渐积蓄了数量足够的武器弹药，借此在该地区重新建立了最强大的武装战斗队。

玛苏德手下的武装人员在1981年时就已经达到了2200人，这就对喀布尔—海拉屯交通线、贾巴尔—乌萨拉吉—萨兰戈山口南段，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段时间，我军事侦察部门也在调整同玛苏德的合作关系。其中，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伊瓦舒京大将的指示，安纳托里·特卡切夫中校与玛苏德建立了长期的接触和联系，换句话说，有过合作。他这样叙述：

1981～1983年在阿富汗服役期间，我很荣幸地多次参与了侦察机构组织的针对阿富汗反对派武装力量战地指挥官之一玛苏德及其作战队伍的战役。其中一次，我成了我军侦察员中第一个与他建立私人接触的人。

在潘捷舍尔峡谷进行过若干次战役，通常，都是以

我军和阿政府军受到人员和武器装备重创的情况下从“被解放区”突围出来而结束。尽管苏军多次占领潘捷舍尔，但没有一次进攻玛苏德的军事行动带来过什么有效的成果。

我在喀布尔情报中心工作期间，我军搞到了有关圣战者武装力量的可靠情报。然而，由于“上面”规定了要与阿富汗社会和政治军事局势发展的积极发展趋势合拍，所以，这些情报汇报上去的时候已经作了粉饰性加工。随后，在总参谋部和总情报局5局进行汇总过程中，它们更是被整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与原始资料没有丝毫共同点。谁也不想承担责任，谁也不想汇报真实情况，其实最高军事领导人也不愿意相信真实的侦察情报。曾经正式下达过指令，在报告中只能反映局势的积极趋势，而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这样，愿望被当作现实来表达。不断有我军伤员和阵亡者尸体从潘捷舍尔运回，这并没有使我军领导人特别感到不安。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向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之一阿赫罗梅耶夫大将汇报情况，建议他应该尝试同玛苏德谈判和解，因为在我们的炮火和轰炸下死去的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圣战者枪口下倒下去的却是我们的士兵。阿赫罗梅耶夫将军回答说，那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是敌人的亲属。至于我们的战士牺牲，这是他们的职责。牺牲一个，再派遣10个。必须制服玛苏德，迫使他缴械投降。

正是基于类似的指示，确定了在潘捷舍尔展开作战行动，这些战役换来了得不偿失的牺牲。我认为，进行这样的战役，完全是为了军队领导人获得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他们在阿期间，许多上层领导人都来过，以便“登记”曾在阿富汗参战，这绝非偶然。就在这样的一次活动中（1982年），阿赫罗梅耶夫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不言而喻，我建议同玛苏德和谈是不会得到认同的。不过，支持我的有伊瓦舒京大将和苏联元帅索科洛夫。在他们两个人的鼓励和允许下，我们在潘捷舍尔展开了一些工作。研究制订了侦察计划，以便直接同玛苏德接触、联系，开展一系列问题的谈判，最终的任务是达到在潘捷舍尔和周边地区实现停火。在喀布尔有一个很大的居民区，住户全是来自潘捷舍尔的移民。我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转达了会见玛苏德的建议。玛苏德欣然同意，并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尽管我方在阿富汗的相当有影响的势力反对这样做，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批准了这次行动。为此，他要承担巨大责任。

圣战者待我们还是相当友善的。在巴扎拉克，我们被安置在一幢房子里，室内很暖和。没有电，照明的是煤油灯。我们与圣战者同宿一室。由于我们没带武器，这更引起了圣战者的好感。

1月1日早晨，塔基特京通知我们，9点半和玛苏德见面。应该说，等待见面时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而且还很紧张。同时，我们的心头也笼罩着一种好奇感。毕竟在我们之前，没有一个苏联军人见过玛苏德，哪怕是照片。如果有什么印象，那也仅仅是听过潘捷舍尔移民口头叙述他的相貌、性格和行为做派。

一个身材不高、消瘦的黑发青年男子准时走进屋来。我们新闻媒介所描绘的那种凶残，在他的容貌上竟找不到一丝痕迹。玛苏德身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精神凝重，神态开朗。不过，紧张的气氛还是持续了片刻。我们没有看到“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凶狠面孔，他目光善良，没有丝毫的恶意。看来，他在我们的表情中也没有找到敌意。短暂的忐忑过后，我们以阿富汗的传统方式相互致意，接着我们被邀请共进早餐。根据东方的习俗，玛苏德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我们的身体状况，旅途

的疲劳是否已经消除。我们回答说一切都正常，并向他表示了问候。就这样，在餐桌旁扯开了远离战争的日常生活话题。作为客人，我们也受到了传统的礼遇：优先在水罐里洗手，优先用干净毛巾擦手，优先掰面包，优先吃大盘子里的手抓饭等等。

用完早餐，玛苏德和一个亲信，以及我们和翻译玛科斯留了下来。谈话开始了。当我们陈述完问题时——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玛苏德的表情有些吃惊，因为在这些建议里没有最后通牒，没有要求他们立即缴械投降。毕竟此前他收到的都是些生硬的要求：停止反对卡尔迈勒政府的武装抵抗，缴械投降。我方建议的关键之处在于双方在潘捷舍尔共同停火，共同承担责任为当地百姓正常生活创造必要条件。关于让那些因战火而背井离乡的百姓返回家园，以及双方在确立和平生活方面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和多方面帮助的建议使玛苏德特别感兴趣，这也是符合他的利益的。

对建议的每一条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并非出于礼貌。玛苏德声称，在战争的两年里，苏军和阿富汗政府代表递交过不少最后通牒，那是他无法接受的。他说自己从没有仇视过苏联和苏联人。但是，领导人使互为邻居的两国人民卷入了战争，战争毕竟是战争，不可能不死人。玛苏德希望战争过后两国人民能重归于好。不过，在对待喀布尔领导人的态度上，玛苏德说，他们不过是把持着首都和几座大城市，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

据我观察，玛苏德在交谈中表现得像一位认真严肃、谨慎多思的政治家，一个思维敏锐的人，熟知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远瞩斗争的最终目的。我们正是需要同这样的政治家打交道。他强调说，随着苏联撤军，喀布尔政权将失去前途，时间会证明他是正确的。

后来，我们又同玛苏德会晤了若干次，但这第一次

会见令人终身难忘。

这次谈判和后来几次的谈判结果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停止敌对活动，以及在支持停火条件问题上确立紧密合作关系。百姓返回了潘捷舍尔，萨兰戈—喀布尔沿线的局势也平静了许多。然而，这种情况不符和人民民主党官僚的意愿，他们仍然施加压力要在这一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屡次试图使苏军领导人参与其中。

我方不止一次地违反停火协议。例如，有一次我们正在当地民房里同玛苏德会晤，传来直升机逼近的声音。我告诉玛苏德说现在已经停火，不用担心直升机。他建议还是躲避一下以防万一。我们刚刚离开，直升机就对那所房屋进行了袭击，炸掉了一半。玛苏德指着废墟对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国际主义援助”。然后补充说，他个人对我没什么不满，但是要让他相信俄罗斯人，却是个复杂的事情。这不是妄谈，因为苏军指挥部后来又不止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对玛苏德做出的承诺。

我对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汇报做玛苏德工作的情况时告诉他，玛苏德仇视卡尔迈勒政府，说他是亲苏联的傀儡，当权者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将为自己的罪行遭受惩罚。索科洛夫问我，在阿富汗我们可以同谁打交道。我告诉他，在阿富汗国内比较有影响和有威信的人物是玛苏德，在一定的前提下可以同他谈判。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幻想有朝一日他还能与卡尔迈勒合作。玛苏德永远不会走这一步。显然是因为这个原因，针对玛苏德的军事行动始终是持续不断的。

如何评价特卡切夫中校的叙述，可以各抒己见。对于他的一些观点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就是苏军指挥部曾经有机会同玛苏德建立一定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利用。我不对特卡切夫的个别叙述表示怀

疑，但是要指出，对阿赫罗梅耶夫大将所起作用的叙述不够完全客观。我有幸长期在阿赫罗梅耶夫大将手下工作，对他很了解。所以必须指出，他一向关心指战员，珍惜人的生命。

……那一段时间，阿富汗安全部门和苏联克格勃渠道收到情报说，玛苏德队伍在交通沿线从事针对苏军哨所和阿政府军哨所的破坏活动。不过事情是在暗中进行的，而且是以来自其他地区阿富汗伊斯兰联盟的拥护者面目出现的。阿富汗情报部门添油加醋地列举情报说，玛苏德正在积极准备新的行动。侦察兵确认，峡谷里已经构筑完毕装备精良的防御体系、火力系统和兵力指挥系统，它不仅在峡谷，还可以在包括喀布尔在内的其他地区发挥间接作用。

卡尔迈勒向莫斯科发出迫切的要求：歼灭玛苏德匪帮。苏联领导人最终决定动用第40集团军的兵力和阿政府军歼灭潘捷舍尔的玛苏德匪帮。

战役进行期间，特卡切夫以合乎情理的借口被召回莫斯科。

这次战役是针对玛苏德采取的所有作战行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值得叙述一番。

战役于1982年5月16日至6月间进行。参战部队共有36个营（20个阿军营、16个苏军营；总人数约1.2万人），装备有320部装甲车：坦克、步兵作战车、装甲运兵车；155门火炮和迫击炮，104架直升机和26架攻击机。

战役指挥员为第40集团军司令员捷尔-格里戈良兹将军，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实施了总体领导。

为了迷惑对手，研究制订了战役伪装计划，佯攻戈尔班德峡谷（与潘捷舍尔相反的方向，仿佛是巴米杨）。在5月6日至16日的10天时间里，根据“巴米杨战役”计划要“攻占”的峡谷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备战。向阿富汗方面发出了有关文件，并且散布出去关于要在戈尔班德开战的“秘密”传闻，还进行了一系列吸引对手注意力的行动（给阿政

府军布置了戈尔班德战役的作战任务，对该地区目标实施了炮火攻击)。相信了假情报的叛匪开始从周边地区——包括潘捷舍尔——朝戈尔班德调集增援部队。

从整体上讲，作战行动是按照计划展开的。战役开始前一天，参战部队在巴格拉姆和恰里卡尔地区集结完毕。同一天，参战部队指挥员在当地明确了各自的作战任务。重要的事件发生在5月15日夜间。当时，我军侦察部队（11个侦察连）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抢占了潘捷舍尔峡谷入口上方的所有制高点。第二个夜晚，第177机械化步兵团的一个营在侦察部队掩护下依次占领了峡谷纵深10公里内若干重要的制高点。

5月17日凌晨4点钟，主力部队根据战役的基本计划开始实施作战任务，这时才把战斗任务传达给需要共同行动的阿军部队。

对峡谷施以强大的空袭和炮击以后，苏军的3个营开了进去。其中两个营从峡谷左右两个方向沿山梁徒步推进，第三个营沿谷底朝鲁赫、巴扎拉克方向推进，一昼夜大约前进7至10公里。

5点钟时，空投了第一批由阿富汗营和苏联营组成的战术伞兵。战役第一天，在纵深40至100公里的不同地区（共4个区）空投了6个营，第二天——4个营，第三天——2个营，第四天——2个营。空降兵把叛匪队伍一块块分隔开来，创造了各个歼灭的条件。然后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艾维姆和沙尔汗等地势复杂区域再次空投战术伞兵，抢占谷地和交通线的交叉点，这样就可以遏制住潘捷舍尔的“喉咙”。来自巴基斯坦的运送武器弹药的马帮队基本上都要经过这里，返回时运走青金石、祖母绿和鸦片。

战役期间空投了20个苏军和阿富汗军伞兵营，超过了4200人。他们切断了谷地的出口和入口，协助合围圣战者。帕甫洛夫上校指挥的直升机驾驶员显示出高超的飞行技巧，表现出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极端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他们成

功地使空降兵在兴都库什山山峰登陆。

由于叛匪企图突围，作了绝望抵抗，所以部分伞兵陷入困境，甚至进行了肉搏战。比如，空投在鲁赫东部地区的伞兵空降团在圣战者轮番进攻下极其艰苦地坚守住了制高点；叛匪们伴随恐怖的“心理战”吼叫进行进攻，我方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团队受到被歼灭的威胁，惟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携有重型装备在谷底推进的机械化步兵了，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尽管叛匪隐蔽在构筑牢固的工事里，凭借良好的火力发射点进行着垂死抵抗，奥舍夫少校指挥下的机械化步兵营还是突破防御线，攻占了鲁赫，与空降兵会师。为表彰营长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概，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苏联军队实施封锁，阿富汗政府军、安全部队和党员骨干分子对居民点进行“清查”，搜寻藏匿的武器和弹药。普遍利用了俘虏的指认，审问在被俘点就地进行，这个方法很见成效。对此，第40集团军侦察部队副指挥伊万年科中校在1982年7月召开的一次军事研讨会上有这样的发言：

“获取敌人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做俘虏的工作，做当地居民的工作。游击战的特点和作战队伍缺乏严整的组织，使得我们以通常的手段难于搜集到情报，有时则根本搜集不到。这种情况下，做好俘虏的工作，做好被拘留者的工作，做好作战区域内居民的工作，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潘捷舍尔战役的经验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一共俘虏了将近200人，审问了其中的120多人，占60%，95个人（占47%）提供了证词，根据这些证词确认和挖出的目标有200多人。最为重要的证词提供了在帕兰捷赫山谷筑有大量仓库的信息，在向导帮助下得到了证实，向导中间就有提供证词的俘虏。”

“这一经验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加兹尼省的伊斯卡波尔山区，俘虏都被用来当向导……。”^①

尽管我军大量使用空降兵，苏联军队和阿富汗军队得以同时沿峡谷迅速推进，以及卓有成效的空中打击和不间断的炮击，玛苏德手下的圣战者仍然在进行着顽强抵抗。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叛匪把主力都集中于守卫同潘捷舍尔峡谷并行的那些制高点，以及入口处和毗邻谷底的制高点。

谷地里的防御工事构筑得非常专业，岩石上布置了火力阵地和以小组为单位的作战人员，构筑了交叉防御点和巧妙的多层次火力点，所有的岩石缝隙、山间缝隙、洞穴和制高点处都构筑了山地对空武器和大口径重机枪阵地。峡谷山峰地带均有洞穴和密室，提供给避难的百姓和撤退的作战人员；那里还有武器弹药和食品仓库。除了个别处，谷地里的大部分村庄没有做防御准备，为了避免村庄被毁，百姓大都弃家而逃。

圣战者的顽强抵抗出乎我军预料。随着我军向前推进，他们的作战特点有了变化。对手多次试图夺回制高点，在集团进攻中采用呼喊宗教口号和呐喊的“心理战”策略……。

6月初，执行完作战任务的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部队在潘捷舍尔部分地区部署了阿富汗驻防军以后，开始向常驻地回撤。部分苏联军队留驻亚纳夫和鲁赫，以便实现监督和稳定局势，他们驻扎在通往鲁赫的谷地入口处的制高点。阿富汗军队部署在峡谷东北地区的村庄，但他们没能坚持多久，便很快撤离了。情报表明，是阿富汗政府军的指挥官接受了玛苏德的巨额贿赂。叛匪返回潘捷舍尔以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土库曼斯坦军区司令员玛克西莫夫上将在总结1982年对玛苏德匪帮的作战经验时指出：

^① 摘自作者档案。

一系列战役摧毁了 10 个地区的伊斯兰委员会及其在阿斯坦地区的联合总部，设在萨塔居民区的潘捷舍尔、帕尔万和卡比萨省的伊斯兰总委员会，以及玛苏德在潘捷舍尔的基地和指挥中心、大量的食品仓库和弹药、军用物资仓库；还缴获了包括叛乱运动领导机构系统图在内的许多文件，阿富汗伊斯兰协会 5200 名成员的名单、照片和履历表，在喀布尔活动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 113 名骨干分子名单，玛苏德日记，在帕尔万绿色区域和萨兰戈—喀布尔公路沿线活动的战斗队的文件，证实玛苏德同戈尔班德山谷、安达拉博谷地、塔加巴、尼拉巴、萨兰戈和喀布尔郊区的叛匪队伍有联系的文件，玛苏德的反间谍力量今后针对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斗争纲领，应该消灭掉的“中央”地区人员名单，其他可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地反对阿富汗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文件……^①

玛苏德试图避免全军覆灭，所以同意了苏军指挥部提出的关于 1984 年 4 月 21 日之前在潘捷舍尔停火的建议（阿富汗历为 1363 年 4 月 1 日）。

玛苏德再次使我们相信他将停止敌对宣传，在潘捷舍尔停止针对苏军和阿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他还承诺要制止其他反对党派的武装人员采取类似的军事行动，不允许他们的队伍和武器弹药运输队通过自己的控制区，不给返回家园的百姓和向喀布尔流动的居民制造障碍。

玛苏德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之初，潘捷舍尔一带的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驻防部队确实没有再遭到枪击。不过，他手下人却违背协议在政府控制地区加强了反对人民民主党和反政府的宣传，阻挠当地居民向政府反映情况，擅自收取苛捐杂税，继续放行武器弹药运输队和接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

通过自己的辖区前往其他省份。对于叛匪违背协议的事实，我们当面或者通过中间人多次提醒玛苏德注意……。

1984年初，迫于阿富汗领导人的一再要求，我们第三次决定在潘捷舍尔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是要给予玛苏德以毁灭性打击。战役准备得仔细周密，有相当的规模，动用了大批作战部队。以苏联元帅索科洛夫为首的国防部作战指挥组负责参战部队人员和装备的总协调。参战的苏联军人和阿富汗军人分别为1.1万人和2.6万人，还有将近200架作战飞机和190架武装直升机。

4月18日，卡尔迈勒会晤了索科洛夫元帅。后者告诉他，计划中的潘捷舍尔战役已经准备就绪。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高度评价了战役计划，同时透露，叛匪在海拉屯—喀布尔交通沿线，特别是朵什和贾巴尔—乌萨拉吉一带的活动急剧频繁起来；希望我们动手和空袭时必须坚决果断、毫不留情，让潘捷舍尔永远不能再作为玛苏德的基地存在。行动要彻底，要把那里的叛匪全部消灭掉，丝毫也不能手软。绝不允许圣战者当中有什么人从潘捷舍尔溜掉，特别要防止他们逃往北部省份。如果战役进展顺利，那么，打击目标就不局限于玛苏德，还要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所有叛匪。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其他后果，卡尔迈勒表示承担全部责任。

战役于4月19日凌晨4时打响（同玛苏德停火协议有效期的终结时间）。首先对潘捷舍尔实施了强大的空中打击，包括使用了从苏联境内起飞的远程轰炸机，空袭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又对其进行了1个小时20分钟的炮击。紧接着是第二次空中打击。在这之后进行了伞兵空投；部队冲进谷地。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出现的牺牲或是因为踏上叛匪埋下的地雷，或是落入对手设下的埋伏。

玛苏德的武装没有进行什么有效抵抗，他们被彻底击溃了。传闻说玛苏德已经死了（显然是他自己散布的）。苏军指挥部起初毫不怀疑这次战役的成功，胜利战报已经发往莫斯科。

阿富汗战争

5月5日，卡尔迈勒会见索科洛夫元帅时高度评价了战役成果，叙述了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制订的旨在该地区稳定局势的一系列计划，指出了在潘捷舍尔继续搜寻和消灭残敌的必要性。

1984年11月，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涅拉洛夫中将在喀布尔的一次军事研讨会上发言说：“在潘捷舍尔峡谷进行的战役，可以成为1984年规模比较大、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战例。它摧毁了东北地区的叛匪武装力量，切断了从巴基斯坦向叛匪武装提供武器弹药的主要运输渠道。”

“……潘捷舍尔战役有效地检验了我军积累的打击反革命武装力量的手段和方法……。”

只是在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事情才真相大白：那又是一次失误。尽管采取措施对苏军指挥部的意向严格保密，但消息仍然外泄。玛苏德在喀布尔有自己的间谍网，在战役开始前15天（他自己说是24天）得到了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作战计划的详尽资料。另外，玛苏德还拥有良好的侦察系统（全体老百姓，从小孩到老人均参与搜集情报），因而苏联军队做不到出其不意。

1997年7月，玛苏德在接受采访时说：“许多苏联将军和我们有接触，甚至克格勃系统都有我们的人。比如，很多针对我的作战计划我都是提前得知的。情报人员工作得非常出色，这是我应当说的。那些在克格勃和军队里占据高位的人，他们协助我们并非为了挣大钱，而这是你们那里通常的理解，他们这些俄罗斯人不过是明白了真相，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不仅欺骗阿富汗人，苏联人他照骗不误，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至于中级军官，付给他们的酬劳是不错的。”

对自己“战绩”的广泛宣传极大地提高了玛苏德在人民中间的威望，使得他得以集中精力在北方地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

在这些行动不便的山区——希劳和瓦尔萨河谷，他招纳了其他党派的小股作战队伍，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和基地区

域，击溃了以阿卜杜勒卡尤姆为头子的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武装队伍，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还极大程度地巩固加强了自己的作战队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又使得他能更多获得来自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军火援助。

1985年，我军对玛苏德也展开过军事行动，并在人员和武器上给予他重创。但他很快就恢复元气，继续从事反对人民民主党的斗争。高原条件令政府军无法充分使用技术装备对其施以决定性打击。毕竟苏联军队也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也迫使我们更负责任地来对待玛苏德这个人。

在上述时间内，玛苏德没有同政府进行过接触，但他的行为中表现出一种倾向，就是我行我素，凡事不一定非得同阿富汗伊斯兰联盟驻白沙瓦的领导人协商不可。他严格实行古老的传统，建立起独特的国家管理基础，赋予它们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民族主义发展方向。

玛苏德独立自主的政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控制地区内开采丰富的绿宝石、青金石，勘察其他宝石储藏地和金属矿藏，使他不必要去大笔借款），包括拥有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军事援助。

蕴藏丰富的绿宝石是潘捷舍尔峡谷的天然资源，已经查明的绿宝石和其他宝石的储藏量占阿富汗全国储藏量的一半。

宝石的开采工作处于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武装力量的严格控制之下。开采宝石的矿场被巧妙地伪装起来，而且有防空火力网的保护。爆破工作在夜间进行，白天进行宝石和岩石的分离工作。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每年在巴基斯坦销售的绿宝石价值超过了2亿阿富汗尼（500多万美元）。西方专家认为，在特定条件下，收入可以增加10倍。

为了在坚硬的岩石表层从事高山爆破，使用了日本制造的钻机。在达尔欣河谷矿场，宝石的开采工作是在法国和西方工程师监督下进行的。玛苏德的人员还在巴达赫山省的贾尔姆县从事宝石开采。仅在国际市场（买主主要是法国、巴

基斯坦和印度)出售绿宝石一项的收入就可以抵消阿富汗伊斯兰联盟购置现代化军火武器和军服所花销的一半。

还有一部分必须的财政费用依靠国内资源补足:向那些土地私有者征收相当于其收成10%~20%的粮食,而租用叛匪土地的人缴纳的比例为自己收成的50%~60%;在控制区内向政府供职人员(包括军人和安全部、内务部人员)和商人收缴其收入5%~10%的现金,职位高低,是否是人民民主党党员,与政权的合作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缴纳数额的多寡;向居住在喀布尔的潘捷舍尔移民收缴资金;武器弹药的补充部分依靠政府军和安全部、内务部的逃兵,以及在控制区公路沿线袭击抢劫运输车队所获。

1986年起,再没有对玛苏德叛匪实施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只局限于空中打击和炮击,而这样做在山区收效甚微,仅仅炸碎了岩石而已。这段时间,玛苏德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战地指挥官摇身成为全阿富汗乃至境外知名的重要政治人物。

阿富汗政府宣布实行民族和解政策以后,1987年1月13日,玛苏德曾经在阿纳沃以西15公里处的巴扎拉克村进行过同潘捷舍尔省党政机构谈判的尝试。但有人挑衅性地提出了缴械的要求,也就是说,强力部门依然在对付“潘捷舍尔雄狮”。玛苏德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专制,所以最终拒绝了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接触。

虽然没有取得丝毫的谈判结果,1987年1月18日,玛苏德对潘捷舍尔的部下发命令,不得无端对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然而,阿富汗政府的个别领导人继续施加压力,妄图把苏军拖入同玛苏德队伍作战。阿富汗安全部门代表转来的玛苏德人员进行敌对活动的情报经核查也是捏造的。

时任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代表的德米特里中校当时就在潘捷舍尔省内玛苏德匪徒的活动地区。他回忆起那些日子时说道:“从宣布民族和解政策的那一刻起,阿富汗领导人就在

有意识地努力制造一种明显不利于苏联撤军的局面。”

……不顾玛苏德控制地区在1987年1月底实际已形成了非正式停火这样的事实，阿富汗政府于2月13日宣布潘捷舍尔和整个帕尔万省为交战地区。尽管如此，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领导人仍然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以保存实力，待苏联撤军后东山再起。同时，他们积极地接纳百姓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居住，实施恢复性工作，从事经济和公共项目（道路、学校、清真寺、医院等）的建设，使居民生活正常化。

这样的政策在客观上对苏军指挥部是有利的，它毕竟导致了伤亡的减少和地区局势的稳定。所以，我军指挥部千方百计地鼓励玛苏德继续这样做下去，但是却违背了喀布尔的意愿，他们认为这是苏联军队同玛苏德的勾结。

1988年上半年（1987年10月，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领导人瓦连尼科夫大将在喀布尔秘密会见了玛苏德的一名亲信，叫库杜斯），玛苏德的队伍没有向苏军开过一枪，不论是兵营，还是交通线。阿富汗政府军同样没有遭到枪击。对叛匪的分化瓦解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旦阿富汗政府军开火，他们就会遭到叛匪的沉重打击。在扩大控制区方面，阿政府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攻占了科兰—蒙贾纳。

阿富汗政府深知玛苏德是不会妥协的，所以千方百计地要“借助俄罗斯人的力量”对其开战，并且不止一次地把这个问题摆到苏共中央阿富汗问题委员会面前，而且每次都要明确地谈到消灭玛苏德本人。因为据阿富汗人自己讲，如果不消灭掉他，“雄狮”会很快地恢复自己队伍的战斗力，而这将构成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严重威胁。

那段时间，笔者有幸在苏军指挥部参与同玛苏德的谈判，以避免同他发生冲突……。

1988年年初，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下达备战指示，要求于2至3月间在潘捷舍尔和塔哈尔省南部地区展开一次战役。不过，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领导人和第40

集团军司令员认为，在冬季条件下作战是不现实的，其次，仅靠这样的行动无法完成既定目标（消灭玛苏德本人）。虽然多次向上面反映了这个意见，但是驻阿苏军领导人的观点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理解。

于是，瓦连尼科夫大将命令对拟作战地区进行航拍，并准备相关资料，用于他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我们遵嘱准备好有关文件和资料，于2月14日飞往莫斯科，提供了显示该地区（赫斯特—费伦格地区）被积雪覆盖的凹凸起伏的“复杂地形”的航拍照片，并以事实为依据阐述了不宜在冬季对玛苏德开战的理由。最终，战役被推迟，使我们得以集中精力同玛苏德进行和谈。

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领导人把苏联撤军看做是消除了欲在阿富汗北方和东北部地区建立“伊斯兰国”的最大障碍。玛苏德考虑到双方控制区内大多数百姓的心态，下令不得有任何针对苏联军队的活动。

这一段时间，玛苏德致力于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武装队伍主要驻扎地潘捷舍尔地区的生活秩序正常化。1988年5月28日和29日，玛苏德在鲁赫东北42公里处的达什吉—里瓦特召集该党首脑开会，讨论了如何接管被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解放的地区和在那里恢复经济秩序的问题，以及如何安置返回潘捷舍尔的难民（大约有3万人）。

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使难民返回的潮流持续下去，玛苏德倾注了很大精力。难民毕竟是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未来“军队”的潜在兵源，他希望今后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掌握足够的后备力量。7月底，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首脑对潘捷舍尔进行了视察，检查了建设、翻修工程和农业工作情况，在同当地居民的谈话中劝他们相信，谷地里再也不会发生战争，并许诺在恢复被毁坏和荒废的农田建设方面给予他们追加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

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相继撤出潘捷舍尔以后，玛苏德于1988年春天在那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后从夏天开

始，朝喀布尔以北的南萨兰戈悄悄推进，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分化瓦解和“规劝”喀布尔—海拉屯一线的阿富汗政府军哨所倒戈。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个连的内务部队和一个连的安全部队在军官的带领下投奔了玛苏德。这一情况令纳吉布拉十分不安，于是，对玛苏德叛匪开展军事行动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这么做对苏联有利吗？苏联国防部驻阿作战指挥部领导人和第40集团军司令员均认为继续开展针对玛苏德的军事行动是毫无意义的。

文 件^① (机密)

致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同志

向您汇报有关玛苏德的情况……目前，这个人物在百姓心目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威望，他麾下的队伍具有较高的作战素质和宣传鼓动能力。经玛苏德制定的社会政策和宣传鼓动方针（修建清真寺、学校、医院、公路，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极大程度地赢得了民心。玛苏德严令禁止部下对苏联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得到了贯彻执行。同时，他始终表现为国家政权不可调和的对手，不过，如果政府军根据民族和解政策不开火的话，他也会相应放弃敌对行为。

我们仍然认为，妨碍玛苏德和政府接近的因素不是不可克服的，虽然纳吉布拉认为玛苏德不会同他进行任何接触。

8月24日，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会议上，苏军代表再次（1987年至1988年间）试图说服阿富汗领导人必须重视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对待玛苏德应该有个基本的方针，首先是政治的。纳吉布拉赞同说，的确，对政权的现实威胁并非来自“同盟—7”，而是玛

^① 摘自瓦连尼科夫大将档案。

苏德的队伍。纳吉布拉还声称：“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和亚历山大罗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化名）年初访问阿富汗时曾经确定，应当同玛苏德进行谈判，如果他拒绝，就坚决果断地打击其队伍。”对此，纳吉布拉给阿富汗武装力量的部长们做过一个解释，那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打击玛苏德的队伍），第40集团军要发挥主要作用。纳吉布拉接着说，他掌握着确凿资料表明玛苏德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因此，他说，可以清楚地揣测到玛苏德的战略构思：抢占阿富汗北部的14个省（实际只有12个），放美国人进去，迫使苏联面对既成事实。我告诉总统，任何情况都不能排除掉，谈及的问题要认真研究（我向苏联大使叶戈雷切夫和克格勃代表列温转达了有关信息）。

我们认为，采纳纳吉布拉的建议将使第40集团军卷入同玛苏德队伍作战，在撤军第二阶段置我军于极大困境，无疑会增加我军的意外伤亡，在规定时间内有组织的撤军计划也会落空。况且，消灭玛苏德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因为首先要确认他的藏身地，而阿富汗的情报侦察部门过去8年里始终没有完成过这个任务。此外，我军的行动必定会被视为直接破坏日内瓦协议，对苏联的威望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还会引起苏联国内的消极反应……对日内瓦协议的任何方式破坏都会让苏联丧失脸面。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1. 当前形势下，阿富汗国内反对阵线才是对现政权的主要威胁，各派领导人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这并非新结论，而是通过两年实践逐渐得出的，不过在政治上对他采取的做法是没有改变的（有时还用军事尺度去衡量）。

在撤军的最后阶段和撤军以后，玛苏德会积极行动以占据北方省份，他首先会把力量集中于喀布尔—海拉

屯一线。

2. 利用接近玛苏德的机会使他接受我方条件的时机已经被错过，他现在是难于被击败的。不过，同他建立接触的可能性还没有彻底丧失。所以阿富汗领导人必定要对他做出重大让步，接受任何方式的妥协，其中包括北方省份的自治等等。

3. 玛苏德今后很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家，苏联显然是不得不同其进行合作，我们把他当作自己的盟友将胜于把他当作敌人。

考虑到这一层，苏联作战部队应该尽早停止同他直接对抗。另外，玛苏德本人曾经坦言，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妨碍他去这么做……。

瓦连尼科夫 1988年8月

瓦连尼科夫大将的结论是正确的：1996年秋天，当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以后，威胁要朝独联体国家边境推进时，正是玛苏德作为杜斯托姆和哈里里的同盟，阻击了塔利班，间接地成为俄罗斯的盟友。

苏联开始撤军后，玛苏德依托北部的巴戈兰、塔哈尔、巴达赫山、昆杜兹、萨曼甘等省份，迅速加强活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把其他伊斯兰党派的战地指挥官招降到自己一边。于是，阿富汗伊斯兰党和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之间为争夺控制区的军事行动陡然升级，为争夺位于戈尔班德的恰利卡尔和卡比萨绿区，双方大动干戈。阿富汗伊斯兰党的匪徒利用大批难民从喀布尔返回潘捷舍尔之机，在喀布尔—贾巴里—乌萨拉吉交通沿线一带公开对潘捷舍尔人进行恐怖活动。例如，8月7日在拉戈马尼地区，他们烧毁了两部汽车，枪杀了9名返回辛吉的潘捷舍尔人。

昆杜兹被反对派攻占以后，阿富汗领导人再次要求苏联领导人对玛苏德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他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而苏军指挥部掌握的是另外一些情报，况且还在继续同

阿富汗的悲剧

玛苏德进行着谈判，瓦连尼科夫大将给玛苏德的信正在转交过程中。信中^①说：

尊敬的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先生！在笃信宗教的阿富汗土地上，无辜者的鲜血已经流淌了多年。妇女、儿童、老人和健壮的男人在死去，家园被毁坏，神圣的土地在荒芜，这是百姓的极大不幸。然而，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他们冷酷地对待百姓的痛苦，继续着肮脏的事情。

最近发生在8月份被阿富汗伊斯兰党人占领的昆杜兹的事件就是这种肮脏事情的例证。圣战者在那里驻扎的时间里，整个城市被野蛮洗劫一空，被彻底烧毁，甚至清真寺都未能逃过此劫。城内发生暴力事件，许多无辜者死于非命。阿富汗伊斯兰党作战队伍领导人对此负有完全责任。

人民不会饶恕他们。

尊敬的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

我们认为，早就应该共同思考一下，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人民能为实现和平做些什么。显然，应当就这些地区的管理问题进行协商，尽管这是纯粹的阿富汗内政问题。作为第一步，不妨研究一下您对昆杜兹省行政管理提出的建议，避免8月份的沉痛事件重演。

我们认为省长应该是在民众中享有威望、受到尊敬的人，是有能力维护和平、为民谋福的真诚穆斯林。

我们把您看做是致力于在潘捷舍尔和阿富汗许多地区实现和平的人，所以向您提出上述建议。希望您的和平意图和对同样为了和平和百姓幸福的我们的意图的正确理解，使您能够尽快做出回答，对此，我们预先向您表示感谢。希望回信通过我们认识的您的某位亲信转交。

……8月里，南萨兰戈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起因是政府军认为坐落于交通沿线的村庄里有敌人而进行了火力攻击，造成了百姓伤亡。当地长老出面要求停火。这一要求非但没有得到满足，政府方面反而增派了第2步兵师，并开始对叛匪控制的村庄实施有规律的炮击。这里的险恶用心在于激怒对手还击，从而挑起战事，阻挠、破坏苏联撤军。

8月6日，叛匪方面在同第40集团军代表会晤时请求我方停火，否则，他们将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可是，第2步兵师非但没有停止攻击，反而加强火力，特别是在夜间。

8月11日，撤军途中的苏联行军部队顺利通过萨兰戈山口，叛匪没有进行任何骚扰。然而，8月15日，叛匪却袭击了阿富汗政府军的行军部队，造成其30辆汽车和两部装甲侦察车被击毁，40人死亡，20人负伤的损失。包括山地高炮在内，被敌人缴获的射击武器达到了100件，50名阿富汗军人被俘。

苏联撤军第一阶段完成后，第2步兵师开始在萨兰戈山口占据我军哨所附近的要冲阵地，这一行动加剧了萨兰戈地区的紧张局势。作为回应，叛匪方面封锁了山口地区，在公路的每一拐弯处都布置了15到20人的武装人员小组，只有撤退的苏联军队经过时才予以放行……。

文 件^① (机密)

今年10月4日，我们会见了阿富汗总统、人民民主党总书记纳吉布拉。

……讨论到阿富汗国内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我们说，现在是各方都应该积极行动的时候了。事情已经做了一些：致玛苏德的信，阿富汗领导人和苏联克格勃领

① 摘自瓦连尼科夫大将档案。

导人都曾前往哈扎拉贾特。

苏联大使已经表示，如果需要，准备亲自会见玛苏德。这位大使没有以往的包袱，在同反对派的接触方面，他可以自己做主。

……纳吉布拉总统指出时间所剩不多。这4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像4年那样利用，所以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要遵循具体化的原则。就是说，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决定是使用武力，还是争取谈判达到妥协。总统认为，采取这一政策能否成功，关键性人物是玛苏德。只有解决掉同玛苏德的问题，才能保障交通动脉的安全……。

叶戈雷切夫（外交部） 瓦连尼科夫（国防部）

扎伊采夫（克格勃） 1988年10月

为了改变目前的状况，阿富汗政府试图利用步兵第2师来挑拨玛苏德的队伍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1月7日至14日，由于经过山口的政府军无缘无故地开枪射击和步兵第2师的炮兵不断炮击贾巴尔—乌萨拉吉村的和平居民，作为回答，玛苏德的武装人员在战地指挥官科里·科莫卢金的率领下对这支部队发动了攻击，重新封锁了萨兰戈通道。阿富汗情报部门则迅速宣称，通过无线电监听，他们截获了阿富汗伊斯兰联盟领导人从巴基斯坦下达的命令，要求属下在萨兰戈山口地区恢复对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的作战行动。该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

南萨兰戈在其辖区内的第108机械化步兵师副师长安托年科上校不止一次向上级汇报，驻扎在贾巴尔—乌萨拉吉的阿军第2步兵师经常使用大炮、迫击炮、火箭炮对一些和平村庄无端射击，而侦察情报表明那里根本没有敌人。这种对和平村庄的无端射击每每发生在师长法卢克将军出差喀布尔期间，而在现场的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对第2师其余指挥官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力，阿富汗人总是以必须执行师长的命令为借口。

安托年科上校还多次请求把阿富汗政府军第2步兵师调离萨兰戈山口入口地区，因为该师在当地没有执行任何作战任务，相反，其指挥人员的行为是在有意破坏苏联军队和阿富汗军队的车队通过萨兰戈山口。

……11月13日，来自萨兰戈和潘捷舍尔的阿富汗伊斯兰联盟的200多名匪徒在塔基甘村地区向第2师的前哨阵地发动了进攻。最后只是凭借瓦连尼科夫大将个人致玛苏德的警告信才又一次缓和了局面。我方还做了阿富汗政府军指挥部的工作，使第108师一部奇迹般地避免卷入战事。这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匪徒在萨兰戈谷地一出口处集中兵力之际，正是负责护送瓦连尼科夫大将致玛苏德警告信的那4辆装甲车到达该地之时。从山口进入谷地的战车陷入圣战者的包围圈。最初一刻，装甲车上的我军侦察兵同敌人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如果没有穆洛·豪斯和巴希尔的干预，真不知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同领头的德米特里中校交谈后，命令部下放行我军侦察部队。

我军指挥部利用他们之间的秘密联系，以书面形式向玛苏德转交了用于协商讨论的若干问题，这些资料以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有关签字和密封标记为证（由德米特里中校通过南萨兰戈地区战地指挥官穆洛·豪斯转交给了玛苏德）。

信^①

同玛苏德进行协商讨论的若干问题

1. 在阿富汗国家统一的框架内、以塔吉克族人居住地区为基础（其涉及范围包括的省份有巴达赫山、塔哈尔、巴戈兰、帕尔万和卡比萨的一部分）确立塔吉克人的自治权，在这些地区建立自主管理制度。

^① 摘自作者档案。

2. 阿富汗内阁、民族院和总统机构中要有塔吉克族代表。

3. 作为独立和平等的阿富汗政党，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应当得到官方承认。

4. 在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作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塔吉克族自治的常规部队，并使之编入阿富汗武装力量。在民族和国家利益方面为这些部队确立任务，包括守卫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

5. 建立塔吉克自治框架内的和平，为其百姓创造恢复正常生活的条件。

6. 东北部经济发展问题。包括经济和财政援助在内，阿富汗政府要给予该地区全面支持。

7. 在阿富汗塔吉克自治地区同苏联塔吉克共和国之间建立直接的经贸联系和文化联系，以获得经济，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发展边境贸易。

我转达给您的这些问题，均得到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沃龙佐夫和瓦连尼科夫大将的同意，他们二人也就这些问题同阿富汗领导人进行过磋商。

军事顾问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军官就这样同玛苏德保持着神秘的联系——作者注)

……玛苏德在回话中声称，已经准备就讨论这些问题会面；他还有一些其他建议。我方使者结束北部之行返回喀布尔之后，详细介绍了同玛苏德的会晤情况，使我们相信，玛苏德赞同苏军指挥部的倡议，愿意继续这样的接触。

苏军方面表示准备不带警卫不带武器前往玛苏德指定的地点会晤。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沃龙佐夫和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瓦连尼科夫大将同意接受这一使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巨大危险。谁料，玛苏德没有拒绝进行接触只

书范围内的地区。如有其他党派的武装分子试图进行上述活动，苏联方面表示可以应潘捷舍尔方面的请求给予炮兵和空军支援。

5. 双方共同努力，为寻找在本意向书所涉及地区失踪的苏联和阿富汗公民交换信息。

6. 双方有必要在局势紧张时会晤磋商，防止战事再起，以维护意向书所涉及地区的和平。

7. 本意向书适用于塔吉甘—乔加尼交通线附近地区（公路两侧 30 公里）在这一地区之外的地方，苏军和潘捷舍尔武装力量有权展开军事行动歼灭继续进攻本协议双方的其他党派的作战队伍。

8. 本意向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①

签署这份文件的是第 40 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中将和阿富汗国防部长塔奈。

我们指望呈交的这份意向书能使玛苏德满意，认为他是能够接受其条件的。谁料，玛苏德拒绝了意向书内容。于是，我们不得不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知他：无论怎样都会布置对公路的防御和保卫，不过现在政府军只能单独行动了，建议他不要干涉阻挠，我方还确定了采取“措施”的时间。为了解释我方立场，避免双方流血，我们也致函玛苏德：

尊敬的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先生！

本着良好的愿望和避免阿富汗政府军和苏联军队同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队伍重新发生武装冲突的意图，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多次致函您，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在您属下队伍驻扎地区稳定局势，喀布尔—海拉屯公路的卡拉文拉戈、贾巴尔—乌萨拉吉地

段也在其中。

鉴于这些问题非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需要一定的时间您才能做出决定，所以苏联代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了克制。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内，您不止一次地给予我们信号，就是您准备进行会晤，您的助手们亦多次转达过这样的意思。先生您自己也表示过……然而，两个月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会晤并没有举行。当然并非因为我们的过失。显然，我们有理由把您的行为看做是没有合作的愿望。实际上，这减少了一种可能性，即以务实的精神，从各自立场出发，为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来探讨所有问题。正在形成的是这样一个态势，即1987年至1988年取得的进展很可能会全部丧失。没有谈判，就达不到相互理解。目前情况下，大家在各行其是。

即使不触动另外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也必须认识到认真研究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至关重要性：保障喀布尔—海拉屯交通运输线正常运行，不间断地提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给喀布尔和其他省份的居民。目光短浅的人们以为，可以也需要阻挠货物运输，于是就袭击车队。这样的行为不仅会给某些阿富汗人本身造成损害，还会殃及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和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同时也亵渎了神圣的可兰经基本原则，这也是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被迫加强公路和运输车队保卫工作的原因。我们知道，苏联提供的食品和其他物资援助应该送达阿富汗百姓手中。南萨兰戈和潘捷舍尔的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获得这些援助，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排除流血。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在最近这一星期（1988年12月25日之前），我军和阿富汗政府机构的代表随时可以在贾巴尔—乌萨拉吉苏军驻防军指挥部，或者根据您的意愿在其他地点会

晤您的全权代表，具体商讨提供食品和其他物资援助的对象、时间、地点和数量。12月和1月的需求量可以完全落实。

2. 如果您的队伍承担起卡拉文拉戈、贾巴尔—乌萨拉吉地段的交通安全保卫，必须同当地机构签署意向书。禁止扫射和抢劫公路上的运输车队应当是重要的条件（职责）。

3. 如果您的队伍不愿承担南萨兰戈地区交通线上上述地段的安全保卫，我们将被迫增设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哨所。如果发生破坏事件——哨所遭到射击，我们有权采取措施回应，后果将有你方人员（队伍）承担。必须记住，你方队伍的类似行为将在全国各省各地区公之于众。

受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沃龙佐夫和瓦连尼科夫大将之嘱，请您认真谨慎地对待苏联方面的建议，包括有关会晤的建议。

1988年12月18日 军事顾问^①

……阿富汗领导人对驻阿富汗苏军指挥部施加着压力，不断向莫斯科求救，指责我们没有对玛苏德采取果断行动。而莫斯科不断下达严厉指示，要求针对玛苏德进行作战准备。不过，在阿富汗的军事领导人深信，采取军事行动不会对我们国家有利。但很少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立场几乎被看做是违抗军令。

第40集团军司令员不止一次地同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过不讲情面的对话，后者始终要求解释清楚，为什么至今没有击溃玛苏德匪帮。当格罗莫夫说目前还没得手，就会听到回答：“那就击溃他”、“击溃他！”如果这是件简单的事，那早就做完了。每次司令员都感到很愤懑，他坚持自己的看

法，相信那样的举动缺乏理智，毫无意义，只能带来多余的牺牲。以消耗大量物资和让官兵们冒生命危险为代价前往难于行走的深山和峡谷搜捕玛苏德，是违背我们利益的，得到满足的只有人民民主党的党魁们。可惜，苏联领导人不愿意理解这一点。

瓦连尼科夫大将陷入极其复杂的境地，他几乎被指罪为无意执行上级指示，私下同反对派进行妥协性谈判。1988年12月下旬，承受着来自中央压力的瓦连尼科夫即将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会议，领导们将要听取他分析同玛苏德进行斗争的前途；行前，他召集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中将、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大本营长官博格丹诺夫中将、武官谢恩上校、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土尔拉莱斯上校、侦察中心主任科莫洛夫上校和笔者。

我们反复研究了各种处理方案，最终的结论是，同玛苏德的队伍发生冲突已经在所难免，所以必须制订相关计划。作为初步方案，瓦连尼科夫指示对其驻扎在可兰—蒙古地区的队伍实施空中打击。这一选择绝非偶然。该地区在潘捷舍尔之外，但对于玛苏德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他的人马在那里开采青金石。谢恩上校询问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是否让玛苏德知道，这次打击是有意的，而非误会？”得到的回答是：“让他知道好了，也算是对他的警告。”第二天实施了这样的打击。随后，对瓦尔萨扎、法尔哈拉、伊什卡申玛等山区相继进行了空中打击和火箭弹袭击。苏军指挥部采取的行动引起了玛苏德的强烈反应，他发来信函：

顾问先生！

收到您最近的来信之后，我已经打算前去同苏军代表会晤了。为了不把事情本末倒置，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承受战争和你们的入侵已经10年了。看在上帝的面

动，我们会予以应有的回敬。就这样！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

顺致敬意！ 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

1988年12月26日^①

非常遗憾，同玛苏德媾和的尝试就是这样结束的。说到遗憾，是因为我清楚，在苏联撤军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位我军指挥员愿意同玛苏德的队伍在南萨兰戈地区发生冲突。在此还应补充说，苏军指挥部同玛苏德进行和谈的做法并没有得到阿富汗官员的理解。苏联克格勃驻阿机构对军界的类似行动也怀有嫉妒之心，他们认为军官们介入了“契卡”的活动领域。有一次，克留契科夫飞到喀布尔以后，专门召见了侦察中心那些根据瓦连尼科夫大将指示去做玛苏德工作的军官，试图从他们手中获取能够证实阿富汗领导人指责瓦连尼科夫企图私下勾结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信息，他当然没有得逞，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很久以后，玛苏德证实说，苏联驻阿富汗代表也曾经希望谈判：“尤里·沃龙佐夫任苏联大使期间，他数十次给我发来电信和书面信函要求会面。他表示准备前往我指定的任何地点……不过至今我也没和俄国人见面。”

尽管玛苏德不愿意合作，苏军指挥部仍然寄希望于最终不同他发生冲突。然而，阿富汗领导人的固执却是无法消解的。1989年1月谢瓦尔德纳泽访问阿富汗期间，他们再次迫切要求在苏联撤军完成以前解决玛苏德的问题，纳吉布拉同谢瓦尔德纳泽的一段谈话可以佐证这段历史。纳吉布拉说：“在转入执行那些更重要和刻不容缓的任务之际，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今天，没有人怀疑，为了达到和解而落实的政治与和平的措施应当成为主要的方针。毫无疑问，在巴基斯坦、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以及反对派拒

绝停火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忘记还可以使用军事手段。事实正是如此，对敌人的基地、仓库和有生力量集结地一如既往地实施强大的空中、炮兵和火箭弹打击，粉碎他们企图在苏联撤军后展开大规模进攻的打算，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特定条件下，同玛苏德武装队伍进行斗争的问题便含有特殊的意义。鉴于他的人马有能力在苏联撤军以后立即切断南萨兰戈地区的海拉屯—喀布尔交通命脉，封锁喀布尔，把首都拖入灾难性困境，所以必须把玛苏德看做是政府在现阶段的头号敌人。”

“玛苏德的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此前做出过不少决定，但它依旧显得很棘手。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被毫无道理地拖延了。”

“……最近4年以来，除了规模不大的火力打击以外，几乎没有对他采取过什么像样子的军事行动。玛苏德借机组建了多达1.1万人的突击队，仅在潘捷舍尔活动的就有2500人。应该承认，玛苏德善于利用由于我们态度消极而形成的对他有利的局势。”

“目前，已经计划好对玛苏德队伍采取一次阿苏两军的联合作战行动。不过，它只具有局部战役性质，仅仅局限于利用苏联军队向阿富汗军队移交哨所的机会对周边地区进行一次清剿。我们认为，这样的作战行动无法给敌人造成明显损失而根本改变局势……。”^①

谢瓦尔德纳泽说：“同意一点，针对玛苏德的军事行动延误了。其中的缘由叫人不大明白，更何况3个月之前阿富汗武装力量的部长们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同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在备战过程中把一些东西了解清楚。的确，任何局部战役和有限的措施都解决不了玛苏德的问题。”^②（1989年1月13日于喀布尔）

① 摘自作者档案。

② 摘自作者档案。

不言而喻，外交部长怎么能理解在撤退中不愿作战的将军们和官兵们的心境呢。在撤军的最后阶段，谁也不愿意去死，谁也不愿意再去杀人。可苏联领导人却持有另外一种意见。所以谢瓦尔德纳泽返回莫斯科以后不久，驻阿苏军指挥部便接到国防部长亚佐夫下达的命令：迅速准备对玛苏德展开军事行动，并且不要指望上边能接受任何反对的意见和理由，战役代号为“台风”。



“谁也不想再杀人”

1989年1月下旬，南萨兰戈地区开始上演一出戏，参与者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对玛苏德事先发出警告：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队伍如果对政府军布置哨所制造麻烦，哪怕开一枪，我们都将被迫动用武力，全部责任由玛苏德承担。对此，也提前通知了当地居民，纳吉布拉总统对南萨兰戈人民发出呼吁，建议他们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期间离开自己的家。

其实，这都是宣传掩护。战役的主动阶段计划于1989年1月24日展开。在山口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苏军部队和大量火炮，包括了“布拉基诺”重型火焰喷射器、“飓风”和“冰雹”火箭炮连发装置……然而，1月22日中午，国防部长亚佐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命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把动手时间提前一天。

毋庸置疑，这绝非亚佐夫的意思，是他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指示。究竟是谁坚持在南萨兰戈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这个谜至今也没揭开。此后，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开始普遍实行口头下达命令的方式。这里埋下的伏笔是一旦遭到失败，责任可以推卸给直接的执行者——军人身上。

当然，改变作战时间从原则上讲已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阿富汗政府军这时还没有准备就绪，他们刚刚到达南萨兰戈，尽管他们的到位也仅仅是表现一下“参与了”。必须

采取应急措施，使阿军能够在1月22日夜里进驻指定位置。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驻阿富汗的将军们、校官们和驻阿总军事顾问机构的人员们四下奔走，以便创造阿军的“飞跃”，保证任务顺利完成。

经过共同努力，部分阿军部队一夜之间在萨兰戈地区部署到位，并于1月23日晨开始推进以建立警戒哨卡和哨所。

根据官方后来的说法，当阿富汗军队开始在公路实施警戒时遭到了袭击（这显然是一种借口，或者是挑拨离间）。实际情况是，1月23日晨，根据格罗莫夫将军的命令对潘捷舍尔及其毗邻谷地进行了事前计划好的空中打击（包括使用了从土库曼斯坦军区机场起飞的空军）和炮兵打击，这次行动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力破坏。

撤军最后阶段的军事冲突没有被我们考虑在计划之内，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纳吉布拉说服苏联领导人相信这次战役是必要的。不愿意再流血的苏军指挥部直到最后时刻仍指望能够和平撤离，但局势让这一幻想破灭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纳吉布拉和人民民主党其他领导人近乎病态地仇视玛苏德。

但愿玛苏德表述的同苏联进行合作的冷静思路能够在未来对俄罗斯关系中转变为具体的行动，它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其实，1989年1月仍滞留在阿富汗的许多苏军官兵，将军、校官、尉官、军士和列兵，都已经明白自己已经不需要这“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没有必要再同反对派作战了，但军令并非儿戏！

某些“评论家”建议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我不知道，或许他们从温暖的办公室或者“奥非斯”观战更为清楚，向来都是不用对后果负责的人最容易提出建议。但是，如果军队开始选择执行哪些任务，不执行哪些任务，那么军队就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这次命令激怒了很多指挥员、政委和战士。他们说，这次执行任务以后自己将失去机会佩带政府奖励的勋章。从作

苏军撤离阿富汗

战地区逃出的当地居民拒绝接受我们的救助，尽管一切都安排就绪：搭好了帐篷城，布置好了医疗点、饮食点、取暖点……难道军队非需要这次战役不可？军人再次成为维护政治家自尊的牺牲品。

今天，把1979年12月决定出兵阿富汗作为一个政治错误来评价已经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然而，1989年撤军以后，显然是没有汲取足够的教训。给军队下达命令时依然没有考虑全民族的利益，这些命令的始作俑者还活着，但他们当中有谁承担了责任？不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忙于回避和否认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事情，竭力洗刷自己，把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卸到指挥部队的人和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身上。

众所周知，政治家向来能摆脱掉一切责任。反过来，逍遥法外和不受制裁又使轻率和不负责地做决定进一步泛滥。难道这就是他们如此草率地打发别人去死的原因吗？有时，和平谈判达到的效果更好：苏军部队的许多指挥员同敌占区百姓和圣战者队伍的战地指挥官达成过秘密协议，进行过对话，给予过不同形式的援助。这并非偶然，其结果就是这些地区的人员伤亡大大减少。



我们撤离、撤离、撤离……

健康合理的观点最终占据上风。苏共中央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决定不能再拖延撤军问题，必须完全彻底履行我们在日内瓦协议中承担的义务，在规定时间内撤出全部军队。

我要指出，日内瓦协议关系到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命运，第40集团军全体将士怀着一种特殊的满足感对待它的签署。不是他们，那些饱受痛苦磨难，在生死之间生存下来，厌倦了战争的普通战士、军士、校官和将官，谁又能成为结束这场战争的积极拥护者呢？正是他们最先懂得了武力

解决阿富汗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并且把自己的见解汇报给莫斯科，但他们的声音被忽视了。

1989年1月27日，撤军得以恢复。

第40集团军指挥部没有忽视敌人的动向，谁也没有放松警惕性。的确，除了个别例外，反对派力量没有给苏联军队撤离制造障碍，也未阻挠阿富汗政府军接管特别管辖区和有关的安全哨所和关卡。除了低温、浓雾和路面结冰等恶劣气候条件的情况外，履带式车队和轮式车队昼夜兼程地驶向苏联边境。在高原地带，特别是萨兰戈山口，部队常常受阻于雪崩。大量的积雪从山上倾泻下来，在路面形成几公里范围的阻塞。

我军不得不进行后勤补给、道路修复、工程救险等大量工作，这消耗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部队的士气依然高涨，因为要返回祖国！大家正在离开一个已经成为熟悉和亲切的、但毕竟是人家的地方——阿富汗。

1月份的最后几天，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对喀布尔进行了短暂访问。他会见纳吉布拉时许诺继续提供援助和支持，总统再次谈及提供武器装备。在场的总军事顾问索兹科夫有些沉不住气，直言不讳地说，阿富汗人根本就掌握不了现有的武器，还在一个劲儿地要新的。部长尽可能使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不过在心里已经决意撤换总军事顾问。

回到莫斯科以后，亚佐夫召集国防部领导层开会，叙述了喀布尔之行，然后宣布必须有人前去接任总军事顾问一职。加列耶夫大将事后回忆说：“讲完这番话，亚佐夫环视了一下在场的将军们。我觉得，他的目光对我格外留意。为了回避赴任，许多将军迅速住进了医院。我私下决定，如果建议我去，那就同意。”

加列耶夫的感觉是对的，部长的目光的确在他身上停留过。事情是这样的：返回莫斯科途中，亚佐夫在飞机上询问随行的布卢金将军和海军上将图鲁诺夫，他们认为谁能胜任索兹科夫这个位置，因为索兹科夫显然缺乏与总统的密切关

系。当然，他是个正直的人，但不是外交家，而现在需要的是灵活性。布鲁金和图鲁诺夫两人就向部长推荐了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加列耶夫大将。“好吧，我看他是个合适人选”，亚佐夫说。

就这样，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会议过后一天，国防部长召见了加列耶夫将军，吩咐他前往喀布尔。将军回答说，不论指挥部下达什么任务，自己都准备去执行。平心而论，这是勇气十足的一步，因为当时人们在心理上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阿富汗首都的局势极其险恶，而从莫斯科观察，那里又充满了极大的危险性。

……2月4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了喀布尔，仅留下为数不多的人员用来保卫喀布尔机场：继续通过空中走廊向首都运送面粉。第40集团军指挥部把指挥点转移到了纳伊巴巴德，从那里指挥部队撤离，苏联国防部驻阿作战指挥组，以及军事顾问机构均迁入苏联使馆和商务代表处所在地。尽管撤军进入最后阶段的那段时间局势极其不稳定，恐怖暗杀活动频繁起来，我们依然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2月7日，加列耶夫大将和一组军官飞抵喀布尔，他们马不停蹄地操持起具体工作。他们面对着复杂局势，如俗语所说，人生地不熟。我并不赞成在紧要的转折时刻把新人任命到关键岗位上，尽管我要说，况且日后的情况也表明，加列耶夫将军是不辱使命的。政府军能够成功抵抗住反对派武装力量的进攻，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2月13日，我们根据瓦连尼科夫大将的指示，公开进行了“最后一名苏军士兵撤离喀布尔”的仪式，我被责成组织落实这次活动。早晨，我们详细演练了送行活动。不过，当记者出现以后，他们大约有200人，一切都乱了套。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广场上跑来跑去，拍摄哨卡处坐在装甲运兵车上的步兵战士，询问谁是“最后一个”，如果他们还留在哨位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活动是专门做给叛匪看的，让他们知道机场仍处于保护之下。为了应付意外的气候

条件可能造成的不便，做了这样的安排：为了转移尚没有离开喀布尔的军人，把原来用于运输面粉的4架伊尔—76飞机留下一天，2月13日夜间至2月14日白天，不过这要冒遭遇破坏行为的风险。我们的记者什基兰多走到我身边，请求允许为“时事新闻”节目拍摄“最后一名”战士。我指了指最招人喜欢的一个战士，列兵里亚比宁。

圣战者没有孤注一掷地冒险攻打飞机，不过从2月14日早晨起，他们使用火箭弹对机场进行密集射击，所幸飞机没有受损。我恰好在敌人射击时来到机场，我对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将要乘坐的那架飞机的机长交代了任务。

1989年2月14日12点，瓦连尼科夫大将在喀布尔的苏联使馆内会见了联合国代表赫利米宁将军。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着在场苏联记者特索夫斯基和什基兰多的面，瓦连尼科夫大将向联合国和平使团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代表宣读了苏军指挥部的书面声明。

联合国和平使团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代表后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报告，对苏联遵照有关时间表完成撤军表示特别的满意。早些时候，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苏联政府和苏联军事代表以及民间代表表示了感谢，感谢在联合国和平使团监督外国撤军过程中他们所给予的协助和合作。

……2月14日19点30分，我们抵达飞机场。这里已经被阿富汗人接管，他们正在拆卸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守卫机场的所有装备也转交给了阿富汗政府军代表。为我们送行的基本上是苏联政府机构留驻喀布尔的负责人……坦率地说，我们并不羡慕他们。送行仪式非常简短，没有出现一个记者，虽然他们知道苏联驻军指挥机构今晚撤离。看来，他们决定不来冒险，因为阿富汗首都的夜晚是非常不安全的。

先于我们起飞的两架伊尔—76飞机载着警卫部队在机场特别管制区上空巡逻飞行，随时准备进行必要的着陆。20点，苏联国防部作战指挥组领导人乘坐第3架飞机起飞了。与我们同行的有驻阿富汗大使沃龙佐夫，他要经莫斯科前往

德黑兰谈判。

升空中，当飞机进行螺旋爬高时，机舱内的所有人都屏息盯住货舱内的高度表看，期待着宝贵的数字“6”。它终于在13分钟以后出现了，众人禁不住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毒刺”导弹可以达到的区域。飞机接着把航向调向塔什干。从空中飞越苏联国境线时，机舱内响遍“乌拉”的欢呼声。有人拿出伏特加，有人取出罐头，按照俄罗斯的风俗，大家为返回祖国一起干杯。

我们在塔什干的“图泽尔”机场落地时已经是深夜了，迎接我们的是凛冽的寒风和当地罕见的零下20度低温，以及以什卡纳金将军为首的土库曼斯坦军区参谋部的军官们。我们从机场去了宾馆，第2天便前往捷尔梅兹和库什卡。在那里逗留的两天时间里，我们遇到的都是刚刚从阿富汗归来的第5和第108机械化步兵师的官兵们，以及在第720教学中心接受P—300导弹系统操作培训的阿富汗军人。

1989年2月15日，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中将跨过了阿苏两国界河阿姆达里亚河上的“友谊桥”，他是苏军驻阿有限部队中离开阿富汗的最后一名军人（被俘人员除外）。当天下午，边防部队也从境外返回，他们的行动是不引人注意的，好像平日的行军一样。我们只有几位军事顾问留在了喀布尔。

在捷尔梅兹和库什卡，战士们受到了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数不清的记者的欢迎。苏联高层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参与欢迎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了多年的军人归来，他们再次暴露了自己对军队的冷漠和毫不关心。军队执行了他们下达的命令，而现在他们已不再需要军队。

在捷尔梅兹的集会上，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将军说：“我们执行了任务，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对驻阿苏军有限部队而言，一场旷日持久的、沉重的、对本国人民长期保密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但阿富汗人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百姓希望迅速实现和平的愿望落空了，

阿富汗人开始了更加残酷的自相残杀。

那些深信这场战争对自己来说是最后一次战争的“阿富汗老战士”当时想都没想过，许多年以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会遭遇另一场战争。其实，阿富汗战争后它已初显征兆。当年，大家即使在噩梦中也不会看到阿富汗那样的情景在自己家园里发生，大家手持武器去拼杀，去死。不过，每个人捍卫的都是自己的祖国……反目为仇并不罕见。

战后返归故里的军人迅速被卷入民族冲突和国内政治冲突，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莫斯科、车臣……。

第九章 苏联撤军以后的阿富汗



夺权计划受挫

最后一支苏军队伍刚刚离开阿富汗领土，纳吉布拉就发布命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保障政治的和军事的中央集权领导，加强对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的控制，同时宣布成立阿富汗最高国防委员会，改组政府。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军队再次充当了主要角色，它拥有超过 30 万人的作战部队、2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近 700 辆坦克、150 架作战飞机和直升机。

如何有效利用军队潜力，使圣战者没有任何机会攻占防御体系存在缺陷的首都，这对阿富汗政府来说生死攸关。原来，苏联撤军结束前不久，纳吉布拉出于对国防部长塔奈和内务部长古里亚博佐伊的不信任，将常规部队“调离”喀布尔，把首都的防御重任交付给重新被任命为近卫军指挥官的塞义德·阿扎姆将军。党内纠纷使喀布尔人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地位。为了能或多或少地调整一下这种状况，我们的军事代表做出了很大努力。政府军也因此得以在苏联撤军后进行有效的动员，成功地抵御了圣战者的进攻。

以武力推翻纳吉布拉为目标的反对派愈加频繁地活动起来。尽管圣战者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但他们没有统一计划，兵力又分散，所以始终无法在主要省份中的任何一处夺取政权（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

叛匪首先集结兵力于距巴基斯坦不远的贾拉拉巴德城下，指望能轻易地拿下它，建立所谓的“过渡政府”。再把它作为基地，展开对喀布尔的进攻。

圣战者曾一度提示：他们包围了没有做积极抵抗的步兵第11师，该师大部分人员缴械投降，师长巴拉克扎伊将军在战斗中阵亡。局势一度变得极为严峻。总统与苏联军事代表合力采取了补救措施，及时向贾拉拉巴德增调后援部队。

政府军坚守阵地，成功地保卫了省中心。然而，叛匪并未放弃自己的计划，他们调集增援力量和武器装备，准备对城市发动规模更大的进攻。集结到贾拉拉巴德的作战人员达到了2.5万人。

而政府军在这一地区只有8000人，由常规部队、安全部队和内务部队参与的防御战组织得松散而混乱。经常重复出现这样的事情，属于不同部门的、若干以20~30人为伍的作战小组在同一地段进行防御，他们不但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且也没有组成统一的作战分队。这既增加了指挥难度，又妨碍了有效使用兵器和调配作战人员。为了守住贾拉拉巴德，苏联军事顾问在加列耶夫将军领导下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努力。

防御线上构筑的工事十分简陋。因此，部队抢先进行空中打击、炮兵打击和火箭弹打击，力图在敌人处于进攻准备阶段时就将其击溃。省中心的保卫者们时常感到弹药、燃料和食品匮乏：一切均通过空投。

所有试图对叛匪盘踞地区交通线（喀布尔—贾拉拉巴德）恢复控制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鉴于这种情况，纳吉布拉总统专门致函苏联领导人，请求予以紧急援助：使用以苏联本土为基地的轰炸攻击机对贾拉拉巴德地区的圣战者队伍实施空中打击。苏联政府婉拒了这一请求，但建议他采取其他措施保卫城市。

圣战者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作战战术，而面对面的正规战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用火箭弹袭击缺乏保护的

城市，从事埋伏、暗杀等破坏活动是一回事，组织目标明确的进攻战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此，圣战者还没有准备好。现代城市战会引起人员的大量伤亡，领悟到这一点以后，圣战者开始通过外国教官和倒戈的政府军军官逐渐掌握进攻战的战术。

叛匪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也日趋频繁。坎大哈、赫拉特、捷尔缅特、法里亚博、拉戈曼、加兹尼、霍斯特等省和地区的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开始遭受到有规律的重型炮火射击，货车运输车队和安全哨卡也不断遭到攻击。玛苏德重新封锁了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在南萨兰戈地区内的某些地段，阻挠前往喀布尔的军需品运送。

反对派武装力量装备了一批远程火箭弹武器，得以随时炮击喀布尔，造成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伤亡，这引起了首都居民的消极反应和对赫克玛吉亚尔、塞耶佛等不调和派领导人的强烈谴责。这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观点：只要美国及其盟国和苏联还向阿富汗境内提供军事援助，战争就不会结束。

苏联军队已经离开阿富汗，可战火并未熄灭，而且打得更加残酷了。我们军事顾问的处境也越来越难。如果从前主要依靠苏联军队打击反对派武装力量，那么，苏联撤军以后，这一斗争就变得困难多了。军事顾问大约 30 人，而叛匪在这段时期制定的目标是击溃政府军，把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989 年 2 月 15 日以后，苏联停止向阿富汗供应武器弹药和专用物资。阿富汗政府军开始动用我们在关键地区为他们准备的 3 个月储备军火，但无法长期维持。3 月上旬，由于局势急剧恶化，特别是在贾拉拉巴德，纳吉布拉呼吁苏联政府给予援助，迫切要求恢复军火供应，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整个阿富汗”。

1989 年 3 月 12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军援，责成国防部长组建 6 支车队，每队 100 辆“卡玛兹”

重型卡车，选派自愿的苏联公民充当驾驶员，还要使用苏联的军用运输机“搭建”塔什干—喀布尔空中走廊。瓦连尼科夫大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组织运输和协商有关问题，我们多次前往捷尔梅兹和海拉屯，会晤阿富汗副总统拉菲和有关部门、机构的代表。

紧急调运的弹药和装备，特别是数千套“丸花蜂”火焰喷射器，帮助喀布尔政权在贾拉拉巴德城下守住阵地，击退了叛匪的进攻。阿富汗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宣传攻势，达到了使反对派同意停火，转入谈判的目的。纳吉布拉总统宣布政府军从4月6日起实行停火，共度伊斯兰斋月。

纳吉布拉致函阿富汗各派武装力量和圣战者，强调停火符合阿富汗民族和全体穆斯林的利益。他呼吁阿富汗各派武装力量首领响应政府的和平倡议，通过寻找妥协渠道，在广泛基础上创建管理国家的联合体系。

在坎大哈、南加尔哈尔、扎博尔、拉戈曼、帕克吉亚和捷尔梅特等省，总统会晤了当地部族首领和长老。喀布尔和其他城市著名的宗教权威人士和神职人员做出决定，阐明苏联撤军以后，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进行圣战了，号召全体穆斯林支持民族和解政策，视那些仍在继续制造流血的人为“骚乱者和叛教者”；与喀布尔密切合作的著名宗教人士还公开指责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号召阿富汗的穆斯林展开对“外国入侵者的圣战”，不过没有得到百姓响应。

反对派武装迅速攻占贾拉拉巴德或者其他大城市的计划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这引起了巴基斯坦和美国的神经过敏和焦虑不安。支持反对派的外部势力有自己的道理：倘若人民民主党政权抵御住反对派的武装进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势必会造成一种有利于落实阿富汗领导人就国内外调解阿富汗问题提出的建议的客观条件。那么，反对派就失去了觊觎政权的任何理由，这恰恰是巴基斯坦人、沙特阿拉伯人和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

5月3日，以瓦连尼科夫大将为首的一批将官和校官飞

抵喀布尔，以便考察局势，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稳定局面，并向阿方提出建议。我们会晤了纳吉布拉总统和拉菲副总统，以及阿富汗武装力量的三家代表塔奈、雅库博和瓦坦扎尔。如果说，塔奈是由衷的高兴，并且坦诚地叙述了国内和党内的形势，诉说了“人民派”可能会遭受排挤的担心，那么，雅库博的一番话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仿佛什么意思也没说明。

我们在喀布尔工作了4天，然后去了一趟坎大哈，就返回莫斯科，向苏联国防部汇报了自己的建议。此后，瓦连尼科夫大将再也没去阿富汗，全身心投入到国内问题的研究解决，经常前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南奥塞梯……那些此起彼伏地发生民族冲突的地区。他为苏联的完整和人民的命运操劳，痛心地看着军队在被分化，国家在被肢解。他勇敢地寻觅着摆脱困境的途径，多次以个人名义，或者苏联武装力量陆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上书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书信惹恼了那些“接触不到的人”：“你应该工作，而不是写”。

1989年8月，瓦连尼科夫大将公开站在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失去了陆军总司令职务，并被逮捕，罪名是“参与夺取政权的阴谋，背叛祖国”。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被拘押在著名的“寂静水兵”监狱，接受侦讯隔离。1994年2月23日，根据国家杜马颁布的“政治经济大赦公告”，瓦连尼科夫获释，但他是被告人当中惟一个拒绝接受特赦，坚持要求法庭继续审理自己的案件，并起诉戈尔巴乔夫分裂苏联的人。1994年8月1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认定瓦连尼科夫无罪。在俄罗斯联邦最高检察院对此决定提出异议后，1995年1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召集会议再次审理了瓦连尼科夫一案，认定最高法院的决定有效。在1995年的大选中，瓦连尼科夫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主持老战士委员会的工作。如今，他是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联合会主席，积极从事着社会活动。

……在阿富汗考察局势时我们指出，事情没有按照反对派的设想发展，他们没能在两星期内推翻人民民主党政权，真是事与愿违。虽然没有了苏联的直接支持，政府军还是顶住了圣战者的攻势。敌人甚至无法攻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而他们的“过渡政府”像先前一样，仍然滞留在巴基斯坦。不过，缺乏稳定的均衡状态是不会持久的，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政权注定要失败。

尽管反对派对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的进攻先后被击溃，但他们并没有妥协让步。5月15日，莫贾达吉回绝了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调解并缓和阿富汗局势的建议，认为那是“不能接受的”。他声称：“阿富汗人决定继续以武装斗争反对喀布尔政权，这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决定。”



和棋局面

政府击退了“死硬派”的进攻，并把他们限制在不同区域内。反对派根本不具备实力和能力实现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阿富汗国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棋局面，它使得政治调解阿富汗问题可以成为现实，可是双方均没有找到手段和途径来实现停火、进行建设性谈判。因此，即便是终止住兄弟间的同室操戈，这样的积极结果也没能达到。在贾拉拉巴德、赫斯特、坎大哈、赫拉特等地，圣战者依然如故地频繁进行军事活动，对交通线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反对派把飞机场和航空基地当作首要袭击目标，他们竭力阻断通往喀布尔的“空中桥梁”，封锁住赫拉特、卡拉特、塔林科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这样的省会中心，以围困的手段迫使当地百姓投降。9月份，政府军独立实现了从图拉昆德往坎大哈的军火运输，显示了战斗力的增强。过去，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运送。

总统和政府机构拉拢反对派战地指挥官的努力无果而终。这些人不愿意以一种长期义务的形式把自己拴在一个缺乏稳

定的政权一边，他们同政府签署了协议，得到了一笔资金和武器弹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回到了反对派一边。

喀布尔的苏联代表也穿针引线，撮合政府同著名战地指挥官接触，在白沙瓦、喀布尔和其他地区组织双方会面。7月里，苏联大使沃龙佐夫转递给玛苏德一封亲笔信，建议恢复接触谈判。玛苏德回答说：

沃龙佐夫先生，作为回答您7月31日的来信，我要说，你们的政府过去对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支持成为150多万阿富汗公民死亡的原因。大约还有50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逃往邻国或者其他国家。阿富汗变成了废墟。这种支持只能让你们折辱，数以千计的俄罗斯青年葬身荒原和深山。你们最终不仅遭受了军事失败，还受到了经济损失。

随着苏联新领导人执政和承认过去的失误，人们期待着苏联能够注意到自己的错误方针，放弃在对阿关系中的类似政策。这样，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才会充满和平与安定。

然而，研究最近6个月以来苏联的行为，迫使我们得出遗憾的结论，苏联在阿富汗冲突中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它有意地变换另一种方式，就是以阿富汗人杀阿富汗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认为，战争在持续，阿富汗继续在流血的罪魁祸首是苏联领导人。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革命之初的情况，当时大部分人以为，在超级大国苏联的坦克和飞机面前，阿富汗人民无法进行抵抗，只需几天时间，红军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可是，时间证明武器的力量是摧毁不了人民的意志的。在更多鲜血尚未流淌出来之前，在阿富汗穆斯林和苏联人民之间的鸿沟还没有进一步加宽之前，在苏联领导人面对上帝和历史发现自己的责任已经堆积如山之前，我们要再一次提醒你们，只要妨碍

实现穆斯林人民平等愿望的人民民主党不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只要苏联不彻底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阿富汗的战火就不会熄灭。正如我所言，你们和全世界人民再次目睹了战火仍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它既违背了热爱自由的阿富汗穆斯林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苏联人民的利益。

顺致敬意

艾哈迈德·沙赫·玛苏德 1989年9月2日^①

来信显示，玛苏德仍然是人民民主党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圣战者在阿富汗夺取政权，自然就会实现和平与安定，但事情的发展使他的幻想破灭。

这一阶段，阿富汗总统继续反复提出各种旨在让苏联重新卷入冲突的建议和要求，比如，苏联空军在阿富汗领空进行威慑性演练，情况紧急时对喀布尔附近的叛匪队伍实施轰炸。虽然这条建议没有得到同意，但军事援助照旧进行。

1989年11月5日，纳吉布拉致函莫斯科，阐述了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今后如何行动的想法，同时要求增加武器供应，包括提供最新式的武器、弹药和航空炸弹：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起您多次说过，必要时或者为了交换意见，都可以直接同您联系，我就决定利用这次机会陈述一些当前令我不安的问题……。

最近几个月来的作战经验表明，我们是仰仗空中打击、火炮和导弹打击才得以遏制住敌人进攻的。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型号的弹药已经告罄，通过“空中桥梁”运送过来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为了保证部队的作战需求，在最近半年时间内，特别希望保持“空中桥梁”的作用，把航班数量增加到每昼夜30~35次，这

^① 摘自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档案。

样可以保障有足够数量的弹药运达。恕我再次强调要解决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每天提供10到12枚P—300导弹……。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报有理由认为，敌人会于秋季和冬季加强在喀布尔周围的活动，喀布尔—海拉屯交通沿线的个别地段也包括在内。为了防患于未然，装备使用精确度更高的“旋风”和“句号”导弹是很适宜的，就此我同你们的军事顾问交换过意见。另外，尽快恢复供应“月球—M”型导弹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它的供应中断是始料未及的，其结果导致我们难于远距离消灭进攻喀布尔的来犯之敌。

再有，恢复对空军技术装备的援助也是十万火急的，今年空军损失了70架飞机和直升机。为了提高战斗力，希望提供给我们米格—29、苏—27和米—35武装直升机。

我们正于冬季到来之前在主要大城市为部队和居民进行食品、燃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储备，由于使用频繁，运输车辆的车况已无法满足需求。许多车辆停用，有的是因为缺乏备件，有的则是根本不值得维修。希望依照过去达成的协议尽快从苏联调拨运货车和运油车。

军事领域的上述问题是需要迫切解决的。我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加上我们独立作战以来积累的经验以及军队总体建设的不断完善，必将会给阿富汗武装力量树立更坚强的信心，大大提高他们的反攻士气。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您保证，阿富汗人民对您和苏联人民的友好和感激之情是不会改变的。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前召开的全会会充分显示了我们今天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它得到了广泛支持。在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您都表现出了对阿富汗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此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

相信上述内容将得到您的赞同和支持，相应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在此，谨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70 周年之际向您表示热烈祝贺。祝愿苏联人民在落实您领导之下的广泛革命改革中取得成就。

祝愿您和您全家健康、幸福、万事如意……^①

在 12 月 11 日的回信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苏联的政策是一如既往的，强调指出：

“显而易见，当强硬派在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唆使怂恿下继续奉行极端主义方针之际，对其使用军事压力是迫使敌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的重要手段：阿富汗人之间的对话与和平谈判并非惟一选择。军事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正在国内外两方面为积极的政治解决创造出某些新的机会……”。

“至于反击反对派针对城市和百姓的野蛮袭击，以及击溃他们的进攻，毫无疑问，使用导弹回击意义重大。如您所知，不久以前，苏联方面做出决定向阿富汗朋友追加提供 500 枚 P—300 导弹。特别希望你们以最合理的方式使用这批 P—300 导弹。我要再次强调，这批导弹是我们从苏军部队中间调拨出来的。高效武器——比如‘月球—M’导弹——的供应也已恢复。从今年 11 月底至明年，将向阿富汗方面移交 100 枚这样的导弹。”

“我们重申已经准备好向你们提供现代化战斗机米格—29……。”

“米—35 直升机将在 1990 年第一季度提供。在您的来函中提到的涉及其他武器供应的问题，也正在研究

^① 机密文件保存中心，类别 89，目录 120。

考虑中……。”^①

读者在此会产生一个问题：阿富汗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新式武器并要求提供？是我们的军事顾问“帮的忙”。

……1990年第一季度，阿富汗人觉察到，从阿富汗撤军以后，苏联领导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失去了兴趣。当时存在着一种意见：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坚持3至4个月，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之后就得依靠自己了……纳吉布拉政权的生存超过了这个时间段，所以，苏联的使命仿佛已经完成了。

苏联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后一年，我们对阿富汗的援助开始逐渐削减。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国内局势日趋恶化，而苏联领导人又缺乏驾驭局势发展的能力。1990年2月，在谢瓦尔德纳泽建议下，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停止了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寻找出路，摆脱困境

1991年3月底，圣战者攻占了省城霍斯特，这是他们此类胜利的第一遭。不同的民族部落有不同的遭遇，他们经常被利用于热点地区的军事行动。其中，阿富汗政府军指挥部不顾苏联代表的警告，把由乌兹别克人组成的杜斯托姆第53步兵师投入霍斯特战役，而当地居民都是普什图人。该师在那里陷入重围，逃生者寥寥无几。反对派在自己的宣传中大肆利用2500人的乌兹别克师被歼这一事实，警告说，如果在普什图人的地界内使用少数民族队伍参与作战行动，他们的命运将和这些乌兹别克人一样。始终表现稳定并善于作战的乌兹别克人被包围的原因是，在毗邻地段进行防御的

^① 此文经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文件记录号175/5，机密文件保存中心，类别89，目录120。

一个普什图师不打招呼便擅自撤离，使第53师侧翼出现空虚，人为制造条件使其被敌人包围。事情发生以后，阿富汗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部落队伍公开声明不愿前往普什图族居住地区作战，即使把他们派遣去了，也会在最初几天里开小差。

军中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日益蔓延，“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军政领导机构不得不付出极大精力去消除这种消极倾向。总统的私人代表被派往那些特别不稳定的地区，但采取的措施仍无法使驻防军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普遍提高。失去战略主动的军队无法恢复自信，根本不具备能力对叛匪展开大规模进攻。遏制敌人的手段仍然局限于炮击和空中打击，而圣战者已经逐渐找到了对策。

面对这样的局面，阿富汗领导人制定了新的对外方针，放弃只依赖苏联的路线，加强同西方和周边国家的联系。修改对苏关系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已经陷入经济的和政治的困境，不得不削减了对阿军事援助和其他类型的援助。

纳吉布拉发表的声明中有这样的话：“……今天依靠苏联是困难的，因为它自身存在许多问题。我相信，面对苏联发生的危机，我们正在彻底失去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同美国接近。”此后，阿富汗领导人便开始努力落实这一指示。

1991年3月，纳吉布拉制定的以保留现执政体制为前提的阿富汗和平建议转交给了美国总统布什、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以及肯尼迪参议员。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机构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换，以便积极地寻求接近美国人的途径，同美国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改善关系。另外，还利用了迈克·谢利万博士的斡旋，他是美国一个民间组织“发展政策问题国际中心”的发言人，这个组织研究制定在阿富汗实现和平的计划纲领。

出现了同西欧国家调整关系的迹象。纳吉布拉的亲信频繁前往直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会晤旅居在这些国家的阿富汗知识分子，这些人有机会接触到西欧国家政府要

员和阿富汗“温和”反对派的代表。在欧洲逗留期间，纳吉布拉的亲信还试图寻求一种以政治手段调解阿富汗问题的最佳方案，包括以复兴阿富汗为目的吸引国外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当然，保留纳吉布拉为首的执政体系是前提条件。

阿富汗国内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和军队高层领导的争权夺利削弱了阿富汗领导人的地位，也使纳吉布拉的个人威信空前降低。1991年6月20日卡尔迈勒返回喀布尔以后，“祖国党”内的派系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卡尔迈勒追随者的行为直接构成了执政党分裂的危险，加之所有重大问题由纳吉布拉一个人说了算的惯例经常导致决策失误和背离既定方针政策，也加深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矛盾。

卡尔迈勒的追随者们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反对总统的活动，官职人员中有权势的卡尔迈勒分子处心积虑地在国家政权各级机构中加强本派的实力和地位。

为了达到目的，卡尔迈勒分子同“祖国党”的其他派别和左翼民主组织（阿富汗劳动人民革命联盟、阿富汗劳动人民联盟）结盟。他们的行径自然引起了总统的不安，迫使他采取行动。纳吉布拉获得情报说卡尔迈勒准备废黜他，于是决定采取紧急手段。为了防止1990年3月以塔奈为首的“人民派”公开进行武装起义的那一幕重现，总统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使卡尔迈勒分子丧失了在军中的支撑点。

把奥留米派遣到苏联以后，总统接着又下达紧急命令，打发卢金上将（卡尔迈勒分子在贾拉拉巴德的首脑）去疗养和休息，后者是贾拉拉巴德省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坎大哈省内务部队的指挥官哈里姆和喀布尔驻防军参谋长哈密吉（两人均为卡尔迈勒分子），另有20位将军和校官（都是卡尔迈勒分子）被列入免职名单。

纳吉布拉还寻找借口试图罢免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喀布尔卫戍司令阿齐姆大将，并且在卡尔迈勒势力有影响的贾拉拉巴德、法伊扎巴德、坎大哈和其他省城进行清洗。安全部

队对许多卡尔迈勒分子、人民派分子和官职人员中的左翼民主主义者的行动实施监控，草拟了以帮派活动为借口准备罢免的将校军官名单（这方面的信息专门由总统的追随者们去散布）。纳吉布拉认为恐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而这一切对巩固纳吉布拉政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政府军开始丧失作战能力，在许多指标上落后于反对派武装。首先是部队的作战士气大伤，消极和厌战情绪充斥人心；大规模的倒戈和开小差现象较之过去频繁起来。对付圣战者的手段仍然是炮兵、火箭弹和空中打击。执政当局至此已经不再具备继续抗衡反对派武装的手段和办法，可以说，它还能够调动的力量已非常有限。

阿富汗政府虽然还控制着一些关键地域，但已经无力扭转大局。部队作战能力低下、政治斗争和帮派纠纷持续不断——这些都为反对派扩大军事的和政治的压力、从而最终夺取政权创造了良好条件。

掌握着主动权的反对派坚持要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其首脑继续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在5月份提出的和平调解方案。受他们领导的战地指挥官们重新在一些关键地段对政府机构施加军事压力。他们认为，苏联发生的事情可以促使西方改变自己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张，转而支持使用军事手段解决，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利用圣战者，以在其南部边疆制造动荡局势要挟苏联。

11月，以布尔哈奴金·拉巴尼为首的圣战者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就调解阿富汗问题和交还被俘苏军人员举行了谈判。巴基斯坦为消除阿富汗国内冲突做了积极努力。

美国和苏联也达成协议，自1992年1月1日起，同时停止对纳吉布拉政权和圣战者的军事援助。如何评价这一步骤呢？它仅仅表明，苏联领导人确实放弃了对纳吉布拉的支持，任他遭受圣战者的蹂躏，让他听凭命运的摆布。事情在于，这份貌似公平的协议，实质上恰恰只对圣战者有利。当时，美国对阿富汗反对派的援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那时

对圣战者的武器、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科威特和埃及，所以，圣战者对于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在阿富汗建立有各派政治力量参加的政府机构的建议始终置之不理。纳吉布拉政权只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苏联停止军事援助表明戈尔巴乔夫出卖了自己的盟友纳吉布拉，注定了他的政权只有投降。

终止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声明一经宣布，喀布尔顿时陷入惊慌失措。这一举动被看做是苏联的背叛，也是它自己寿终正寝的前奏。阿富汗的新闻媒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苏宣传。1992年1月，纳吉布拉就实施民族和解政策5周年发表的讲话最终暴露了自己的虚伪面孔。他声称苏联出兵是不符合阿富汗各民族利益的，并且成为阿富汗人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导致了悲剧。他宣布苏联完成撤军的那一天——2月15日——为阿富汗民族解放日。

1991年底，阿富汗的局势已经呈现危机征兆，人人知道现政权气数已尽，末日屈指可数。



纳吉布拉政权垮台

自1992年年初终止供应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起，阿富汗局势急剧恶化，很快便具有了崩溃的特征。随着苏联于1991年年底解体，纳吉布拉失去的不仅是支持和援助，他还彻底丧失了起死回生的可能。从精神上讲，其摧毁力更强。

巴基斯坦不顾美苏关于对阿富汗交战双方同时停止军事援助的协议已经生效，继续从自己领土（帕拉奇纳尔、斯彼瓦姆、米拉姆沙赫）向圣战者提供武器弹药，规模有增无减。贾拉拉巴德东南75公里处巴基斯坦境内的兰吉—科塔尔被用作大型转运基地，这就为反对派给政府军施加压力注入了底气。于是，反对派领导人开始实施一项原本拟于苏联撤军后立即着手实现的计划，当初之所以未得手，就是因为纳吉布拉还仰仗着苏联的强有力支持。

反对派在喀布尔的地下组织加强了暗杀活动和破坏活动，在百姓中制造恐慌情绪，让人们看到政府连城里的秘密活动都无力控制。首都的不少街区接连发生爆炸事件……。

燃料和食品已经严重匮乏，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反对派力量一方面破坏政府对生活必需品的应急补给措施，一方面利用在春夏季被俘的政府军官兵积极进行颠覆和宣传活动，这些人在金钱诱惑下，加入反政府宣传行列。

反对派领导人还利用形势收买政府军官兵，特别是指挥员。阿富汗伊斯兰党总部划拨给北方部队、东北方向部队和洛加尔方面战地指挥官的现金多达 10 亿阿富汗尼。在其他省，叛匪主动同政府军军人接触的事情频繁起来，他们引诱后者倒戈，或者借机获取武器弹药。在战略要冲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和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反对派武装都施加了军事压力。海拉屯—喀布尔、沙尔汗—巴戈兰一线的局势也日见吃紧。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在巴尔赫、萨曼甘和昆杜兹的战地指挥官接到总部指示，加强监控，每天通过无线电汇报自海拉屯、沙尔汗至喀布尔的货运车队情况。玛苏德给活跃在公路沿线的属下指挥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有计划地袭击运输车队，截取物资。

不过，对纳吉布拉而言，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国家北部地区。这要归罪于他自己推行的亲普什图民族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国家北部地区发生了民族矛盾大爆发，普什图人强迫其他民族接受他们条件的企图遭遇到少数民族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导火线从来都小事：纳吉布拉试图罢免驻扎在海拉屯的国家安全部队第 70 旅旅长穆米恩将军（乌兹别克人），用一个普什图人接替，穆米恩的拥护者们公开站出来反对军官阶层的这种普什图化。当前部长会议主席、哈扎拉族领袖之一克希特曼在喀布尔的一次恐怖事件中被手枪击成重伤以后，局势急剧严峻起来。有关特工人员参与暗杀行动的传闻使北方的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也使全国形势迅速恶化。毕竟，克希特曼在被刺前夜接受 BBC 记者

采访时申明，少数民族权利得到保障和普什图领导人同其他民族代表分享权利之时，才是阿富汗实现和平和统一之日，他呼吁联合国承当这些条件的保证人。

北方省份发生的事情对喀布尔的局势起到了扰乱和破坏的作用。在军人和社会各阶层中间，有可能转变为武力冲突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膨胀。在喀布尔的特别行政管理区内，叛匪继续组织破坏小组，对住宅楼、部队阵地、机场和首都的其他军事目标实行火力袭击。

反对派还组建了精干的作战分队，在首都的第一道防御线上同政府军鏖战，而其他队伍在不同地区继续扩大着武装斗争的规模和范围。圣战者还不失时机地在驻防军中间开展策反工作，劝说他们相信抵抗没有意义，应该倒戈过去。

我军的最后4位军事顾问是4月13日离开阿富汗的。拉格申少将对我叙述道：“临行前一天晚上，纳吉布拉把我请到家里，他说苏联军事顾问必须火速撤离阿富汗，政权将在最近几天移交反对派，总统位子他只能再待5天。纳吉布拉还补充道，尽管他已经把苏联人当作背叛者，但仍视安排苏联军事顾问安然无恙地返回家园为自己的义务。纳吉布拉没有食言，当喀布尔机场的管理人员以种种技术故障为借口拖延起飞时间时，他亲自赶到机场，协助我们飞往塔什干。”

圣战者占领了除喀布尔以外的所有地区之后，开始向首都推进。玛苏德的兵力集中在了喀布尔特别管理区域的北部和西北部方向，以及米尔巴恰科特、沙卡尔达拉和杰希萨博县，其先头部队直抵喀布尔外围防御线前哨阵地。阿富汗伊斯兰党的人马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从南面逼近首都……。

在喀布尔成立了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领头人为外交部长阿卜杜勒·瓦吉尔，他是另外一个反对总统的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之一，这个委员会认为总统是联合国框架内调解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妨碍因素，并要求他辞职。

联合国代表贝农·谢万也在劝说纳吉布拉辞职，并担保

他和家人的安全，建议他们乘坐联合国的专机飞往任何国家。然而，总统无法使用他的专机，因为喀布尔机场已经在杜斯托姆控制之下，谢万的承诺没有兑现。相信了联合国代表的纳吉布拉已经毫无选择，只得同自己的家人以及助手图辛和兄弟贾伏萨尔一起躲藏进联合国使团所在地，在那里像囚徒一样待了几年。

我们离开阿富汗时，纳吉布拉曾经说过头三四个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下来，他们就能够统治住阿富汗。实际上他们坚持了3年多。面对依靠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支持的反对派的联合势力，又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孤立无援的纳吉布拉政权终于经受不住打击，垮台了。

纳吉布拉离开政治舞台以后，阿富汗政局朝着有利于反对派的方向急剧转变。

国家的政治领导临时由一个5人“核心组”担当，为首者是瓦吉尔。总统职责由4位副总统哈杰夫、拉菲、莫赫塔特和索拉比共同履行。

瓦吉尔试图通过谈判与玛苏德合作，实现国内和平。不过，“祖国党”领导人极力标榜自己在一些重大事务中的特殊作用，在百姓和圣战者中间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阿富汗新领导人”实际只在喀布尔市内维持了自己的政权，玛苏德同赫克玛吉亚尔两支力量之间在首都地区的矛盾日益突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战地指挥官同喀布尔驻防军的指挥部相互配合策应。根据玛苏德的指令，政府军炮兵对洛加尔地区、西南方向和西部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作战人员集结地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普什图部落长老召集会议讨论时局，与会者对北方少数民族代表和阿富汗武装力量指挥部代表在国家领导机构里的影响日渐扩大表示了焦虑，普什图人对此均有强烈反响。会议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给普什图族人民武装单独划拨武器装备，以对付玛苏德、杜斯托姆、纳杰里和哈

扎拉人可能夺取政权的企图。不过，与会者放弃了在首都进行军事对抗的提议，而倾向于从其他地区调集普什图人来首都。

哈扎拉人也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他们赞成与各派作战队伍合作，以期在首都势力范围划分中赢得自己的那一份，并且能在新政府的各级机构里获得足够的代表名额。他们也计划通过从外省向首都调集本族人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4月下旬，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圣战者的影响遍及全国之际，反对派从政府手里夺取了对最后一批省城的控制权：贾拉拉巴德、米杰尔拉姆、加尔捷兹和坎大哈。各地组建了以民族成分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机构。

4月21日，玛苏德召集属下战地指挥官开会，重申了自己的决心，就是要在联合国保护下将消除冲突的和平方案贯彻到底，同时警告“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首领不可轻举妄动，他“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保护好喀布尔”。玛苏德再次声明，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同前喀布尔政权对话，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防止首都发生流血。

玛苏德希望大家相信，阿富汗未来的国家体制将是自由的伊斯兰体制，前党和国家机构的高级领导干部将不受任何追究地被解职，而中层和基层公务人员都有机会留任公职。

喀布尔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参与工作的有玛苏德、杜斯托姆、纳杰利和阿富汗伊斯兰统一党的代表。采取紧急措施封锁交通要道，防止各个反对派的极端主义分子和人员擅自结伙闯入喀布尔。

玛苏德和杜斯托姆的人马在喀布尔住宅区进行了大规模围捕搜查，想迫使“阿富汗伊斯兰党”的追随者在未来的冲突中只能保持中立。激烈的枪战发生在首都的新旧住宅小区、巴拉一希塞尔古堡、外交部大楼和市政府门前，以及迈万特大街、总统宫周围……德国使馆和保加利亚使馆都被迫击炮弹击中。

宣布成立了由玛苏德的战地指挥官和北方少数民族武装

代表组成的“喀布尔圣战委员会”。它全权担当起市政府的各项职能，其中包括维护市内正常秩序。

采取安全措施来保证“圣战者临时委员会”首脑莫贾达吉能够准时从白沙瓦抵达喀布尔。



阿富汗新领导人莫贾达吉

4月27日（特地计划在四月革命14周年这一天），“圣战委员会”（或曰“圣战者临时委员会”）主席、阿富汗伊斯兰国家元首莫贾达吉在喀布尔的外交部接受前政府代表移交权力。

莫贾达吉分别会见了参加仪式的各国驻喀布尔代表机构领导人，并逐个进行了秘密谈话。同俄罗斯大使的会晤在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进行。大使转达了俄罗斯领导人的祝贺，莫贾达吉对阿富汗发展同俄罗斯以及独联体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表达了良好愿望。

玛苏德领导着“喀布尔安全保障委员会”，同时代理国防部长职责，原政府军喀布尔卫戍部队被他收编于自己麾下。

城里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玛苏德颁布命令撤除“阿富汗伊斯兰统一党”、“阿富汗伊斯兰运动”和“阿富汗圣战者联盟”等派别的作战队伍，以及杜斯托姆的童子军，把他们置于“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和“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党”的完全控制之下，由玛苏德的精锐部队和喀布尔卫戍部队独立分队执行巡逻任务。这些做法被其他党派的圣战者视为在首都削弱他人实力……。

5月6日，“领导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解散原政府内阁、国家全部、“祖国党”和民族委员会两院，同时废除了所有相悖于伊斯兰准则的法律法规。根据“领导委员会”的决议，组建了临时宪法起草委员会。新宪法必须完全符合伊斯兰法典原则。在省城和县中心，开始动工兴建清真寺，部分全民义务教育学校改建为中等伊斯兰宗教学校。

绝大部分省份相继承认了在喀布尔成立的中央机构，只有东部和东南部个别普什图人居住稠密地区例外。

战争似乎走到了尽头，圣战者的所有首领都异口同声地宣称确立和平与安定的日子来到了。谁料，就在圣战者内部，昔日反对派阵营的战友和伙伴之间突然爆发了更加猛烈的战争。还存在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普什图人同少数民族代表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

赫克玛吉亚尔拒绝承认莫贾达吉和拉巴尼全权享有他们所占据的位置。这一阶段，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领袖主要致力于团结积聚本方力量，在那些担心失去优越地位的普什图派别中间寻觅自己的同盟者。

后来，武装冲突在掌权的圣战者和没掌权的那些圣战者之间继续着。穆斯林和穆斯林同室操戈，兵戎相见。尽管这时的“圣战”早已背离初衷，但伊斯兰各党派领袖还是找到了其他辩护词。

7月底，“阿富汗伊斯兰联盟”首领拉巴尼取代莫贾达吉坐上“圣战委员会”主席的交椅，战事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立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没有讲完最后的话。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不能坐视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权机构里不合比例地占据多数席位，更何况，许多圣战者领袖依然如故地遵循着自尊自大的处世原则，每个人都想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对纳吉布拉政权的否认。对拉巴尼采取不妥协立场的“阿富汗伊斯兰党”领袖赫克玛吉亚尔为夺权果断发动了战事。

1992年8月，喀布尔遭到密集的炮兵和火箭弹袭击，大批房屋被毁，百姓中间出现了无辜伤亡。不少炮弹落入俄罗斯使馆院内，并造成人员伤亡。阿富汗首都这次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多年内战期间喀布尔蒙受损失的总和。喀布尔人犹如思乡那样回忆当年在苏联军队保护下，他们过着安定的日子。

8月底，首都无辜死亡者的数字已经超过了2000人，

伤员数以万计，20多万人逃离了喀布尔。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决定撤离使馆人员。当时，包括联合国代表处在内，绝大部分国家都撤走了自己的外交人员。

1992年12月，拉巴尼在人民代表全权大会上当选为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赫克玛吉亚尔和追随他的其他圣战者组织抵制了这次选举，他们展开作战行动反对喀布尔政府。

1993年3月，阿富汗实际形成了南北割据的局面：赫克玛吉亚尔控制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南方政权和拉巴尼、杜斯托姆领导的北方政府。

在1994年1月喀布尔发生激烈战事期间，除了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朝鲜和巴勒斯坦留驻了少量外交人员以外，此前尚有使馆人员留守的国家，这次都全部撤离。

赫克玛吉亚尔同杜斯托姆是在这一年2月携起手来一道反对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的，他们发动武装进攻对付拉巴尼。战地指挥官们占山为王，在自己控制区域内确立了传统形式的地方自治。



阿富汗战争没有尽头—— 塔利班的崛起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阿富汗已经不复存在。在少数民族立场的明显作用下，它转变成为以民族、部落和部族特征相互区别的、总体面积不大的纷乱堆积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重新动员起普什图人的力量。“塔利班伊斯兰运动”应运而生，它作为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亮相，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迅速展开了权力重新分配的斗争。

早在80年代末，建立“塔利班伊斯兰运动”的基本理论就已奠定。那时，在巴基斯坦和美国情报部门对抗苏联在阿富汗影响的计划中，圣战者的首脑们还没有受到重视。通过

安插于联合国的情报人员协助，美巴情报部门在巴基斯坦领土内的阿富汗难民营进行了适用于组建国家强力部门和行政管理机构所需的军事专家和民用专家的挑选、考察和登记。

从1994年起，巴基斯坦领导人就利用前苏联领土内发生社会政治混乱而出现的有利局势，加强活动巩固自己在独联体中亚国家的影响以及以此为目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密切同这一地区的关系。1994年夏季，巴基斯坦内务部和跨部门侦察情报局在本国西北边境省份把3000名普什图族的宗教中等学校学生组建成为军事化团体，其为首者是阿富汗宗教界领袖之一、毛拉塞义德·穆罕默德·奥马尔（阿洪扎达），这个团体就被冠名为塔利班（宗教学生的音译）伊斯兰运动。

在这一运动的创建阶段，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便致力于在阿富汗主要派别武装力量争权夺利的内讧中间制造矛盾。阿富汗普什图人领袖、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赫克玛吉亚尔由于执意使用火箭弹袭击喀布尔并与毒品生意有瓜葛而威信扫地。另外，该党大多数追随者是北部和东部部落代表（帕克吉亚、南加尔汗尔、拉戈曼、巴格兰、帕尔万和昆杜兹省）。这样一来，坎大哈分支的普什图人作战队伍便成为运动的主力，不过其中包括作战能力较差的“阿富汗民族统一战线”和“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的队伍。由于巴基斯坦方面大幅度减少了对赫克玛吉亚尔的军事援助，1994年夏季，喀布尔地区 and 阿富汗东部、北部省份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属下的作战队伍有半数投靠了塔利班，转而追随塔利班的还有“人民派”中的大部分普什图人和退役的巴基斯坦军人。简而言之，大部分普什图人都改换门庭。

主持“塔利班伊斯兰运动”日常运作的机构称为“舒拉”^①，大“舒拉”为60人，小“舒拉”为27人。毕业于巴基斯坦神学院的毛拉奥马尔成为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为了提高塔利班运动在信徒中的威信并迎奉奥马尔的野心，亲

塔利班的宗教界举办仪式，封奥马尔为“全体穆斯林的领袖”。从有关情报得知，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乌萨玛·本·拉登。塔利班的领导核心只有几个人：毛拉哈桑、毛拉艾赫萨奴拉、毛拉豪斯、毛拉阿巴斯、毛拉拉巴尼、毛拉梅什尔等。进入运动领导层的还有阿富汗南部的著名人物大毛拉阿卜杜拉泽克、尤奴斯·哈利克，毛拉穆罕默德·乌马尔·阿洪。大“舒拉”和小“舒拉”的所有决定均需集体通过。

塔利班运动正式宣布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解除阿富汗境内所有派别的武装，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把少数民族（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代表从国家政权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

然而，也有人认为，塔利班的真实任务在于，为西方公司实现铺设从中亚经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计划创造条件，这将使美国及其盟国获得一条完全绕开伊朗和伊拉克的动力资源保障渠道。该项方案总投资为200亿美元。对实施它感兴趣的国家有美国、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塔利班所有的军事装备和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专业人员（喷气机和直升机驾驶员、坦克车长、炮兵班长等）的培养训练均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克维塔营地进行。巴基斯坦内务部长纳斯卢拉·博巴尔和军事情报部门领导人负责全面协调军援。塔利班队伍中有许多巴基斯坦军事顾问，毛拉沙菲和毛拉阿卜杜卡德尔分别领导两支作战主力。

1994年11月，塔利班武装首次出现在阿富汗领土上。当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经签订了卡拉奇—克维塔—坎大哈—赫拉特—库什卡过境运输协议，塔利班武装夺回了被圣战者截获的一支从克维塔前往库什卡的马帮队，并乘胜攻克坎大哈，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南方一些省份。至1995年3月，塔利班武装已经包围了喀布尔，不过在政府军面前，他们吃了败仗，并于4月份后撤。9月，塔利班攻占了申丹特空军基地和赫拉特，将克维塔—库什卡交通线置

于自己控制之下。

后来，塔利班在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利用人民的厌战情绪和纳吉布拉政府军的大规模开小差现象，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就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并企图向北方扩大自己的影响。圣战者派别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使普什图民族威信扫地，普什图人对此已厌恶到极点，所以把塔利班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这一令人惊奇的现象说明，塔利班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就获胜了，它使对手相信，屠杀真主的学生——这是最沉重的罪孽。

10月，攻占喀布尔的企图彻底失败以后，塔利班便在毗邻地区开始了同首都对峙的阵地战。1996年3月，他们试图再次进攻喀布尔，但被玛苏德组织的反攻所击溃……。

看来，塔利班运动是美国和巴基斯坦巧妙玩弄的地缘政治勾当（普什图是一张牌），旨在同时对付印度、伊朗、中亚国家和俄罗斯。

1996年夏季，通往首都要冲的阵地战持续不断。9月13日，贾拉拉巴德被攻陷。9月27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宣布推翻拉巴尼政权，建立“以伊斯兰教法典为基础的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首都居民怀着结束亲兄弟自相残杀的愿望迎接了他们。但是塔利班在阿富汗首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使用中世纪的酷刑惩罚受联合国保护的前总统纳吉布拉和其兄弟艾赫玛扎，他们被金属链条抽打至死后，还被悬尸街头。

我回想起瓦连尼科夫将军同纳吉布拉之间的一次谈话。纳吉布拉曾经预见了类似的收场，他说，阿富汗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政权发生更替时一定要杀人。1997年夏天，玛苏德在接受《绝密报》记者米哈伊尔·玛尔凯洛夫采访时说：“我和纳吉布拉是站在街垒两端的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他总是希望消灭我们，我们相互间是敌人。不过苏联军队离开阿富汗以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些。”

“他为了逃避塔利班，被迫躲藏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和平

使团内。我们非常清楚，他绝无出路。我们并不希望他死，请相信我。离开喀布尔的那天，我们曾经建议纳吉布拉一起走，然后帮助他前往他想去的国家。”

“他婉拒了，知道嘛。纳吉布拉感谢了我们，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留下两名保镖。这两个人后来也被杀了。纳吉布拉以为自己是普什图族，又藏在联合国和平使团驻地，塔利班不会动本族人。另外，还传说纳吉布拉构思了一个在塔利班帮助下重返政坛的计划，后来的事情表明他是大错特错了。纳吉布拉是被金属链条殴打至死的，还被挖出双眼，暴尸街头。得知他的死讯后，我们把塔利班的这种行为看做是违反人道主义和亵渎宗教的，这是禽兽不如的暴行，但绝不是真主的意愿。我们确实爱莫能助。”

纳吉布拉被杀第二天，他的亲属来到喀布尔，运走了尸体，在众多百姓参与下，把他体面地下葬在出生的村子里。

1996年12月3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莫斯科逝世，这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最后一位总书记，也是他们当中惟一个病逝，而非死于非命。葬礼在位于卢布廖夫大街的克里姆林宫中央医院追悼大厅举行。卡尔迈勒的战友在葬礼上发言，赞扬他在为争取自由进行的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发誓要继承他的事业。没有一位俄罗斯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尔后，亲属将他的尸体用飞机运送回了阿富汗。根据遗嘱，卡尔迈勒被安葬在了海拉屯。这样，20世纪阿富汗的统治者当中，只有3个人，即阿玛努拉·汗、扎希尔·沙赫与卡尔迈勒避开了横死的命运，而且他们都是因为侨居国外才幸免于难。

塔利班以“清除”国家存在的强暴、杀戮和无法无天为口号，不但没有给予几百万阿富汗人许诺的解放，而且使他们陷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残酷时代。塔利班在控制区内确立伊斯兰法典法律。小偷被割下手指或者手腕，录像机和电视机（是魔匣）一律被销毁。颁布规定，女孩不得离家学习，女子不得离家务工，置许多寡妇于饥饿边缘。女人必须

身着从头盖到脚面的传统伊斯兰服装并由男人陪伴才能上街……阿富汗在历史上进行了若干次改革的尝试之后，这次竟拒绝了进步。

支持拉巴尼的以玛苏德为首的武装力量不战自弃喀布尔，在自己的传统地区巩固下阵脚。掌握了战略主动的塔利班试图把他们从那些地区赶出去。这时，玛苏德表现出了战地指挥官的成熟：他同杜斯托姆和哈扎拉人结盟，携手反对普什图人的进犯，并予以反击，阻止了塔利班推进。哈扎拉人公开持有反塔利班立场，指责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哈扎拉人的伊斯玛仪派领导人加入了反塔联盟。

1996年冬季至1997年春季的军事态势具有试探性质，双方各有胜负。

1997年5月24日，“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国际联络部主任阿卜杜勒·玛列克·帕赫拉万将军在北方举兵反对该党领袖杜斯托姆，阿富汗军事形势再度急剧恶化。杜斯托姆被迫逃往土耳其。塔利班借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一举攻占了北方省份法里亚博、扎乌占、拔尔赫和昆杜兹。

阿富汗总统拉巴尼转移到法里亚博，并求救于塔吉克斯坦领导人，请求允许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建立“阿富汗流亡政府”，不过遭到了拒绝。

面对塔利班解除其武装和以武力在北方建立残酷的伊斯兰秩序的企图，“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的队伍和视塔利班为散布伊斯兰激进主义、制造民族纠纷的普什图占领者的当地乌兹别克人参与起义，并决定给予塔利班部队迎头痛击，迫使其退出占领的省份。

5月27日至28日，遭受回击的塔利班部队被重创，昆杜兹、拔尔赫、扎乌占和法里亚博4省被收复。塔利班方面阵亡1500人，被俘3000人，其中包括塔利班部队指挥员大毛拉阿卜杜拉泽克、塔利班赫拉特省指挥员毛拉阿卜杜勒·瓦西德，以及若干巴基斯坦公民。在随后的日子里，“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的队伍又夺取了巴德吉佐姆和赫拉特部

分地区，援助当地起义百姓。

在喀布尔方向，塔利班部队试图通过萨兰戈向北推进，但遭到玛苏德队伍的顽强阻击，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不得不停止行动。先期用于在北方地区确立秩序而通过萨兰戈投入的大量塔利班部队在普利—胡姆利附近陷入包围。是玛苏德戏弄了塔利班，他故意先把他们放过山口，然后切断供给渠道，将这部分人与大部队分隔开，最后各个歼灭之。

占领普利—胡姆利以后，法西姆将军和伊斯玛仪分子纳杰里率领玛苏德部队在巴格兰和昆杜兹方向乘胜追击溃逃的塔利班部队。其中一部分向“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战地指挥官巴希尔投降，其余人马在亲塔利班作战队伍配合下占据了昆杜兹城和机场。

玛苏德控制着潘捷舍尔峡谷和萨兰戈山口的主要地段，占据着玛赫姆德拉吉、贾巴尔—乌萨拉吉、恰利卡尔等行政中心，以及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的人马又相继攻占了塔加尔、尼日拉博和苏卢比，切断了重要的喀布尔—贾拉拉巴德战略动脉。塔利班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增援后，曾一度恢复了对交通线的控制，但不久玛苏德再次攻占了苏卢比。另外，站在反塔利班联盟一边的原南加尔哈尔省省长卡德尔的部下控制了贾拉拉巴德—白沙瓦干线的一些路段，以及诺兰格。

在庫纳尔省，塔利班还失去了阿萨玛尔。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恰利卡尔、贾巴尔—乌萨拉吉、古尔巴霍拉、普利—胡姆利和昆杜兹地区。政府军最终控制了这些地区。塔利班从迈丹沙赫尔撤退以后，喀布尔便处于一个半圆形包围圈内了。

这时，北方省份（巴尔赫、法里亚博、扎乌兹占、巴德吉兹和萨曼甘）已经处于帕赫拉万将军控制下。另外的省份则掌握在玛苏德手中，巴米扬省和古尔省的部分地区处于“阿富汗伊斯兰统一党”卡里姆·哈里里的什叶派队伍控制下。在阿富汗西部的伊朗边界地区，伊斯玛伊尔—汗的追随

者们同塔利班鏖战着。领土的其他地区仍掌握在塔利班手中。这样，阿富汗北部重新回到少数民族手里。军事冲突仍以阵地战为主要特征。

塔利班领袖毛拉奥马尔在喀布尔召集领导层开会，他建议重新研究在被占领土上推行的残酷政策，认为贯彻原来的方针政策会导致反塔利班情绪的进一步升温。他还主张同以玛苏德和帕赫拉万为首的阿富汗民族解放联合阵线进行对话谈判。

9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的阿富汗问题特使易卜拉希姆在德黑兰会晤了“阿富汗伊斯兰运动”的莫赫谢尼赫和“阿富汗伊斯兰党”的赫克玛吉亚尔，建议他们在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协助下组建有阿富汗各党派和运动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和领导委员会，负责收缴居民手中的武器和取缔非法武装组织，并在全全国实行民主选举。但同以往一样，仍然是只有宣言，没有行动。

9月中旬，塔利班进攻海拉屯得手，第70步兵师被迫撤出。反塔利班联盟建立了以杜斯托姆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着手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被塔利班占领的北方居民区。玛苏德部队在昆杜兹采取了攻势。9月13日至17日，塔利班向那里空运了3000名作战人员。同时，1100名巴基斯坦军人抵达喀布尔，而“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队伍控制了玛扎里—沙里夫—什巴尔甘交通线。

“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领袖们在普利—胡姆利和法里亚博两地多次召开会议（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和安全部长胡洛耶夫受邀与会），讨论如何克服相互间矛盾，制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共同立场，并做出决定，帕赫拉万留任“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主席，杜斯托姆为副手。

9月底，“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占据了捷尔缅特外围的阿姆达里河湾，但海拉屯仍在塔里班手里。来自伊朗的大批物资、技术装备和弹药运达玛扎里—沙里夫，其领头

者宣称支持反塔利班联盟……。

10月初，巴尔赫省从塔利班手中完全解放出来。将近千名为塔利班作战的人被俘，其中的阿富汗人被就地枪决，而巴基斯坦人则被押往专门的集中营。昆杜兹、海拉屯、塔什库尔甘地区和喀布尔方向的战斗异常残酷激烈。政府军开始进逼塔利班部队，一部分先前支持塔利班的普什图部落相继退出战斗，在坎大哈甚至也出现了反塔利班进攻。

政府军最终攻克了昆杜兹和海拉屯，塔利班开始从北方溃退。然而，“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领导层把9月至10月政府军在玛扎里—沙里夫和海拉屯地区的作战失利归罪于帕赫拉万将军，指责他分裂阵线领导层、背叛阵线利益。帕赫拉万被迫离开了北方省份。杜斯托姆在什巴尔甘扎下根来，哈扎拉人在玛扎里—沙里夫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经过冬季的间歇以后，塔利班在1998年夏季重新在北方展开了强大攻势，接连攻占了玛扎里—沙里夫、什别尔甘、塔什库尔甘、普利—胡姆利等北部行政管理重镇，把“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部队逼进了山区。塔利班进犯到了独联体国家边境线。塔利班在控制区域内推行残酷的伊斯兰秩序，实行宗教的和民族的清洗，在玛扎里—沙里夫他们炸毁了什叶派圣者阿里·玛扎里的墓地。“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部队实际上是不加抵抗地放弃了自己控制的地盘，据守在潘捷舍尔和哈扎拉贾特，以惯用的游击战战术对付敌人。

塔利班占领伊斯玛仪派祖传巢地凯安·伊玛—萨希博—巴格兰省省城以后，屠杀了大部分平民百姓，毁掉了村庄、学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塞义德·曼苏尔·诺吉里和其他伊斯玛仪派的领导人被迫出走他乡。

老百姓最初对塔利班的一些正面印象迅速转变成了失望。他们推行的秩序实际上是古代残余和宗教偏执的混合物，是不能被阿富汗社会所接受的。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的表现可以看到恢复普什图人特权的企图。如果是这样，那么毫无疑问，塔利班的激进主义定会逐渐衰亡消失，国家仍将生存在传统的法规下。

1990~2000年，阿富汗的力量分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尽管反塔利班联盟内部的局势表现为主要军事政治派别领导人之间再现互不信任，甚至发生了地方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公开冲突，但塔利班和“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依旧控制着各自的地盘。杜斯托姆放弃了同塔利班的积极斗争而移居国外。

就整个阿富汗局势而言，其特点仍然是“阿富汗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同“塔利班伊斯兰运动”之间的军事对抗。塔利班领导人不顾双方就和平调解国内局势进行过一系列谈判和协商，继续采取步骤和措施，为武力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条件。

国内战争进入螺旋线的新一圈，具有了持久的性质。今后局势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不同情况：双方领导人就划分势力范围和建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武装冲突升级，受到不同政治力量和外国支持的对立双方试图消灭对手并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塔利班领导人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他们计划展开大规模武装进攻，彻底消灭反塔同盟。2000年年底，他们便实施了一次这样的计划。不过，在玛苏德率领下，反塔同盟相当成功地抵御住了塔利班的进攻。北方联盟积极破坏塔利班计划的实现，稳守自己的控制区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战争还能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国外的军事和政治援助的性质。2001年9月9日，两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本·拉登授意下对玛苏德采取了恐怖主义暗杀行为，它可能会对阿富汗国内战争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两人装扮成记者采访玛苏德，实际携带了爆炸装置。引爆后记者双亡，玛苏德遭受致命创伤，终因不治于9月14日去世。第二天，他被当作阿富汗民族英雄安葬在了家乡潘捷舍尔的占贾拉克村，数千人前去为这个为了阿富汗人民

的自由和繁荣贡献自己生命的人送行。这次事件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恐怖分子没有民族性和宗教信仰。伊斯兰杀手卑鄙无耻地杀害了忠实奉守穆斯林法规和传统的玛苏德，这一损失对反塔联盟来说很可能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塔利班也极有可能完全控制阿富汗。

美国转变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方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意义。塔利班告诉世界，他们没有受到什么监控。他们的行径遭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谴责。美国人严重失算，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普什图人是那么热爱自由，尽管支持塔利班的动机可以理解：拉巴尼执政多年，却无法团结起全民族制止妨碍美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混乱状态；较之“输出伊斯兰”的伊朗原教旨主义，塔利班的危险性要小得多；塔利班许诺组织反对毒品和恐怖主义斗争；他们曾向美国人担保自己能够在中亚占据主导地位；塔利班若获胜，华盛顿可以同北京玩伊斯兰牌；较之因德黑兰对拉巴尼政府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为难的伊朗、印度和中亚国家联盟来说，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更受重视。

但是，美国人最初选择的途径演变成为无所不及的灾祸。被塔利班征收百分之十政府税的鸦片生产创造了世界纪录，为净化伊斯兰而采取的极端主义斗争手段抛弃了人权原则，连与华盛顿亲密的盟国也不愿意承认塔利班政府。他们摧毁了阿富汗领土上所有先于伊斯兰问世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化古迹和遗产，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野蛮本性。

对塔利班武装力量基地实施导弹袭击表明，美国自己也越来越远离对塔利班的支持。这方面，俄罗斯同美国有着共同利益。2000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在俄罗斯和美国建议下对“塔利班伊斯兰运动”实施武器禁运和停止提供可以制造可卡因的化学原料。2001年9月11日，极端主义分子在纽约和华盛顿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行动，导致数千无辜者身亡，美国对塔利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强硬立场。塔利班将

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策划嫌疑人乌萨姆·本·拉登隐藏在了自己的领土内。美国人对塔利班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交出地球上头号恐怖分子头子，否则将给予报复。

除了境外的支持，塔利班能够持续进行武装斗争的经济基础就是毒品生意。在塔利班控制地区内，毒品生产的规模大约为数千吨。阿富汗成为向西欧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输出毒品的最大提供商。毒品运输线路沿途地区不稳定的局势对塔利班最有利，“浑水中才能摸鱼”。

阿富汗的国内冲突预计还要持续下去。但不管战争进行多久，其结果都会是这样的：传统的、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和强有力的、相互间签署协议、进行横向配合的地方（外省）统治者（大约是控制着一定地域的、替代了地方上传统的部落领袖的战地指挥官）……为了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他们自然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免遭中央政府的侵害，不论什么样的中央政府。只有各民族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国家的统一才能保持下去。无论塔吉克人还是乌兹别克人，非普什图群体代表很难在国家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普什图人仍将在政权机构中享有较大影响，可能会在保留了普什图优势地位的“阿富汗同一民族”框架内实现相对的民族平等。我想，这是一个可以保证稳定的、能被广泛接受的局势发展的可能结果。

什么样的力量能保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呢？显然是那些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这将是一支爱国主义倾向的联合力量——普什图部落有威望的领袖、知名的神职人员、“人民派”和“旗帜派”的代表、属于“同盟—7”和“联盟—8”的伊斯兰各党派战地指挥官、哈扎拉人和伊斯玛仪教派信徒的代表……重要的是为了阿富汗，为了共同事业团结起来。实际上，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出努力。

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根据民族性建立若干自治的地方政权或国家（普什图、乌兹别克、塔吉克、哈扎拉）。由于把普什图问题搁置到一边，这也是巴基斯坦愿意接受的。

同时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在阿富汗出现一个邦联制国家，或者兼顾本地区各派实力均衡现状因素的其他形式的政权。还有可能在阿富汗领土，包括部分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和塔吉克领土，以民族属性形成新的国家：普什图斯坦、哈扎拉斯坦、俾路支斯坦，塔吉克斯坦联盟、乌兹别克斯坦联盟等。形成的过程会极其漫长，许多方面取决于外部势力追求的利益，首先是美国，还有西欧和伊斯兰国家。但无论如何，普什图人未必能重温历史上自己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的辉煌，后者不会放弃自己的战果。总之，还要看少数民族头领是否善于谈妥相互间的重要事情，他们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随时都可能瓦解，因为其基础是反普什图主义。面对弱不禁风的联盟，一旦塔利班积蓄了力量就会卷土重来，甚至能控制整个阿富汗。不过，那时战争仍不会结束，少数民族武装将展开游击战。

显而易见，阿富汗人自己不会停止战争，必须注入外来机制迫使交战双方媾和。这方面，国际社会是有经验的……。

▼ 阿富汗战争之总结和经验教训

苏联政治领导人所确认的军事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战略目标含糊不清的，这给那些居心叵测的家伙提供了口实，使他们接长不短就谈论苏联军队在协助阿富汗政府进行内战时遭受的失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某些气焰嚣张的头头也声称他们给了苏联军人许多教训。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谈论教训，那就是阿富汗人民在捍卫古老传统、民族文化和自己的宗教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而任何英勇行为都应该享受容光，甚至值得对手钦佩。不过，谈论第40集团军蒙受了失败是没有根据的和站不住脚的。在这里谈论胜利和失败均不合适，但可以指出，苏军撤离阿富汗绝非溃逃，而是根据苏联领导人指示实施的有计划的行动。

尽管军队在战后遭受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蓄意攻击，但这也不足为怪。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于历史。比如，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美国人在越南……我们的“阿富汗人”也做了别国战争的士兵。不过我深信，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们当年在那里是为祖国而战。这不是奇谈怪论。

在别国为那里的人民的“幸福”而战，从来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被解放者”对此是不珍视的，他们经常忘记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那些人。就说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浴血奋战的苏军战士吧，他们绝不会想到，50年后，自己被斥责为“侵略者”；当年手捧鲜花眼含热泪把他们称为“解放者”欢迎的那些人的后代在阵亡将士墓地上大行粗暴侮辱之事；居然为当年站在法西斯一面作战的人矗立起纪念碑。

所以，有时会听到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战士无奈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该去欧洲作战。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就足够了。”

记忆丧失了理智是最可怕的事，而这已经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战争不是士兵发动的，而他们在战争中死去，这首先是他们的人生悲剧。

按说，第40集团军在阿富汗针对反对派武装力量展开的作战行动是成功的，虽然我军经受了艰难困苦，也蒙受了人员伤亡，但那毕竟是处于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流行性疾病的双重压力下。高山和荒原、高温和低温，它们的陡增陡减、陡升陡降、缺氧缺水、传染性疾病等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军事行动的复杂性。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没有一支苏军部队退却或者放弃阵地。战士们没有玷污过自己的荣誉，视荣誉高于生命，而荣誉感就是面对祖国不辱使命。

虽然我们在阿富汗蒙受了损失，但在大多数苏联参战官兵心目中，并没有留下对阿富汗人的憎恨感，甚至有一种亲近和亲切感。苏联战士在履行和平使命过程中为阿富汗人民做了许多积德行善的事情（铺设道路、修建学校和医院、给

予居民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成功地守卫了喀布尔和其他许多大城市,使它们长期免遭毁坏。而圣战者执政以后,它们立刻变成了战场,至今处于废墟中,其居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我没有把详细分析阿富汗战争的结果作为目的,或许,那样做专家们更感兴趣。不过,本书不仅仅是为他们写的。所以谨对这场战争的几个方面叙述一番。

历史方面:

1. 假使扎希尔·沙赫国王在1973年的倒台是阿富汗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1978年4月导致人民民主党执政的上层军事政变就是受到军队和部分小资产阶级支持的少部分人的冒险主义行为的结果。它破坏了国内长期形成的实力均衡。阿富汗新领导人宣布忠实于共产主义思想和选择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被美国人看做是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增强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考虑某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甚至世界强国的利益,就无法解决该地区区域性或者某个国家的单独问题。如果那里的共同实力均衡被破坏,那就必须在对抗国家之间建立同盟。

2. 在阿富汗我们卷入了几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以阿富汗社会为例,那么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判断,这是一个宗法族长制国家;根据精神宗教状态判断,这是一个建立在氏族部落关系(族长和部落村社)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许多阿富汗人的宗教意识并非经典的伊斯兰,而是实用的,有时是半偶像崇拜、半多神论的。还有许多东西是人民民主党人在我们授意下试图引进的生活习俗,而不被百姓所接受。以欧洲文明的观点来看,阿富汗发生的许多事情从逻辑上是解释不清的,所以我们研究制订的建议经常被看做是抽象的,而无法付诸实现。

3. 人民民主党领导制定和宣布的治国目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因为改革纲领是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前提的。

但是，为实施彻底的社会改革而出笼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缺乏客观先决条件，缺乏社会经济基础保障，没有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谁都清楚，把老东西改头换面充当新事物，是最棘手和最危险的事情。所以在动手改革之前，既要考虑到旧秩序对其有利的那部分力量的积极抵抗，又不能忽视新秩序对其有利的那部分力量的惰性。通常，新事物尚未被持续不断的实践经验稳定下来之前，人们是不愿相信的。这时，旧秩序拥护者的抵抗是残酷的，而新秩序拥护者的行动往往是软弱的。人的性情并非固定不变，轻易吸引过来的总是难于把握。如果没有积极的变化，人民的信心很快就会丧失。强迫阿富汗人民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文明）的试图最终落空。

事情在于，不是为国家安全，而是为恐吓住老百姓所实行的清洗和镇压，特别是阿明时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相反，其规模反而扩大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在推行土地改革和供水改革期间，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强人所难的方式方法，根本不考虑国内既有现状和社会各阶层利益，而且还破坏了世代沿用的经营方式和地方自治，违反了事物发展规律。人民民主党政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无从改善基本群众——农民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指望得到农民支持，这样，政权就会维持不了多久。

4. 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没有遵守保证党能维持政权的规则：保护自己，争取朋友；向干部灌输热爱人民的思想，向军人灌输服从命令的观念；罢免可能给政权带来危害的人；逐渐更新旧秩序；避开军中那些不可靠的人，建立起忠诚和信得过的军队；善于严厉和宽容相结合；同部落长老和知名人士保持友谊，以求得他们的支持，或者保持中立。

换句话说，为了防止国内战争，首先要谋求阿富汗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达成一致，制定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基础的灵活的对内政策，这样才有利于在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键部门逐步实现必要的改革，并把大多数人吸引

到人民民主党这一边，缩小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国家领导层管理社会的工作应当具有民主和集中原则基础上的创造性和生动活泼的特点，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以便适时地给予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协助。要花费精力去分析时局和预测发展前景，特别是地方上的，以便对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将各种冲突制止于萌芽状态。

5. 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真实目的并非官方宣称的那样是为了抵御外来干涉，而是为了废黜阿明，支持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掌权。借口出兵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之要求，恐怕站不住脚。因为苏军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使用特种部队除掉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明，让卡尔迈勒取而代之。假使阿明不死，仍为一国之首脑，谁也说不清事态会如何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特别是亚洲的、专制统治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的个性。如果这个人非常强悍，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机会一直向前发展，反之，就会衰败，甚至崩溃。尽管阿明表现出了过分的残酷，但他的个性仍然是强悍的。

在亚洲，自古以来理想的统治者都是人人惧怕的严厉独裁者。对百姓来说，阿富汗上层权力实在是高高在上，不但独断，而且恣意。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执政以来，人民生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有极革命的华丽语言，但一切均是按旧方式实现的。所以，未遵照普什图民族传统进行的卡尔迈勒（“旗帜派”）对阿明（“人民派”）的更迭导致了消极后果，因为它引发了新的清洗和镇压，这次是反对“人民派”人士。其实，仅领导层的改组就已经削弱了不稳定的政权。卡尔迈勒并不具备引导国家走向繁荣的杰出品质。

6. 政治家的英明在于寻觅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发生。为了维持和平，应当尝试任何可能的妥协，最大限度做出可以接受的让步。在开战之前必须寻找一切可能的方式，只有别无选择时，才能诉诸武力。但不能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就姑息和蓄意制造混乱，战争是躲避不

掉的，只有幸免。如果已经决定动武，那就不要幻想最小牺牲，以此来安慰自己。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战争是不可以玩弄的，如果战火已起，那只能把它进行到底。古代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子说：“对于国家而言，战争是一件大事，是生与死的基础，是通向生存或死亡的道路。”^①

7. 第三支力量（苏联军队）卷入阿富汗内战引起了战争的升级和敌对双方的极化，使得中间派力量也加入了反对“傀儡”的斗争，以及阿富汗国内冲突国际化。在此，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斯兰国家给予反对派的援助具有决定性意义。

苏联领导人明显过高估计了自身实力，而低估了阿富汗人的抵抗能力，并错误判断了该地区形势，忽视了国际影响因素。苏联政治领导人确立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而派出执行任务的力量却不充足。数量相对不多的部队、作战计划的仓促拟订、官兵们缺乏反游击战训练，这些都制约苏联无法达到既定目标。分析美国在苏联出兵前的所作所为，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领导人沦为了高明的美国情报机构实施战略伪情报战的“牺牲品”。苏联出兵阿富汗一事对美国非常有利，它得以借机解决许多地区性问题和与苏关系问题。此前一直视美国和以色列为敌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也把矛头指向了苏联。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自量力地急于达到既定目标而又不动用自己全部力量的政治家犯了应该遭到谴责的错误。

8. 人民民主党在执政期间没有能够解决阿富汗国内的民族问题，这也是阿富汗内战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人口占多的普什图人企图恢复旧秩序，独享往日的统治地位。

俄罗斯制定自己在该地区的方针政策时，不能只考虑居住在同独联体国家接壤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必须对普什图族采取建设性政策，而不要把他们同塔利班混为一谈，尽管他们与毗连的独联体国家没有民族的和社会的根源关系。

^① 《孙子兵法》，康拉德译，第137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

9. 阿富汗战争破坏了中近东地区的稳定, 另外一些地区也被卷入其中, 并清晰地呈现出威胁中亚国家, 首先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主权的事态。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以传播原教旨主义思想为目的, 企图对包括独联体穆斯林居住地区的邻国强行推行“圣战”精神, 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产生了实际的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胃口甚至扩散到了欧洲。必须清楚, 伊斯兰的活动中心不仅在俄罗斯南部有, 还分布于伏尔加中游、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 也就是说集中在俄罗斯的中部地区, 还有巴尔干、近东和北非。随着伊斯兰塔利班运动掌权, 阿富汗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黑社会的堡垒, 不仅威胁到了该地区国家的安全, 其中也包括西方国家和美国。所以说, 暗中支持极端主义分子, 怂恿局部冲突(比如说外高加索或者巴尔干)的那些人, 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行径最终一定会引火烧身, 使冲突蔓延到自己的国家。

军事方面:

1. 倘若动用军队只是基于打胜仗的愿望, 而非根据现实的必要性、地缘战略利益和战略规律, 那就不可能获胜。1979年年底, 并不存在非得出兵阿富汗不可的必要性, 没有任何客观情况迫使我们去这么做。主观的“个人”因素成为决定性因素, 而这是非常不可靠的前提。

出兵阿富汗的正式目的是保障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维护和平, 而实际上导致了战争。在制定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旗号下的维和行动时, 都值得考虑这一事实。如果不对冲突各方果断采取强制性的和平措施, 那么在军事冲突地区即便动用多国维和部队也会收效不大, 甚至还会起到冲突升级催化剂的作用。

2. 苏联领导人决策出兵阿富汗时, 缺乏对局势的相应分析, 对事态发展的预测, 对冲突原因、性质和规模的评估, 以及对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的研究; 甚至没有制定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借用算术来解决高等数学方程式的

尝试导致阿富汗成了苏联的“泥塘”，就像越南对美国那样。苏联领导人对出兵战略和最终结果的认识是一团模糊。非常遗憾，面对类似局面进行决策的机制至今也没有成熟，在俄罗斯占据上风的仍然是“主观因素”。要避免这种状况，就要以法律的形式责成政治家们遵循一长制原则，他享有权力做出决定和下达命令，但同时执行这些决定和命令的后果负有全权责任。我们的政治家只承认自己有权做决定和下达命令，而不对后果负责。在阿富汗战争中，那些直接参战的军人们成了“罪魁祸首”。

3. 没有利用苏军在重型武器方面的优势。指挥员在火力指挥和杀伤、行军、侦察和防御的战术环节上暴露了知识缺乏和技能低下。组织作战行动时遵守军事条例不当，或者完全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出营连排一级指挥员在组织山地战以及在战斗中间调动人马的实战素质不高。

作战行动总是实施得不够积极果断，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在战斗过程中出现过无法解释清楚的时间较长的停顿和中断。

面对战局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武器装备组织全面的火力杀伤和迷惑敌人，还有叛匪为及时转移在战术上采取的新手段等问题的方面，部队，首先是指挥员没有能力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表现特别差的是需要与炮兵和空军进行协调的突击部队的行动。在向进攻目标推进和进攻战进行过程中，连和排一级的指挥失灵，不能充分利用炮兵和空中打击成果，不善于巩固阵地，组织防御，以及脱离战斗和撤离。没有按规定调集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用于对付圣战者的意外行动和作战局势的突然性恶化。忽视了敌人用于掩盖真实目的的欺骗手法。

阿富汗圣战者采取的游击战术和我军在人员编制不足情况下还要坚持昼夜值勤防守部队驻地的做法耗尽了军人的体力，使他们情绪低迷、态度冷漠。作战人员特别是狙击手和驾驶员以及驾驶技师的单兵训练水平差，体力上韧性不足，

均暴露无遗。士兵没有学会正确选择阵地，在阵地上如何移动，以及武器装备在使用前的准备，也没有掌握夜视仪和照明器械的使用。士兵装备不实用，无法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军装易破损。总之，还没有建立休整和生存的保障体系。

电子战、通讯和侦察机构技术装备严重落后的问题突现。

现代化的微型武器使得在总的作战潜能方面大大逊色的武装团伙能够卓有成效地同正规部队进行周旋。所以要建立强大的部队群，它要有能力对假设敌方区域实施有效监控，并且在敌方作战队伍出现后迅速将其歼灭。这样的部队群应当根据这种战事的特殊性尽早建立。实施作战行动之前应该进行审慎的侦察，评估对手的军事实力，然后集中炮兵和空军力量对其重要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使其指挥系统瘫痪，并加之以大规模的侦察破坏行动，采取其他特别措施。此后才可出兵，最好是从不同方向迅速占据战略要冲，实施自己的控制。从动手起就要主动展开作战行动，不给敌人喘息和重新组织的机会，直至其投降或者被彻底击溃，还要采取果断措施切断对手从各个方面获得的武器弹药补充供应。

4. 阿富汗领导人没有能力建立一支坚强的、具有战斗力的可靠军队。分属3个强力部门（国防部、安全部和内务部）的3支军队的并存发展分散了国家的财力，无法有效使用现有人力和物力。军队的指挥部门多次经历了清洗和镇压。党派属性、部族属性，以及是否忠实于某个领导人或者将军，都成为军内关键岗位任命的决定性因素。“旗帜派”被塔拉基和阿明排挤出了军队，而卡尔迈勒和纳吉布拉排挤的是“人民派”。高层领导中“旗帜派”占多数，中层和基层领导“人民派”占多数。这一切都大范围地严重破坏了军队的内部关系，削弱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此外，对军内和党内的反对派实行镇压清洗涣散了军纪和军内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最终就是降低了御敌的战斗力。

大规模地使用常规部队不仅是为了镇压叛匪，而且也用于对付平民百姓，这完全违背了军队的职能。另外，反对派有效的政治宣传攻势摧毁了阿军的士气，引发了普遍的逃兵现象。不过，在战斗减员和逃兵减员造成部队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敌人捕捉百姓的企图没有得手，因为阿富汗人拒绝服役是不择手段、不惜花钱的，甚至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

苏联撤军以后，阿富汗军队有机会部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但与其说他们同反对派武装周旋了3年多，不如说是反对派没有做好进攻战的准备。阿富汗领导人试图使军队服从于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做法涣散了军纪和士气，最终是军队放弃同反对派武装力量作战。

5. 在局部战争和地区性武装冲突中参战的应该是具备实战经验的职业军队。使用仓促召集和拼凑的部队只能导致重大牺牲，会大大挫伤士气，破坏作战潜力，损害国家威信。

在局部性武装冲突中组建部队群对付较大规模的匪徒队伍时，应该以其组织参谋机构齐全、指挥系统完善，并拥有相应物资装备储备的、做好了战斗准备的队伍为基础。实施类似的作战行动前，参战部队必须拥有足够时间用于备战，以达到所有作战单位之间的有效配合和战术协作默契，并掌握当次作战行动的特殊手段。这样才可期望战役能取得圆满结局。

战役进行中，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不给敌人喘气和反扑的机会，直至将其彻底击溃，或者迫使其投降；要确立坚定的目标，制订的行动计划要兼顾从不同方向对敌实施突击和将其分而歼之，使其无法迂回，并切断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通道。行动必须积极果断、出其不意，不要有大的间隔或中断。对于居民区，应该先绕行，然后予以包围封锁，再进行“清剿”。提前摧毁基地和武装分子训练营地具有重要意义，不论他们躲藏在哪里，务必使用全部力

量和手段歼灭之。

占据领土空间非常重要，这就是对整个冲突地区实施控制，实行军事介入。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派遣部队进驻确定的辖区，在那里建立基地防御中心系统和能够限制武装恐怖分子机动人员自由移动的相关设施。同时，实战经验表明，只有当非正规的武装叛匪动用相当力量进行顽强抵抗时，才适宜使用大部队对付他们。而用大部队对付小股叛匪机动人员，好比是拳头打苍蝇。对叛匪控制地区实行军事经济、军事政治和信息封锁是一上策。叛匪的游击战术实际类似于非正规的武装队伍的游击战术。还应该动用特遣部队、军事破坏小组和以搜寻、摧毁和消灭恐怖分子基地和其头目为任务的作战分队。

6. 恐怖主义活动呈积极发展的趋势。破坏行为和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各类恐怖分子达到巨大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恐怖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动用的力量越来越多。对付他们不仅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反恐怖特种部队（“阿尔法”或者“捷尔塔”），还常常要求空军、炮兵和常规部队参与。反恐怖作战行动已具备了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性质，不过它还具有特殊的战略战术特点。应当针对恐怖活动的战术研究制订专门的规划，对部队实行特殊训练。在对大规模的战争进行备战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体系训练部队以应付“小规模”军事行动和现代局部战争。在实战经验基础上研究制定指导性和章程性的文件是必要的。

从事战争的经典方式方法并非一贯用之有效。必须克服大规模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中的惰性和因循守旧因素，因为在游击战条件下，这些经验或许根本不适用。对付以游击战形式活动的非法武装队伍就要采取非传统战争的战略战术，大家公认的从事战争的方法应该能考虑到局势的特点、对手的战术和战事所在地区的情况。

局部冲突的表现方式极其独特，充满变数。开具处方和阐明要领对从事局部战争来说是危险的。在局部冲突中，指

挥人员适度的创造性临场发挥比战事的环境和条件还要重要。最近的经验表明，在地区性的局部冲突中，作战的传统战术是行不通的。这里没有严格的前线，游击战的队伍更愿意直接接触，他们善于对单个目标和人员不多的驻防军突然袭击，或者封锁交通线，以及从事颠覆、破坏和恐怖活动。作战行动的特点是机动性同连排规模的（很少到营）残酷阵地战相结合。所以应当汲取部队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积累的经验。

在这样的条件下，切断退路进而歼灭之或者俘虏之，是较为有效的克敌武器。

作战行动的成功取决于组织出色的侦察体系，特别是特工工作环节，以及与空中打击和精确炮火打击手段相结合而广泛使用的空降和空降突袭行动，有效地使用各种战术（包抄、攻击侧翼和它们的延续）。为了以最小代价歼灭固守据点的敌人，必须完全包围住防守方，及时抢占和控制制高点，使用空军、炮兵、坦克炮火和其他炮兵手段准确摧毁敌方火力点，同时最大限度地投入兵力，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

使用得到空军和炮兵支持的战术独立分队是山地战的基本原则。加强营（很少使用加强团）是山地战的基本战术单位。所有兵种都要鼎力援助加强营去完成任务，要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机械化伞兵空降营必须有炮兵营和火焰喷射器排的支援。

在局部战争（冲突）中，为了歼灭叛匪的小股机动队伍，特别是在山区和林区，要求动用数量上大大超过对手的作战人员和装备，也就是多于同常规部队进行常规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因为对手回避正面接触，把力量分布于辽阔的区域内，使用游击战的斗争方式。

为了实现对领土的监控，要建立包括装备良好的驻防军在内的综合保安体系，要拥有强大的值勤岗哨网、机动值勤分队、24小时连续地面侦察和空中打击值勤、伞兵空降值勤和空军机动分队、机场周边地带和重要生活设施的特别管

制区。

为了避免运输装备的车队遭受袭击，应当在行车沿途易于设伏的地带设立哨卡（哨所），而在车队经过的山谷地带，必须占据制高点。不过，哨卡一定要构筑得结实牢固，否则，就会成为敌人的袭击目标。每一支车队都应该配备单独的保安力量，为此可以建立专门的运输警卫部队。在行车路线沿途搜集准确可靠的敌方情报、路况情报和连续不断的空中掩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山区从事侦察，要使用20倍以上的望远观察仪器和红外线远视仪。

7. 只要源自训练营地的人员补充和武器装备、弹药的供应不中断，就无法彻底消灭对手，必须最大限度地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来阻断盟友给对手提供援助的渠道。阿富汗战争期间，反对派获得了足够的外来军事援助，苏军指挥部试图对此加以限制的努力最终徒劳一场。

8. 不创造相应条件、不消除诱发武装冲突的原因，仅仅依靠和平号召和和平口号是制止不住战争的。为了达到民族和解，冲突双方必须真诚做好准备走向建设性妥协。

同具有相当实力的对手进行谈判无利于维护和平，只能适得其反，使它赢得时间，重整旗鼓，让它有机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或者签署条件利己的协议。所以，应当给予对手那种事后再也无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沉重打击。

在阿富汗，反对派拥有战斗力颇强的武装队伍和夺取政权的一切条件，所以它才拒绝了和平调解，民族和解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

9. 只要在现有的实力均衡状态下不出现中央政权的优势倾斜，阿富汗国内的战事就不会中止。否则，战争便会激化，犹如阿富汗目前的状态。那时就需要有能力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外部力量对和平进程进行干预，比如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独联体、欧洲安全委员会，或者打着北约旗号的维和部队。不过，目前这种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就使用北约空中力量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进行轰炸的做法将破坏世界秩序，

有可能导致“冷战”恢复，甚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10. 在局部战争中，参战部队行动要迅速果断。在最大限度地击溃对手、并完成政治任务以后，他们应该毫不迟疑地迅速撤离战事所在国，把巩固政权方面的问题移交当地政府（该国政府）解决。战事一旦拖延，那将是参与国的灾难。如果不能速战速决，那么持久战比吃败战还要糟糕。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这么说过：“战争持续下去是没有好处的。战争好比火焰，如果不及时扑灭它，你就会引火烧身。”^①

^① 《孙子兵法》，康拉德译，第8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

第十章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阿富汗 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

◆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战争”的 第一个牺牲品

从前苏联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角度，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他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造成的。这场战争的余波是，当地的许多力量打起伊斯兰旗号，把它作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武器，并得到外来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支持。

早在1984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着手进行针对中亚国家的颠覆活动，那是在时任中情局长的威廉·凯西的伊斯兰堡秘密之行后不久。经他建议，巴基斯坦人同意把用于颠覆性宣传的物资通过阿富汗运往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苏联南部共和国。不久，中情局便提供了数万册《可兰经》和揭露苏维埃在乌兹别克暴行的书籍，偷运由巴基斯坦跨部门情报局指导实施。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逝世前不久相当坦率地描绘了与阿富汗有关的目标：“我们争取到一个权力，就是要拥有一个同我们关系非常友好的喀布尔政权。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个政府像先前的那样处于印度和苏联的影响之下，并且还存有对我们的领土要求。这将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是泛伊斯兰复兴的一部分。你们将会看到，它有一天会吸引

苏联境内的穆斯林。”这番话并非说说而已，它很快就付诸行动了。由美国情报部门庇护，在巴基斯坦制订的一份规划准备对中亚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进行入侵，并建立“第五纵队”。

1990年2月，英国《独立报》披露：“英国外交部决定对公众关闭英国情报机构50年前在苏联南部共和国实施颠覆活动计划的有关文件。根据这一决定，该文件的保密性将延续至2015年，这区别于其他同类文件根据年限予以解密的惯例。”这份报纸透露的资料表明，秘密文件建议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借助英国特工人员利用当地穆斯林和非俄罗斯民族仇视俄罗斯人的情绪；还建议利用相貌同苏联边境地区居民基本没有区别的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地区的人员，利用他们在更广阔的地区煽起动乱。对此，该报记者提出一个问题：“秘密文件延期解密的决定本身是否证明英国情报机构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目前仍在苏联上述地区派有特工和谍报人员？”

“阿富汗战争”先是蔓延到了中亚，然后是俄罗斯。伊斯兰再次成为夺取政权的借用工具。某些势力在诡辩术掩护下开始实行旨在“解放苏联穆斯林”和创建“自由土耳其斯坦”（中亚国家均被划入这一联盟）的颠覆活动；他们扩大反俄罗斯宣传的规模，在中亚主权国家的穆斯林居民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俄罗斯情绪；协助那些有能力依托民族和宗教问题挑起国内战争的武装分子建立作战队伍。

在阿富汗境内和边境地区修建了大批武器弹药仓库和毒品仓库，以及颠覆性宣传书籍的转运站。它们不仅要装备颠覆破坏行动小组，还要转交给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极端主义分子。

穆斯林被指定充当“爆炸物”的角色，而充当点火装置的是属于伊斯兰逊尼派一项宗教政治运动的瓦哈比主义。20世纪初，正是瓦哈比运动利用英国人葬送了奥斯曼帝国。20世纪80年代，这一方法被用来对付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国

家，俄罗斯是其后的目标。瓦哈比主义教义的基础是关于对伊斯兰进行必要“净化”的一神论概念，以及通过放弃圣者崇拜和确立质朴风尚回归伊斯兰原本宗旨的认识，其特点是信仰的极端狂热和在同政治对手斗争时采取极端主义手法。“瓦哈比主义”这一术语可能从开始就是不准确的，因为瓦哈比信徒的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相关联，可是它却牢牢地作为伊斯兰宗教极端的武装恐怖主义标志进入了日常口语（尽管追求“信仰源头”的瓦哈比信徒确实被这样称呼）。70年代初，瓦哈比主义最先出现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菲尔干纳谷地，70年代中期—塔吉克斯坦。起初，它表现出和平的哲学色彩。后来，极端主义在伊斯兰复兴的浪潮中异常活跃起来，并把该地区发生的改革利用于自己的目的。成立了一批严格保密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组织，除了意识形态教育之外，军事培训和体质训练是它们的重点项目。虽然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限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但是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改革”的大气候影响下，许多犯有刑事罪的极端主义分子作为“道德罪人”被免除了刑事起诉，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在塔吉克斯坦发动政变篡夺政权的武装集团核心。

1990年10月，瓦哈比派信徒召开了“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成立大会，从此由地下活动走上了公开的政治舞台。许多雇佣军人以伊斯兰传教士面孔出现，谋输出伊斯兰思想的私利，有意识地在伊斯兰其他教派信徒中间散布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病毒”，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行，煽动人为操纵的冲突，培养并千方百计地支持自己的同党，妄图强迫其他派别接受他们的教理。《可兰经》不是瓦哈比信徒的法规。1990年年底，穆斯林瓦哈比信徒在纳曼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中亚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俄罗斯被指明是伊斯兰的敌人。

1991年7月底，苏维埃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克格勃副主

阿富汗战争与塔吉克斯坦

席别洛乌索夫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塔吉克斯坦加强了影响，这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积极展开活动，制订破坏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局势的计划，进而创造条件使它们脱离苏联是紧密相连的。”别洛乌索夫透露，克格勃掌握着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阿富汗反对派武装的确凿证据。他分析说，伊斯兰宗教对中亚国家局势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但如何采取预防措施，联盟领导人和共和国领导人均未做出适当反应。1991年8月以后，戈尔巴乔夫更是顾不上中亚地区了。

阿富汗圣战者极端主义倾向严重的头头们不断在阿苏边界制造敌对事端，直至武装入侵。

塔吉克斯坦成为阿富汗战争的重要牺牲品。它处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外扩张企图的锋芒尖上，承受着外部极端主义势力操纵支持的内战带来的所有苦难。

塔吉克斯坦简况

塔吉克斯坦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至10世纪的萨玛尼德时代，但其过程极其复杂而漫长。数百年间，这片土地饱受创伤，几易其主，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国家体制。塔吉克民族就是在不屈不挠地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妨碍最终实现民族结合的关键因素是游牧部落的周期性侵犯。18世纪下半叶，游牧部落的压力减弱，塔吉克民族也自然划分为人口大致相等的两部分：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中亚的塔吉克人，并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开始征战中亚时，部分塔吉克人群体居住在布哈拉、萨玛尔汗和霍占特等大城市周围的平原地区，承受着日益强大的乌兹别克人的压力。塔吉克山民栖息在东布哈拉，这一地区后来奠定了当代塔吉克斯坦的疆域。1868年，塔吉克北部地区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而南部地区在相当长时间里处

于布哈拉汗国统治之下。不过，到了 19 世纪末，塔吉克边界线已经受到俄塔联军共同保护。

阿富汗的北部边界线确立以后，经俄罗斯、不列颠和法兰西 3 国政府认同，根据地理等高线对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所处地区进行了划分，当时这并未影响到民间的家庭和贸易关系。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归附于普什图艾米尔，成为其国民；中亚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组建了一些国家雏形，其中最大的是布哈拉艾米尔国和坎大哈汗国。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红军为征服塔吉克山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军事行动。虽然这一企图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居住在东布哈拉的 50 万塔吉克人却逃亡到了阿富汗的边界省份。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前，国家雏形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没有存在过的。另外，在建立各自国家的过程中，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也没有实现过各自民族的统一性。部分专家认为，即使在今天，乌兹别克人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民族派系，内部仍然区分为不同的民族群体：库拉玛人、突厥人、乞卜察克人、贾拉伊尔人、弘吉拉特人、杜梅人、科塔人、巴格林人、米纳特人等等。

苏维埃中亚国家“历史边界线”的形成也走过了极其复杂的、主意论主义占上风的痛苦历程。1924 至 1925 年，逐渐实施了土库曼斯坦行政管理划分的新原则。在历史上的布哈拉汗国地域内，先是出现了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5 年乌兹别克共和国成立以后，布哈拉的主要部分都纳入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管辖。只是在 1929 年，讲伊朗语的、东布哈拉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脱离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塔吉克斯坦。就这样，最初创建的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

国、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都先后进行了改组，并不止一次地更改了边界线。尽管塔吉克斯坦独立出去，易名的老布哈拉仍然兴旺起来，它作为统一的行政管理中心将土尔克斯坦和基发的疆域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纳入自己的版图，布哈拉的上层政治社会开始对其实行管理。

任命法伊祖拉·霍贾耶夫为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中亚促进了类似的力量配置，他在共和国领导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37年，受到莫斯科的格外信任。显然由于这一原因，在中亚创建苏维埃政权立足基地之初，斯大林把诸如萨玛尔汗、布哈拉、费尔甘纳、基发、塔什干等重镇要地，以及后来在1929年临时划归给塔吉克斯坦的霍占特，都纳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管辖区内。1925年2月，加里宁在布哈拉召开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阐述了在中亚建立服从于莫斯科的武装力量中心的思想：“……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巨大的文化潜力和技术能力，拥有东部最富有的城市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所以应该在中亚发挥更大的、可以说是一种主宰的作用。作为强盛和有实力的国家，你们应当在同邻国关系方面表现得更恰如其分，就像莫斯科对待你们一样。”^①

这段时间，中亚的政治局势已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29年至1930年，乌兹别克斯坦从萨玛尔汗迁都塔什干，而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同霍占特一起被划分出去成为独立的行政管理单位。部分专家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削弱霍贾耶夫和布哈拉上层的影响。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舞台上还出现了几个新人物：代表塔什干派别的伊克拉莫夫和尤素波夫。

^① 《加里宁全集》，第1卷，第630页，莫斯科出版，1960。

这样，20年代至30年代发生在中亚的重大事件，以及根据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对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人民进行重新划分，也导致了这一地区疆界的重新划分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出现了难于解决的领土问题和民族问题。自然，随着一批年轻的独立国家的出现，这里越来越成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自古就属于塔吉克人的布哈拉和萨玛尔汗两地被并入了乌兹别克斯坦，1/3居民为乌兹别克人的霍占特则被并入首都为杜尚别的另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不过，人口居少而发达程度占先的平原地区（霍占特）的塔吉克人却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苏联而言，塔吉克斯坦这片土地具有足够的战略意义：它是通往中国、印度和阿富汗并进而深入亚洲的门户。苏维埃政权生存的最初年代里，这个地区便受到了极大的关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亚地区的安定。然而，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集体化、工业化和文化革命——破坏了后来转变为部族结构的氏族部落结构。

在塔吉克斯坦，血缘关系是部族互助合作的基础（可至父系第7代）。蔑视任何一位部族成员的人都会约定俗成地被亲人看做是丧失一切的人。部族隶属于某种领土联盟，就是和毗邻的村社的联盟。这绝非只是形式主义的联盟，像部族一样，它受成年男子的会议管理，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部族长老和穆斯林宗教神职人员。

对在当地人自古栖身的那片土地上建立区域性的完整的等级制度体系而言，塔吉克斯坦具备最好的自然条件：这是一个高原国家，划分出大小河流中道道谷地的雄厚山梁也分割出片片领土。人口都集中于谷地，领土的其余部分实在是荒无人烟。

塔吉克斯坦由4块相对独立的地区组成。北部的霍占特和列宁阿巴德州同首都杜尚别地区之间被难于通行的山

脉所隔断，它们之间亦没有铁路线连接，只能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领土内的长长的盘山公路。因此，人口 1/3 为乌兹别克人的霍占特渴望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哈特仑州也被山脉与杜尚别地区隔离，只有公路线连接着两地。帕米尔地区则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杜尚别—霍洛戈公路是帕米尔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惟一的连接纽带。

全国形成了 5 大行政管理区：北方、卡拉捷金、库里亚博、吉萨尔和帕米尔。帕米尔人并不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塔吉克人，因为语言上有区别：帕米尔话属于东伊朗语系，而塔吉克话属于西伊朗语系，生活习俗也有明显差别，另外，帕米尔人属于伊斯玛伊利特派系。在行政管理上，帕米尔被划入巴达赫山山区自治州。

建立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之时，其经济只有中世纪的水平：自然和半自然农业是国家经济主体；没有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交通和通讯设施。俄罗斯担负起了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的重任，农业经济成为重点。在苏联的整体经济体系中，塔吉克斯坦得到了生产棉花的位置。另外，在建立水力发电和开采工业方面均有所建树。在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和医疗事业方面发挥领先作用的是有计划被派遣到那里去的讲俄语的居民代表。

80 年代初期，塔吉克斯坦出现了人口爆炸，年出生率达到了 4.4%。而当时中央的预算拨款却减少了，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出现了大波动。先前存在于大城市，特别是存在于年轻人中间的失业现象潮水般地扩散，本来就不高的生活水平一下子跌到了危机边缘。阿富汗战争和塔吉克斯坦因此而变为向欧洲贩运毒品的中间环节这些因素加剧了由体校毕业生操纵的社会青少年犯罪，逐渐构成了“社会爆炸”的前提。

苏联解体以后，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为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竞争。在土耳其，中亚现状被看做是

在安卡拉庇护下联合所有突厥语系民族的绝好时机，他们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广泛吸引该地区所有国家在经济、贸易、政治和军事领域进行合作。伊朗则计划同中亚国家建立伊斯兰宗教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紧密关系，相互矛盾的志向加深了土耳其和伊朗两国间已经存在的不和，也加剧了互不信任的紧张局势。

作为世界伊斯兰运动领袖，德黑兰的作用一开始便受制于伊斯兰教的分裂：什叶派（被大多数伊朗人所接受）和逊尼派（被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所接受）。伊斯兰教在前苏联南部地区的复兴，客观上恰恰会加强逊尼派的势力。所以，伊朗绝非偶然地在1990年9月率先承认了塔吉克斯坦的独立，采取引人注目的努力来确立和迅速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为双边关系和自己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建立牢固基础。

伊朗地位的巩固也仰仗于塔吉克斯坦国内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宗教倾向的加强。除了给予塔吉克斯坦人道主义援助和积极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之外，伊朗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在此，负责实施“输出伊斯兰革命”构想的伊朗国家机构伊斯兰方针和宣传部，以及伊斯兰革命警卫军团遵循经过核准的、向其他国家（阿富汗、黎巴嫩和苏丹）传播伊斯兰思想的传统进度表。鉴于什叶派的激进主义革命口号和志向，所以首先要依靠伊斯兰教中的这一派系信徒；给予正在形成的宗教中心以财政援助，它们在伊朗控制下从事宣传资料的印刷出版，培训青年人，建立和巩固伊斯兰政党和组织，筹建武装分子战斗队，提供武器，借助支持者对国家的个别地区实行控制，继而将这种控制转变为国家制度和政府机构。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界局势变得复杂起来。2000公里长的边境线接连不断地发生挑衅事件，既有塔吉克斯坦一方的肇事，也有阿富汗一方的肇事。渗透到边界线塔吉克斯坦一侧的有在阿富汗训练营地接受过

训练的武装分子，还有各类“专家”和教官，他们向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武装队伍传授游击战战术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技能。武装分子的装备都很好，交火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俄罗斯边防军经常遭受损失。事态按照在阿富汗制订好的进度表发展：起初是宣传性的和宗教布道行为，然后就是成立非法武装组织，对他们进行装备和训练，接下去就是在伊斯兰口号下夺取政权的积极行动。最初，这些做法确实行之有效。

1991年9月9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塔吉克斯坦独立法。苏联解体在地方上演变成为党的官僚、知识分子、宗教界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这也是一场公开的政治冲突，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前总统玛克哈莫夫被迫下台。1991年11月24日进行了总统竞选，当选者是纳比耶夫，另一个官僚、一个优柔寡断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这正好被反对派所利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反对派联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该党把赌注押在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达夫里亚特·胡朵纳扎洛夫身上，结果得逞了。官方的统计是他得到了31%的支持率，反对派的统计为40%的支持率。

反对派在杜尚别组织了连续几天的示威游行。迫于集会者的压力，1991年10月22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90年10月5日颁布的决议中关于禁止在共和国境内建立全苏伊斯兰复兴党地区分部的第三条款已失去效力。就这样，伊斯兰政党终于能够在塔吉克斯坦正式注册了。

1991年10月26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理事会的单独会议上，希玛佐达当选为该党主席，乌斯莫恩和加朵耶夫为副主席。会议还确定了党旗和党徽，《复兴报》成为机关报。1991年12月4日，该党在司法部登记。这时，其成员大约有2万人。

1991~1992年残酷的内战期间，亲政府力量（霍占特部族和杜尚别、法里亚博部族联盟）抵御住了反对派（加尔

姆和帕米尔上层社会)的进攻。1992年3月26日~4月23日、4月25日~5月5日,杜尚别的沙希东广场发生了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伊斯兰复兴党是组织者之一。4月1日和5月4日,司法部两次要求该党领导人停止违宪行为,但没有被理睬。

旷日持久的群众集会最终达到高潮:反对派控制了首都,纳比耶夫总统被迫同意组建“民族和解政府”,反对派占据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位置。达夫拉吉·乌斯莫恩被任命政府副总理。

那段时间,亲政府力量既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没有政治组织机构,他们的联合是不定型的。只有基萨尔派拥有自己的领袖肯扎耶夫,法里亚博人没有自己的头领。霍占特人虽然是一盘散沙,但还妄想着自己的政治统帅地位。

原库尔干—秋别州的瓦赫沙谷地是武装冲突的主要舞台。6月,卡拉捷金人和法里亚博人在此展开了流血的厮杀。法里亚博人在8月的得手和由此引起的包括部分杜尚别居民在内的百姓外逃使“民族和解政府”处于极其复杂的境地,也使它对纳比耶夫总统表示了一致的不信任。9月底,纳比耶夫总统在一部分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临时执政的伊斯兰反对派(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带来了普遍的暴力现象和公开的反俄方针。内战造成了混乱和饥饿、流血和痛苦、煎熬和死亡,受害者已经数以千计。法里亚博和库尔干—秋别的大批居民,以及其他居民点的百姓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召集力量。

这时,在法里亚博—吉扎尔—乌兹别克联盟基础上建立了“人民阵线”,它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恢复“宪法秩序”,肯扎耶夫成为其主席。11月下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恢复了以法里亚博人占优的霍占特—法里亚博—基萨尔联盟。原国营农庄主席和“人民阵线”战地指挥官拉赫莫诺夫成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4年年底,他又当选为塔吉克斯坦总统)。新政府以霍占特人阿卜杜玛立克·阿卜杜拉

贾诺夫为首。

12月初，“人民阵线”的队伍高举红旗向杜尚别发动进攻。大部分反对派武装队伍，其中有前来助战的阿富汗圣战者、波罗的海雇佣军、车臣武装分子和阿拉伯教官都被歼灭，残余部分逃进深山或者阿富汗境内。12月10日，“人民阵线”力量进入首都，随后开始了种族屠杀。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科济列夫同阵线头目桑加卡·萨法罗夫在公开场合的拥抱象征了俄罗斯对“人民阵线”的支持。

“人民阵线”获胜以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头目侨居到国外，煽动难民从塔吉克斯坦逃亡到邻国。数万难民出现在中亚国家，他们对所遭野蛮暴行的控诉令人印象深刻，同肆无忌惮的犯罪现象牵扯在一起的民主主义思想就这样威严扫地。

1993年1月底，穆斯林国家代表在白沙瓦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支持塔吉克斯坦兄弟的“圣战”，并做出决定：在塔吉克斯坦反对派武装队伍指挥员中安插具有同苏军进行游击战经验的阿富汗人；把向西方贩卖毒品所获部分收入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并提供给塔吉克斯坦反对派。同时，把阿富汗境内巴达赫山、库纳尔和南加尔哈尔省的若干毒品加工车间移交给塔吉克斯坦人经营。武器和毒品生意成为边境省份黑社会最大的收入来源，巨额利润诱使他们铤而走险。泛伊斯兰主义分子的兴趣超出了塔吉克斯坦的范围，在整个中亚地区蔓延开来，这仅仅是开头。

1993年年初，俨然已经成为政府军的法里亚博武装分子把卡拉捷金人驱赶出瓦赫沙谷地。反对派武装分子依靠外界支持阻止政府军进攻的企图没能得逞，因为边境线处于包围阿富汗圣战者的苏联边防军严密监控下。1993年4月，战事达到了白热化。

5月23日，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友好互助协议在莫斯科签署。根据协商结果，俄罗斯部队和联邦边防军将进驻塔吉克斯坦领土。边防军的任务不仅要巡逻边境，还要捍

卫边境。组建了独联体联合和平部队，90%为俄罗斯军人，另外还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队，联合国、欧安会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和平使团也进驻了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边防军处于斗争的风口浪尖。1993年6月13日，莫斯科边防分队第12哨所发生了戏剧性事件。当时，一股总数约250人的塔吉克斯坦武装分子和阿富汗圣战者企图偷越边界线。边防军战士进行了英勇的阻击，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守卫住了哨所。

1993年6月，塔吉克斯坦最高法庭以违反“塔吉克斯坦社团法”和自己的章程为由，宣布取缔“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根据这一决定，国家新闻出版部认定1992年1月14日授予《复兴报》的第162号注册证书作废。

这年夏天，政府军攻克了通往巴达赫山的卡拉捷金峡谷。

尼古拉耶夫将军被任命为俄罗斯边防军司令后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边防保卫，以及建立驻塔俄罗斯武装力量各军兵种协作体系和各方面供给保障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边防部队在守卫边境的同时，还解决了防御问题，隔断了外来武装分子从这一地区对塔吉克斯坦的渗透。

1993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阿富汗成立，塞义德·阿卜杜勒·努里被推选为主席，第一副主席为塔吉克斯坦宗教界领袖霍迪·艾克拜尔·土拉焦扎达，其次是穆哈迈德·沙里弗·希玛佐达。这一运动成为“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阵营”的基础。1993年年底，在莫斯科成立了“独联体国家塔吉克斯坦民主力量协调委员会”，后来同“联合反对阵营”站到了一起。栖身阿富汗的反对派领导人成立了“塔吉克共和国流亡政府”，领袖为努里，他也是“联合反对阵营”的主席。这个“政府”的副手有负责财政经济事务的阿卜杜勒·加弗尔毛拉和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穆罕默迪毛拉，外交部长为霍迪·艾克拜尔·土拉焦扎达。

经过持续的战争和长时间谈判以后，1997年6月27日，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参与下，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和反对派领袖努里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书，并就民族和解问题达成妥协。参与其中的还有“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代表。反对派代表根据划拨的30%的额度在所有政权机构都获得了相应的位置，他们获得了塔吉克斯坦政府副总理、经济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海关委员会主席、水利和土壤改良部长、农业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位。

不过，距离共和国的和平安定还很遥远。相互间的恩怨和觊觎积累得太多，对今后国家建设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一方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另一方拥护非宗教的民主国家。这些问题不解决，和平就不可能实现。此外，没有允许以阿卜杜拉贾诺夫为首的所谓“第三支力量”（霍占特人）参与谈判。这一个或者那一位战地指挥官为权力划分进行的武装冲突继续成为局势的不稳定因素。1997年夏天和1998年11月，胡代别尔德耶夫上校两度发动武装政变，都被政府军和联合反对阵营的部队联手平息了，但国内始终没有形成稳定局面。

要说前景，显然，冲突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看得见的将来，平息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其他中亚国家参与其中的做法正在造成新的不稳定。

设在坎大哈的援助北高加索和中亚伊斯兰运动的一个协调中心正在致力于破坏中亚稳定和推翻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现政权。比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复兴党”的特使得到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支持，在坐落于阿富汗北部省份的专门营地积极从事着训练武装战斗人员的工作，同时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失业的年轻人中间收买雇佣兵，利用他们组成有战斗力的作战队伍。首先要在费尔甘峡谷地区动手，武装夺取当地政权。第一阶段是有步骤地进行恐怖和颠覆活动，破坏局势的稳定，并在边境地区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方面挑衅，制造冲突。对阿乌边

界地区的若干目标实施声东击西的攻击，在大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然后从塔吉克斯坦调集兵力，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和巴特肯州，依托费尔干峡谷的地下组织，掀起武装叛乱。接下去就要把军事行动扩散到整个乌兹别克斯坦领土。对此给予援助的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组织。类似的恐怖颠覆手段，他们在该地区反对其他主权国家时也予以了使用。

瓦哈比主义思想的传播宣传工作在中亚居民中间逐渐扩大。面对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影响，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提供的财政、物资、技术和军事援助，又对好战的瓦哈比主义和类似宗教流派在中亚地区的传播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抵制，致使该地区相当数量的居民被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瓦哈比主义还采取措施在其他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1999年11月10日，塔吉克斯坦反对派、阿富汗塔利班、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车臣武装分子代表进行会晤，讨论如何协调在中亚南部的行动。

为了阻挠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实施计划，该地区所有国家必须协同行动，否则，就无法制止该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扩散。2000年5月，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6国的明斯克协商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目前的局势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缺乏远见的短期行为所致。或者说，是他们自己造成阿富汗极端主义分子在“绿色圣战旗帜下”的战争威胁被转移到了独联体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本土，而苏联出兵阿富汗正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车臣——俄罗斯的阿富汗

车臣战争期间，许多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把那里发生的事情同阿富汗战争进行比较，并且指出，阿富汗人和车臣人之

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车臣人和普什图人一样，都是山民，都是穆斯林。他们的行为特点、习俗、传统、性格……笔者赞同这样的意见。甚至这两次战事期间都有不少的相同点，对此，读者可以自己确认。

车臣第一次被提及是在6世纪。它今天的领土在石器时代便已有人居住。不过，7世纪之前关于车臣人的记载非常稀少。16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在车臣传播，至19世纪中叶，成为当地的主导宗教。

16世纪末，车臣人开始犹豫不决地同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和奥塞梯人建立友邻关系。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同印古什人一道，协同俄罗斯驻防军击退了伊朗和土耳其鞑靼对边境线的进犯。

18世纪初，位于今日车臣境内的纳赫奇部族确定自己的称呼为“车臣”（取自一小村庄之名）。直到19世纪，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车臣人始终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也是在那些年代，人口不多的山民不得不求助于北方邻居，和他们的军队一起捍卫自己的独立。今天，这段历史被有意地抹煞，代之以车臣领导人和俄罗斯媒介的篡改和歪曲。

必须指出，车臣人的邻里关系并非总是和睦的，伊朗和土耳其鞑靼的侵袭给车臣人上了很好的实用主义课程。这是迅速致富的直观例子，无需劳动便可掠夺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在车臣，盗窃和掠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一般是偷盗牲畜（在斯塔夫罗波尔和奥塞梯）。每一代人都如此接受教育和培养，这被视为豪勇和无畏。对此有民间传说：这种生活方式吸引了男人，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

车臣社会的“台普”结构对于车臣民族的心理特点，以及人种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台普”（也有历史学家称“捷普”）是车臣确定个人身份所依据的社会群体和帮派，是氏族和有固定传统及明确准则的同乡会。

车臣人的姓氏通常借用较近的一位祖辈之姓，比如借用祖父或者曾祖父（即第2个父亲和第3个父亲）的姓，甚至可以沿用第4个父亲的姓。这种同姓的亲属群体叫“涅科伊”。范围更大的亲属团体组成“加耳”，若干“加耳”联合成为一个“台普”。今天，车臣境内存在着130多个“台普”。在血缘亲属关系上不论真正相承与否，“台普”必定是车臣人文化行为准则的卫道士。车臣人自己说，“台普”是民间风俗习惯的要塞。

在车臣社会，“台普”的类别具有重要意义。有些被称为纯正高贵的“台普”，自古以来便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山头，不纳赋税，并有自己相应的行为规范。车臣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拥有土地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因为土地给予“台普”以经济动力，是达到团结的主要手段。

今天，车臣“台普”的权威人士还信誓旦旦地说，车臣人向来坚持枪不离手的自由，对“台普”的忠诚激励着他们去战斗，这便是任何一个车臣人视父辈之言、祖辈之言、曾祖辈之言为法规的原因。他必须遵循这一法规，不仅要尊敬亲属，还要服从于“台普”的意志，这亦可以解释在与俄罗斯旷日持久的战事中车臣人有关的社团组织表现出来的远近闻名的坚韧不屈。

叶尔莫洛夫将军早就叙述过同车臣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艰难。他指出，在同一支氏族（“台普”）作战时，你不得不冒险招致其他氏族（“台普”）的仇恨，即使他们同你的对手处于敌对状态。这个民族具有鲜明的品质特性，就是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信念和自由去牺牲，这高于其他任何品质。今天的车臣人如果被问及是否愿为正义事业牺牲，他们一定会给予斩钉截铁的回答，而且绝不食言。“台普”的法规高于个人利益，山民强调，蔑视自己的家族比死亡还要可怕。

车臣人性格心理特征的方方面面都与“台普”结构相关联。就性格气质而言，大多数车臣人是唯心的理想主义者，经常脱离自己的现实生活。

历史上，高加索山民的荣誉规约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时刻准备捍卫自己的尊严、保护家庭（家族）的荣誉和具备养活家庭的能力被视为一个人受到尊敬和被承认为自由人和无愧公民的基本保障；其次，个人品质与能力（智慧、知识、勇气）作为无愧公民的标准使车臣人有别于普通百姓，并保证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有对青年人的教育体系都建立在尊重自我约束、热爱自己小祖国和自由的价值之上。车臣人的威信不是建立在财富多寡或者知识水准上，也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个“台普”，最终要看他是否骁勇剽悍、勇敢无畏、视死如归。习俗要求车臣人在战场上面对危险时不能调转身来，牺牲与胜利是同样光荣的事，丝毫的怯懦和片刻的畏惧都会招致公众的蔑视，直至被“台普”除名，而这是对车臣人最重的惩罚。

车臣人中间广泛流行血债血偿的复仇习俗。不过，根据山民的宗规，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也遵循浴血复仇传统的那些部落群体。20世纪车臣人反抗俄罗斯军队时，这个方法没有发生作用。

19世纪初，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成为俄罗斯属国。崭新的政治任务摆在了俄罗斯面前一把隔断了俄罗斯与上述两国的那片土地连接起来。车臣成为引人注目的利益地区：一方面是土耳其和伊朗，一方面是俄罗斯。

1871年，俄罗斯军队开始在车臣领土构筑要塞，设立哥萨克居民点，缓慢而稳步地向南推进。然而，由于率领北高加索山民同俄罗斯作战的宗教族长沙米尔在依靠土耳其苏丹支持的同时，又得到垂涎盛产石油地区的英国人相助，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沙米尔的立场起着关键作用。笃信伊斯兰教的车臣人认为，同教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才是可靠的盟友。险恶的宣传更是把俄罗斯人描绘成不可信赖的蛮夷，仿佛他们是专门来杀戮车臣人及其妻子儿女的。

1859年，沙米尔停止了抵抗，车臣正式归附俄罗斯。

是的，实力因素在当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过，就整体而言，归附俄罗斯对当地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

19 世纪末，在车臣开始积极勘察石油。早在 1914 年，俄罗斯年产“黑金”的 14% 就是由车臣提供的。90 年代初，铺设了穿越车臣领土的符拉迪高加索铁路。

征服高加索以后，沙皇政府对当地的传统制度和车臣人的习俗采取了宽容政策。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向山民许诺了民族国家体制，因而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南部地区活跃着一支由沙里波夫指挥的、约 3000 人的“车臣红军部队”。苏维埃政权确立以后，沙米尔时代的许多法律规范和行政管理制度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稍作变动的穆斯林诉讼程序制度一直沿用至 1926 年。

苏联诞生以后，成立了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公民都从事着发展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事业，并创立了自己的书面文字。工业机构发展了，汽车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出现了，还有采油和天然气生产。共和国形成了文化机构网络：8 家博物馆、7 所专业演出和业余演出的艺术剧场、音乐厅、国家马戏场……这些设施的修造都考虑到了山民的传统和习俗。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开辟出许多地方专门用于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活动。车臣人的杰出活动家曾经闻名全国，而艾塞姆巴耶夫这样的舞蹈家更是世界驰名。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拿起武器加入红军队伍。战时从车臣共和国调集了 5 万多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在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中表现得英勇无畏而被授予了奖章和勋章，6 名车臣人还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而，由于贝利亚的阴谋，1943 年 6 月，停止征召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入伍。

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自战争爆发以来，高加索一带

的土匪活动日渐猖獗，三分之二的适龄男子逃避入伍。1941年7月至1942年4月间，大约有1500已经应征入伍的车臣人开小差逃离红军部队或者工人民兵队伍，另有2000人躲避了征兵调查登记。这些人躲进深山，结成土匪团伙，人数大致有600至700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入伍以后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领取了武器以后又逃进山区加入土匪行列。土匪队伍的头目都是当地原党政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干部。1942年7月，分裂主义分子向车臣人和印古什发出呼吁，说高加索人民期待德国人的到来，要以礼相待，给予协助，换取德国人承认高加索的独立。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后，随着战线接近格罗兹尼，包括哈桑·伊斯拉伊洛夫、贾瓦坦·穆尔塔扎里耶夫、玛伊尔别克·谢里波夫等头目在内的部分战前未遂武装叛乱的漏网者纠集了一批原来各自为战的土匪头子，同法西斯分子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帮助下策划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并且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和起义政府。

伊斯拉伊洛夫亲自创立了起义组织“高加索兄弟独立党”，其行动目的就是在苏德战争中击败俄罗斯；还要按照德国人的委任在高加索建立自由兄弟联邦共和国；让俄罗斯人和犹太人迁移出高加索。为了达到目的要动用一切力量，以恐怖主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毁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以武力反对地方苏维埃政权。

为了把苏军战俘中间的北高加索人训练成为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工人员，德国人开设了专门的特工学校。1941年秋天，在“什特兰兹”集中营组建了以车臣人为主的“山民”特务连，后来，这个连被改建为“山民”营，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卡腊查耶夫人、奥塞梯人、印古什人、车臣人。这支队伍的任务就是在高加索地区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在德军常规部队发起进攻之前在敌后进行破坏：袭击并占领桥梁、隧道、交

通枢纽等战略目标。队伍内部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和睦，区别于普通部队的严明纪律。他们从事的许多破坏行动协助德军取得了某些战役的胜利。1942 年中期，“山民”连企图煽动组织高加索山民进行反对苏维埃的起义，但没有得逞，自己也在抵抗了 3 个月以后被苏军彻底歼灭。

1942 年 8 月 30 日，面对德军已经突入高加索疆界的局面，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务部人民委员阿尔格巴契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战线移至高加索领土和德国人的出现引起了山民中间反苏和反俄情绪的爆发，对后方供给和交通运输、对企业和通讯线路的破坏、对个别部队以及公民和军人的袭击事件都有大幅度增加。

为了保卫自己的后方，苏军指挥部被迫从前线抽调相当数量的部队，专门制订作战计划对付土匪的破坏活动。动用的军事力量有第 242 山地步兵师，外高加索方面军第 347、317 步兵师，第 28 步兵后备旅，内务人民委员部奥尔焦尼基泽夫师，外高加索方面军辖区内所有的军校学员。战史档案文件记载，第 28、44、58 军也接受了反击土匪的军事任务。在高加索，红军部队腹背受敌，被迫两面作战，进攻不仅仅可能来自对面的德军，也可能来自土匪盘踞的后方。1942 年 7 月 27 日，第 66 师的一个后备连在库尔—库玛斯山地区陷入土匪包围，在坚持了 4 天之后才被赶来增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第 114 团解救突围。1944 年 1 月，一支规模较大的土匪队伍牵制住了在山间行军的我部一个师。对行军部队打冷枪，袭击铁路沿线哨所，偷盗牲畜和其他恐怖活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1942 年 8 月，人数约 1500 的一支联合土匪队伍包围了伊土姆—卡拉地区中心和派驻在那里的一支驻防小部队，企图在这个山区夺取政权，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粉碎了这次暴动。红军在 1942 年采取的方法是把土匪驱逐出山区。由于地形生疏，侦察工作不到家，所以无法予以全歼。况且，红军得不到当地百姓支持，而土匪恰恰可以得到。随着

作战经验的积累，红军放弃了驱逐战术，开始以侧翼攻击的手段将对手分割包围，再各个歼灭。

由于德军在高加索节节败退，土匪队伍得到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急剧减少，从而有效遏制了高加索地区土匪叛乱的蔓延。1942年至1944年，红军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的部队进行了一系列作战行动，消灭了土匪的主要力量。

1944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同北高加索其他民族的遭遇一样（卡腊查耶夫人68327人，巴尔卡尔人37406人），大部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共496460人）遭到了驱逐，他们被迫离开故土，被遣往遥远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他们被指控与德国人合作，参与针对苏联红军的恐怖活动，还列举他们的抢劫和盗窃行径。尽管这样的指控在很多方面是成立的，但是清洗整个一个民族却是说不通的，毕竟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领土并没有被德国人占领。

文 件^①（机密）

国防办公室、斯大林同志：

向您汇报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结果。2月23日，驱逐工作在绝大部分地区展开，只有极个别的高山地区例外。

至29日，驱逐并被火车运出的已达478479人，其中车臣人为91250人。装运了180个运输编组，已经有159组抵达新的居住点。

今天出发的是车臣—印古什原来的领导人和宗教知名人士，这次行动是利用他们进行的。

由于大雪封山无路可走，加兰乔日地区若干居民点还有6000名车臣人未迁出。他们的运出将在两天内结束。这次行动组织得很好，没有发生任何严重抵制或者意外事件。

^① 见罗曼诺夫《车臣白皮书》，第23页，莫斯科，2000。

……对林区也进行了搜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和契卡行动小组暂时留守在那里。在行动的准备和执行期间，一共逮捕了 2016 名车臣和印古什人中的反苏分子。缴获射击武器 20027 件，其中步枪 4868 支、机枪和自动步枪 479 支。

贝利亚 1944 年 3 月 1 日

这一丧失人道主义原则的行为导致数十万车臣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人在流放途中死去，绝大多数人是无辜的。这次驱逐行动产生的最消极后果就是把打击土匪武装的斗争置于受怀疑的位置，而且也没有消灭北高加索地区的土匪活动。逃脱掉迁移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加给他们民族的莫须有罪名所激怒，转入非法地下活动，走进深山，与土匪合为一股。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在 1944 年被取消，原版图中 4 个地区全部地、3 个地区部分地并入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迁入了来自达格斯坦高原地区的 4.6 万阿瓦尔人和达尔金人。

斯大林领导层在执行驱逐时借鉴了 19 世纪 60 年代在高加索驱逐山民的经验。然而，当年的驱逐不是清洗，具有礼貌相劝、自愿和强迫相结合的特点。山民被建议迁往斯塔夫罗波尔平原地区，或者经土耳其政府同意迁往土耳其。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政府承认驱逐北高加索民族的决定是错误的。



卫国战争后的车臣

50 年代后期，大部分车臣人从流放地归来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的房屋和住宅被移民占据，也无法找到工作。这不仅造成严重摩擦，还滋生了埋藏心底的怨恨和人民内部的冲突。即使恢复了车臣的自治，也解决不了这个民族的全部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缺乏农业可耕地和潜在的失

业。以自己的实践给国家带来明显损失的“伟大改革家”尼基塔·赫鲁晓夫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纳乌尔地区和谢尔科夫地区并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管辖，车臣人在这片土地上开始积极耕种。

60年代到80年代，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局势从外部看似似乎是稳定的，但内部仍保持了紧张，仿佛已经危机四伏。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发动了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所谓“改革”以后，危机终于爆发了。80年代末，戈巴乔夫的改革路线遭到彻底失败，原加盟共和国要求主权独立和苏联解体在即都直接影响到车臣局势的发展。

其实，那段时间里，面对因苏联解体而招致的抨击和国家被掠夺，俄罗斯领导人只能忍辱负重。经俄罗斯当选总统叶利钦提名，车臣族出身的哈斯布拉托夫成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为自己的“小祖国”争得主权，他可谓不辞劳苦。

1990年年初，包括部分“台普”长老在内的车臣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教界密使开始频繁接触驻塔尔图航空师师长焦哈尔·杜达耶夫少将，他们指望在日益突现的共和国夺权斗争中利用少见的车臣族将军的影响。同年夏天，杜达耶夫退役后来到格罗兹尼，积极投身政治斗争。1990年11月，他入选车臣人民民族会议执行委员会。1991年6月，他当选该机构的主席。

10月6日，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人民联合会议执行委员会做出决议解散临时最高苏维埃，其本质无异于实现政变，篡夺政权。10月27日，在近乎军管和由武装人员完全控制的情况下，该执行委员会进行了车臣共和国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参与者仅占选民总数的10%—12%。此举被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11月2日通过的决议认定为违法。

1991年11月1日，杜达耶夫违反俄罗斯宪法，宣布车臣共和国为主权独立国家，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

主权独立地位。

车臣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俄罗斯法律，它伴随或引发了强占共和国政府、最高苏维埃和司法机构所在地，驱赶驻军，抢夺武器库的违宪暴力行为。军人被绑架为人质，要求用武器赎买，一些军事要地被封锁。抢夺、偷盗和暴力成风，局势完全陷入混乱。莫斯科对此竟毫无反应。

车臣社会一部分人中间的犯罪现象已经演变为俄罗斯南疆地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从1991年起，共和国内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800多名屡教不改的刑事犯，车臣领土内隐藏了在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受到刑事侦讯调查的1200多名嫌疑犯。在车臣，这些人甚至不回避司法部门，其中不少人面对俄罗斯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的摄像机竟然胆大妄为地摆出各种姿态来拍照。

通过对杜达耶夫的调查得知，车臣境内曾经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过卢布假币的制造。在阿尔贡城组织过大规模的假币生产，然后运往车臣以外地区去兑换真币……。

在杜达耶夫亲自领导下，还策划组织了利用伪造汇票单在俄罗斯银行提取大量资金，然后再汇往车臣，用于上述目的。经查明的事实还有从车臣往莫斯科汇款75万多美元，用于支付亲杜达耶夫的游行费用和收买某些政治势力。

俄罗斯政府非但没有干涉过杜达耶夫实现自己的计划，反而助其一臂之力。1992年6月，俄联邦军队撤离车臣时竟留下了一批武器和技术装备，而莫斯科并没有发出过类似的指令。联邦军队撤离后，遗留在车臣境内的有42辆坦克、38辆装甲车、28辆侦察巡逻车和装甲运输车，以及3万多支新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1.2万支手枪、1000多挺机关枪、1.4万枚手榴弹、1000多套掷弹筒和大量教学和其他用途飞机。

从1991年秋季起，共和国境内出现了大批武装分子团伙：“车臣民族自卫军”、“伊斯兰之路战斗队”、“绿色运动战斗队”……还组建了防御性统一征兵体系，所有15岁至

55岁男性均参与其中，同时，适龄青年人则拒绝为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

格罗兹尼官方组建的战斗队伍积极参加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武装冲突，获得了基本的实战经验。杜达耶夫政权招募了数以千计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格鲁吉亚，以及其他来自国外的土匪、在逃刑事犯、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和雇佣军人，从而把车臣变成了独特的恐怖主义中心。

1994年年底，杜达耶夫的武装分子约有5000至6000人，其中3000人接受过系统的作战训练，是所谓的“骨干”队伍，这包括了500人的国民近卫军（山地步兵团）、300人的“总统近卫军”，以及沙林坦克团（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作战人员编制）。另外，还有一个以沙米尔·巴萨耶夫为首的别动团，该团的600名武装分子基本上是来自阿布哈兹的雇佣军人。

车臣社会军事化，随处可见持枪人，土匪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以及不同团伙首领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在车臣纳杰列奇地区出现了一个与官方的格罗兹尼相对峙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其首领是区长图尔哈诺夫。

1994年10~11月，受到俄罗斯特工部门支持的反对派转入积极的军事行动。然而，旨在废黜杜达耶夫的关键性战役失手，既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也不具备实战经验的反对派武装队伍在11月26日对格罗兹尼进行的不成功的进攻中表现得无能为力。阿夫图尔哈诺夫的突击队核心力量被歼灭，反对派树倒猢猻散，俄罗斯国防部官兵陷入极度困境。联邦安全委员会曾经同反对派签署过“偷运”坦克到格罗兹尼的协议，实际成了送给分裂主义势力的最好“礼物”。

联邦安全委员会支持反对派的拙劣做法对车臣局势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情况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必须采取极端措施才能稳定局势。



车臣战争（1994～1996 年）

11 月 29 日，联邦安全委员会讨论车臣局势的会议进行得非常紧张。安全委员会部分成员（基本是策划组织了反对派进攻的那些人）劝大家相信，俄罗斯军队在车臣是没什么仗可打的，因为 70% 的居民支持俄罗斯政府军，他们会用面粉给我军铺路（当地迎客习俗）；30% 的人会中立，即使那些武装分子进行抵抗的话，也是不堪一击。

然而，军事研究机构对局势发展所做出的预测却完全相反。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试图使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相信，问题是可以政治解决的；即使动用军队，那也只限于封锁车臣边界，切断武器弹药和毒品的运输渠道，保障与车臣毗邻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和达格斯坦共和国的安全。遗憾的是，安全委员会中部分有影响的成员（切尔内梅尔金、雷布金、叶戈罗夫）认为国防部长的论点不足以令人信服。有人甚至宣称，部长的情绪是悲观主义的，必须解除他的职务。

格拉乔夫对此表示了原则性同意，明确告诉了支持自己的叶林和巴尔苏科夫。高层的 4 人领导小组进行了短暂会晤之后，叶利钦总统宣布不会解除格拉乔夫的职务，但命令他在一周内拟订好在车臣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格拉乔夫只得做出让步，不过请求给予 10 天时间。其实，即使他予以拒绝，也未必会影响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那么，就会立刻找到别人替换他，后来的实践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总参谋部也在同一天接到命令着手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保障。

1994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发了“在车臣共和国恢复宪法法律制度 and 法律秩序”的第 2137 号命令。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部队都接受了根据这一命令下达的作战任务——按照俄罗斯立法文件稳定局势，解除非法武装，恢复法律和法律秩序。

俄罗斯总统决定向车臣派遣作战部队和内务部队的目的

俄罗斯总统决定向车臣派遣作战部队和内务部队的目的在于恢复车臣领土上的宪法法律，制止自相残杀的内战进一步蔓延，确保和平与和睦，创造条件执行俄罗斯政府的决议——落实“在车臣刻不容缓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根据面临的任務确定了参战部队的组成。以北高加索军区的机动兵力为主，辅之部分中亚军区机动兵力组成联合作战群。建立了3支联合作战部队：莫兹多克方向的北方分队、符拉迪高加索方向的西方分队和基泽尔方向的东方分队。部队沿6条线路出动。

作战群最初包括了陆军第8军第20机械化师所属混成中队；陆军第42军第19机械化师所属混成中队；陆军第67军第131独立机械化步兵营；第106空降师第76伞兵空降团；第21和第56独立机械化步兵旅；空4军战斗轰炸航空队；内务部队部分分队；以及联邦快速反应部队的兵力和装备。

边防部队负责封锁制止非法武装战斗队和零散武装分子对军事行动地区的渗透，阻止他们从车臣朝达格斯坦和印古什的转移突围。给予边防军的增援于11月24日到位：陆军第42军第19机械化步兵师第429机械化步兵团进驻印古什—车臣交界的姆日契地区，并进入戒备状态。

命令要求在1994年12月5日之前完成动用部队的计划和确定行动的具体环节，这一期限也是要求部队完成备战工作的期限。纸上谈兵是容易的，实际情况也许恰恰相反。事态的发展表明，采取的措施和动用的军队数量不足以保证全面完成俄罗斯总统关于在车臣恢复宪法秩序的命令，在车臣境内的日常巡逻监督问题被疏忽了。由于参战部队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对格罗兹尼和车臣与接壤地区的边界封锁，而非法武装分子的活动范围是整个共和国，其中包括人口稠密地区，比如古捷尔梅兹，沙力、沙托伊、巴姆特和萨玛什金等地。所以，非法武装分子有机会迂回绕道，把自己的人马从一个地区转移并调集到另一个地区。在攻占格罗兹尼的战斗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列夫·罗赫林将军说：“总参谋部制订的作战计划实际成了部队的死亡计划。它没有以任何作战战术推理为依据，也没有考虑当地条件和各种因素的综合情况。这简直是冒险、犯罪式的冒险。”

1994年12月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在车臣共和国领土取缔非法武装组织活动和制止奥塞梯—印古什地区武装冲突的措施”的第2166号命令，其中阐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确认在车臣共和国和俄罗斯北高加索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非法武装力量，其活动引发流血事件，导致人员伤亡，侵犯了俄罗斯公民在该地区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三章第五条规定，俄罗斯境内禁止任何方式的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而建立非法武装和煽动民族和地区纠纷的活动。”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八条，我决定：

为保卫国家和法制，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同犯罪现象做斗争和解除一切非法武装，责成俄罗斯联邦政府动用国家拥有的一切方法和手段。”

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使用强制性手段解除这些非法武装的第1360号命令。

1994年12月11日早晨7点钟，执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作战部队开始在车臣领土上有组织地向指定区域推进。做出了在行动过程中使用武器的一些规定：只能回击，只能消灭武装分子，不实施空中打击……这次行动只仓促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组编混成部队，制订作战计划，补充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补足人员编制，完成部署。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实际是无法完成这么多工作的。因为部队现状决定了步兵和作战车辆之间必须进行配合训练，进行参谋人员演练，这也包括内务部队和联邦边防军……其实，联邦部队根本不具备局部战争的经验。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对军队现状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公平的。但是，没有人对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感兴趣。

军事行动刚刚开始，部队便遭到武装分子的顽强抵抗，一部分居民也参与其中。其结果是没有一支部队按时完成任务，突破进格罗兹尼城。尽管在战斗中俄罗斯士兵表现英勇、果敢和坚强，但从交战一开始，联邦部队指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部队训练的严重不足等许多消极因素就暴露出来了。部队缺乏实战经验，训练水平低下。开战的第一个昼夜，我军被烧毁、掠夺和毁坏的军事装备就达到 72 件，数百名官兵伤亡。

对于指挥部而言，最大的意外是，12 月 12 日 14 时 20 分（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刻），火箭部队误射行军途中的空降师第 106 混成团，导致 6 名军人阵亡，13 人受伤。

12 月 15 日，车臣代表团在符拉迪高加索城断然拒绝同俄罗斯领导人继续进行谈判，要求俄罗斯联邦把车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而这是俄罗斯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

12 月 31 日，第 131 独立机械化步兵旅和第 81 机械化步兵团 1 营首先入城。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两支部队推进到火车站，并占领之……入城以后，我军开始付出沉重代价。两天战斗中，仅第 131 旅就损失了 85 人，其中包括旅长，另有 75 名军人下落不明。这个旅进入格罗兹尼的 26 辆坦克中有 20 辆被击毁，120 辆步兵作战车辆损失了 102 辆。当然，非法武装分子的损失更大。

在 3 天时间里，联邦军队不顾自身的重大损失，始终试图占领整个格罗兹尼。但是，东方面部队撤退了，西方面军部队陷入与敌人的对峙，北方面军部队（第 131 旅和第 81 团）被击溃了。只有第 8 军（指挥员罗赫林中将）第 20 机械化步兵师的一支混成部队勉强在市中心支撑下来，为继续进攻创造了立足点。1 月 5 日，第 129 机械化步兵团撵走了松日河东岸军事城堡内的非法武装分子，并于次日一鼓作气攻占了市中心另一处军事城堡。联邦军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巨大努力逐渐地控制住格罗兹尼市中心，然后在 1 月

19日轻易地拿下“总统府”。

为了顺利结束军事行动，需要对战果进行巩固和扩大。对此，内地各军区均予以积极协助，甚至有一支海军陆战队参加了战斗。

2月3日，格罗兹尼战役收尾开始。3天以后才实现了对全城的完全控制，非法武装分子开始大批逃离。

格罗兹尼战役之后，联邦军队乘胜追击，对临近的重要村镇相继予以封锁包围和清剿。1995年6月，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处在联邦军队的控制下，非法武装分子残余逃进了山区。在拟定消灭杜达耶夫的特别突击行动计划之际，政治家们再次予以干涉，力主停止军事行动，同对手进行谈判。他们的行径使局势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令军方百思不得其解。时至今日，政治家们也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

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的战术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类同于阿富汗圣战者。显而易见，在教官指挥下，非法武装的指挥员对此做过详细研究。他们在山地战实战中表现出的良好技能，说明他们具有较高的训练水平。非法武装分子注重战役的准备工作，包括细致的侦察和对作战区域的选择。自战事开始以来，他们就运用不同战术手段与俄军周旋，有效的惯用手段是袭击和占领联邦军哨卡和孤立的据点。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哨卡所在区域范围较大，而哨卡之间往往没有火力接合，使敌人得以在某一点集中兵力……。

匪徒还经常在我军行进路线上设伏，给我们造成不小的损失。他们提前选择设伏地，构筑火力工事，放置遥控炸弹。通常放过作为先导车的侦察编队，再引爆遥控炸弹使载有探雷器的坦克瘫痪下来，接着集中火力猛烈攻击指挥车和车队中部，击毁运载物资的车辆。有时，匪徒发起进攻的时间选在前导车已经进入基地中心地区并已经发出车队抵达报告的那一刻。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7月，车臣匪徒在沙托斯和维杰峡谷设伏5次，致使俄军阵亡106人，伤117人；损失坦克两辆、军车12辆、载有物资的运

输卡车 16 辆。

在设伏的策划准备阶段，非法武装分子积极侦察我军车队的行走路线，严密监视车队离开驻地的时间，监听野战无线电台对话，利用当地居民侦察我军车队的移动情况，车队动态信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递到前方埋伏点的作战小组。他们还特别注意有无直升机掩护和警卫部队的编组情况。

1996 年 4 月 4 日，亚雷什玛尔德地区行政当局为配合同分裂主义分子签署和约，命令在该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匪徒们利用这个机会制造了令人震惊的袭击事件。事情是这样的：亚雷什玛尔德东部地区的一条公路上被事前安放了大功率遥控炸弹。我军一支车队经过时，它炸毁了坦克先导车，接着被战毁的是指挥联络车和作战指挥车，上面载有指挥员、对空瞄准手和通讯兵，车上的短波电台同时报废。他们还对我军无线电网超短波频率发射大功率电磁干扰，使受阻部队完全失去了同指挥部的联系。

接着，匪徒从两侧提前构筑好的工事里近距离射击，短兵相接。他们围困住第 245 机械化步兵团的后勤运输车队，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击毁了所有武器装备，消灭了所有人员……参加这次行动的总共有两个中队、4 个小队的 150 名非法武装分子。

1995 年春天，俄罗斯联邦部队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不得不俯首称臣。平原地带的大部分居民区也已处在联邦军队控制之下。6 月初展开了夺取山前地段的进攻，俄军在沙托伊、玛赫涅特、维杰诺三条峡谷地带重创非法武装分子，歼灭了大股匪徒，夺回了全部居民区。在与俄军的这次直接较量中，非法武装分子方面损失惨重，完全丧失了正面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把赌注押在了恐怖暗杀活动上。联邦部队联合作战群司令员罗曼诺夫少将就是遭遇恐怖分子的暗杀后身负重伤，最终导致残废的。他们在布坚诺夫斯克、古捷尔梅兹、基兹里亚尔和格罗兹尼等地进行的恐怖活动更是俄军指挥部始料未及的。

军事侦察机构每天都要把恐怖活动的可能性情报汇报上来，也有消息不断显示，恐怖分子已经出动前往阿斯特拉汗至顿河—罗斯托夫一带的某些地区。根据某些侦察情报，巴萨耶夫曾经多次动身前往莫兹多克，或在途中，或又去了汗尔卡，或处于前往“北城”的路途上……其实，这些情报经常有误。

非法武装分子善于把真实目的巧妙地遮掩起来。久而久之，关于他们要实施恐怖活动的例常情报不再被重视了，也就是说出现了疏忽。的确，日复一日地使人力物力处于一种强化的紧张状态是难于做到万无一失的，巴萨耶夫匪徒终于在布坚诺夫斯克得手了。他们的胆大妄为和野蛮行径当时在国际社会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在一次有巴萨耶夫参加的杜达耶夫战地指挥官会议上确定了展开恐怖活动的3个目标：莫斯科、克拉斯诺达尔和布坚诺夫斯克。就在悲剧发生前一两天，来自重组的车臣警察局的一位警员试图把有关情报转告给俄罗斯内务部驻车臣代表，遗憾的是，此人不但没有得到信任，反被指责为挑拨离间。

6月12、13日，关于土匪可能要突袭的一份密电发送给了法制机关、安全部门和部队领导人。

在布坚诺夫斯克绑架人质的行动是由专业水平很高的车臣人策划实施的。匪徒的第一次攻击目标为什么选择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呢？首先是因为距离车臣近。其次，当地有户口的车臣人约7万；没有户口的车臣人也有数万。在布坚诺夫斯克城内，距市立医院不远处有一家车臣人注册的公司“伊尔比斯”的办公楼，该公司承租了医院的部分仓库。情报表明，恐怖行动中使用的枪支弹药就是事先转移藏匿到这个仓库里的。

恐怖分子一行人分乘3辆挂斯塔夫罗波尔地区车牌的“卡玛兹”载重卡车，在“日古力”警车护送下从维杰诺出发，经达格斯坦荒野地带和废弃道路，出现在凯斯比斯克一

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公路线的斯塔夫罗波尔路段，然后拐向涅夫吉库姆斯克。

6月14日晨，“卡玛兹”打着前灯疾驶过涅夫吉库姆城和列沃库姆斯克村，直取布坚诺夫斯克。有一个疑团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开：运载着那么多人的车队如何能顺利穿越过被强力部门严格控制的地区？后来才搞清楚：原来，与达萨耶夫同乘“卡玛兹”的只有少数随行人员，大部分匪徒已经在6月14日之前潜入城内。而当地车臣人的家眷已在事发前两天离开布坚诺夫斯克，留下来的都是拥有战斗能力的男人，其数量相当于巴萨耶夫参战人员的1/3。

交警证实，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两辆“卡玛兹”先停在了入城处的边防检查站附近，伪装成警车的“日古力”开过来，坐在里面着警服的斯拉夫模样的男人说，“卡玛兹”运送的是阵亡军人，然而，“卡玛兹”停也不停地就开了过去。命令迅急传到前方检查站：拦截车队进行检查。在下一个检查站，他们被迫停下车。伪装的警察拿不出应该交验的证件，他们只得掉转头跟着驶向警察分局。交通警察排排长波波夫开车在前，另两位警官契普尔金和格拉西梅科驾驶“莫斯科人”殿后。当时听到他们对话的其他警察证实，格拉西梅科告诉波波夫，后面的“卡玛兹”掉队了，波波夫命令“把它赶过来”。看来就在这一刻，那辆“卡玛兹”刹车停下，3支冲锋枪把“莫斯科人”扫得一片窟窿眼。在“卡玛兹”轰隆隆的马达声中，波波夫竟没有听见枪声。他在距警察分局200米处停下车，看到第一辆“卡玛兹”在刹车，就快步跑向分局办公楼，但没来得及跑到就被子弹追上来击倒。

匪徒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警察分局，但又匆忙离去，甚至连那里的枪支都没有碰，这说明他们的目标在别处。市政府大楼和军事代表处同样是如此迅速地被占领。与此同时，另外两伙匪徒闯进了集贸市场和青年宫。在警察分局门前事发前几分钟，其中一股匪徒出现在集贸市场里，

伊萨耶夫在车臣用俄罗斯城市复制一幅“死亡和毁灭的画面”

商贩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他们身上，只是在警察分局那边传来枪声的那一刻，他们才对着摊位扫射起来。这时，城里出现了许多小轿车，头戴面具的人使用自动步枪从车里朝人群猛烈扫射。事后在部分被击毙的匪徒衣袋里发现了宾馆的收据存根，证实他们是以出差人员的身份在宾馆登记入住的。

在市中心行凶以后，匪徒们在加里宁大街汇合起来，列纵队向医院推进。沿途抓捕住宅内的居民，反抗者就地枪杀。情况表明，匪徒们不是随便乱来的，他们是在按计划行动，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落实起来非常迅速。下午16点，所有匪徒都集中在了目的地：市立医院。在这里，他们枪杀了几小时前扣押的、已经负伤的飞行员和警察。

恐怖分子为什么会选择医院？显然，医院是最易于制造“活人盾牌”的目标。他们可以借“活人盾牌”来要挟政府。当时在医院内有800名患者和300名医务人员。再有，如果对布坚诺夫斯克的“斯塔夫罗波尔—聚合厂”进行破坏，那无疑是一次小型切尔诺贝利事件，但它未被匪徒列为攻击目标。在控制该市的3小时内，匪徒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这家几乎不设防的工厂，用掷弹筒轰击矗立在厂区的大量储油罐。万分侥幸的是，没有一个匪徒在厂区出现。不过，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仅仅企图在车臣用俄罗斯的城市复制一幅“死亡和毁灭的画面”。制造生态灾难的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它势必会勾销恐怖分子们的初衷——吸引国际社会对车臣局势的关注和制止战争。除此以外，巴萨耶夫知道这家公司已不是俄罗斯产权，在引资招标中获胜的是“梅纳捷普”的子公司，它又把工厂的控股权转卖给了一家著名的荷兰公司。

巴萨耶夫故意释放了医院里的非俄罗斯人：越南人和土耳其人，以此表示自己无意触犯西方人权。他指望西方人即使不同情他，起码也会理解迫使他孤注一掷的原因。

这时的布坚诺夫斯克已被恐慌所笼罩。前往医院前集结

的当地警察各自为政，无法建立起严密的封锁圈。如果巴萨耶夫当时就打算撤离的话，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恐怖事件发生的第一天里，政府在布坚诺夫斯克和临近的村落里展开了挨门挨户的检查 and 搜捕。城里的车臣人所剩无几，只有一些老弱妇孺。他们全部被带往警察局，关进地下室。这样做是试图以当地车臣人交换人质，并对匪徒施加压力：如果情况恶化，他们将全部被枪毙。而巴萨耶夫的回答是非常冷漠的：“他们不是车臣人，是俄罗斯公民。如果你们愿意，就请便吧。”

国内爆发了强大的反车臣情绪。从城市到乡村，以致哥萨克的村会，驱逐车臣人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车臣人的踪迹开始在布坚诺夫斯克市内和斯塔夫罗波尔州的其他城市消失。

联邦安全厅和内务部的队伍，以及作战总局人员和“维加”（原信号旗）小组于6月14日19点抵达布坚诺夫斯克市。当天下午15点，“阿尔法”反恐怖特别行动小组也进入戒备状态。给他们的情況通报非常简短：一股车臣人在布坚诺夫斯克袭击了警察分局。队员们迅速集合完毕，可待命却持续了3个小时。后来命令终于下达了：“武器弹药和装备迅速装车……19点起飞。”不过，并没有解释布坚诺夫斯克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尔法”小组终于在晚上8点30分升空，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他们被带到曾经被恐怖分子占据过的那个警察分局，同时也得到了第一手可靠情报。

此前两小时，俄联邦内务部长维克多·叶林、联邦安全厅主任谢尔盖·斯捷帕申和副总理尼古拉·叶戈罗夫来到现场，叶林负责指挥作战行动。

6月15日清晨5点钟，内务部队在市郊和市内展开肃清非法武装分子的作战行动。必须承认，作战行动指挥者对散布于医院外的武装匪徒会伺机袭击我军腹背的担心得到了证实。为巴萨耶夫匪徒刀下的第一批牺牲者下葬前不久，我

军参战人员歼灭了一股在城内公墓一带设伏的匪徒。对射中，两名匪徒被击毙，另有3人拉响手榴弹自尽。不久，在火车站一带也发生了枪战。

6月16日，巴萨耶夫向政府交出了被他们枪杀的71具人质的尸体；当天，作战人员得到情报说，他们至少还要干掉5到8名人质。傍晚时，与巴萨耶夫的谈判陷入僵局，原因是我们显然无法满足他提出的要求，况且他还不愿妥协。到了夜里，巴萨耶夫干脆回绝了任何谈判。也就是在这时，决定对他们采取最后行动。

那一刻，我们已经掌握了对医院里匪徒人力和物力分布的空中和地面侦察结果：90人、90支冲锋枪、40个“蝇式”掷弹筒、20套“丸花蜂”火焰喷射器、2挺卡拉什尼科夫重机枪、300枚手榴弹和100枚各式地雷。匪徒中大部分人有犯罪前科。

“阿尔法”小组指挥员在熟悉了情况以后，试图说服作战行动领导人相信不宜采取强攻手段。专家意见认为，进攻无疑会给人质和进攻者造成重大伤亡。原因之一是，医院内的人口密度大；第二，匪徒人数相对较多；还有一个困难是医院的石墙很厚实，一层的窗户全部有栅栏，进入楼内只能通过3米高的二层，而二层的窗户也都做了相应的防御措施。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整个医院已经被巴萨耶夫匪徒布雷，一旦发起进攻，就有可能大家一起升天同归于尽。然而，专家的论证被认为缺乏说服力。

整个进攻行动是这样设计的：“阿尔法”小组首先突破进医院城，抢占主楼；莫斯科州快速反应特别分队抢占创伤科楼；莫斯科市快速反应特别分队抢占传染病科楼；内务部快速反应特别分队抢占车库；“维加”小组通过那片空地支援“阿尔法”小组；给“阿尔法”小组配备了14辆步兵作战车来加强力量，这些作战车必须在诱敌火力打响后10分钟时到达；部署在建筑工地和空旷地带的4辆装甲运兵车要给予进攻人员火力支持。车上均安排了狙击手。

参加进攻行动的军人将近 300 名，其中有“阿尔法”小组和 27 对狙击手。按照计划，在行动的第一阶段要完成一系列任务：限制对手运动，把门诊部同主楼分割开来，以便占据更有利的地势，确认对手位置，利用狙击手消灭之，解救部分人质，对敌人展开法制严厉性的强大宣传，迫使他们同意进行谈判。

由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叶戈洛夫上将下达作战任务。只有 3 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显然，这对重新参战人员编配时间都不够，更谈不上正常的战斗组织，以及起码的勘察选点。不过，听取了“阿尔法”成员的意见后，叶戈洛夫同意推迟动手时间，但最多一个小时。

6 月 17 日凌晨 4 点半，特遣队人员才在出发阵地集结完毕，快速反应部队紧随其后。诱敌火力打响前 10 分钟，“阿尔法”第一小组已经渗透到医院建筑群一带，分为三个分组，控制了车库—洗衣房地段。

另外两个小组在同一时刻接近了创伤科和传染病科，那里也没有恐怖分子。但他们刚刚试图穿越一片面积不大的空地，就遭到了巴萨耶夫匪徒的猛烈射击。事后得知，有人提前两个多小时向巴萨耶夫透露了消息，匪徒一直在等候我们发起进攻。不过，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承受不住了，否则，再过几分钟，“阿尔法”小组大部分人员也会进入这一地段，那我们就会蒙受更大损失。

重机枪、掷弹筒和冲锋枪在 20 至 30 米的近距离猛烈扫射起来。“阿尔法”小组在最初一刻便遭受到损失，特别困难的是潜伏在“口蘑”里和落入“火力口袋”的那个小组。距离车臣匪徒最近的是符拉基米尔·索科洛夫，他同主力小组失去联系以后，一个人坚持独立作战 30 分钟。后来在他身上找到了 3 颗子弹，两颗在胳膊上，一颗钻进了后背……进攻创伤科的小组也遭遇到了猛烈的火力抵抗。是德米特里·里亚宾金化解了这一险情，这位优秀射手在短促的几秒钟内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击毙了杜达耶夫的枪手，使主力小

组得以掩蔽起来，而他自己未及退下，不幸中弹牺牲。闯入膳食间的那5个人被敌人的火力切断了返回车库的退路，而室内又被投了许多手榴弹。他们能生存下来，简直是奇迹。如果有谁能给予火力支持，他们早就可以冲进楼里去了。然而，本该在那片空地上进行火力掩护的装甲车迟迟没有出现，许诺的步兵作战车更是不见踪影。

于是，“阿尔法”小组的狙击手不得不去掩护自己人。他们要克服200米距离的困难。一颗疾飞的子弹击中德米特里·布里亚耶夫……。

这一天，“阿尔法”小组人员连续4小时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战斗结束以后，一名战士发现自己身上有9处被击中：防弹背心上3处，冲锋枪枪身和子弹盒上有3处，身上有3处。在喀布尔参加过攻打阿明总统府的特遣队员表示，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

战斗打响3小时以后作战车辆才到达，而这时已不能再强攻了：恐怖分子把人质推到了窗口。“阿尔法”小组怎么会对着孕妇和儿童开枪呢。

8点30分，医院的楼顶燃烧起来，附楼的窗户也冒出浓浓黑烟……注定会死的人质们在窗口摇动着白床单，“别开枪！”“别打死我们！”绝望的喊叫声在枪炮声中格外刺耳，一个街区外都能听见。9点20分，进攻医院的战斗停止下来。而“阿尔法”小组和“维加”小组的指挥员认为，停止进攻的命令是错误的，因为遭受惨重损失的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正准备接受政府的谈判条件。谈判还是开始了……。

11点钟，巴萨耶夫释放了一批孕妇和母子，共150多人。另有130多人被允许自己走出来。这时，医院里有两层楼起火了，里面的匪徒试图扑灭，但无济于事。于是，两辆消防车被允许开了进去，及时扑灭了火。

这一天，“阿尔法”小组的所为是常人所不能为的。他们以死3伤13的代价击毙巴萨耶夫匪徒15人，击伤48人。

6月18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的倡议下，沙米尔·巴萨耶夫同他进行了电话谈判，在场的有政府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维兹、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联邦安全委员会书记奥列格·洛博夫。作为释放一大批人质的交换条件，总理保证政府军将停止在车臣境内的军事行动。沙米尔·巴萨耶夫要求驻车臣的联邦部队指挥官安纳托里·库里科夫出具书面保证。这一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恐怖分子押上少数人质，乘车朝车臣方向驶去。6月20日，恐怖分子的车队拐向哈萨维尔特方向，在占达克村释放了最后几个人质以后，消失在车臣境内。

切尔诺梅尔金同巴萨耶夫签署协议之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举行了民俗礼仪舞会：这次行动以他们的成功而告结束。尽管在布坚诺夫斯克的医院里他们为达目的不惜卑鄙地使用孕妇来遮挡俄军枪火的做法是被山民习俗禁止的，但在车臣人的眼中，这些人还是成了民族英雄。

“阿尔法”小组指挥官古谢夫中将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警卫总局局长召见我，命令我飞往布坚诺夫斯克，同时说明，作战隶属关系上，作战分队服从内务部副部长M.叶戈洛夫上将的指挥。”

“‘阿尔法’小组抵达布坚诺夫斯克时，已经有3位部长在指挥部进行作战部署了：内务部长叶林、民族事务部长H.叶戈洛夫、联邦安全厅主任斯捷帕申。他们吩咐我同‘维加’小组指挥官鲁戈洛夫一道研究局势，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如何实施作战行动提出自己的建议。”

“头两个昼夜，我们对医院建筑群实施了包围封锁。后来，在决定发动攻击前，我们呈报了人员和武器数量。必须指出，攻打100到200名土匪扣押着1000多人质的医院，尽管其前景难于预测，但对突击人员和人质中可能会出现伤亡，我们还是提前打过招呼的。更何况，当时得到的情报说，医院主楼已被布雷。”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估计，我们提出不宜强攻。但最终

国家高层领导人还是决定发动进攻。总统命令是通过巴尔苏科夫将军下达的。动手时间定在凌晨4点，希望以出其不意来取胜，可是没有做到。医院之外也有恐怖分子的同谋，特遣部队向出发阵地秘密移动时，他们向敌人透露了消息。另外，战地急救车的大夫们无意中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们在无线电联络中提醒同事们将会有大批伤员出现。曾经推迟了动手时间，那是因为匪徒在医院周边布设了雷区，而排雷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建议调遣装甲车编队给予进攻小组火力支援，但内务部领导人没有采纳。我们被告知，技术装备将在进攻开始之前达到，但实际上它们迟到了许多。‘阿尔法’小组是进攻的尖刀，内务部的特遣分队是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

“凌晨4点钟，‘维加’小组行动方向得到了开火的命令，以吸引恐怖分子注意力。‘阿尔法’小组从另外3个方向发动进攻。我们同匪徒的力量对比是大致势均力敌，而所有的作战条例都要求进攻方起码应具备3倍的兵力优势。情况的严峻还在于，装甲车只能对墙射击，因为恐怖分子把妇女抵在窗口，躲在他们身后，从其手臂和双腿后射击。尽管如此，‘阿尔法’小组还是给予了他们沉重打击。我们占据了部分建筑，克拉斯诺达尔分队从一个方向突进一层楼，但其他两个小组陷入‘火力口袋’，被猛烈的射击压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在距主楼20至30米处掩蔽下来。索洛维耶夫少校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掩护同志们撤离，自己却倒在敌方狙击手枪下。布尔里亚耶夫中尉和里亚宾金中尉也牺牲了，‘阿尔法’小组受伤人员达到了30人。用语言是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只得下令回撤。”

“虽然我们未能迅速拿下医院，但匪徒们已经动摇。除了自己逃出来的人质，他们还释放了其他一些人，包括若干产妇。‘阿尔法’小组完全有能力结束这次行动，绝不会让这些匪徒以胜利者的姿态逍遥法外。”

“谁知道，此后开始了‘政治游戏’。议会代表来了以

后，恐怖分子更是捕捉到了我们的软肋，没有再释放过一个人质。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同匪徒进行了谈判，给予了他们人身安全保证，这对全世界都没有隐瞒。我们没有权力擅自破坏这些许诺，不过我个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也是没有权力同恐怖分子谈判的，布坚诺夫斯克事件的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我们准备在跟踪匪徒的过程中将其歼灭，但始终没有接到可以这样做的命令。起码，那位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时说出的那番话是不得体的，他说他不明白特遣部队为什么没有在恐怖分子返回车臣的归途中把他们消灭。他给巴萨耶夫作了许诺，但并没给我们下达什么其他命令。”

“‘阿尔法’小组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遗憾的是，没有授权我们为这次行动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觉得，如果在布坚诺夫斯克没有放虎归山，那么，后来在基兹里亚尔和彼尔沃玛伊斯克两地就不会悲剧重演。正因为在恐怖分子眼中，袭击布坚诺夫斯克行动相对来说是成功的，所以拉杜耶夫才敢再次铤而走险。”

此后，车臣恐怖分子的气焰愈加嚣张起来，而且经常把妇女和儿童当作活人盾牌。

……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签署的和平协议下掩盖了许多秘密。为什么在格罗兹尼被非法武装分子占领之前，我们从城里撤走了常规部队，只留下内务部队？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类似草率和无异于犯罪的无所作为终于导致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于1996年8月6日潜入格罗兹尼市内，发动突袭并攻占了全城。分裂主义分子甚至闯入阿尔贡和古杰尔梅兹两处袭击俄罗斯政府驻车臣代表处。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列别德热衷于作战与谈判轮换交替的做法延续到8月20日。此后，尽管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包围了格罗兹尼，并且准备恢复失去的优势，但车臣人竟试图迫使俄罗斯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军界同列别德之

间产生了矛盾。军队代表建议把武装分子赶出城去，联邦部队作战群副司令员普里科夫斯基将军建议平民在两昼夜内离开格罗兹尼城。而列别德却执意履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意图，签署了轻说于俄军不利、重说就是俄军耻辱的停火协议。根据列别德和马斯哈托夫之间的停火协议，1996年8月22日和8月23日中午在车臣全境停火。8月31日，在哈萨维尔特城，列别德和马斯哈托夫在欧安会驻车臣代表古尔吉曼的监督下签署了确认俄罗斯联邦同车臣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原则基础的协议，并且发表了在车臣停火的联合声明。军队随后撤走，莫斯科也就失去了对这个共和国的控制。战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暗中发生作用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背叛行为，还是高瞻远瞩？深藏在背后的究竟是什么势力？这场战争的发起人和终结者是谁？目前还没有答案，但秘密迟早会逐渐明朗，所以希望还是存在的，哪怕只让全体俄罗斯人民了解车臣战争的一点点秘密也好。



“独立的车臣”

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签署以后，车臣共和国的战事（1994~1996年）平息下来，但导致战争的原因没有消除。在这3年时间里，俄罗斯政府为寻求摆脱北高加索复杂局势的途径作了种种努力。照理说，许多方面都应该有所改观。然而，俄罗斯领导人面临的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老问题。

俄罗斯法律在车臣境内已经失去效力，联邦军队也已撤离车臣领土，车臣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车臣选举了自己的总统玛斯哈托夫。车臣领导人始终在致力于解决两个对独立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使车臣转变为国际法主体和北高加索冲突的国际化；挑动“高加索战争”，利用具有鲜明反俄色彩的宗教民族狂热主义在北高加索民族自治区域内建立不安定因素的策源地。

为达此目的，极端主义的车臣首脑制定并采取了相应的

策略。其基本原则是：车臣依靠武力获得了独立，作为战败方的俄罗斯理应给予无条件赔偿；和平与和平进程是从俄罗斯获取财政经费，以及食品、武器和军队服装的手段。除此之外，车臣在所有事务中都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武装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车臣毗邻地区的驻军中间制造死亡恐惧（涣散他们的军纪，绑架他们做人质，直至处决）。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活动猖獗一时（攻击那些持爱国主义立场的俄罗斯人，污蔑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拉拢那些心理慌张的人；利用“丧失良心的俄罗斯人”；在属于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共和国领土上制造民族矛盾，挑拨俄罗斯同当地民族的关系，任何不幸事件都嫁祸俄罗斯人；而那些不愿遵循伊斯兰法典生活的民族主义者则会被处决，然后栽赃俄罗斯人和哥萨克）。计划遣员深入到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工矿企业扰乱正常工作，败坏俄罗斯人的名声和制造社会紧张气氛，并借此转移政府和社会对车臣的注意力。

车臣人认为，俄罗斯的政府部门和财政部门都被收买了，许多官员依靠黑社会生存，所以拟定计划要在黑社会，特别是民族色彩浓重的黑社会结构中，比如达格斯坦人、印古什人、茨岗人以及高丽族的黑社会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这些黑社会实现自己的运作，获取必要的资金和指令。在这方面，莫斯科具有特殊地位。在那里，车臣黑社会得以在许多经营良好的商业领域落脚扎根。

车臣武装分子必须通过第三者的行动来落实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和命令，以掩盖自己的罪责和逃脱追究；引发社会安全危机和紧张气氛，导致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和国际局势紧张化，从而达到激化民族矛盾，加剧地区冲突，诱使俄罗斯北高加索国家同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目的。

“台普”和车臣流亡势力、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社团和民族宗教团体都是车臣首领在北高加索地区开展活动的中坚力量。对他们而言，“民族独立”思想是实践活动的纲领性

原则，也是共同任务。另外，俄罗斯境内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在逃刑事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团体也是车臣依靠的力量。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给予车臣财政和物资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事态的发展表明，车臣领导人只是利用“和平进程”由俄罗斯掏腰包来为自己解决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中央政府毕竟一如既往地视车臣为俄罗斯联邦主权所辖，继续向车臣财政拨款，十分认真地划拨资金用于退休金、抚恤金和和公务员薪金的发放。然而，所有这些资金都被挪作他用。

俄罗斯检察院“通缉”参与布坚诺夫斯克和基兹里亚尔恐怖主义事件的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并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然而，这些家伙们连藏也不必藏，因为车臣实际上已经处于俄罗斯法律空间之外。他们不断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打肿脸充胖子地硬说自己是伤害不到的，并对俄罗斯领导人发出咄咄威胁。

那段时间，车臣局势的发展完全是“阿富汗式”的：虚弱的格罗兹尼政权、各自为政的战地指挥官、他们之间的内讧之争、车臣政府缺乏能力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针对平民百姓发生的恐怖和讹诈活动。分别以玛斯哈托夫、扬达尔比耶夫、巴萨耶夫和杜达耶夫等战地指挥官为首的各派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巴萨耶夫、哈达卜、巴拉耶夫或者哈尔哈罗耶夫之类的战地指挥官不放弃绑架人质等恐怖活动。车臣境内活动着一大批不在玛斯哈托夫总统控制之下的恐怖主义土匪团伙，他们试图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伊契凯里毗邻地区，袭击边境地区的村庄和居民点，枪击边防哨所，恫吓本民族百姓。来自车臣的土匪袭击，盗窃机动车辆和牲畜，从输油管道线偷盗石油，随意绑架人质（包括外国公民和记者）并作为奴隶出售，杀害俄军官兵，拖延战俘和人质问题的解决，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对俄罗斯方面进行虚张声势、夸大其辞的无端攻击，甚至污蔑俄罗斯特工人员参与扣

押记者事件等等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人质和红十字人员被害问题，国际慈善机构和人权组织于1997年年底终止了在该地区的活动。

首恶的恐怖分子被英雄主义化使恐怖分子在心理上受到鼓舞，全社会男性公民佩带枪支，不愿意履行俄罗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固守宗教法规，依靠犯罪致富，把犯罪式的生活方式当作生存方式，绑架勒索等等，这一切都为恐怖主义毒素向俄罗斯蔓延创造了条件。另外，车臣恐怖分子还在依靠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而国际恐怖势力则利用车臣武装分子和国外武装土匪雇佣军进行侵略扩张，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伞。某些势力还妄图利用恐怖行为支配俄罗斯及其盟国，分散它们对基础设施、平民百姓和其他恐怖分子潜在袭击目标的保护力量；甚至企图公然侵占俄罗斯领土，动用军事力量破坏俄罗斯联邦的完整，建立所谓的大高加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飞地。

共和国境内保留了极端主义的武装组织，俄罗斯居民持续受到种族迫害，经济生活严重瘫痪导致的居民普遍贫困，这就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生存方式而打起邻国的注意，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伊契凯里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也孕育着武装冲突的爆发。车臣百姓就是这样沦为了非法武装头目自尊与傲慢的人质和可以获取赎金的商品。记录对人质进行拷打、剁指和砍头的录像带成为车臣的特色产品，并在俄罗斯和欧洲广为流传。心理恐惧迫使被害者亲属打开自己的钱袋。这类事件中最为著名的有杀害3位英国工程师和一个新西兰人并砍下他们的头颅，以及6名国际红十字组织人员被害。类似悲惨绝伦的人间悲剧数以千计，大多来不及曝光。车臣实质上已经被非法土匪武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所侵占，他们在那里确立自己的秩序，而百姓的“支持拥护”并非由于惧怕或者自愿合作，而是源于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在车臣人眼中，如果土匪属于武艺高强的骑士而又不针对本地百姓，那他们几乎就会被视为民族英雄和被模仿的楷

模。不过，土匪的暴力手段已经逐渐引起百姓反感，但还不敢流露出来，因为那样做只能遭到镇压。

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哈萨维尤尔特协定以后，继续以令人难以理解的固执落实车臣方案的“和平进程”，而这从一开始就对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民族统一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哈萨维尤尔特协定签约之后，俄罗斯同车臣的相互关系仍然令人不安绝非偶然。不论是“和平进程”，还是始于1996年的“和谈”，都没有真正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只是使公开的武装冲突转变成了永久性的沉重对抗，而车臣犯罪体制的头头们正好借机“合法”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被“封存”住了。时间逐渐证明，不顾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撇开同各种形式的犯罪现象做斗争，不把北高加索问题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解决，解决车臣问题就是毫无希望的。然而，俄罗斯领导人做不到以坚定的意志制定一套完整、统一和灵活的政策，只推出了观望等待的无效策略，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和缺乏主动性。许多不愿承担责任的领导人有意识地同车臣问题的解决保持距离，这种做法最终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积极后果，相反，北高加索的局势更加恶化了。极端主义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势力的触角伸了过来，他们开始在此建立自己的基地（比如达格斯坦的卡达尔地区）和培养恐怖分子的训练中心，推行自己的秩序，并推出经过详密考虑的超前计划——依靠同盟者扰乱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使它脱离俄罗斯，从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在俄罗斯政府的软弱政策下，是不可能以强力手段来制止住恐怖主义浪潮的。没有制定该地区的总方针和民族政策，没有从俄罗斯未来民族利益的角度对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区政策进行战略展望，反恐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鉴于险恶的现实情况，研究制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在北高加索地区强化向心力，从而有利于捍卫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和提高俄罗斯影响力的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性强硬政策已

经迫在眉睫。

俄军指挥部汲取 1994 至 1996 年车臣战争的经验教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北高加索作战群实力，提高各级部队战斗力，研究制订了反游击战的手册、规程和细则，部队针对非法武装分子的战术特点进行了训练。建立了由内务部队和常规部队驻扎的据点体系，以保护车臣周边地区的百姓安全。

车臣“独立”后的那段时间内，有 2/3 的当地居民逃离，即 20 万俄罗斯人和 60 万车臣人。留下的大部分人仅仅是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而无法离去，尽管很想离去，无奈没有资金，或者在俄罗斯没有亲戚。这些人不幸成为分裂主义的人质。整个俄罗斯都好像人质似的陷入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的肮脏陷阱：土匪拐骗儿童，绑架人质、记者和神职人员，对妇女施暴，扣押俄罗斯总统代表和内务部高级官员，切割人质的手指、耳朵和头颅。“独立的”车臣为所欲为，目的就是要俄罗斯人改变观点，放弃因第一次车臣战争对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指责。



俄罗斯军队在北高加索地区的 反恐怖行动

1999 年 8 月 2 日，车臣恐怖分子袭击了达格斯坦境内楚玛金地区的联邦部队哨卡，尔后，在战地指挥官巴萨耶夫和约旦雇佣军人哈塔卜率领下，近 2000 名匪徒以事先构筑的据点为依托，闯入达格斯坦山区。他们在博特里赫和楚玛金地区的居民点大肆烧杀抢掠。他们的目的在于推翻达格斯坦的宪法制度，在车臣和达格斯坦领土上建立统一的、以伊斯兰法典模式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进而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扩大影响，使其脱离俄罗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在车臣战地指挥官和博特里赫、楚玛金两地曾在车臣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少数居民参与下，分裂主义分子召开国民议会，决

定在这片土地上成立伊斯兰国家。

恐怖分子认为联邦政府仍会消极无为，并寄希望于得到部分达格斯坦人的支持，所以迅速占领了一批居民区，悄悄向外扩大自己的影响。当地民众把这次土匪行径看做是车臣对达格斯坦的挑衅，对整个俄罗斯的威胁，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站到了联邦政府一边。达格斯坦警察部队和一批民兵首先投入了与恐怖分子的战斗，内务部随后向冲突地区紧急调遣部队。作战行动由内务部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内务部副部长科列斯尼科夫中将指挥警察的行动，第58军副军长格里申少将被任命为驻扎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然而，仅仅使用内务部队无法将匪徒迅速赶出被他们占领的地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俄罗斯政府方面，具体说就是普京总理，最终抛弃了妥协的“和平”政策，对恐怖分子表示出不能退让的强硬态度，在捍卫国家利益上表现出头脑冷静的立场。鉴于北高加索地区局势严重恶化，内务部队作战不得力，俄罗斯总统决定赋予俄罗斯武装力量全权稳定达格斯坦局势。调集了数量足够的参战部队，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卡赞采夫中将亲自指挥作战行动。

以紧急情况的处理方式向冲突地区调集增援部队和武器装备，8月10日组建了拥有2500人和100套装备的作战群。空军使用高精确度炸弹袭击了恐怖分子集结地和基地，参加反恐战斗的还有达格斯坦共和国内务部队和民兵。当地居民友善地对待了俄罗斯军人，把他们看做自己的解放者和保护者。8月15日，在我军打击下，恐怖分子被迫放弃了楚玛金地区，在博特里赫地区，他们也仅仅扼守着几处与车臣直接相连的山区居民点。恐怖分子曾经企图招兵买马，与同盟军瓦哈比教派队伍会合于所谓的卡达尔地区，但是没有得逞。俄罗斯总理普京亲临作战现场，极大地鼓舞了俄罗斯官兵的士气。

在达格斯坦警察和自卫部队支持下，联邦部队于8、9

月间将恐怖分子彻底赶出了博特里赫地区的居民点，并粉碎了车臣武装分子试图在达格斯坦共和国诺沃拉克和哈萨维尤尔特地区纠集车臣流亡人员在当地制造混乱的阴谋。

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强硬立场和果断措施最终使得巴萨耶夫和哈达卜的恐怖分子团伙被击溃并逃回了老家。联邦部队同时还在达格斯坦共和国的布伊纳克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击了他们的同盟者瓦哈比恐怖主义分子，恢复了当地的宪法秩序。

车臣恐怖分子在达格斯坦的失败伤及了元气。然而，他们的恐怖活动毕竟造成了严重后果：1500人死亡，3.2万人无家可归。有关这次恐怖活动的目的和幕后鼓动者的问题还没有水落石出。部分反恐行动参与者证实，当时广为流传巴萨耶夫同莫斯科某位面目不详的高官之间的对话被截获，巴萨耶夫就俄军动用空军和炮兵向对方表示不满：“你可是保证过不会使用空军和炮兵的”。将校军官们曾经希望能够对此进行核查，但政府至今对此讳莫如深。

车臣匪徒在达格斯坦的恐怖行动，布伊纳斯克、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3城居民楼爆炸事件，以及车臣总统玛斯哈托夫不愿制止恐怖活动和奴隶贩卖，使俄罗斯政府和公众确信，和平调解车臣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彻底丧失，终于决定直接在车臣境内展开反恐军事行动。

组建了对非法武装分子拥有绝对优势的强大作战群后，联邦部队兵分两路（“北方纵队”和“东方纵队”）于9月底展开了旨在消灭武装团伙、摧毁基地和训练营地的作战行动。由沙曼诺夫将军率领的北方纵队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便占据了车臣北部地区，突进到捷列克；由特罗舍夫将军率领的东方纵队击溃了恐怖分子的抵抗，控制了辖区内的交通要道和有利地段。向车臣境内果断派遣联邦部队是匪徒们始料未及的，使他们来不及迅速组织起有效抵抗。然而，联邦部队并未强行突进，而是在空军和炮兵对恐怖分子基地和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对一些战地指挥官进行了偷袭，并以各种火

力手段对匪徒有组织的抵抗采取有效压制以后才开始推进。包括基兹里亚尔恐怖事件罪魁拉杜耶夫在内的一批车臣战地指挥官先后被俘，或被消灭。

9、10 月间，联邦部队的攻势推向车臣纵深，将全部新建居民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这时组建了以莫兹多克为大本营的“西方纵队”，他们沿捷列克河上游分界线和松仁山脉推进。“东方纵队”从东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推进。其中，指挥部通过与“台普”长老谈判和平解放了车臣以东的所有居民区。政府首先在经济领域和社会范围采取一些措施，做百姓的工作。厌恶了连年不断的战事和已经被全民贫困逼入绝境的车臣各地百姓和顺地接受了联邦部队的出现，并且积极协助指挥部稳定局势。建立了国民自卫队，但不排除个别队伍是昔日非法武装战斗队的改头换面。在被解放的车臣土地上建立的警备司令部临时履行政府职能，协助恢复和平生活，开辟学校，向农民提供粮食种子和牲畜饲料等等。车臣行政当局逐渐恢复了日常工作，百姓生活开始趋于正常。在恢复当地政权的过程中，曾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传统风俗和现实条件。11 月底，车臣全部平原地区被解放。这时，恐怖主义势力开始对配合联邦政府工作的车臣行政当局的代表采取恐吓手段或者人身消灭，其中既有俄罗斯人，也有车臣人。

区别于 1994~1996 年车臣战争的是，联邦部队在这次作战行动中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战术，不再正面进攻居民区和敌人固守的地区，进攻只在居民区之外的地区展开，或者山脉的分界线，行军时避开公路，普遍采取大包围、大迂回和其他战术。苏—27 战斗轰炸机、陆军航空兵武装直升机和炮兵在歼灭匪徒的战斗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空军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对地面部队予以空中火力支持；空中封锁作战地区；从空中摧毁敌人的据点、基地、仓库、装备和人员；对恐怖主义非法武装人员的出没地区布雷；对恐怖分子展开心理战；空中侦察；间接指挥作战；空投兵力和物资；一般情

况下在夜间使用轰炸机群对恐怖主义非法武装的出没路径进行布雷，进而在敌人集结地区消灭其有生力量和摧毁装备，以及在敌人活动区域和集结地区实施威慑性空中打击。攻击机群还被用于摧毁敌人据点、火力点、运输工具和恐怖分子团伙，以及给地面提供支援，以弥补直升机在中空和远程方面的能力不足。独立寻找目标并予以歼灭成为空军广泛采用的作战方法。为此，使用那些接受过针对性训练并有能力独立判断目标的机组，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空袭战术缺乏突然性这一不足，因为在山区，飞机轰鸣声在20至50公里以外就能听见。空中打击要沿峡谷顺阳光照射方向进行，俯冲高度要尽可能保持在重型机关枪和其他对空射击装置有效杀伤范围外，攻击机群在可能有移动导弹防空系统对抗的地区掩护己方地面部队时要投放航空照明弹。

只有在空军和炮兵对敌方火力和人员进行了可靠的遏制以后才可去夺取恐怖分子的防御阵地。对居民点先予以封锁包围，然后再进行清剿。部队也必须这样行事，后方不得保留一块没有经过清查的居民区。山前地区由内务部队设置哨卡和关卡予以严密封锁。作战行动展开3个月以后，在车臣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要峡谷空投了战术伞兵，并由他们组成了“南方纵队”，指挥官是格拉希莫夫将军。他们最后合拢封锁圈。

但是，非法武装分子并不准备束手就擒。随着联邦部队朝车臣纵深推进，敌人的抵抗愈加频繁起来。在解放格罗兹尼、共青城和其他居民点时，均发生了激烈战斗。俄军运用的战术对他们来讲是致命的，并最终使他们走向灭亡。恐怖主义的非法武装团伙不得不转移进了山区。

政治家这次没有干涉军人的行动。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出果断和从容，以及合乎逻辑地要把事情做到底的决心——在车臣根除恐怖主义，确立合法政权。公众对军队的态度也转变了，他们终于明白了联邦军队在执行解放任务，在铲除奴隶买卖和恐怖主义，在帮助百姓摆脱匪徒强加的必须依照别

人中世纪法规生活的生存方式。如果说在车臣采取第一次军事行动时并不那么受欢迎，那么这次，俄罗斯代总统普京的果断立场得到了包括车臣人在内的俄罗斯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这次，联邦军为逮捕和消灭恐怖分子中的战地指挥官实施了特殊作战行动，使用炮兵和战斗轰炸机打击恐怖分子集结地，以及他们的基地和训练中心，并且履行起安全保卫职能。

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距离解决还很遥远。与彻底消灭恐怖分子残余同等重要的是车臣社会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今天的车臣领导人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所有车臣爱国主义者一道，正在为实现共和国的和平做着最大努力。然而，他们的行为遭到恐怖分子战地指挥员的残酷对抗，他们针对同车臣现政权和俄罗斯政府合作的人士展开了真正的战争。最重要的现实任务就是保护百姓免遭土匪袭击。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俄罗斯政府如何利用车臣社会最近出现的一些积极趋势，如何同当地百姓，特别是车臣人在俄罗斯的流亡群体和“台普”的长老开展工作。后者对车臣战争的本质必须有个清楚认识，理应把自己的人民拯救出依靠国外资助和提供武器的雇佣军人的侵占。这种土匪式的国际主义于共和国完全是陌生和异己的，他们只能把多灾多难的车臣人民带向基因储备枯竭，置车臣民族于灭绝境地。

北高加索地区当前的紧张局势乃是国际恐怖主义受挑动唆使，通过颠覆破坏使高加索脱离俄罗斯的直接后果。这里正在解决的俄罗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也决定着它的命运。不过，捣毁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车臣的策源地并不意味着在俄罗斯同他们的斗争就此结束。历史早已证明，军事上的胜利还不是最后的胜利。针对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针对国民经济设施和公路交通，针对与联邦政府进行合作的车臣地方行政当局和公民个体；不问其民族和宗教信仰，恐怖分子仍然在从事着颠覆和破坏活动。在人口

稠密区实施爆炸，袭击政府代表等恐怖活动在与车臣相连的其他地区时有发生。恐怖分子不择手段地破坏共和国和平生活的恢复进程，斗争远没有结束，通向和平的道路艰难而漫长……然而，恐怖主义在这里绝无出路，因为恐怖的矛头已指向了自己的人民，而这是得不到饶恕的。

在车臣的反恐行动使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施加的压力，各种国际组织也趁火打劫，要采取制裁措施惩罚俄罗斯在车臣践踏人权的威胁声四起，经常听到车臣问题非俄罗斯内政问题的奇谈怪论。这些国家使用人权的双重标准，表现活跃的恰恰是动用飞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那些国家。尽管这些国家自己恪守的原则是不对恐怖主义做任何退让，可它们却企图迫使俄罗斯坐下来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做出让步。它们姑息纵容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实际是为自己国家埋下了祸根，“9.11”悲剧才使美国人确信了这一点。

其实，较之所有的“捍卫人权者”和欧洲议会代表，俄罗斯更感兴趣通过谈判以和平手段解决北高加索地区冲突问题。然而，某些势力企图借恐怖主义之手来宰割俄罗斯和盟国的意志，迫使俄罗斯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去守卫基础设施、居民区和其他恐怖主义潜在袭击目标，从而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俄罗斯，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解决咄咄逼人的分裂主义问题和制止恐怖主义颠覆破坏行为时能够避免使用军事手段。国际社会同这一邪恶势力的斗争愈加趋向残酷激烈绝非偶然，俄罗斯联邦奉行的也是这种强硬路线。恐怖主义分子同外部势力紧密合作的迹象越来越明晰，车臣领土变成了国际恐怖主义训练武装分子的分支机构的藏匿之地，来自阿富汗、土耳其、中东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得到雄厚资金支持的伊斯兰不同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各类冒险主义分子趋之若鹜。有关资料表明，在华盛顿和纽约制造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均在车臣逗留过。

供参考的情报汇编

在俄罗斯，伊斯兰教是一个受到平等对待和被人尊重的信徒数量居第二的宗教。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笔者并非某一教派的信徒，但对伊斯兰教怀有好感，注意到它包含了不少令人信服思想和原则。遗憾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时而在媒体突显，它从根本上扭曲了这一热爱和平的学说。极端主义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都背离了任何准则和规矩，破坏了社会安定。在伊斯兰信徒过激行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代表自己利益的某些特定团伙，他们的利益往往同穆斯林广大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国家越虚弱，信奉伊斯兰教的国民受到政府的关心就越少，伊斯兰信徒的立场也就会越强硬，同他们做斗争时，必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手段方面拥有足够优势。

伊斯兰教是数百万俄罗斯人的权力和道德标准，是他们内心世界的核心、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和生活方式；同如此微妙的问题打交道，显然应该遵循“避免损失比获取更重要”的原则，要慎之又慎。“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的悲痛经验可以证实这一点；忘记它，便意味着轻视历史的悲剧性教训，那必将走向新的战争、新的流血、新的灾难、新的悲剧。实际上，所有国内和国际冲突都是滋生在从北非到中亚的这条“不稳定弧线”上，构成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是使穆斯林世界和后社会主义地域（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相接触的一条线。这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区。

分析研究表明，国际恐怖组织和某些国家的情报部门给予了车臣极端主义分子积极和有效的支持，车臣的分裂主义者从未感到过资金或物资的匮乏。除了武器交易和毒品生意换取的资金，他们还得到国际恐怖主义中心给予的援助，比如，本·拉登的“国际圣战基金会”，他们打着慈善活动的幌子，通过国际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把资金转到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手里。向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支援的名单

中间，有不少组织机构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欧洲国家也有合法经营的门面，它们在这些西方国家享受官方的商业优惠政策，冠冕堂皇地宣称要同恐怖主义做斗争。

在美国，大约有 50 个注册的伊斯兰社会团体，它们收集捐赠物和捐赠款用于对车臣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做出决定，建议每一位旅美穆斯林缴纳 100 美金用于对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紧急援助。在英国、德国、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苏丹、也门和其他国家都有收集钱财、收买雇佣兵的赞助商活动。比如，落脚利雅得向世界各地瓦哈比教派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资金、叫做“阿尔—哈拉梅因”的组织创立了“支持车臣基金会”，1999 年还在阿塞拜疆设立了分支机构。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的还有“阿尔—伊萨、阿尔—伊斯拉米亚”、“世界伊斯兰联盟”、“国际救援伊斯兰组织”等等。外来援助主要表现为提供范围广泛的支持，培养训练武装分子和恐怖破坏活动的执行者，以及雇佣军直接参加作战。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外来援助不中断，恐怖活动就会继续下去。切断支撑非法武装分子生存的经费和物资的外部来源，无疑会使他们缩小人员编制，减少恐怖破坏活动规模。

苏联出兵阿富汗是苏联走向同伊斯兰世界发生矛盾的第一步。后来，这一矛盾被火上浇油，被人出钱挑唆成为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国家范围内的局部战事，俄罗斯军队卷入其中。高加索起到了特殊作用，北高加索紧张局势升级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将会扩大到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防止俄罗斯成为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之间的缓冲器是个复杂的任务，重要的是避免在欧亚地区同伊斯兰因素发生冲突，避免东正教同伊斯兰教发生冲突。冲突对谁都没有利，包括其他宗教流派，尽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代表在挑拨这样的冲突，指望依靠基督东正教和穆斯林的相互削弱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在某些势力的煽动和支持下把自己对立于是

有的宗教流派。他们妄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向东正教和犹太教发出挑战，企图毁灭以色列国。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在纽约和华盛顿制造的恐怖事件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宣战。

在这一地区或者那一地区破坏稳定局势的技术手段已经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充分研究过，并且多次成功运用过。所以说，俄罗斯在车臣进行的斗争就是捍卫主权和民族利益，就是保障俄罗斯各族人民今后在统一国家框架内的生存权。在这一前提下，联邦部队的目的就是歼灭恐怖势力的非法武装，切断恐怖主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的渠道，摧毁他们的训练基地，在车臣全境恢复宪法秩序与和平生活，为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局势正常化创造必要条件。

令人欣慰的是，恐怖分子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攻击以后，俄罗斯在车臣的立场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理解，以及大家都准备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进行合作。



车臣：初步的教训和结论

对于车臣和伊契凯里的战事如果不专门探讨一些细节，那么，只能得出若干概括性的总结。

政治方面：

1. 众所周知，尽管车臣长老从古代起就多次拜见俄罗斯沙皇，请求接受车臣百姓为俄罗斯国民，并且在全俄建堂节上宣誓效忠沙皇，最后两次书面请求的日期为1781年4月和1807年3月。但是，车臣领土最终还是以武力手段被并入俄罗斯版图。

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车臣人始终手持武器，先后同沙皇专制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斗争。而且每当俄罗斯发生内讧和中央政权被削弱时，这种斗争就显得尤为积极。

历史记载了不少在久远的过去曾经依照自己的法规自由生存的那些国家被征服的例子。降服这种国家的最可靠方法

莫过于摧毁它和把其人口分离迁移。否则，无论你怎么做，无论你怎么努力，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昔日的自由和祖先的规矩，一旦有机会，就要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看来，斯大林谙熟此道，他把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强行迁移到苏联其他地区，以防止他们发生骚动和暴乱。车臣人从流放地返回以后，继续奉守自己的法规，莫斯科遥控使用得到信任的人履行国家领导职能。在车臣人的心底，对往日自由的记忆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泯灭。他们等待着时机，并且终于等到了。戈尔巴乔夫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为觊觎主权的车臣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古以来，车臣就是北高加索地区反对俄罗斯入侵的传统领头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车臣这种危机和冲突的固定策源地的作用竟丝毫没有改变。车臣冲突实际是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在“改革阶段”的短视政策以及缺乏民族政策的必然后果。这一冲突也表明，造成威胁俄罗斯领土完整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正在日益膨胀。1989年到1990年开始实行“松绑”政策，当时对斯大林的镇压带给百姓的苦难和委屈给予补偿的期望高涨，也引发了车臣的国家主权化问题。某些势力则打起“车臣牌”，妄图颠覆苏联的制度和构成，将它一棍子打死。苏联领导人以为，随着杜达耶夫当选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掌权的是个“被莫斯科驯服的好车臣人”，但是他们错了。那里的局势并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设计发展，可莫斯科最初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英明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今天，更要考虑明天，还要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如果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做到这些不算难。用和平手段能够获得的远比战争手段多得多。可惜，在车臣没能这样做到。

2. 与车臣悲剧直接相关联的就是俄罗斯当局不能确定稳定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范畴的新核心，政府展现的是没有帝王思想的帝王自尊。就为实行强力政策而提供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方面的保障而言，领土必须完整和宪法

秩序必须恢复的理由不怎么令人信服。另外，车臣的武力冲突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这就是贬低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削弱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地位，把它挤压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使里海的滚滚石油绕过俄罗斯。

车臣冲突并非自生，而是人为制造的受控危机后果。俄罗斯经受的困难是国家领导人执政失误的结果，而敌人善于利用这些失误。北高加索地区武装冲突的胶着状态持续得越久，对西方越有利。绝非偶然的是，联邦军队指挥部是被“束缚住手脚”地在车臣从事战事的，因为同西方财政金融界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政治人物三番五次地予以干涉，在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已经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从莫斯科下达停火令，恢复和谈。1996年同车臣签署的和约完全违背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迎合了西方某些财团的利益。

3. 1994年的客观局势并不是非出兵不可的。利用政治手段和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都还没有完全丧失，而主观的和唯意志论的因素却起了决定作用。联邦部队进入冲突地区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促使武装冲突升级，招致了悲剧后果，适得其反地使北高加索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不合时宜地采取的考虑欠妥的行动演变成为数万人的死伤和残废，数十万难民逃离。俄罗斯在政治、物质和道德方面蒙受了不可思议的损失，也就是签署和约为我们在车臣留下的后患。

俄罗斯当局动用了军队，却一个问题也没能解决，相反，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车臣的国民经济被毁，数万失去生计的人沦为多余的人，度过战乱年代的数千非法武装分子已经生疏了劳动技能，重操旧业——当地的传统生存方式，掠夺和绑架无辜，勒索赎金……。

在车臣的第一次行动中使用军事手段并没有遏制住分离主义倾向，车臣实际上已“独立”于俄罗斯，充当起欲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前哨阵地。

1999年第二次出动联邦军队是针对车臣恐怖主义非法武装的阴谋而采取的对策，目的在于把车臣与相接的毗邻地区隔断，保护百姓免遭土匪袭击，并解放车臣境内的平民百姓，使他们摆脱土匪制度。制止土匪行径，保护车臣百姓和相邻地区人民的安全，也是联邦强力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4. 战争总是在生活着平民百姓的区域展开。所以，在决策阶段就应当考虑到这个因素，并且要提前做好准备，承担伤亡及无辜的责任。历史上不曾发生过一次不伤亡及无辜、不践踏人权的战争。很遗憾，战争期间其实是无法避免伤亡及无辜的。所以，那些下令开战的政治家们为无辜受害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发出的牢骚和愤懑听起来很奇怪，但愿别亵渎他们的良心。现代战争的野蛮性恰恰在于，武器给平民带来的伤害大大超过了军队。

5. 联邦军队在车臣结束了攻势作战行动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区的战争已经完结，不过，它具有了另外一种其危险后果不亚于过去的外部形式。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达到分离目的的主要手段。车臣已演变为恐怖主义的“穴巢”、毒品和武器的转运基地、世界其他地区的武装分子训练基地。同恐怖主义势力做斗争要求国际社会动用更多的力量，而且这种斗争不会每次都获得成功。恐怖主义分子难以被伤亡及要得宜于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社会努力避免伤亡及任何无辜。1999年在车臣开展的反恐怖军事行动是事情的一种必然，它应当持续到恐怖主义分子在北高加索被彻底消灭为止。

军事方面：

1. 1994年决定派遣军队进入车臣执行特别作战任务和恢复当地宪法秩序时，没有对局势进行相应分析，没有预测高加索局势的发展前景，没有研究冲突原因和杜达耶夫政权的意图以及能量，甚至忽略了俄军自身状况和外来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生了对俄罗斯联邦军队和车臣百姓来说都很惨痛的事情。

1999年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在计划

俄罗斯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教训

动用军队和策划作战行动时充分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和局势，迅速取得了积极效果。虽然反恐作战行动尚未最后结束，但已经给未来注入了极大希望。

2. 1994年至1996年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初衷是威慑住对手。然而，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决定使得军队没有在动手前进行适当准备，而这种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时军队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已经两年多了。部队的专家配备情况和武器装备状况均亟待改善，相当数量的装备和武器已不适用于实战，维修和恢复它们的使用功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材料。军用蓄电池的糟糕状况简直就是危机。这样的军队怎么能胜任面临的任務呢？这种状态的后果只会令人伤心。所以我还要重复强调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如果已经决定开战，那就要认真地做，绝不要敷衍了事。着手战事准备的出发点必须是组建有能力对战区实行可靠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击溃或者封锁住对方作战队伍的强劲作战群，而且要根据战役特点让这些部队提前进入备战。动手前要做好缜密的侦察，充分估计到对手的潜在实力，使用轰炸攻击机和炮兵对其重要目标发起先发制人的密集火力打击，使对手的指挥系统瘫痪，同时兼用侦察破坏等特殊手段。部队最好从不同方向朝各关键区域进发，迅速对其实行控制，保护好那里的平民百姓。部队不要进入居民区，而只是予以封锁包围，迫使对手停止抵抗。在车臣展开恢复宪法秩序的军事行动中，上述措施无一使用。

1999年至2000年车臣反恐战役期间，联邦部队的作战行动考虑周全，迅速而有力，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3. 在备战大规模战争的同时，要建立相应体制备战现代局部战争和小型战事中的作战行动，要根据实战经验制定指导性和条例性文件。

1994年至1996年的车臣战事中，在大多数场合下，联邦部队的作战都是还击性的和消极的，无法给非法武装分子造成出其不意。部队表现出没有做好战事准备，甚至无法发

挥重型武器的威力优势。指挥员在组织火力杀伤和调动武器使用的战术环节上，以及组织侦察、行军和警戒方面暴露出知识和技能的缺陷。没有遵照军事条例组织作战，经常表现为完全的疏忽。排、连、营的指挥员在山地战条件下不会选择地形，在作战指挥中表现出缺乏实战本领。整个作战行动进行得不够积极不够坚决，缺乏足够的坚定性。战斗过程中的间隔和中断都时间过长。

部队，首先是指挥官，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作战过程中发生的局势变化和敌人的战术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反应，以便调整战术，充分利用现有力量组织起有效的火力杀伤，或者迷惑住敌人。与空军和炮兵协同作战的突击部队特别不善于在居民区行动。连排长在部队向进攻目标推进时，或者在进攻过程当中，仿佛就丧失了指指挥技能，也不会利用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打击成果，更不会巩固阵地和组织防御，甚至不知如何脱离战斗和撤退。没有提前划拨出数量足够的后备力量应付敌人的变着和战场上的意外情况，发生过被假象所蒙蔽，使敌人隐瞒了真实意图的事情。

鉴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采取游击战术，迫使人员编制不足的俄军在驻扎地实行昼夜警戒值勤，搞得士兵筋疲力尽，产生无所谓和冷漠情绪。另外，我军单兵训练水平也不高，特别是狙击手、驾驶员和机械师，他们的体能承受力较差。战士没有学会在战场上移动，不会正确选择阵地和构筑，不善于伪装，不会把武器装备调整到实战状态，不会使用夜视仪器，不会在夜间使用照明器械察看地形。士兵装备已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不实用，军装易破损等等。总之是没有建立一种生存和休整体系。

电子战、通讯机构和侦察机构在技术装备方面也暴露了严重不足。

部队的备战状况同赋予他们的局部战争任务不相适应，以及参战部队中间作战人员和武器配备欠缺和仓促应战是1994年至1996年车臣境内武装冲突中俄军失利的原因。

尽管在 1999 年至 2000 年的车臣反恐战事中俄军的上述不足和缺陷已经被克服和弥补了很多，但暂时还没有做到彻底杜绝。

4. 组建用于局部武装冲突地区的作战群一定要以组织参谋机构和指挥系统完整、并具有相当物资储备的备战水平好的部队为基础。策划这样的战役时，必须有足够长的备战时间，才能使参战各部达到有效的协调配合和战术默契，以及掌握特殊的作战手段，这样才能指望战斗以胜利告终。

战斗打响后，行动必须积极勇敢，不给敌人喘息和重新组织的机会，直到他们被彻底击溃或者投降。还要确立坚定的目标，制定好包括多面强攻的行动，分割敌人，不让其迂回，断绝敌人物资和人员的补充渠道。作战行动必须造成敌人措手不及，还要勇猛果敢，战斗中不要有大的停顿和间歇。遇居民点要迂回绕行，然后予以封锁包围，再进行“筛查”。提前摧毁基地和武装人员训练营地意义重大，不论它们位于何处，我们都要集中兵力和装备予以摧毁。

占据地域空间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军事介入实现对整个冲突地域的控制。派遣部队进入规定辖区，建立大本营式的防御中心和限制非法武装人员随意调动的工事。

利用大部队对付非正规的武装分子战斗队只有当对手集中大部分力量进行拼死抵抗时才是有效的，而使用大部队对付小规模的非非法武装机动队伍则会收效甚微。对非法武装盘踞地区实行军事经济、军事政治和信息封锁不失为上策。

5. 和平时期建立的部队作战群指挥体系到了危机时刻也不要改变。因为保持规模庞大的集成军指挥部和参谋部是没有道理的，不断变换部队的指挥隶属关系对于策划作战行动，特别是组织友军相互配合，以及全方位的保障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车臣，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快速反应部队、联邦安全部队等不同兵种的指挥和协调问题并没有解决好。联邦安全部队、联邦快速反应部队和内务部作战指挥组基本上是各

自为政，执行各自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同其他部属部队没有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实际上是在独自解决自己的任务。这样，人力物力都被分散了。缺乏协调也是经常性的，难怪炮兵和空军误伤己方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实施类似战役时，必须建立具有统一侦察、联络和指挥点系统的联合指挥部。必须在各级建立协作协调关系，在战役的各个阶段注意保持。指挥必须要统一，要服从于执行主要作战任务的那支部队指挥官的领导。

6. 恐怖主义的扩张迹象是明显的。颠覆破坏和恐怖暗杀成为各路极端主义分子活动的主要手段，他们借此达到全球性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恐怖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参与的力量越来越强悍。直接参与反恐战斗的已经不仅仅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反恐部队（“阿尔法”类型的），还要动用空军、炮兵和常规部队。反恐军事行动经常表现出兵种联合作战的特点，只不过它具有特殊的战术和战略性质。要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策略专门研究制订规划，并据此来训练部队。

车臣反恐军事行动的主动进攻阶段结束以后，特种部队将在最后歼灭残敌的阶段发挥特殊作用。同时要求建立全球性的反恐体系：通过特工机构采取通缉措施；跟踪侦察，不惜代价逮捕或者消灭恐怖主义队伍的战地指挥官，不论他们藏身何处；对那些确实同恐怖分子有勾结的人必须进行惩处，公开交付法庭，或者勒令迁居；对待这类人物中的外国公民要有专门措施；要广泛利用假情报迷惑恐怖分子，并揭露罪行使他们成为过街老鼠；在俄罗斯境内开展的反恐活动中，流亡的车臣人群体、与黑帮土匪有瓜葛的犯罪团伙、企业团伙、支持恐怖分子的群体中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都应该成为注意目标。

7.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在高加索方向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南部的军事实力，取决于俄罗斯军队和其他联邦武装机构所处的保卫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准备状态。政治家的意志和始终不渝是举足轻重的，而对手持武器捍卫这一

安全的那些人的关爱同样事关重大。

8.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规模，他们利用“小型”战争的策略，正在对不同国家构成现实的或者说是主要的威胁。恐怖分子理应不受法律保护，而对那些支持他们的国家，国际社会应当摒弃双重标准，予以制裁。



结束语

出兵阿富汗是苏联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决定。它导致了该地区的战争升级，也是苏联解体和目前仍在中亚持续的剧变的诸多原因之一。招风者引来的是暴风雨。俄罗斯最近 10 年经历的悲剧已经把这个千年古国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一个拥有世界上最辽阔领土和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在被改造了的“首领”的关照下被迫伸出了乞求之手。俄罗斯经济和精神复兴的潜在能力是巨大无比的，现在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确定民族理想和历史发展远景，领会面临的任務，为完成它而团结一致，并且寻找到可靠的盟友，这一切都还为时不晚。

数百年来，广袤浩瀚的草原始终是俄罗斯的南部疆界，那里不断迁徙流动着把死亡和毁灭带给俄罗斯人民和城市的游牧部落。因此，俄罗斯国策最为重要的部分向来都是捍卫南疆和铲除源自高加索的威胁。最近 1000 年来，欧洲能幸免于来自无边无际的亚洲空间的游牧部落金帐汗国的进犯和袭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俄罗斯，这同时也为欧洲今天的繁荣提供了保护屏障。

我想，很多欧洲国家对待俄罗斯的轻视乃至敌视态度，今后恐怕要另寻出路了。毫无疑问，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欧洲的盾牌和缓冲带，放弃优先以欧洲为发展方向的时候到了。必须充分利用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不仅要同欧洲国家，还要同亚洲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其次有日本、韩国、越南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当然不可放弃同伊斯兰世界重要国家的合作。我们与它们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相反，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前景。比如，伊朗拥有成为欧亚大联盟核心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性。最近这些年形成的地缘政治力量均衡就是这样，它迫使伊朗为自己寻找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同盟者。

俄罗斯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必须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它自己还要确定，以什么样的立场和原则，同谁合作，与谁友好相处。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水平应当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考，以及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优先的基础上加以确定。在这些问题上，一个国家采取了别人都能理解的强硬的原则立场，那对它就会有利，而且是长期的、稳定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民族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古老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观念，这个民族就能保护和创造本民族复兴和繁荣的条件。在不远的过去，我们的许多民族问题基本原理都被偷换了概念，使国家遭受了沉重损失，使国民情绪压抑。随着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国家出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俄罗斯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潜能来捍卫民族利益和振兴国家。

评价阿富汗战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时，必须指出，这个国家的领土已经逐步演变成为演兵场，来自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印度尼西亚、乍得、缅甸、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武装人员在这里接受训练。在阿富汗的激进武装分子中间，还有来自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甚至中国新疆地区和美国非法移民中的穆斯林。这里也是国际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栖身之地。

西方专家估计，除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顾问之外，阿富汗领土上的恐怖分子的总数约为 2500 人。他们为了金钱踏上阿富汗领土，战争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这些人用华丽的辞藻为自己辩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雇佣军的事实。随着圣战者和塔利班先后执政，伊斯兰激进主义始终在利用

他们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思想。

恐怖主义已经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祸患。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时代像 20 世纪这样“赐予”人类如此之大的恐怖主义伤害，需要所有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恐怖主义这一邪恶势力。恐怖主义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庞大，恐怖主义刀下的无辜者越来越多。如果说，过去他们的矛头多指向个别人物，那么现在的遇难者大都是与恐怖分子试图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的无辜百姓。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公然对华盛顿和纽约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袭击，造成数千无辜者死伤，使国际社会感到极大震惊。面对恐怖主义袭击，一个超级强国精心建立的防御体系竟然如此脆弱，简直不可思议。大家都希望，这次事件能够成为反恐怖斗争的转折点。

美国政府对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宣战。阿富汗成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因为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嫌疑人本·拉登被塔利班保护藏匿在了阿富汗境内。

美国人明白，以空军和导弹为手段的军事打击，达不到消灭本·拉登的最终目标，必须付诸困难巨大和前景不明朗的地面行动。美国人的策略是不慌不忙、井井有条，而且非常高明地进行着复仇行动的准备，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调集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装备，促成了以前国王扎希尔·沙赫和北方联盟为基础的阿富汗问题协商会。

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和英国空军开始对塔利班的指挥点、武装分子训练基地、军事目标、机场和防空系统实施空中和导弹打击，为投入地面部队扫清障碍，掀起了代号为“持久和平”的反恐怖军事行动。

我认为，美国领导人缺乏对当地地缘政治的深入研究分析，没有充分预测到动武对自己同当地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关系会产生长期影响，愤怒情绪和急于对恐怖主义袭击华盛顿和纽约予以报复在美国当局的行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必须做好面对严酷斗争的精神准备，所以，请不要忽视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境内 10 年积累的作战经验。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档 案

俄罗斯总统档案、机密文件保存中心、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馆、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指挥总局档案、侦察总局档案、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993 年 EO12356 条款由泰利解密和降低保密等级的文件、苏联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档案、瓦连尼科夫大将档案、博洛维克档案、作者本人档案。

书 籍

《阿富汗革命的现实问题》，M. 阿鲁诺娃、B. 巴索夫、B. 普拉斯通、C. 波尔塔夫卡娅著，“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 年。

《列夫·罗赫林——将军的生与死》，A. 安吉波夫著，“艾克斯莫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

《代号：眼镜蛇》“信号旗”丛书，Э. 阿卜杜拉耶夫著，莫斯科，1997 年。

《隐蔽的战争》，A. 博洛维克著，“绝密出版社”，莫斯科，1999 年。

《人民派与旗帜派：争夺阿富汗政权的主要阶段》，Ю. 布拉托夫著，“科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97 年。

《纪念 1979 年至 1989 年在阿富汗牺牲的苏联克格勃部

队和机构的军人》，B. 维诺格拉朵夫、Г. 杰格捷列夫、A. 杜纳耶夫著，“国境线出版社”，莫斯科，1993 年。

《小型战争——游击战与破坏行动》，M. 德洛勃夫著，“信号旗”丛书，莫斯科，1998 年。

《特工队长笔记》，Ю. 德洛兹朵夫著，“俄罗斯传记研究出版社”，莫斯科，1999 年。

《333 进攻行动》，Ю. 德洛兹朵夫、B. 库里洛夫著，“信号旗”丛书，莫斯科，1999 年。

《侦察：面孔与身份》，B. 基尔比琴科著，“戈亚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

《孙子兵法》，H. 康拉德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0 年。

《私事》，B. 克留奇科夫著，“沃利姆普出版社”，莫斯科，1996 年。

《趁火打劫者出局》，Ю. 库兹涅兹著，“国际普拉科斯出版社”，莫斯科，1992 年。

《阿富汗：历史的教训》，B. 蒙强编，“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90 年。

《转折时刻——俄罗斯将军笔记》，A. 尼古拉耶夫著，“当代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

《战火中的阿富汗》，B. 普里马科夫著，“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29 年。

《纳吉布拉：地缘政治重压下的阿富汗》，B. 普拉斯屯、B. 阿德里阿诺夫著，“俄罗斯传记研究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

《库什卡战役》，彼德洛夫著，土库曼斯坦第 2 军参谋部印刷厂，阿什哈巴德，1910 年。

《人民君主制》，И. 索洛涅维奇著，“索菲亚之光出版社”，明斯克，1998 年。

《阿富汗：伊斯兰反对派。根源和目的》，B. 斯波尔尼科夫著，“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0 年。

《阿富汗》，M. 斯林金著，国际生态—政治学大学，辛菲洛波尔，1995 年。

《掌权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M. 斯林金著，国立大学，辛菲洛波尔，1999 年。

《阿富汗》，A. 斯涅萨列夫著，“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21 年。

《破坏者手记》，И. 斯达里诺夫著，“信号旗”丛书，莫斯科，1997 年。

《缓爆雷》，И. 斯达里诺夫著，“信号旗”丛书，莫斯科，1999 年。

《叛乱记录》，Ф. 穆罕默德著，“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8 年。

《国际主义使命》，H. 齐加尼克、Г. 阿列克谢耶夫、B. 土尔宾著，莫斯科，1999 年。

《健康与政权：克里姆林宫御医回忆》，E. 恰佐夫著，“新闻出版社”，莫斯科，1992 年。

《侦察队长生活片段》，Л. 舍巴尔申著，“捷拉出版社”，莫斯科，1994 年。

作者采访过的与阿富汗战争 有关的人士名单

(受访者军衔以本书撰写时为准)

国防部方面

苏联出兵前已在阿富汗工作的有关领导人

苏联英雄帕甫洛夫斯基大将、梅里姆斯基上将、巴扎耶夫上将、波普科夫上将、扎帕拉金少将、图图什金少将、库兹涅佐夫上校。

1979年12月27日喀布尔行动参与者

苏联英雄沃斯特洛金上将、什帕克上将、古斯科夫中将、苏联英雄科列斯尼克少将、波波夫少将、上校军医阿列克谢耶夫、伊普拉辛莫夫上校、什维兹上校、图尔松古罗夫中校。

苏联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指挥组领导人

苏联英雄索科洛夫元帅、苏联英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苏联英雄瓦连尼科夫大将、加列耶夫大将

苏联国防部中央机构军官

希特诺夫上将、布鲁金上将、库兹涅佐夫上将、博戈达诺夫中将、普罗科普奇克中将、舍甫琴科中将、索罗玛金中将、罗果夫中将、尼基坚科少将、拉夫里年科上校。

土库曼斯坦军区军官

苏联英雄玛克希莫夫大将、捷尼索夫上将、戈里申中将、克里维斯基少将、鲁奇斯基少将。

第40集团军指挥官

图哈里诺夫上将、叶尔玛科夫大将、罗基奥诺夫大将、格罗莫夫上将。

第40集团军官兵

苏联英雄格拉乔夫大将、巴伦金上将、瓦谢宁上将、苏

联英雄维索斯基上将、格列科夫上将、卡斯别罗维奇上将、苏联英雄科特上将、玛耶夫上将、米罗诺夫上将、谢尔盖耶夫上将、索科洛夫上将、苏联英雄帕甫洛夫上将、鲁兹里亚耶夫上将、阿德列耶夫中将、阿托年科中将、苏联英雄涅维洛夫中将、苏联英雄皮斯梅内中将、罗赫林中将、斯米尔诺夫中将、戈里果里亚兹中将、耶罗维克少将、库兹明少将、谢列博洛夫少将、乌奇金少将、丘尔金少将、尼古连科上校、维列捷尼科夫上校、克林采维奇上校、拉普申上校、特卡切夫上校、图尔拉伊斯上校、哈巴罗夫上校、苏联英雄拉伊良上校、沙雷波夫上校、卡扎克帕耶夫大尉、列兵谢苗诺夫。

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

格列罗夫中将、萨尔玛诺夫大将、沃斯特罗夫上将、索兹科夫上将、舍因上将、格拉乔夫大将。

驻阿富汗苏军顾问

格雷申中将、斯捷潘斯基中将、克里维兹基少将、察果洛夫少将、科列诺伊上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

克格勃第一总局军官

舍尔巴申中将、基普皮契科中将、格鲁别耶夫中将、德洛兹朵夫少将。

驻阿富汗克格勃机构领导人

伊万诺夫中将、巴格丹诺夫少将、扎伊采夫中将。

1979年12月27日喀布尔战斗参与者

波里亚科夫上校、普列什古诺夫上校、罗辛上校、金上校、尼谢夫上校、普恩图斯上校、里亚宾宁上校、果罗瓦托夫上校、舍尔金上校、伊佐托夫上校、伊尔瓦涅夫上校。

攻打塔日—别克宫参战者

苏联英雄卡尔布辛少将、罗曼诺夫上校、果洛夫上校、叶梅舍夫上校、巴拉绍夫上校、古梅内上校、苏联英雄科兹洛夫海军上校、谢苗诺夫上校、别尔列夫中校、卡列林中校、库里洛夫中校、兹维特科夫中校、格里申中校、科洛梅耶茨中校、科里莫夫中校、库兹涅佐夫中校、菲德谢耶夫中校、图尔松库洛夫中校。

外交部方面

多勃雷宁、塔巴耶夫、莫扎耶夫、叶格雷契夫、沃伦佐夫、留里科夫、别什科夫、哈基莫夫、米哈伊洛夫、阿列克谢耶夫、玛尔亚索夫。

苏共中央方面

巴索夫、布鲁坚兹、维谢洛夫、扎米亚京、波里亚科夫。

东方学专家

阿鲁诺娃、冈科夫斯基、普拉斯屯、玛拉申科、米尔斯基、斯林金。

外国人士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特尔奈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雇员奥朵姆中将、情报机构雇员哈里松、国务卿特别助理舒尔曼、国家安全委员会雇员西克、国务院雇员加里松；联合国使团负责人赫尔米内、代表波·彼尔内斯、谢万、阿富汗总统纳吉布拉、副总统拉菲上将、国防部长塔奈上将、内务部长古里亚博佐伊上将、内务部长瓦坦扎尔上将、安全部长雅库博上将、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杰拉瓦尔上将、坎大哈省长奥留米上将、工程兵司令阿尤普中将、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加伏尔中将、司法部长巴格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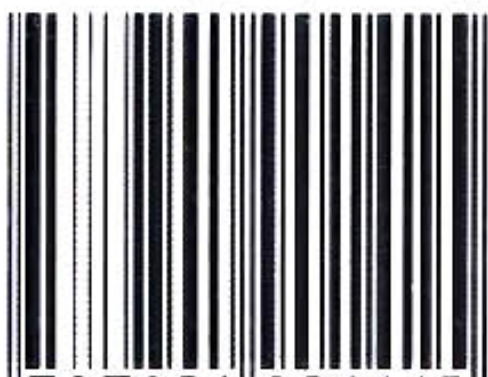
- 秘密准备
- 出兵在即
- 代号333行动
- 棘手的事
- 战争总结和经验教训

阿富汗人民在捍卫古老传统、民族文化和自己宗教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甚至值得对手钦佩。

阿富汗社会的暴政改造实验失败了，阿富汗已被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招风者最终引来的是暴风雨。阿富汗战争使苏联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损失。

ISBN 7-80190-141-X



9 787801 901415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90-141-X/K · 049

定价：

39.00元